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FERNAND BRAUDEL

文明史

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常绍民 冯棠 张文英 王明毅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常绍民 冯棠 张文英 王明毅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中译本序

不知道布罗代尔之名何时传入中国，较多介绍肯定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笔者初闻其大名是在1980年，张芝联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主办的系列讲座“青年世界史学”上介绍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是讲述的重点。许多年过去了，知道布罗代尔的人越来越多，谈论布罗代尔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不限于史学界。布罗代尔成为受国人关注最多的几位当代西方学者之一。终其一生，除大量论文外，布罗代尔主要撰写了以下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史》）、《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法兰西的特性》，以及他的史学文集《论历史》等，均已有了中文译本；他这本写给青少年的《文明史》，历经两年的翻译，今天得以与读者见面了。翻检当今学界，有此幸运者能有几人？

布罗代尔无疑完全配得上这种幸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他成为法国史学的化身和标志性人物，在西欧学界也享有崇高地位。不止一位评论家这样断言：如果诺贝尔奖专设史学奖，那么布罗代尔在世时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位。即便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人们谈起他来仍满怀尊崇之情。“史学界有了难以超越的布罗代尔，所以我就转而从事其他行当。”不止一次亲耳听到地位绝对不算低的法国教授这么说。至少在笔者听来，这不是戏言。

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大量介绍到中国时，他在人生和学术方面都步入了暮年。几部代表作被译介过来时，他本人已归土为安（布氏于1985年11月27日去世）。这几部代表作中，最先出版中文版的是《物质文明》（三联书店，1993年），其次是《法兰西的特性》（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第一部《空间和历史》，1996年出版后一部《人与物》上下两册），最后是《地中海史》（商务印书馆，1996—1997年），此时离这部经典之作问世已有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布氏的著作早已有英译本及其他十来种文字的译本，但国人真正了解他的学说和思想靠的还是中译本。据说我国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在去世前夕不忍释卷的就是英文本的《地中海史》。但诚如不少人所言，他的著作篇幅宏大，博大精深，读起来太过困难。固然，此前大量文章、专著谈论过布罗代尔及其著作，但据笔者粗浅所知，且不说法文原版，在中译本问世之前，通读

过布氏任何一部代表作的人即便说有也寥寥无几。（时至2000年，权威性中文历史刊物《世界历史》在其卷首语中仍在对从未读过布氏著作而奢谈年鉴学派的现象提出批评。）

我们一直回避使用“了解”或“理解”这样的字眼。从其几部著作在中国销售的情况看，或许不少人现在阅读过《地中海史》，尤其是《物质文明》（这部书在国内卖掉了数万册），但从迄今发表的论文、专著看，泛泛介绍者多，钻进去求得了解者少，同时误读现象时常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著作被引入的先后顺序有关，人们谈论《物质文明》的多，谈论《地中海史》的少。不算太少的人把《物质文明》视为布氏的代表作；不算太少的文章在谈论、引用《物质文明》时，关注的是他的所谓结论：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因为当时国内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问题余波未平。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把布罗代尔庸俗化了。顺便说一下，20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文章说，年鉴学派已经衰落、分化了，进入了穷途末路。事实是否如此，尚值得商榷。至少在法国，年鉴学派各大家的著作仍赫然摆在图书馆和书店突出位置。即便在人口不多的小国荷兰，译成荷兰文出版的年鉴学派的著作在书架上就占了好几排。倒不如说，“年鉴学派”一词已不必多提，因为作为当今法国史学界的龙头老大，它的地位经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等几代人的努力已根深蒂固，不必像早年布洛赫等那样要为“新史学”而大声疾呼。至于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无可厚非。年鉴学派从中世纪入手突破旧史学的重围，为了改变旧史学偏重政治史、君王史的陋习而力倡社会经济史、精神史，并在方法上力求归纳融合一切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方法，以致给人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在年鉴学派笔下人物失去了地位，历史失去了趣味，基本的事实不再为人关注。这是斗争的要求。布罗代尔撰写《文明史》，后辈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撰写在法国竟成为畅销书的《蒙塔尤》，勒高夫撰写《圣路易传》，表明历史在年鉴学派笔下同样也会具有魅力。

在西方学术界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好的传统，既重视书本和理论知识，也重视田野工作。研究中国的人如果没有在中国待过一段时期，很难被视为一个合格的汉学家。透视布罗代尔的成长道路，也可看到这一点。这位曾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史学巨擘生于1902年8月24日。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洛林乡下度过的，熟悉有关农业、植物、树木、家畜饲养等乡村生活。长大成人后，本来一心一意研修医学的他迫于父命进了巴黎大学历史系，并逐渐喜欢上了历史学和地理学。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1923—1932年，他在地中海彼岸的阿尔及利亚任中学教

师，并开始对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利用假期遍游了除埃及以外的地中海诸国，出入多个国家的档案馆，得以“全面认识”地中海的地理景观和它的历史作用，萌发了以地中海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念头，并为此收集了大量相关材料。1935—1937年，他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度过了他自称“很重要的时期”。在这里他体验到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对地中海历史得出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因为“远离故土产生的新奇感……能帮助你更加全面地理解周围的事物”。在其思想趋于成熟的这段时期，布罗代尔结识了正在为“新史学”而奋斗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并被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1946年更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迷住了。他本意是从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撰写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但现在一个全新的地中海史逐渐成形。

就在布罗代尔准备动笔写作其思索已久的博士论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斗打响了。布罗代尔应征入伍，驻守马其诺防线，结果被德军俘虏。在孤独、沉闷、难以忍受的五年战俘营生活中，身体得不到自由的布罗代尔在精神上却神游波澜壮阔的整个地中海，并把心得体会记在已获释难友寄来的练习本上。实在难以想象，这部旁征博引，涉及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和加泰罗尼亚文等多种文字，初版长达1300余页，内容庞杂、卷帙浩繁的巨著，是在监狱中几乎全凭记忆完成初稿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47年，这篇题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两年之后，即1949年，该书分两卷正式出版。

笔者无力对布罗代尔的整个学说及其著作进行深入、全面的评价，在此我只想重点介绍他两部不同风格的著作：一是其成名之作《地中海史》，一是《文明史》。

首先谈一谈《地中海史》。诚如布罗代尔夫人所言，它是布罗代尔最负盛名的著作，其重要性非其另几部著作所能比拟。该书获得好评，主要不在于作者在收集、分析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虽然这一点同样令人钦佩），不在于作者由此得出的异于常人的结论，而在于它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地中海地区）和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在这部长达150余万字的洋洋大作中，作者从总体史学的思想出发，努力把16世纪后半期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时期（1556—1598年）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在作者笔

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海洋，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该书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台阶，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时间计量单位来写。具体说来，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自成整体，单独阐明一个问题”。第一部分题为“环境的作用”，根据地理观察的框架和脉络仔细寻找了地中海历史上局部的、不变的、重复的事物，即“具有规律性的事物”，论述的是它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第二部分题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可以说是一部社会史或群体和集团史。这是一种处在地理环境之上而又有别于它、节奏缓慢的历史。该部分重点考虑的是“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第三部分题为“事件、政治和人”，属于传统历史学的部分，叙述的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和动荡的历史。……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它们……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这三个部分也就构成了作者所说的长、中、短三个时段。它们构成了历史乐章的多个声部，因为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个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按照这样的结构和安排，书中首先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进而探讨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最后涉及16世纪中晚期该地区的政治史。为了阐明地中海的全貌，作者广泛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把宏观分析与微观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所述时代地中海和相关地区人类的全貌，揭示了它的命运，向人们展现了一部在时间轴线上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三个层面，在空间上不同尺度交错坐标共同演绎的历史。《地中海史》甫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费弗尔称它“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具有革命的性质”。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从它对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如此，从对年鉴学派的发扬光大来说更是如此。年鉴学派的主要贡献或者说主要特点在于倡导总体史学（histoiretotale，所谓“真正唯一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诸如此类；倡导比较研究；倡导打破学科界限，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用到史学研究之中。凡此种种，在《地中海史》中都得到了完满的体现。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和费弗尔都是不可多得的史学家。两人也都撰写过一些优秀的史学著作，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和《具有魔力的国王们》，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不信神问题》《一种命运：马丁·路德》和《大地与人类演化》等。虽然这些著作运用了他们积极倡导的新史学方法，但难以说是体现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典范之作。布罗

代尔的《地中海史》在研究深度、广度和成就上明显超过了其精神导师。此书也奠定了他作为年鉴学派旗手和第二代领袖的地位。相比之下，他的另两部著作，《法兰西的特性》属于未竟之作，被国人大加推崇的《物质文明》着重探讨的是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是在《地中海史》基础上的发展，且过于琐碎，在方法论上也没有什么突破。因而，要了解布罗代尔，了解其学说思想，必须从《地中海史》入手。

《文明史》是布罗代尔最后一部被译成中文的重要著作。这部书初版于1963年，写作初衷是为法国16—18岁的男女中学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年鉴学派方法——编写的教材。全书计约40万字，分为三大部分（中译本作上、中、下编）25章。第一部分“文明释义”着重叙述了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它首先“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第二部分“欧洲以外的文明”分为三个小部分，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黑色大陆”（非洲）、“远东”的文明。第三部分“欧洲文明”同样分为三个小部分：“欧洲”“美洲”，以及“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叙述东欧和俄国的历史）。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学术界的布罗代尔力图借这部作品，说明和示范如何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然而，它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是一部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

首先，作为教材，这一著作旨在说明和示范如何讲授“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为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要做到这一点，一项基本原则是要让接受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要力求公正。“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平铺直叙、形象、电视系列片、电影，即大体上传统的但又改进了的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因而，撰写历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人同时应该是“语言大师”，写作态度要极其认真，“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然而，当时法国教育的现实，却是在中学低年级班讲授新史学。在第二阶段，直到中学结业班，才讲授传统史学，即叙述、事件、年代、战争。曾经当过教师的布罗代尔非常不赞成这样划分课程，力主把步骤颠倒过来：“假如由我负责，直至一年级，我教授传统史学，叙述史学：讲讲，停停，解释更重要一些的事件，不时地略提一下社会

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见解；在中学结业班，我集中讲‘新—新史学’和‘新—新—新史学’。”这样才能使尖端的历史学富有生机。教学的目的是要学生“发现视角，发现过去时代的真实性，发现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义，发现种种连续更迭，给它做出标识，立下标杆，赋予它第一个可以辨认的面貌”，是要帮助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当说，这是一种理性而富有创见的思路，它也至少部分地匡正了人们认为布氏只注意结构、局势而忽略人物、事件的误解。不过，由于法国史学界和教育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请参见本书法文版前言），布氏的这一著作未能真正列入中学教材。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它是由当代最有名的一位史学家以一人之力撰写的一部通史。在当代，随着学术分工的细化，也出现了学科碎化的状况。最有影响的通史类著作如《剑桥世界史》系汇集多人之力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每一章每一节都可以延请最有名的专家，保证书稿的质量。但其弱点也非常明显：各个部分自成一体，难以会通；这样的著作往往具有学术性，而失去了史魂，即思想。布氏的这部书不然。它是在大量汲取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布氏自己的理论体系，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及总体史学观念，写成的一部通史。用法国著名史家莫里斯·埃马尔的话说，它“给了我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第二，写作方法独特：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而又有着有机的联系；融古与今于一体，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第三，论述深刻：全书第一部分关于文明与文化问题的理论论述深刻而独特，予人以启迪。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作还要丰富。读读关于非洲、拉丁美洲的章节，你不能不击节叹服，在我们眼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竟可以写得那么好。而在不少方面，如关于东欧的章节，作者显示出远见卓识。第四，布罗代尔给人的印象是总爱关注小的问题，尽管他具有常人不及的宏观视野。《文明史》向人展现了另一面。正因为如此，截至去年，此书在法国仍在重印，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译本也受到了好评。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能够让人们对年鉴学以及布氏本人有更全面的了解。

下面略述一下翻译情况。由于布氏追求的是“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行文洗练、有力，概括性强，因而翻译难度较大。从方便读者的角度考虑，译者适当增加了一些注释。为了保证译文质量，在根据法文版翻译完毕后，我们又据英文版（理查德·梅因译，1993年企鹅丛书版）逐字逐句校订了全部译文。尽管如此，译文中难免仍有不少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翻译工作由冯棠、张文英、王明毅和常绍民承担。常绍民校改了全文。译稿尚未完工，年仅50岁的冯棠先生就因病不幸去世，令人痛心疾首。我们谨在此表示无尽的哀思。

常绍民

2003年8月

序 布罗代尔教授历史

本书是1963年首次出版的一部教科书——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教科书的中心部分。此教科书是专为法国中学结业班的使用而构思和撰写的，我们今天也必须照这个样子去阅读。但是，阅读的时候既不要持先验态度，也不要有所保留，恰恰相反，因为这不是一部应时的作品。人们当然会在这里认出费尔南·布罗代尔，然而是在这部教程的背后。说得严重一点，这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教程，他是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撰写的，也因为布罗代尔那种不顾一切的风格而遭到抵制。也就是说，这部作品不是为史学界同仁而写，也不是为广大读者而写，在那个时期他还不为他们所知，同时他对读者大众也不大关心。他这部作品是为完全确定的读者——16—18岁的男女中学生——而写的。1983年，他在致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 ）的一封短笺中称他们为“这些成年人”，这里同样再把它提出来。他说他打算触及，而用不着增加他们老师所讲的内容。这部著作旨在说明和示范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可以教授和怎样教授。它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要使成为教育对象的男女学生对此产生兴趣，就必须使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事实上，在他看来，历史学通过发问和迂回到过去，是可以回应人们的好奇心、狐疑，并回答今天提出的种种问题的。

今天重读这部作品，将更好地理解出版者为什么在10年间恳求为另一批读者大众“改编”这部作品，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未真正说不，但总是一再推迟进行这一工作。对每一部著作，他的写作逻辑都不容许做详细修改，而总是要求人们从零开始。他向所有接近他的人不断地重复讲述这一点：历史应该由身为“语言大师”的历史学家好好来写；为了写好它，就绝不能准许修改，而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

因此，今天最好按原文重新推荐此书，至多去掉插图、文献和阅读注释。此外，自相矛盾的是，即使费尔南·布罗代尔原未承担部分责任，但他后来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还是承担了责任。它的最早的读者已年过四旬，最早使用过它的教师中最年轻的也已年届五旬。然而就像对《地中海史》[1]一样，从1966年起，西班牙和意大利就率先做出了

榜样。西班牙整本翻译了这部书，给［马德里、泰克诺斯（Tecnos）］大学的学生使用，意大利出版了该书袖珍本，以后又按时重版发行［都灵，埃诺第（Einaudi），PBE］。这种情况说明，在书籍的流传中，会出现使今天走在统一道路上的欧洲人吃惊的种种有意义的差别：实际上，除了大学课程和课程划分有些相似之外，没有什么比我们中学教育的内容被分隔得更厉害的了。冒着曲解术语的危险，让我们再补充一句，即使在法国，毫无疑问，这部书也没有达到它会有也应当有的发行量：到底有多少次教师会议曾决定（就像1964年在我刚刚获得教师职位的巴黎北部的省公立中学，我亲身经历的有点令人吃惊的情况一样），对学生来说因此书过于艰深，必须给学生另选择一部更易读的课本，而将此书留作"教师用书"（livre du maître）呢？在学校出版社大量发行教科书的时期，要确保免于遭受出版方面的无谓失败！但是我情愿相信，此书哪怕能找到它所力求得到的读者大众的一半，并且真正用作"教师用书"，帮助教师以费尔南·布罗代尔期望的精神来教授这门新的困难教程——他曾经大力推动，以使人们接受它——那么费尔南·布罗代尔也只能满足一半。最后，它今天是否既找到了读者，又赢得了历经许多人苛评的地位呢？至少有三个原因促使人们相信他：我试图在下文一一陈述之。

本书和许多其他的书一样有它的历史背景；为了评价它的意义，必须把它重新置于它所处的背景中去：（20世纪）50年代末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工作和现代化的巨大努力在这个时期使法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结构成了问题，人们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在有教养和对外开放的"精英"眼中是这样。政治的实际情况，还有教育体制的实际情况，从小学到大学，都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它必须接受出生率激增的孩子进行更长学习期限的学习这一现实，必须从在战前出生率异常低的年份出生的人当中招收数量更多的教师。前者必须学习，后者必须以不同方式教授彻底更新的各门课程。数量和质量双重进步的同一要求——实际上是真正的决裂——有益于培养其他国家干部，尤以工程师和医生为首。改革以"统治就是预见"这句格言的名义提到日程上来。但是改革使舆论界、用户和专家分裂开来。一些改革成功了：数学教育、医学研究；另一些改革全部或部分地失败了，其中就有历史学领域的教育改革。

历史学课程改革原则在第四共和国终结之前便已决定：改革始于1957年，在中学六年级进行，1962年开学期间，改革达到了中学结业班。改革的原则非常简单。1945年以来施行的旧的划分将历史学划成连

续的几段，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和埃及开始，而把所谓“当代”（contemporaine）时期留给最后两个班级：1789—1851年为前一班级，1851—1939年为结业班级。始于1957年7月19日的新的划分，把历史学教育提前了一年，并将内部的划分下移（1789—1871年为前二班级，1871—1945年为前一班级），以便留给结业班级“当代主要文明”的研究学习。以这个临时的题目，下文将要谈到的7月25日官方公报详细地按六个“世界”（西方、苏联、伊斯兰世界、远东、东南亚、黑非洲）讲述史学内容，前边还有一个序言，旨在讲明其“设想和意义”：它“首先必须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

这个前言对费尔南·布罗代尔来说，在此时是一种补偿，而非真正的胜利。他被迫离开教师资格考试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这一职位使他能够体验到势在必行的“考试改革”可能遇到的重重困难，他其实是被亨利·隆尚邦（Henri Longchambon）请来撰写法国科学研究报告中有关社会科学的部分，这个报告是为正在制订的五年计划准备的。但是布罗代尔提交的建立经济、社会与政治科学小型实验学院的规划，遭到处在原位的文学院和法学院（Lettres et Droit）的反对，它们受到竞争的威胁。1957年6月，提交给政府的最后报告作为“长期改革”方案还保留着它（“不要过于相信它”，鉴于“处在原位的所有机构，基于担惊受怕或‘通情达理’而表现出麻木不仁或系统的抵制”），它在“结构的适应”范围内尚有可能。在“法国社会科学：总结，规划”题目下，人们可以读到它的原文，这显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本人撰写的，此文刊载于1958年《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Annales E.S. C.* ）第一分册。

然而这第一次失败，由于时任高等教育部主任加斯东·贝尔热（Gaston Berger）的创意，带来了两个后果。人文科学院（或社会科学院，因为1958年的条款依次使用两个说法）在巴黎创建了，这是一个围绕图书馆和公共服务部门（“尤其是机械化处理中心和绘制地图术实验室”）的“集中研究”场所。而那项中学结业班级（实为中等教育第二阶段）课程的改革，应当能够为大学和当代世界准备学生，应该通过文明概念向他们阐明历史学能够从专心阅读“相邻社会科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中汲取的一切。这是一门真正有内容的世界性课程。

但是将事件从历史教学中撤出，或至少把事件降低到次要地位，即

使只有一年，这种改革也显得过于突然，无法被原封不动地接受，并当即遭到了抵制。两年以后，必须撰写一部教材。在1959年6月的新作中，第二部分“当代世界文明”的叙述中把远东和东南亚归结为一个单独的世界，名之为“印度洋和太平洋”世界，并增加了一个关于“当前重大问题”的结论。尤其是，它将1914—1945年这段时期重新写入了中学结业班级的教程中，占用整个第一学期[2]，故而改变了学年的平衡。战斗还没有输，但是也没有赢，因为必须对在教材的使用、教学的方式和指示、题目的选定等等方面遇到的所有抵制做出说明。我们可从许多例子当中列举一个：在风起云涌的非殖民化浪潮中，甚至当新独立国家勇敢地力图书写其历史之际，1965年8月10日的一道法令就无条件地除去了“非洲世界”这一章。

新教程临近使用时，各种保留意见就公开地表达出来。没有叙述事件的支持，考试之际没有具体可证实的知识来支持，如何教授历史？第二学位[3]的负责人自问，他们无疑有理由意识到，对于在另一种学校、在有争议的社会科学尚无地位的许多大学中培养的教师，这个教程行将带来彻底决裂。是否要在“事实”与“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或“抽象”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新课本或重新修订的旧课本的作者们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明他们的困惑，即使不是怀疑的话。让我们重读一下曾为几代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学生的权威著作的一部最有名的教科书（阿蒂埃，1962年）的前言吧：“即使这门课程的趣味不容置疑，即使对第二学位在学的学生来说，当今世界的这种学习研究具有诱惑力和好处，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使用这个教程有重重困难。许多技术字眼必然要涉及，必须使之简单易懂……”在推出了“专家”即大学教员或博士论文准备者（这些有名的新章节就是交给他们的）之后，前言继续写道：“这组专家致力于把该书讲得简单明了，这是我们大家所期望的。他们只想勾画出大的线条，理解它们和使人理解……从288页起，当涉及比简单叙述事实更艰难的文明史时，有着厚重特点的‘销售说明书’使课文清楚完整。它可以充当概要，无疑极为简洁，但对于想一眼就识得课程框架的急切的学生来说是足够了……”在卷末，“更合乎教学原理的最后一部分，试图回答投考者合情合理的焦虑不安”。

请原谅我这有点冗长的引文，我在那些意味深长的词语下面加了着重号[4]：它并非要指责什么人，亦非要恢复什么旧派、新派摩尼教徒之争（le bataille manicheenn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但是没有什么更能表明这些争讼的赌注，以及“这门的确引人入胜但又雄心勃勃的课程”所激起的忧虑担心了。费尔南·布罗代尔亲身投入到这本教科书的

撰写工作之中，他对即将遇到的种种反对不抱过分的幻想，并且他选择承担了困难的部分。他将中心部分，即最有争议、最容易遭人评头论足的部分，即关于“伟大文明”的部分，留给了自己。卷首几页是“导言　历史与现代”，其中“教育学逻辑”必然使人们“宁愿阅读课程第一部分以后的内容”（1914年至今的历史）……“当涉及伟大文明的棘手的学习研究时”，他毫不犹豫地重申这种当今世界整体阅读的深刻统一性。这部教程从问世之际就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课本。这是一部引起斗争的书，而且这是一场最棘手、进行起来最令人不快的斗争：反对行会习惯的斗争，因为不能强加于人，必须说服人，而为了说服人，就必须不断地从头开始，还必须反复地讲述。种种错误，甚至最丑恶的无知，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今天和过去一样，既不能归咎于学生，也不能归咎于课程，更不能归咎于课本。困难——“困难”一词在最前面十行中出现了两次，但明显地与上面引文中的含义不同——既不能否认，又不能缩小，要面对困难进行探讨。

当然，人们可能认为费尔南·布罗代尔徒劳地处在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地位上，他只能失败，因为他面对的学校体制毫无生气。当时学生人数迅速膨胀，学习期限延长，学生普遍进入至少第二学位第一阶段的学习，学校体制在1968年以前，就已开始陷入危机。同样，人们认为，他全力以赴进行斗争的战场并不在这里，而在研究战线，用勒费弗尔（Lefebvre）的话来说，是在“尖端历史学”上，他要发挥当时崭新的这个最神奇的斗争工具，正全面发展的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分部，努力使“尖端历史学”富有生气，集中人才，而不是唯我独尊。费尔南·布罗代尔全力以赴的战场或许还在大学战线，这种高等教育继续拒绝他参加学位的授予。发起各种研究，从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中赋予历史学一种焕然一新的面目，把那些最有本事的人分配给大学，从而既确保教学内容的更新，又确保所教授学科领域的扩大，以另一种精神来培养未来的教师：这本来应该是理性的道路，是对时代和缓慢的变革所下的不同赌注。但是，费尔南·布罗代尔不爱循规蹈矩。重读一下1985年10月20日他在夏托瓦隆（Châteauvallon）公开演讲的最后几句话就足以确信了：“我喜爱的人对我说：‘不要像平常那样胡言乱语。’你们认为我听从他们的忠告了吗？”［《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一堂历史课，1985年10月于夏托瓦隆》，巴黎，阿尔托-弗拉马里昂（Arthaud-Flammarion），第224页］俏皮话在他身上始终意味着是说反话的讽刺方式，这在他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教书时（教历史，像教所有其他课程一样），重要的是深信，要经常地重申，改革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想有达到目的的可能性，改革就不能局限于一个阶段——初等学校、第二学位的第一或

第二阶段、大学，改革必须是全方位的。

不管怎样，费尔南·布罗代尔有充分的理由意识到他在学校战线上已经失败。甚至早在新的正式课本发给该课程的中学结业班级的学生之前—这一课程大大打乱了人们的习惯，在它本来绝不该丧失的地位上，恢复了从1914年、继而从1939年至今的当代的只叙述事件的旧史学—明确载入索引的“le Braudel”（布罗代尔其人），1970年就被偷偷从销售目录中取消了：这个标记骗不了人。但在布罗代尔看来，问题并不在于一本书：这是历史教学中一个愈加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晚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际，始终唤起他内心的战斗激情。

人们知道，布罗代尔在所有场合，甚至直到他逝世前夕，为了宣布脱离常轨而反复参与这一事务。对他来说，脱离常轨相当于新，继而是“新—新”（nouveaux-nouveaux）课程。1983年《晚邮报》上刊登的他的文章重复了四五年前他在一次辩论会上的论点，这次会议特别邀集了J.-P.谢韦内芒（Chevènement）、M.德布雷（Debré）、A.德科（Decaux）；他还宣讲了两年后在夏托瓦隆他将要再次说到的话。还是在夏托瓦隆，在土伦中学的三年级学生面前，在讲述土伦之围——1707年土伦之围，在《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é de la France* ）一书中他曾用很长篇幅加以叙述，而不是赫赫有名的1793年土伦之围——时，当场有摄影机，他做出了榜样，而且用了很大力气：那部影片可资证明。但也同样是在夏托瓦隆，他已不满足于对学生讲话。10月17日，他坚持至少要回答40位教授给他准备的有关历史教学、艺术史、科学与技术的地位、地理问题，还有一贯要讲的学校课程问题。

如果必要的话，我的同事吉尔贝·比蒂当场所做的这次谈话的笔记可资证明。它证实了布罗代尔立场的连续性。他坚持重复他的史学应向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开放的信仰——但史学绝不能与它们混同，因为史学保留有照过去的样子把握过去，使之能够更好地理解现在这样一种无法替代的优势。他重申他非常不赞成目前课程的划分，这种划分似乎极力要解决问题，直面种种难题，但与解决问题的顺序反其道而行之。在低年级班，讲授新史学；在第二阶段，直到中学结业班，讲授传统史学，即叙述、事件、年代、战争。而在布罗代尔看来，步骤应当严格颠倒过来。我们再听一遍布罗代尔在夏托瓦隆所说的话：“假如由我负责，直至一年级，我教授传统史学，叙述史学：讲讲，停停，解释较为重要的事件，不时地略提一下社会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见解；在中学结业班，我集中讲‘新—新史学’和‘新—新—新史学’。因为我觉得在业

士学位考试上向孩子提问1945—1985年这个时期的问题，就像今天人们所做的那样，是可惜的，讨厌的，我确信，如果我是主考人，我将在业士学位考试中难倒不论哪一位历史学家！而如果人们向我发问，我自己也会被难题难倒！”

在这里，我们不要光看这次会面中他心血来潮时所说的俏皮话。1983年的文章更直截了当地对意大利读者讲了同一桩事：“这等丑举源自何方？源自国民教育部的一纸荒谬决定。就个人而言，我一向主张，只在中学结业班（la seulec lasse terminale）课程中进行新史学基础知识的传授。新史学是各种各样的人文科学的有意识的归并。各种门类的科学注视着、解释着现实的世界，试图让混乱变得清晰起来，可以为人理解。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

费尔南·布罗代尔用他的方式，挑战的方式，坚持重申他对真正的教学规划的深信不疑，这个规划将历史学（“谁能否认历史学的强有力作用？”）置于中心地位，用作破译和理解世界的享有优先权的工具，它实际上既针对过去，又针对现在。但是他从未停止“用各种口气”反复地说传统史学（histoire traditionnelle）——以准确的编年为依据的叙述——是唯一既能集中最年轻的学生——同中学结业班的“成年人”相对而言是“孩子”——的注意力，又能给予他们“时代必需的最初几课”。不过，在这种经常重复的断言中看到迎合时宜的论点并非错误，它力图以我不知道什么基督教全体教会合一运动的名义（au nom de je ne sais quel oecuménisme），恢复“传统史学”与这种“新史学”（histoiren ouvelle）之间的连续性，而布罗代尔则倾其研究员的精力与科学主管官员的权力，从一方到另一方，创造决裂。好像他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为他喜欢那么称呼的“高等”（depointe）史学——因为有高等数学——进行辩解，洗掉不管对与不对都归咎于它的一切罪过：难道人们没有把他打成差不多最高层的1968年“五月风暴”[5]的罪魁祸首之一吗？

随着年龄的成熟，面对遇到的重重困难与失败，费尔南·布罗代尔毫无疑问立场明确坚定。但是真正的锁钥，应该上下而求索。1923—1935年之间，在阿尔及利亚和巴黎，他从事中学教学差不多10年或12年，从中积累了经验。这是锁钥所在。即使进行研究是为了促进史学，使史学恢复生机，使它面目一新，但在他看来，史学首先还是为了进行教学。1936年9月，他在巴西圣保罗教育学院（Instituto de Eduçãcao de

São Paulo）最初进行的一次讲座，就明确地冠以“历史教学”（Pédagogie de l’histoire）这一名称：原文当时以葡萄牙文发表在该学院的《档案》（*Archivos* ）中，1955年又重新刊登在圣保罗《历史学杂志》（Revista de historia，第23期，第2—21页）上。在埋头酝酿《地中海史》时，布罗代尔（人们简直要说“布罗代尔之前的布罗代尔”）提出了此后50年间他不断重复的思想的核心。

要将“教育小说”（romans colaire）改造成为“冒险小说”（romand’aventure）（我是从葡萄牙语意译的），没有别的秘诀，只有切中要点的简朴，不是“歪曲真理、空洞无物、拾人牙慧的庸才的简朴，而是清晰、理解力出类拔萃者的简朴”。“到成为文明中心的地方去：希腊是爱琴海的一个文明，从色雷斯到克里特——而非巴尔干半岛文明。埃及则是由尼罗河养育的文明。”他的楷模亨利·皮雷纳[6]，是“当今出类拔萃的用法文写作的历史学家”，通过皮雷纳，教学不理睬书本而依靠口头。要想叫人理解自己，就要避免使用那些抽象术语。要想叫人听你的，“就要让所讲的历史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布罗代尔得出的结论是：“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我坚持这一点。仅仅向学生讲授公司、支票和小麦的价格，是一种失职。历史编纂缓慢地经过了各个阶段，它曾一直是君王年代记、战争史或历史事件镜鉴；现在，得益于勇敢的先驱者的诸般努力，它深深扎在昔日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这些阶段就像通往真理的阶梯的踏板。在学生面前，不要省掉任何一个阶段。”从在法国与历史教学紧密配合的地理学中借用一个例子，他更进一步补充说，重要的是，要解释潮汐（les marées），不是从精确的科学理论出发，而是要达到精确的科学理论。而亨利·普安卡雷[7]揭露的“业士学位考试的潮汐”，可能是极好的教育学出发点。这些话显露出一个很早就做出并一直坚持到生命末期的抉择的几乎惊人的连续性：费尔南·布罗代尔，或对历史教学和被教授的历史的某种激情。谁敢说这种教学主张在今天新的改革时刻，丧失了其现实性呢？不管怎样，让我们顺便注意一下，这个怀着满腔激情为历史学辩护的主张，对其他学科也是有益的，就像数学或语法；在布罗代尔看来，它们也都是基础学科。

第三条线索，我在这里能把它勾画出来就不错了，是要取代著作的连续性中那种虚假的“小”作品（而且一并取代全部其他作品）。费尔南·布罗代尔受成功的束缚，常常埋头在一本书中，很多人喜欢在《地中海史》《物质文明》（*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8]和《法国史》

（*Histoire de France* ）[9] 之间建立对立和分门别类。与此相反，我认为，他的著作经过时间的推移，今天在整体性和连续性上重读一遍会觉得更好。话语和文字彼此重复（但“教育就是重复”是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紧密联系，在思想、表述、风格的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它们使他能够玩弄思想概念，使思想概念驯服于他，而后在给思想概念找到表达方式和确定的位置前，将其扔掉。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反反复复，就像屋顶的瓦片一张搭着一张，使人产生清一色的外表印象。但是上述印象扩展开来，便不断引进新的动机。新的动机开始是一点一滴的，但始终是以发展的方式勾画出来的，并得到发展和融合。

从这种角度看，如果说《地中海史》第一版（1949年）为一方面，《地中海史》第二版（1966年）和《物质文明》第一卷（1967年）为另一方面，那么《文明史》则正好处于两者之间。《文明史》明确地根据《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第22卷（1959年）第五章“文明史：过去解释现在”（1969年以同名重新出版，为《史学作品》一部分，第255—314页），此外还根据同一年代的其他一流“大”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1958年）等。实际上，《文明史》给费尔南·布罗代尔提供了一个机会，利用他倡议延请到的高等实践研究院——今天的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第六分部“文化基层”系的许多研究员的建议和知识，发展了对于“文明”这同一概念的思考，并使之达到顶点（显然是临时性的）。这是在地中海遇到的“第一个和持久性最复杂的”文明，它带有文明的一切矛盾。因为各个文明“亲如手足和自由自在，而同时又封闭、排他、乖戾……和平”而“同样好战；有惊人的固定性”“同时又流动，浪迹天涯”。逐渐地，跟往常一样，依据严密的形象网络，一个词被确定下来：层次叠放，时段交错，等等。一笔接着一笔，他把每个词在仍属于他的体系内的特有词义明确化，该体系要站住脚首先得靠他的才能，尽可能最紧密地贴合现实事物的复杂性，提出因其不透明性而分析不到的一切。想一想“文化”（culture）一词就足够了。经过长时间自问（在后边的篇幅中仍将如此），他参照德语，终于就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写道，文化“即尚未达到成熟、尚未达到最佳状态、尚无法确保其成长发展的文明”（《物质文明》第一卷，第79页）。在这里，通过参照空间、社会、经济和集体心态，文明被不断地加以定义。1963年，文明与长时段本身成为同一：“经过一系列经济、一系列社会，仍坚持生存下来，同时几乎只是一点一滴地才改变方向者，就是文明。”但是它与历史的整体性不能划为同一，对历史的整体性而言，还有待于寻找一个既非文明又非文化的第三个词（1959年）。后来布罗代尔终于给它选定了词义明

确的社会学术语，这回是单数，即“整体的整体”（l’ensemble des ensembles）。

费尔南·布罗代尔常常自己重提马克·布洛赫[10]的断言，最后一次是在《法兰西的特性》一书导言中：“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但是他立即补充说：“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他没有时间完成这部法国史，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一搏。他通过电影和文本（《欧洲》，巴黎，图解艺术与行业，1982年），叫人仅勾画出《地中海史》所宣布的那部欧洲史。和《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起，他给了我们一部世界史，这部世界史不同于《地中海史》，是要考察过去与不远的将来。这部现时世界的“文明史”名实相符，酝酿并完成了世界史。

莫里斯·埃马尔

[1] 《地中海史》全名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共两卷）。初稿是他作战被俘后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囚五年期间，用练习簿写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答辩通过，两年后正式出版，并一举成名。——中译者

[2] 法国学制一学年分为三学期：暑假后开学到圣诞节前为第一学期，圣诞节后到复活节前为第二学期，复活节后到暑假为第三学期。——中译者

[3] 第二学位是指大学教育获得的学位（degre），第一学位是指中学会考通过而获得的业士学位（bacca-laureat）。——中译者

[4] 中译文中用的是黑体。——中译者

[5] 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战后对法国政治、经济乃至精神生活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潮和罢工。起因是学生领袖被校方开除，校方无视学生的基本权利。学潮蔓延全国，持续一个多月才被平息下去。“五月风暴”导致了戴高乐的辞职，也导致了法国以后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中译者

[6] 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1862—1935年）：比利时历史学家，所著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多卷本《比利时史》（1899—1932年）是西方著名史学著作之一。——中译者

[7] 亨利·普安卡雷（Jules Henri Poincare，1854—1912年）：或译庞加莱、彭加勒，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对函数理论、天体力学、拓扑学和光学、电磁学等都有重要贡献，法国科学院和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科学的假说》《科学的价值》等。——中译者

[8] 全名为《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布罗代尔的另一部名著。——中译者

[9] 《法国史》全书共分三大部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但只有第一部分的前两个篇章于1986年出版。——中译者

[10]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法国年鉴派史学创始人之一。1929年，他与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年）共同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以推广他们的史学主张。年鉴派史学即由此得名。他著述甚丰，包括《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和《历史学家的技艺》等。——中译者

自序 [1]

要使有关历史教学的争论重新活跃起来，只要提一下去年 [2] 9月16日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演说时的一句话就足够了。演说无疑只要求重新掀起高潮。

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争论，总能使历史教学更叫座，而从不会让人对历史漠不关心。它提起了公众的兴趣，使之比以往更加醉心于历史；提起了政治家的兴致，使之不得不跟上时代。记者，尤其是历史教师更不能无动于衷。这是一场老调重弹的争论，没有什么新的货色，然而它的圈子却在不断扩大。所有争论都可随心所欲地进行。论战挟着炮声而至，就像一支支精良部队。

在原则上，这场争论只关涉小学（初等）教育和中学（中等）教育的课程问题。奇怪的是，对于前者，人们几乎只字未提；对于后者，人们提到的较多，胜过对其真正的研究。事情还关系到这些学校的灾难或所谓灾难问题，这是根据人们所说的我们孩子的恶劣成绩来断定的。但是这些结果本可以或一直是完美的吗？1930年前后，一家历史杂志就已经热衷于在丰富的蠢话录专栏中，列举中学生愚蠢可笑的过错。可是在那个时代，正统教育是通过马莱-伊萨克（Malet-Isaac）的神圣教程进行的——那么多好争论的人今天对它大唱赞词。

最后，批评家对史学本身发展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了攻击。对一些人来说，忠实于叙述并受叙述支配的传统史学，毫不吝惜地将日期、英雄的名字、大人物的事迹与武功，一股脑儿地塞进学术论文中；对另一些人来说，“新”史学自我标榜为“科学”，着重关心的是长时段，而忽略了对事件的研究，所以应对那些教学法的失败负责，此乃真正的灾祸，至少导致了对历史编年的不可原谅的遗忘。这场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3] 是不是无足轻重呢？在一场只与教学法有关而与科学理论无关的争论中，很多问题和“犯罪”被掩盖起来，而没有得到阐明。

问题难道真的就这么复杂吗？你在中学面对的，首先是未成熟的孩子，而后是成年人。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时刻，必须对教育进行改

革，无论历史学还是其他学科都是这样。问题是要知道如何把要讲授的问题分配到前后连贯而又各不相同的学年。一开始学生还是孩子，最后，他们变成了成年人。适合于孩子的东西，对成年人不适合，所以对课程必须做出区分。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区分，为此就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区分出紧急与需要，而且要有指导性的理解力。

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使用各种图片、电视系列片和电影，也就是说讲授总体上属于传统的但又经过改进、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对媒体，孩子们已经养成了习惯。我现身说法。像我这一代的所有大学教员一样，我曾长期担任公立中学教师，除了结业班或委托给我的会考外，我总是要求教六年级，即教10—12岁的孩子。这是美妙的、本能地令人惊叹的听众，在他们面前，人们能使历史像用一盏神灯一样，一段一段不断地展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主要的问题是帮助他们发现一种透视感，发现过去时代的真实性，发现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义，发现种种连续接替，给它做出标识，立下标杆，赋予它第一个可以辨认的面貌。如果一个才智中等的学生不能确定路易十四相对拿破仑所处的年代，或但丁相对马基雅维利[4]所处的年代……我自己会感到非常震惊的。希望逐渐获得的历史感能够有助于尽可能地减少混乱！但是我还希望流畅易懂的叙述能够自然而然地向人们展现各种场面、各种景致和各种整体视野！我们身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的场合，在威尼斯、波尔多，或者在伦敦……作为学生，除了记住年代外，还需要学习词汇：学会准确运用各种词语，准确地描述抽象的与具体的东西……学会准确运用一些关键概念：社会、国家、经济、文明……所有这些都要做到尽可能地简单。要求具备基本的年代知识，确定杰出的、重要的甚或可憎的人物处在什么年代，将其置于他们的时代背景之中。

我们现在到了分界线的那一边，面对着年轻人。他们今天比起我们在他们这个年龄时可能更自由，不过也更不幸。他们有造反精神，而事实上，正是社会，正是世界，正是生活方式，在他们周围发生着变化，把他们卷入运动，让他们受到压制，使他们怒火中烧。也许他们比起完成学业时的我们少些敏悟性，少些书卷气，但他们同样富有智慧，肯定更有求知欲。那么，他们应接受哪种历史话语（discour shistorique）呢？

在法国，我们的课程非常荒谬：一年级时给他们灌输1914—1939年的世界，而后结业班时给他们灌输1939年以后的世界。这个庞大的世界被讲述了两次，但却是一个政治的、战争的、典章制度的、冲突的世

界。也就是说，讲了一大堆编造的年代、事件。我看不上有马一样记忆力的历史学家，他生就经得起对这一大堆一环套一环的通常平庸乏味的事实的全部提问，并且保证成功……我在《当代》（*Le Temps présent*）上看到这类教科书中最新出版的一部，据说是上乘之作。我觉得它很有用，写得相当不错，但靠不住，令人失望。对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对世界人口，对欧洲以外的文明，对冲突背后隐含的深刻原因而不是冲突本身的过程，它没有说一句有价值的话。

这等丑举源自何方？源自国民教育部的一纸荒谬决定。就个人而言，我一向主张，只在中学结业班课程中进行新史学基础知识的传授。新史学是各种各样的人文科学的有意识的归并。各种门类的科学注视着、解释着现实的世界，试图让混乱变得清晰起来，可以为人理解。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举一个简单明了的实例吧，他们要能够阅读严肃的新闻日报，理解读到的内容。

然而事与愿违。新史学被安排设置在低年级去上，在那里它显然起着破坏作用。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结果吗？

最后，两种形式的历史话语被错用到不同的地方，一个针对公立中学新入学者，一个针对公立中学毕业生，结果给双方都带来了有害的后果。由此出现的明显的混乱，因1968年以来教师夺取的自由权而愈益加剧。教师们满怀着世上最美好的愿望，选择这一部分课程，而对另一部分不闻不问。由于继任的教师随心所欲选择自己喜爱的内容进行教学，学生们度过了整个学校生涯，却未听到历史的这一重要部分或那一重要部分，更谈不到能够按编年线索连续性地了解历史了。

唉，在教给我们孩子的历史中，也产生了数学或文法教学中所产生的那种情况……为什么要用被肢解得零零碎碎的知识，去讲授一个本为整体的主题呢？尤其是，接受教育的对象是10岁的小孩子，他们只不过能掌握普通计算，只有个别人多少年以后才能学到高等数学。语言学学习像土豆地里野猪的嘴巴那样把语法搞得一团糟。它用学究式的、复杂的、难以理解的，更有甚者，用不适当的语言来装扮语法。其结果是：语法和拼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人们严重忽略！但是应对这些不恰当的言行负责的，既不是语言学，也不是高等数学，更不是新史学。它们做它们应当做的。它们不关心教什么或不教什么给这种或那种年龄的学生。既然如此，该负责的乃是那些编制学校课程计划的人的知识野心。

他们好高骛远。我很高兴他们本身雄心勃勃，但是面对他们所负责的学生，他们应竭力使之简单，哪怕——尤其是因为——这是个难题。

我在寻思这场讨论在多大程度上会引起意大利读者的兴趣。然而，如果好好思考一下，这场争论的实质却意义深远，不可等闲视之。有谁能够否认历史学的强烈作用呢？当然，历史学不应陷于始终应该批判的杜撰民族主义神话的行为之中，也不应一味沉湎于我所钟爱的人文主义之中。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民族意识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没有这种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情况都一样。

费尔南·布罗代尔

[1] 本文1983年发表于意大利《晚邮报》，在法国从未刊行。我们以为用它来作《文明史》的序言最适当不过。—英文版注

[2] 此指1982年。——中译者

[3] 这一争论是17世纪末法国发生的一场文艺大论战，新兴资产阶级不满足于文艺只表现帝王将相的生活，力图冲破古典主义教条的框框，要求描写现实和反映资产阶级的生活，两种观点冲突激烈，最终爆发了“古今之争”。——中译者

[4]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的统一，认为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此即人们所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和《曼陀罗花》等。——中译者

导言 历史与现在

正文前的这几页文字试图说明新的历史课程对中学结业班学生提出了什么要求。从逻辑上讲，它们应当被放置在这里，即本书的开头。但从教学目的考虑，它们应当被放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在第二学期就要结束，在课程的第一部分讲完、对重大文明的真正研究就要开始时，再来阅读这些话。到了那时，学生们应已对哲学术语和争论比较熟悉。然而，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需要在一开始就要马上认真处理的问题。

适用于结业班学生的新历史课程造成了严重问题。它相当于要对现代世界的所有混乱和复杂性做出概览，而这只能通过一种历史学手段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这一历史学手段涉及各种相近的社会科学，诸如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

· 三种相互接续的解释

对现代世界做出解释是件自命不凡的事。我们所能期望的是借助各种不同的手段更好地理解它。你们的课程提供了三种此类方法。

首先，现在部分地可以借助刚刚过去的过去来加以理解。就简短的回顾而言，历史学要完成它不是件难事。因而，你们课程的第一部分涵盖了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世界所经历的那些激动人心，而且往往是残酷血腥的岁月，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些事件从“一开始”就搅乱了20世纪，使之极富戏剧性，并以不计其数的后果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然而，仅靠昨日事件本身并不能完全说明今日的世界。事实上，现在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其他更为古老的经历的产物。它是已往数百年的结晶，甚至是“人类迄今为止整个历史演进”的结晶。说现在关涉如此广袤久远的过去并非荒唐无稽，尽管我们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仅仅根据我们自身的简短的存在来思考、理解世界，把世界历史视为快进的电影，其中的一切都是在纷乱、仓促中发生的：大战、战役、最高级会议（峰会）、政治危机、政变、革命、经济衰落、思想、知识和艺术范

式……

然而，人类生活显然涉及其他许许多多在这一事件电影中无法罗列的现象：人类居住的空间，限制并决定其生存方式的社会结构，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服从的道德法则，其宗教和哲学信仰，以及他们归属的文明。这些现象存在的时间比我们自身的生命要长得多，我们在区区人生百年中是不可能看到它们彻底转变的全过程的。

我们不妨做一个类比，以周围的物质世界为例。这一世界确切无疑地在发生着变化：山脉、冰川和海岸线逐渐移动。但这一过程极为缓慢，世间没有一个人凭肉眼能够察觉到，除非把它与遥远的过去相比较，或者借助科学研究和超出一般性主观观察的测量。国家与文明的生命，以及人们的心理态度或精神，并不像物质世界那样看上去亘古不变；不过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不会发生真正剧烈的变化。这么讲绝不是要贬低这些侵入了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塑造了世界的深层的、潜在的力量的重要性。远不是这样。

因而，刚刚过去的过去和多少能算得上遥远的过去合在一起构成了现在的多重性。新近的历史以高速度向我们冲来，更早一些的历史则以较为缓慢的速度、较为隐秘的方式伴随着我们。

这一早期的历史，即远程历史（télé-histoire），构成了你们课程的第二部分。把重大文明选作理解现时世界的“清晰的背景”（cadres intelligibles），意味着要超越你们刚刚学过的1914—1962年那种变化迅猛的历史运动。这就要求我们平心静气地去思考历史，即“用长时段”（de longue durée）。文明是异乎寻常的创造物，其长度超出了人们的所有想象。它们古老得令人难以置信，继续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且，在我们去世之后它们仍将存在下去。

新近的历史与遥远的历史是理解现在的前两把锁钥。最后，课程提供了第三把锁钥。这一次涉及以世界的刻度界定基督纪元1962年这一年的重大事件：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文化事件、技术事件和科学事件……总而言之，这里所要求的超出了上面所述两种历史方法的范围，意味着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区分出主次。

一般而论，历史学家思考过去，为过去绞尽脑汁；假如说手头可用的文献资料并不总是让他们有能力完全掌握过去，那么他们至少预先知道，比如在研究18世纪历史时，这一“启蒙的世纪”（Siècles des

Lumières）会导向何方。这本身就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知识和理解。他们知道戏剧的结尾（le mot de la fin）。当涉及现实世界时，从它向我们提供的多种多样可能的结局中，辨别出那些主要的问题；如此情况下，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辨别出那些最有可能获胜的想象戏剧的结尾。这一任务非常艰巨，需要运气，无疑也是必须完成的。

孔多塞[1]认为这么一种任务是合法的。尽管不无风险，现今严肃的历史学家也勇敢地为预测进行辩护。1951年，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经济学家科兰·克拉克（Colin Clark）运用他所掌握的统计学预测了未来经济可能达到的规模。1960年，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平静地讨论了1980年的文明，在他看来这决定了——或应当决定了——1960年应当遵循的政策。一门非常脆弱的“科学”，即哲学家加斯东·贝尔热所说的展望（prospective），宣称专门进行近期未来的预测；他用了某些经济学家钟爱的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来称呼它：“futurible”。“futurible”是指现在可以合情合理地用将来时态加以描述的最近的未来——提前预测几乎能够抓住的细细一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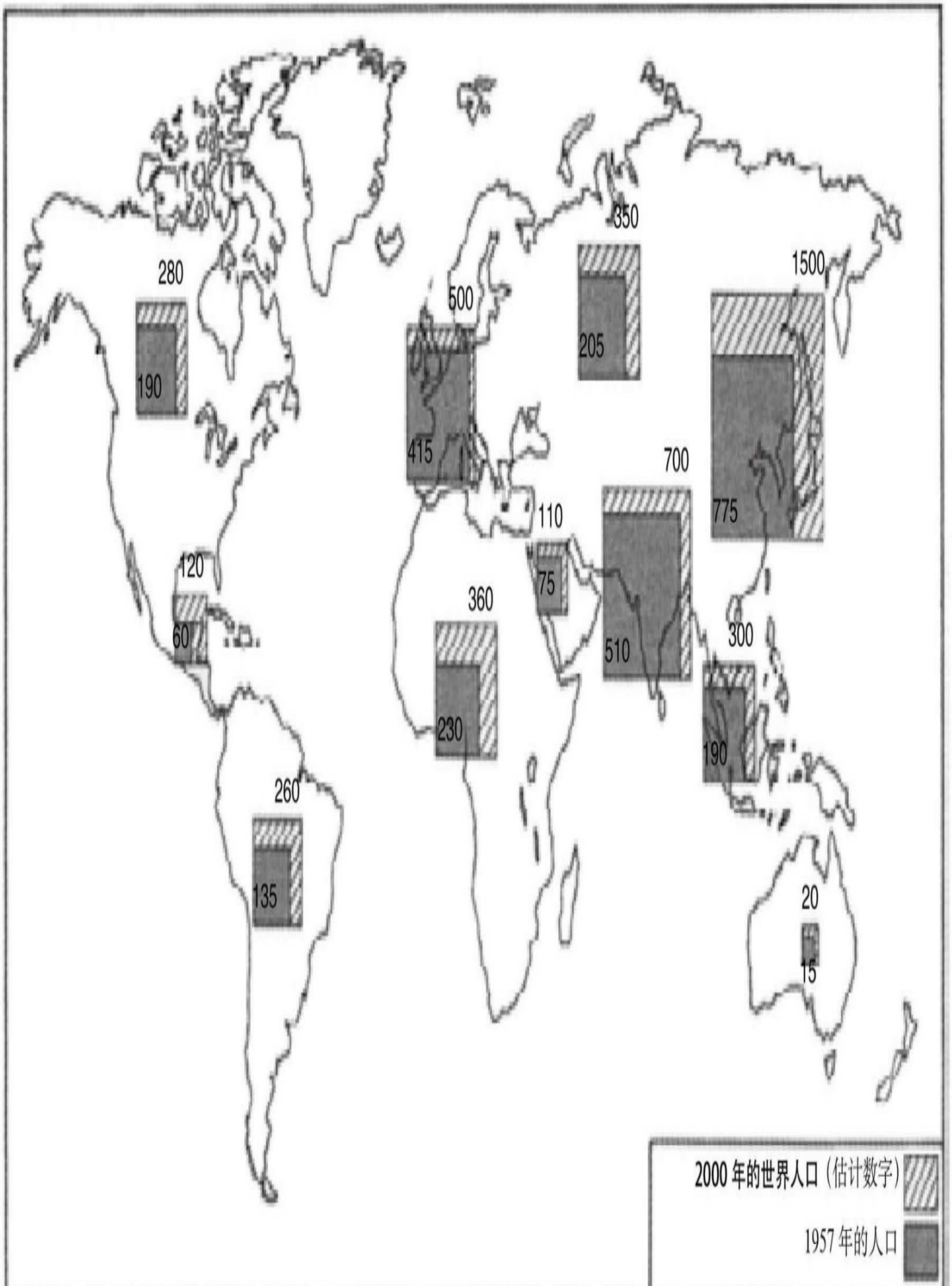

280
190
120
60
260
135
500
415
360
230
350
205
110
75
700
510
1500
775
300
190
20
15
2000 年的世界人口（估计数字）
1957 年的人口

图1 2000年的世界人口（单位：百万）

这类的行为时常遭到嘲笑。不过，尽管它们可能仅仅取得部分成功，但它们至少提供了摆脱现在之混乱的一个出口，着手弄清现在最大的各种问题，并试图赋予它们某种含义。现今的世界是演化中的世界（Le monde actuel est unmonde en devenir）。

上文所附地图显示出2000年世界人口可能的分布情况。它包含了供人思考的成分。其中尤其应当明确的是，如果心目中没有这么一张图表（以及其他许多文献），任何一位规划人员——而规划意味着对现今的问题进行周全的和“展望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正当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它无疑证实了象牙海岸共和国总统M.乌弗埃-布瓦涅（M.Houphouët-Boigny）的下述评论，即在亚洲和黑非洲，规划应采取不同的形式，因为亚洲的贫穷与人口过多相关，而在黑非洲人口过少构成一个挑战。

·多重与单一的历史

历史学应向这类分歧和猜测敞开大门，也就是说，一句话，它应当寻求成为一门现在学，成为一门关于模棱两可的现在的科学。这看上去令人吃惊。历史学是不是误入歧途了？它是不是就像羊群中的狼，穿上了从其他社会科学中盗窃来的虚假外衣？在本书“中编”一开始，我们将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到那时，问题应得到澄清，因为这是一个与时间本身相关联的问题，而时间的性质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将会被提出来。

历史学所提供的解释的明显的多重性，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甚至它们相互间的矛盾，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为历史学独有的辩证法（dialectique），而且它建立在它所描述的不同的时间之上：与事件相关的迅捷的时间，与时期相关的较为缓慢的时间，以及与文明相关的更为缓慢甚至迟钝的时间。在学习不同内容时，应当选择不同的时间。相反，任何类似于文明史这样做全球性解释的尝试都需要持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我们必须参考过去之许多不同的、有着各自曝光时间的快照相片，它们随后把时间与图像结合在一起，就像太阳光谱的各种色彩聚焦，最终合成纯粹的白光那样。

[1] 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年）：法国数学家、革命家和哲学家，其关于人类能够无限地完善自身的进步观念对19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具有极大影响。他还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曾积极参加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筹备工作。1785年发表了在概率论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论文《简论分析对从众多意见中做出决断的概率的运用》。积极参加法国大革命，却在大革命中被处死。其最为人熟知的著作是《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中译者

上编 文明释义

第一章 术语的衍变

能够像定义一条直线、一个三角形或一种化学元素等等那样，把“文明”这个词定义得言简意明，这应该是一件令人愉悦之事。

遗憾的是，社会科学的词汇几乎不可能有明确的定义。这并非是出于万物变化不居的缘故，而是由于大多数词语远非恒久不变，它们因作者而异地在我们眼前发展变化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指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事实上，社会科学一如哲学，其最简单的词语根据使用它们的思想以及思想赋予它们的特征，含义上发生着广泛而频繁的变化。

·“文明”（civilisation）是一个新词，出现得较晚，在18世纪的法国还不太引人注目。

它由“civilisé”（开化的）和“civiliser”（使开化）构成。这两个词存在已久，在16世纪就已经得到普遍使用。大约在1732年，“civilisation”还仅仅是一个法律用语：它指称一种正义的行为，或者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civil）诉讼的审判。其现代含义“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则出现得较晚，在1752年才出自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1]笔下。当时，他正在写作一部通史，不过他本人没有将其发表过。该词最早正式在出版物上出现是在1756年的一部名为“人口论”（*Traité de la population*）的著作中。这部书的作者是维克托·里凯蒂，即米拉波侯爵（Victor Riqueti，Marquis of Mirabeau），他是著名的革命家米拉波伯爵（Honoré，Count Mirabeau）的父亲。他提到了“文明的范围”，甚至还提到过“骄奢淫逸的虚假文明”。

说来也够奇怪，伏尔泰（Voltaire）在其《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 et sur l’Esprit des Nations*，1756年）中竟没有使

用“civilisation”这个有用的词，然而，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2]却评论说：“正是他构想出这个概念……他第一次概述了文明的普遍历史。”

就其新义而言，文明（civilisation）一般指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一方面是开化的人，另一方面是原始的野蛮人或蛮族。即使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其原则所钟爱的“高贵的野蛮人”也不能被视为开化的。无疑，路易十五（Louis XV）统治后期，法国情愿用这个词来看待他们自己的社会形象——这一形象即使在相隔甚远的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吸引力。综上所述，“civilisation”一词由于需要而出现。截至那时，“poli”（文雅的）、“policé”（有组织的）、“civil”和“civilisé”均无相应的名词。“policé”一词确切地说是指社会秩序——这与形容词“poli”在词义上相距稍远，菲雷蒂埃（Furetière）1690年在《万有词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中将“poli”定义如下：“比喻性地用于伦理学上意为‘开化的’。‘使开化’：使举止文雅，有教养，好交际……没有什么比贵夫人的谈话更适于教化年轻人了。”

·文明与文化。“civilisation”一词从法国迅即传遍欧洲，“culture”（文化）一词也随之风行开来。

到1772年（或许更早些），“civilization”这个词已经传到英国，并取代了“civility”（教养），尽管后者历史更为悠久。“Zivilisation”轻而易举地便植根于德国，与更古老的词“Bildung”（教养）并行不悖。另一方面，在荷兰，尽管“civilisatie”一词出现得较晚，但它还是遭到“beschaving”一词的抵制，后者源于动词“beschaven”（意为“使变得优雅”“使更尊贵”“使开化”）。在阿尔卑斯山以南，“civilisation”遭遇了同样的抵抗，意大利已经并很快地在“civilisation”的意义上使用但丁作品中的古雅词语“civiltà”。Civiltà壁垒森严，阻止了新词的入侵，却未能阻止随之而来的爆炸性论点。1835年，罗马尼奥西（Romagnosi）徒劳地试图创造“incivilmento”一词，在他看来，该词指的是“文明的进程”，其本身便是“文明”（civilisation）。

在遍及全欧的旅程中，一个古老的词语“culture”（文化）一直伴随着“civilisation”这个新词。西塞罗（Cicéron）使用过该词的拉丁文形式，例如，他曾说过“Cultura animi philosophia est”——“哲学是对心灵的教化”。如今，该词又焕发了活力，或多或少地具有与文明相同的含义。的确，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两个词是同义词。1830年，在柏林大学，黑格尔（Hegel）交替地使用这两个词。但最终，人们开始感到有必要对它们加以区分。

事实上，“civilisation”至少是一个双义词。它既表示道德价值又表示物质价值。因此，卡尔·马克思区分了经济基础（物质上）与上层建筑（精神上）——在他看来，后者严重地依赖于前者。夏尔·塞尼奥博斯（Charles Seignobos）指出：“文明不过是道路、港口和码头之类的东西。”——轻率地说，文明并非全然等于文化。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断言：“文明是人类所达到的全部成就”；而对历史学家欧仁·卡维涅克（Eugène Cavaignac）来说，文明是“最低限度的科学、艺术、秩序和美德……”

所以，文明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由此一来，许多作者感到有必要区分“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认为前者承载了高贵的精神关注，后者接受了平凡的物质事物。困难在于没有哪两个人在应该如何做出区分的问题上能达成共识：对此问题的回答因国家而异，在一国之内因时期而异，因作者而异……

在德国，经过一些混乱，这种区分最终确立了文化（Kultur）的某种优先性，有意识地对文明加以贬低。对社会学家A.滕尼斯（A.Tönnies，1922年）和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935年）来说，“文明”不过是大量的实用性技术知识、一系列应对自然的方式而已。相反，文化则是一套规范性的原则、价值和理想——概言之，也就是精神（l’esprit）。

德国历史学家威廉·蒙森（Wilhelm Mommsen）曾发表过一篇会使法国人顿感生疏的评论：“认清文明并没有摧毁文化、技术，也没有摧毁人类，正是当今（1851年）人类的责任。”前一段文字对此可以提供解释。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在法国人听起来有些刺耳，因为对我们来说就像在英国和美国那样，“文明”一词具有优先性，而在波兰和俄国就像在德国（并通过德国的影响）那样，文化具有更高的价值。在法国，“文化”一词仅仅在意思为亨利·马罗（Henri Marrou）所谓的“精神生活的所有个体（personnelle）形式”时，才依然行之有效。我们说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的文化，而不说他的文明，其原因在于后一个词通常更多地被用来指群体的价值。

此外，还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其复杂程度较之其他各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自1874年E.B.泰勒[3]的《原始文化》一书问世以来，英美人类学家已越来越趋向于使用“文化”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所研究的原始社会，而他们所抵触的“文明”这个词在英语中通常适用于现代社会。几乎所有人类学家沿用此例，他们提到原始文化时是与较发达社会

所发展出的文明相对而言的。在本书的行文中，我们将采用常见意义上的区分方式。

庆幸的是，1850年前后德国创造的有用的形容词“culturel”从未遭遇过这些复杂的情况。确切地说，它指的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全部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说：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是其文化财富（biens culturels）的总和；其地理区域是其文化的领地；其历史是其文化的历史；一种文明遗留给另一种文明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一种文化借用（emprunts）或是一种文化迁移（transferts culturels）。当然，或许“culturel”这个词用起来太过方便了：它被认为不合规范或词形不完善。但在找到替代词之前，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今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词合乎需要。

·1819年前后，“文明”一词开始被用作复数形式，在此之前它一直是单数形式。

从那时起，它“往往会具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义，亦即为一个时期或一个群体的集体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因此，人们可以有5世纪雅典文明或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文明之类的说法。这种经过审慎思考得出的单复数之区分，进一步使问题高度复杂化。

事实上，在12世纪，这个词的复数形式已广为使用，这与我们的个人经验十分接近。

博物馆带着我们沿着时间的轨道旅行，使我们几乎全身心地沉浸于往昔的各个文明之中。尽管如此，实际的旅行还是更富于启发性。穿越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或莱茵河，南抵地中海：这些都是值得记忆的确凿经验，所有这一切突出了文明的复数性。毋庸置疑，每个文明都与众不同。

今天，如果有人要求我们以单数形式定义文明，我们理所当然地不很情愿。事实上，使用复数形式意味着一种观念的逐渐式微——这个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的观念，它主张存在文明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与进步的信念相关，仅为少数特权民族或特权集团（也就是人类的“精英”）所拥有。庆幸的是，20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摈弃了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人们难以确定——以什么标准——哪种文明最好。

这就是说，单数形式的文明已然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其权威性。它

已不再代表它在19世纪时所似乎体现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譬如，今天我们更自然地倾向于将某些令人生厌的不轨之举称为“反人性（l’humanité）罪”，而不是称之为反文明罪，尽管二者所指的是十分相同的东西。文明一词就其古义而言，暗含人类优秀或卓越之意。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们会感到不太舒服。

实际上，单数形式的文明在今天确切地说是指某种为所有文明所共享却不可均分的东西：人类的共同遗产。火、文字、算术、耕种和饲养——这些东西已不再拘泥于任一起源：它们已经成为单数形式文明的集体属性。

然而，全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这种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显著现象。西方发明的工业技术，输出到世界各地并得到热情的接纳。通过使各个地方面貌划一——同样由钢筋混凝土、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建筑，同样的机场，同样分布着许多车站、安装着扬声器的铁路，同样湮没了大量人口的巨型城市——世界会一致化吗？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写道：“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一方面正在发现文明概念的有限有效性，另一方面却在发现超越这个概念的必要性……多元文明的阶段正在走向终结，无论如何人类正在开始一个新阶段。”——单数形式的文明概念将会适用于一切文明。

不过，由西方输出的“工业文明”仅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而已。世界接受了它，并非就是在接纳西方文明之整体：事实远非如此。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上是许许多多个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然而，必须承认，今天，一个特定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方面第一次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自愿地接纳，现代通信的速度第一次如此程度地促进了它迅速而有效地传播。这只不过意味着：我们所说的“工业文明”正处于合成一个能够容纳世界整体的共同文明的过程之中。所有文明已经、正在或将要受到它的冲击。

然而，即使假定世界上所有文明或早或晚终将采纳相同的技术，即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也部分地趋同，我们在长时期内仍然将面对事实上非常不同的各种文明。长时期内，“文明”一词仍将既用作单数形式又用作复数形式。就此而论，历史学家不必担心会被类同化。

第二章 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

要阐释文明的观念，需要所有社会科学协力合作。它们当中包括历史学，但在本章中历史学仅仅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在此，要提到的反而是其他那些被称作辅助学科的社会科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这意味着我们要涉足四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尽管一开始它们的面貌各不相同，但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作为地理区域的文明

文明，无论其范围广大还是狭小，在地图上总能找到它们的坐标。它们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

当然，人力在几个世纪乃至一千年中终究对地理因素产生了一定影响。每种地貌上都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累积的劳作痕迹。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通过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 [4] 所说的“决定性的自我塑造”，或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而得到改变。

·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

这也就是说，讨论人类利用这些基本环境所创造的东西——农业、畜牧业、食物、居所、衣物、通信、工业等等。人类无止无休地演出戏剧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故事的线索并说明了故事的性质。演员可以变换，但布景依然完全相同。

印度学专家赫尔曼·格茨（Hermann Goetz）认为，在自然意义上，存在着两个印度：一个是湿润的印度，其土地上拥有巨大的瀑布和众多的湖泊，分布着许多沼泽、森林或丛林，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和花草——这是肤色黝黑的人民的土地。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由印度河——恒河平原以及德干高原构成的干燥的印度——这是肤色浅淡的人民的家园，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十分好战。按照格茨的观点，就整体而论，印度意味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和这两大截然不同的人民之间的论辩与争斗。

当然，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并不能预先就决定一切。环境并非无所不能，但是它会对任何既定地点先天具备的或后天获得的有利条件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先天具备的有利条件为例，每种文明都源于直接的机遇，都是对这些机遇的迅即利用。因此，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古代世界繁荣着许多大河文明（civilisations fluviales）：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印度河沿岸的前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与此类似，还有海生的文明（civilisations thalassocratiques），即大海的女儿：腓尼基、希腊、罗马（如果说埃及是尼罗河的产物，它也同样是地中海的产物）。同样，一个充满生机的文明群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更不用提及大西洋了——沿岸的北欧地区发展起来。事实上，当今西方及其附属国大部分都是环绕着海洋聚合在一起的，它们与从前的罗马世界环地中海而聚合不是有几分相像吗？

事实上，这些典型事例尤其表明了交往的至关重要性。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例如，倘若离开了阿拉伯商队横跨沙漠和大草原这样的“干燥的海洋”的流动，离开了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和印度洋沿岸乃至远到马六甲（Malacca）和中国的旅行，伊斯兰世界便无法想象。

这些成就的提出已经使我们超越了自然的和直接的有利条件，而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了文明的兴起。克服沙漠的逆境和地中海的暴飑，利用印度洋的和风，在河中修坝筑堤——这一切都离不开人力，是人类在享受这些有利条件，或者毋宁说是他们在创造这些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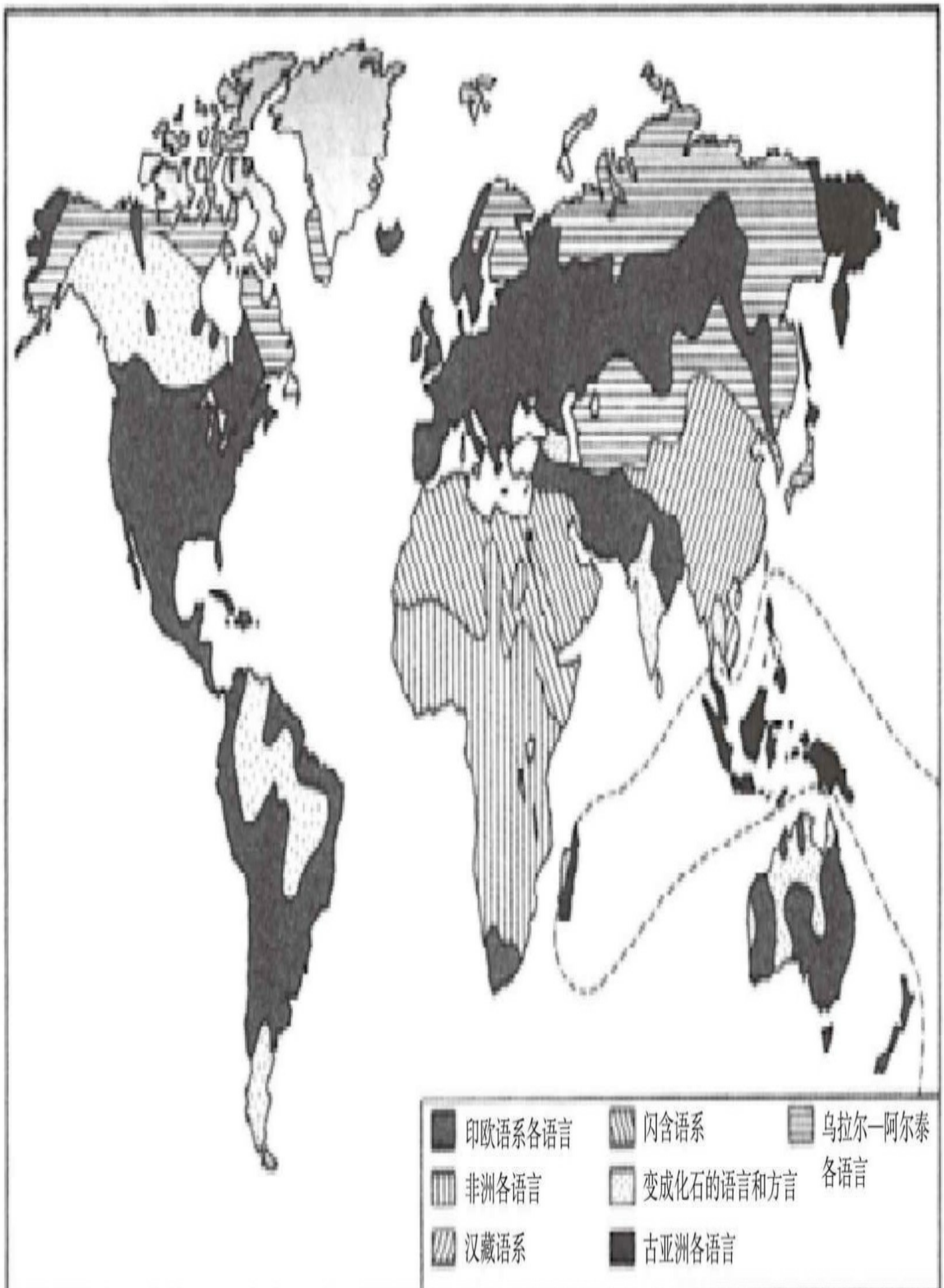
然而，为什么一些人（而非另一些人）在一些地方（而非在另一些地方）能够持续几代地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阿诺德·汤因比[5]提出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理论。他主张，人类的一切成就都与挑战与回应（这两个词法文分别为défi和riposte）直接相关。自然必然表现为需要克服的困难。如果人类接受了挑战，他们的回应就将为文明奠定基础。

但是，如果将这一理论发挥到极致，它就意味着来自自然的挑战越大，人类的回应就越有力吗？这似乎有点儿问题。在20世纪，文明的人们已经接受了来自沙漠、极地和赤道等地区的严峻挑战。然而，尽管涉及诸如黄金和石油之类的物质利益，他们却仍然未在这些地区定居和繁殖，也未在那里建立真正的文明。挑战，是的，还有回应，但文明并非总是遵循此道——至少在技术的改善能够保证做出更适当的回应之前是

这样。

因而，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限制。每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地理条件，都有其自身的机遇和局限，其中一些条件实际上长期不变而且各不相同。结果又如何呢？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其版图可以标示出哪些地区的房子是用木头建造的，哪些地区的房子是用泥、竹子、纸、砖或石头建造的；哪些地方的纺织品是用羊毛制造的，哪些地方的纺织品是用棉花或丝制造的；哪些地区生长哪些各不相同的粮食作物——稻子、玉米、小麦等等。挑战不同，回应也不同。



印欧语系各语言
闪含语系
乌拉尔—阿尔泰各语言
非洲各语言
变成化石的语言和方言
汉藏语系
古亚洲各语言

图2 世界语言分布图

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难道不是建立在小麦和面包——在很大程度上是白面包——的基础之上，具有它所蕴含的一切限制吗？小麦是一种要求很高的作物，它需要一块每年轮种的土地，或几块每隔一两年就要休耕一次的土地。远东的水稻田逐渐传入低洼地区，它们同样对土地的使用和地方习俗提出自己的限制。

因此，对自然挑战的回应不断将人类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中解放出来，同时又使人类屈从于由此产生的解决方案。我们将一种形式的决定论置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

·按照人类学家的定义，一个文化带（aire culturelle）就是一组文化特征占优势地位的一个地区。

在原始人的情形中，这些文化特征也许不仅包括他们的语言，而且还包括他们的粮食作物、他们的婚礼、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陶器、他们的羽翎箭，以及他们的编织技术等等。按照人类学家基于这些精确的细节所给出的定义，这些文化带一般说来都很小。

不过，有些文化带覆盖的地区却大得多，它们由那些为群体所共有的特征联结在一起，这些特征使它们不同于其他大的共同体。马塞尔·莫斯指出，环绕着广袤太平洋的各种原始文化，尽管它们之间差异明显、相距遥远，但都是一个单独的人类整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

非常自然地，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仿效人类学家的做法，也开始讨论起文化带来——这时，他们所关注的是复杂的先进文化。他们所确定的地区反过来又可以划分为一系列区域。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再划分基本上适用于那些大型文明：它们通常可以分成几个较小的单位。

所谓“西方”文明，指的既是美国的“美利坚文明”，又是拉美、俄罗斯等的文明，当然也包括欧洲文明。欧洲本身又包括若干个文明——波兰、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诸如此类。更不用提及如下这个事实了——这些民族国家性质的文明是由诸如苏格兰、爱尔兰、加泰罗尼亚（Catalogne）、西西里、巴斯克地区（Pays basque）等更小的“文明”组成的。

在这些区域，这些色彩绚丽的镶嵌画，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固定不变的特征，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忘记。

·然而，这些文化带及其边界的稳定性并不能使它们不受文化引进的影响，并不是说它们不会被众多从未停止越过其边界的文化所渗透。

每种文明都会引进和输出其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包括失蜡浇铸法、罗盘、火药、回火钢技术、哲学体系的全部或部分、膜拜仪式、宗教或18世纪流传于欧洲的有关马尔伯勒 [6] 的歌谣——1786年歌德（Johann von Goethe）在维罗纳街头听到过这首歌。

巴西社会学家希尔韦托·弗雷里（Gilberto de Mell Freyre）曾经为他的国家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19世纪的最初五六年中不加选择地从欧洲——当时非常遥远——接受的一切事物开列了一张单子。这张单子中包括汉堡的黑啤酒、英式村舍、蒸汽机（1819年汽船就在圣萨尔瓦多湾上定期航行了）、白亚麻布夏装、义齿、煤气灯以及（先于上述一切的）秘密会社。秘密会社中著名的有共济会 [7] ，这个组织在拉美独立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几十年后传来了奥古斯特·孔德 [8] 的哲学体系，孔德哲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即使在今天，其踪迹在拉美仍依稀可见。

巴西的例子不过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它表明，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地完全封闭的。

昨天与从前的真理：过去，文化影响一点一点地缓慢来临，其速度为旅途的遥远和行程的缓慢所延宕。如果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话，中国唐朝时期（公元7世纪以后）的时尚传播极为缓慢，直到15世纪才传至塞浦路斯岛和辉煌的吕济尼昂（Lusignan）王宫。由此，它们又随着地中海贸易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传至法国和查理六世怪异的宫廷，在那里，高高的锥状头饰和足尖长长的鞋子逐渐广为流行。一个湮没已久的世界的遗产——就像已经消逝的星辰一般，其光芒依旧照亮我们。

今天，文化影响传播的速度已经达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地步。不久，世界将无处不被发源于欧洲的工业文明所“污染”。在北婆罗洲（在1963年之前与沙捞越同属英国统治），为数不多的几个喇叭一直在转播共产主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它们的听众们对广播在说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懂，但他们听到的音乐节奏很快便对他们的传统歌舞产生了影响。电影，尤其是欧美的电影，对世界上与其遥遥相对的那些国度的趣味乃至习俗产生的影响，难道不是太大了吗？

然而，叙述得最详尽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9]所描述的一种经验了。在她年轻的时候，她对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个民族做过研究，并曾与他们共同生活过几个月的时间。战争导致他们与外部世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接触。战争结束之后，玛格丽特·米德返回祖国并写下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她极其动人地描绘了所发生的事情，并配发了许多照片。照片上的许多人过去一直或曾经属于这个民族，但他们这时已完全发生了改变。

一种文明和多种文明之间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对话，这种对话我们可以在这部著作中多处听到。文化影响总能以这种非常迅即的传播速度改变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是如此固定的文明的边界吗？对它们即将发生的改变，许多人感到担心——也有一些人感到高兴。然而，尽管许多文明急切地渴望获得“现代”生活的装饰物，但它们仍然不准备对一切事物不加选择地予以接受。我们将会看到，它们甚至还会顽固地拒斥某些外来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和过去一样，所有一切都声言要消灭的那些特征，在它们那里却依然能得到维护。

作为社会的文明

离开社会的支持，离开社会带来的张力和进步，文明便不能存在。因此，我们第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便是：倘若“文明”一词仍旧不过是“社会”的同义词的话，是否还有必要创造这个词，并在学术上推广这个词的使用？阿诺德·汤因比不是持续不断地使用“社会”这个词以此取代“文明”吗？马塞尔·莫斯也相信，“文明这个概念肯定不如社会的概念含义清楚，前者以后者为前提”。

·社会与文明永远是不可分离的（而且反之亦然）：两个概念指的是同样的一个现实。

或者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它们所表述的并非是迥然不同的对象，而是对单一对象的两种相辅相成的看法，这个对象可以根据人们的不同视角选用其中任何一个术语完善地加以表述。”

“社会”这一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就此而论，它与文明的概念极为相似，而且二者之间还常常彼此关联。例如，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文明依赖于“工业社会”，后者是前者的驱动力。通过描述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社会张力、社会的道德价值和知识价值、社会理想、社会习俗、社会趣味等等——换言之，通过描绘作为社会的体现者和传承者的人

民，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简要勾画出西方文明的特征。

如果社会发生动荡和变革，建立在社会之上的文明也会发生动荡和变革。这个观点是在吕西安·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的一部优秀著作《隐蔽的上帝》（*Le Dieu caché*，1955年）中提出的，这部书论述的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戈尔德曼阐述说，每一种文明都从它所采纳的“世界观”中得出其基本见解，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世界观即使不为社会张力所决定，也因之而丰富多彩。文明简直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社会。

詹森主义[10]、拉辛[11]、帕斯卡尔[12]、圣西兰神父（abbé de Saint-Cyran）和巴尔克斯神父（abbé Barcos，戈尔德曼重新发现了他的趣味盎然的书信）所处的时代，如《隐蔽的上帝》所表明的那样，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激情荡漾的时代；当时所流行的充满悲剧色彩的世界观，初始于议会中的中产阶级上层，为他们与之作对的君主制所击碎。他们命运的悲剧性、他们对这种命运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的智力优势结合在一起，使这个伟大的世纪弥漫着他们自己的主流精神。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论证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或者如同大多数人类学家所主张的）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别时，也以不同的精神将文明与社会等同起来。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即是社会，“（它们）产生了轻微的失调——医生们称之为‘熵’（entropie）——而且往往不确定地保持它们最初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它们就像既缺乏历史又缺乏进步的社会一样。而我们的社会（也就是那些与现代文明相符的社会）却为一种不同的电压所驱动，可以说它们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等级制度……这样的社会总是设法在其内部造成一种社会不均衡。利用这种不均衡，它们在人际关系方面既带来更加稳定的秩序——我们所拥有的社会就像机器一般运作——又导致更加严重的失调，更不用说熵了”。

因而，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原始文化是平均主义社会的果实，在这样的社会里，群体之间的关系一成不变、确定不移；而文明则是建立在等级制社会的基础上的，群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因此，紧张局势、社会冲突、政治斗争以及持续的发展交替进行着。

·文化和文明之间这些区别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

在文明阶段，城市大量存在；而在文化之中，城市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中间阶段和中等程度。黑非洲就是一个各种传统社会——或文化——的集合体，它正处于文明成长和城市发展的艰难而且时而非常残酷的过程之中。除此之外，黑非洲还会是什么样子呢？非洲城市根据国外的一种现在很国际化的风格，确立了它们自己的模式，但它们仍然只是停滞的农村之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而已。不过，它们成为社会和文明将要来临的预兆。

然而，最辉煌的社会和文明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内以较为初级的社会和文化为其前提条件。就以城镇和农村之间的交互作用为例吧，这一点就从来未被低估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其各个地区和全部人口都不是均衡发展的。通常，为现代通信所不知悉的山区和穷乡僻壤处于不发达状态——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原始社会，是处在某种文明之中的真正的“文化”。

西方最初的成功无疑是城镇对农村——即农民“文化”——的征服。在伊斯兰世界，相对于西方而言，二重性更加明显：伊斯兰城镇兴起的速度要比欧洲快得多——可以说，它们的城市特征更为早熟；同时，农村仍然非常原始，到处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地区。在远东地区，这种反差至今仍然是普遍的现象：其“文化”依然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依靠自身的资源孤立地生存。处在最辉煌的城市之间的是大片大片的农村，这些地区的生活方式差不多能自给自足、勉强维持生存，有时甚至是处于半开化状态。

·既然文明与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考察漫长的文明史时采纳社会学的范式是有意义的。

然而，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社会与文明混为一谈。

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们就将解释我们所认为的两者之间的不同：从时标上看，文明所隐含和包括的时段相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都要长得多。文明的转变远不如它所支持和包含的那些社会的转变那样迅速。但是这里还不是充分展开这个问题的时候。每次我们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作为经济的文明

每个社会，每种文明，都依赖于经济、技术、生态、人口等方面的

环境。物质和生态条件总是在决定文明的命运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健康与疾病、经济或技术的增长或衰落——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所有这些重大问题的。

·人口数量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人力一直是人类唯一重要的工具或能量形式——是人类单凭肌肉和大脑建设一个文明的独一无二的资源。

在原则上，事实上也是如此，人口的增长总是有助于文明的发展。13、16、18、19和20世纪的欧洲，便是具体的例子。

然而，正像常见的那样，当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时，曾经是有利条件的因素就变成了不利条件。无疑，16世纪末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今天，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也是类似情形。这种情况在过去造成的后果是饥荒、实际收入的下降、人口增加以及严酷的衰落时期：最终，流行病和物资的匮乏残酷地使得人类过于密集的行列变得稀疏起来。在这样的生态性灾难［就像14世纪后半期的欧洲一样，先是黑死病（Peste Noire），随后是各种流行病］之后，幸存者短暂地度过一段较为安定的时期，人口便又重新开始膨胀起来——最终，下一次打击降临。

只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化似乎才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它甚至使得那些过剩人口又有了用途，可以参加工作和生存下去。正如欧洲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力劳动的价值和成本的增加以及在雇用劳工时需要的精打细算，促进了机器的发展。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当时的智力而论，根本没有与其水平相适应的机器，人们也从来不曾努力地去获得它们。这种落后局面形成的原因在于奴隶的存在。18世纪十分兴旺发达的中华帝国具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技术，然而，它也遭遇了这种局面：它的人口太多了。这些人力成本很低，几乎能够承担缺乏畜力的经济所需要的全部工作。结果，尽管中国在科学方面长期在世界上享有领先地位，但它未曾跨越过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门槛。中国把那种特权，那种荣誉，那种收益，统统留给了欧洲。

·经济波动的后果：经济生活从未停止过波动，其间隔期时长时短。

因而，丰年和歉年彼此相继；社会和文明都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在

经济上升和衰退的时间被延长时，情况更是如此。15世纪晚期广为传播的悲观情绪和不安心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称之为“中世纪的秋天”（automne du Moyen Âge）——反映了西方经济的显著衰退。同样，欧洲浪漫主义与1817年和1852年之间的长期经济衰落相伴而生。18世纪中期（自1733年以降）欧洲的发展遭遇了一些挫折（如法国大革命的前夜）。但是，总的来说，当时的经济发展将“启蒙运动世纪”的知识进展放在物质丰裕、贸易活跃、工业扩展、人口增加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无论处于繁荣还是处于衰落之中，经济活动总是会带来一定的剩余。

不过，这些剩余产品的花销，或者说挥霍，始终是各文明中出现奢侈生活和某种形式的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今天，当我们欣赏建筑、雕塑和肖像画时，我们也会（并非总是无意识地）默想到一座城市不动声色的自豪感，默想到一位君主虚荣的华而不实，默想到一个暴发的商业银行家的富有。在欧洲，自16世纪以降（或许时间更早），资本主义和财富便成为文明最终阶段的标志。

所以，文明反映了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各种文明根据它们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式，根据从流通过程中抽取出所有注定要用于奢侈生活、艺术或文化的财富的社会机制和经济机制，先是在头面人物中，然后在大众之中，开始具有了它们的各种特征。在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的艰难时代，除了宫廷以外，几乎不存在其他赞助人。文学和艺术生活局限于这个小圈子当中。在18世纪铺张浪费、贪图享受的经济潮流氛围下，贵族和资产阶级加入到王室的行列中，共同传播文化、科学和哲学……

但是，在那时，奢侈依然是社会中少数人的特权。构成奢侈基础的文明，也就是朴素的日常生活的那种文明，却几乎没有分享到这种奢侈。而一种文明的基础层面往往就是它最为关键的层面。没有足够的生计，谈何自由？谈何个人文化？从这个观点来看，屡遭毁谤的19世纪，暴发的新贵（nouveaux riches）和“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无聊至极的世纪，尽管还不是文明和人类特性的典范，却预示了文明和人类特性的新归宿。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有某种共同的文明（civilisation collective）。诚然，这种转变的成本人们还意识不到，但它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不过，它所带来的好处也是很大的。教育的发展、文化的接受、有机会进入大学、社会进步——这一切都是19世纪的成就，这个世纪已经非常富足，它对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天最大的问题，就同今天一样，也是创造一个高品质的大众文明。这样做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不将大量的剩余物资投入到公共设施上，缺少了机械化不久肯定要提供给我们的闲暇，这简直是无法完成的。在工业化国家里，这样一种未来图景在不久的将来便可看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里，这个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因为，正像经济发展使得文明距离某些社会等级较近而距离另一些社会等级较远那样，它同样在世界各国之间造成差别。世界多数人被一位随笔作者称为“外部无产者”（le prolétariat extéieur），而更著名的说法是“第三世界”。他们人数众多，其中的许多人在能够享有他们自己国家的文明所具有的好处之前，还必须去挣一份微薄的工资以维持生计，文明对于他们就像一本合着的书。人类只有努力矫正这些为数众多的不平等现象，他们才能使各种文明——或某种文明——走到终点。

作为集体心态的文明

在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之后，我们在最后必须转向心理学。在这方面存在着下述差别：相对于迄今我们已经考虑过的其他社会科学，集体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还不够自信，成果也不太丰富。它也很少沿着历史的途径去冒险。

·集体心理学、意识、心态（mentalité），抑或精神禀赋（outillage mental）？从这些词中进行挑选是不可能的。词语上的这种不确定性表明，集体心理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

“心理学”是阿方斯·迪普龙（Alphonse Dupront）偏爱的说法，他是这一领域的一位大专家。“意识”仅与一个发展阶段，通常是最后的阶段相关。“心态”显然用起来更方便一些。吕西安·费弗尔在其杰出作品《拉伯雷》（*Rabelai* s）中宁可采用“精神禀赋”（outillage mental）这种说法。

不过，用什么字眼并不重要！它们并不成其为问题。在每个时期，都有一种确定的世界观，都有一种集体心态支配着社会的全体大众。强加给社会一种态度，引导社会的选择，固执社会偏见，指导社会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明中的一种事实。这种世界观，这种集体心态，远非源于偶然事件或一个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它们源于今天人们几乎已察觉不到的古代的信仰、恐惧和焦虑——这是一种巨大的污染，它们的细菌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还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传下去。社

会对某种没有表达出来和常常不可表达的强制力所产生的反应，来自集体无意识；不同于这种反应，社会对当时的事件、对自身的压力、对必须直面的抉择所产生的反应，不是个逻辑问题，甚至也不是自私自利的问题。

这些基本价值、这些心理结构无疑体现了这样的特征——文明最不容易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们就是那些使人们陷于孤立状态、造成人与人之间最明显差别的因素。这样的心灵习性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经过长期的酝酿——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未被人意识到——它们才会发生微小的和缓慢的变化。

·在这里，宗教是文明中最强有力的特征，始终是过去和今天的文明的中心问题。

当然，先让我们看看欧洲以外的文明。例如，在印度，所有行为的形式和理由都是来自宗教生活，而不是来自推理。希腊人就已对此表示过惊讶，根据恺撒里亚主教优西比乌斯[13]记述的一件逸事："音乐家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ane）讲述了有关印度人的如下故事。他们中的一个人在雅典遇见了苏格拉底，并请他描述他的哲学。'哲学是对人类现实的研究。'苏格拉底回答道。对此，这位印度人爆发出一阵大笑。他反问道：'如果一个人对神的现实一无所知，那么，他怎么才能研究人类现实呢？'"

当代印度哲学家辛尼提·库马尔·查特吉（Siniti Kumar Chatterji）对于人类不能理解的超自然的无限神秘和统一性，做出如下著名的解释："我们就像盲人一样只摸到一头大象的身体的某个部分，就十分认真地确信大象的形象，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大象像一根柱子，另一个人说大象像一条蛇，第三个人说大象像某种硬物，第四个人说大象像一堵墙，第五个人说大象像一把把柄有弹性的小刷子——这些断言分别是根据他们所触摸到的大象的腿、象鼻、象牙、躯体和尾巴做出的。"

与这种深刻的宗教谦恭态度相比，西方似乎忘记了它的基督教根源。不过，与其强调理性主义可能造成的宗教和文化之间的断裂，不如思考一下世俗权力、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存以及它们之间急风暴雨般的对话更为切题。且不论表面现象如何，这种对话始终在进行之中。基督教是西方生活的一种基本实在：它甚至在无神论者身上也留下了痕迹，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伦理规则、对待生活和死亡的态度、工作的观念、努力的价值、妇女和儿童的地位——它们表面上可能与基督

教情感毫无关系。不过，这一切还是源于基督教。

然而，自希腊思想的发展开始，西方文明一直趋向于理性主义，并因此摆脱了宗教生活。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下文我们将要专门叙述的某种东西。除了极少的例外（中国的智者、12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在西方之外的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发现过这样明显地摆脱宗教的事例。几乎所有的文明都被宗教、超自然和神秘现象渗透和淹没：它们始终浸淫其中，从中抽取出它们特定的心理的最强烈动机。这是我们将有许多机会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第三章 文明的连续性

现在是历史加入到这场复杂的争论之中的时候了。它或许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但是它对时间标尺的运用和它解释问题的能力应当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事实上，如果对现存文明所遵循的道路、所承继的价值观以及所拥有的经验了解甚少，我们便不能真正理解这一文明。一种文明总是与一种历史密切相关，这种历史过去曾经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

因此，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它有待解决的问题不在于要告诉人们关于希腊文明或中世纪中国我们所知的一切，而是仅仅要告诉人们在西欧或现代中国以前的时代与今天仍旧相关的东西：这些东西之中无不存在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短路，它们常常跨越了几个世纪的鸿沟。

由日复一日的短暂时光看文明[14]

但是，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吧！无论昨天还是今天，每种文明都直接表现为某种容易把握的东西：一出戏剧，一次画展，一本成功的书，一种哲学，一款时装，一个科学发现，一场技术进步——它们表面上似乎全都互不相关。［乍看之下，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哲学与毕加索（Picasso）后期的一幅绘画之间毫无关联。］

人们可以注意到，文明的这些表象存在的时间总是非常短的。那么，当它们表面上总是互相取代、互相摧毁而不是显示出某种连续性时，它们怎样才能帮助我们描绘出一种今天尚在存在的过去呢？

·这些景象事实上是服从于持续不断的变化的。节目不停地变换着：没有人愿意让它持续得太久。

这种变化无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看到：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各个阶段总是彼此接续的。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那里借鉴来一个说法，如同存在一种经济趋势那样，也存在着一种文化趋势（conjonctures），也就是说存在着波动，这种波动的时间多多少少或长或短，同时它们在大多数情形下与以前出现过的那些波动截然相反。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一切事物所发生的变化或表面上的变化，正像舞台上的灯光那样，无须拆除布景或改变演员的化装，便可以用一种崭新的色彩表现它们，把它们带入一个不同的世界。

在这些阶段中，文艺复兴是一个最佳的例子。这一阶段有它自己的主题、自己的观点和偏好，甚至还有它自己的习性。它的特征体现为对知识的热衷、对美的爱恋以及充满宽容精神的自由论辩，在这些论辩中趣言妙语是享乐的一种不同表现。它的另一个特征体现为对古希腊罗马时期著作的发现与再发现，整个开化了的欧洲全都热情地投入到这一事业中来。

同样的例子还有浪漫主义时期（大约从公元1800年到1850年，但它在更早和更晚时均有所表现）；在一个漫长的充满艰辛的乱世中，在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的哀怨岁月（1817—1852年，其间发生了遍及全欧的经济衰退）里，它对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影响。我们当然不应声称只有这次经济衰退才能解释——甚至在较小的程度上还创造了——浪漫主义的忧虑（inquiétude romantique）：不仅经济上存在着周期，而且在情感上、在生活艺术和思想艺术上也存在着周期，它们独立于或半独立于所有外在事件之外……无论如何，每一代人都希望背离他们的前辈；而他们的后人也会这样做，甚至会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或如欧热尼奥·多尔斯（Eugenio d’Ors）所谓的巴洛克风格］之间，在往往形成鲜明对照的冷静的理智与热烈而又混乱的情感之间，钟摆会不停地摇摆下去。

由此产生的模式便是一种不断变换的氛围。文明就像经济一样，有其自身的节奏。它的历史结构松散，容易分成几个部分或几个时期，它们几乎都各有特色、自成一体。我们不是可以非常愉快地提起“路易十四时代”或“启蒙运动时代”吗？同样，我们不是还可以说“古典文明”，说“18世纪的文明”吗？具有哲学头脑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沙佩（Joseph Chappey）认为，称这些短暂的时期为文明实在是“邪恶的发明”：对他

来说，这种做法与（我们将会看到的）含有连续性（continiuté）意思的文明这个概念产生了矛盾。但是，让我们暂时把这个矛盾搁在一旁吧！毕竟同一和差异总是令人不安地共存着。就让我们随遇而安吧！

·“转折点”（tournants）、事件和主人公：这一切都有助于阐明特定事件和特定的人在文明史上的特定作用。

细细研究之下，每一个事件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的行为、姿态和人物。不管怎样，文明是由人构成的，因此，这还不算完，文明也是由人的行为、成就、热情，由他们对事业的“奉献”以及他们对世界认识的质的飞跃构成的。但是，历史学家必须进行筛选：在所有这些行为、成就和生平之中，某些事件凸显出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一个新时期。变化越重大，它所预示的意义也就越清晰。

例如，艾萨克·牛顿爵士1638年发现万有引力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有意义的事件还有1638年《熙德》[15]的首次上演和1830年《爱尔那尼》[16]的首次上演。

就这些人的工作标志了一个时代或概括了一个历史事件而言，他们同样地出类拔萃。这种情形同样也适用于若阿基姆·杜·贝莱[17]和他的《捍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Défenc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格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8]和他的微积分或德尼·帕潘[19]和他发明的蒸汽机。

然而，真正对文明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是那些历经了很多场合而存续下去的人，他们就像一艘战胜了一系列狂风暴雨继续行进的船只一样。只有少许几位罕见的天才之士才成为许许多多时代之间的界限，他们集若干代人的面貌于一身：但丁（Dante，1265—1321年）处于“拉丁”中世纪结束之际；歌德（1749—1832年）处在欧洲第一个“现代”时期终结之时；牛顿处在古典物理学的门槛上；盛名远扬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则宣告了亚原子物理学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伟大的思想体系的创建者也从属于这个特定的范畴：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孔子、笛卡儿或卡尔·马克思——他们当中每个人都在不止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是文明的缔造者，在重要性上丝毫不亚于世界上那些不朽宗教的卓越创始人——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是否还需要我们述说这些呢？

简言之，一个事件或一个人在混乱无序的历史中的重要程度，取决于遗忘它（他）所要耗费的时间。只有那些经历了时段（la durée）的考验或被等同于一种恒久的实在的人，才真正被列入文明史之中。因此，通过筛选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人们也许会认识到更为持续的实在正在浮现的轮廓，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必须要发现的。

文明的基本结构

对历史的各个时期的浏览，带来的仅仅是转瞬即逝的图景：它们投射在文明的背景之上，出现，然后再消失。如果要在这些变化不居的映像背后寻求永恒的特征，我们将会发现种种不同于此的、更为简单的实在，它们所表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关注点。这些实在中，有些仅持续了几个季节，有些持续了几个世纪，还有一些持续时间之久，仿佛它们是永恒存在的。当然，表象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在缓慢地变化和衰败。

·这些实在就是前一章所提及的那些实在：由地理条件、社会等级制度、集体“心理”和经济需求等因素所施加的无尽无休的约束——这些意义深远的影响，起初几乎并未被人们认识到，对当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当代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考虑到它们时，总是把它们看作完全是自然而然和理所应当的。这些实在便是我们现在所要说的“结构”（structures）。

甚至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起初可能也未注意到这些实在：他们所习惯的编年体的叙事方式常常过于繁琐，以致他们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要理解和探索这些基本结构，人们就得以一种挥霍的方式研究巨大的时间段。表面上的运动在不久之前涉及的还是事件和人，但是当我们思索这些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同时又介于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非常现象时，事件和人便从图景之中退去了。这些现象便是文明的“基础”，或者不如说是文明的基本“结构”。例如，宗教信仰，各个时代都存在的粗鄙无知，抑或对死亡、工作、娱乐和家庭生活的态度……

这些实在、这些结构通常都是历史悠久、长期存在的，而且它们总是各具特色、与众不同的。正是它们赋予了文明基本轮廓和典型特征。此外，它们很难在各种文明之间进行交换：所有文明都把它们视为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持续存在的遗迹，这些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选择，这些拒斥其他文明的理由，通常都是无意识的。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必须得从他们所处的社会中脱离出

来，至少在精神上应做到这点。

试举一例：20世纪的妇女在类似于我们欧洲这样的社会中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虽然简单，却有着深刻的根源。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特征似乎是再“自然”不过了；直到与穆斯林妇女的地位或处于另一个极端的美国妇女的地位进行了对比之后，其特征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了解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不同，我们必须回到遥远的过去，至少得回到12世纪那个“典雅爱情”（amour courtois）的时代，去追溯西方的爱情观和婚配观。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下列的因素：基督教、妇女上学问题、欧洲的儿童教育观、经济状况、生活标准、妇女走出家庭就业问题等等。

妇女地位问题事实证明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的一个结构，是文明的一种检验标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中，它都是一种长时段的实在，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人们很难在一夜之间改变它。

·一个文明通常不肯接受那种质疑它自身的任一深层结构的文化革新。这样的拒斥态度，或者说不言自明的敌意，相对而言很罕见，但它们总是指向一个文明的心脏。

各种文明都在不停地借鉴它们所邻近的文明，哪怕它们“重新解释”和同化了它们所接纳的东西。的确，每种文明乍看之下都更像一个铁路货场，在不断地接受和发送包罗万象的货物。

然而，一种文明也可能会顽固地拒绝接纳某种特定的外来物。马塞尔·莫斯曾注意到，每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都会拒绝或排斥某种东西。在每个时代，这种拒斥都是长期疑虑和试验的后果。在长期调节和缓慢传达的过程中，抉择总是至关重要的。

土耳其人1453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现代一位土耳其历史学家声称，君士坦丁堡是它自己放弃的，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前该城便从内部被攻破了。尽管这个论点是夸大之词，但也绝非无稽之谈。事实上，东正教会（或拜占庭文明）宁可屈从于土耳其人，也不愿与它唯一可能的拯救者拉丁人联合。这并不是那种在事件的压力之下仓促做出的“决定”，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自然后果。事实上，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拜占庭的衰落，而这种衰落促使希腊人越来越不情愿地跨越神学争论的鸿沟，不可能与拉丁人结成密切的关系。

希腊—拉丁联盟本来是可能结成的。1274年，米海尔·帕莱奥洛加斯[20]皇帝在里昂会议上曾经赞同过这种联盟。1369年，约翰五世（Jean V）皇帝在罗马承认了东正教的信仰。1439年，佛罗伦萨联合会议再一次表明这种联合是可以达成的。最杰出的希腊神学家约翰·贝楚斯（Jean Beccos）、德米特里奥斯·里多内斯（Démétrios Lydonès）和约翰·贝萨里翁[21]，也都凭借他们的反对者所不能匹敌的才能，撰文支持这种联盟。然而，在拉丁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希腊人还是宁愿选择后者。“因为正是出于对其独立性的妒忌，拜占庭教会才求助于它的敌人，拱手将帝国和基督教世界送给了他。”早在1385年，君士坦丁堡最高级主教（牧首）曾致函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inⅥ）说，土耳其人提供给希腊教会“充分的行动自由”——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是从费尔南·格勒纳尔（Fernand Grenard）那里借来这些说明解释的。格勒纳尔还进一步补充道：“君士坦丁堡为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Ⅱ）所奴役，是主张分离主义的最高主教的胜利。”西方就其自身而论，也意识到东方教会厌恶它的程度。彼特拉克[22]写道：“这些分离主义者发自内心地恐惧和憎恨我们。”

缓慢形成的另一个拒斥的例子是意大利和伊比里亚半岛对新教改革的闭锁。法国则更加犹豫不决：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全国成为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仰之间的一个大战场。

时间上更近的一次拒斥的例子并非完全是政治性的（也不是毫无异议的），这就是长期以来工业化的西方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北美（包括加拿大在内）与马克思主义和各社会主义共和国极权统治之间的分野。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对后者断然说“不”：法国和意大利——甚至包括伊比里亚半岛——对此的答复则更加复杂、更加模糊。这极有可能便是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文明的拒斥。

根据同样的思路，我们也许可以补充说，如果西方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话，那么，它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做，会对共产主义加以改造，就像当前改造资本主义使其完全不同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一样。

·正如一个文明可以欢迎或排斥来自其他文明的成分一样，它也可以接纳或拒绝它自己历史的残存物。这一选择过程并不缓慢，而几乎总是无意识地或部分地进行。但多亏这样，一个文明通过“分割”出其固有过去的一部分，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己。

在遥远的或晚近的过去所提供的大量资料和见解中，它一点一点地

加以筛选，看重一些东西而忽视另一些东西；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它具备了一种既非全新也绝非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形态。

这些来自内部的拒斥可能很坚定，也可能是犹豫不决的；可能是持久的，也可能是短暂的。只有持久的拒斥对于心理学史正在逐渐探索的那些领域才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领域或许大如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诸如此类的探索的例子包括：阿尔贝托·特南蒂（Alberto Tenenti）对15和16世纪的生活与死亡的两项开拓性的研究，R.莫齐（R.Mauzi）在《18世纪法国的幸福观》（*L’Idée de bonheur en France au XVIII esiècle* ）的考察，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于1961年写作的那部令人着迷的著作《古典时代疯狂史》（*L’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c lassique* ）。

这三个个案都是改变了自身传统的文明的例子——有时它们很少为人充分地了解。这种过程十分缓慢，以至于生逢其时的人们根本注意不到它。每一个时代，拒斥——和对某种抉择的偶然接受——往往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在此期间，禁止、阻碍和恢复的过程常常是艰难的、不尽如人意的，而且总是非常漫长的。

这正是米歇尔·福柯以其特有的术语所说的“分割”（partager）——就是说，将其所摈弃的价值驱逐出知识边缘和内心生活。福柯写道：

人们可以追溯界限（limites）的历史，也就是追溯令人费解的行为的历史，这些行为一旦得以实施必定会被人忘掉，借此，一种文明将它视为异己的某种东西清除出去。贯穿这一文明的历史，它围绕自身所挖掘的壕沟，它所赖以维持其孤立状态的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就像它的正面价值一样独特。因为它把它的价值作为它的历史的持续特征来接受和维持；但是在我们所选择讨论的范围内，它做出了基本的抉择——（我们所强调的）分割，这种抉择赋予这种文明正面的性质——也就是构成这种文明的基本实质。

这篇优美的文字值得密切关注。一种文明要获得其真实面貌，就得排除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中烦扰它的东西，尽管这个领域对我们可能已经变得陌生了。文明的历史是历时几个世纪之久的提炼集体性格的过程，它就像一个介于清楚的、自觉的目标和模糊的、未察觉的命运之间的个人一样举棋不定，进退维谷，它对目的和动机的影响常常为人所漠视。显然，这种基于回忆的心理学论文已受到心理分析发现的影响。

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研究了一种特殊的情形：理性与疯癫、理智健全者与神志不清者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中世纪并不为人所知，那时，疯子（le fol）和其他遭社会遗弃者一样，或多或少有些神秘地被人视为上帝的使者。然而，在17世纪，出于当时对社会秩序的酷好，精神错乱者第一次遭到残酷无情的监禁。这个时代将他们视为无家可归的穷人，像对待罪犯和屡教不改的游手好闲者那样，将他们逐出这个世界。后来，到了19世纪，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较为公正一些，甚至还很不错，因为人们认识到他们是病人。尽管人们的态度有所改变，不过实质问题仍然存在。从古典时代直到今天，西方一直对疯癫保持一种疏离的态度，禁止疯癫的话语，清除疯癫病人。因此，透过表象人们可以发现，理性的胜利伴随着一场漫长的、无声的动荡；这场动荡几乎无人察觉、无人知晓，但它是与理性主义和古典科学的众所周知的胜利互为补充的。

当然，人们可能会给出不同的例子。阿尔贝托·特南蒂的著作耐心地追溯了西方疏离中世纪所面对的基督教死亡观的过程——从放逐尘世向坟墓外真实生活的一次简单的转变。在15世纪，死亡成为人类所受到的至高无上的考验，被看作消灭肉身的仪式。但是，在这种新死亡观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观，生活固有的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对死亡的焦虑有所减弱，16世纪——至少在开始时——是以尽情享受生活（joie de vivre）为其特征的。

·到此为止，我们的论点一直是建立在文明之间的和平关系之上的，每种文明都在自由自在地进行着它自己的抉择。但是，暴力也是常有的事。总是令人悲叹的是，暴力的结果常常是毫无意义的。

像高卢和西欧大多数地区的罗马化这样成功的例子，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所花费的那个时间段——尽管常常不可信——通过罗马化的这些民族开始出现时的原始水平，通过它们对征服者的崇拜，事实上也就是通过它们对自己命运的默认，才能得到解释。但是，诸如此类的成功十分罕见：正因为存在这种例外，才证明了普遍规律的存在。

事实上，当双方的接触充满暴力时，失败比成功要来得更加频繁。“殖民主义”或许在过去取得过成功，但今天它显然是一败涂地。通常，殖民主义的后果是一种文明为另一种文明所淹没。被征服者总是屈从于更强者，但是，当文明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的屈服仅仅是暂时性的。

长期的强行的和平共处中或许包含着让步或共识，也可能包含着常常是富有成果的重要的文化交流。但是，这个过程总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在充满暴力的氛围下文化相互渗透的最佳例证，在罗歇·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的杰出著作《巴西的非洲宗教》（*Les Religions africains au Brésil* ，1960年）中得到了描述。这本书讲述了黑奴的悲惨故事，他们被强行从他们的非洲根基上拖走，抛到殖民地巴西的父权制基督教社会之中。他们对此表示反对，但同时又接纳了基督教。一些逃亡的黑奴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quilombos：巴伊亚（Bahia）东北部的帕尔梅拉斯（Parmeiras）共和国并不是没有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就被征服了。尽管被剥夺了一切，但这些黑人还是恢复了古老的非洲宗教习俗和神秘舞蹈。在他们的candomblés和macumbas中，他们将非洲和基督教的仪式混合为一个综合体，今天它仍然存在，甚至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这是一个令人称奇的例子。战败者投降了——但同时也保全了自己。

历史与文明

文明在面对变化、面对它们永恒的和缓慢的变化时，或进行抵抗，或表示默许；回顾这些，我们或许能够提供一个可以恢复文明特有本质的最后解释，也就是说，文明的长期历史连续性。

因而，文明事实上是漫长历史中最为漫长的。但这是历史学家起初所未认识到的真相，这种真相只有通过连续不断的观察才能显现出来。因而，随着认识的上升，视野逐渐变宽。

·历史的不同时态：历史运转的时态、规模和单位经常发生着变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或者十年为一次，乃至整个世纪为一次。

在每一次，随着所使用的衡量单位的不同，景致都在发生变化。正是在不同时标上观察到的各种实在之间的对比和彼此之间的矛盾，才养育出历史辩证法。

出于简单性的考虑，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至少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工作。

第一个层面，我们称之为A，是传统历史学的层面。历史学家就像

一个编年史家或今天的记者一样，按照常见的叙述方式，匆匆地从一个事件转向下一个事件。1000个画面飞快地从眼前掠过，就像无休无止的连续剧一样，构成一部充满偶然事件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不过，这种历史读得快忘得更快，我们对它有着太多的不满，它使我们不能做出判断和理解。

第二个层面，我们称之为B，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系列事件的层面：浪漫主义、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里的时标是10年、20年甚至50年。各种事实根据这些现象被组织起来，加以说明和解释。它们或者被称为时期，或者被称为阶段，有时被称为时段，有时被称为趋势。它们被视为长期持续的事件，其细节可以被忽略。

最后是第三个层面，我们称之为C，它超出了这些事件的范围。它所考虑的只是那些按照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来衡量的现象。在这个层面上，历史的进程十分缓慢，跨越了巨大的时间范围：要跨越这个时间，就得需要一双7里[23] 高的长筒靴。在这个尺度上，法国大革命在西方革命、自由和暴力的漫长历史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时刻而已，然而，这个时刻却是必不可少的。同样，伏尔泰也只不过是自由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24]

在这个最后的视角——社会学家自有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称之为“最深的层面”——中，文明被看作不同于标志着它们发展的偶然的和变幻无常的事件：文明所揭示的是它们自身的长期性、恒久的特征以及它们的结构——文明的近乎抽象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图形。

·因此，一个文明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而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

所以，文明只能在长时间段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握一条逐渐呈现的主线——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种东西。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动荡和骚乱，但是，这种东西还是被人们视为最为珍贵的遗产，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如此，我们便应该在三思之后，才能同意西班牙历史学家拉法埃尔·阿尔塔米拉（Rafaël Altamira，1951年）和弗朗索瓦·基佐[25]（1955年）的观点，即文明史就是“历史的全部”（toutel’histoire）。无疑，此话不错：不过其前提是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使用一种与人类和历史关

注点相一致的时标。贝尔纳·德·丰特奈尔[26]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对比：无论玫瑰是多么美丽，它的历史都不是不朽的；而在玫瑰看来，园丁的历史则无疑是不朽的。从社会、经济和无以计数的短时段的事件来看，文明无疑也是不朽的。

这种长波的历史，这种远距离的历史，这种环绕在时间公海周围的大海、而不是谨慎的从来不会偏离的陆地的航行——这种做法，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来称呼它，它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它的有利之处在于，它迫使你以一种你所不习惯的方式去思考和解释问题，从而就可以把历史解释当作开启你自己时代大门的一把钥匙。它的不利之处或危险在于，它使人沉溺于更加图像化的某种历史哲学的概括中，而不再去探索和证实。

历史学家不相信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27]或阿诺德·汤因比这样的热情过度的探索者，无疑这是正确的。任何与普遍性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都需要恢复其真实面目——图像、地图、精确的年表和证据。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文明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研究实例，而不应仅仅依赖任何文明理论。我们迄今所概括出来的所有规则和解释，都将通过以下的事例得到阐明和简化。

[1] 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年）：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路易十六时期曾任财政大臣，试图实行财政、行政和政治改革，但因特权阶层和教会的激烈反对而失败。——中译者

[2]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年）：荷兰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格罗宁根大学和莱顿大学教授，死于纳粹囚笼。主要著作有《中世纪的秋天》《伊拉斯谟》和《明日即将来临》等。——中译者

[3] E.B.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年）：英国最杰出的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1865年）、《原始文化》《人类学：人类和文明研究导论》等。他认为“野蛮和文明作为一种类型的低级和高级阶段是互相联系的”，因而，不仅应根据艺术和精神文明的成就去研究文化，还应根据各个发展阶段的技术和道德的完善去考察文化。——中译者

[4]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年）：法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曾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维科影响很深，强调人本身在形成历史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自由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主要著作有《法国史》（1855—1867年）、《法国革命史》等。——中译者

[5]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英国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主要著作为长达12卷的《历史研究》（1934—1961年）。在该书中他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提出一种根据挑战和回应来分析各种文明的循环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哲学。——中译者

[6] 马尔伯勒：当指第一任马尔伯勒公爵（First Duke of Marlborough，John Churchill，1650—1722年）：英国将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统率英荷联军，战胜强盛一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表现出非凡的军事天才，并因此被封为公爵。——中译者

[7] 共济会（franc-maçonnerie，英文为freemasonry）：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它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其纲领强调道德、慈善及遵守当地法律，会员必须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并坚信灵魂不灭的成年男子。——中译者

[8]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为《实证主义哲学教程》，认为人类智慧的发展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及现代实证三个阶段。另有著作《科学等级》和《实证政治体系》等。——中译者

[9]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年）：美国女人类学家，曾任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长。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著名，对心理学和文化如性行为的文化制约、天性以及文化变化等方面的研究成绩卓著。主要著作有《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人的成长》《三个原始社会中的性生活和气质》《男性和女性》《文化发展之连续性》等。——中译者

[10] 詹森主义（Jansénisme）：或译詹森派，为天主教的一个非正统派别，主要于17、18世纪活跃于法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其主要倡导者是荷兰神学家詹森（1585—1638年），认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家在反对路德和加尔文关于上帝的恩惠的教义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人的责任，以致贬低了天主的主动性。该派自17世纪中后期起即被宣布为异端，遭到压制。——中译者

[11] 拉辛（JeanBaptisteRacine，1639—1699年）：法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之一，他使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臻于完美。主要作品有诗剧《安德洛玛克》、悲剧《菲德拉》和《爱丝苔尔》等。——中译者

[12] 帕斯卡尔（BlaisePascal，1623—1662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和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他提出了关于密闭液体能传递压力变化的一个定律，后人称之为帕斯卡尔定律。在哲学上，他建立的直觉主义原则对卢梭、柏格森等及存在主义者都有影响。主要著作有《思想录》《致外省人书》等。——中译者

[13] 优西比乌斯（Eusebe，Eusebius，evequede Caesarea，265—340年）：教会史家。生活在基督教历史上由遭到镇压到获得宽容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当时的基督教学术中心凯撒里亚受洗并受神职，公元313年任该地主教。著有《基督教会史》《君士坦丁传》等，并曾注释《圣经》，研究《四福音书》。——中译者

[14] 英译本作“文明内部的诸阶段”。——中译者

[15] 《熙德》（Cid）：17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所著剧本。此悲喜剧是高氏最负盛名的作品，许多人认为它标志着法国近代戏剧的开端。——中译者

[16] 《爱尔那尼》（Hernani）：雨果所著浪漫主义戏剧，1830年2月25日首次上演时引起很大轰动，成为当时被称为“爱尔那尼之战”的文坛冲突的焦点。它一方面受到浪漫主义拥护者的欢呼，另一方面受到保守的拥护法国传统古典戏剧理论的人的嘲笑。剧作的成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胜利的一个标志。剧中主人公爱尔那尼是一个有革命精神的罪犯，他受无情命运的驱使，献身于狂热的爱情。——中译者

[17] 若阿基姆·杜·贝莱（Joachimdu Bellay，1522—1560年）：法国诗人，七星诗社的代表之一，是该社《捍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1549年）的作者之一。认为法兰西有产生至少一种可以与意大利文学并驾齐驱的现代文学。主要作品有《罗马怀古》《悔恨集》等。他用法文写作的颂歌诗集和十四行爱情诗，在法文历史上开了先河。——中译者

[18] 格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其广泛的才能影响到诸如逻辑学、数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和神学等领域，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的德国知识界占有主导地位。毕业于莱比锡大学，所著《组合之艺术》表述了成为现代计算机理论先驱的某些模型。1675年，他奠定了微分学和积分学的基础。1676年，在力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679年，改进了二进位制，奠定了一般拓扑的基础。1684年发表《求最大和最小的新方法》，解释其微分学方法，1686年发表《形而上学论》，1687年发表《神正论》，1714年写作《单子论》。——中译者

[19] 德尼·帕潘（Denis Papin，1647—1714年）：法国物理学家。发明高压锅，并首次提出由汽缸和活塞组成蒸汽机的设想。虽其设想不切实际，但经过别人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对工业革命有重要贡献的蒸汽机。主要著作有《利用蒸汽抽水的新技术》。——中译者

[20] 米海尔·帕莱奥洛加斯（Michel Paléologue）：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皇帝，1259年在尼西亚即位，号米海尔八世。1261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帕莱奥洛加斯王朝。其子安德鲁尼克斯二世和孙子米海尔九世作为同朝皇帝继承皇位。米海尔九世之子安德鲁尼克斯三世传位给幼子约翰五世（1341—1391年在位）。约翰五世传位于次子曼努埃尔二世，他又传位给其子约翰八世。其弟君士坦丁九世是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中译者

[21] 约翰·贝萨里翁（Jean Bessarion，1403—1472年）：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神学家，1423年做修士，1437年被约翰八世皇帝任命为尼西亚大主教，曾随约翰前往意大利，商谈两派基督教会联合抵御土耳其人的问题。他得到了教皇尤金四世的宠信，1439年被任命为枢机主教，从此长住意大利。曾在佛罗伦萨与人合作创办柏拉图学园，资助学术活动，藏书丰富，包括大量希腊文手抄本。1463年任君士坦丁堡牧首。——中译者

[22] 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年）：佛罗伦萨学者、诗人，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爱情诗《歌集》和描写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史诗《阿非利加》等。——中译者

[23] 这里是法国古里，1法国古里约合4千米。——中译者

[24] 以上所说的三个层面就是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中所说的三个时段。其中A代表短时段，B代表中时段，C代表长时段。参见中译者序。——中译者

[25] 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1787—1874年）：法国政治人物和历史学家。曾任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鼓吹君主立宪制，七月王朝期间（1830—1848年）为该派领袖，任教育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在史学方面颇有成就，主要著作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和《从远古到1789年的法国史》（共五卷）等。——中译者

[26] 贝尔纳·德·丰特奈尔（Fontenelle，Bernard Le Bovier，Sieurde，1657—1757年）：法国科学家、文人，伏尔泰称之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曾创作歌剧和文学作品，《死者的新对话》至今仍吸引着读者。其他作品有《神谕的历史》《婆罗洲岛纪行》《关于宇宙多样化的对话》和《论寓言之起源》等。——中译者

[27]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哲学家。其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西方的没落》（第一卷1918年出版，第二卷1922年出版）对社会理论的研究贡献颇大，也让他获得了永久声誉。该书认为，由于大多数文明都必须经历一个生命周期，因此历史学家不仅能够重建过去，而且能够预言“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成果”。它相信西方已经度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而进入反省和物质享受（斯氏认为这是“文化”的本意）的阶段，而未来只能是无可挽回的没落阶段。——中译者

中编 欧洲以外的文明

第一部分 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

第四章 历史

文明的产生、稳定和成长需要经过难以计数的时间。

伊斯兰教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伴随着穆罕默德而兴起的，这是一个事实，但另一方面，贸然做出这一论断也会使人误入歧途，且难以理解。与此类似，基督教伴随着耶稣基督的诞生而诞生，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先于他而诞生的。没有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就不会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但这两种新型宗教都依托于一个业已存在的文明实体，都从该文明实体中获得其灵魂。从一开始，它们就可以依托一个丰富的遗产，一个丰富的过去，一个活生生的现在，以及——已经如此——一个未来。

作为一个后继文明的伊斯兰文明：近东的新形态

·恰如基督教承继了罗马帝国，是其延长部分，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近东，而这里或许当算世界上开化之民最古老的汇集地。

这一点意义至为重大。伊斯兰文明把一系列古代地缘政治义务、城市范式、制度、习惯、仪式和由来已久的观念化为自己的信仰和生活。

信仰：即便从宗教本身而言，伊斯兰教也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与亚伯拉罕家族、《旧约》及其严格的一神论联系在一起。对伊斯兰教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城，耶稣是穆罕默德之前最伟大的先知，只有穆罕默德才超过了他。

生活：直至现在，伊斯兰教仍保留了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古老仪式。在《天方夜谭》（《阿拉伯之夜》）中，向君王致意的方式是“跪吻大地”。这种做法在波斯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Chosroès I，公元531—579年在位）的宫廷中就已流行，在此之前无疑就已存在。16、17世纪及更晚的时候，欧洲驻伊斯坦布尔（Istanbul）、伊斯法罕（Ispahan）或德里（Delhi）的大使认为，这对自己尤其是他们所代表的君主是一种耻辱，力图避免向当地君主行跪拜礼。许多世纪之前，希罗多德[1]就对他在埃及见到的种种行为愤愤不平。“在露天街道上，他们彼此半拜倒在地，以示问候；他们把手置于膝下，其行为与狗无异。”这种问候方式至今仍然流行。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其他一些细节、实例。土耳其浴（hammams）事实上是古罗马浴的残存，阿拉伯征服者把这种洗浴方式带到了波斯及其他地方。穆斯林所说的相当于我们西方人所述“我们的圣牌与肩布”（nos médailles et scapulaires）的法蒂玛[2]之手（la main de Fatma），已经装饰着迦太基的墓石。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Emile Félix Gautier）记述过这些事实，他毫不迟疑地认为穆斯林的传统服装与巴比伦人的服装相同，与2400多年前希罗多德的描述完全一样。希罗多德写道：“巴比伦人首先穿的是长及膝盖的亚麻袍子。”戈蒂埃评论道，在阿尔及利亚，这种长袍被称为“冈杜拉”（gandourah）。“在冈杜拉的外面，他们再穿上一件用羊毛做的袍子［我们把它称为吉拉巴（djellaba）］；吉拉巴之外是一件白色小斗篷［我们可称之为白色小伯诺斯（burnous）］；他们头上戴的是一种圆锥形帽子（我们称之为fez，非斯帽，或tarbouch，塔布什帽）。”

如此一来，要分清伊斯兰国家中哪些东西真正属于穆斯林，哪些不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昨天还在强调，北非特产粉蒸羊肉（couscous）据说源于罗马人，甚或布匿人！具有典型穆斯林特征、在埃及和马格里布到处可见的带平台的低矮房屋，肯定无疑地问世于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这种建筑既与带柱廊的希腊建筑相似，也与“我们时代最初几百年以来的阿拉伯建筑”非常相像。

这是一些具体细节，不过它们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与西方文明一样，伊斯兰文明是一种衍生的文明（une civilisaiton dérivée），借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是第二程度的文明（civilisation du second degré）。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近东先于它的多变、充满活力而混杂的文明的熔岩之上。

因而，伊斯兰教的历史既不是开始于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也不是

开始于穆斯林进行令人头晕目眩的征服活动的第一个十年（632—642年）。确切地说，它肇源于近东无从追忆的遥远历史之中。

近东的历史

曾由亚述人予以统一的近东，在很长时间内（公元前546—前486年），随着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3]、冈比西[4]和大流士[5]的征服活动而进一步连接在一起。两个世纪过后，由上述阿契美尼德王朝（Achéménides）诸王创建的庞大结构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所率希腊和马其顿联军的攻击下（公元前334—前331年）分崩离析。亚历山大所取得的胜利甚至比一千年后阿拉伯人的征服还要迅速。

从广义上说，这一千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殖民”时期，希腊人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广袤而没有明确界定的地区。作为殖民者，他们建造了像安条克（Antioche）、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e）那样的城市的大型港口，创建了类似塞琉古王朝（Séleucides）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Lagides）的马其顿那样庞大的国家。尽管他们在其臣民之间游移不定，但他们并没有与臣民融合在一起；他们从不在乡村居住，那里仍然是异域土地。实际上，就像后来欧洲人在非洲进行殖民活动那样，人数不多的希腊—马其顿人拓殖了亚洲这片广袤的土地，把其语言、行政管理方式强加在那里，并把他们的一些活力赋予那里。

罗马人的征服活动也扩展到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把希腊人开始的这一殖民时期延续下来。在罗马的外表之下，希腊文明继续存在下去；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拜占庭——另一个希腊文明——取而代之之后，它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不久之前，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为这一大规模的殖民冒险活动所缠扰：历史终有一天会把这些冒险推到一边，仅留一些遗迹在其身后。

作为一个殖民地，近东并不喜欢其外来的主子。自公元前256年起，帕提亚阿尔萨克王朝（Parthes Arsacides）［自公元224年起是波斯萨珊王朝（Perses Sas-sanides）］控制着横跨伊朗、自印度河边缘到叙利亚摇摇欲坠的边界的广袤地区。罗马和拜占庭与这一强大、有组织和好斗的邻居进行了耗资巨大的战争，后者实行封建官僚制度，有一支庞大的骑兵，在远东与古代印度、古代蒙古和古代中国相连。波斯骑兵使用的弓箭可以击穿罗马人的护胸甲，这种弓所用的箭镞可能来自古代蒙古人。波斯人在“优越的琐罗亚斯德教（la religion supérieure de Zoroastre）的鼓舞”下，顽强地抗击着“入侵者的希腊化主义

（hellénisme）”。不过这种政治上的敌对并不妨碍它偶尔接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影响。被查士丁尼[6]放逐的希腊哲学家们在底格里斯河畔大都会泰西封（Ctésiphon）找到了避难场所；另外，正是经由伊朗，遭到拜占庭迫害的基督教异端分子聂斯脱利派[7]到了中国，后来在那里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

·在多事的近东，为了反对希腊人的存在而皈依基督教，招致持续不断的、激烈的宗教斗争。阿拉伯最早的征服者（634—642年）迅速找到了同盟军。

叙利亚在634年、埃及在639年分别向这些新来者张开了欢迎之手。更出人意料的是，波斯在642年迅速表示臣服。这一旧的帝国因与罗马和拜占庭进行的长期斗争而精疲力竭，尽管拥有马和大象，却无法卓有成效地保卫自己，或者说面对骑着骆驼的阿拉伯战士的凶猛进攻根本无法保卫自己。近东投降了，把自己交由入侵者支配。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阿拉伯人发现，征服北非更为困难一些。但在此之后，他们于711年极为迅捷地侵占了西班牙。

总之，除小亚细亚受到拜占庭保卫和救援的山区之外，阿拉伯征服者以极快的速度控制了整个近东，随后由那里向西方大规模推进。

阿拉伯人能够迅速取得成功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

（1）他们的突然袭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2）他们的进攻把城镇孤立起来，快捷而有毁灭性，迫使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称臣，此为这种进攻自然而然的结果？

（3）为在近东发生的现在可以称为“非殖民化”的渐变累积到顶点所致？



征服路线
劫掠路线
道路
征服地区
725 年
科尔多瓦
711 年
凯鲁万
648 年
亚历山大里亚
642 年
巴格达
635 年
巴士拉
麦加
丝纸
（约 751 年，
造纸技术传入
阿拉伯世界）

图3 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

这三种假说无疑都有其道理。不过，从文明史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短时段的解释是不够的。无论是被征服一方的默许、放任，还是厌倦，都不能说明为什么阿拉伯人的这一成功如此持久。由于长期的共存，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由来久远的宗教和道德认同感，有一种密切的关联，这种说法不是比上述几种假说更有意义吗？穆罕默德传播的这种新宗教实际上是在近东腹地锻造成型的，与其根本性的内心冲动相吻合。

在其扩张的初期，伊斯兰教仅仅是复活了曾经长时期极为强大的古代东方文明，至少是大厦的“第二神柱”（阿拉伯自身是第一神柱）。作为一个文明，它牢牢地以极其富裕的地区为根基，当时阿拉伯半岛则看上去非常贫瘠。

伊斯兰教的命数就是在一个不同的轨道上为这一年迈、衰老的文明重新注入活力，并把它带到难以想象的高度。

穆罕默德、《古兰经》和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直接起因使我们马上面对一个人、一部书和一个宗教。

·穆罕默德决定性的成就是在公元610/612年（这一年代存有疑问，但大致可靠）至632年他去世之间取得的。

当时，阿拉伯地区因敌对部落和联盟的纷争而陷入分裂状态，大门洞开，对外来影响不加任何防备，向波斯、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Éthiopie）、叙利亚和拜占庭帝国所属的埃及进行殖民活动的种种努力打开了大门。没有穆罕默德，它永远不会实现统一，并在借此加强力量后向北方广阔的边界派出劫掠队伍。

拜占庭和帕提亚这一对争斗了数百年的宿敌都没有意识到在如此贫瘠的一个近邻地区会出现一个大敌，也没有对此表示过丝毫的担心。阿拉伯人确实进行过凶狠的劫掠活动，但这些从事劫掠活动的人来去匆匆。看上去没有任何令人感到惊慌的理由，尤其是在这么一个边疆地区——往往是无人荒地（no man’sland），处在“肥沃新月地带”的边缘，波斯人和希腊人曾进行过拉锯式的争夺？

随着穆罕默德取得的成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有关的学术研究使我们可以透过后人的渲染美化而了解他的生平，但去掉金色涂层之后的真实画面却显得更加生动、引人。穆罕默德出生在公元570年左右，在其人生的前40年历经了许多苦难。只是到了40岁那年，即在610—612年之间，他才从不为人知的模糊状态中崛起。“斋月（Ramadan，伊斯兰历九月）下旬的一个夜里”，在离麦加（La Mecque）不远的“希拉（Hira）山一个山洞里”，正在他熟睡之时，“永恒的声音（la Parole Incréée）注入了无际的世界，同时圣书出现在这位先知的怀中”。在睡梦中，一位神秘的人物向他出示了“一卷盖满印迹的布书，命令他好好阅读”。穆罕默德说：“我不识字。”天使则一边打开环绕着穆罕默德的布书一边说：“读吧，读吧。”“我读什么呢？”“以创造人类的主的名义去读吧。”……“安拉的选民静思冥想，意识到一部书深入到了他的内心。”［德尔芒让（E.Dermenghem）］这里应补充一个细节：此处译为“读”的那个词也可译作“传教”，因而我们仍然不清楚先知本人到底是否会识文断字。

这种神圣的历史已经广为人知。穆罕默德如何在听了大天使哲布勒伊来（l’Archange Gabriel，即那位神秘来客）[8]的话之后自认为是安拉的使者，是《圣经》传统中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如何在开始时，他的追随者唯有他的妻子赫蒂彻（Khadidja），而他的亲戚，麦加城富裕的商人，几乎马上对他采取敌对态度；在那时他的命运如何完全难以预料，处在失望、发疯的边缘，差点自杀身亡。我们没有必要通过追溯同时代人的叙述，通过先知的说教（hadits），通过《古兰经》的章节（sourates）——后人辑录而成的穆罕默德的启示——来一步一步地再现穆罕默德“朝拜圣地的历程”。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点，是要认识到这一“无与伦比的”文献（此为其神圣起源的证明）以及穆罕默德说教的优美、爆炸性力量和“纯粹的乐感”。穆罕默德曾在很长时间里处于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这些说教往往先于这一阶段。诗歌非同寻常，节奏非常有力：即使在译文中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一特点。就这种含义来说，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的阿拉伯地区相当于荷马史诗阶段：诗歌开启了它的耳目和心智。

在若干年中，先知仅仅向人数不多的忠诚于他的小圈子传道，其中一些人是他的亲戚，一些人非常不幸，一些人异常贫穷。埃及、叙利亚和海湾之间的长途商队使商人致富。除他们之外，麦加也有劳工、艺匠和奴隶。这些下层人士中有一位叫比拉尔（Bilâl），他是一位黑人奴隶，阿卜-巴克尔[9]替他赎回了自由；阿卜-巴克尔是先知的朋友，后来

成了他的岳父。比拉尔是伊斯兰教第一位穆安津[10]，他负责召集穆斯林进行祈祷活动。

富人对穆罕默德的说教先是感兴趣，继而感到困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不久就对此感到惊恐。在他们的威胁之下，穆罕默德的一些门徒到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避难，另有60余人逃到了麦加以北的雅特里布（Yatrib）绿洲。穆罕默德到那儿与他们会合。雅特里布更名为麦地那，意即“先知之城”，这一逃离事件或“希志来”（l’Hégire，另作赫吉拉）成为伊斯兰历纪元的起点（622年9月20日）。请注意，这里也可补充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麦地那城似乎得名于真正的希志来出现之前。

在那一时期，麦地那四分之三的居民是农民，同时存在着两个敌对的阿拉伯部落，另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大都是商人。穆罕默德对犹太人起初非常友好，继而表示蔑视，最终则持敌视态度。伊斯兰教的礼拜从前面向的是耶路撒冷，现在则转向了麦加。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持续纷争的背景下发生的：为了生存，逃难的穆斯林劫掠了他们的邻居，洗劫了麦加的长途旅行队。经过十年的战斗，先知穆罕默德最终以胜利者的身份重回麦加。在种种巨大的困难面前，他显示出了非凡的决断能力、审慎态度和耐心。

·作为一种启示宗教（religion révélée），伊斯兰教（“伊斯兰”一词的含义是“顺从”，即顺从真主安拉）逐渐根据未来的《古兰经》的章节和先知的言行举止而形成。这一信仰具有一种堪称典范的简朴特征。

伊斯兰教的“五个支柱”是：信奉单一的神安拉，除他之外，别无神灵，而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即chahada）；每天礼拜五次；伊斯兰历九月即斋月的29天或30天禁食；天课，即救济穷人；到麦加朝圣。护教战争（jihad）即圣战不是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之一，但后来变得异常重要。

伊斯兰教的宗教象征体系并不具有任何神秘性，但其中的许多观点互相矛盾，这导致人们对其神秘主义做出了各种各样复杂的解释。就此而论，伊斯兰教神学与基督教非常相似：两者都潜在地涉及困难的灵修道路。

至于礼拜，先知受到了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关做法的启示。然而，在朝圣方面，他维持了阿拉伯人和麦加的传统。他实际上保留了更早的互

相关联的朝圣习俗——到麦加的克尔白古庙（la Kaaba，即天房）和该城附近的阿拉法特山（le mont Arafat）朝圣，可能是古老的春季节期和古老的秋季节日，其中前者类似于《旧约》中的住棚节[11]。这些由来已久的仪式的深层含义已因时间久远而不为人所知，现在则转化成了新的形式。“穆罕默德归并了这一旧的制度，并在事后通过一种文化传奇证明它的合法性。他宣称，亚伯拉罕及其子以实玛利[12]（阿拉伯人的祖先）在他们那个时代就组建了圣克尔白祭坛，组织了相伴而生的朝圣活动。这样，相对于摩西创建的犹太教和体现在耶稣身上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就取得了优先地位。”把对亚伯拉罕的祈求解释为政治考虑，解释为仅仅是一种断称伊斯兰教拥有优先地位的愿望，这还不足够吗？难道宗教不是有其自身的宗教逻辑，有其自身的真理吗？优亚基姆·穆巴拉克（Youakim Moubarac）就是这么断言的（《〈古兰经〉中的亚伯拉罕》，1958年）。路易·马西尼翁（Louis Massignon）则认为：“伊斯兰教把亚伯拉罕尊为第一位穆斯林——确实是这样，从神学上讲确实是这样。”

伊斯兰教向穆斯林施加了严格的宗教戒律。关键的一点，同样是要认识到宗教信仰和宗教惯例在穆斯林的生活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包括法律在内，所有的一切都肇源于《古兰经》。比起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现在宗教习俗在伊斯兰世界的活力要大得多了。1955年路易·马西尼翁写道：“在1360年里，每年到阿拉法特山朝圣的各国人士计有15万人。”在复活节，法国一个典型村庄中有多少人去教堂，在埃及一个典型村庄，就有同等数量的人进行上述这种朝圣活动。优势显然在伊斯兰教那一方。但这必定意味着更强烈的宗教信念吗？往往由于所承载的文明，基督教罹受了内部的磨难。这些伊斯兰国家迄今大都没有遭受过这种苦难。这难道不是由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以古老、不变的社会为根基，而在这些社会中，与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本身的其余方面一样，宗教仪式持续未变吗？

阿拉伯半岛：一个几乎没有城市化的文化的问题

在穆罕默德所取得的成功和伊斯兰教的扩张过程中，广袤的阿拉伯半岛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对此做出回答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伊斯兰世界中，城镇起着首要作用：穆罕默德生活在麦加的城市世界中，在那里经营（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麦加位于仍然保持原始状态的阿拉伯半岛的边缘。

当时，麦加的繁荣仍是为时不久的事，这种繁荣因它与遥远的异域城市的联系而产生，且仅仅与大规模的贸易和麦加商人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相关。无疑，正是在叙利亚的城镇里，而不是在阿拉伯半岛本身，穆罕默德在得到神祇的启示之前首次接触到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圈子。

不管怎样，他的种种戒律——穆安津的宣告，星期五集体做礼拜，妇女头戴面巾，信徒和率穆斯林做礼拜的伊玛目（imans，准确的写法应是imam）的尊贵——正是以城市背景为先决条件。所有这些都是城市人群的见证，指的是拥挤的城市人群。

“这些严格而过分拘于礼节的理想是禁欲的汉志（Hedjaz）商人的理想。在这里伊斯兰教寻求的同样是城市的正派得体，而不是田间的无序。”［德普拉诺尔（X.de Planhol）］我们必须从这一背景出发去理解先知的某些习惯。“我担心我的子民的是，牛奶里有潜伏在泡沫和奶油之间的恶魔。他们将急不可耐地喝掉它，然后回返沙漠，离开共同做礼拜的中心。”（着重部分系本书作者所加。）被归结到先知穆罕默德头上的还有一段话，说的是他看到犁铧时的情景：“那从不会进入虔信者之家，而是令人卑微、退化。”正如《古兰经》上所载，用一句话来说：“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冥顽不化，死抱住不洁行为和伪善不放。”因而，在伊斯兰教兴起的那些早期岁月中，信仰的中心在城镇，这一点让人回想起西方基督教刚刚开始时的情景：那时不信教的人不是农民，paganus[13]，即异教徒吗？

·确实，阿拉伯半岛上的贝督因人（Bédouins）是被视同外人的“农民”。20世纪初，仍有可能碰到按其一贯方式生活的他们。时至今天，在阿拉伯半岛的腹地，仍有可能看到他们。

一位研究伊斯兰教问题的专家罗贝尔·蒙塔涅（Robert Montagne，1893—1954年）撰写过一部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一沙漠文明的著作——对这一文明，任何人种史学者都会毫不迟疑地称之为文化。

那里实际上没有什么城镇，即使有，事实上也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在穆罕默德由麦加大逃亡之时，雅特里布甚至连伊巴密浓达[14]时代维奥蒂亚（Béotie）的底比斯城（Thèbes）也比不过！围绕着这些“城镇”，在拥有勉强维持生计水流的谷地，有一些定居的农民，他们是固着于土地上的奴仆，但人数非常少。大多数阿拉伯人是游牧民，“像蜂群一样”，组成了非常小的社会集团——父家长制的家庭、亚氏族、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由研究阿拉伯问题的那些人发明的这些标签纯粹

以人数为依据：一个氏族指100—300顶帐篷；部落则有3000人，它是任何社会聚合中最大的单位。在那一规模上，还有可能维持严格的结构，贝督因人承认的唯一的虚虚实实的血缘关系终于维持下来。部落是大型战斗单位，包括兄弟、堂表兄弟和扈从。另一方面，部落联盟则仅仅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其成员分散在相隔遥远的地区里。

贝督因人在阿拉伯半岛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之所以能够在如此艰苦的生活中过下去，可能完全依靠饲养骆驼。骆驼所费甚少，而且非常耐渴，能够使人们有可能由一个牧场到下一个牧场做长途迁移。在进行劫掠活动时，它们驮运饲料、皮制水囊和粮食。马则留在最后才使用，用于进行最后的攻击。

日常游牧生活逐“消逝的牧草”而游移不定。贝督因人借助他们的驮驼和白色的善于奔跑的母驼由北向南、由南向北奔波，每次行程均多至上千千米。在北方，即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肥沃的新月地带的边缘，随着与定居农民频繁的接触，游牧习惯受到了削弱。除骆驼外，他们还饲养了羊；同时他们迁移的区域非常有限。一旦贝督因人成为养羊的农民，他们就不再是chaouya，即牧民。他们的地位仅仅比牢牢固着于一地的饲养公牛或水牛的人高一等。

在阿拉伯半岛的腹地和南部，饲养骆驼的游牧民族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习性不变，未受外来影响的玷污，保持着其高贵的特性。这些具有贵族派头的部落不停地进行着战争：强者驱赶走弱者。沙漠上人满为患，超出了它所能供养的能力，因而剩余人口只好向外迁移，他们大部分向西迁移：西奈半岛和狭窄的尼罗河并不构成阻止人们前往撒哈拉沙漠和西方国家（les pays du Couchant）地区的障碍。

阿拉伯地区的居民向西迁移，既有地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根源。从地理上讲，在习惯了南方的炎热之后，北方沙漠地区气候寒冷，不适于居住。阿拉伯人7世纪时之所以未能征服小亚细亚，是因为他们的骆驼忍受不住现今安纳托利亚平原的寒冷，那里的巴克特里亚骆驼更多的是待在家中。然而，撒哈拉沙漠实际上是阿拉伯沙漠向红海以外地区的延伸。从历史上说，北方和中亚的沙漠已经为当地的游牧民族占据，他们有双峰骆驼、马和骑马的战士，既凶猛又机动性强。新来者想在这里找到一片空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并非不加迟疑，贝督因人的阿拉伯为伊斯兰教提供了一支非同寻常的战斗力量。游牧民族并不是马上就皈依伊斯兰教的。他们依然好战和

难以预测。甚至在西班牙，在倭马亚哈里发（Omeyyades）统治时期（661—750年），来自也门（Yémen）和来自盖斯（Qais）的不同派别之间由来已久的纷争重新燃起，而这里离其发源地有数千英里之远。另外，先知去世时，那些声称接受他的权威的游牧民族举行暴动反对他。战斗旷日持久，而且非常惨烈；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欧麦尔哈里发[15]（634—644年在位）发现，要解决这些恶魔般的纷争，只有派遣这些骑马民族和骆驼民族去进行护教战争或圣战，借此把他们从阿拉伯半岛支走，并超越部落之间的争斗，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就这样，贝督因人完成了伊斯兰教最早的征服。他们这些小的集团，微型的民族国家，带着其沙漠卫队，带着其羊皮或骆驼皮帐篷，带着其风俗习惯，怀着其荣誉感和对维持游牧生活、着力避免过上不高贵而且令人窒息的定居农民生活的深切关心，穿行了成千上万里。他们就像雹块那样降落在伊斯兰教将要征服的西方广袤地区。不管他们到了哪里，他们都带去其语言、民歌，带去其缺点和美德。他们最大的美德之一就是非常地好客，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一个例子是贝尼希拉尔（Beni Hillal）部落长期流浪的故事。7世纪时他们离开了汉志以南的地区，约公元978年他们活动于上埃及，处境不佳，但11世纪时他们像蜂虫那样成群结队地降落在北非。12世纪时，他们在1151年的塞提夫（Sétif）战役中败在柏柏尔人（Berbères）手下，散布在马格里布地区（le Maghreb）各处。他们的史诗至今仍存在于民歌之中——“自外约旦（Transjordanie）沙漠到毛里塔尼亚（Mauritanie）的比斯克拉（Biskra）和艾蒂安港（Port-Étienne）”，均传唱着这些民歌。

·伊斯兰世界的“文明”与“文化”：阿拉伯部落的作用值得注意。不久就变成极为精良优雅的文明的伊斯兰教能够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几乎完全应当归功于其好战“文化”的力量，归功于每次它都迅速地同化了这些原始的阿拉伯民族，并使之迅速“开化”。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阿拉伯部落给伊斯兰教带来了最初的这些胜利。随后，北非粗野的山民即柏柏尔人帮助它征服了西班牙，并组建了法蒂玛王朝的埃及。最后，它利用了中亚游牧民族突厥—蒙古人，他们位于其边界地带，几乎处在其边界线之内，使其能够加以伊斯兰教化。自10世纪起，突厥雇佣军构成了为巴格达哈里发效劳的军队的主体。他们是一流的士兵、弓箭手和非同寻常的骑手。

9世纪阿拉伯伟大作家贾希兹[16]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这些粗人，以令人难忘的话语描述他们。但历史又一次重复了自身。穷人变成了富人，游牧民族变成了公民，他们都栩栩如生地说明从奴仆变为君王时常仅仅是一步之遥。昨日是雇佣军，今日一跃成为主子。先是塞尔柱突厥人，随后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新君王。西方人把奥斯曼领导人称为“大公”或“大土耳其”。他们于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从而完全彻底地证实了土耳其人的力量。

伊斯兰世界的命运或许就在于吸引并利用处在其周边或穿越其区域的原始民族，而后沦为其暴力的牺牲品。最后，秩序得到了恢复，创伤得到了治愈。获得成功的原始民族战士被伊斯兰世界全能的城市生活所驯服。

第五章 地理

尽管伊斯兰世界覆盖的区域互相连接，但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在远离中心的边远地区，有着天壤之别。事实上，伊斯兰的历史从来就不是风平浪静的。

然而，从更广的意义上说，这些不同是相对的。就整体而论，伊斯兰是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体系，可以说它自己提供了一系列的实例和解释。

伊斯兰世界的土地和海洋

地图标出了基本的情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曾经控制的区域，以及后来他们面临外来的敌对文明时所抛弃的区域。这些对抗包括在西西里、伊比利亚半岛、塞蒂马尼亚[17]、意大利南部和地中海西部与西方的冲突，在克里特和巴尔干半岛与东欧和东正教的对抗，以及在印度河—恒河平原和德干高原中部及西部与印度教世界的对抗。

信奉伊斯兰教的区域——如同在开始时一样，至少在很长的时期内如此——至今依然非常广袤。这些地区并非一直富庶，但它们自摩洛哥和撒哈拉大西洋沿岸向东延伸到远至中国和印支半岛，引用新近一部书的副标题——“自达喀尔（Dakar）到雅加达（Djakarta）”。

在进行本概括性叙述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宽阔的公海，伊斯兰国家曾程度不同地对它们加以开发利用，但现在除非常有限的沿海航运外，大都放弃了。海洋属于那些在它上面扬帆起航的人，而现在海洋上实际上没有几艘伊斯兰国家的船了。回顾往昔，在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里海，尤其是在印度洋，情况迥然不同。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船（les boutres），这些船的木壳板用棕榈绳系牢，没有帆，利用季风圈进行活跃的大规模贸易。到了9世纪，他们已经抵达中国广州。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18]追上并抢劫了他们。但无论葡萄牙，还是很晚之后的荷兰和英国，都没能够把他们从印度洋的低成本贸易中驱逐出去。只是到了19世纪末，他们才被蒸汽船超过。

因而，阿拉伯的航海史诗是长存的。伊斯兰古代的荣誉不仅归功于其骑兵，而且归功于它的水手。水手辛巴德[19]就是一个象征。

·地中海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大型冒险主要是在地中海上演的。

辛巴德叙述的惊险离奇的历险故事，属于在印度洋上遇到的种种神奇经历、不可思议的怪事和灾难。不过确切地说，伊斯兰国家作为世界海上强国的地位是在地中海确立的。在那里，穆斯林首先成为主宰，而后进行殊死的斗争，最终沦为败军之将，失去了一切。

伊斯兰征服的重要地区不仅包括叙利亚、埃及、波斯、北非和西班牙，而且几乎包括整个地中海。825年，它占领了克里特（Crète），并在那里安下身来，如此看来它的胜利似乎是永久性的。但在961年拜占庭收复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前哨阵地，并牢牢地控制住罗得岛（Rhodes）和塞浦路斯（Chypre）——这几个地方扼守着通往爱琴海的海路。

随后，在东方，伊斯兰也遭受了挫折。拜占庭继续控制着布满岛屿的爱琴海，控制了巴尔干半岛两侧，控制了水域辽阔的黑海和亚得里亚海，后者是通往意大利的门户，威尼斯人正是经由这里靠为富裕的拜占庭运送木材、盐和小麦挣得了第一笔有限的财富。

然而，另一个地中海，即西地中海，却臣属于海上强国埃及、北非和西班牙，它们此时悬挂的都是伊斯兰的绿旗。825年，安达卢西亚人（les Andalous）征服了克里特。827—902年，突尼斯人拓殖西西里。在他们的统治下，西西里空前地繁荣起来。该岛及其最为辉煌的城市巴勒莫（Palerme）成为“萨拉森人的”地中海至关重要的核心；巴勒莫位于孔卡多罗（Concad’Oro）的边缘，而今在水渠的灌溉下，那一群山环绕的

平原变成了伊甸园。

穆斯林还抵达了科西嘉岛（Corse）和撒丁岛（Sardaigne）不同的地点，并曾短暂地据有普罗旺斯（Provence）。他们对罗马形成了威胁，并曾向它发起攻击，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台伯河（le Tibre）河口登陆。他们还以武力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Baléares）；该群岛享有中途停靠港的地位，对西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至关重要，并使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有可能直接通航，而不是进行沿岸航行。

因而，西地中海这一财富通道是由伊斯兰国家主宰的。它给类似亚历山大里亚（迄至那时是大都市开罗的一个沿海口岸）、巴勒莫和突尼斯（离海10英里，似乎有意要与它保持距离）这样的海港带来了活力和繁荣。其他城市也发展起来或重新振兴：贝贾亚（Bougie，布日伊）及其附近的森林，是造船业所必不可少的；阿尔及尔和奥兰（Oran）这两个城市当时仍不占有重要地位；阿尔梅利亚（Almeria）为充满活力的西班牙港口；以及繁华城市塞维利亚，它位于流入大西洋的瓜达尔基维尔河（le Guadalquivir，意为“大河”）河畔，处在其适于航行的河段。

伊斯兰的支配地位持续了一百多年。确实，不久它就成为基督教海盗行为的牺牲品：富人总是招引穷人的抢劫。10世纪及10世纪前后，与后来人们熟悉的情况相反，富人是穆斯林，海盗是基督教徒。阿玛尔菲（Amalfi）、比萨和热那亚是所有大黄蜂的巢穴。随着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形势变得戏剧化了。诺曼人的快船与海盗船相比毫不逊色，同样令穆斯林的独桅三角帆船筋疲力尽。事实上，诺曼人占领西西里是“异教徒”（Infidèles）对地中海的控制中最早出现的裂痕。

接踵而至的是慢慢地被窒息而死，逐渐逐渐地收缩，其恶果不久就在整个“穆斯林湖”显现出来。约1080年，在熙德[20]的时代，就在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es）到来——他们从苏丹和北非前来帮助西班牙的穆斯林——之前不久，西西里的一位阿拉伯诗人对是否接受邀请前往西班牙迟疑不决，尽管托莱多（Tolèdo）国王莫塔米德（Motamid）允诺给他50第纳尔。他这样写道：“我的头发因忧伤而变白，睹此不要惊奇；把惊奇留给下述事实吧：我双眼的瞳孔竟依然褐黑！地中海属于基督教徒，我们的船要冒极大的风险才能在那上面航行。阿拉伯人现在所拥有的仅仅是陆地。”时过境迁，局面确实已经逆转了。

不久就出现了十字军东征（1095—1270年）；除拜占庭据有的那些水域外，东征使得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舰队能够收复其固有海域。大型

历史插曲有：1099年十字军战士占领耶路撒冷，建立圣地国家；1204年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异乎寻常的大分裂后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我们不要因为这些插曲而忽略了另一重大事实：他们控制了地中海的海上贸易路线。1291年，随着阿卡的圣约翰（Saint-Jean-d’Acre）的陷落，基督教失去了它在亚洲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不过它在整个地中海依然维持着无人可以匹敌的霸主地位。

伊斯兰世界直到两三个世纪后才做出反应。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竭尽全力去恢复海上霸权。1538年他们在普雷韦扎（Prévesa）的胜利似乎有希望让他们控制地中海，但1571年他们在勒班陀（Lépante）战役中的毁灭性失败很快就阻碍了他们的复兴，这种复兴无论如何是纯粹军事性的。面对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拥挤的舰队，土耳其人所能做的只是集结起数量有限的商船，它们大都来自希腊，仅仅在伊斯坦布尔、黑海和埃及之间往返。

当然，接下来出现了土耳其海盗持续不断的活动，以及阿尔及尔异乎寻常的优势。即使如此，伊斯兰世界从此再也没有建立起一支商船队。

因而，在地中海，胜利与灾难彼此相承。在印度洋，生活较为平和——直到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在那里出现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自那时起，伊斯兰世界的侧翼受到了包抄。

·散文作家艾萨德·贝伊（Essad Bey）正确地评论道：“伊斯兰世界就是沙漠。”但沙漠或者沙漠群周围，一面是两个适于航行的盐水水域地中海和印度洋，另一面是三个人口相当密集的陆块—远东、欧洲和黑非洲。

最为重要的一点，伊斯兰世界是一块连接这些广袤地区的“居间大陆”。

非常明显，在大西洋与华北或西伯利亚森林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沙漠：南部的炎热沙漠，此为阿拉伯单峰驼的故土，与北方寒冷的沙漠迥然不同，后者的骆驼是名副其实的双峰类型。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大致在里海到印度河河口。

当然，在每一个沙漠中，在某处都会有河岸或海岸，有其“萨赫勒地区”[21]，定居农民生活于其间，有大平原及其绿洲，在那里锄头和平

衡犁能够平整出土地，人们在其上播种收获。在这些古老的文明国度里，甚至有田园般的河流绿洲，比如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阿姆河（Amou Daria）和锡尔河（Syr Daria）肥沃的谷地，那里的土地肥得流油——尽管常常因过长时期的耕种而枯竭。假如气候不好，这些地区易于受到影响，同时太易受到哪怕最小的人为恐怖或自然中不幸的影响。一次入侵，一次长期的战争，一场暴雨或者人口过多——有了这些因素中的任一个，大片大片的农耕地区实际上就有可能失去：沙漠同样会吞噬并埋葬城镇和乡村。

因而，伊斯兰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础上。它那过分拥挤的城镇随着贸易而增加，其分散的农业地区及其关系总是很紧张的文明都面临持续不断的难题。现今一份人口统计图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伊斯兰世界包含少数人口密集的地区，大片大片的空地把它们彼此分开。尽管具有巧夺天工的灌溉系统，尽管旱地农作取得了成功，尽管有任劳任怨和坚强不屈的农民，尽管种植了类似橄榄树和棕榈树这样的适应性极强的树种，伊斯兰世界却从未享受到稳定的富足，至今仍不太丰裕。任何丰裕都只是临时性的，是由一阵风般的对某种奢侈品的时尚追求造成的，或者是某一特别幸运的城市所特有的。

因朝圣客云集而获得巨额财富的麦加城就是这种情况——初看上去这自相矛盾。非常不可思议，在那里任何事情看来都是可能的。1326年，伊本·拔图塔[22]，所有阿拉伯旅行家中最伟大的一位，这样赞美麦加的富裕：其“大块肉食美妙的味道”，其不同寻常的水果、葡萄、无花果、梨和枣椰，“不见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此外还有无与伦比的瓜类等等。他这样得出结论：“总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每一种商品，在这一城市中都可以找到。”而在其他地方，司空见惯的是饥饿每日相伴。一位阿拉伯诗人写道：“我可以把饥饿感封存在肚子的深处，就像一位精巧的织工可以弯曲手指把线缠在手上那样。”穆罕默德的一位战友阿卜·霍莱伊拉（Abou Horaïra）这样评说先知：“他未曾有一次用大麦面包填饱过肚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一个是，就像我们在阿拉伯半岛看到的那样，游移不定的游牧生活居主导地位。除在细节上有些不同外，在伊斯兰不得不赖以为生的所有沙漠中情况都是这样（mutatis mutandis）。各种限制非常苛严。尽管具有高贵的血统，贝督因人一无例外地被描绘为野蛮人。如果说他们未能理解定居的农民，那么反过来农民照样回敬他们。伊斯兰问题专家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很有道理地写

道："这些常常遭到诋毁的贝督因人，是多么的高贵啊！"确实，他们是人类动物中卓越的分子。不过，对伊斯兰世界来说，他们却是难以驯服和领导的盟友！但他们是极为有用的盟友，因为没有他们，伊斯兰教就会失败……

然而，尽管他们因其极端清苦和俭省的生活而受到谴责，但他们没有多少机会取得今日会称为"社会进步"的发展，尤其因为这将要求他们去采取定居生活之时——实际上现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规模宏大。且不论好坏，奥斯曼帝国早在16世纪就遵循这么一条道路，在土耳其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都建立了安顿游牧的优鲁克人（Yourouks）的殖民地。这种做法结束了严格的游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不可避免的命数降临到优鲁克人身上。用阿诺德·汤因比的术语来说，这些人是其自身"回应"的囚徒。

·作为一种缺少人力的文明，伊斯兰教不得不从它能招募到人的地方招募人员。这种人力缺乏是其根本性贫困的一个因素。

自相矛盾的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现在伊斯兰世界人口过剩：信奉伊斯兰教的总人数在3.65亿—4亿之间，占世界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相对于其有限资源来说，人口过多了。

但在过去，在其繁盛时期，伊斯兰世界至多只有3000万—5000万人，而全世界总人口在3亿—5亿人之间。这并不算太多，因为非常粗略地说，如果这一比例保持不变，相对而言，那时伊斯兰世界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它实际上是由欧洲、非洲和亚洲构成的旧世界（le Vieux Monde）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而这三个洲在美洲被发现之前本身就是一个星球。

这赋予它种种难以承受的责任：行政管理、贸易、战争、军事安全。为了负起这些责任，伊斯兰世界在各个地方都吸纳人口，并表现出为人口众多的西方所不知晓的宽容。此外，它还在其疆域之外每一处寻找他们，并决心把古典伊斯兰教变成一个出类拔萃的奴隶文明。

这种持续不断地大量征召人员的做法在很长的时期里是穆斯林种种活动不可或缺的基础。周围的各个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它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海上或陆上被穆斯林亲手抓获的欧洲基督教徒，或者通过转手买到，比如9世纪时凡尔登（Verdun）的犹太商人转售的斯拉夫人战俘；还有非洲黑人、阿比西尼亚人、印度人、贫穷的土耳其人和斯拉夫

人、高加索人。16世纪时，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劫掠中捕获的俄罗斯人被送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充当奴隶。

此种奴隶往往挣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财富。埃及的马木路克（Mamlouks）就是一个实例，1250年他们在路易九世[23]即圣路易的十字军东征遭受失败之时夺取了权力。马木路克的大多数有土耳其人血统，后来有高加索渊源。他们虽然身份是奴隶，但被训练成为士兵。他们在1517年被奥斯曼征服之前一直非常成功地治理着埃及，但即使在那之后他们也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波拿巴·拿破仑（Bonaparte Napoleon）在金字塔战役中与他们交过手。当今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马木路克是些暴发户，但并不卑微。"同样著名的土耳其禁卫军在不止一个方面与他们相像。

实际上，每一个伊斯兰城市都辟设专门的区域，供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的人居住。1651年，奥斯曼素丹的宫廷里发生了一次政变，此时"巴别（Babel）的诅咒降在了素丹后宫的侍从官（Icoglans，素丹的年轻侍从和军官）头上，并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力"。在极端的压力下，他们忘记了后天学会的奥斯曼语言，而且，保罗·里科（Paul Ricaut）在1688年写道："见证者满耳听到的是嘈杂的不同的声音和语言。一些人用格鲁吉亚语大喊大叫，一些人用的是阿尔巴尼亚语，一些人用的是波斯尼亚语，一些人用的是明格列尔语[24]，还有一些人用的是土耳其语或意大利语。"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而且仅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土耳其海盗统治下的阿尔及尔同样有着众多的语言）！

居间大陆或空间运动：城市

伊斯兰世界没有受到大自然的恩赐。如果没有穿越其沙漠的道路，它就基本上什么也算不上：道路把它连接在一起，并赋予它生命。这些道路是它的财富，是它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是它的文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们赋予它"支配"地位。

至美洲被发现之前，伊斯兰一直在旧世界居支配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命运。如我们前文所述，单单它就把分散在旧世界各地的几大文化带连接在一起。这几个文化带是：远东、欧洲和黑非洲。未经它的同意，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任何东西都无法从它中间穿过。它是它们的中介（intermédiaire）。

·船队、沙漠商队和商人：尽管伊斯兰的政治局势有时——而且相

当经常——非常困难，但它持续不断地从它所处的别人不得不从它那里经过的地理位置中获利。

显然，它未必总是充分认识到它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未能充分地利用这一优越条件。因而，在亚洲寒冷的沙漠中，伊斯兰国家罹受它对极其骚动不宁的游牧民族——“处于边缘地位”——控制非常脆弱之苦。沿绿洲向外伸展的突厥斯坦（Turkestan）是一片前哨地区，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边疆。实际上，要想把土耳其人、土库曼人或蒙古人从由咸海通往黑海和里海的道路上赶走是不可能的。这些游牧民族中最为凶猛的一支蹂躏了伊朗，并对巴格达形成了威胁……图4（本书第98页）显示出13世纪蒙古人入侵规模巨大的程度。

虽然如此，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有伊斯兰国家把苏丹的黄金和黑奴送到了地中海，把丝绸、胡椒、香料和珍珠由远东运到了欧洲。在亚洲和非洲，它控制了与黎凡特[25]的贸易。意大利商人只是从亚历山大里亚、阿勒颇、贝鲁特或叙利亚的的黎波里（Tripoli）接手。

因而，伊斯兰文明首先是一个建立在运动和中继之上的文明。这意味着长途旅行和众多的沙漠商队路线——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从黑海到中国和印度，从黑色大陆到北非。

尽管东方有大象，各个地方都有马和驴子，但这些沙漠商队主要是由骆驼组成的。一峰驮驼能够运送300担（约300千克）的货物。由于一支沙漠商队可能由五六千峰骆驼组成，因而其总运输量相当于一艘非常大的商用帆船的载重量。

商队在行进时就像一支军队，有其首领、参谋部，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设立了强制性的旅站，采取了应对靠打劫为生的游牧民族的预防措施——与这些人达成协议是稳健之举。除沙漠腹地之外，沿途每隔一天的行程就设立一个固定的营地，那里有庞大的建筑，叫做商队旅馆或“可汗”（khans），人和牲畜均可找到合适的歇脚地。这实际上是商队路线上的旅站。欧洲的旅行家没有一位不用笔墨描述这些宏伟的大厅、描写其比较方便的起居设备的。其中一些，比如阿勒颇的引人瞩目的可汗，至今仍然存在。

除非通过一种半资本主义的庞大组织，否则这种商队体系是无法与海上贸易连成一体的。伊斯兰国家有它自己的商人，一些是穆斯林，一些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1095—1099年）开

罗的犹太商人的书信保存了下来。它们表明人们知道有关信贷和支付的所有方法，展现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协会。（这不像人们过于轻易地相信的那样是后来由意大利人发明的。）它们还证明存在着长途贸易：珊瑚由北非到了印度；奴隶是在埃塞俄比亚购买的；铁是从印度带来的，同时带来的还有胡椒和香料。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金钱、商品和人员的大规模流动。

因而阿拉伯人游历范围如此之广就毫不令人奇怪了，尽管这在当时看来让人难以置信。伊斯兰教充当了开路先锋，它总是处在运动之中，靠运动而生存。伊本·拔图塔是一位摩洛哥人，1304年出生在丹吉尔（Tanger）。1325—1349年，他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到了埃及、阿拉伯半岛、伏尔加河下游、阿富汗、印度和中国。1352年，他到了黑非洲和尼日尔河沿岸，在那里他抱怨说，苏丹人尽管是穆斯林，却对“白人”太不够尊重。在黄金之城西吉尔马萨（Sijilmassa），他非常意外地遇到了一个来自休达（Ceuta）的同胞，此人是他在中国认识的某位叫作布赫里（al-Buchri）的人的兄弟……在这一时期，伊斯兰世界“盛产”这种漫游者，他们自大西洋到太平洋都一无例外地受到穆斯林的款待和欢迎（其好客程度与俄罗斯人相同）。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城市，这种流动就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城市自然而然地在伊斯兰世界兴盛起来，是使人的流动、货物和金钱的流通成为可能的发动机。

因为所有东西都从它们那里经过：商品、驮驼、人和珍稀物品。在后者之中，开列一个不完全的单子，到达欧洲的就有：异域植物（甘蔗、棉花）、蚕蛹、纸张、罗盘、印度（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可能还有火药，以及——除某些非常著名的药之外——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可怕的传染病病菌，这两个地区是天花和瘟疫的故乡……

就广义而言，所有这些城镇看上去都很相像。它们的街道非常狭窄，普遍呈斜坡状，这样雨水可以自动地清洗它们。让我们看看街道狭窄的情况：常常两头负载货物的驴子无法错身而过。根据先知一个圣训的规定，街道应宽7腕尺（约合3.5米），这样满载物品的两头驴子错身而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尽管有法律条文的规定，两侧的房屋还是蚕食着街道，它们通常有挑头部分突出出来，就像西方中世纪的房屋那样。这部分是因为伊斯兰教禁止兴建多层的楼房［除开罗、麦加及其港口吉达（Djedda）等城市外］；把房子建得太高是其主人追求虚荣的一个标志，应受到谴责。

由于这种混乱无序状态，由于缺少整体的市政管理，一个城镇中任何严重的人口压力都会导致这种低矮房屋的四处蔓延，它们纷纷侵占空地，彼此互相逼近，造成一种杂乱无章的结果。

1657年，一位名叫泰弗诺（Thévenot）的法国旅行家吃惊地注意到，“开罗没有一条优美的街道，却有不计其数的弯弯曲曲的小巷，看起来显然所有房屋在兴建时都没有经过任何规划，哪里有空就在哪里建造，至于是否挡道则不管不顾”。

一个世纪后，1782年，另一位名叫沃尔内（Volney）的法国人又记述了这些同样狭窄的街道：

由于街道没有铺砌过，人群、骆驼、驴和狗群从那里经过时，扬起一股让人非常难受的尘土。人们经常把脏水就泼在自己的门外，这样尘土就变成了泥浆和散发恶臭的雾气。与东方通常的习惯不同，这里的房屋有两三层楼高，顶部是一个铺砌过或用黏土涂抹的平台。它们大都是用泥或烧制不精的砖头建成，余者使用的是产自附近的莫夸塔姆山（Moqattam）的软性石料。它们看上去都与监狱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面对街道的那一侧都没有窗户。

19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呈现出类似的图景：“且不必说马车，就连两匹马也几乎无法错身而过。迪宛大街（rue du Divan）在当时是该城最宽的一条街，在某些路段宽度也不超过两三米。”

总体而言，这些都是事实。然而，11世纪的开罗拥有一些高达7—12层的房屋；9世纪的萨迈拉（Samarra，位于伊拉克境内）有一条长数千米、宽50—100米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这些事实是一些已知规则的例外！

在伊斯兰国家中，街道尽管看上去很窄，却总是非常有活力，生机勃勃：它们是人们永久的聚会场所，尤其是那些喜爱表露自己看法的人。它们是“主动脉……（是）说书人、歌手、玩蛇人、江湖艺人、游医、江湖骗子、理发师和所有那些在伊斯兰道学家和教规学家眼中非常可疑的职业人士聚会之地。此外，它们还是孩子们的活动场所，是他们玩耍嬉戏（这些活动常常很激烈）的地方”。除街道外，露台也是互通消息的地方，尽管它们是专门留归妇女的。

虽然一切杂乱无章，但它们从未把整体规划排除在外——尤其是因

为这个规划以城镇的结构和居民的生活为根基。在城市的中心是大清真寺，供每周的讲经之用。“它就像心脏，万物通往它，并由那里流出。”（雅克·贝尔克语）离此不远是集市（bazar），即商人区，那里有店铺街［“苏克”（souq），露天市场］，还有商队旅馆或库房。另外，尽管经常遭到非难和被定罪，公共浴室在那里兴建起来并得到维持。由大清真寺开始，艺匠按照同心圆方式聚集起来：先是制作和出售香水和熏香的，而后是出售织物和小地毯的店铺、珠宝店和食品店，最后是最卑下的行业——制革匠、补鞋匠、铁匠、陶瓦匠、马鞍匠、染匠……他们的店铺位于城市的边缘。

在原则上，每一行当都有它的固定的地点，永远不会改变。同样，王公区（maghzen）原则上位于城市的郊区，远离骚动或平民暴动。在其附近，而且受到他们保护的，是犹太人区（mellah）。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居住区构成了一幅镶嵌画，这些居住区根据种族和宗教来划分：仅安条克就有45个区。“城镇是不同居住区的集合，它们都生活在残杀的恐惧之下。”因而，西方殖民者在什么地方都不开启种族隔离，尽管他们实际上在什么地方都不压制它。

尽管处于明显的无序混乱状态，但由于下述事实这种刚性被强化了：城市通常被圈在带有奢华城门的围墙之内，四周是大片大片的墓地，在那里建设城市非常困难。现在车辆交通问题迫使人们进行改变——时常超出了所有比例，没有任何限度。在展宽街道的狂热下，伊斯坦布尔近来变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建筑工地：房屋被一切为二，所开的房门不冲向任何空地，有了一条新的主要通道，其横向的支道“像冰河谷地那样”悬在那里；由于挖掘仓促，密密麻麻的管线悬在空中……

从广义上讲，伊斯兰城镇既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建筑规划意识，而西方城市一旦有了足够发展后就为此而斗争。不过，假如说这是事实，那么它们确实拥有真正城镇生活的各种要素：一个具有正统观念的资产者阶层，另加较为贫穷的大众、穷困的艺匠，还有扒手，他们或多或少都靠捡拾富人餐桌上的面包碎屑为生。它们享受到文雅讲究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方受到的限制都要少，这种乐趣在严守戒律的人看来是一种无法忍受的邪恶。它们还是教育的堡垒和支柱，有附属于清真寺的学校，它们的经学院（médersas）和它们的大学。最后，它们一直在吸引来自周围乡村的人前往，驯化、制伏他们，就像城市产生以来一贯做的那样。“世上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受到惩罚的了，因为他们是窃贼、浪费者和罪犯。”塞维利亚的一位市民这样写道。他这么讲，无

疑是想到了在城门甚或集市上与乡下人无休无止的争吵，这些人前来出售动物、肉类、皮革、腐臭的黄油、矮小的棕榈树、“绿草”或鹰嘴豆。他本不必如此忧虑的：十次有九次，城里人的警惕性或狡诈占了上风。劫掠者接着也遭到了劫掠，而且毫不留情，因为伊斯兰世界的城市居民，对城门以外处于非常原始状态的农民的控制甚至比西方还要严。因而大马士革控制着古达（Ghouta）附近的农民和杰贝勒德鲁兹（Djebel Druze）的山民；阿尔及尔控制着海盗以及法赫斯（Fahs）、米蒂贾（la Mitidja）和卡比利亚山区（massifs Kabyles）的农民；与此类似，格拉纳达（Grenade）穿着丝绸的资产者与来自附近山区的穿着破烂衣服的贫穷农民形成了对比。

然而，这又一次可以说是所有城市的典型特征，西方世界这样，伊斯兰世界亦然。就其本质而论，伊斯兰城市有别于西方城市的是它们发展较早，城镇的规模异乎寻常地大。

城市在伊斯兰世界占有重要地位是毫不令人奇怪的：它们是其文明的根本所在。城市、道路、船只、商队和参拜圣地是单一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它们都像路易·马西尼翁恰如其分所说的那样，是运动的各个因素，是穆斯林生活中的各个“实质方面”。

第六章 伊斯兰的伟大与衰落（公元8—18世纪）

伊斯兰辉煌的鼎盛时期是在公元8—12世纪。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与此相对，它是从何时开始走下坡路的？如果按照常见的说法，伊斯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衰落始于13世纪。但这是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即支配地位的终结与文明的结束混为一谈了。

到了13世纪，各种证据都清楚地表明伊斯兰失去了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但它真正意义上严重性的衰落可以说直到18世纪才开始；从文明生命之漫长这一角度考虑，18世纪仅仅是在不久之前。工业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使人类可以随着机器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向前发展的革命。伊斯兰世界与现在许多因错过了工业革命而被称为“欠发达的”国家具有相同的命运。

虽然这是一次明显的失败，但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失去它作为文明的

地位。一切的一切不过是欧洲获得了两个世纪飞速的物质进步，把伊斯兰世界抛在了后面。这是什么样的两个世纪啊！

8或9世纪之前没有一个伊斯兰文明

在引导阿拉伯人征服了一个帝国后，伊斯兰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一个政治实体。但伊斯兰文明产生于那一帝国与它毗邻区域古代文明的结合之中。这一结合花费了非常长的时间，用了几代人的工夫才完成。

·没有宗教皈依，而是有大量纳贡者：第一个征服周期，阿拉伯人的周期，创建了一个帝国和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文明。

在一开始，施加征服的阿拉伯人很少试图令其臣民皈依伊斯兰教，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满足于剥削他们征服的这些富裕的文明：波斯、叙利亚、埃及、非洲［即罗马人的非洲，阿拉伯人称之为伊费里基亚（Ifriqya），大致是指今天的突尼斯］和西班牙［即安达卢西亚（Andalousie，al-Andalous）］。任何试图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都遭到鞭笞。由于只有非穆斯林才缴纳税赋，那么征服者为什么如此减少其税赋收入呢？

“被占领国家的居民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没有遭到恶意的干涉……但被视同高级牲口；他们之所以得到照料，是因为他们缴纳了大部分税收。”［加斯东·维特（Gaston Wiet）语］

这就是穆罕默德之后前四位继承人统治时期（632—660年）的情景。这四个人被称为“得到很好指导的哈里发”［“哈里发”（calife）一词的意思是“继承人”“副手”或“代理统治者”，具体使用哪一个意思视译者的偏好而定］。之后是倭马亚王朝的诸位哈里发（660—750年），他们在大马士革建立了自己的首都。在这些战争不断的岁月，宗教问题没有被提到前台，即便有，也非常罕见。比如，与拜占庭的斗争与其说是宗教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

不仅如此，被占领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仍掌握在“当地人”手中，有关文件仍然用希腊文或帕拉维文（Pehlvi，萨珊时期的波斯语）书写。艺术本身依然受到希腊化风格的影响，甚至在建造清真寺时也是如此。清真寺的中央庭院、柱廊、拱廊和圆顶依照的是拜占庭风格。只有清真寺的尖塔是按穆安津召集人们进行祈祷的需要设计的，是名副其实的伊斯

兰风格，尽管它也与基督教的钟楼相像。

·阿拔斯王朝（Abbassides）时期出现的转折点：只是到了8世纪中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才出现了。当政权转到阿拔斯王朝手中、其黑旗取代了倭马亚王朝的白旗时，政治、社会、最终是知识的大规模的高涨才出现了。

此后伊斯兰世界转向东方，并从过去吸引了它非常大注意力的地中海略微向后退却。在新哈里发的统治下，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实际上由大马士革转移到了巴格达，这在那些因其影响消失而心怀仇恨的人（伊朗人）和其他臣民及被征服者中引起了非常大的不满。这是持续了至多一个世纪、有三四代才华出众的人的“纯种阿拉伯人”统治的结束，此时较高的武士等级在财富和奢华生活中沦落了。这种财富和奢华属于一个文明。来自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名叫伊本·赫勒敦 [26] 的阿拉伯贵族后来把这一文明称为“人格化的邪恶”（le mal personnifié）。

此后，当物质财富在各个方面都迅速增长的时候，非常自然而然，那些古老的文明国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优越性。公元820年前后，哈里发每年获得的贡赋可能是拜占庭帝国所获收入的五倍。在一个远远超出于其时代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下，大量财富聚敛起来。这一贸易体系扩展的范围非常广，延伸到了中国、印度、波斯湾、埃塞俄比亚、红海、伊费里基亚和安达卢西亚……

资本主义（capitalisme）并不是一个与时代不符的词语。自伊斯兰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投机商们肆无忌惮地进行贸易赌博。一位名叫哈里里（Hariri）的阿拉伯作家向一个商人宣称：“我想把波斯藏红花用船运到中国，我听说这种东西在那里可以卖上高价。随后我把中国陶瓷运到希腊，把希腊锦缎运到印度，把印度的铁运到阿勒颇，把阿勒颇的玻璃制品运到也门，把也门的条纹织品运到波斯……”在巴士拉，商人之间的结算是按照我们一种现在可称为清算（clearing）的方式进行的。

没有贸易就不可能有城市。大量城市作为贸易中心建立起来。这些城市中不仅包括巴格达，该城自公元762年起到1258年被蒙古人残忍地毁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真正的“光明之城”（villelumière），是旧世界最大和最富有的都城，而且包括幼发拉底河畔离此不远的大型城市撒马拉（Samarra），以及大型港口巴士拉、开罗、大马士革、突尼斯（它是迦太基的新化身）和科尔多瓦（Cordoue）……

自《古兰经》和传统诗歌使用的语词开始，所有这些城市都缔造或重新缔造了所谓“经典的”阿拉伯语。这是一种有学问的、人工的、文学的语言，后来成为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惯用语言，恰如拉丁语相对于基督教国家的作用。与此相对，不同国家讲的阿拉伯语，甚至阿拉伯半岛本身讲的阿拉伯语也是这样，听起来越来越像是各种方言。经典的阿拉伯语不仅是一种语言，而且是一种文学，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狂热的普遍信仰和一种文明，它加工形成于巴格达，由那里向四周广大地区传播。

这样造成的结果，甚至在阿拔斯王朝之前，就是在征募公共官员时面临严重危机。公元700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马立克（Abd-el-Malik）传唤时任其顾问、后来出家为僧的若阿内斯·达马士努斯（Jean Damasène，655—749年），告诉他自己决定自此以后禁止在任何公共行政管理文件中使用希腊文。阿拉伯历史学家拜拉祖里[27]写道：“这令萨尔贡（Sargoun，即Sergius，塞尔杰乌斯，若阿内斯·达马士努斯的另一个名字）大为不满，在辞别哈里发时非常伤心。他会见了一些希腊官员，告诉他们说：‘你们最好去找别的谋生职业，你们现在的差事被神收回了。’”

这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赖以相互宽容地生活在一起的临时解决办法（modusvivendi）的终结，这种办法曾实施了很长时间。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开始。

实际上，阿拉伯世界语言的统一为知识交流、商业活动和行政管理创建了一个重要工具。前文提到的犹太商人的信函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尽管使用的是希伯来字母。文化从这一语言资源上获得了巨大好处。赫赫有名的哈伦·赖世德[28]之子马蒙[29]（813—833年在位）把大量异域的尤其是希腊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不久之后，伊斯兰世界开始使用比羊皮纸廉价得多的纸，这些异域知识更为迅速地传播开来。在科尔多瓦·哈里发哈康二世（El-HakamⅡ）据说拥有一家收藏40万份手稿、带有44卷目录的图书馆。即便说这些数字被夸大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国王查理五世[30]（“智者查理”“好人约翰”之子）的图书馆仅仅藏书900册。

在这具有关键意义的几百年，伊斯兰世界内部发生了改变。穆罕默德创立的宗教因拜占庭风格的注解而复杂化，同时又添加了被现代许多专家视为新柏拉图主义复兴的一种神秘主义形式。就连什叶派分立这一驱动力看来也部分地来自早期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范围以外的深层。什叶

派教徒尊崇被倭马亚人杀害的虔信的哈里发阿里[31]，并反对逊尼派教徒，后者代表了伊斯兰教的主流，多数穆斯林都属于这一派。他们朝圣的一个场所是伊拉克境内的卡尔巴拉[32]，那里至今仍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信徒前往。“阿里就像第二个基督，他的母亲法蒂玛就像第二个圣母玛利亚。阿里及其子之死就像耶稣受难那样为人详细描述。”（E.F.戈蒂埃语）

因而，即便在其宗教的核心，伊斯兰教也通过借鉴东方文明和地中海文明而获得重生，此时在一个共同语言的帮助下，为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和世俗的任务而返老还童，重整旗鼓。阿拉伯半岛仅仅成为一个插曲。确实，从一派的观点来说，伊斯兰文明只是在众多阿拉伯人以外的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后，在伊斯兰教学校传遍自大西洋到帕米尔高原的整个教徒社区或乌玛（Ummâ）后才开始的。老酒又一次被注入了新瓶。

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8—12世纪

在四五百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文明是古代世界最灿烂辉煌的文明。从广义上说，那一黄金时代始于巴格达科学院（它同时也是一个图书馆、一个翻译中心和一个天文观测站）的创建者、哈伦·赖世德之子马蒙统治时期，止于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位伟大哲学家阿维罗伊[33]去世之时，后者于1198年在刚过72岁时在马拉喀什（Marrakech）告别人世。但艺术和思想的历史并非伊斯兰盛期的唯一锁钥。

·首先，总体历史的内涵被证明是有决定意义的。

莱昂·戈蒂埃这位专攻伊斯兰哲学的历史学家指出，伊斯兰思想最为繁荣的那些时期是“普遍和平和普遍繁荣时期，当时大量的财富使开明和无所不能的哈里发有能力提供庇护。这些哈里发，在东方，8和9世纪时有阿拔斯王朝诸哈里发，自曼苏尔[34]到穆尔瓦基勒（El-Mutawakkil，847—861年在位），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鼓励在伊斯兰世界传播希腊科学和哲学，后者因聂斯脱利派基督徒所做的大量翻译工作而成为可能。……在西方，12世纪时有穆瓦希德[35]王朝各哈里发，他们习惯于与其宠爱的医生或哲学家单独进行旷日持久的思辨性谈话。与此相反，思想学术活跃的时期还有帝国衰微之时，此时大胆的思想家从互相竞争的各位小王公中挑选乐善好施的恩主，比如赛义夫·道拉（Sayf al-Dawla），他在9世纪上半期任阿勒颇的埃米尔，是哲学家法拉比[36]的保护人……”

莱昂·戈蒂埃显然是从政治史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文明仰赖于王公和“开明的专制君主”。不过，在经历一系列不幸事件后，巴格达王朝的迅速衰落，导致出现史无前例的政治分裂局面，但这绝不意味着哲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相反，它使一定程度的知识自由成为可能，最不济也使一个学者可以从一邦或一个王公跑到附近的另一邦或另一王公那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17、18世纪欧洲正常的情况就是这样。伊斯兰世界也常常从这种机会中获得好处。

但知识的进步光靠自身永远是不够的。重要的物质进步既支撑着知识进步，又为它们提供了解释。

到了大约公元750年，伊斯兰世界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范围。进一步的扩张因来自外部世界的反作用力而受到阻碍。君士坦丁堡在718年遭到围攻，但为无畏的利奥三世[37]和希腊火硝所解救。查理·马特732年或733年在图尔或普瓦蒂埃（Poitiers）战役中的胜利及同一时期马格里布的起义解救了高卢和西方。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伊斯兰国家边境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安定局面（相对的，但是真实的），而在它的境内，在帝国各地，一种庞大的经济制度生根、成长并结出了果实。

这一成长与一种市场经济、一种货币经济和农业产品逐步地“商品化”有关。这些农产品并不是完全就地消耗，而是把剩余的部分拿到城镇出售，进一步促进了城镇的普遍繁荣。椰枣贸易每年需要动用10万峰以上的驮驼。城镇里的集市会所有了像“西瓜市”那样的名称。特兰索斯夏纳（Transoxiane）的梅尔夫（Merv）所产的西瓜尤其珍贵。它们被以瓜干的形式用船长途大量向西贩运；至于新鲜西瓜，则是采取把西瓜放在装满冰块的皮袋之中，用特别快递的方式送到巴格达。同样，甘蔗种植也成为一项产业。

谈到食物时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即面粉碾磨的发展。比如，在巴格达附近有水磨，到947年在桑斯坦（Seistan）有风磨，而在巴士拉，底格里斯河的水流被用来驱动浮动磨坊的轮子。

这一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说明了众多工业部门——冶铁、木材和纺织（亚麻、丝、棉花和羊毛）——的发展和棉田在东方大量增加的原因。布卡拉（Boukhara）、亚美尼亚和波斯的地毯早已名扬天下。巴士拉进口了数额巨大的胭脂和靛蓝来把纺织品染成红色和蓝色。经喀布尔而来的印度靛青被认为优于上埃及出产的靛青。

所有这些活动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反响。货币经济动摇了一个主要由地主和农民构成的社会的基础。富人变得更富了，而且傲慢无礼；穷人则变得更穷了。灌溉技术的发展加大了对农业奴隶的需求，而伊斯兰世界的财富使它可以出得起比任何竞争对手都要高五六倍的价格。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社会的紧张局势产生了。

如果说这种繁荣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它说明了大量问题。尤其是，它帮助培育了一种革命气氛和一系列不间断的城市与农村骚动，它们往往与民族主义运动纠缠在一起，伊朗爆发的那些事端就是例证。那一时期的文学也展现出非常现代的表现形式和概念：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我们不妨引述一份公元1000年前后由伊夫里基（al-Ifriki）撰写的小册子，其中写道："不，只要我处于贫困状态，我肯定不会向神祈祷。把祈祷留给军队统帅大人（Cheik）去做吧，他的地下室满是东西，盛都盛不下。我为什么要祈祷呢？我有权有势吗？我有一座宫殿、良马、美裘或黄金做的腰带吗？在我无立锥之地的时候，去做祈祷可谓虚伪透顶。"

由于所有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那么在这乱哄哄的几百年中，数量激增的伊斯兰教异端就像中世纪欧洲的异端一样，都有着社会和政治根源，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团体问世、发展，并在鼓励或迫害之下采取不同的形式。穆斯林思想的历史与这种易变秘密小集团的思想密切相关。

·一位名叫梅茨（A.Mez）的历史学家用了含混不清的"文艺复兴"一词来描述伊斯兰的黄金时代。

这表明它的辉煌卓越只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才堪媲美。不管怎么说，这一对比的好处在于强调下述事实，即知识财富和物质财富都与伊斯兰文明相关涉，如同15世纪意大利的情况一样。

两者事实上都建立在从贸易和财富中获利的城市社会的基础之上。两者都是由异乎寻常之人组成的小型才俊圈子的产物，这些人深深依赖他们尊崇和加以复活的古代文明，比其同侪要超前数百年。然而，两者都处在多多少少略加掩盖的野蛮民族的压力之下。

对15世纪末的意大利来说，野蛮民族是指瑞士各州的山居民族、布雷纳（Brenner）山口以北的德意志人、法国人和脚穿软鞋的西班牙人或土耳其人［他们在1480年占领了奥特朗托（Otrante）］。对阿维森纳[38] 或阿维罗伊时代的伊斯兰世界来说，野蛮民族是指塞尔柱突厥人、柏

柏尔人、撒哈拉沙漠的游牧民族或西方十字军战士。野蛮民族常常为人追寻或受到邀请——就像后来在意大利出现的情况那样。如上文看到的那样，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刚刚建立就需要突厥奴隶和雇佣军。这些奴隶是由其亲生父母提供给买主的，“以使其未来有个保障”。在西班牙，在非常长的时间里，用上几块金币就可以收买来自北方、信奉基督教的入侵者，让他们打道回府。而后，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战斗变得激烈了。塞维利亚国王穆塔米德（al-Mutamid）现在不得不保护自己免受信奉基督教的蛮族的侵害，办法是寻求另一蛮族部落，北非的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es）的帮助。

·看上去可能自相矛盾的是，在我们前文已经叙述的年代（813—1198年），就总体而论，伊斯兰文明既是一个文明又是许多文明，既具世界性，又在地域上四分五裂。

统一性（une）：伊斯兰教所到之处无不兴建清真寺和经学院，这些建筑的装饰风格都是统一的、精雕细琢的“抽象”风格。所有清真寺的样式都是一样的：一个中央庭院，拱廊，一个净手盆，一个向祈祷者指示方向的米哈拉布[39]或壁龛，一个带有柱子的中殿的敏拜尔[40]或布道坛或一座光塔。所有清真寺都使用同样的建筑功能：带柱顶的支柱，不同样式的拱门（八字面、摩尔人风格、三叶形、多叶形、尖顶式、带钟乳石形），带拱肋的穹顶，马赛克，瓷器，最后是涡旋形状的令感情产生共鸣的阿拉伯书法艺术。

统一性：伊斯兰教所到之处都产生关于同样的原则、带有同样受人喜爱句子的诗歌。它赞美神（“无刺的玫瑰，那就是神”）、自然、爱情、勇敢、高贵血统、马匹、骆驼（“像山一样高大……它踏出的路径构成了环绕地球的紧身褡”）、知识、被禁止的饮酒之乐以及各式各样的花儿。整个伊斯兰世界也都颂唱着同样的民间传说，它们最初产于印度，在经过口头长期的酝酿后在14世纪集成文字，此即今天人人皆知的《天方夜谭》。

统一性：在各个地方，伊斯兰哲学（falsafa）都替代了亚里士多德和逍遥派（péripatéticiens）的学说：它做出了巨大努力把神置于一个宇宙之中。阿拉伯哲学循着希腊人的说法，视宇宙为永恒存在的东西，从而把任何创世观念排除在外了。

统一性：正如在科尔多瓦附近撒哈拉城（Madînat al Sahra）进行的考古发掘所显示的那样，伊斯兰世界到处都有同样的技术、工业、制造

品和家具。另外，在各个地方都流行着模仿巴格达品位的同样的时尚。西班牙是来自东方的这种文化输入的终点站，这些输入迟缓的影响至今在全国各地仍可追溯得到：借用东方著名诗人之名举办假面舞会这种愈演愈烈的时髦活动，阿尔摩拉维德人到来后连风帽长斗篷普遍为人采用，某些文学主题或某些医方广为流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自波斯到安达卢西亚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以四海为家的艺人在进行表演。他们大都来自埃及，但也有一些年轻女舞蹈演员和歌手是在麦地那或巴格达培训而成的，她们在东方身着黄色服装，在西方则着红装，所有的诗人都提到她们。最后，所有地方的穆斯林都爱下棋及非常盛行的库拉格（kurâg）游戏，后者用的是骑在披挂铠甲的马上的人形木雕像。这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游戏："穆塔米德的军事统帅伊本·马丁正在玩库拉格，突然发现在他位于科尔多瓦的住所有一队敌军。"

还有两个例子表现出穆斯林紧密的凝聚力：一个是有关一位维齐尔的，他在10世纪初做波斯呼罗珊省（Khorassan）的摄政。他"派使者到各国寻访有关各个宫廷及各个政府部门习俗的抄本，无论它们在希腊帝国、突厥斯坦、中国、伊拉克、叙利亚，还是埃及、赞詹地区（pays des Zenj）、扎波勒地区（pays de Zaboul）、喀布尔……他仔细地研究了它们，选择那些他认为最好的"在他宫廷实施并用于布哈拉的行政管理上。另一个更严格的局限于伊斯兰世界范围之内的例子是哈康二世。此人是科尔多瓦的哈里发，他购买在波斯、叙利亚及其他任何地方问世的书籍，并"派人给阿布尔法拉吉·伊斯法哈尼（Abulfaradj al-Isfahani）送去上千纯金第纳尔，以获得他著名诗集的第一本"（勒南语）。

·不过，这一文化统一并没有摧毁鲜明而富于生气的地方特色。

10世纪伊斯兰帝国分崩离析之时，每一个地区都获得了某种独立，有了重新呼吸并重申其自身独特气息的自由；尽管这种独特气息借自作为整体的伊斯兰世界并对伊斯兰世界做出了贡献，但各个地区总是小心翼翼地加以保留。一个新的地理模式开始出现了。

穆斯林的西班牙对来自外部的一系列影响做出了回应并加以调适，由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的西班牙特征——这是它在历史进程中的众多化身之一。

伊朗更为顽强、更为有力地维持着它的个性。在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下，它恢复了活力和自己的风格。巴格达是一个伊朗化的城市。在阿

拔斯王朝时期，珐琅质陶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其故土就是波斯，那里还是其另一个珍宝即带金属釉料的陶器的发源地。波斯的巨型门廊（iwâns）让人想起科斯洛埃斯[41]的王宫。这里阿拉伯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波斯文——用阿拉伯文书写——成了第二重要的文学语言，并传播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尤其是传到了印度（非常晚的时期之后传遍了奥斯曼帝国）。它具有半人民大众语言的特点，其好处是可以为大众所接受；它还因希腊语几乎完全黯然失色而取得突出地位。10世纪末叶，诗人菲尔道西（Firdawsi）撰写《列王书》（*Le Livre des Rois*），称颂古代伊朗人。自11世纪起，波斯文在有关大众科学的著作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

无疑，波斯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的民族文明——但自此时起这一文明处在了广袤的伊斯兰文明的范围之内。就这一方面而言，1961年在巴黎举办的大型伊朗艺术展览引人注目。它展现出伊朗艺术在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时期尽管存在非常大的区别，但两者之间仍存在着连续性。

全球化与地区化之间的这种对立在伊斯兰世界各地都存在着。极端的例子是穆斯林印度、穆斯林印度尼西亚和黑非洲，它们都深深地为伊斯兰教所渗透，但居压倒一切地位的仍然是其自身。

在印度，两种文明的相互作用引发了名副其实的印度—伊斯兰艺术，其鼎盛时期是在12世纪，尤其是13世纪。特别是在德里，惊人的例证至今依然存在。它们的古怪奇异可由其折中主义来做解释。比如，该城市中可以追溯到1193年的大清真寺，设计者是穆斯林，建造者是印度瓦匠和雕刻匠，他们把印度风格的涡旋形花纹与阿拉伯的书法装饰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一种全新的艺术产生了，有时以穆斯林艺术为主导，有时主要是印度风格，随时间和地点而有所变化。最后，到了18世纪，每一种风格都对另一种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无法把两者准确地区分出来。

在更高的层次上，伊斯兰文明在其黄金时代既在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又异乎寻常地复苏了古代哲学。这些并不是它所取得的成功的全部，文学是另一个；但它们令其他所有的成功相形见绌。

科学与哲学

·首先谈谈科学。正是在这一领域“萨拉森人”（Sarrasins，那时人们

时常这样称呼他们）做出了最具独创意义的贡献。

简单地说，这些贡献是指三角学和代数学（及其非常重要的阿拉伯文名称）。在三角学方面，穆斯林发明了正弦和切线。希腊人只是从角所对应的弧弦方面测量了角：正弦等于半个弧弦……科斯拉宁［Chosranien，穆罕默德·伊本·穆萨（Muhammad Ibn Musa）的笔名］在820年发表了一篇代数学论文，甚至谈到了二次方程。这一论文在16世纪被译成拉丁文，成为西方的代数学入门著作。后来，穆斯林数学家解决了双二次方程问题……

同样出类拔萃的是伊斯兰的数学地理学家，他们进行的天文观测、发明的天文仪器（尤其是星盘）及其如果说仍然不够完美的但已非常精确的对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测量，匡正了托勒密[42]广为流传的种种错误。穆斯林还在光学、化学（用蒸馏法酿酒，制造炼金药和硫酸）和药剂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西方使用的半数以上的药物和治疗辅助药物都来自伊斯兰世界，包括山扁豆、大黄、罗望子、马钱子、胭脂、樟脑药糖浆、糖浆药水、膏药、润发脂、油膏和蒸馏水等。穆斯林的医学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埃及人伊本-纳菲斯（Ibnal-Nafis）——尽管他的发现一直未为人使用——在米歇尔·塞维图斯[43]之前300年发现了肺动脉的血液循环，比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早的时间就更多了……

·在哲学领域，阿拉伯哲学家的贡献是再发现，主要是回到逍遥派哲学的主题上来。

然而，这一再发现的范围并不限于照抄和传承，尽管这无疑也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它也涉及延续、阐释和创新。

被译介到伊斯兰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有关世界和人类的观点必定看上去非常危险，因为它与天启宗教伊斯兰教的说法相左。后者也对世界做了普遍解释，而且这一解释是极其严格、不得妄说的。但亚里士多德迷住并征服了所有的falasifat（意即falsafa，也就是希腊哲学的信徒）。在这里，A.梅茨用“文艺复兴”一词描述伊斯兰黄金时代的比喻不无道理。确实存在着一种具有很高价值、多种多样的穆斯林人文主义，不过在此处我们只能略述一二。

它涉及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一长列思想家。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五个名字：金迪[44]、法拉比、阿维森纳、伽扎里（al-Gazali）以及阿维罗伊。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名气最大，但后者因在中世纪欧洲产生了被称

为阿维罗伊主义（averroïsme）的巨大回响而更为重要。

金迪（我们只知道他去世于873年）生于美索不达米亚，他的父亲曾任库法（Kûffah）的总督。由于他的出生地，人们称他为“阿拉伯人的哲学家”。法拉比出生于870年，为土耳其血统。他居住在阿勒颇，950年在大马士革去世。他被称为第二先师——第一先师是亚里士多德。阿维森纳（确切地说是伊本·西拿）980年出生在布卡拉附近的阿夫什纳（Afshena），1037年于哈马丹（Hamadan）去世。伽扎里出生于波斯的图斯（Tous），1111年在那里去世；在他生命的末年他成为一位反对哲学的人，成为传统宗教狂热的代言人。阿维罗伊真名叫伊本·拉什德，他于1126年出生在科尔多瓦，1198年11月在马拉喀什去世。

地理和年代上的这些细节表明，穆斯林人文主义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是广泛存在的和持续时间长久的。考虑到他们这些巨擘的每一位身边都有同事、学生和虔诚的读者，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这些细节还表明，最后一位重要的伊斯兰哲学家主要活动于西班牙——他是最后一位，但并不是最伟大的一位，尽管正是他使西方认识了阿拉伯哲学和亚里士多德本人。

从这一长期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在于路易·加尔代（Louis Gardet）所非常有力地指出（而且，附带地说，他对此做出了否定性回答）的那一问题：是不是存在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哲学呢？这意味着：（1）自金迪到阿维罗伊，是不是存在一个单一的、持续的哲学传统？（2）这样一种哲学是伊斯兰教气氛的一个产物吗？（3）它是原创性的吗？如同经常会出现的情况那样，在这里对这位小心翼翼的法国人提出的问题做出“是与否”的回答，就不仅仅是审慎，更是必不可少的。

是的，这种哲学是一致的。一方面是希腊思想，另一方面是《古兰经》之天启真理，它受困于其中，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它受惠于希腊，也受惠于伊斯兰国家的科学特长，受惠于其清晰但非排他性的理性主义。我们论及的所有哲学家都应被称为科学家，他们关心天文学、化学、数学以及——一直关心医学。正是医学使得他们常常得到王公的青睐，使得他们可以生存下去。阿维森纳撰写了一部医学的《正典》，或一部医学百科全书。阿维罗伊同样如此。在欧洲，穆斯林医学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代表着医学的最高水平，甚至晚至莫里哀时期一直如此，反映在其喜剧中（《莫里哀的医生》）。

希腊的影响赋予伊斯兰哲学一种内在的整合力。“本书的作者是亚里士多德，”阿维罗伊在《物理学》序言中这么写道，“他是尼克马库斯之子，是希腊人中最聪明的一位。他创建并完成了逻辑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我说他创建了它们，是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一部有关这些主题的著作值得人们探讨……在他之后，直到现在，大约1500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他的著作添加任何东西，或从中发现任何重大错误。”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崇拜者，阿拉伯哲学家不得不在预言性的启示和人类的哲学解释之间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前者指《古兰经》，后者指希腊思想。启示与解释之间令人痛苦的争论需要理性和信仰双方都做出让步。

通过穆罕默德揭示出来的信仰传授给人类一种神圣的音讯。孤立无助的思想家能够发现世界的真理，并把他个人判断的理由置于宗教教条的价值之上吗？面对这一两难处境，我们所论及的所有哲学家都展现出高超的、可能有些过分的辩证技巧。马克西米·罗迪逊（Maxime Rodinson）说，阿维森纳“并不是一个一无所用的天才：他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的解决办法，这并不是他独享的，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先知“以寓言、象征符号、讽喻、映像或隐喻的形式”展现了更高的真理。他们在阐述真理时使用的是面向大众的语言，旨在使他们幸福。与此相反，哲学家有权远远超出这种语言。他坚持要求具有非常大的选择自由，即便在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有着明确无疑的、十足的矛盾时依然如此。

比如，哲学家通常像希腊人那样相信世界是永恒的。但如果世界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如何能够像启示坚持的那样是在某一时刻被创造出来的呢？法拉比把其逻辑推到了极致，宣称神不能知道特定的物品或事物，而仅仅知道概念或“普遍之物”（universaux）——可是《古兰经》中的安拉神，就像《旧约》中的上帝一样，“知道陆地上或海洋上的一切。一片叶子落下，也会为他知晓。埋在大地深处的种子，长出嫩芽或细枝干枯，无不被记录或书写下来”。此外还有其他相左之处。法拉比不相信灵魂是永恒的。与他相反，阿维森纳相信灵魂永恒，但他不相信人体会复活，而这是《古兰经》所坚称的。他认为，在他死后，灵魂回归其自身所属的宇宙之中，即游魂的宇宙。因而，从逻辑上讲，不会有对个人的奖励，也不会有惩罚；不会有天堂，也不会有地狱……神、脱离肉体的存在和灵魂是理想的世界，面对它物质是不会腐坏和永恒的。说它永恒，是因为“运动不会先于静止而存在，静止也不会先于运动而存在……所有运动都是由先前的运动造成的……神没有理由成为新的运动”。

我们从勒南 [45] 那里借来的这些引语可能会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但无法令人满足。在沿用这种逻辑上没有把握的、一直引起争论的解释体系时，需要特别密切地加以关注，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

自勒南以来，那些对这些昔日的两难问题感兴趣的哲学家发现，要解决它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所做的阐释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心理习性上：理性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换一种说法，建立在他们个人对这位哲学家还是另一位哲学家的偏爱基础上：金迪在宗教的海洋上航行，没有激起任何风暴；无可否认，阿维森纳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阿维罗伊则是世界末日的一位哲学家。伽扎里是信仰和传统的捍卫者，他把早期穆斯林神学家顽固的教条化为他自己的教条；他试图忽略甚至消灭逍遥学派哲学，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把他引向迥然不同的道路，即神秘主义的道路。因而他舍弃了现世，穿上了苏菲派（Sûfi）编织的白色羊毛罩衣（苏夫，sûf）。后者是神秘信仰而不是理性神学的信徒。他们通常被称为“神的小丑”。

科尔多瓦医生阿维罗伊成了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忠实编纂者和评注者。他工作的优点在于，既给出了希腊文本的完整的（in extenso）阿拉伯文译文，又添加了相关的论述，其中包括评论和枝节内容。文本和评注在托莱多被由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借此传到了欧洲，从而点燃了13世纪的一场重大的哲学革命。因此，尽管人们时常说伊斯兰哲学在伽扎里强有力的、致命的打击下迅速消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不过，到了最后，在12世纪结束之前，伊斯兰哲学真的死去了，一同死去的还有伊斯兰科学。这时接过火炬的是西方。

停滞或衰微：12—18世纪

·到了12世纪，在取得了极为不凡的胜利之后，“萨拉森人的”文明突然受到了遏制。该世纪最后几十年过后，就连在西班牙，科学、哲学和物质的进步也基本上没有持续下去。

这一突如其来的停滞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1）这是否如同人们过去惯常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伽扎里对哲学和自由思想发起的狂热（且非常有效的）进攻造成的？没有一个学者会对这一说法太过在意。伽扎里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与其说是因由，不如说是一种后果。此外，“哲学”自其问世以来就一直遇到诋毁、贬低它的人，历史上曾无数次地出现图书被勒令焚毁的情景—除非出现了激烈

的公众敌对情绪，不然这种情况就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许多哲学家遭到了公开谴责诟骂，并被判处流放—至少直到形势变化之前是这样。此外还出现过这种情况，即《古兰经》的律法（fiq）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迫使哲学陷于沉寂状态。值得补充的还有，在伽扎里之后falsafa（哲学）再度繁荣起来，这种繁荣并不仅仅是随着阿维罗伊而出现的。

（2）那么，这是不是由“蛮族部落”造成的呢？近来有一位名叫戈泰因（S.D.Gothein）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见解。蛮族是使伊斯兰世界免除来自亚洲和西方威胁的军事救星。他们是不是同时从内部逐渐侵蚀了它的基础？

在西班牙，这些危险的救星首先是来自苏丹和撒哈拉地区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或柏柏尔人，随后是来自北非的阿尔莫哈德人（Almohades）。在近东，伊斯兰国家的救星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是来自中亚“寒冷大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或者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奴隶。

按照戈泰因的观点，“当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大权都被蛮族战士接管”及“地中海的统一被打破”之后，衰落开始出现了。地中海的统一曾经缔造了伊斯兰世界，但它对“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分享地中海传统的蛮族”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人们可以提出反驳说，这些蛮族，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与最初开展征服活动的阿拉伯人的大多数相比，野蛮程度并无超过之处。同样，与阿拉伯人一样，他们通过与伊斯兰世界古国的交往多多少少迅速文明化了。阿尔莫哈德人的哈里发向阿维罗伊提供了保护。在有关十字军东征的传统的纪事中，库尔德人的伟大素丹、狮心王理查的对手萨拉丁 [46] 是一位非常高贵的君王，至少在信奉基督教的蛮族眼中如此。最后，多亏了埃及，伊斯兰世界才在1260年9月3日在叙利亚的艾因雅鲁特（Aïn Djalout）击败了蒙古人，1291年夺取了基督教在圣地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Acre），恢复其自主地位。

（3）反过来，可不可以说是因丧失地中海而造成的呢？在11世纪临近结束时，欧洲开始收复这一内陆海，伊斯兰世界开始失去它在地中海的利益。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认为，8和9世纪穆斯林对地中海的征服致使西方失去了在那里自由行动的权利，迫使它向后退却。现在皮雷纳的理论被反过来使用。地中海开始向伊斯兰世界关闭，后者发现自己

永远处于不利地位，无法扩张，对其日常生活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看上去非常奇怪的是，1930年首先强调萨拉森人文明这种突然衰退的E.F.戈蒂埃，竟然没有把亨利·皮雷纳的学说运用到这里来。要知道，皮雷纳的学说在当时为人们广泛讨论。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皮雷纳的学说可能是有关伊斯兰国家突然衰落之因的最佳解释。

·伊斯兰文明承受住了这种起伏。它可能无法与其昔日的成就相媲美，但它继续存在了下去。

当保罗·瓦莱里宣称“文明，我们知道你正走向死亡”（1922年）时，他肯定是夸大其词。历史季节的变换导致花儿和果实飘落在地，但树依然存在，并没有死亡。最起码说，要把它杀死是非常困难的。

12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无疑经历了某些非常黑暗的岁月。在西方，它罹受了十字军东征的长期折磨（l095—1270年）；1291年，它夺回了阿卡，取得了部分胜利。但是，尽管它收复了失地，它却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权。在亚洲，伊斯兰国家因1202—1405年蒙古人长时期的野蛮而凶残的入侵而在一定程度上陷于衰亡：突厥斯坦、伊朗和小亚细亚从未能完全从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中恢复元气。1258年巴格达陷落是这一系列不幸的征兆。伊斯兰国家治愈了自己的伤口，但只是部分地痊愈。

与此同时，在这黑暗的几个世纪，即13、14和15世纪，伊斯兰国家的困苦艰难因世界性的经济逆境而进一步恶化。自中国到印度和欧洲，总的而言，整个旧世界都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危机。所有事物和所有人都在受苦，而且持续数百年之久。

在欧洲，危机出现的时间似乎稍晚（自1350年或1357年起），持续的期限较短（结束于1450—1510年），但危机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的百年战争（1337—1453年）是最为明显的迹象，同时出现的是其他一长串外国的、民政的和社会的冲突，以及荒芜和贫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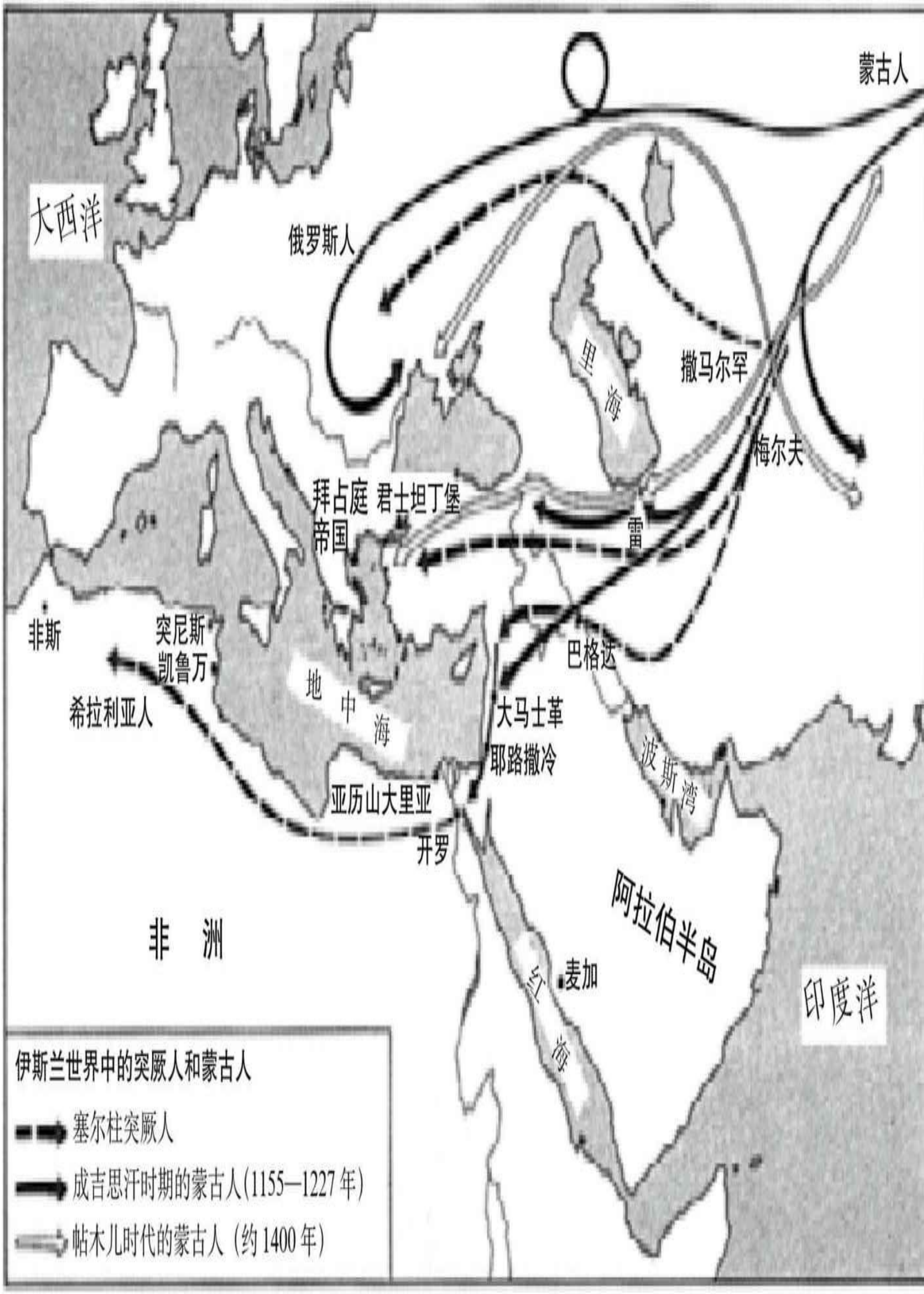

蒙古人
大西洋
俄罗斯人
里海
撒马尔罕
梅尔夫
拜占庭帝国
君士坦丁堡
雷
非斯
突尼斯
凯鲁万
巴格达
希拉利亚人
地中海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
波斯湾
亚历山大里亚
开罗
阿拉伯半岛
非洲
麦加
红海
印度洋
伊斯兰世界中的突厥人和蒙古人
塞尔柱突厥人
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1155—1227年)
帖木儿时代的蒙古人（约1400年）

图4 蒙古人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衰落

成吉思汗（1162—1227年，意为“海洋”或“强大”）以武力统一了蒙古各部落。随后，他征服了华北。此后，他挥戈西向，经由“乌拉尔—里海通道”抵达高加索地区。在他之后，蒙古人降临欧洲和亚洲：1241年，他们抵达波兰和匈牙利；1258年，他们占领了巴格达。

帖木儿（1336—1406）重新开始征服活动：1398年，他们占领了德里；1401年，他毁掉了巴格达。

因而，在强调伊斯兰的不幸时，必须注意区分什么是世界现象，什么是穆斯林独有的。

不管怎样，正是在这么一种普遍阴郁和悲观的气氛中，最后一位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撰写了其权威性著作。伊本·赫勒敦是一位安达卢西亚籍的历史学家（而且，放到现在我们还应当说，他也是一位“社会学家”），1332年出生于突尼斯。作为一名外交官和政界人士，他在格拉纳达、特莱姆森（Tlemcen）、贝贾亚、非斯（Fez）和叙利亚过着一种忙碌而多事的生活。1406年，他比曾到那里充当大使的帖木儿[47]晚了一年，以法官（卡迪，cadi）的身份在埃及去世。

伊本·赫勒敦的主要作品是汇编而成的《范例之书》（*Kitab El-Ibar*）。该书卷帙浩繁，以一种原创的方式叙述了柏柏尔人的历史。仅其“导论”本身就是一部经典，是关于穆斯林历史之方法论和社会学的第一部系统的论文；19世纪，它被译成法文出版，题为*Prolégomènes*（绪论）[48]。

·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较美好时光的到来，广义地说是在16世纪，伊斯兰世界再一次从它享有的位于东西方之间的地位中获利。土耳其的辉煌一直延续到所谓的“郁金香时期”（é poque des tulipes），即18世纪。

从政治上来说，这一复苏是以奥斯曼土耳其人迅速而辉煌的扩张为标志的。这一征服扩张早在他们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前就已开始了。但那一驰名的胜利带来了其他成功。到了16世纪，他们已经把土耳其改造成为地中海的强国之一。

拜占庭（包括阿拉伯圣地）的新主子不久就或多或少地重建了整个

伊斯兰世界。1517年之后，奥斯曼素丹即大土耳其成为所有信奉伊斯兰教者的哈里发。仅有不受土耳其控制的地区包括遥远的突厥斯坦、阿尔及尔“摄政”控制之外的摩洛哥和什叶派的波斯，后者随着塞法维王朝（Séfévides）的崛起而变得更加民族化。蒙古人和土耳其穆斯林雇佣军在帖木儿相隔久远的后代巴布尔 [49] 的率领下夺取了德里帝国，建立了一个莫卧儿帝国，并把印度大部分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

就在同一年，1526年，土耳其人在莫哈奇战役（bataille de Mohacs）中击败了信奉基督教的匈牙利。显然，在土耳其人和逊尼派的影响下，伊斯兰正在享受一次普遍的复兴，在各个地方都为伊斯兰正统和传统宗教带来全面的胜利。权力重申了自己的力量：独立思想受到了抑制，一种铁的统治被强加在人们头上。

在巴尔干半岛和近东，土耳其的统治与显而易见的物质繁荣、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繁荣城市的建立同时发生。1453年，君士坦丁堡可能只有不足8万居民。到了16世纪，当它变成伊斯坦布尔时，城区本身加上黄金角（Corne d’Or）以外的希腊人区佩拉（Péra）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斯库塔里［Scutari，即Üsküdar（于斯屈达尔）］，居民达到了70万人。这一都城像所有大都市一样，集无尽的奢华和令人瞠目结舌的贫穷于一身，向人提供了一个帝国文明极为令人称羡的样板。它在奥斯曼人统治下向广大的地区传播其影响，向外输送其庞大无比的清真寺的平面布局，其中包括蔚为壮观的、专为苏莱曼大帝 [50] 而建的苏莱曼大清真寺（la Suleymany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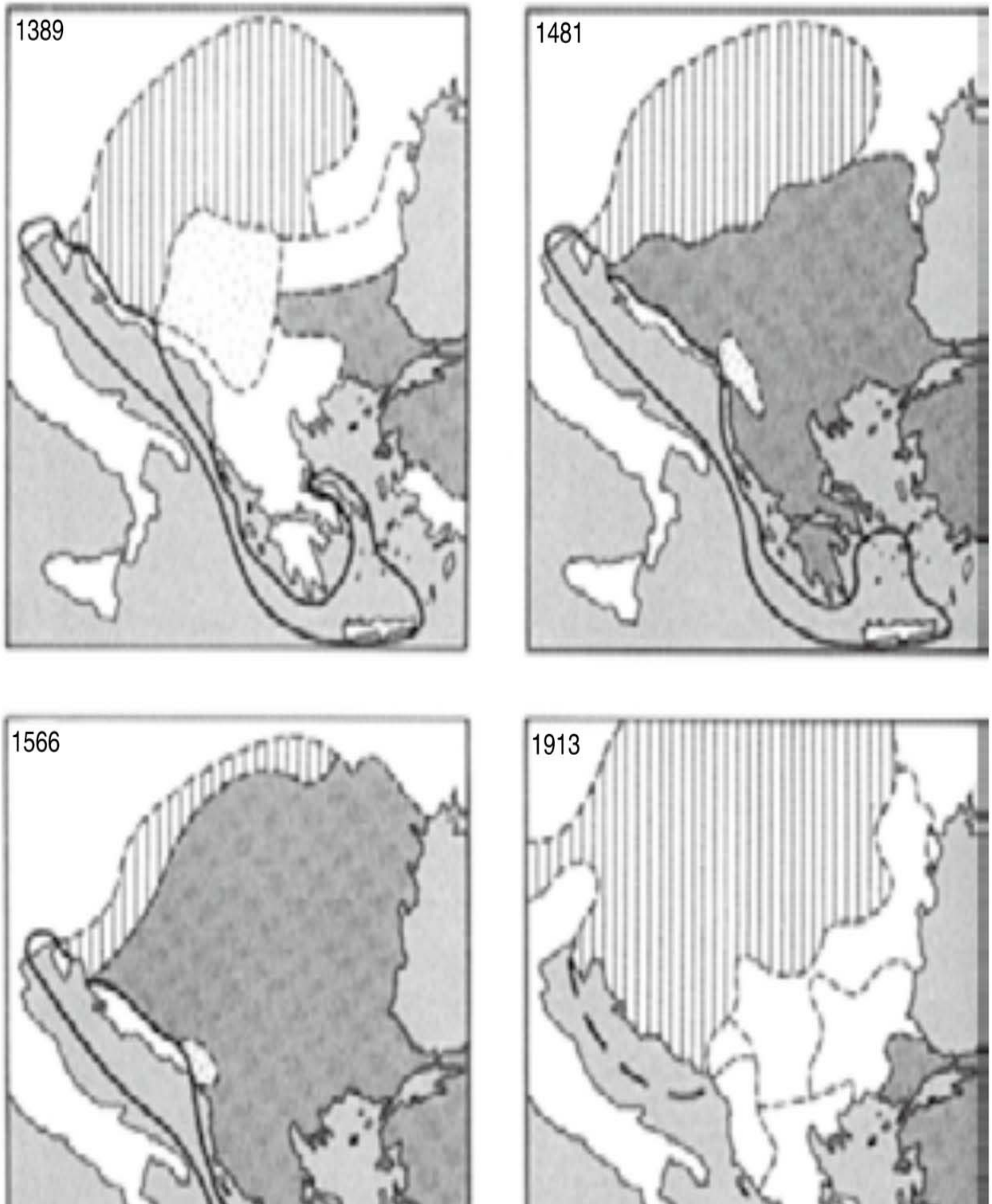

1389
1481
1566
1913

图5 奥斯曼帝国的命运

图中灰色部分代表奥斯曼帝国占领的地区。带点的地区指的是塞维利亚。带竖条的地区指的是匈牙利。粗黑线内地区是威尼斯和意大利（1913年后）控制的区域。

经过历史学家精心的研究，土耳其的这种长期以来为西方所否认的名副其实的辉煌灿烂之处，现在逐渐显露出来。终于得到分目归类的、至为丰富的土耳其档案，现已开始向学者开放。它们一点一点地显示出一个形形色色、辛勤耐劳、先进而专断的官僚机构运转的情况：能够编制详细的人口统计资料，制定前后一致的行政政策，聚集起大量的金银财富，通过在那里安置游牧民族有系统地向奥斯曼帝国对付欧洲的堡垒巴尔干地区殖民。此外，它还实行一种强制劳动（劳役）制度，维持一支令人惊奇的、受到严格训练的军队……这支军队确实现代得让人不可思议。

这架庞大的机器最终出了毛病，但时间不会早于17世纪末。它最后一次震惊世界的重大举措是1687年围攻维也纳……在此之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是由于缺少出海口而窒息了吗？摩洛哥卡在它与大西洋开放的海域之间；红海使它可以通往印度洋，但无法满足其要求。在波斯湾，它面临波斯人激烈的反抗，尤其是拥有优越舰队及其强大的商业后台的欧洲新来者的竞争。

另外，土耳其帝国灭亡是由于它没有迅速、有效地适应新的技术吗？或者说，而且这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它在18世纪，尤其是在19世纪，面临来自现代俄国的强有力的敌对行为？欧仁亲王战役期间（尤其是自1716年到1718年）奥地利骑兵取得的胜利只不过危及土耳其在欧洲的边缘地区。随着俄国的介入，一个年轻的巨人向一个奄奄一息的、至少是疲惫不堪的老人发起了挑战。

即便如此，土耳其帝国在一开始时并不是19世纪时遭到列强外交极为耻辱地对待的“病夫”。土耳其伊斯兰帝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非常强大、辉煌和有威慑力。塞法维王朝统治下的波斯也是这样，17世纪到过那里的一位法国游客，像塔韦尼耶（Tavernier）那样细致入微的观察家，曾对它羡慕不已……同样，莫卧儿帝国也是如此，它在18世纪尽管受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严密监视，仍在南方几乎控制了整个德干地区。

因而，我们切记不要对伊斯兰早期的衰落匆忙地做出判断！不要性急！

在伊斯坦布尔，18世纪是“郁金香时期”，其真实存在和装饰风格可见于众多物品之上：陶瓷、细密画以及刺绣品。这种图案不断地出现。对一个既缺少力量又缺少典雅的时代来说，“郁金香时期”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称呼。

第七章 现今伊斯兰世界的复兴

伊斯兰世界黯然失色，变成了现在生活着的人类的地狱或炼狱，我们委婉地称之为“第三世界”。说它黯然失色，是因为从前它在世界上享有的地位无疑比现在要高得多。

这一衰退，假如说或多或少姗姗来迟，却是确定无疑的。伊斯兰世界因此在19世纪陷于耻辱境地，罹受各种痛苦与灾难，而后是各地区普遍为外来势力所控制。此类事实众所周知。只有土耳其逃过了这一命运，它在穆斯塔法·凯末尔[51]帕夏（Pacha）的领导下，在灾难降临之际，做出了勇敢的、出色的反应。这一事件为后来民族的反应和民族胜利提供了一个实例。现在，伊斯兰国家的解放接近于完成。

不过，尽管获得了解放，确保独立却是一个问题；另外，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同样的发展速度、清清楚楚地看到未来，是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殖民主义的结束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现在最容易不过的是追溯伊斯兰世界各个地区遭到殖民，而后是“非殖民化”的过程。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除苏联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加盟共和国外）获得了完全的政治独立。

·苏联的殖民主义？从习惯上说，本节标题中使用“殖民主义”这一词时，通常指的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或荷兰的殖民主义。它们当然构成了整个殖民运动的一大部分。但此处也存在着俄国殖民主义，然后是苏联的殖民主义，对此人们讲得不多。从表面上看，它控制了至

少3000万穆斯林，甚至比现在整个马格里布的人口还要多。

使用“殖民主义”一词，在这里是否恰当？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做出了种种努力解放其控制的地区，并实行非中央集权化。为了地方自治，它做出了各种让步，由此也出现了巨大的物质进步。“现在，苏联和各伊斯兰加盟共和国，尤其是突厥斯坦人和高加索人，都拥有自己的科学、行政和政治管理阶层，即其知识界（intelligentsia）。他们已缩小了自己与鞑靼人之间的差距，不再需要寻求喀赞（Kazan）知识分子的帮助。”俄国的一个很有年头的、曾经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兰文化中心这样说。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伊斯兰国家中天然的休戚与共关系受到了削弱，建立一个面积广袤的“突雷尼语族”[52]国的思想渐渐为人遗忘。在苏联联邦体制中，文化“具有民族主义的形式，而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为内涵”。其结果显然是世俗化，对穆斯林的宗教准则造成了损害，同时，民族主义现在实际上局限于外省的范围之内，不再诉诸穆斯林兄弟的乌玛（Umma），通常仅仅提出诸如“进行机构改革”或“希望少数民族干部发挥更大的作用”之类短期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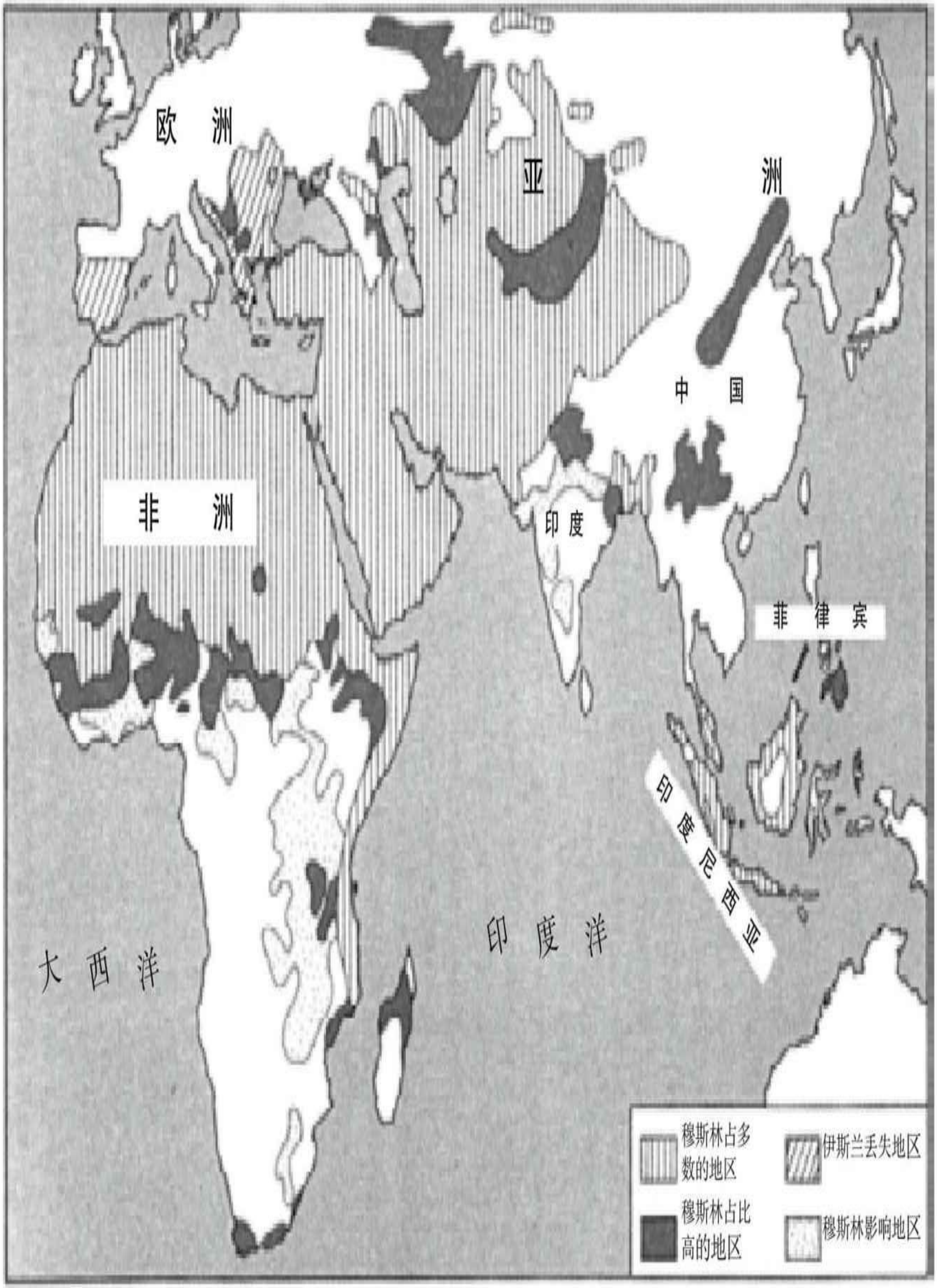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苏联的穆斯林问题暂时与伊斯兰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大声叫嚷着提出的一般要求无关。苏联各伊斯兰共和国享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但被紧紧维系在苏联整体之内，与苏联有着同样的外交政策，在国防、金融、教育和铁路运输方面完全依赖联邦。

加列夫素丹（Sultan Galiev）自1917年起就是共产党的一位高级官员，但1923年他变成了一位反革命的煽动者，1929年被判处死刑。从他的经历和视野来看，要走的路还相当长。作为一个穆斯林，他梦想着把苏联境内的所有穆斯林团结在一个单独的国家之内，并通过强制手段把它变成指向东方的一个探针，向亚洲腹地输出革命意识。加列夫认为，在这一大陆进行政治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而在同时，在他看来，欧洲的工业劳动阶级不过是一个“已经熄灭的革命火炉”。伊斯兰世界有能力点燃亚洲的革命之火吗？

·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e），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头牌。在现今公开的国际争端局面中，泛阿拉伯主义只是自己太过情愿地想把整个伊斯兰主义取代过来。除它自己之外，谁也看不见，谁也听不到。

纯粹的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显而易见的、苛求的中心，是其十字通道。因而，人们易于把中东（及其在北非的据点）误作整个伊斯兰世界，除这一或那一地区外，这一或那一著名的人物之外，看不到别的任何地区、任何人物。这在每日的新闻中随处可见。我们显然不应当把局部与整体混为一谈。

在东印度群岛，8000万名穆斯林生活在浓厚的印度教和泛灵论传统的侧旁，或生活于其间，生活于极为独特的经济结构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半迷失的孩子。在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由两个庞大的地区构成，印度这一庞然大物从中间把它们分开，其众多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威胁。在中国，1亿穆斯林是一个非常分散的集团，非常肯定地“已经成为迷失的孩子”。在黑非洲，取得胜利的穆斯林部分地成为形形色色强有力的泛灵论信仰的猎物，一定程度上为这些信仰所改变。



欧洲
亚
洲
中国
非洲
印度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印度洋
大西洋
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
伊斯兰丢失地区
穆斯林占比高的地区
穆斯林影响地区

图6 当今世界上的穆斯林分布区（这一略图没有显示出伊斯兰教在古代曾控制了几乎整个印度）

这些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往往成为他们争取民族主义的论据，成为他们进行反抗的一种手段。但就穆斯林整体而言，所有这些不再像从前那样严格地瞩望麦加，不再蜂拥前往那里进行朝圣，或不再完全赞成建立一个有效的、统一的泛伊斯兰的国家，无疑都是迷路的孩子，或者极有可能迷路。空间距离、政治以及无神论和世俗化的发展都在起着作用。自1917年以来，仅有几百名苏联朝圣者设法到了麦加。

·伊斯兰世界现在是否处在“加里波第时代”？在各伊斯兰国家的核心地带，在近东，泛伊斯兰运动正与当地急剧而热烈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

1961年9月，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R.A.U.）的解体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突尼斯、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也门都抓住自己独有的特权不放，同时彼此之间常常或多或少地公开进行对抗，尽管它们在面对外部世界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时有时能够实现临时性的团结合作。

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驱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和学生——做出暴烈的和引人注目的姿态。不过在对此不表同情的西方人的眼里，它们往往被视为过时，与时代不合。我们有着太多的、非常充分的理由对我们自己历史上民族主义的过分的行为感到后悔，因为欧洲为此付出过非常惨重的代价；当欧洲正在实现统一的时候，我们不希望爆发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实现统一方面欧洲缺少某些热情，而且确实非常不公平的是，当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时，欧洲的热情就会更低。

不公平吗？下面是一位阿富汗知识分子在1959年非常公正地表露的他的情感，这位阿富汗人叫纳吉姆·巴玛特（Nadjmoud-Dine Bammate）：

现在伊斯兰必须同时经历一系列革命：一个是像宗教改革那样的宗教革命；一个是像18世纪启蒙运动［Auf klärung，这个德文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18世纪启蒙运动和开明专制主义（despotisme éclairé）］那样的知识和道德革命；另一场是相当于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那样的经济与社会革命；而且，在大型地区性体系（请注意：东西方两大集团）的时代，应爆发众多它自身的小型民族主义革命。在缔结全球性条约的时

代，伊斯兰各国仍在等待和寻找自己的加里波第[53]。

这绝不是——远非如此——对加里波第的光辉形象进行中伤。但就欧洲而言，在过去必不可少的民族统一战争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我们熟知的一系列可怕的组曲。

与欧洲相比，民族主义是否很有可能更有利于欧洲呢？在一个互相依附的世界经济（在这里这种分裂没有什么意义）中，它难道不可能把伊斯兰国家导入死胡同吗？更有甚者，它不会引发危险的冲突吗？每一个独立的国家，只要它拥有某些军事力量，就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野心，来阐释泛伊斯兰主义或泛阿拉伯主义。众所周知，过去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埃及就是这么做的；在这个名单上还可以加上所有后来者。

然而，民族主义也可以是竭力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每一种民族主义都是反对殖民主义、抗拒外国统治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潜在的解放运动。

阿拉伯世界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其宿敌以色列持敌对态度，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奇。以色列国的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后果。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这是西方制造的一个最坏的结果。以色列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的支持下在技术上取得令人称羡的进步，1948年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它以其不多的军队蹂躏广袤的西奈半岛（Sinaï），在与埃及军队作战时显示出来的军事实力——这些以及其他的成就让人嫉妒、担忧和仇视，可谓旧仇添了新恨。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不无道理地写道：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同时是上帝的子民，对外交家和将军们来说这未免过多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准确地说产生的原因在于他们是表兄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都因一神教信仰而变得高贵……对西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其中一个即犹太人在大散居（diaspora）过程中使其生活方式与异邦人令人目眩的技术相适应，但在同时尤其保存了他们的共同的理想。另一个即阿拉伯人依然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遭到了侵略，遭到了瓜分，但有幸或者不幸多多少少待在自己过去的地方。由此就产生了现在双方在资源上的不平等，造成了双方在言语和行为上的不同。最有自知之明的阿拉伯作家对他们所说的……1948年“灾难”进行了痛苦的思考。恰如1870年以后的泰纳[54]或勒南，他们劝说其爱国者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

免重新回到那种冒险上来。

·民族主义在不远的将来有一个角色要扮演：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将不得不采纳并推行极为严格的义务规划。

实际上，他们需要的是有关团结和社会规则的规划，而民族主义将会帮助这些年轻的国家解决它们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将导致人们更容易接受与其非常古老的社会、宗教和家庭结构——其祖先所有由来已久的习惯，在伊斯兰教的古风中长期存在——相冲突的根本性改革，这种变革极有可能招致激烈的反应。

因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伊斯兰教都必须实行现代化，并在很大程度上采用西方的技术，后者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生活的根基：未来就建立在接受还是拒斥这一世界文明之上。强有力的传统呼唤人们拒斥它，但民族主义的荣誉可能激起人们接受他们本能地表示拒斥的东西。

人们往往否认伊斯兰教具有进行如此巨大之变革所需要的机动灵活性。久而久之，以致众多观察家宣称，由于其心灵、精神和文明"不可渗透""宁折不屈"，伊斯兰国家将会发现，他们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化努力因而遇到了重重阻碍。这是事实吗？

实际上，伊斯兰教已经接受了它自感包围着它的现代世界的某些方面，而且可以接受得更多。基督教昔日这么做时并非没有犹豫，并非没有冲突；不过最终它在适应过程中保存了其独创性。

把伊斯兰教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冥顽不化的宗教，认为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就是完全把它培育过的那么多的异端置之不顾，忘在脑后。单单它们就证实了这一宗教的不安定，展现了扭曲的可能性。此外，《古兰经》本身就向改革者显现了一扇永远打开的伊智提哈德（ijtihad）之门。皮埃尔·龙多（Pierre Rondot）写道："据认为先知预见到了《古兰经》或索乌纳（Sounna，传统）未加指点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他建议人们通过类比（即qiyas）进行推理；假如这一点无法做到，那么人们就要把其判断和视野（或者光线）置于此前所有的基础之上。个人进行阐释的这一努力，即ijtihad，在后来穆斯林思想的发展中起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改革运动非常明确地试图重启这扇门。"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紧急出口。伊斯兰教可以拖延或者反对变革，但它也可能受到影响，有可能发生转变。

钻研日常现实的经济学家一直对种种基于所谓穆斯林生活不可动摇的“事实”上的现成的、漫画式的解释表示不满。

他们认为，真正的困难在于远为世俗的方面：这仅仅表现在所要进行改革的规模上。伊斯兰世界已经落后西方世界200年，而这200年里西方发生的变化远比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8世纪2000多年里所发生的变化要多。伊斯兰国家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花大力气迎头赶上？这将意味着控制住其非常古老的社会并重新塑造它。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呀：农业依然贫瘠，没有保障，工业在一个无法进入人口迅速增长的缺乏活力的大众的生活并为他们谋取财富的经济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进而言之，伊斯兰世界中也存在着财阀，他们人数很少，却有更强大的势力。宗教信仰和传统常常成为特权阶层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口实，以致某些社会像也门那样保存着名副其实的“中世纪”特征，像伊朗那样保有封建特征，或者像沙特阿拉伯那样保持古风，尽管它们有石油，甚或可以说因为有石油，它们才如此。

这些困难向改革家们的工作提出了严重挑战，比如土耳其穆斯塔法·凯末尔非凡而残忍的工作；叙利亚自卡赛姆[55]以来与暴力相伴的改革；埃及以执拗固执为特征的纳赛尔改革；以及突尼斯的布尔吉巴[56]明智有效的工作。不管他们的性质或特性如何，它们都面临类似的阻碍。他们进行的所有改革都要克服内存于伊斯兰文明之中的形形色色的所谓禁忌；其中最大的、无可置疑的考验是解放妇女，首先要做出这么一种宣言，随后——这一过程要慢得多——是落实。废除一夫多妻制，限制丈夫单方面废除妻子的权利，取消妇女的面纱，允许女性上大学、就业和参加选举，所有这些都是或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采取的措施表明改革并没有失败，但改革需要旗手，需要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斗争将是多方面的。最大的危险来自在种种诱惑、便利条件的吸引下，或在某种借口（或者根本就没有借口）下利用政治局势的紧迫性，做出偏离改革的举措。

理想？理想的技巧是一次只走一步，而且每一次都选择具有根本意义的一步。但政治并不按照笛卡儿的定理运行。仅仅经济进步一项就要求伊斯兰世界——就像对所有地区一样——做出优先的、可能是排他性的政治努力。而在现实的世界中，这往往可能意味着在问题一出现时就加以解决，不管它们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

因而，所有这些以独立为自豪的国家，都因它们面临的死胡同而偏

离其严格和狂热的政治理想。它们易于受到各种不得不审慎应对的问题的影响：伊斯兰和欧洲一样丰富，它要说的东西并不少。伊斯兰世界还有自己的青年，有自己急躁不安的大学生，他们倒不如说类似于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中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学生。它有自己的军人，他们像1939年以前拉丁美洲的军人一样精于起义和政变。它有渴求权力的政治党派，其政治家追求着自己的画像到处张贴的蜃景，追求其演说的猛烈威力。他们不得不抬高自己的嗓门，以便盖过世间喧嚣的吵闹。

外国的利益显然是存在的：比如法国在北非，英国在科威特和阿拉伯半岛南部人口分布稀疏的地区，美国在各个地区（它平静地提供着自己的贷款和建议）以及苏联，它根据情况时而吝啬，时而慷慨，但在这一广袤的角力场所时刻保持着警惕。最后，在各个地区，社会革命都在展现着自己的色彩，表达着自己的愿望，待机而起。

历史有着自己的风向。在土耳其，1960年5月27日的军事政变致使许多人希望推行早就期盼着的社会改革。在伊朗，第一次革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其领导人既保守又具有现代思想；尽管面对年轻人、宗教极端分子、前首相摩萨台博士（Mossadegh）领导的派别和伊朗共产党（le Toudeh）的敌意反对，仍取得了某些进步。在约旦，一位勇敢的国王挺身而出，应对来自八方的危险。在黎巴嫩，在明智的时期，它试图成为近东的瑞士。在伊拉克，革命与其说是真实存在的，不如说是口头上的，但库尔德人问题一直是其深深的痛。在埃及，在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后，国家着手推行某种形式的社会共产主义，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这一成功可能恰恰证明是有害的……为了使这一画面变得完整，我们还可以把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巴基斯坦补充进来，它对印度一直心存畏惧，现在看来比人们过去认为的还要好斗，而且它想控制克什米尔地区（le Cachemir）；另外还有野心勃勃的印度尼西亚，它受印度在果阿（Goa）的成功的鼓舞，想在荷属几内亚即伊利安岛（Irian）建立其保护国。最后还要加上心神不宁的整个北非，它在阿尔及利亚悲剧以大团圆收场后一直在踌躇着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所有这些焦虑都对伊斯兰各国的政策产生了压力，致使它们面临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既大大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邻国。1961年富于激情的比塞大（Bizerte）事件给法国（该国是富国）和突尼斯（该国是穷国）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谁又能估算得清呢？在那一危机中，比塞大到底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争端，还是对双方都有伤害的虚荣？法国感到非常痛苦，因为它认为自己为伊斯兰做了许许多多的事（这显

然是真实的）；伊斯兰国家也感到痛苦，因为它相信法国给予它的独立是不完整的。确实，如果把其经济如此迅速地委身于第三世界之列，那么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独立的。

不过，原宗主国对经济的这种持续的依附状态只负有部分责任。这一状况还产生于别的具体的原因，包括伊斯兰国家的过去，其自然资源的缺乏，以及人口出生率的不加节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严重的障碍，但并非没有解救之道。

现代世界中不同的伊斯兰国家

·增长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伊斯兰世界面临同样的困境。要想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它就必须尽可能快地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

描述这一任务非常容易，但这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要求人们勤奋工作，但这么做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者说不会迅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伊斯兰国家在充当殖民地时并没有做好准备以负起这一责任，而这无疑是殖民势力最严重的失败。

确实，殖民者为其统治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些几百年里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异常落后的地区，突然被带到了现代世界，与高度发达的文明产生了接触。这些国家从中得到了某些东西：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的医药卫生，视具体情况不同或多或少进行很有成效的教育（就此而论法国殖民地比其他大多数殖民地要好），在港口、公路交通和铁路方面大量物资投资，通常带有用于灌溉的大坝的现代农业设施；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对工业化的一种明智的态度。

有人也许会说，这已经够多的了。这么讲既是又不是。一方面，殖民者的贡献部分地毁灭了旧有的结构；另一方面，它在取代它们时非常不完美。他们建立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为殖民地的国民经济，而是为一种与宗主国相连的经济设计的，依附于宗主国和世界的生活。因此造成的结果是各个经济领域的发展极不平衡，新独立的国家必须改革其经济结构以保持国内的各项需求。这一困难与源自其文明本性和其大部分土地非常贫瘠之现实的许多其他困难交织在一起，使局面更加严重。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伊斯兰国家既需要自助，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因而它们不得不适应特权世界变化中的政策，对此后者有非常清楚的认

识，而且非常擅长。伊斯兰国家既缺乏才智，又缺少政治技巧。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得不随权达变，与现实世界进行搏斗。在这些任务中，化圆为方是最为困难的一桩。

·经济与石油：不存在一种轻而易举、独一无二的解决办法。即便是石油这一看来如此慷慨的大恩主也起不到这种作用。

石油无疑是一大财富，它在所有产油国家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我们所知，大自然对近东非常宽厚仁慈。

尽管如此，大型国际石油公司，仅靠它自己就能承担起勘探和开采石油的高昂费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石油的主要得益者：它们控制了石油的源头，以此换取各种石油开采权（royalties）；它们提炼石油，也负责分发。各国在早期做出的收复石油资源的尝试，就像伊朗1951年短时间所做的和1961年伊拉克所倡议的那样，实际上都遭到了挫折：石油只有在卖出后才变得珍贵。现在，所有权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现在世界上已经不缺乏石油，同时，随着其他类型的能源的出现，包括核能，伊斯兰世界对这一燃料实际上的垄断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我们可以补充一个小的细节：顺带说一下，外国剥削不是唯一的恶魔。在伊斯兰国家，石油开采权养肥了一个特权阶级。金钱的分配并不平均，司空见惯的情况是，为特定等级的穷奢极欲提供了资本。这一奢华也没有刺激当地的生产：人们消费的是舶来品，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在当地生产。沙特阿拉伯利用其石油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建造新的城市、新型公路、新型铁路和新型机场。这显然是一种进步。但相当多的石油收入也流入王族和主要的部落首领的手中，为其毫不收敛、与时代不合的奢华提供了方便。这种豪华场面既令年轻人不满，他们在埃及掀起了革命；也令中产阶级不高兴，他们渴望在公共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某些观察家看来，近东的石油与16世纪南美洲的银子非常相像，后者流经西班牙，却没有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是从那里流出去，养肥了欧洲其他地区富有活力的经济。

不管怎样，石油是而且仍将是近东无休无止冲突的始发点。这方面早期的一个例子是伊拉克及其首领卡赛姆将军与八家大型国际石油公司（就像人们说的“八巨头”）的冲突，这些公司在当地的代表是IPC，即

伊拉克石油公司。

谈判进行三年后中止了。特许开采的油田中尚未开采的那些不再由公司控制。妥协无疑依然是有可能的，办法是向伊拉克做出让步，包括不低于50%的利润分成。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引来意大利和日本这些更为通融的新来者进行石油勘探，尤其是开发波斯湾的地下石油资源。但即便如此，石油生产国仍没有掌握所有的王牌，它们仍面临倒退的危险。

·所有伊斯兰国家都行动起来，并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包括生产总的发展。但人口的增长持续不断地使其努力化为乌有。一切都在进步，但一切都不得不重新开始。

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1956年8月7日《世界报》（*Monde* ）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近东的文章，其论点至今仍没有失去效力。他这样写道：

阿拉伯世界（他本应可以写成“作为整体的伊斯兰世界”），是一座人口火山。人口出生率高达52‰，或者说每个家庭有六七个孩子，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较高的地区之一。这一出生率远没有降低，而是随着一夫多妻制的衰落，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实际上变得更高。而在出生率达到新高的同时，由于瘟疫、饥馑和部落间战争的减少，人口死亡率却在急剧下降。现有的死亡率不为人精确知道，但肯定是呈下降趋势，趋向于20‰。人口年2.5%—3%不再是例外。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可能还有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增长率致使人口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增加了一倍，比欧洲人口增长最迅猛的时期（年增长率1%—1.5%）还要快得多，同时它缺少移民和拓殖这一安全阀。伊斯兰世界把欧洲1880年的死亡率与欧洲仅在其中世纪最繁盛时期所达到的出生率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爆炸性的结合。

如此一来，“这些国家，人口和需求增长得如此迅猛，它们之间有石油、管道和（苏伊士）运河，却听任如此多的财富流经其疆土而不要求为自己分得重要的一份。这么去想真是幼稚可笑”。

·伊斯兰各国中人口如此迅猛地增长，其结果是，尽管生产有所增长，但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提高。这是第三世界常见的现象。

然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地都在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失业率

因此有所下降。仅举一个例子吧。在突尼斯，在没有外界帮助或巨大型投资项目的情况下，20万或30万失业者找到了工作：他们充当修路工人，平整田地以防侵蚀，建造房屋，或者单单去种树。一位经济学家估计，1952—1958年，近东农业增长的速度与世界整体水平大致同步。每一个工业部门都出现了类似的进展。在埃及，1953年其制造业的指数为100，发展轨迹如下：1951年，95；1952年，98；1953年，100；1954年，107；1955年，117；1956年，125；1957年，132；1958年，143。在巴基斯坦，工业生产由1952年的指数100上升到1954年的128和1958年的215……

因而，在伊斯兰国家出现了进步，国民收入在全球普遍有了增长，从而看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并鼓励增长。事实确实如此，但与此相反，人口增长的潮流对此起了阻碍作用。人口数量的增加依然超过他们可分配物品增加的速度，同时人均收入下降了：在所有的商中，其分母（这种情况下指的是人口）都比分子增加得要快。一位航海者与压倒一切的潮流进行搏斗，不管他航行了多少距离，结果是他投入的精力越多，下的功夫越大，他就越是被浪涛驱回到海岸。伊斯兰世界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它在各个方面都有所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或者说基本上保持不变。

不过，对此我们应补充说明一点，即有关人均收入的这些数字仅仅是些估计。人口数字本身往往难以确定，其误差可能高达20%。由于通常缺少可靠的全国统计数字，我们对国民收入也难以做出精确的估算。同样，分散而原始的艺人到底有多少收入，在大片从事农业生产、农民靠田地的收成过活的地区中，农村经济收入如何，也非常不易于做出准确的统计。

因此，上文所列举的数字都只不过是些大致估计数字。不过这些已经足够了。

·鉴于人口的增长，仅仅维持人均生活水平这一事实就说明，伊斯兰各国的经济是有活力的，有能力应对巨大的生物威胁。

就整体而言，伊斯兰各国证明了这一活力；即便说有些衰退，那也微乎其微。这些国家的人民每天消耗的卡路里平均不到2600（这是富国较低的界限），但总的来说超过了生存线，而且除非洲的部分地区外，都处在世界上残酷无情的饥荒区域之外。这样也就是说，它们处在贫富界限之下，但处在赤贫界限之上。这是它们取得的一个成就。

不同的国家在这两个分界线之间占据不同的位置。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按美元计算，（在20世纪60年代）由低到高顺序如下：利比亚，36；阿富汗，50；尼日利亚，64；巴基斯坦，66；印度尼西亚，88；约旦，100；叙利亚，110；伊朗，115；埃及，122；突尼斯，132；伊拉克，142；摩洛哥，159；阿尔及利亚，210；土耳其，219；黎巴嫩，247。确实，与欧洲（超过1000）和美国（2200）相比，这些数字相当低。只是在和世界其他地区，比如说黑非洲相比较时，这些数字看上去才显出价值。

我们还可以指出，上面列举的数字中一些较高的数字是那些曾经或者仍然与法国有联系的国家的数字，如黎巴嫩、叙利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法国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很难说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尽管它一度有其优点，本质上是因为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同时比其他地区更为有效地缩小了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差别。

黎巴嫩能够取得相对繁荣，原因既在于其双重的宗教遗产，基督教遗产和伊斯兰教遗产，也在于其贸易、资本主义和文化（culturelle）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播。阿尔及利亚得益于法国和国际上（在农业、水坝、道路、学校、医疗设施和撒哈拉石油方面）的投资，同时也得益于它向法国的劳动移民，这些都未受到自1954年开始的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影响。

在谋求发展的斗争中，每一种经济都有某些优势或者王牌。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有石油；埃及拥有肥沃的尼罗河谷地、苏伊士运河和优质棉花与欣欣向荣的纺织业；土耳其和摩洛哥则在工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成就，其工业化极为常见的是经过了精心设计；印度尼西亚拥有橡胶、石油和锡矿；巴基斯坦则有丰富的小麦和黄麻资源。

这些王牌极为出色，但要打好牌仍非常困难，偶然性很大。

·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艰巨。一方面它们属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它们又非常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不可能一个接一个地解决。从总体上考虑，需要做出惊人的大型规划。

这实际上包括：

（A）首先，改善农作方式。这意味着强行改变古朴的财产法，直

击灌溉这一多重问题，结束可耕地被侵蚀和荒废的局面。一句话，推行农业政策和技术。

（B）建立工业工厂（在重工业领域或轻工业领域，国家所有或私人所有）。如果可能就把它们融入国家的整个经济之中。必须把它们建立在全球经济结构之上，并促进其普遍增长。

（C）解决投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外国援助（这种援助可能是私人国际资本，也可能是通过瑞士银行而来，或者是从苏联、美国、法国或欧洲共同体得到的政府援助）。

（D）创建一个市场。在这方面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一个市场以一定的生活水平为前提条件（此乃所有这些措施力图实现的）；其次，任何有效的市场，其规模都必须大于一般的国家规模。由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如泛阿拉伯市场计划、建立马格里布市场计划或建立非洲市场计划，人们在这方面投入的热情大于取得的成功。梦想是非常明智的，但难的是使它们变为现实。

（E）教育和培训劳动力。自动化尽管在各种几乎从零开始的工业部门切实可行，却不能解决紧迫的、至关重要的失业和剩余劳动力问题。此时这一问题变得更有必要。

（F）培训经理和其他人员。工程师、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已提上了日程，这是长期的任务。只有在人民有了极大的学习热情之后，才有可能克服当地面临的重重巨大困难。

总之，需要做出范围广泛的投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投资在非常长的时期里是不会产生回报的。正如J.贝克指出的那样："一代一代的人要为未来做出牺牲，只有很少数人有幸实现这一点。某些年轻的叙利亚—黎巴嫩诗人试图抓住这一现象，他们乞灵于塔努斯（Thannus）神话，这一东方神灵注定要痛苦地死去，但也注定会再生。他们就是这样解释其国民永恒的畏惧和现时的痛苦产生的原因的。"

·必须做出一种选择：面对此类严重的问题，此类急迫而困难的解决办法，以及此类巨大的、不可避免的牺牲，各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自然而然地对采取何种战略踌躇不定。世界至少展现了两种选择，做出哪一种选择，决定并超越伊斯兰国家的整个未来。

从广义上讲，可从以下两种选择取其一：或者维持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采取半干涉主义、半自由放任的政策，并实现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或者以共产主义实验为榜样——苏联、南斯拉夫或中国的经验。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说，这意味着或者维持政府和社会现有的状况，并在情况允许的程度内做出各种改善；或者推翻整个结构，旨在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结构。

不幸的是，这些选择并不纯粹是思想上的，甚至也不纯粹是经验性的。它们受到了国内外其他形形色色因素的影响。

在所有地方，或者说几乎所有地方，一个中产阶级正在崛起。构成该阶级的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年轻人。他们仍对在模仿西方尝试之后出现的深深的失望感到愤恨。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除阿富汗和也门外，各伊斯兰国家都有议会，但这对崛起的中产阶级有什么好处呢？中产阶级的成员感到失望，渴望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他们“转向共产主义，视此为将来他们控制政局的一个手段。官僚政治以及苏联之计划化（planification）的理想，似乎向人们提供了确保安定的允诺，提供了解决几乎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的方法……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受到了现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气氛的诱惑。应当承认，这只不过是对使伊斯兰思想失去任何活力的中世纪的种种限制做出的反应。但是更为危险的是，那些倡导共产主义的人此前曾经寻求——但没有成功——从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中找到建立一种现代的、理性的哲学方法的途径。从今以后，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贝尼格森（A.Benigsen）语］。

西方人非常倾向于把伊斯兰国家过去与苏联的各种交往视为低价获得机器、武器和贷款的手段。事情远不止如此。共产主义经验仍令伊斯兰国家的年轻人着迷。西方仰赖的通常仅仅是倒退的贵族制，是人造戏剧舞台上的社会背景。在这一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它缺乏一种真正的“全球政策”。

实际上，答案不在于让伊斯兰确信西方模式本身更为优秀，或者与其他选择相比更好，甚至也不在于多多少少慷慨大方地提供信贷的金矿。反过来，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计划化的范式，这一范式与其要求契合，给它们希望，赋予它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前景。

20世纪的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文明本身受到了这一深刻危机的危害吗？这一问题以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

在各民族四分五裂、政治敌对普遍皆是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存在一个类似于统一的伊斯兰文明的东西呢？

如果这样，它是否受到了雅克·贝克所说“技术和行为中普遍流行的时尚的采纳”之类东西的威胁？换言之，它能受得住现在已经全球化、但实际上是西方发明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吗？

假如伊斯兰选择可能毁灭对维系其团结统一至关重要的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信条，把它视为通向现代之路，那么这一风险是否更大？

·现在是否仍然存在一个伊斯兰文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政治分歧似乎结束了泛穆斯林梦想，令其实现遥遥无期。但是，如同在过去一样，泛伊斯兰主义仍然是一个事实，是伊斯兰文明的一个方面。

那一文明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清晰可见。从伊斯兰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有类似的信仰、道德、习惯、家庭关系、品位、休闲消遣、游戏和行为，甚至有类似的饮食……一位欧洲人在地中海沿岸伊斯兰国家的各个城市之间走马观花，他更为吃惊的肯定是它们的不同，而不是它们的雷同。在巴基斯坦和东印度群岛，差异更大；而在黑非洲伊斯兰国家，差异还要大：在那里，伊斯兰文明遇到了敌手，后者的力量通常丝毫不差，有时甚至更为强大。

在黑非洲，穆斯林仅仅通过宗教——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才建立其联系。宣教（因为埃及以泛阿拉伯主义的名义掀起了一场“传教”运动）时使用的常常是法语，即当地所使用的语言。这意味着文化联系或多或少是不存在的，或至少是脆弱的和间接的。我们也无法肯定宗教联系在非洲大众之间是否真正起作用，他们事实上向对基督教那样随心所欲地对伊斯兰教进行改造，即非洲化（Africanise）。简而言之，在黑非洲，泛伊斯兰主义如果说有的话，其力量至多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它根本不是此类文明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是一个被恰当地称为“印度伊斯兰文明”中的一部分。它使用的语言——乌尔都语（l’Urdu）——把伊朗语或阿拉伯语的词语与其他源自梵文的词语掺杂在一起。与阿拉伯文一样，乌尔都文从右向左书写，但在其他方面截然不同。

然而，那些国家仍然是伊斯兰国家统一体中名副其实的一部分的最鲜明的证据之一仍然是其语言。20世纪保留了“书面”阿拉伯文，它一直是伊斯兰教的黏合剂：它是通用的书面文字，用于报纸和图书。各民族的语言纯粹是口头用语。

此外还有其他的联系。伊斯兰世界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源自两种文明的冲突，一种是古老的、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什么变化，一种是现代文明，它在所有地区都在向伊斯兰文明提出挑战。就此而言，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本质上几乎都是相同的。在某些地区问题仅仅是崭露头角，而在其他地区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但在所有地区要采取的解决方法都极有可能是类似的。这只是从逻辑上做出的推论，因为起始点是一样的。那些在改革方面进展最大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仅仅是由于它们比别的国家先走了一步。

然而，在这一方面，“流亡的伊斯兰”（l’ Islamexilé）——在黑非洲、东印度群岛（Insulinde）、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又一次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不同，因为它的未来与其他文明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问题：伊斯兰世界在更为紧密地接近工业化和现代技术时，是否会抛弃其传统的文明，就像脱掉一件过时的旧外套那样？

这一问题并不是伊斯兰命运中独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拥有计算机、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核技术的现代文明，是否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使世界整齐划一，并消灭单个的文明呢？

机械化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肯定可以搅乱、消灭并重建文明的许多方面，但绝不可能是全部方面。就其本身而言，机械化并不是一种文明。说机械化是文明，就是假称今日之欧洲完全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重新获得生命的。工业革命无疑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但欧洲文明早在它开始之前就存在了。确实，欧洲各民族让人非常怀疑机械化能否团结全球或使之整齐划一。它们早已为一个单一的文明所锻造，此即基督教和人文主义西方的文明；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工业化同样的冒险中，几乎同时受到驱动；分享同样的技术、同样的科学、类似的制度和机械化的所有社会后果——这些民族应当肯定早已就失去了我们现在仍能够言说的法兰西文明、德意志文明、英国文明或地中海文明等等的强烈的个性特色。不过，一个法国人只需越过拉芒什[57]，一个英国人只需踏上欧洲大陆，一个德国人只需进入意大利，他们马上就能认识到工业化并不意味着标准化。同时，如果技术无法消灭地区性差异，它又如何能消灭那

些建立在迥然不同的宗教、哲学和人类与道德价值之上的大型文明呢？

但是，假如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相伴呈现在穆斯林面前，其中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标准与伊斯兰教传统的精神准则相互敌对，问题会不会有所不同呢？用至为简洁、通常是非常庄重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既不容易，同时也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不敢肯定这是否能够真正改变你们的疑虑。

我在此冒昧地讲几句：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替代的文明；它是一个社会运动，是一种自愿的人文主义，是人类事务的一种理性化。假如将来有一天它为伊斯兰世界接受，它无疑导向共存和分享，就像在苏联那样，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文明共存，或者像在中国那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共存。尽管它对这些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它并没有铲除它们，而这也不在其规划之内。

Y.穆巴拉克认为，在那样一种局势下，“伊斯兰教会发现比基督教更难抗拒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它仍无法把精神与世俗事务区分开来。因此，精神就更容易陷入一个共产主义穆斯林社会的机械唯物主义之中，遭受灭顶之灾”。他这么说无疑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之前，在所有地区，或者说几乎所有地区，基督教都受到了科学、理性和世俗因素的冲击。它花了很长时期去适应，甚至进行反击，但它维持住了平衡，仅仅舍弃了它可以舍弃的东西。这一启蒙曾在与理性主义的斗争中为它提供了武器，也曾为它反对技术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提供了武器。

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决定了人们生活中的所有行动。对这一宗教来说，技术（不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人们不得不一跃而过的防火墙，借以拒斥一个已变得年迈不堪的文明，并从火焰后现在的世界中找到新的刺激。它选择什么道路既依靠自己，也依靠世界，像钟摆那样左右摇摆，或东或西。与整个第三世界一样，伊斯兰世界可能无法按自己的设想行事，而是屈从于两极中更重的一方。

1966年附言

1962—1965年，伊斯兰世界发生的系列事件就足以写满满一整卷。从印度半岛到摩洛哥，某种激烈言辞极为常见，其中居压倒性优势的是尤其因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而特别自觉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一运动在石油开发等各重大事务上，反对国际资本主义。1960—1961年埃及的国有化提供了一个范式。伊拉克国有化（1964年7月14日），或者叙利亚对石

油转让采取敌对政策（1964年1月2日），其情况也是如此。

最近这些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在与法国于1962年3月19日签署了埃维昂（Évian）协议以来，1962年7月1日举行了民族自决投票。

独立的最初时刻以动荡和失序为标志。人民军队在独立战争期间曾驻扎在摩洛哥和突尼斯，面向阿尔及利亚的边界防御，现在要重建秩序。本·贝拉（BenBella）于1962年11月15日第一次组阁，经历了整个1963年，采取了被称为“的黎波里”（Tripoli）的社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欧洲殖民者抛弃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并发挥管理委员会的作用。政府从此支持成为“尖刀”的农民民主制。

然而，新政府面临的困难不计其数。随着国有化的普及，欧洲人大量移居国外，国家长期面临资金缺乏和技术干部匮乏的局面。政治困难不断引发骚动，致使关系破裂、政见不同、游击队活动频繁、诉讼案件上升……但不管怎样，本·贝拉似乎控制住了困难的局势（1963年9月15日当选共和国总统，1964年4月16—20日出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但是社会和经济压力日趋严重：以菲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者的不满，经济萧条生活物价上升，还有失业压力……各种力量逐渐取得平衡，本·贝拉似乎掌控了军队和民族解放阵线。对外方面，它与法国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体现在经济和文化援助方面；法国雇用50万阿尔及利亚工人，这也减轻了失业的后果。

阿尔及利亚希望保持中立，这一态度并不排除强烈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意图，而反殖民的意图尤为突出。它对葡萄牙的态度，或者对前比利时殖民地刚果的态度就是明证。

1965年6月19日：本·贝拉的权力自1962年起得到加强，由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遭到清洗［4月10日，艾特·艾哈迈德（Aït Ahmed），1964年卡比尔人暴动的领导者，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他将所有的政权机器集于一身。然而，一次政变导致了制度的突变。6月19日清晨，参谋长带领一队军官逮捕了本·贝拉和政权的其他几位要员。时任国防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布迈丁（Boumedienne）上校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掌握了政权，宣布“今天失去作用的暴君”被推翻，他“对国家遗产的糟糕管理”被终止，但他保证“革命的成果不可剥夺”。

7月4日：革命委员会名单公布，主要包括旧时海外军队和游击队的

军人。

7月11日：新政府成立。政府成员大部分是昔日本·贝拉的合作者。

7月14日：签署法国—阿尔及利亚关于碳氢化合物的极为重要的协议。这份协议延长了1962年搁置的埃维昂协议条款。它为开发公司，尤其是为它们的税收制定了新的政治制度，特别创立了“合作联盟”，加强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在石油勘探、生产、开发、运输和商业化方面的紧密合作。这样就建立了出产石油的不发达国家和作为石油消费大户的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全新类型的合作模式。最后，协议用石油公司的收益创立了阿尔及利亚工业化的混合机构。这份协议于7月28日在阿尔及尔正式签订，开启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此后，阿尔及利亚政府没有错过任何赞成和支持戴高乐将军对外政策的机会。

摩洛哥

1965年3月23日，卡萨布兰卡爆发了学生和失业者的骚乱，遭到内政部长乌弗基尔（Oufkir）将军的严酷镇压。3月28日，因上一年的颠覆阴谋被判死刑的14名摩洛哥人被执行枪决。

4月13日，哈桑二世（HassanⅡ）发布大赦令，着手进行所有政党进行协商以达成国家统一政府的工作。协商失败了。6月7日,国王哈桑二世宣布废除1963年相对自由选举出来的议会政体。特殊政府成立，议会被解散，从此国王不受限制地掌控一切。10月29日，一位左派反对派领袖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在巴黎遭绑架，引发了摩洛哥和法国之间的危机。法国把矛头直接指向内政部长乌弗基尔将军，认为是他的责任。哈桑二世国王庇护自己的部长。法国与摩洛哥的合作似乎受到牵连。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1965年8月24日，纳赛尔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达成停战协议，从而结束了也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纳赛尔支持共和派，而后者为君主主义者提供经济和武器援助。这份协定主要是由美国外交斡旋而成的。美国看上去在10月1日筹建由扎卡里亚·穆赫迪德（M.Zakaria Moheddied）领导的新政府后在开罗重获成功。新领导人在埃及接受了美国的食品援助。但是这一变革非常短暂，纳赛尔政府拒绝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1966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Kossyguine）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标志着苏联积极地重回近东，开展外交活动。苏联重新给阿斯旺大

坝的后续工程提供贷款，并尽力加强对也门共和派的援助。由于其他原因，也门重燃战火。

1966年3月，叙利亚的政变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左翼和共产党的一位成员、两位同情者引入政权。

1966年6月，伊拉克政府首脑阿拉夫（Araf）元帅的意外死亡将他的兄弟、前参谋部部长引入政权。在苏联的怂恿下，他签署了一项协议，结束了北部库尔德人持续几年的造反。同时，莫斯科给伊拉克提供大量贷款，在幼发拉底河建造水坝。

[1] 希罗多德（Hérodote，约公元前484—前430／前42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有西方“史学之祖”之称，著有《希波战争史》（或称《历史》）。——中译者

[2] 法蒂玛（Fatma，606？—63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女，阿里之妻，被什叶派尊为圣母。10世纪初，什叶派曾在北非建立法蒂玛王朝。——中译者

[3] 居鲁士大帝（CyrusⅡ，公元前590／前580—约前529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国之君，波斯人称之为“波斯之父”。约公元前550年起兵反叛米堤亚王朝，并破吕底亚和新巴比伦，建立起一个远届小亚细亚的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和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公元前529年在征讨一个游牧民族时丧生。——中译者

[4] 冈比西：指冈比西二世（CambyseⅡ，活动时期为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之子，前者去世后继承其王位。曾任新巴比伦总督，即位后远征埃及。——中译者

[5] 大流士（DariusⅠ，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阿契美尼德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公元前522年乘冈比西去世之机赶往米堤亚，杀死合法的继承人取而代之。在平定国内叛乱后四处扩张，曾进攻里海东岸的西徐亚人，到达印度河谷地，征服色雷斯，跨过多瑙河进入欧洲领土。公元前499年起两次远征希腊，但以失败告终。在国内健全了行政制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改善水陆交通，建立行省制，并尊重帝国内各民族的宗教。——中译者

[6] 查士丁尼（Justinien，483—565年）：拜占庭帝国最著名的皇帝之一。525年获得“恺撒”称号，527年4月与其叔父查士丁共执朝政，号称“奥古斯都”，同年8月查士丁去世后成为唯一的君主。在东方曾与波斯等势力进行战斗，保全了东方各省的完整。又曾在意大利和北非用兵，曾从蛮族手里短时间内收复罗马帝国大片失地。对内大兴公共工程建设，重视法学研究，编纂《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学汇编》，比较完整、系统地保留了罗马法典。——中译者

[7] 聂斯脱利派（les Nestoriens）：基督教的一派，起源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得名于其创始者聂斯脱利（活跃于5世纪上半叶）。431年和451年先后遭到主教会议的谴责，从此脱离教会而另立门户。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各自独立，仅在道义上合而为一。在波斯等地曾非常兴盛，至今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仍有不少信徒。此派7—10世纪在中国相当活跃，被称为景教。——中译者

[8] 伊斯兰教《古兰经》向穆罕默德传达安拉启示的四大天使之一。他即基督教《圣经》中传达上帝佳音的七大天使之一加百列或犹太教信奉的四大天使之一。——中译者

[9] 阿卜-巴克尔（Abou Bakr，约573—634年）：穆罕默德的挚友和首席顾问（622—632年），据说是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男子。穆罕默德死后成为第一任哈里发，任内将阿拉伯半岛中部置于穆斯林控制之下，并长驱直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开始了穆斯林的征服活动。——中译者

[10] 穆安津（muezzin）：意为“宣告者”“宣礼员”，职责是召集穆斯林做礼拜。——中译者

[11] 住棚节（Tabernacles）：犹太教三个朝圣节期之一，开始于赎罪日后第五天，其特殊活动是用树枝搭棚并采集四种植物以示土产丰盛，感谢上帝。节期第七天要用四种植物扎成七重篱笆，称为大和散那。——中译者

[12] 以实玛利（Ishmaël）：《旧约》中的人物，亚伯拉罕与使女夏甲所生之子，后与其母皆被其父驱逐。——中译者

[13] 拉丁文，本意指农民、庄稼汉、乡巴佬，后被用来指异教徒。——中译者

[14] 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约公元前410—前362年）：古希腊政治家、将领。生于底比斯，曾领导底比斯人起义，着力兴建反对当时军事强国斯巴达的同盟，与斯巴达进行了多次战斗，并两度击败它，建立底比斯的霸权。他曾改革希腊的战术常规，为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胜利开辟了道路。——中译者

[15] 欧麦尔哈里发：即欧麦尔一世（OmarI，586—644年）。伊斯兰第二任哈里发。起初反对穆罕默德，后成为其主要助手，并把女儿嫁给穆罕默德。634年继阿卜-巴克尔任哈里发。率阿拉伯军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打伊朗和埃及，使伊斯兰政权从阿拉伯小邦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译者

[16] 贾希兹（al-Jahiz，约776—868/869年）：阿拉伯伊斯兰教义学家、文学家，以独特和精湛的散文著称。其作品现仍可寻。未完成之作《动物书》共七卷，是一部仿亚里士多德风格的动物寓言集，也是一部以动物为题材，加进神学、社会学和语言学议论的阿拉伯文学论著汇编；另有著作《修辞与阐释》和《吝人传》等。——中译者

[17] 塞蒂马尼亚（Septimanie）：位于今法国西南部的古领土，介于加龙河和罗讷河之间及比利牛斯山和塞文山之间。可能得名于罗马第七军团（Septimani）曾在此定居。9世纪时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从历史上消失。英译本直接译为“朗格多克”。——中译者

[18] 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约1460—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1497—1499年首辟由欧洲绕非洲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使葡萄牙得以在印度洋上建立霸权。去世前任葡属印度总督。——中译者

[19] 水手辛巴德（Sindbad le Marin）：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中的巴格达富商，曾进行过七次冒险航行。——中译者

[20] 熙德（Cid Campeador，约1043—1099年）：11世纪西班牙著名的军事统帅，生于卡斯蒂利亚。抗击摩尔人（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的军事统帅、民族英雄，本名迪亚斯·德·玻利瓦尔。曾率军多次打败摩尔人军队，征服并入主巴伦西亚，其业绩被加工渲染，并被写成多种文学作品，如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喜剧《熙德》等。——中译者

[21] 萨赫勒地区（Sahels）：阿拉伯语，意为“沙漠之边”，指撒哈拉沙漠南沿的一条宽广的半沙漠地带，横跨乍得、冈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国。——中译者

[22] 伊本·拔图塔（Ibn Batouta，1304—1368年或1369年）：中世纪阿拉伯最伟大的旅行家，著有《游记》。出身于摩洛哥一穆斯林法官家庭，21岁去麦加朝圣时开始旅行，到过埃及、苏丹、马里、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伊拉克、伊朗、阿塞拜疆、高加索、拜占庭、阿富汗、印度等地，据称曾作为印度素丹的特使到过中国泉州。——中译者

[23] 路易九世（LouisⅨ，1214—1270年）：法国国王，13岁继位。曾率军抗击英国国王亨利三世所率入侵者。1248年参加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进军埃及，损失惨重，其本人也被埃及军队俘获，后被重金赎回。在国内赞助文学艺术。死于第二次征讨北非之时。——中译者

[24] 明格列尔语（mingrélien）：又名梅格列尔语，是一种无文字的语言，通行于格鲁吉亚共和国黑海沿岸地区。它与格鲁吉亚语、拉兹语等同属于卡特维尔南高加索语系。——中译者

[25] 黎凡特（Levant）：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地中海东岸各国的通称，用于指称小亚细亚沿海和叙利亚，有时也包括希腊和埃及之间所有沿海地区。该词与“中东”或“近东”是同义词。——中译者

[26]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oun，1332—1406年）：阿拉伯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后、马基雅维利之前社会科学方面最著名的人物。其家族曾是西班牙望族，后由于宗教原因迁居非洲。主要著作为篇幅宏大的《历史导论》，第一卷为社会学概论，第二、三卷为政治社会学，第四卷为都市生活社会学，第五卷为经济社会学，第六卷为知识社会学。本书也是一部权威的穆斯林北部非洲史。——中译者

[27] 拜拉祖里（Baladhori，？—约892年）：阿拉伯历史学家。其主要著作《各地的征服》，叙述了从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起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历次战争和征服。另著有一部《贵族系谱》。——中译者

[28] 哈伦·赖世德（Harûnal-Rashid，766/763—809年）：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786—809年在位。出生于伊朗德黑兰附近，在巴格达宫廷长大，曾率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按照对穆斯林有利的条件与拜占庭达成协议，并因此获得“赖世德”（意为引导正道者）的称号，担任突尼斯、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诸省的总督。哈里发任内统治一个从西地中海直到印度的大帝国，但其内部变乱频仍。不过，此时纺织、金属制品、造纸等有了巨大发展，贸易规模有所扩大，帝国仍非常繁荣。《天方夜谭》（或译《一千零一夜》）中对哈伦及其宫廷的描写尽管具有神话性质，但也有相当的真实性。——中译者

[29] 马蒙（al-Rashid Ma’mûm，786—833年）：阿拔斯王朝第九任哈里发，961—976年在位也是第一个将希腊哲学介绍到伊斯兰世界的人。任内鼓励人们翻译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创建一所被称为“智慧之家”的学院。力求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达成和解，并试图用更加唯理主义的伊斯兰教义来影响其臣民。——中译者

[30] 查理五世（Charles V，1338—1380年）：法国国王。百年战争中，1356年，为了赎回其被英军俘获的父王约翰二世而召开三级会议，并被迫颁布改革敕令。1364年正式登基，1369年与英国重启战端，屡战屡胜。任内改革军队，创建新海军，实行税制改革，并将卢浮宫改为图书馆。——中译者

[31] 阿里（Ali，约600—661年）：全名阿里·伊比·艾比·塔列卜。出生于麦加，一生追随先知穆罕默德，并与其女法蒂玛成婚，第四代哈里发，656—661年在位。他曾着力去实现伊斯兰教理想中的社会正义与和平，却因教会内部的纷争而受到挫折，并被哈里吉派暗杀。被什叶派尊为第一代伊玛目。——中译者

[32] 卡尔巴拉（Kerbela）：伊拉克中部省份及其省会名称。公元680年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曾在此进行战斗，什叶派领袖侯赛因被杀。在卡尔巴拉市，侯赛因的墓地成为什叶派最重要的圣地和朝拜中心之一。又因该派认为死后葬在这里是通向天堂的可靠途径，当地辟有大面积的公墓。该市为贸易中心和赴麦加朝圣的起程点。——中译者

[33] 阿维罗伊（Averroès，1126—1198年）：最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之一。他把伊斯兰传统学说与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成自身之思想体系。主要著作有《医学通则》《关于宗教法则与哲学之间一致性的论文》《关于宗教教义论证方法的考查》《矛盾之矛盾》和《柏拉图〈共和国〉评注》等。——中译者

[34] 曼苏尔（al-Mansur，709至714年之间—775年）：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一般认为他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真正开创者。754年登基，任内平定内乱，实行各种改革，建立新都巴格达，大力发展官僚体制，为其统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译者

[35] 穆瓦希德（almohades）：原意为“信仰真主独一教义者”。柏柏尔人的一个联合体。曾在北非和西班牙建立伊斯兰帝国（1130—1269年）。1147年征服马格里布，攻占马拉喀什，并定都于此。不久占领阿尔摩拉维德人控制下的安达卢西亚，1172年进驻塞维利亚。13世纪初在基督教联军的压力下退到北非，1269年亡于马里尼德人手下。——中译者

[36] 法拉比（al-Farabi，约878—约950年）：伊斯兰哲学家，阿拉伯世界认为他是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哲学权威。他对伊斯兰教的功绩在于，运用当时阿拉伯人所理解的哲学传统，指明如何运用这种传统解答穆斯林争论不休的各种问题。他认为人的理性先于天启。其著作大都论治国之道。——中译者

[37] 利奥三世（LéonIIIl’Isaurien，约675/680—741年）：拜占庭皇帝，伊索里亚王朝的创建者。曾任皇帝侍从和安纳托利亚军区司令官，战功赫赫，717年自立为皇帝。任内整修君士坦丁堡的防务，击退了穆斯林的进攻。其最大功绩是颁布了一部法典，其中对婚姻和财产的权利做了详细规定，并以断手断足的刑罚代替了过去的死刑。——中译者

[38] 阿维森纳（Avicenne，980—1037年）：原名伊本·西拿，伊斯兰医学家，哲学家中最有名的波斯人，因其在学术上的巨大影响和权威，穆斯林尊称他为“卓越的智者”，西方则尊之为“杰出的医生”。主要著作有《治疗论》《医典》和《指导与评论》等。——中译者

[39] 米哈拉布（mihrab）：意译为壁龛或祭坛，指清真寺正殿纵深处墙正中间指示麦加方向的小拱门或小阁。——中译者

[40] 敏拜尔（minbar）：或译“敏拜楼”，指清真寺殿内的宣教台，形如楼梯。——中译者

[41] 科斯洛埃斯（Chosroès）：伊朗萨珊王朝国王的称号。科斯洛埃斯一世在位时间为531—579年，科斯洛埃斯二世在位时间为590—628年。——中译者

[42] 托勒密（Ptolemee，活动时期为公元2世纪）：古代著名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生平不详。其主要研究成果是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完成的。他所发表的地心宇宙体系即托勒密体系在西方天文学中占统治地位达1300年之久。主要著作为长达13卷的《天文学大成》，分别论述太阳系和恒星的有关天文概念，是对古希腊天文学成果的概括。另著有《光学》和《地理学指南》等。——中译者

[43] 米歇尔·塞维图斯（Michel Servet，1511？—1553年）：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1531年发表《论三位一体论的谬误》，攻击正统教义。1546年把其观点充实，写成《恢复基督教义的本来面目》，并把手稿呈送给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在论述圣灵和再生两者关系时，他在无意中发表了他对人体血液循环的发现。塞氏因其神学见解先是遭天主教的迫害，后在新教的日内瓦被以异端的罪名烧死。——中译者

[44] 金迪（Yaqub Ihnas-Sabah al-Kindi）：伊朗伊斯兰哲学家。所涉猎范围不仅包括亚历山大里亚的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派所关心的哲学问题，而且包括占星术、医学、印度算学、字谜、制剑、烹饪等。据称他有270种著作，其中不少传至今日。——中译者

[45] 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法国作家。他以实证主义研究宗教史，否定天主教的教条。主要作品为《耶稣的一生》等。——中译者

[46] 萨拉丁（Saladin，1138—1193年）：中世纪埃及、叙利亚、也门和巴勒斯坦素丹，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最著名的穆斯林英雄之一。出生于美索不达米亚一个显赫的库尔德人家庭，在大马士革长大成人。1169年任叙利亚军队总司令和埃及维齐尔，接受素丹称号。1171年废黜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1187年大败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拉丁基督教国家，把欧洲人从那里赶走，后来又挡住了狮心理查所率第三次十字军的进攻。——中译者

[47] 帖木儿（Tamerlane，或作Timur，1336—1405年）：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出生于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家庭，兴起于撒马尔罕，先后征服西察合台、波斯、阿富汗、印度，直至小亚细亚，暴卒于东侵中国途中。——中译者

[48] 该书尚无中文译本。英文译本于1958年问世，题为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中译者

[49] 巴布尔（或译巴伯尔，1483—1530年）：印度皇帝，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是帖木儿的第五代直系后裔。原名Zahired-Din Mohammed，Baber是对他的称谓，意为“狮子”。1526年击败印度德里素丹国，占领德里，建立莫卧儿帝国。其《回忆录》是一部世界名著。——中译者

[50] 苏莱曼大帝（Soliman le Magnifique，1494或1495—1566年）：即苏莱曼一世，奥斯曼帝国素丹。1520年继承父位，登基后立即开始对中欧和地中海地区基督教国家的战争，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1526年在莫哈奇战役中大败匈牙利军队。1529年率军围攻维也纳，但因天气等原因失利。1538年在希腊普雷韦扎海域打败威尼斯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由此控制了地中海的主动权。1551年占领北非。又曾与波斯人进行了三次大战。——中译者

[51] 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pha Kemal，1920—1938年在任）：另译基马尔。1881年生于希腊萨洛尼卡，在进入军校后入伍，战功显赫。率领土耳其人民反对“一战”后协约国强加的各项不平等条约，1923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并当选为其第一任总统。任内推行各项改革，如没收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废除哈里发制度、革除一切男尊女卑的传统、推广土耳其文字等。1933年被土耳其国民议会授予“土耳其国父”（Ataturk）的称号，1938年病逝。——中译者

[52] 突雷尼语族（Touranien）：是一个假定的语族，包括非印欧语系或闪含语系的几乎所有亚洲语言。——中译者

[53] 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年）：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著名领袖。1834年在皮蒙特参加起义，后流亡南美。1848年回国参加意奥战争，维护意大利的民族独立。同年底，率军进入罗马城。曾组织罗马保卫战，与境外势力进行斗争。1860年组织红衫军，占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南部，为意大利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中译者

[54] 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年）：法国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著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和《当代法国的由来》等。——中译者

[55] 卡赛姆（Abdul Karim Kassem，1914—1963年）：伊拉克高级军官，讨厌君主政权及其亲西方政策。1958年初推翻君主政权，建立伊拉克共和国，并任其首脑。他与1958年初联合埃及和叙利亚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纳赛尔发生了冲突，后者的支持者在伊拉克发动了叛乱、兵变，并最终于1963年2月把他杀死。——中译者

[56] 布尔吉巴（Harib Bourguiba）：突尼斯独立的缔造者。1902年出生。早年受过阿拉伯和伊斯兰良好的教育，后又接受了西方思想。20世纪30年代起领导突尼斯人民进行独立斗争，反对法国统治者，推行其号称“布尔吉巴主义”的渐进政策。1957年共和国成立后任总统，三次连任。任内进行各项改革。1975年成为终身总统，1987年被废黜。——中译者

[57] 拉芒什（La Manche）：法国人对英吉利海峡的称呼。——中译者

第二部分 黑色大陆

第八章 历史

黑非洲，或者可以说很多个黑非洲，几乎完全封闭在两个大洋和两块沙漠之间：北面是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南面有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西面有大西洋，东面有印度洋。这一切构成了严重障碍，尤其是非洲台地与相邻大洋之间的通路困难：那里没有良港，又因为急流、瀑布和港口泥沙淤积，没有易于通航的河流。

但是这些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印度洋上很早就行驶着利用变换的季风作动力的帆船；大西洋已经为欧洲人自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Les Grandes Découvertes）所征服；卡拉哈里沙漠通往南方的大门仅仅关闭了一半；至于撒哈拉沙漠，自古希腊罗马时代早期就已经有人在穿越；纪元之初北非单峰驼的到来大大繁荣了撒哈拉地区的贸易：来自北方的有盐，很晚之后还有纺织品；来自南方的有黑奴和金砂。

总的来说，黑非洲对外部世界不够开放，而且开放的时间非常晚。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它长久以来紧闭门户，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里，大自然虽然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统治一切，但并不是唯一发号施令的人：历史经常有话要说。

空间

·不能让地理决定论独自主宰一切，对只占非洲大陆一小部分的黑非洲的边界和边缘地区进行初步研究，便表明了这一点。

（A）在北部、东北部和东部，撒哈拉沙漠这密不透风的障碍成为黑色世界的特殊边界。

正如欧洲共同市场的某个委员会在标题中所述，黑非洲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从地中海沿岸直到苏丹的撒赫勒（Sahel），这部

分非洲的居民属于白种人。无疑还应该把埃塞俄比亚列入白种人的非洲，因为埃塞俄比亚人具有不可否认的白种人特征，这些特征已融合在迥异于真正的黑肤色非洲人种的杂交人种里。尤其是，从它的文明、它信奉的基督教（始于公元350年）及其农业的性质——既掌握了畜牧技术，又会使用原始的摆杆步犁，会种小麦和葡萄——来看，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民族，过去曾在被伊斯兰世界包围之后，击退了伊斯兰的入侵。而在此之前，欧洲人将穆斯林隔离在红海和印度洋之间。

史前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们甚至认为，在远古时代，埃塞俄比亚是传播摆杆步犁和家畜驯养的次中心，最大的发明中心是印度。没有这个中介，畜牧是个不可想象的特权，如此多的黑皮肤农民将只会在泥泞中摸爬滚打。

实际上，不是存在一个以埃塞俄比亚为中心的名为东部非洲的广阔地区吗？这个地区北起尼罗河地区（直到第六瀑布），东至索马里沙漠，南至肯尼亚，甚至更靠南的地区。它是非洲的中介地区，既非白也非黑，而是二者兼备，既像白非洲一样有自己的文字（进而有自己的历史），又有与来自北方的辐射中心相连的文明，在亚洲、地中海和欧洲的巨大冒险中发挥了自己无可辩驳的作用。最终人们会看到，撒哈拉由厄立特里亚（Érythrée）和索马里人扩展至埃塞俄比亚以东，即一条干旱而孤立的漫长地带，这同样标明黑非洲的界线。

（B）在南方，长久以来，历史事件阻止了并将继续阻止黑非洲的扩张。17世纪，荷兰人想在通往印度的途中建立一个停靠港，他们在大陆最南端一个相当空旷的区域停下了脚步；英国人在1815年夺走了这个战略位置；荷兰移殖民即布尔人（les Boers，意为农民）很快向北方迁移，到达了草木茂密的高原（Veld），在那里开始建立繁荣的畜牧农场。

就像在大陆北端一样，白非洲逐渐在南方成形。白非洲因金矿、钻石和工业而繁荣富足。尤其是，为了与黑人人口增长的势头（那里有300万白人，1000万黑人，150万混血儿）相抗衡，南非联盟顽固地执行极端的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种族隔离），导致它中断了与英联邦的联系（1960年）。这是一个插曲，还是决裂？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歇的，它自己不能驻步不前。

（C）最后一个例外，同样也是历史性的例外，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不应该算是黑非洲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它的人口由两部分组成：来自近大陆的班图黑人和从东部随几次人潮迁徙来的马来部族。马达加斯加的许多居民是这两种人的混血，但仍可以说，岛的西部主要是班图人的地盘，东部主要是马来人的天下。根据尚不很完备的研究，该岛大部分人都是混血。印度尼西亚人[1]和非洲人的比例为1:2，非洲血统占优势。

但是，人种的差异与文化的和谐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极度统一的文化中，印度尼西亚文化[2]更为突出。马达加斯加语是印度尼西亚语，农业和手工技术无疑也都来自印度尼西亚："烧荒，长柄锹的使用，水稻、芋、薯蓣、香蕉的种植，狗、黑色猪、家禽的养殖……捕猎抹香鲸、乌龟，有叉架的独木舟，投掷捕猎，吹管捕猎，投石捕猎，镶贝壳的席纹编制家具……"航海者们应该是来自北方，而不是直接过来的。证据（虽然很脆弱，却还是证据）之一就是，马斯卡林人（Mascareignes）的留尼汪岛（Réunion）、莫里斯岛（Maurice，即毛里求斯）和罗德里克岛（Rodrique）直到17世纪仍荒无人烟，而这些岛屿可以说是东印度群岛（Insulinde）和马达加斯加之间直航的必经之路。

总之，印度洋的历史和文明征服了马达加斯加，使它与非洲大陆剥离。但这一岛屿在地理位置上与后者相邻，致使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与非洲的命运越来越紧地联结在一起。

·要了解黑非洲，地理原因比历史原因更应受到重视。如果说地理因素并不能代表一切，不是唯一的因素，那么它是诸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气候解释了为何随之而来的是辽阔的植物带，那里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同的生命物种。

在西部，赤道的雨水存留在原地，形成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近似于处于同一纬度的亚马孙森林和印度尼西亚森林。

这就是"森林海绵，积洼的水，大片茂密的参天森林，相互绞缠的林下灌木，阴暗无声，抵御着一切开发的企图，抗拒着人类的建筑，甚至是交通，除却河流构成的通道；仅靠渔猎维持的脆弱、孤独的生命区"。这正是非洲俾格米人的避难之所，这些尼格利罗人的幸存者可能是非洲最早的居民。

这片森林向赤道以北地区扩展的面积要大于向以南地区的扩展。它北以几内亚海湾为界，从利比里亚一直蔓延到喀麦隆。我们的地图中部标明的阻断地区在达荷美（贝宁）南部，那里是生长着树木和棕榈的萨王纳（savanes，稀树草原地区）。在其东面，赤道森林在刚果盆地消失不见了，那里是东部非洲高地的边缘。

在广袤的热带雨林的四周，热带森林的树种呈现依干旱程度递减的趋势，随后是草木茂盛的热带萨王纳（那里生长着高而密的草和树丛），以及沿水流形成的灌木林，再后是裸露的萨王纳，最后是大草原。



阿尔及尔
波尼
卡萨布兰卡
奥兰
突尼斯
马格里布
亚历山大里亚
天然气
开罗
石油
铁
铜
撒哈拉
北回归线
石油
阿斯旺
达喀尔
萨哈勒灌木
塞内加尔河
铝矾土
锡
尼罗河
科纳克里
铁
苏丹萨王朝
几内亚森林
埃代阿
刚果河
石油
赤道
刚果森林
奎卢
因加
利奥波德维尔
大西洋
印度洋
伊丽莎白维尔
森林
萨王纳
铜
工业中心
大坝：已建或计划中
地中海植物
沙漠
灌木
萨王纳
稠密森林
灌溉作物
加丹加
卡里巴
铁
煤
纳塔尔森林
铜
卡拉哈里
约翰内斯堡
煤
奥兰治河
煤
德班
东伦敦
开普敦
伊丽莎白港
0
1500千米

图7 非洲的多样性：地理

从人的方面考虑，那里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地区：两地都有雨季和旱季的交替，一个是畜牧带，另一个没有畜牧业（由于舌蝇的存在）。在黑非洲，畜牧带是最有生命力的地区。在黑非洲各个地区，农耕靠的都是锄头。动物实际上没有被用作耕地的帮手。人们种植的作物有黍、高粱、薯蓣、玉米和稻子等，尤其是用于出口的棉花、花生和可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还有橄榄油——它尤其是尼日利亚的财富之一。

总之，饲养家畜区域的生活方式与不饲养家畜区域的生活方式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北部和东部——拥有畜牧业的外部地区——最为富有，发展最为平衡，相当长的时期里对外部世界也最为开放，成为历史的辽阔舞台。

乡村空间的这种划分与人种的划分交织在一起。稍有理智，就不要相信美洲黑人属于唯一的同一人种的说法，一刻都不要。非洲人可以粗粗地划分为四组：俾格米人智力发育迟缓，没有开化（他们语言的发音几乎说不清晰）；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存在着小股的古老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即霍屯督人，Hottentots）和桑人（Saan，即布须曼人，Bushman）；从达喀尔（Dakar）到埃塞俄比亚的苏丹人；从埃塞俄比亚至南非的班图人。

苏丹人和班图人是其中两个最大的群体，他们都具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化。班图人可能起源于非洲的大湖地区，凝聚力比苏丹人还要强。但是，或者是由于历史的变故，或者是缘于地区的差异，两个群体内部都存在着许多有着极大的深层差异的民族。就苏丹人而言，同样存在着与信奉伊斯兰的民族和闪米特人杂交的现象，尤其是考虑到摩尔人和伊斯兰化的柏柏尔富拉尼人（Peuls berbères）的渗入，这些人一开始是游牧民族，后来越来越成为定居民族。

黑非洲详细的人种分布图使所有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实际经验基础上的理论说明失去了根据：它显现的是没完没了的冲突、运动和迁移，一部分人向前推进，一部分人则向后退。由此产生了人们在黑色非洲大陆到处可以看到的人种混合与紧张冲突；无论在遥远的古代还是刚刚逝去的昨日，一波又一波的民族浪潮或者重叠交织在一起，或者彼此争斗。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可靠的。弄清所有这些移民潮，它们的日期、方向和速度等，是件非常迷人的事。对于目标明确而勤奋的调查者来说，没有不可能办到的事，因为“一个村庄的居民不知道其共同体的创始者来

源于哪一村庄”是不可能的。

在北纬12度至15度之间苏丹人的移民地带内，紧张的状态可能最为严重，更为尖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被称为古黑人（他们是除俾格米人外最古老的人种）的难民的迁徙。他们是原始的采集狩猎者和热衷于耕种经常是极度贫瘠的山地的农民。他们通过采用密集种植的方法，成功地保持了每平方千米50人甚至更多的人口密度。他们通常占据着易守难攻的险要位置。多贡人（Dogons）是这些有着深堑壁垒的人种中最靠北的，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非洲所有的那些所谓“赤裸民族”——“几内亚的科尼亚吉人（Coniaguis）和巴萨里人（Bassaris），象牙海岸的博博人（Bobos）和洛比人（Lobis），现代加纳的南坎塞人（Nankasas），多哥-达荷美（贝宁）的卡布雷人（Kabrei）和松巴人（Sombas），尼日利亚的法比人（Fabis）和阿格尼人（Agnus）”——也都是如此。这些种族集团规模都很小，在地图上仅仅是个小黑点。

赤道森林和撒哈拉之间，在地图上大些的色块里，还应该提到图库勒尔人（Toucouleurs）、曼丁哥人（Mandingues）、巴姆巴拉人（Bambaras）、豪萨人（Haoussas）、约鲁巴人和伊博斯人（Ibos），最后两个人种构成尼日利亚的两个主要的民族；尼日利亚是黑非洲最富有和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独特的、从不与别的文化重复的文化。这种差异性使非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一个地点到任何一点，其经验在很大的程度上因民族的不同而永远会有巨大的差异，让人难以想象这些民族之间会有一个共同的未来。“非洲原住民躲避外来统治的避难场所，非常常见的是在最为发达的首府附近。”

总之，从黑肤色的苏丹人到肤色稍浅，或者说是黄肤色的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肤色的不同只是人、社会和文化更为根本性的差异的人类学、生理学的符号。

·这片大陆曾经和正在忍受着多种资源的匮乏与总体的严重不足的困扰。

把这些困扰全部列举出来，或者说明它们是如何随时代的变迁变得更加严重，或者有所减缓，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曾经提及黑色世界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不畅，这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因为一切文明的进步因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系而更加顺利。这种相对的封闭性说明为什么在

欧洲人的到来和大规模殖民运动开始之前会出现（又一次）无法补足的严重空白。轮子不为人所知，摆杆步犁和役畜也是这样；至于文字，除了严格地讲并不属于黑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很早就伊斯兰化了的东部沿海各国以及苏丹国家（其文字源起于不久它们就采纳的伊斯兰教），同样不为人所知。

仅这些例子便足以证明，非常常见的情况是，外部影响只是一点一滴渗透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广阔非洲。

古代埃及的法老对黑色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一直有人在讨论，但至今仍未解决。这个问题同样表明了这一点。人们在加蓬（Gabon）发现了玻璃珠，在扎伊尔（原比属刚果）东南部的马隆加（Malongue）发现了奥西里斯神（Osiris）的一尊雕像，在赞比西河以南地区又发现了另一尊。这些虽然都是很脆弱的证据，但毕竟揭示了某些关系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广泛的艺术领域和技术方面（诸如失蜡浇铸法）。

然而，我们应该承认，外来植物可能是在相当晚的时期后传到非洲的，比如远东的水稻、玉米、甘蔗、木薯等。它们在古代黑非洲可能尚不为人所知。

非洲还有其他薄弱之处。其中之一是可耕地红土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稀土层的鲜红，这一土层厚而松散）浅（不过这并不能解释一切问题）；另一个是气候的限制，每年田地可以耕作的时间较短；第三个则是多数人的日常饮食中缺少肉类。

在非洲大多数部落中，只有在大型节庆时才可以吃到肉。肯尼亚的基库尤人（Kikayous）农民在田地粗放饲养的绵羊和山羊是留作牺牲祭祀和公共典礼用的。基库尤人靠游牧为生的邻居，即马赛（Masaïs）牧民靠其牧养的家畜为生，但这些生灵太珍贵了，一般情况下舍不得杀食。被视为强壮和生殖力之源的肉类食物在黑非洲各地都非常稀少，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对象，俾格米人的下述这首狩猎歌曲就丝毫不加掩饰地表露了这一点：

在别无他人前往的森林，

猎人提起心来，滑翔，奔跑，跳跃，

肉，就在你的面前，那巨大的快活的肉啊！

像山丘一样在移动，

肉，令人热血沸腾，

肉，就要放在你的烤炉上，

肉，牙齿即将深深地咬噬，

肉，诱人而鲜红；血，热气腾腾引人饮。

然而，我们不要过分强调黑非洲的这些不利因素。首先，黑非洲在古代取得的进步，其速度之快丝毫不逊于史前欧洲的进展。它显著的成功不仅表现在艺术方面，不仅体现在贝宁（11—15世纪）令人赞叹的青铜器艺术和象牙雕刻艺术方面，以及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的用不同植物纤维织就的布料方面。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非洲很早就有了冶金术，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了铁。说黑非洲人是在葡萄牙人到达博哈多尔角（Bojador）后才知道铁的存在，这是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的。他们很早就知道了铁制武器。罗得西亚人（Rhodésien）的冶金术早在中世纪就达到了完美程度。2000多年以前，上尼日利亚可能就已开始使用锡。最后，一个有说服力的细节是，人们经常提到黑非洲社会存在一个强大和令人惧怕的等级集团，即铁匠的组织，这无疑是与非常古老的传统相联系的。

黑非洲的过去

黑非洲悠久的过去不为人所知，就像其他所有类似民族一样，他们没有文字，其历史仅靠口头文学、考古研究和其他来自外来世界的偶然的证据才流传至今天。

然而，尽管黑非洲的历史模糊不清，但仍可以看出三个系列的事实来：

（A）村庄、王国、帝国，这一切的飞速发展都与文明和血统的交相混合有关。

（B）黑奴贩卖古已有之，但16世纪以来以惊人的速度急速增长，因为美洲大陆的开发，对于欧洲自己来说，是一项过于沉重的使命。

（C）最后，欧洲突然插手这里。柏林会议（最后的文件完成于1885年）之前，这片广袤的大陆还没有理论上的主人，几乎仍不为人所知。此后，欧洲中止了在地图上瓜分它的行为，而开始对它进行全面彻底的殖民。

·在黑非洲，历史只在下述地区呈现出高级的政治和文化形式：一方面，是农业与畜牧业资源相结合的地区；另一方面，是与外部保持接触的地区，或者是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地带，或者是印度洋沿岸。正是在这些地区，古代帝国和古代城市曾繁荣一时。

就这样，一个独特的非洲突现出来。它的过去，它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社会和文化，较之于一个从历史角度而言不甚为我们熟悉的“间歇的”非洲，显得相对出名。至于撒哈拉地区大西洋沿岸的原住民，一位葡萄牙探险家在15世纪曾轻蔑地说：“他们甚至没有国王。”这样就存在着两个非洲：一个是有国王的非洲，其历史并非完全不为人熟悉；一个是没有国王的非洲，其历史已被遗忘吞噬。

因而，黑非洲沿着其两个与伊斯兰世界有联系的外缘发展起来。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并不总是和平与两情相悦的，而是经常掺杂着殖民——尽管只是通过殖民活动黑非洲才能够呼吸到外部世界新鲜的空气。

最初的一缕晨曦照在非洲的东海岸。非洲从基督纪元之前数百年就已经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半岛有了往来。但是，只是随着7世纪穆斯林的第一次扩张，阿拉伯和波斯与非洲东海岸之间才建立了经常的联系。自648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贸易市镇：摩加迪沙（Mogadiscio）、索法拉（Sofala）、梅林德（Mélinde）、蒙巴萨（Monbasa）、布拉瓦（Brava）、桑给巴尔（Zanzibar），由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拉伯人于739年最后建成，基卢瓦（Kilva）则是由波斯设拉子的“设拉子人”（Chiraz）在10世纪建成的。

这些城市因为奴隶、象牙和黄金贸易而经历过相当的繁荣。索法拉辽阔的内地盛产黄金，麦斯欧迪（Masudi，916年）[3]和伊本-瓦迪（Ibn al-Wardi，975年）等阿拉伯地理学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采金地和矿山的位置似乎在赞比西河（Zambèze）和林波波河（Limpopo）之间的马塔贝莱（Matabelé），可能还有现在的德兰士瓦（Transvaal）地区，虽

然很多人不支持这个观点。这里出产的既有金粉，也有金片。多亏了季风，所有这些交易都与印度有联系，从那里进口的有铁和棉花。

这些城市里居住的主要是非洲人，只有极少部分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另外，它们与印度半岛的联系要比与阿拉伯半岛的联系紧密。这种紧密关系一直维持到了15世纪。但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仍停留在前货币状态，实行的是物物交换，至少与非洲内地的贸易是这样。尽管如此，非洲内地从中没有少获利。虽然相隔遥远，它拥有像南罗得西亚（Rhodésie du sud，即今津巴布韦）的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王国（Monene Motapa意为“大矿产主”）那样的政治结构。应当承认，我们对这一王国的了解远比其声名显示的要少：据说它在17世纪被罗齐人（Rowzi）的姆博（Mambo，意为“君主”）毁灭。

人们过去曾经认为，瓦斯科·达·伽马大航行之后（1498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地位的确立，给了南部非洲沿海城市的贸易致命的一击。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半阿拉伯半非洲的文明继续广泛影响着沿岸城市没有设法征服的这片内陆地区。肯尼亚和坦噶尼喀（Tanganyika）沿海地区的废墟，过去人们还将之上溯至中世纪，但实际上是在17世纪、18世纪，甚至19世纪才出现的。让我们回忆一下能说明这些城市特点的一个细节：中国青花瓷器在那里被普遍使用。

位于尼日尔河湾地区的诸帝国是另一个与伊斯兰世界有着繁忙而富有成果的联系的地区。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在基督纪元之初，随着单峰驼的足迹到达北非和沙漠小径之中，与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的接触越来越多，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贸易的增长（黄金和奴隶），以及越来越多的沙漠商队的前来，致使白非洲（即闪含语系的非洲）进入了黑非洲地区（阿拉伯人称之为Ble des Soudan，意为阿拉伯苏丹的穷乡僻壤）。

这些帝国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是加纳（Ghana），大约建成于公元800年（与查理大帝属于同一时期）。它的首都也叫加纳，地处巴马科（Bamako，现属马里）以北340千米的昆比萨利赫（Kumbi Saleh），位于撒哈拉沙漠的边缘。该城市以其富庶广为人知。它是由来自北方的白种人建立的吗？很有可能。总之，它很快成为黑肤色民族索宁凯人（Soninke）的财富；索宁凯人是曼德人（Mande）的一个分支，曼德人又属于曼丁哥人的一部分。由于受到穆斯林的进攻，加纳城于1077年陷落被毁。

但是，因为黄金交易仍在继续［从塞内加尔（Sénégal）、贝努埃河（Bénoué）和上尼日尔河的采金地开始］，另一个帝国很快取而代之。它的地理位置略微偏东，为曼丁哥人所控制，信奉伊斯兰教。这就是马里帝国（Mali），它扩展到了整个尼日尔湾。在曾去麦加朝圣的坎坎·穆萨（Kankan Musa，1307—1332年在位）统治时期，无数的商人和文人蜂拥到尼日尔河两岸。马里首都廷巴克图（Tombouctou）是那时有影响的都城，游牧的图阿雷特人（Touaregs）经常光顾这里。他们后来占领了该城，此为帝国覆灭的一个原因。

而后，另一股向东的新的推动力给桑海帝国（Songhaï）带来了繁荣。桑海有两个都城，一个在加奥（Gao），一个在廷巴克图。这个帝国得益于它与昔兰尼加（Cyrénaïque）的联系，同时也得益于桑尼·阿里（Sonni Ali，1464—1492年在位）的赫赫战功。桑尼·阿里无疑是黑非洲所有帝国建造者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个正统的伊斯兰信徒，但他的继任者败于篡位的穆罕默德·阿斯基亚（Muhammad Askia）之手，标志着伊斯兰教在这一新帝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尽管如此，尼日尔湾地区各帝国的辉煌时代还是结束了：葡萄牙人发现的大西洋海路成为向外输出黑非洲黄金的一条新通道。它虽然没有完全取代撒哈拉的贸易，但大大削弱了它的规模。正是在这种普遍衰落的情况下，1591年，西班牙背教者率领的一支摩洛哥远征军攻陷了廷巴克图，消灭了桑海帝国。摩洛哥素丹穆莱·艾哈迈德（Moulay Ahmed）因为这一成功而获得了“胜利者”（El Mançour）和“镀金者”（El Dehbi）的称号。不过，远征队的组织者们原以为会征服一个神奇的黄金之国，结果大失所望。苏丹对这些贫穷的国土仅保留了名义上的和遥远的统治地位，那里自1612—1750年至少有120个帕夏，他们不过是摩尔人驻军手中简单的玩偶。摩尔人挑选帕夏，如果需要，随时可以把他们换掉。

实际上，18世纪时，尼日尔河流域各国的政权由游牧民族与塞古（Segou）和卡尔塔（Kaarta）的班巴拉人分享。大型帝国的时代结束了。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是它光辉而早熟的霸权地位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唯一源泉。它们随着贸易的消失一起消失了。

因而，这些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让我们产生幻觉：它们纯粹是个例外，而不是通则。黑非洲其他国家很少有过如此的辉煌。比如贝宁，自11世纪开始引人注目，15世纪达到一定程度的艺术上的完美，但它的疆域实际上非常有限。大致说来，它不过是在几内亚湾和内陆高原之间茂密的热带雨林中开出的一条崎岖的通道，没有任何好的规划。贝宁处于

约鲁巴地区，地处尼日尔三角洲和今天的拉各斯（Lagos）城之间，属于一个很早就城市化了的地区。

贝宁的名声远远超出了它的疆域。它还具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即很早就通过北方的道路与开罗的艺术家和富裕的客户，后来又和葡萄牙人有了接触；由此而来的另一个优势就是，通过这些接触，它成为非凡的象牙雕刻和青铜铸造的艺术中心。贝宁王族乏味的历史无法解释这一非凡的、奇妙的成功。我们不妨听听非洲学家保罗·梅希叶（Paul Mercier）的解释。他认为，贝宁的成功在更大的程度上归因于约鲁巴地区人口极度稠密，归因于贝宁的城市结构，最后还有气候条件提供的良好的可能性。这里濒临几内亚湾，一年有两个雨季（阳光两次直射这里），因而每年可以收获两次而不是一次。这不是很可能的吗？

·黑奴的贩卖：毫无疑问，始自15—16世纪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黑奴贸易的发展。虽然官方明令禁止，这种贸易在北美却一直持续到1865年左右，在南美持续时间甚至还要长些。而在沿着红海至东方的通道地区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

黑奴贩卖并不是欧洲的一个可恶的发明。伊斯兰世界在与黑非洲接触很早的时期，就通过尼日尔和达尔富尔（Darfour）之间的地区并经由其在东非的市场，首次大规模地进行奴隶贸易。顺便说一句，它进行奴隶贸易的理由与后来效仿它的欧洲竟然一模一样：缺少人力去完成许多工作。但奴隶贸易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影响着所有处于原始阶段的社会。而且，虽然当时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但无论奴隶制还是奴隶贸易都不是它的发明。

黑奴贩卖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献档案（比如在欧洲和新世界的商业档案中），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有关数据和长串长串的价目表。这种簿记的历史本身并不令人愉悦，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它使人对这种贸易的规模有了必要的感受。

在16世纪，每年运到美洲的黑奴在1000—2000人之间；到了18世纪，是1万—2万人之间。最多的一年是5万人，出现在19世纪这种贸易就要被禁止的时候。这些是一些大致的数字，世界各地有关输入到新世界的黑奴的总数也是如此。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P.兰松（P.Rinchon）的估计数字：大约1.4亿。这一数字比莫罗·德·若那（Moreau de Jonnès）1842年的估计（1.2亿）要高，但比人口学家卡尔·桑德斯（Cari Saunders）的估计数字要低。桑德斯估计的数字是接近2亿大关，这可能

走得太远了。按照他的估计数字计算，在公元1500—1850年的350年里，平均每年有6万名黑奴被运到美洲。即使运输条件适宜，这一数字与事实似也不合。

另外，我们还必须清楚，黑人离开非洲的人数与到达美洲的人数是有区别的。部分是由于掳获奴隶的环境，部分是由于航行中异常恶劣的条件，死亡的黑奴很多。因而，仅就奴隶贸易而言，欧洲人造成的破坏无疑大大高于上文列举的数字。奴隶贸易致使黑非洲损失了大量的人口。

更具有灾难性的是，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奴隶贸易仍在继续，而且在18世纪末甚至有所增加。来自达尔富尔的商队一次可以把1.8万—2万名奴隶带到开罗。1830年，桑给巴尔的素丹宣称一年向3.7万名奴隶征税。1872年一年，计有1万—2万名奴隶离开萨瓦金（Souakim）前往阿拉伯半岛。初看上去，伊斯兰世界奴隶贸易影响的人数比欧洲奴隶贸易大得多，因为后者因航程遥远、船舶运量有限和禁止奴隶贸易的立法本身而有所限制。禁止奴隶贸易的立法在19世纪曾数次颁布，这一事实本身即证明，尽管遭到禁止，尽管非法贩卖要面临种种困难，奴隶贸易仍在继续。

1877年V.L.卡梅隆（V.L.Cameron）估计，每年经由北非和东非输入到伊斯兰世界的黑奴在50万人左右，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非洲每一个毛孔都在流血。"我们只能有保留地接受他的这个数字，但黑奴被输送的范围肯定非常广泛，非洲在人力方面的损失无疑也大得惊人。

这样一来问题产生了：黑非洲人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增加出生率来弥补这一灾难性的亏空？

公元1500年前后，包括白色非洲在内，非洲的总人口在2.5亿—3.5亿之间。当然，这是一种历史的估计。到公元1800年，非洲至少有10亿人。因而，尽管奴隶贸易造成非洲人力大量外流，但其人口仍有所增长。正是不断增长的人口才使得可怕的黑奴贩卖活动成为可能。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奴隶贸易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假说。

坦率地说，欧洲奴隶贸易是在美洲不再迫切需要奴隶的时候停止下来的。欧洲人向新世界的移民，19世纪上半叶发生在美利坚合众国，19世纪下半叶发生在南美，替代了贩卖黑奴贸易。

从维护欧洲的颜面起见，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在欧洲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些反应，即对黑人奴隶制表示怜悯和感到义愤。这些反应并不仅仅局限于口头上，因为它们在英国最终以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掀起的解放黑人和废除奴隶制伟大运动为顶点。

我们无意宣称两股奴隶贸易（一股朝向美洲，一股朝向伊斯兰世界）中哪一股更为人道——或更不人道，但可以进一步指出这样一个对现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也就是说，在新世界至今仍然存在着黑人社会。无论在北美还是南美，强大的种族集团都有所发展和存续着。而在亚洲或伊斯兰世界，却找不到任何这类流亡异域的非洲社会。

·这里并不是谴责，更不是赞扬欧洲在非洲殖民活动的场合，而只是要指出，殖民活动与文明之间几乎所有的文化接触一样，既产生积极的文化影响，也产生消极的文化影响。

殖民活动是丑恶的：它既涉及种种暴行，也涉及许多荒谬绝伦之事，比如用几匹布或少量的酒换得大片的领土。我们无意为这类事端进行辩护，但应当承认，殖民的冲击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甚至最终对遭受殖民的黑非洲人本身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对欧洲来说，在1885年柏林会议的决议最终通过之后，向非洲殖民是最后一次大型海外冒险。如果说这种姗姗来迟的接管维持时间不长（持续不到一个世纪），但进展非常迅速，而且发生在欧洲和世界经济全面扩张的时代。

与黑非洲交往并侵略它的是一个拥有各种现代通信和行动工具、发达的和苛求的工业社会。非洲本身则善于接受新事物，甚至比近来人种学家所认为的还要灵活变通：它有能力抓住西方提供的物品与措施，对它们加以重新阐释，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并在一有机会满足其传统文化的需要时与它们抗衡。

在南非，班图世界被同化的过程，与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同样，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迅速和剧烈。即便在那里，按西方方式生活的受过教育的黑人（le Noir évolué）仍维持其自过去承袭下来的传统不放，哪怕这仅仅涉及婚姻、家庭，兄弟、长子或幼子的地位等。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给新娘父亲的嫁资现在是用现金支付的，但计算的方式是牛的头数，以与过去的习俗相合。


突尼斯
摩洛哥
伊夫尼
西属撒哈拉
利比亚
埃及
毛里塔尼亚
马里
尼日尔
塞内加尔
冈比亚
沃尔特
乍得
苏丹
法属索马里角
几内亚
几内亚
比绍
尼日利亚
象牙
海岸
加纳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塞拉利昂
利比里亚
多哥
达荷美（贝宁）
索马里
扎伊尔
乌干达
赤道几内亚
加蓬
刚果
肯尼亚
卢旺达
桑给巴尔
布隆迪
坦噶尼喀
科摩罗群岛
安哥拉
北罗得西亚
莫桑比克
马达加斯加
南罗得西亚
西南非
（纳米比亚）
贝专纳兰
（博茨瓦纳）
南非共和国
斯威士兰
莱索托
卡萨布兰卡集团
非洲统一组织
蒙罗维亚集团
非洲国家组织

图8 非洲及其内部的多样性

在国家的多样性之上，在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松散的联系。

至于殖民活动的积极影响，我们指的不是纯粹的物质方面的好处，比如铁路、公路、港口和堤坝等，或者殖民者在很大程度上为了自己的利益建立的那些开发土地和底土（sous-sol）的制度。这一遗产尽管在有些时候看上去重要，但如果那些接受它的人现在在痛苦的殖民考验中没有同时掌握合理地使用它的能力，就不会有多大用处，存在的时间也不会长。教育以及某种水平的技术、医药卫生和公共管理，这些都是殖民者留下的最大好处，同时因与欧洲接触而被毁灭的旧的部落、家庭和社会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恢复，非洲的整个组织和文化都建立在这些习惯之上。人们永远无法说出诸如雇佣工资、货币经济、文字和土地私有制等新兴事物的全部后果。它们每一个无疑都是对旧的社会制度的一个打击。不过，这些打击不是现在发生的变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吗？

·另一方面，殖民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把非洲区分为一系列区域——法语区、英语区、德语区、比利时语区和葡萄牙语区，这一分裂状况在现在永久化为过多的独立国家群，也就是人们时常说的非洲的“巴尔干化”。

这些区分有些是人为的，有些是地理上的，很少是文化上的。但这是无可救药的坏事吗？它们可能严重妨碍了某些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至少是建立一个非洲共同市场）的观念的实现。但目前尚无法肯定非洲是否已做好了实现政治统一，甚或文化统一的准备。分裂非洲大陆的不仅有旧的殖民地行政区划和边界，而且有种族的、宗教的和语言的分歧。现今民族国家分割的主要弱点在于它们与文化边界连起来。但我们能够期望它们在一百多年前做到这一点吗？


毛里塔尼亚
马里
尼日尔
塞内加尔
沃尔特
（布基纳法索）
乍得
法属索马里角
冈比亚
加纳
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
塞拉利昂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象牙海岸
多哥
达荷美
（贝宁）
索马里
乌干达
肯尼亚
刚果（布）
加蓬
刚果（金）
卢旺达
桑给巴尔
坦噶尼喀
科摩罗群岛
北罗得西亚
马达加斯加
南罗得西亚
博茨瓦纳
斯威士兰
巴苏陀兰（莱索托）
与欧洲共同体相关的国家
英联邦国家

图9 非洲与西方

在讲法语的旁边是讲英语的非洲，这一非洲更为分散一些。经济的联系反映了这些文化联系。

殖民的另一更应遭到指责的地方在于：在为黑非洲人提供现代国际通用语言这一有益工具时，它实际上耍了一个很坏的花招，即向他们提供了至少两个这种工具：法语与英语。值得担心的是，一种语言在构筑教育和思想习惯并打下自己的烙印时所带来的一切，都倾向于使非洲实现统一的各种努力化为泡影：它把非洲分裂为两个营垒，即说英语的非洲和说法语的非洲。现在看来一个非洲吞噬另一个非洲是不可能的，比如说英语的非洲在人数上具有的优势会压倒说法语的非洲，它在文化上的力量更强，在更长的时间里享有一种有效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产生了政治和行政结构，此为成功的最好保证。

就非洲统一的未来而论，令人遗憾的仍然是，在所有那些已经过于慷慨地授予其历史和地理的所有这些因素之上，又添加了这一重要区分。

第九章 黑非洲：今天与明天

从文明研究的角度来说，黑非洲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它们在近年大都获得了独立。对黑人传统的“自豪感”（négritude），或者寻找土生土长的根源，亦即所谓“一种正在形成的人文主义”，已开始特别向人陈说非洲的价值和可能性。非洲人急不可耐地寻求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这一历史不得不化零为整地缀合起来，甚至几乎是创造出来。凡此种种赋予非洲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即它是一个处在充分而迅速发生变化之中的文化世界。对来自外部的观察家来说，它提供了从最古老到最现代、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文化类型。它还包含了文化适应的所有阶段。

非洲的苏醒

所有非洲专家看来都同意下面这一点：他们对非洲人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对非洲人强大的同化能力和可做楷模的忍耐力充满信心。如果他

们不得不孤独地旅行，越来越孤独地旅行，那么所有这些都是必需的。这一漫长的道路将会把他们从依然非常原始的经济，引导到充分发达的经济，从一种依然诱人的传统生活，引导到变革必然带来的种种艰辛，从一个部分地仍处在部落阶段的社会，引导到现代化和工业化所必需的一种民族意识。所有一切，包括心态（les mentalités），都要创建。

我们不应该忘记，非洲是以其微小的组织、非常有限的资源，怀着因宗教和种族不同而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态度，去迎接这一长时期的挑战的。

首先，这一大陆上常见的情景仍然是人口不足，缺乏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既构成障碍又起到促进作用的人力剩余。在整个发展行列中，非洲到得最晚。这无疑使它有可能取得最引人瞩目的进展，但同时也意味着它要走的路最为漫长。

其次，在其古代文化的基石中，非洲并不真正是一个整体。非洲传统的文明在过去已经包含了众多不同的信仰和态度，又从外部世界获得了新的宗教因素。它首先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受到了其社会威望、知识威望及其公认二流的古兰经学校的影响。伊斯兰教事实上向原始宗教做出了巨大的妥协（超越了它们，但没有排除它们）。来自外界的第二个重大影响是基督教，它在贸易活动最热烈的地方得到了普遍发展。基督教也把自己强加在一整套古代信仰和习俗之上。

除这些不同之外，我们还必须补充经济方面大量的对比，尤其是向贸易开放的地区与那些向贸易封闭的地区之间，或者说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

这是一个相当不和谐的整体，它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以迎接未来，对此未来黑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看来正怀着勇气和共识进行思考。

毋庸置疑，这一变革具有根本意义；而且，它并不单纯依赖这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本身应对世界其他地区及各种问题的政策和态度——包括其可能的统一或其热切的争论，具体体现于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61年1月）、蒙罗维亚（Monrovia，1961年5月）和拉各斯（Lagos，1962年2月）等地召开的会议上。

应当承认，政策非常重要，但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它变化无端，稍微有些风就会使它偏斜。尤其是，单凭它自己无法完全控制把

它包含在内的巨大变化。

·原始文化与原始宗教的阻碍：这些旧的传统减缓了总的推动力，并使所需的变化复杂化，至少是使之延迟。

黑非洲大多数人口，尤其是在构成大陆总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村，依然忠诚于构成其整个社会之根基的原始文化和宗教。

传统宗教因地区和种族集团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然而，在所有地区，人们信奉的都是万物有灵论，认为所有自然物之上都存在着神灵，它们在自然物死后仍然存在；同时这些神灵也存在于物之上，此即物神崇拜（fétichisme）。另一个常见，几乎可以说普遍的特征是祖先崇拜。传说中的首领或英雄起先作为祖先受到尊崇，但最终并入较高层神祇的行列；这些神祇通常以大天神、地神或创造万物之神为首。非洲人的祖先或神祇不仅向生者显灵，而且可能回来占有他们。正因如此，许多神圣舞蹈具有非凡的意义，比如在达荷美的类似舞蹈中，伏都神（Vodun）和奥里沙斯神（Orishas）“降临在”某些表演者“头上”，后者马上进入鬼魂附体状态，昏昏欲睡。

在所有这些祭祀仪式中，“人们说祷文和祷词，献上食物和棕榈油，并把作为牺牲的动物”放在神或者祖先的祭台上……他们因此得到了供奉。反过来，神和祖先可望帮助和保护生灵。

这一宗教组织是非洲社会组织的保障，后者一无例外地建立在亲属关系和父家长制家庭的观念之上，其中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父家长对整个家庭或氏族享有绝对的权威。（这一权威在一般情况下是按父系由父亲传到儿子手里，按母系传承的较为罕见。）

在那些昔日处在非洲各大帝国影响之下的社会中，社会的等级制使一些家族对其他家族享有贵族权威；那里也出现了建立在手工艺人职业基础上的“等级”。每一集团都有自己的神和先祖，其权力与那一社会集团本身的权力密切相关。

宗教与社会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在社会秩序为现代生活（尤其是教育）搅乱的城镇，依具体情况的不同，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都倾向于取代万物有灵论（农村地区至今仍然信奉这种宗教）。

·因而，每一个受到教育、现代化或受到工业和有组织劳动影响的城镇和地区，都不得不努力克服文化适应（进入另一个文明）这一困难的问题。

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1958年社会学家克洛德·塔迪特（Claude Tardits）在达荷美的波多诺沃（Porto Novo）进行的测试。这显然不适用于整个非洲。不过它使人们对问题有所了解。

波多诺沃是达荷美目前的首都，为一座古城，没有便利的出海口，因而在某些方面为港口城市科托努（Kotonou）超过。不过，尽管出现了相对衰落，在达荷美这一比其邻国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波多诺沃仍然富有活力。正如埃玛努埃尔·穆尼耶（Emmanuel Mounier）所说，达荷美是“黑非洲的拉丁区”。

这并不意味着接受教育（la scolarisation）能够永远为那些在当地被称为évolué（文明人）的人的未来提供保证；évolué指的是上学的人，即通常所说的“见到了光的人”。（1954年，真正上学的孩子有43419个，占适龄儿童的15%。就非洲而言，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但其重要性不要看得过高。）文明人有高层和低层之分。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在大约刚过150万的总人口中，仅仅有10万人是城市居民，而真正受过教育、有修养的精英至多只有1000人——为原白人殖民地时期的3倍，当时只有300多人。培养出哪怕如此少的精英，却费了多少劲啊！

在波多诺沃本身，主要的障碍自然是一个业已四分五裂而非铁板一块的传统社会的各种惯性。这一社会至少由三个集团构成：其中之一是贡人（Gun），他们为现在已经定居在城市中的达荷美农民的后代；第二个是约鲁巴人，为来自邻邦尼日利亚的商人；最后一个由“巴西人”构成，他们是从巴西返回故土的黑人，通常是基督教徒，但有时是改宗的穆斯林，有过非同寻常的冒险经历。这些集团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标记，有自己的敏感之处，有自己的抵抗变化的方式。每一个集团也都有自己的氏族；每一集团按氏族集中在一起建造房屋，婚姻过去是指定，现在仍然如此，同时宗教规定和做法也得到了维持。关于作为一个社会胶合剂的宗教价值伦理，波多诺沃的一位传教士曾这样说：“对物神崇拜我只有一句话要说，但就传教士而言可能有某些价值：这是一种精美的正在衰落的制度。”他补充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优秀的宗教。”

妇女是最早向这一家庭传统表示反抗的，目的在于按照自己的意愿订婚（现在她们中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这么做）。但妇女解放运动依然

要与一夫多妻制和根深蒂固、保守的过去进行斗争。请看看一位女性所具信心的开端吧："我丈夫娶别的女人时，他把钱交给了我，因为我是结发之妻，我则把钱分给她们。与我结婚几年后，我丈夫娶了另两位妻子，她们是由我选定的。其他做妻子的人向我屈膝行礼，并按我的吩咐做家务。"另一个补充说："我向公公行礼，向婆婆行礼，向叔叔大爷、姑姑阿姨、大伯兄和大姑子们行礼。但我不向小叔子和小姑子行礼，他们反过来要尊敬我。我侍候丈夫的全家：我跑腿，我做家务，我为每一个打水，我去集市买东西，我磨辣椒面。在做饭时，我时常要拿出一部分菜肴送给叔叔婶婶，或者丈夫兄弟家和公公婆婆。"

因而，请设想一下，在这样一种氏族中间，在一个大半程度仍然是乡野的城市，一个"文明人"是什么样的情景。他会在他的那些新习惯（时常得自国外）和这些他未必能够完全抛开的礼仪之间，在对家庭的挚爱和不可能服从其所有律规之间，感到身心俱裂，无所适从。

使一切陷于混乱的是城市环境——工作、学校甚至街道生活的情景，它们与农村环境形成对比，在那里一起都顽固地保持不变。某位裁缝，一位文明人，在科托努的修女那里学会了这门手艺，随后嫁给了一位文职人员。她在自己的铺子里非常高兴，对接待客户也感到非常愉快。"结婚一年后，我的丈夫，他是政府中的一个职员，被派到了北方。在那里我无所事事，因为那里的妇女要么穿的是树叶，要么赤裸着身子行走。"最后，她丈夫被调了回来。"去年我住在波多诺沃……我丈夫又给我买了一台缝纫机。"

与这一例子相合，人们只能想到城市中典雅的妇女，或者用奢华的白色服装包裹起来的达喀尔模特儿。未来的幻象，就像城市中现代的大胆处理，相对于达喀尔对面戈雷岛（Gorée）上旧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屋而言无疑少了些诗意，但更具有时代精神。

在这里，城市与乡村进行着先进文明与原始文化之间由来已久的对话。但在非洲，城市处于少数地位。非洲发展的速度最终视城市相对的强大或弱小而定。

·非洲独立政府尽管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但在实际上显示出出乎意料的稳定性。

尽管单个的例子非常有趣，但由于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就要求做出总的解释。事实上，面对这些政府，被统治者显现出无限的耐心，打个

比方，比法国路易十四的臣民对其太阳王（Roi Soleil）尊敬的程度要大得多了。在黑非洲，进行治理必然意味着统治。看上去可能令人惊奇的是，在那里行使权力令统治者青春再现，重新萌发生气，而不是令他们担忧困扰。利比里亚总统W.塔布曼（W.Tubman）1944年上台，1962年仍在执政，1963年则又一次当选。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纪录。在这里，看来是不是存在某种特别的东西，令权力免受欧洲不稳定的骚扰，或者说某种近乎王制的东西？

不管怎样，在加纳奥萨格耶沃（Osagyefo，意思是“所有人的胜利”）雕像的底座上，夸姆·恩克鲁玛总统让人刻上了下述文字：“首先寻求政治王国，其他一切自然会到你手中。”这与法国一个更为简洁的格言有共通之处：“政治第一！”（Politique d’abord！）

因而，必然夺取并保持权力。由于权力不能分享，同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因而反对派起不了任何作用。对权力来说，就它显现出来的而言，这是非常致命的。加纳、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已足够明显地展示了这一点。在那里，青年知识分子已经与其国家的专制政府发生摩擦，他们在欧洲各地游历，或在美国各大学寻找场所：这些人中的一些是被解职的大使，他们认为明智之举是不回国。由此出现了塞内加尔总统的那句名言：“加纳制引不起我们的兴趣。”这是非洲即便是政治水平也远非整齐划一的一个证明。

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为了抵抗实质性的诱惑，非洲统治者需要具有非常高的智慧。欧洲人把这些政府和一党制国家视为异域奇景。如果说他们的判断不够公平，那么非洲统治者必须认识到统治阶层是如此的狭小。出现在黑非洲统治者周围的总是同样一批人数很少的精英，远比昔日为安茹的勒内或公平者菲利普服务的人要少。比如说，治理利比里亚的是占总人口约2%的美国黑人，他们自己甚至可能不是专职雇员。多数人仍处于不活跃状态，远离国家的官僚机器，或我们法国人所说的payslégal（“法定国家”）。这并不意味着这批人数不多的精英为铁板一块。他们内部有着无休无止的不合、争执，有关当局采取突然的有力行动并非没有理由根据。

此外，假如说治理引起的政治问题非常少，那么其行政问题巨大。要想让人民走上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说服他们，引他们加入进来。在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时，一些政府被困在它们自己蛊惑人心的计划当中。

为了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就需要人民、干部忠贞不贰的献身和纪

律；从零开始建设，需要资金和详细计算的投资。总之，理性必须凌驾于至尊之上，但这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罕见的情况。

几内亚是法国在非洲领地中第一个选择自由和独立的国家：1958年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政府同意授予它独立权。在该国，塞库·杜雷（Sékou Touré）的社会党政府制定了一个三年计划。就其本身而言，三年计划并不是头脑发热的产物，或者有错误的问题，它是依据经济标准和一系列数据起草的，那么传统社会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的一个因素。“各种各样负责进口外国产品的国有公司一个接一个地垮了：阿里玛格（Alimag），专门负责总的食物供应；利布拉波特（Libraport），负责纸张和图书；埃玛泰克（Ematec），负责技术供应；几内亚医药（Pharmaguinée），负责医药产品；及其各种姊妹公司。”它们失败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内部的（或外部的）密谋，也在于没有根据几内亚人口成分进行估算的组织。凡此种种不仅以诚实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为前提，而且以一个行政集团、管理人员和检查制度为前提。所有国有化的行业都需要有非常称职、非常能干的管理人员。在这里，他们必须接受培训。

经济与社会赌注

·黑非洲各国的未来仍是不定之天：它是由非洲和世界的棋盘决定的，既具有活力，又带有某些虚幻。

某些棋手对其近邻的疆土怀有短视的或许缺乏理智判断的野心，计划攫为己有。非洲的边界——我们可以说因人为而形成的——虽然没有证明什么，却鼓励他们这样做。

摩洛哥在过去一直对整个毛里塔尼亚、里奥德奥罗（Riode Oro）、伊夫尼（Ifni）及阿尔及利亚所控撒哈拉的部分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几内亚比绍对人口众多的塞拉利昂一直睁大眼睛防备着。加纳——这一名字让有心之人想到昔日的那一大帝国——基于其历史的原因寻求把多哥和象牙海岸吞并过来。马里——这一名字同样非常显赫——梦想着与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建立“联邦”，并把阿尔及利亚所控撒哈拉部分地区收归已有。更为雄心勃勃（如果说更为稳固）的计划包括把非洲各国组合成为两个集团，就像1961年两个敌对的非洲大会召开时那样。一个是卡萨布兰卡集团，由摩洛哥、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R.A.U.，后来重新分解为埃及和叙利亚）、几内亚、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G.P.R.A.）和马里组成，它们显然都是极端主义者。另一个是蒙

洛维亚集团，包括突尼斯、利比亚、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象牙海岸、上沃尔特、尼日利亚、尼日尔、乍得、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加蓬、刚果（布拉柴维尔）、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马达加斯加，它们显然是一些温和派，一些审慎有分寸的国家。

这种分野根本无法说是长久不变的。新近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带来了一种难以预料的新因素。赌博仍在进行，未来仍是不定之天，其中包含着统一和寻求统一问题。不管怎样，这是1962年2月在拉各斯召开的第三次非洲大会的主题。会议由尼日利亚政府承办，但准备得非常不充分，结果以失败告终；卡萨布兰卡集团向布拉柴维尔“十二国”提出了抗议；会议未邀请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是它们不予妥协的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这些事端及随后的伎俩总是非常复杂的。哪一个人在原则上都承认非洲人享有完全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可以具有许多不同的含义。恩克鲁玛总统希望欧洲人对非洲的占领到1962年12月31日宣告终结，但与此同时，他寻求从这一“强者”政策中为自己赢得领导地位，而这不是其他国家乐于授予他的。这也正是拟议中的加纳和几内亚联盟搁浅的原因……

即便是现在，人们也难以看到下述局面：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有可能从他国或国家集团中脱颖而出，并把统一强加在各国之上。领导权既是一个野蛮武力的问题，也是智慧问题，同时相对于政治力量而言更是一个真正实力的问题。

对缺少人口的非洲大陆而言，人力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前英属非洲无疑占据主导地位，因为那里人口密度普遍较高，而且加纳、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的城镇较发达。进步体现在城镇的发展上：尼日利亚的那些城镇是黑非洲最大的。1963年，拉各斯的人口在30万人以上，伊巴丹（Ibadan）在50万人以上。

黑非洲讲法语的部分除几内亚外（马里刚刚与法国政府就一项经济规划达成协议），都很快与欧洲共同市场建立了联系。不过无论尼日利亚还是加纳看来都不接受这么一种合作，即便英国自身加入欧洲共同体也是如此。

尽管黑非洲讲法语的部分人口相对较少，但它也有一个优势，即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最后我们要说说这一区域的城市。地理学家说过并一再重复说到一个城市，由其地理位置和实力而论，都是一

个帝王般的和世界性的城市，此即达喀尔，它控制着南大西洋和穿越非洲的空中航道。所有这一切显然有可能随着世界交通通信的节奏而发生变化，也可能证实自身。

·真正的赌注不是在力量、人口和经济进步等方面的进展吗？

非洲大陆非常落后的经济提供的是原材料和食物（如果我们把塞内加尔的制油工业和几内亚的铝工厂排除在外的话），购买的是工业产品。一切必然要以供应方和购买方为依托。在贸易平衡之正常的条件下，发展和年度投资的可能性仍非常微弱，其增长也很缓慢。要想改变这一切，就不得不转向一种信贷政策，由此打开了直接依附之门，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假如苏联为科纳克里（Conakry）至坎坎（Kankan）铁路提供了铁轨，铁路需要保养和维修，那么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哪些技术人员承担这一工作？铁路工人及其辛迪加（工会）发挥什么作用？假如塞内加尔和达荷美着手建立大学里一个重要的院系，它们无疑会按照它们从法国那里承袭的方针去做，即以几乎完全不付费为基础。但为此它们既需要法语教师，也需要法国的贷款，同时它们还需要技术人员和中学教师。事情接踵而至，彼此相连。

因而，黑非洲不可避免地从这两个大的工业集团寻求帮助，事实上还需要第三者即中国的帮助。中国是以传教的精神进行援助的，但由于其自身人力的充足，因而总是派出大量的人力到那里。

不管怎样，如果不马上接受这些解决方案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或者它们全部，非洲就没有希望完成重要的公共工程，或执行其经济计划。即使是做出巨大的牺牲，就像1961年12月19日尼日利亚在其独立周年纪念日同意做出的那样，也不足以完成上述任务。这些牺牲包括：削减政府成员的工资，不再配备官车，不再额外支付报酬以及增加税收。机床依然是为人们需要的。同样，马里在与塞内加尔分离后，只是由于得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供的运货卡车，使它可以到达坎坎、科纳克里铁路和外洋的出口，才得以存在下来。

同样，世界上的任何机械，没有掌握技术的劳动力使用它们，都会变得毫无用处。要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非洲各国自身优先做出有意识的努力。

在几内亚，在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塞库·杜雷的统治时期，一位瑞士记者记述了他与一些捷克斯洛伐克技术员的谈话。他们中的一个人说：

瞧，法国人比我们有一项优势，他们可以下命令。昨天，我汽车的电池用完了，就这么点事，但在官方车库没有一个人想听我的意见，黑人技师马上就胡乱摆弄起汽化器来，他们有一种鼓捣汽车最复杂部件的癖好。结果是在那之后我到哪里都要步行，这种状况可能还要持续不短的时间。如果是法国人，是会打他们的屁股的。我们则不能这么做。但在这又热又湿的地方，这是合理的，可能会产生某些好处。非洲！我真不明白过去法国和英国为什么要把这盘磨吊在自己脖子上。我签的合约是一年，能够离开我会非常高兴的。我没有培训好任何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一小小的心理剧的伦理非常简单。教育只有在接受者真正需要它时才会发挥作用。

一个更充满希望的前景是由一位1961年到了象牙海岸的法国年轻教师提供的。他非常高兴地发现，他所负责的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表现出的对知识的渴求是何等地强烈，他们自发的学习是何等地勤奋，他们的智力是何等地高。他们至少知道，他们代表着非洲的未来。

艺术与文学

·在现在与明天之间左右为难的艺术和文学能够为这一不断变化的世界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

所有观察家都不得不承认，西方如此称羡不已的非洲本土艺术——面具、青铜制品、象牙制品和木刻——正在我们的眼前衰落和死亡。它已经死去了。这是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在城市工业文明激烈和一而再再而三地进攻下，一直培育着这种艺术的社会框架，尤其是宗教框架，其本身正在走向衰亡呢？

不管怎么说，毋庸置疑的是，我们过去知道的那个非洲正变得愈来愈遥远，它的诗歌，它的舞蹈，它的艺术观念，它的宗教，它的为人朗诵或为人传唱的传说，也是如此，再加上它关于过去、宇宙、人民、植物、动物和神灵的概念，换言之，也就是说其整个传统的文明，就像我们从西方自身的例子中所了解的那样，如果现有的退化加剧的话，将会被荡涤干净。

不过欧洲保留下的传统东西并非一丝半点，对此它们依然加以珍惜，当然时常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之下。非洲将保留其自身文明中的什

么东西呢？

非洲艺术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这一文明远比现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文明古老。年轻的非洲文学与此不同。它是高度西方化的，但愿仅仅是因为它使用了西方的语言：很少有人用非洲的语言进行文学尝试，这种语言是口头用语，仅仅在最近才被转译，而且不无困难。另外，这一新型文学关注的是黑人演变的远端—以及当大多数非洲人“看见光明”时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形势。从文明人（évolués）的角度看，这些坚实、生动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非洲的现实，它们让人对非洲的那些最有独创性、最不易与其他文明的价值观相融合的方面，有了非同寻常的了解。

就以《阿马杜·库姆巴故事集》（*Nouveaux Contes d'Amanou Koumba* ）为例吧，此书的作者是已经广为人知的西非作家比拉戈·狄奥普[4]。它们的主题可以是过去，但其形式，以一种符合文学规则的平衡的叙述方式被包裹在其中的线性方式，远远超出了让·迪维尼奥（Jean Duvignaud）所说的民间传说“失去的天堂”。单单其西非风格就表明了这么一种特别的文学，一种“被从其仍在魂牵梦萦的共同体中连根拔起的”文学。在此他们与高卢第一批拉丁作家形成了对比。不论何处，只要是新型黑人文学兴起的地方（在非洲或新大陆，不论使用哪一种西方语言——法文、英文、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随着兰斯顿·休斯[5]、理查德·赖特[6]、艾梅·塞泽尔[7]、桑格尔[8]、狄奥普、法努（Fanou）、格利桑[9]、费迪南·奥约诺[10]、迪奥雷（Diolé）或卡玛拉·莱耶[11]等，都不会有背叛的言谈，而只有穿过时代变幻所造成的无法避免的空间距离的热切眷恋。

正如让·迪维尼奥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他们大大修正了他们生存的深层结构，以致语言成为一种存在和一种生活方式。在那一过程中，某种东西永远地消失了——那就是对神话的亲近。”这无疑是符合事实的。但语言的变化并不是这些作家所罹受的唯一的结构变化。正如卡玛拉·莱耶在《黑孩子》（*L'Enfant noir* ）中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完全的变形。《黑孩子》是莱耶这么一位年轻村民的自传，他出身于“一个大的铁匠家族”，后来到了巴黎学习。每一次他离开时，他的母亲都无助地看着他上路：

是的，她必须看着这个过程，看着这个从位于库鲁萨（Kouroussa）的村落学校通往科纳克里（Conakry），再从那里通往法国的齿轮结构；在她挣扎努力的时候，整个过程中……她都要看着运动

的齿轮结构：首先是这个轮子，其次是另一个，而后是第三个，再后是其他轮子，除她之外没有人能够看得见的其他许多轮子。人能做些什么来阻止轮子的转动吗？人们只能观看着它们，观看着命运的作用：我的命运就是往前走！

是的，一个新文明，不论脆弱还是坚实，正在从一个仍在滋润着它的子民的活生生的传统文明之由来已久的波动中，历经艰辛地产生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非洲正在把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抛在后面，但它并不会因此失去它的文明。它有可能被改造和被分化，但将保存自身，以一种心理、各种品位、种种记忆和赋予这一土地以其特征的万物为其深层标志。桑格尔甚至提到了一种非洲的“生理机能”，述说出对世界的某种“引起强烈感情的态度”，这样“神奇的世界相对于黑非洲人来说比有形的看得见的世界更加真实”——实际上是一条通往知识的道路。那些从其作品看显得最为西方化的黑人作家，在另一方面也是最强烈地坚持关注其同胞特别的心理洞察力的作家。

《黑孩子》的另一段文字证实了这一点。它描述了小说男主人公的母亲超常的、几乎可以说是神奇的天赋：

这些奇迹——它们确确实实非常惊人——在现在看来就像遥远过去中的种种传奇的特征。世界仍在运转和变化，我的世界可能比任何别人的变化更加迅速；到了我们似乎不再是过去的我们，我们确实不再是过去的我们，当这些奇迹出现在眼前时我们已经完全不是自身的程度。是的，世界在运转和变化：它在运转和变化，以致我连我自己的图腾——我也有自己的图腾——也不知道了。

还有比这更生动的对与过去决裂的描述吗？但这位作者又补充道：

我犹豫了一阵才说出（我母亲的）力量何在，我甚至不想把它们都描述出来：我知道我的叙述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至于我自己，在想起它们时，我无法确定如何处理它们。它们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它们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我需要做的唯有回忆我所目睹的东西……我目睹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我在心里像当时目睹时那样看到了它们。任何地方不都是有无法解释的东西吗？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数也数不清的无法解释的东西，而我的母亲与它们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

“无法解释的东西”：它们可能正是每一个文明之所以成为自身的秘密。

1966年附言

阿尔及利亚独立（埃维昂协议，1962年3月19日）和联合国重新接受毛里塔尼亚（1961年10月27日）之后，政治党派之间的紧张局面消失了。由此在1963年出现了一项积极成果，此成果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5月25日）上被非洲联合组织（OUA）宪章所接纳，同时承认了自殖民地时期延续下来的政治边界，投票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葡萄牙的提案。1964年2月的达累斯萨拉姆会议，正值坦噶尼喀叛乱，1964年7月开罗再次举行会议，这个新的非洲联合组织似乎有能力吸纳卡萨布兰卡、蒙罗维亚、非洲联盟和马达加斯加所有这些老团体，可能只有前葡萄牙殖民地刚果除外。刚果的去殖民化完成得过快，1960年之后，经历了一段动荡、戏剧性的日子［联合国的介入，卢蒙巴遇刺，卡汤伽（Katanga）的分歧，冲贝（Tschombé）部落的抗议……］。或远或近，孩子们被企业和政府资本雇用。相反，在桑给巴尔，1964年1月，爆发了一场“中国式的”革命，证明非洲问题也与全世界各地发生的情况相似。

1964年4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为一个国家（1964年11月），后来取名坦桑尼亚，苏联和中国的影响在此形成竞争。其他新近独立的国家：尼亚萨兰（Nyassaland）成为马拉维（Malawi）。

勾勒出现在努瓦克肖特会议（Nouakchott，1965年2月）的运动：旧的法属非洲重组的努力，对中国渗透的斗争，对国际资本开放或是不开放，似乎还看不出有任何决定性的结果。它突出了潜伏的危机。

社会主义政体的困难，非洲社会根深蒂固的落后，在1965—1966年由精英发动的黑非洲的广泛的反抗运动和一系列军事政变曾经呈现出革命的希望，但最后被放弃。

在加纳，恩克鲁玛（M.N’Krumah）政权倒台后成立了军政府。在尼日利亚，刚刚独立时建立的议会和联邦制度在政变之后消失，政变的发动者是伊龙希（Ironsi）将军。在中非共和国，1965年12月31日至1966年1月1日深夜爆发了一场危机：一位上校掌握了政权。

1965年12月22日，在达荷美，索格洛（Soglo）将军把独立后掌权的所有文职领导人从职位上赶走。

在上沃尔特，亚梅奥果（Yameyogo）总统的政府在稳定掌权六年之后倒台，取而代之的是一队军官。

在比属刚果，军队首脑蒙博托（Mobutu）建立了独裁统治。

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政治混乱与无能致使它们无法赋予非洲联合组织（1963年5月2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创立）以活力。因此，非洲国家无法阻止叛乱政府在短时间内巩固自己，此政府是由伊安·史密斯（IanSmith）领导的罗得西亚小部分白人殖民者建立的。同样，非洲的独立国家不能向反抗葡萄牙统治的非洲人民提供帮助，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斗争非常艰难，而在近期看不到希望，但几内亚的斗争更为有力和有效。

[1] 原文如此。英译本作“马来西亚人”。——中译者

[2] 原文如此。英译本作“马来西亚”。本段其他几处也是如此。——中译者

[3] 麦斯欧迪（9世纪末—957年）：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旅行家，人称阿拉伯的希罗多德。生于巴格达，曾涉猎许多学科，才思敏捷，博闻强记。为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到各地旅行，足迹遍及叙利亚、伊朗、亚美尼亚、里海沿岸、印度河流域、锡兰、阿曼及非洲东海岸。著作甚丰，但多已散佚。主要作品是长达30卷的《历代史》和《中书》。——中译者

[4] 比拉戈·狄奥普（Birago Diop，1906—1989年）：塞内加尔诗人，搜集整理了沃洛夫民间故事及传说，曾以《阿马杜·库姆巴故事集》（1947年）、《阿马杜·库姆巴新故事集》（1958年）和《拉万斯故事》（1963年）获1964年黑非洲文学大奖。另以写作短小精悍的抒情诗著称，著有《诱惑与微光》等，仿效其同胞桑格尔等，对非洲社会生活的奥秘进行探索。——中译者

[5] 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年）：为黑人文学开辟现实主义道路的美国黑人诗人、作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多次获奖。主要作品有诗歌《疲倦的黑人伤感歌》、诗集《黑豹与鞭子》、散文集《不是没有笑》和短篇小说集《白人的行径》等。——中译者

[6] 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年）：美国小说家，最早反对种族歧视的美国黑人作家之一，以小说《土生子》（1940年）闻名，开创了反种族歧视的主题。其他作品有中篇小说《在地下生活的人》、自传体小说《黑孩子》和有“美国第一部存在主义小说”之称的《局外人》。——中译者

[7] 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1913—2008年）：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出身的黑人诗人、剧作家，与桑格尔共同创导“黑人性”文艺运动，宗旨在于恢复非洲黑人的文化特色。曾在巴黎学习，后返回马提尼克岛任教。他用充满黑人意象的白人语言，来表达其炽热的叛逆精神。主要作品有《回乡札记》《被斩首的太阳》《国王克利斯朵夫的悲剧》和《刚果一季》等。——中译者

[8] 桑格尔（L.S.Senghor，1906—2001年）：塞内加尔著名政治家和诗人。毕业于巴黎大学，曾获法国中学教员资格。他深信非洲对他后来所说的“普世文明”所做的潜在贡献，与塞泽尔等提出“黑人性”文艺理论，认为此乃“黑非洲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主要作品有《诗集》及政论集《自由二集》。曾参加反对法西斯战争和法国抵抗运动。1960年塞内加尔独立后当选为总统（1960—1980年）。——中译者

[9] 格利桑（Édouard Glissant，1928—2011年）：生于西印度群岛法属马提尼克岛，非洲主义文学运动的成员，诗人和作家。诗作《岛国原野》和《西印度群岛》记述了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小说《成熟》曾获勒诺多文学奖，另著有《第4世纪》和《杜桑先生》等。——中译者

[10] 费迪南·奥约诺（Ferdinand Oyono，1929—2010年）：喀麦隆政治家、演员和喜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僮仆的一生》《老黑人和奖章》和《欧洲的道路》等。曾在法国学习，1960年返回喀麦隆后进入外交界核心，曾任喀麦隆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副主席和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主席等。——中译者

[11] 卡玛拉·莱耶（Camara Laye，1928—1980年）：几内亚作家，为最早获得国际声望的黑非洲作家之一。曾在科纳里克的一座工学院读书，后到法国攻读工程学。其富有浪漫色彩的自传体小说《黑孩子》（1953年）怀着思乡之情，以流畅而又充满诗意的文字追述了他在几内亚的童年生活。另著有《黑孩子》的续篇《德拉穆斯》（又译作《非洲之梦》，1966年）。——中译者

第三部分 远东

第十章 远东简介

我们的意图是依次借助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专门考虑远东共同的特征，考虑远东聚合的特征，随后考察其文明遥远的起源，这些文明至今依然非常兴盛。最后这一点是所有文明最重要的特征。

地理学所示

单单看看远东地理范围的广袤，就已经可以对其奇怪的命运和文明有一知半解的了解。对首次接触这里的人而言，旅行家、记者和地理学家可以充作最好的向导。这么做有一个条件，即他们没有根据某种绝对的地理决定论，以专制的方式解释一切。这种理论在亚洲并不比在欧洲——或者在任何受到历史和人类持久努力长期作用的国家和地区——合适。

·从广义上说，远东是一个热带和亚热带的世界。

远东包括印度的“火炉”，那里也有森林和丛林；包括华南，那里湿热多雨；包括印支半岛，那里有着高耸入云的森林和生长极其迅速的植物［在爪哇伯伊滕索格（Buitenzorg）的植物园中，某些藤本植物的生长速度达每天一米］。

不过，印度本身也包括印度河流域、恒河中游、德干高原中部，那里因受西高止山脉遮挡，气候非常干燥，换言之，就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同样，中国既有华北这样的地区，那里有着广袤而开阔的黄土和近世冲积平原，冬季非常寒冷，也有着林木参天的东北林海和极北地区冰封雪盖的沙漠。

整个华北地区都罹受寒冬之苦，中国的首都北京就位于华北的东南端。在那里，人们冬天睡在火炕上。谚语云：“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

他人瓦上霜。”18世纪一位文人曾这样宣称：“冬天上冻的时候，如果有穷亲戚朋友来访，我们首先熬一锅热粥，盛上一大碗，并端一小盘腌姜给他们（作为小菜）。这是让老人暖和身子、解人急需的最好办法……我们煮稠稠的汤，双手捧着喝，并把脖子缩到双肩里：下霜或飘雪的早上，吃上这么一顿饭，谁都感到热乎乎的。”

有时这些寒流和突如其来的降雪会南下到南方热带地区。1189年，南宋的都城杭州这座长江以南不远的城市下起雪来。“竹子的茎干劈里啪啦发出奇怪的响声。”

初看起来，地理向人们显示出的是这些形形色色地区的差异性，而不是统一。这么做我们是否有可能误入歧途，以错误的方式去处理这一问题？东南亚的地理环境无疑多种多样，变化多端，但把这一地区统一起来的不是地理环境，而是一种单调无变化的物质文明，与地理、自然和人文因素相比，它在该地所有地区几乎都起主导作用。这一物质文明太过古老，太过根植于遥远的过去，是“太多的个人和集体心理的产物，这种心理可以简单地视为当地自然条件的一种作用”［P.古鲁（P.Gourou）语］。它靠自己而存在，是一种半独立的力量，决定着自己的运行方式。

·所有报道都告诉人们，这一文明在各个地区都是完全一样的，几乎都是素食文明。

所有西方旅行家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点，今天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自他们一踏足亚洲起便是如此。

1609年一位西班牙旅行家报告说，日本人吃的唯一一种肉食是野味。一位德国医生在1690年前后也宣称，他们根本不知道奶酪和黄油为何物。他们靠gokost（五谷）即“地上出产的五种东西”维持生存（就像在中国那样，数字“五”在日本具有神圣意义）。其中包括：稻子，“像雪那样白”；清酒（sake），用稻米做成的一种酒；大麦，主要用于喂牛，但也用于磨粉和做糕点（这位医生还说，田里大麦麦穗有一种“令人称羡的红色”）；与肾形豆没有什么不同的白豌豆。在这份食物单子上还可以加上粟、蔬菜和鱼，但肉类无论在任何时候都非常稀罕。

在此20年前，一位法国医生在印度目睹了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1] 由德里到克什米尔时伴随他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他大感吃惊的是士兵生活节制，不饮酒，“吃的东西非常简单……在所有这些骑兵中，不到

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二十分之一，在行军时食肉。只要能够吃上基歇里（kicheris），这是一种把米饭和蔬菜混杂在一起、上面浇上棕褐色黄油的杂拌饭，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苏门答腊岛（Sumatra）阿歇姆（Achem）居民在饮食方面的要求丝毫不比印度人多。“他们唯一的食物就是稻米，”一位旅行家在1620年这样写道，“富人除米饭外吃很少一点鱼和蔬菜。在苏门答腊，能够吃上烤鸡或煮鸡，那他肯定是个大领主……他们说，如果岛上有2000名基督教徒，他们很快就会吃光岛上所有的牛和家禽。”

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也大同小异。1626年科尔特斯神甫（P.de las Cortes）这样写道：“假如中国人像我们西班牙人那样吃肉，那么喂养足够多的牲畜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富裕人家也满足于少吃肉。“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他们在饭上配上几小片猪肉、鸡肉或别的什么肉”；这种东西，我们现在可称为餐前点心（amuse-gueule）。18世纪一位英国旅行家做出了同样的记载。就连在北京（鞑靼向那里供应牲畜），“人们也只吃很少的肉。他们把它们与蔬菜混杂在一起来提味。牛奶、黄油和奶酪……基本上不为中国人所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肉，远非如此。假如一只动物——一头牛，一峰骆驼，一只绵羊或一头驴——由于意外或者疾病死去，它马上就会被吃掉。这位英国旅行家以某种不屑的口吻这样总结道：“这些人不知道不洁的肉和洁肉有什么不同。”在中国，人们还吃蛇、青蛙、老鼠、狗、蝙蝠，诸如此类……

这些观察得到了中国文学作品中不计其数段落的证实，它们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如人们希望的那样精确。一部小说中的一位人物是位装腔作势的年轻寡妇，“今天想吃鸭子，明天想吃鱼，后天又想吃蔬菜和笋汤。没有事可干的时候，她必须要有橙子、饼干和睡莲。她平常要喝大量（米）酒；每天晚上，她吃的是炸麻雀和腌小龙虾；她还要喝下3升用100种花酿成的酒”。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挥霍，是富人的心血来潮……

郑板桥（1693—1765年）是一位诗人、画家、书法家，也是一位非常乐善好施的人，他希望节日时宅中所有人与他一起分享盛宴。他在其家书中写道：“每一次都有鱼、蒸米饭、水果和点心，他们应公平地分享。”他的书信中提到的食物包括荞麦圆饼和稠稠的热米粥。这些是通例。有一位非常富有的高利贷主，他拥有一家当铺，曾出现在中世纪的一个传奇故事中。就连这么一个人，尽管他满怀欣喜地飞快地捡起“他在地上发现的”任何一块“硬币”（sapèque），但吃的是“用开水泡热的一盘冷米饭”。

事实上，到了20世纪，中国情况的改变微乎其微。一位记者在1959年写道："我非常清楚，中国人的餐饮艺术一直是无中生有的艺术；这么一个人口过多的国家，饲养肉牛——对卡路里的巨大浪费——是明令禁止的，试图利用我们不加注意的一切东西。"

中国人仍然是素食民族：他们消耗的98%的卡路里来自菜蔬；他们不吃黄油、奶酪或牛奶，食用的猪肉和鱼也非常少。他们的碳水化合物部分来自小麦，在北方来自小米，而在南方则主要来自稻米。中国人的蛋白质来自大豆、芥菜籽和各种各样的植物油。

有一个国家正在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那就是日本，它大大增加了食鱼量，尤其是转向食肉。

·稻米在中国东南部的无处不在和向北方的输入，是这种食素饮食习惯如此普遍的原因。

食用小麦和其他类似作物的西方就这样不得不在其历史的很早时期，先是实行田地抛荒制，而后实行作物轮作制。如其不然，地力就会迅速枯竭，小麦种下去就不会有什么收成。因而，部分土地自动地变成了草场或者牧场；由于种植小麦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畜力，情况就更是这样了。

相比之下，稻子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无限期地每年栽种生长。栽种的活儿大部分靠的是人力，水牛只用于水田泥地中的轻活儿。事实上，在所有地方，作物都是靠手精心栽培的。在这些情况下，靠食肉维持生存都会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浪费。要喂养动物就要用粮食，而人自己更要食用这些东西。

这种饮食制度的首要后果是使人口有可能实现更大的增长，而不是使人们有可能转向肉食结构。如果人们的饮食是素食，那么单单1公顷[2] 田地就可以养活6—8个农民。特定单位田地的食物产量无疑比把这些田地用于其他方面要高。正是这使得"亚洲密集的人口"成为可能。

毋庸置疑，如同在印度那样，中国人口的增长是相当晚近的事。它实际上始于11和12世纪中国的南方，是随着早期一年有可能两熟的稻子的传播而出现的。到了13世纪，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了1亿。自17世纪末叶起，人口增长极为迅速。现在，中国的人口是如此的众多，以致即便有心改变，也不可能采用别的饮食结构了。"中国就这样陷入文明决

定论之中不能自拔：他们的文明只能沿着塑造了它的道路前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印度的人口在18世纪也越过了1亿大关。

·魏特夫 [3] 的理论：稻米文明隐含的是一种“人工”灌溉的制度，这种制度反过来又要求实行严格的民事、社会和政治纪律。

水稻把远东的人民与水联系在一起。在南印度，把人们与贮水池或水库联系在一起；而在印度河—恒河平原，把人们与水井或靠水道相通的灌溉渠联系在一起。同样，在中国灌溉有多种形式：在南方依靠的是流动平缓的河流（以及长江边上鄱阳湖和洞庭湖有规律的洪水泛滥），还有水井、运河（其中京杭大运河是个典范，它既起交通作用，也充当灌溉水系）；在北方，河流湍急，比如北河（Peï Ho）或黄河，必须筑坝和治理，即便这样，这些河流仍经常决口。水利灌溉无论是在菲律宾或爪哇的台地，在中国广东，还是在日本，在所有地方都在进行；灌溉靠竹制导水管、原始或者现代的水泵进行，为此就要求推行严格的纪律并服从，就像在古埃及那样，后者是因灌溉而施加各种束缚的经典例证。

水稻种植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被冲击平坦的低地上开始的。它逐渐扩展到所有可以得到水流浇灌的土地上。与此同时，由于选种使早期的各种品种能够出现，水稻种植有所进步。自那时起，如魏特夫所说，水稻种植在远东导致建立起专制的官僚政权，并出现了众多的国家官员。

这一假说虽不无道理，但在各个细节方面受到了挑战。首先，它过于简单化。种植水稻需要有水的供应，同时水稻本身无疑决定了远东生活的许多特征。但这些局限、束缚只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结构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不过，在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忘记文明的这些束缚本身：它们起过作用，而且一直在起作用。

·远东大片的地区依然是蛮荒之地或原始地区。普遍说来，这里相对于所有建立在灌溉基础上的平原文明尤其占有优势。

确实，在山区也有水稻田，但它们限于狭小的地块上，限于人口过度拥挤、有足够的人手去从事相关的繁重劳动的地区，比如爪哇就是一个例子。通常而言，在那些精耕细作取得成功的地方，开化之民在远东只占据着小片地区。其余的地方，尤其是山区、与世隔绝的地区和某些岛屿，成为原始民族和文化的保留地。

乔治·孔多明纳斯（Georges Condominas）在1957年出版了一部书，名叫“我们吃掉了森林”。这部书把我们由西贡向内地带到了达拉（Dalat）避暑胜地以远的地区，按年代记载了一个原始部落的日常生活。这个部落的成员生活在森林中，每年他们都要开辟出更多的土地种植庄稼。他们把树的一圈皮剥去，伐倒或焚毁它们。在这样开辟的土地上“种植，采取的办法是用小锹掘穴点播：在地上挖出一个小洞，把种子放进去，然后用脚尖推土把洞重新填平”。作物主要是旱（culture sèche）稻。每年都要毁掉一片林。如果一切进展良好，也就是说，如果这片林在“抛荒”时重新长了树，那么经过20年，这个部落会重新回到起点上来。

这种流动农业［马来语称之为“拉当”（ladang），而在实行这种耕作办法的其他地方，人们可以发现许多别的称呼］非常原始，实际上没有任何经过驯化的动物。它维持了上千个不同民族的生存，这些民族都极其原始。它们显然无法适应现在这个时代，但它们在与世隔绝的地区残存下来。

与此相反，西方自很早的时代起就同化了其原始民族。这里并不缺乏与世隔绝的落后地区，我们现在仍可以把它们识别辨认出来。但它设法到达他们那里，归化他们，使他们与城市建立起联系，并开发其资源。

类似的过程在远东没有出现。这一巨大的差别说明了为什么在中国有如此多的民族没有“被汉化”，为什么在印度会有如此多的部落游离于卡斯特制度及其禁忌之外（实际上也就是游离于印度文明之外）。

这一差异还说明了现在和过去的许多细节。1565年，在塔里科蒂（Talikota）战役中，德干高原上“信奉印度教的”毗阇耶那伽王国（Vidschayanagar）尽管拥兵百万，却惨败在穆斯林素丹的骑兵尤其是炮兵手下。那座伟大而辉煌的城市变成了不设防的城市，城里的居民甚至无法逃跑，因为所有的运输工具和驮畜都被军队征用了。然而洗劫城市的并不是战胜的一方。他们没有侵入城市，而是忙于追逐战败者，忙于切断他们的喉咙。降临这座城市并洗劫它的，是城市周围的原始部落，成群成群的布林沙利人（Brindscharis）、兰巴迪人（Lambadis）、库龙巴人（Kurumbas）……

17世纪时，一位德国医生在前往暹罗（Siam）途中遇到了一位日本商人，此人几年前（1682年）与其他人一起在菲律宾群岛吕宋岛附近的

一个荒岛边遇上了海难，船只失事。同时遭难的大约有10个人。他们靠着海岸上丰富的野生海鸟蛋和成堆成堆的介壳类水生动物过得非常滋润。在度过8年“奢华”的生活后，他们建造了一条船，系上帆，最终在精疲力竭时到达了海南岛。在那里他们知道他们侥幸保住了生命。海南是个半汉化半原始的岛屿，他们非常幸运地在汉人地区靠岸。在岛的另半边，野蛮民族是不会让他们有立身之地的。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尽管该岛在1683年即被汉人征服，但在很长的时期里仍分为汉人区和非汉人区，就像许多岛屿和“大陆上真正防水的隔舱”那样。

现在在中国，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人数仍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这些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大致差不多，少数民族的总人数非常接近于3600万人），但占有的地域面积占全国的60%（应当承认，其中确实包括戈壁沙漠、新疆和西藏这些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换言之，就地理范围而言，他们一直是多数。

这些少数民族包括广西的壮族、苗族、黎族、傣族和彝族（他们大都散布在自云南到甘肃的广大地区）；甘肃的回族，还有瑶族。对于所有这些少数民族或其大部分，昔日帝制时代的中国以及后来的蒋介石政府，都采取的是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彝族城镇的大门上立着这样的告示：“彝人三人以上不得聚会或在街上散步。”“彝人不得骑马。”现在中国政府改善了他们的处境，并赋予他们一定的自治，但没有像苏联授予其少数民族那样授予他们半独立地位。与此同时，所有这些落后社会［这些社会实行奴隶制，比如凉山的彝人，或者农奴制（ula），比如西藏］的根基都被动摇了。政府采取了坚定有力的措施，让少数民族中最原始者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字。因而现在只有中国挂念着其落后民族（为他们好，但肯定有违他们的意愿）。

·在文明地区之间，原始民族据有的地区也是野生动物的领地。

这些野生动物中，有旁遮普的狮子、苏门答腊沿海的野猪、菲律宾群岛河流中的鳄鱼，以及在各地都有的动物之王，獠牙利齿、时常吃人的老虎。

过去不计其数的记载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缤纷多彩的场景。科尔特斯神甫是位西班牙耶稣会士，1626年在广州附近遇上了海难。他提到中国的乡间游荡着许多老虎，它们经常进入城镇和村落猎食人类。

约公元1600年，一位名叫弗朗索瓦·贝尼耶（François Bernier）的法

国医生访问了恒河三角洲。他报道说，孟加拉肯定是印度迄今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就像埃及是尼罗河的礼赠那样，那里是“恒河的礼赠”，盛产糖和稻米。然而，在一派繁荣景象之中，河曲中有一些无人居住的岛屿，那里是海盗经常光顾的地方。贝尼耶写道：“这些岛屿是老虎的聚居地，它们经常由一个岛屿游到另一个岛屿；或者是羚羊、猪和曾经驯化、现在又回归野生的家禽的乐土。正是由于岛上有老虎，因而乘坐小划艇（当时的通例）在这些岛屿间航行时，登岸在不少地方是非常危险的。夜间停靠把船系在树上时，千万要当心与海岸保留一定的距离，因为一些老虎总是不知不觉地进入。据说有些老虎胆子大得要命，竟敢跳上船来，叼走船上尚在睡梦中的人们。（如果当地水手的说法可信的话，）它们甚至挑选那些个头最大、身体最胖的人。”

野蛮对抗文明：历史的证明

远东那些伟大的文明，尤其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如果遇到的麻烦来自其疆域内蒙昧原始的地区，来自那里的吞噬森林的贫困的农民，那么它们是会平安地存在下去的。但堪与埃及圣经时代的瘟疫相比拟的天罚来自广袤的沙漠和大草原（对中国来说在其西部和北部，对印度来说是在其北部和西部），那里夏季裸露在阳光暴晒之下，酷热无比，冬季则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下。

在这些环境恶劣的地区生活着各游牧民族：土耳其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蒙古人……从他们在历史上刚一出现，直到他们辉煌的历史终结之时，也就是说直到17世纪中叶，留给人们的就是这种印象：凶猛、残酷、富有亡命徒精神、骑着大马的暴徒。事实上，只是到了17世纪，在火炮的帮助下，定居民族才真正击败了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在那之后，他们把这些野蛮民族驱赶到一定距离之外；这些人受到了限制，面临着威胁，仅仅是在苟延残喘而已，直到现今仍是这种样子。现在，无论两个蒙古（中国的内蒙古和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还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和苏联的突厥斯坦，其本身都不是世界棋局中的关键国家和地区。真正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其空间和飞机场，而不是其财产。

·但这些游牧民族对我们现在的文明研究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呢？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劫掠无疑延迟了与他们毗邻的那些大型文明的发展。

赫尔曼·格茨在其自1929年开始出版的那部经典文集《印度文明的各个时期》（*Les Époques de la civilisation indienne* ）中这样论述印度，

他的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因为印度只有一个穿过阿富汗山脉的狭窄的开伯尔（Khaiber）山口向游牧世界开放，而中国很不幸与广袤无比的戈壁沙漠接壤。自公元前3世纪起开始兴建的中国万里长城是一道重要的军事屏障，但它与其说卓有成效，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突破。

根据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研究，游牧民族原本是农民。更先进的农业的发展迫使那些不太能够掌握这种先进技术的人向外迁移，到了吞噬森林者的山区，尤其是到了沙漠和大草原的边缘地带。他们被从较富裕的地区驱赶出去，现在所拥有的只剩下这些广袤但非常分散的草地。通过这种方式，文明成为“野蛮之母”：它把农民转变成了游动不息的牧羊人。但是这些野蛮民族由于内部危机、社会革命和人口过度增长而不断地从其常驻地回来。他们重又回到了定居的农业地区，这种回归很少是采取和平方式的。他们作为劫掠者和获得胜利的征服者前来；他们鄙视、瞧不起被他们打败的定居农民。在这方面请听听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巴布尔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吧，他在1526年夺取了印度北方的大部分省份：

……尽管印度斯坦是一个充满自然魅力的国度，但其居民一点也不高雅，与他们打交道产生不了任何乐趣，引不起反响，也不会建立长久的友谊。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才智，也不诚实热情；他们根本不知道侠义或果敢为何物。在他们的观念中，就像在其工作中那样，缺少方法、持久力、秩序和原则。他们既没有良马，也没有佳肴：他们没有葡萄，没有西瓜，也没有其他多汁的水果。这里没有冰，也没有新鲜的水。在市场上人们买不到精美的食物，甚至买不到好面包。澡堂、蜡烛、火炬、吊灯，所有这些都不为人们所知……

除了在沟壑峡谷流畅的江河溪流外，他们的庭院或宫殿中没有任何活水。他们的建筑缺乏美感魅力，缺乏气氛，没有规划，一点也不高雅。住在农村里的人和其他穷人大都裸体而行。他们穿的唯一外套是他们称为“朗格塔”（langota）的东西，这不过是一小块布，自腹脐下垂大约两拃。朗格塔之下另有一块布，用朗格塔上的细带系在两腿中间，从中间穿过去，用于在后面系上。妇女用一块“朗”（lang）裹体，其中的一半用于盖住生殖器官，另一半用于裹头。

除疆域面积广袤之外，印度斯坦的一大好处是在那里可以找到大量金子，其中既有金锭，也有铸币。

这位来自突厥斯坦的穆斯林心中洋溢着胜利之情，对其游牧的沙漠生活充满自豪感，自伊斯兰文明的辉煌顶点俯视世界。他就是这样评价印度的古代文明、艺术和建筑的。他这种傲慢自大，尽管不是出自一位西方人之口，却同样令人不快。

·蒙古人声势浩大的征服运动不是本书关注的主题，这里关心的只是影响到中国和印度的部分。蒙古人的征服对这两个国家都是致命的打击。由此在13—14世纪和16—17世纪之间持续出现了两次大的入侵浪潮。

本书图4、图10、图11和图12显示出这些侵略的年代范围和不同的形态；入侵的方向一是西方和遥远的欧洲，一是东方，另有一股朝向南方和印度，同时在中国的方向一直有一些反弹和回响。这无疑是因为中国自15世纪初期开始就是“东亚病夫”，为劫掠者所垂涎、觊觎。1405年帖木儿（Tamerlan）去世时，他正准备进攻中国。

事实上，游牧民族每一次发动侵略，中国和印度都是受害者。两个国家的首都也未能幸免。两两成对的四个日期本身告诉了人们这一切。1215年，即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在布汶（Bouvines）战胜奥托四世（OttoⅣ）的那一年，成吉思汗占领了北京；1644年，北京再次为满族人占领，后者得到了蒙古人的帮助。1398年，帖木儿占领了德里；1526年，它再次被巴布尔攻陷。

这些事件是些不会被人礼赞的灾难。每一次都有成百上千万人丧生。到了20世纪，在技术战争的时代，西方都没有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杀戮。印度的历史骇人听闻，那里因文明间的冲突（入侵的蛮族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变得更加复杂。与中国一样，它最终能够战胜这一波又一波的入侵，完全得益于它对生活异乎寻常的控制力。另外，这也因为它从未被完全征服，征服者从未达到科摩林角（cap Comorin）顶端以远地区，同时德干地区的经济一直与印度洋国家（有时是通过移民）联系在一起。

对中国和对印度来说都是这样，入侵的浪潮意味着一而再地毁灭和倒退。从长时期来看，两个国家都同化了入侵者，但它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么，野蛮民族应对远东和欧洲之间日益加宽的鸿沟负主要责任吗？这是不是影响该地区命运的关键因素？

对印度来说，可以认为是这样。在开始时期（公元前第二千纪），

旁遮普的雅利安人与希腊人、克尔特人、古意大利人和日耳曼各民族的祖先颇为相像。与《伊利亚特》（*Iliade*）和《奥德赛》（*Odyssée*）相似的是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的骑士文化，它叙述了征服恒河上游平原时的各种战争。到了公元前5世纪，在佛陀的时代，北印度布满了与希腊城邦相似的贵族制的共和国和小型王国，它们也像希腊那样开始进行贸易。公元前3世纪时，旃陀罗笈多（Tshandragputa）和阿育王（Asoka）建立了最早的帝国，它把阿富汗和除德干高原南端小部分地区（这里从来就未被征服）以外的整个印度统一起来。在同一时期，亚历山大的希腊—马其顿帝国正在建造过程之中。纪元伊始，北方的西徐亚人（Scythes）开始南侵。它在公元3—6世纪达到了顶点，建立了面积宏伟的笈多帝国（Gupta），重新开启了印度白肤色和褐色民族之间无休无止的争斗。此后不久，如同西方的中世纪，印度出现了大量农奴，出现了大型封建国家。印度与欧洲之间的平行线并不是完全并行的，尤其是在各自社会的形态方面。但直到13世纪蒙古人掀起的入侵风暴之前，两者之间并没有惊人的区别。

自那时起，鸿沟越来越宽。对中国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它的发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因完成于1279年的蒙古人的征服和1644—1683年满族人的征服而延缓、减速？至少直到13世纪，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仍领先于西方。但自13世纪起，它被超越和甩在后面了。

尽管如此，来自大草原的入侵者显然不能对远东波折重重的命运负完全责任。入侵者给它们造成了巨大损失。然而时间会修补和治愈一切的。

人们几乎会马上这样说道：愈合得太好了。外敌入侵在西方造成的是与过去的断裂和新型文明的诞生，而对中国和印度而言，只是物质方面的灾难，它们既没有改变其思维方式，也没有改变其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那里没有出现像西方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或者罗马皈依基督教时，抑或中东皈依伊斯兰教时，那样的巨大飞跃。

远东对其自我异乎寻常的忠诚以及它的停滞不前，部分地是其内部诸因素作用的结果。这反过来部分地说明了它为什么落后于西方——况且这种落后完全是相对的。远东并未真的倒退；它在原地踏步，而在同时，在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其他地区在明显地向前迈进，结果把它抛得越来越远。

久远的根源：远东文化停滞的原因

毋庸置疑，正是在史前时代，在最早的文明的黎明时期，事情就已定局了。远东文明呈现出来的好像是这样一个整体，它们早早地就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成熟，但处于一种使其某些基本结构几乎拒斥变化的框架之中。这使它们有了一种卓绝超凡的统一性和内聚力。但它们也发现这使得它们极难改变自我，非常不愿意变化，也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点。它们似乎刻板地反对任何进步和发展思想。

·我们必须在忘记我们西方人的经验的同时着力去理解的是，远东的这两大文明已存在了数千年之久。

在远东，纪念性建筑衰颓崩坏得太快，因为它们往往是用易碎的材料建成的，比如中国和日本就是这样。与此相反，人类社会和文化看上去是不可毁灭的。它们可追溯的年代不足几个世纪，而是远为遥远的过去。请想象一下：经过神奇方法保存下来的埃及法老（木乃伊）或多或少地适应了现代生活，但仍保存着其信仰及某些习俗。

现在仍然具有活力的印度教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印度文明几乎不加改变的基础；而它反过来又自先于它一千多年的过去中借来并传递了某些宗教观念。

在中国，对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第一千纪。这种崇拜在道教、儒教和佛教中延续下来，后三者绝没有超越它。它至今仍具有活力。

这些古老而生命力顽强的宗教体系是与同样顽固坚韧的社会结构——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等级制——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两个国家，亘古不变的宗教和社会似乎互为支撑。这是原始社会的典型特征，其中所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都完全并直接地植根于超自然力量中。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伟大的文明中，这两个在其不同的领域内如此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发现这一点，尤其让人感到不协调，但这也使得它们更引人注目。

·与把人类与圣物明确区分开来的西方不同，远东没有做出这种区分。

宗教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国家是宗教，哲学是宗教，伦理是宗教，社会关系也是宗教。所有这些都有宗教在充分参与，而这使它们经年不变地反对变革。

通过一种奇怪的但可以理解的矛盾方式，宗教对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最琐细的方面的介入，常常令西方人感到不知所措。西方人习惯于把宗教置于精神的最高点上，因而得出了错误的印象，认为远东人缺乏宗教情感，而代之以注重礼仪形式。对西方人来说难以把握的正是这些宗教仪式的重要性和真正意义。

举行这些祭祀仪式是为了与制约人类所有事务的神圣秩序相合。这是要过一种神圣的生活。因而，印度教就本质而言更多地包含的是对种姓制度所代表的价值的认可，而不是对“神灵的信仰或者对神祇的崇拜祭祀，两者都只不过是整体的一个部分”。

与此类似，中国人对区分清楚无穷尽的神祇并不怎么关心。具有意义的是向所有这些神都尽礼奉义务，做自己该做的一切事，包括对祖先的崇拜，并最终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满足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所强加的一切职司。

确实，印度的宗教内涵与中国的宗教内涵迥然不同：它们的宗教制度和社会制度完全不同。假如一个人把西方与作为整体的远东进行简单的比较，就有可能忽略远东内部的深刻差异。不必多言，印度不是中国。同时，假如说中国与西方相比看上去深受宗教的熏染，那么与印度相比，它似乎像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国度。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一次重大的思想危机，这与古希腊出现的后来孕育了科学精神的至关重要的哲学危机很相像。下文我们将要看到，儒教承袭了这一不可知的和理性主义剧变的遗产，使之与政治局势相适应，并使之得以度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各种大的宗教争论而存在下去，把它重新塑造成为自13世纪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新儒教。

因而，在中国是两种思想潮流并存，其社会的停滞不前既归因于宗教影响，也同等程度地归因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而在印度，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宗教。在那里，当人类社会的组织表现出来的是精神真理时，人们又如何可以改革这一社会，甚或对它提出质疑呢？

第十一章 古代中国

我们之所以从古代中国开始叙述，是因为它绝对没有完全消失。古代中国是在历经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后才获得并发展起它典型的特征的。此后它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实体，难以区分为历史学家所钟爱的“时期”。经过了许多个世纪，罹受了一系列无休无止的灾难，出现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征服，中国看上去没有变化，而且不可能发生变化。

不过，不管这一庞然怪物行动得多么缓慢，但它绝不是停滞不前的。像所有文明一样，中国文明积聚了经验，并在其资源和各种可能性中持续不变地做出选择。另外，它也不像外表看上去的那样向外部世界关上大门。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到了中国，并为人们感受到了。

宗教方面

它最早的诸方面，最重要和最难以完全理解的方面，是其宗教生活。这一宗教生活非常难以界定。它包括诸多不同的体系，就像西方宗教那样，但它们不像西方那样互相排斥。一个信徒可以从一种虔信形式转到另一种，在同时既信奉神秘主义也信奉理性主义。不妨设想一下，一个欧洲人未遇到哪怕最轻微的思想障碍或宗教障碍，就从新教转向天主教，甚至转向无神论，并从中选择自己之所需，那该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场面。马塞尔·格拉内（Marcel Granet）写道：“在中国人中最严格的不可知论者或最严格的墨守成规者中，存在着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中国人要么迷信要么务实，或者说两者同时兼备。”正是这种“两者同时兼备”是西方人往往难以把握的。

这些评论甚至适用于不远的过去的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把这些铭记在心。它们事先阐释了一个基本事实：儒教（人们在极其少见的情况下也说孔教）和道教大致在同一时期在中国成型，此后很晚之后是佛教的传入；尽管三教之间存在着争论和斗争，但任何一个都没有取代其他二者。实际上，它们并不总是相互界限分明的。事实是，它们把自己嫁接在一个古老得多、更为原始和强大的宗教生活之上。人们说这“三大宗教”在古老的宗教之水上航行。它们实际上是沉没于其中了。

·中国的宗教生活就其基础而论，要比嫁接于它之上的三大宗教信仰悠久得多了。在那个多重遗产中存在着许多鲜活的种类，它们遍布于所有宗教实践之中。

中国的宗教遗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千纪之前该国首次成型之际，此后没有任何东西使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犁的引入使人口比过去远为密集地聚居于村落和庄园之中成为可能。当时中国既崇拜祖先，也祭祀领地上的土地神。这既可以与希腊古朴时代也可以与罗马遥远的开端形成明显的对比，它们都有自己典型的古代城邦（la cité antique）。

祖先崇拜赋予父系家族群体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其中姓氏由父亲传给儿子。在这些家族之外，更大的氏族集团（在汉语中为"姓"）包括所有由同一祖先传袭下来、因而拥有同一姓的人。正因为这样，对姓纪（Ki）的人来说，其始祖是后稷；对姓徐（Sseu）的人来说，其始祖则是大禹，他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

就源起而论，祖先崇拜及伴随而生的家庭结构局限于贵族阶层。后来，平民家族仿效这一古老的模式，开始崇拜自己的祖先，好像他们是神似的。

在祖先之旁，同时与他们没有多少区别，供奉的是领地当地的神灵，从各家之神、山神、河神和不同地区不同自然力量之神，直到领地土地即州（Cho）上的各种神祇，这些神灵主宰了其他所有的神。"公元前548年，一位陈姓诸侯因战败而向敌人表示降服。投降时他身着丧服，手捧领地之神神像，其将军走在他的前面，抱着祖庙中的祭瓶。这样他献出的就是领地本身。"［H.马斯佩罗（H.Maspéro）语］中国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单个的领主变成了君王的臣属之后，一个统辖王土——主权国土（后土，le Souverain Terre）——的大神凌驾于所有地方神祇之上。极为自然而然的是，他是死亡之神（阎王）：他"把他们关在九幽的中心靠近黄泉的监狱中监管着他们，一年到头不让他们见到光"。此外还有天神（玉帝），有山神、四海之神和河神（河公是令人生畏的黄河之神）……事实上，古代中国有多少字，就有多少神。

这一迅速崛起的多神教相信灵魂不朽——无论是在黄泉，在玉皇大帝的天宫，还是在人间的祖庙中。人死后其灵魂的命数通常由灵魂拥有者在世间的社会地位而定。诸侯、大臣和其他重要人物注定在来世天国中享受幸福生活，其中最有地位者仍有仆从环侍。普通人死后下到了黄泉、九幽，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地狱。地位介乎两者之间的灵魂存活于祖坟中。这几者的边界线有些模糊不清，部分原因在于每一个人都有好几个灵魂，部分原因在于来世之成为可能，是生者在现世供奉和祭祀神灵的结果，是神祇的恩赐。死者和神都要吃东西，"我们往木杯和陶杯中放满供品"，在举行牺牲仪式的同时唱着赞美的歌曲。"供品的香味上升后，天帝就开始享用食品。"

在神和生者之间，通常要达成如下的规则：前者提供保护，后者则提供祭品。一位神灵这样宣称："你们向我提供牺牲，我就会赐予你们幸福。"一位王侯这样请求："我供献的东西充足而纯洁，神灵肯定会帮助我。"另一位王侯则抱怨道："人现在到底犯了什么罪，竟惹得上天降灾祸给我们，令食物和蔬菜缺乏！凡是神没有我不敬到的，我没有漏掉过任何一次供献牺牲的机会。"

·"战国时代的危机"。公元前5—前3世纪之间，封建制的中国在一个被称为"战国"的多灾多难、动荡不已的时期分崩离析。

在那一时期，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领主被或多或少规模更大、或多或少更为稳定的诸侯国吞并了。最终汉帝国拔地而起，通过统一实现了和平。

在这一漫长而激烈的危机中，中国的思想家产生了强烈的忧虑情绪，出现了激烈的意识争论，这是对昔日程式化的宗教做出的反作用。未来中国的整个知识都受到了这一骚动不安时期的影响，这使人联想起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政治和社会惨剧，此时无论对僭主还是对臣民来说，面临的首要问题都仅仅是生存，或者说如何存活下去。

就这样，在公元前6—前3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其政治家（法家），他们精心估算着环境可能给君王或国家提供的机会（时，che）。中国还出现了自己的修辞学家，即自己的诡辩家，他们关注的是公共利益。这些诡辩家通常属于古时的墨翟（或墨子）学派，其信条被称为"墨家学说"。

墨子的信徒是类似于某种为受压迫者打抱不平的骑士，还是类似于托钵修会那样的宗教团体？这一比较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义务"。历史学家在相当晚的年代后给他们起的"诡辩家"一名也反映出他们谈话、通过辩论而说服人、每人都遵循其不同的思想体系进行无休无止的激情辩论。墨家学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的哲学，这一学说与严格的宗教指令迥然不同，是在这些生动活泼的讨论的背景中脱胎成型的。

这些哲学创新只有一部分残存到了汉代。这一部分能够存在下来，就广义而言，是因为它变成了儒教，也就是说一种显然是理性的趋势，是对古老宗教的反作用。但这同样是对诡辩家滥用修辞术的一种反作

用，是其信条的多重性与它们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的结果。事实上，儒教在知识、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回归了秩序。

与此同时，儒教使一种虚假的理性主义在中国永久流传，这种理性主义经受住了道教和佛教的宗教压力而存在下去，后者直到10世纪之前曾非常强大。到了13世纪，它发展成为新儒教，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儒教不仅是对世界做出理性主义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且是一种政治和社会伦理体系；假如说它不像前文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宗教，那么它至少是一种使自己既与怀疑论甚或赤裸裸的不可知论相协调，也同样与某种宗教感情相合的宗教态度。

儒教得名于孔子（按传统说法，他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尽管孔子自己没有留下任何作品，但他的教导由其门徒传了下来。他实际上创建了一种后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他本人是其中的一分子）之象征的体系。

（A）儒教事实上首先是一个特别的等级的表现，这一等级是一个叫作士（mandarins）的文人阶层。他们是在中国封建制分崩离析后一个逐渐崛起的新型社会和政治等级的代表。简言之，他们是这一新型中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公务员”。

这些受过教育的公务员（文官）体现的是国家的权威，他们随着第一批大型邦国（诸侯国）的形成，随着文字变成建立秩序和政府的必要条件，人员变得越来越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只被获准拥有低级和从属性的职位，而大贵族家族垄断了重要位置。但第一个大帝国即汉帝国（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建立，确保了官僚制的最终胜利。

儒教的发展与文人阶层的教导密切相关。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的大学传授的是一种已经非常复杂的教义，这一教义以阅读和注解五部经典著作（五经，包括《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和《礼记》）为基础。此五经据认为代表了孔子的传统，但它们形成的年代既有早于他的，也有晚于他的，同时其文本实际上是在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才由学者重新编订并解读评注的。

每一位老师只教授一部书，永远是同一部书，并且只根据一家的解释。因而在大学中，对一部书有多少种解释（公元1世纪时是15种），

就可能有多少位老师。各位老师都仅仅是直接向十几位助教传授，后者反过来去教学生。公元130年，大学计有1800名在学学生，另有3万名旁听生。学业考试非常严格。试题写在木条上，应试者用弓箭瞄准木条射击，射中哪根木条，就回答哪根木条上的问题。

大体上讲，这种制度一直存在到了20世纪初期。不过，自然而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了种种修正、新的注解和具有真正价值的“概述”，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部新的著作。这些修订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是在8—12世纪由5位大师完成的，他们是后来所谓新儒教的创始人。这5位大师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朱熹（死于公元1200年），他创建的新儒学直到1912年中国帝制时代结束一直是中国哲学中不变的指南和正统学说。

（B）作为高雅之士的一种学说，儒教是对世界力求做出解释的一种尝试，它在尊重传统总的内涵的同时，却排斥大众原始的信仰。

由此产生了它非常高贵的冷漠超然，它对民众宗教（迷信）的蔑视，以及它那非常明显的怀疑论。孔子从未提到过神；尽管他尊重鬼魂，尊重祖先，但他更愿意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他曾这样说道：“活人还不能被服侍，怎么能去服侍死人？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4]

孔子的追随者（儒家）对自然力量和人类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做了一种总的解释，这可以被视为建立科学的宇宙学说的首次尝试。他们认为，世界的生命及其荣枯盛衰，不是由神祇的反复无常，不是由他们的喜悦或愤怒决定的。居支配地位的是不具人格力量的交互作用。因而他们谈论天，而不谈论天上的神……不过在述及这些新奇的解释时，儒家使用的常常是极其古老的术语和概念，它们来自民间，甚或来自农民那里，但赋予它们新的哲学意义。阴和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民间用语和民间文学中，这两个词实际上指的是“一组形成对比的形象”：阴可以指树荫，阳指太阳；阴代表冬天湿冷的季节，阳代表夏天干热的季节；阴代表阴性，亦即被动，阳代表男性和主动……儒家拿过了这两个词，把它们用来表示“宇宙中两个具体的和互补的方面，它们在空间上相对，在时间上互相交替”。阴和阳的相互对抗是宇宙中一切能量的源泉。它们在时间上的更迭持续不断，永无止境，“休息的时间叫作阴，活动的时间叫作阳；两者永不可能共存，而是无休止地彼此交替，而其交替决定了万物”。季节尤其是这样：阴秋冬为阳春夏替代；这同样也说明了日夜、冷暖交替出现的原因。就人类事务而言，阴

和阳的“争斗”产生了爱和恨、怒和乐……

导致阴阳交替作用的原因是道。道指的是自我更新，从而也就是所有存在之统一和所有运动之统一的原则。俗语云：“一阴一阳构成了统一，即道。”

不幸的是，假如在自然界中万事万物都循着它们的道即其笔直的道路，假如上天之阳与大地之阴完美无缺地交互更替以解决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问题，那么人类是宇宙中的一个特例。他们是一群特别的捣乱分子，独具不遵循道并偏离其正确的道路的自由。如此他们就以其恶行破坏了世界原有的和谐。

儒家相信，人类以这种方式陷到所有麻烦之中，不论这种麻烦来自自然界（日食、月食、地震、洪水泛滥等等），还是来自人类（革命、社会灾难、饥馑，诸如此类）。与此相对，新儒家把人类毁灭力的范围修正为人类自身。人类因缺乏美德而遭受到堕落的惩罚。下文我们将要看到，这也是帝权的原则：根据它们是不是沿上天规定的正确道路前进，最高权力自动得到提升或者被剥夺。

（C）儒教借此建立了一种旨在维持社会和国家之秩序、等级的伦理、生活规范，而对诡辩家（墨家）和法家在知识和社会上的无政府状态做出了强烈反应。

儒家从古代宗教习惯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对家庭和社会态度做出了规定；这么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平衡道德伦理和控制情感。这些程序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他们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循道而行首先意味着所有人永远保留自己在社会等级中正确的位置上，或不如说待在分配给他们的地方。“孔子有关仁政（好政府）的著名定义的真正含义是：‘让君王成为君王，臣属成为臣属，父亲成为父亲，儿子成为儿子！’”[5]

自然，人们对君王或官员的服从和尊重起因于他们的权威。“君王的本性像风，小民的本性像草。风吹来时，草总是要弯腰的。”臣子的基本美德是绝对服从，此乃社会和谐之所系。由此出现的是儒教继续赋予“祖先崇拜”以重要地位，这种崇拜被“摈弃了所有宗教情感，但要充当等级制的胶合剂”［艾蒂安·巴拉斯（Etienne Balazs）语］，因为祖先崇拜在家庭内部维持了等级制和绝对服从。

显然，“儒家谆谆教导的那些美德，如尊敬、谦让……服从听命于地位高和年长的人等”，有力地强化了文人阶层，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这种形式化的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中国的延续和社会静止不变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道教问世的年代与儒教大致同时，也是产生于那一旷日持久的危机之中。道教代表的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追求，是一种寻求个人得救的宗教。由于其形式通俗易懂，它与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秘密社会联系在一起。

从理论上说，道教起源于老子（“先生”）的教导。老子是公元前7世纪的一个神秘人物。但那部归结到他头上、阐述了他的信条的著作 [6]，成书年代仅仅是在公元前4世纪或前3世纪。

（A）道教是对绝对和不朽的一种神秘主义追求。

与儒家一样，道家出于自己的目的对人们普遍使用的术语“阴”“阳”和“道”重新做出了阐释。在他们看来，道是一种神秘的绝对，是“万物由以滋生”的原始生命力。

给这一神秘的绝对下个定义不是件容易的事。请听听被认为是由老子撰写的古文献是怎么说的吧：“人们试图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道，其本身就不是道；希望给出名字的名，就不是真正的名。无名，代表着宇宙的本始；有名，是万物的根源。让我们从无中观照道的奥秘；从有中，去观照道的端倪。无名和有名这两者，来自同一源，而名称不同。这单一的源泉称为黑暗。用黑暗观照另一黑暗，是了解一切奇迹的法门。”[7]

道家寻求的完美或圣洁，是与永恒之道的神秘结合：“在这一本原的和至高无上的存在中消隐活生生的自我，这一存在包掩万物，而自己从未被包掩”，在“孕育万象的无形中，在拥有永恒生命的道中”消隐活生生的自我。这么做是在同时获得不朽。

这是一种神秘的体验，其本身非常难以理解，只能通过禁欲苦行和沉思默想才能实现。“不要用你的耳朵去听，而要用你的心（在中国人眼中，心指的是精神）去听；不要用你的心来听，而要用气息去听。……气息是空虚的，它可以接纳各种事物。只能通过空虚才能达到道，这一空虚就是心的斋戒。”[8]

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长年的沉思默想和斋戒，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善功，去实现一位大师据说在几天就可以实现的东西。“持守三天，他就能与外部世界脱离关系；七天以后，与其四周之物脱离关系；九天之后，可以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这样……他就能达到清明洞彻，而后能看到独一无二之物。看到了独一无二之物，他就进入无今也无昔的状态，并最终没有生也没有死的概念。”[9]

在这里，道教与所有神秘主义体验，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还是佛教的，都走到了一起。

（B）但道教寻求的不朽不只是解救灵魂，还包括借助于一系列长生秘诀，净化并“卸除肉体的负荷”，获得肉体的不朽（即长生不老）。

与此相关的做法实际上不计其数：进行吐纳训练，以帮助呼吸和血液的自由运行，并避免“阻碍、凝结和结节”；小心注意饮食，不要吃普通的食物（尤其是谷物），而代之以蔬菜秘药或矿物质药品；最后是炼制丹药。后一种做法包括用于净化所有食物的金器，熔解的金水，尤其是朱砂（硫化汞），朱砂要先化为水银，再由水银还原为朱砂，如此循环往复计9遍，最后制成“长生不老的红色丹丸”。通过这些不同的修行，“骨头变成了黄金，肌肉变成了玉，身体则变得不会腐烂”；此时身体轻若稻草，能够上升到极顶，把现在变得不朽的炼金术士带到神的住所。为了避免烦扰世人，他假装和其他人一样死去，把他做的与躯体非常相像的一根棍或一把剑留在了身后。

炼丹术研究和对长生不老药的追求，让人想起长春（意为“永远保持青春”）真人[10]的故事。成吉思汗为了寻求长生的秘方，邀请这位道士在75岁（但据说是200岁）时，离开自己的道观前往蒙古。1221年这位老道士抵达时，大汗问他：“你给我带来了什么秘方？”道士答道：“什么也没有带来。我随身只有一个道来确保我的生命。”1227年，他和大汗在几天之内相继去世。

（C）最后出现的是一种大众化的宗教，它无视宗教领袖的神圣，无视各种追求长生的复杂做法。汉语本身把道民与真正的炼金术士，道士，做出了区分。

许多道民满足于参加众多的法会、提供充足的献祭和苦行。他们本人不能声称获得长生，但那些生活纯洁的人被确保在来世有一个更好的存在。他们不能躲过黄泉，但可以充当大地之神的助手，统管处境悲惨

的死者。这些细节显示出大众版的道教是如何与古代信仰达成妥协的（就像在其他事务上那样）。

这一大众化的道教一再组建等级极其分明的教会，以及一系列或多或少带有无政府和神秘主义倾向的秘密宗派。与儒教这一社会等级中奉行传统主义的派别相比，道教一直是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和反叛的象征。

·“三大教派”中最晚来到中国的是佛教，它是由来自印度和中亚的传教僧侣引入的。不过它也从中国传统思想这一公共思想宝库中借鉴了许多东西，并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深刻改变。

（A）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形成于印度。阿育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73—前236年）佛教在那里步入兴盛时期。后来它逐渐遭到印度教的排斥，并为后者同化，但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在亚历山大征服后残存的希腊统治者中，仍有一些崇拜者。此后它传到了中亚，包括大夏（Bactriane，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和塔里木盆地。

正是在这里，在大约公元前2世纪，来自中国的征服者与佛教相遇了。三个世纪后，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佛教开始进入汉帝国，其路线部分地是沿中亚商路，但也通过海路和穿过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而来。不太长的时期过后，公元3世纪，它确实在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传播开来，其信奉者既包括社会上层，也包括大众。直到10世纪，佛教在中国仍具有压倒性影响。

佛教教导人们说，在死后人转投到另一个躯体上再生，这一新的生命根据他们在前世的行为而决定是更加幸福还是不幸，但其中总是涉及受难。摆脱这种苦难的唯一办法是佛陀宣讲的道路：这使它有可能实现涅槃（Nirvana）[11]，也就是说融入一种无条件的永恒生命之中，并从轮回“循环”中解脱出来。这一道路障碍重重，因为导致人们在死后再生的是其生的渴望。这必须通过超脱和出家加以遏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理解的是无论自我还是自我周围的一切都不过是些幻象，不是任何真正的存在。这种理解不是一种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认识，而是一种直觉，是一种灵感，圣哲只能通过一生（往往是几生）沉思默想和精神训练才能达到。

（B）这一与中国精神迥然不同的宗教在一开始就能够取得成功，是长期误解的结果。它没有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最早的佛

教徒都来自道教圈子，这些人声称佛教不过是他们自身宗教的轻微变异。确实，这两个宗教都建立在得救基础之上，而其沉思默想的做法从外表看来非常相似，尽管佛教的沉思默想遭到的皮肉之苦较少，看上去可能更有吸引力。研读相关的梵文文献可以消除这一争论，但这些文献是在后来才传入中国的，把它们译成中文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最终进行这一工作时，通常是由印度传教僧侣和最早皈依佛教的道教徒合力完成，他们自然而然地使用了道教的词语，这样一来，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就这样，佛教徒的灵感与道结合在一起，“Nirvana”一词被翻译成中文“涅槃”，该词本来是指永恒不朽之所，诸如此类。多亏了众多的和尚庙和尼姑庵，这一被扭曲的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

如同道教的情况一样，一种大众版的佛教应运而生，它团结的是那些满足于参加最简单的仪式、念祷文、提供捐赠、避免犯五种大恶[12]和参加大型法会（在法会上，僧人从其阴间居所中召唤先祖的亡灵，从而拯救他们）的信徒。通过同样的措施，如果得到在人死后负责拯救被罚入地狱的灵魂的圣徒的祈祷，信徒本人也可望到达西天极乐世界。

（C）这一误解只是在人们可以阅读到诸多梵文佛经的译本后，也就是非常晚的时期后，不早于6世纪和7世纪，才得以消除。

实际上，道教和佛教是相互矛盾的。一个在“寻求不死的良药”，即肉体的存活；另一个则视肉体为因人类的先天不足而被强加的羁绊，是一种甚至并不真正存在的东西。对佛教徒来说，自我本身是不存在的：达到涅槃后，所有的人格都化为乌有。对道教徒来说，在长生不老的天堂中，每一个圣徒都可以永久地保留自己的人格。

中国只有少数思想家为迟迟才被人们发现的这些差别，为无法像其中一位思想家在7世纪所写的那样“用佛教体系达到道”，而感到困扰。到那时，佛教已经“汉化”了。佛教时而得到提倡，时而受到压制。公元845年曾受到灭佛的严重影响，所有寺院都被关闭。[13] 但佛教仍然长久保留下来一定数量的“适当挑选的信念，中国承认它们是它的遗产，而不改造为自己所用”［戴密微（Demiéville）语］。就这样轮回信仰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其中包括道教的高层人士，而在同时，佛教的形而上学学说自13世纪起对新儒教产生了深刻影响。

因而，我们不能说佛教被中国文明毁掉了。反过来，它对中国文明做出了补充，在其身上打上了自己永久的烙印（比如在不计其数的艺术作品中），同时浸淫于中国文明的影响之中，无法祛除。然而，这恰恰

是所有宗教在中国的命运。

·那么，在13世纪乃至今日新儒教的兴盛之外，宗教对大多数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

换言之，大多数中国人从那些用砖头建造、涂有明亮颜料的寺庙中看到了什么？这些寺庙在普通的木墙或泥墙、棕灰色的房屋中显得鹤立鸡群。没有任何宗教是特别的，所有宗教同时存在。

每一批信徒都是有时转向佛教僧侣，有时转向道士。佛教和道教在同一座寺庙里举行宗教仪式；庙里立着释迦牟尼的塑像，还有地方神的祭坛或者孔子的塑像，孔子本人几乎被神化了。祭品是供奉给所有这些神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据说在中国的一个寺庙里举行了联合祈祷，列出的神祇共有687位，包括耶稣。饶有趣味的是，这一大批神中包括某些最早时期的神，同时古代的任何一次宗教争论都没有赋予任何一种形式的信仰高于其他信仰的权利。

马可·波罗时期，在当时控制着中国的蒙古大汗的宫廷中，爆发了一场看上去会毁灭一切的宗教风暴。大汗免除了所有儒者的职位（只保留了他用作文官的那些人）；迫害道士，在许多情况下把他们处死；鼓励蒙古的萨满教（精灵崇拜）和藏传佛教（尤其是后者），在宫廷接见其喇嘛、法师和巫师。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斯脱利派也受到他的青睐。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不久，一位西方修士弗拉·焦瓦尼·孟迪科维诺（Fra Giovanni de Montecorvino）甚至成功地在汗八井（北京）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教堂离皇宫很近，他甚至可以听到那里的钟声。弗拉·焦瓦尼·孟迪科维诺写道："这一异乎寻常的事实为各地的人知晓。"不过无论他的理想还是后来耶稣会士的理想都没有成功。到底有没有可能使中国人都皈依一种宗教，尤其是一种来自异域的宗教？

政治方面

在这一节，根据标题，我们必须追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仅仅考察意味着帝国宏伟壮观制度的群体习惯和礼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出解释的是，它如何把其力量归诸一个文官团体，他们直到昨天仍然是中国社会和文明中最引人注目的原创性特征之一；最后，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些制度为其取得的成就所证实：在一个巨型社会中维持了稳定，在一个广袤的国度实现了政治统一。统一是帝国君主制存在的理由。

·帝制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的连续性”。

按照中国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君主制追溯到4000年前，计有22个朝代，在官方史书中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相互承袭，其间没有任何哪怕轻微的间隔或中断。但是对这一处理我们不应抱有幻想。首先，其平稳的朝代更替因骚乱和冒名顶替而被打断。其次，帝国机构在中国真正出现是在秦朝“第一个皇帝”（始皇帝），即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06年在位）实现统一、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予以巩固和使之稳定下来之后。

如果我们同意把这一有理可据的年份视为中华帝国的起点，那么这一帝国自公元前221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911/1912年满族人王朝（清朝，创建于1644年）的灭亡。因而帝国在中国是一个长时段现象，是一个轴心，围绕着它，中国的历史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缓慢运转。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定见：他们试图强调君主制的长期性和合法性，同时如果是出于恢复秩序的必要，把中国历史回溯到史书未能记载的时期。因为在中国，这一秩序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秩序，也是宗教秩序，以超自然价值为基础。

社会秩序和超自然秩序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而皇帝既是俗世的统治者，也是精神统治者；他的任何行动都不纯粹是世俗性质的；实际上他既监管世界之自然秩序，也监管超自然秩序。作为神俗两界的最高主宰，他不仅任命官员，而且对寺庙的僧侣统治集团具有决定权，为“这一神化的古时贤哲”命名，或者主持农田开耕仪式，在春节时象征性地用犁开出第一条犁沟……

汉学家们常常这样说：中国的君主制不是神权。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方的神权国王相比，这样讲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国的帝制与西方的帝制，比如说古罗马的帝制之间的共同点岂止一处。“中国的政治学说从不教导任何类似于西方的神权国王的信条”，但是，如果皇帝是“真正的天子”，如果他靠着承天命进行统治（奉天承运），那么还有必要像中国一位哲学家说的那样，达成一个“仅奖励有德者”的约定吗？帝国及皇帝本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灾难，美德在解释灾难产生的原因时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洪水泛滥，严重的旱灾，抗拒纳税，野蛮民族犯边时军队失败，农民起义——上帝才知道到底发生了多少次，所有这些麻烦都是因为破坏了根本契约，是因为皇帝失德造成的，如此情况下他们不再承受天命。这类征兆是不会弄错的：它们王朝变迁的征兆，在数代人力求避免重蹈一位无德皇帝的覆辙后突然湮没无闻。至少在古代中国，人

民起义被视为皇帝即将失去帝位的先兆。一个古代谚语这样讲："上天通过人民的眼睛进行观察。"（这与西方的vox populi，vox Dei [14] 有点相似。）

因而，上天的授权会合法地从一个失德的家族转到一个新王朝手中，该王朝必须拥有道德，因为它得到了授权。"中国人说的'革命'一词，译成我们的语言为révolution，中华民国时代采用了它，字面意思是'收回授权'。一位统治者失去了这种不可缺少的保护，就不得不退位。"因而，为了帝祚的承续和中国的统一，调整连续相继的各王朝的年表以消除"间歇日"（乱，jouen）——我们会称之为僭主当政的时期——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王朝结束了，另一个王朝必然承受天命。对历史学家来说就会产生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在一个动乱年代，几位对手争夺权力甚或分享权力时，应当如何处理？那时中国历史学家发现很难说哪一位是天命或者说"连续性"（tchang-t'ong）——也就是我们西方人所说的合法性——真正的承继者。由于缺少好的解决办法，他会选择那些在他看来"最为适宜的人"，在追溯时给予他们"天子享有的所有尊重"。

根据正当理由把合法性授予那些有能力夺取权力的强者（因为他的力量必定来自上天），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为何尽管出现了戏剧性的政治灾难，却具有历史延续性。

这一亘古不变的君主制的盛宴富丽堂皇，异乎寻常：朝廷、王宫里站满了大臣、官员、太监、嫔妃和姬妾，典仪进行得宏伟壮观。宋朝一位皇帝到都城杭州南郊的寺庙上香上供，祭祀祖先和上天。在他去之前，通往该寺庙的大道预先经过了修整，且铺上了沙子。士兵列在道路两旁，经过精心装饰的大象走在御辇之前。队伍开始行进时，路旁在夜幕降临时点燃的火炬马上一起熄灭。这种场面非常雄伟，激起了民众的情感。毋庸置疑，世界上的统治者没有不考虑复杂、经过严格筹划的典仪的效果的，比如，法国国王进入效忠于他的城市时的"入城"仪式同样声势浩大，侍从众多。中国皇帝举行的仪式有着类似的深刻动机，但更讲究排场，更具有宗教权威。要想估量这些典仪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奥古斯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系列王朝进行的风格和意义完全相同的仪式在欧洲产生的影响。

·这种君主制就本质而言非常原始，却与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官僚队伍（文官）并存。

西方对此感到迷惑，对其真正的地位产生了误解，徒劳地试图在明代或清代中国中找到一种与欧洲或多或少对等的社会阶层；在欧洲，在君主制之旁，有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中国文官的重要性致使他们在西方人眼中非常类似于贵族。

事实上，他们是高级官员，人数甚少，是通过复杂的竞争性考试遴选出来的。他们受过的教育就像其职业（但不是其出身）一样，使他们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等级（在13世纪时他们可能共有1万个家族）。尽管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社会等级，但想进入并不容易，因为它是专留给士阶层的；其知识、语言、忧虑、思想和气质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但在同时使他们与世上其他阶层分裂开来。

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不被描述为贵族、领主或财阀（其中某些人是）。按照艾蒂安·巴拉斯的说法，他们最近的同类，是我们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官僚”。这些人作为强大国家的代表，是非常强烈的干涉主义者，关注效率和生产力，不折不扣地恪守理性主义。

中国的文官与他们相似：

（1）与他们一样，他们由于其知识资格和会试成功而享有社会地位和独特的威望。

（2）与他们一样，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绝对的权力、影响、地位和威望”。

（3）与他们一样，他们“只知道一种职业，即管理、指导”。

孟子（死于公元前289年）有关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区别的一段广为人知的话明确地表现了文官的理想：“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两者是不同的。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统治别人，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则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而统治者则靠人养活。”[15] 嫌恶体力劳动是荣誉的一个标志：一个文人把指甲留得长长的，他的手只有一个用途，即拿毛笔写字。

但治理在古代中国寓意如何呢？大致说来，如同在现今的一个国家，担负起行政和司法的一切事务。官员们负责征税、审理案件和维持治安，如有必要还要领兵打仗，执行军事任务，制订工作计划，建造和维修道路、运河、堤坝和灌溉系统。他们的作用在哪里？在于“匡正大

自然的严酷”，预先防范洪涝干旱，储备食粮。简单地说，也就是监管一个要求有严格纪律的复杂的农业社会之正常运转，尤其是处理河流系统，确保灌溉得以有效地进行（这里我们引述的是魏特夫的解释）。

中国的官僚代表了这一纪律，代表了社会、经济、国家和文明中的这一稳定。他们是秩序的化身，反对的是无序混乱。秩序无疑不是纯粹的幸福。但它是“为了保持中国文明的同质、长期存在和活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面对封建领主和农民社会——一旦任由它们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滑向无政府状态，只有官僚的铁腕才能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统一。因而，面对反对一切集权限制、号召回归自然状态的道教，官僚们宣讲等级、社会秩序和儒家伦理的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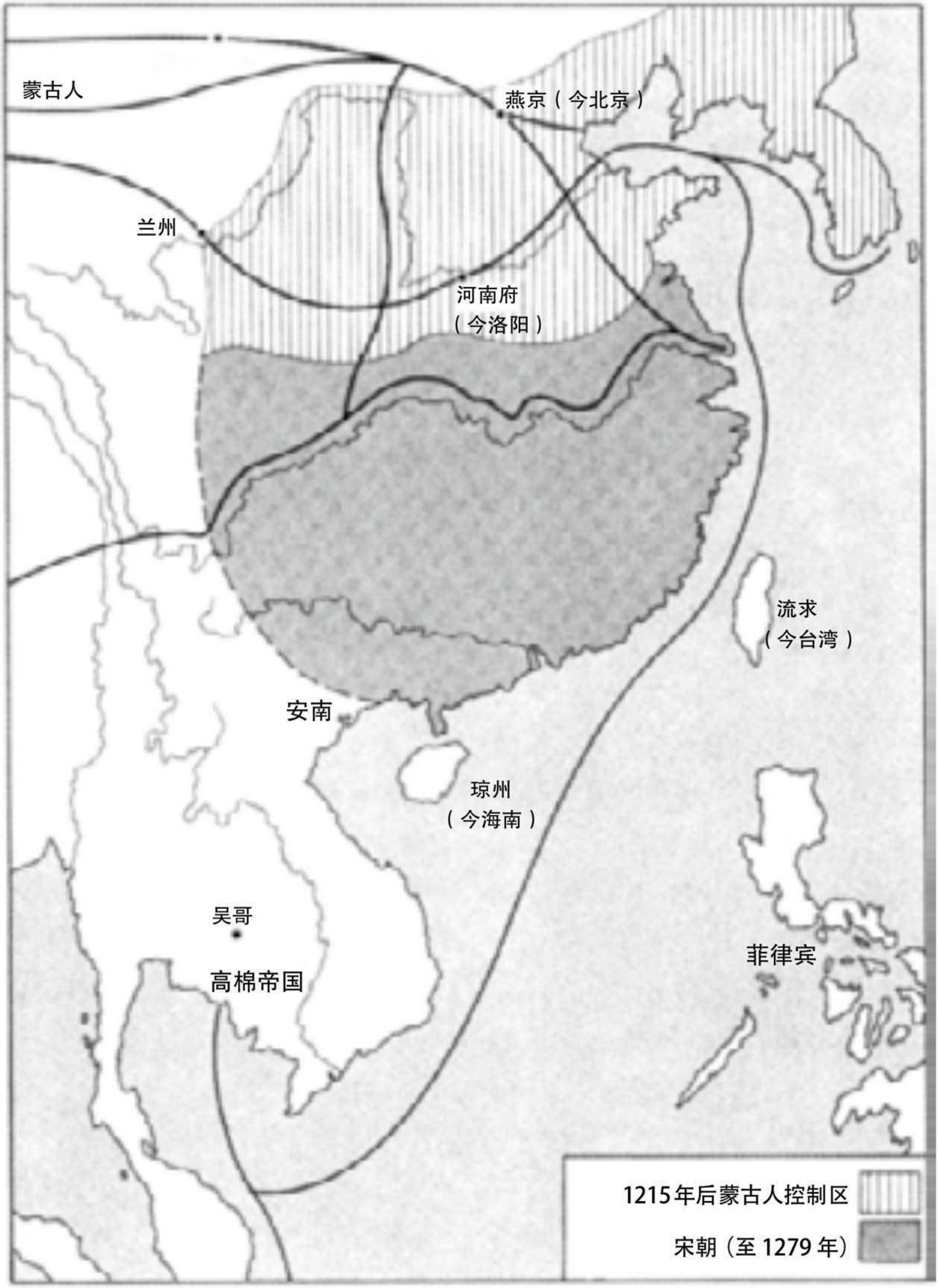
就此而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负有责任。他们在大地产主和贫穷的农民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前者负有其职司，后者无论如何仍保留其贫瘠的土地。另外，官僚们还对崛起中的任何资产者、商人、高利贷主和新贵保持警惕。他们在受到监管的同时，也为官僚的威望所征服：正常说来，发财的商人会耐不住士人生活的诱惑，经受不住权力的吸引，从而参加著名的科举考试……这至少是中国社会为何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发展成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它仍停留在父家长制和传统主义的阶段。

·中国的统一，就是北方加上南方。中国直到13世纪其整个疆域都遭到灭顶之灾时才真正实现了统一。

蒙古人征服（1211—1279年）的顶点是消灭南方的宋朝（南宋）并占领其都城杭州；此后不久马可·波罗访问了这里，目睹了它的富裕繁华。中国的这些新统治者不仅把中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地理极限，而且赋予这一不同空间的集合体生命和力量。后者在汉朝、唐朝和宋朝统治时期经常汇集在一起，但正是在现在，这一已经实现的进步达到了顶点，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南方的财富和优势地位，并把这一财富带到了帝国各地。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南方一直是一个“远西地区”[16]，一个“半处于蛮荒状态的梅佐焦诺[17]”，除偶尔有一些难以控制的原住民部落外，居民很少。然而，至晚自11世纪起，由于有了可以一年两熟的早期稻子品种，南方从其半殖民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自那时起，它就成为中国的粮仓。如果说前两千年（11世纪之前）主宰中国的是黄河流域的民族，那么第三个千年（自11世纪到20世纪）则多多少少成为长江流域及

更靠南的、远至广州的民族独占的领域。然而，蓝色河流之国的都城南京和杭州都被北京取代了。北京作为一个首都在北方建立显然是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这是为了充当一道屏障，防备北方蛮族和游牧民族入侵的危险。



蒙古人
燕京（今北京）
兰州
河南府
（今洛阳）
流求
（今台湾）
安南
琼州
（今海南）
吴哥
高棉帝国
菲律宾
1215年后蒙古人控制区
宋朝（至1279年）

图10 古代中国的道路和河流（粗线表示道路，细线表示河流）

南方的优先地位不久就反映在其人口的规模上。到了13世纪，有10个南方人，才有1个北方人。南方在品质和效率上也享有优势，今天仍然如此。在已往的三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来自江苏省和浙江省，而20世纪中国革命的多数领导人来自湖南省。这事实上是大约一千年前中国重心转移的结果。在11—13世纪之间，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给出产稻米的地区带来了长久的好处，而对出产小米和小麦的地区不利。但这一新的中国仍然是过去的中国，是过去中国的延续和丰富发展。我们可以这么说，南方是中国的美洲——正如东北在相当晚的时间之后在20世纪时扮演的角色那样。

社会与经济方面

构成其停滞不前基础的古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处于半静止不变状态。它们事实上是一座大厦的地基。

·与全球所有社会一样，中国也是相互交错的不同社会的集合体。一些社会保守，另一些社会进步。其中任何变化（当出现变化的时候）都经历了一个让人难以觉察的演变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是农民和无产者，其中大量是贫苦农民和一贫如洗的城市居民。这一穷人的世界很少能见到自己的主子：它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能见到皇帝或同宗王公，后者人数很少，却异常富裕；也很少见到大地主，而更常见的是与他们并肩劳动、非常招人恨的管家；同样少见的是令人敬畏的大官，他们从远处治理国家，如科尔特斯神甫所说，“用的是一个竹笏”。然而，大家都很同情低级官吏，同时谁都巴不得高利贷主和钱庄老板暴死。

凡此种种至少是宋朝以来民间传说的主旨。

这些民间传说描述的是一个既实行父家长制又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既现代又小农的社会，这一社会与西方社会的“范式”无疑迥然不同。

说它是父家长制，是因为它有着强有力的家庭联系，有着长期的、没有中断的祖先崇拜纽带。“家庭的相互联系延伸到最远的姑表堂兄弟，甚至到了孩提时的朋友身上。这不是慈善行为，而是公道问题。一

个飞黄腾达的特权人士利用了家庭集团的优势，得到了列祖列宗的保佑。因而，一个这样利用了家庭好运的人应与所有亲戚分享他欠他们的荣华富贵，完全是公平的。”

同样，这一个社会也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或者说，假如奴隶制不是其主要特征，那么这无疑很普遍。总的说来，奴隶制是冷酷无情的贫穷和无法解决的人口过剩问题造成的。时局艰难时，不幸的受难者只好出卖自己，而且在整个远东，都有父母把子女卖作奴隶的现象。这一习惯在中国一直维持到1908年，清王朝即将倾覆之时；该年法律禁止奴隶制，禁止出卖儿童。然而，它授权父母“在饥馑时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把其孩子交出，为他人劳动到25岁”。

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社会。那里没有享有封地的封臣，没有采地，也没有农奴。许多农民拥有自己的一小块田地。但在他们之上有“乡间名流”（绅士），他们出租自己的田地，时常充当放贷者，要求农民为他们劳动，并要求他们在使用其炉灶、磨坊时缴纳费用，最常见的是实物，如一斗粮食、一罐猪油。与此同时，这些显贵与官僚（他们中不少人是大地主）有联系，后者如前文所说代表了国家利益，因而倾向于在一个阶层的力量过于强大时进行遏制，尤其是封建阶层的利益，因为这有可能会对中央权威形成挑战。

这一复杂的社会网络在旧的等级制的四个集团中维持着秩序。在这四个集团中，处于顶层的是官僚（士），以下依次是农民（农）、艺匠（工）和商人（商）。后两个有可能扮演主导角色的集团像其他集团一样受到心存警惕的政府的抑制。不管怎样，他们的影响只有在经济有了突然发展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些不过是断断续续发生的。

·尽管许多热爱中国的专家和历史学家坚持，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很有限；坦白地说，与西方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很落后。

当然，我们不能马上指责中国相对于欧洲在全球处于劣势。中国的劣势在于其经济结构、市场通道和商人中产阶级不如伊斯兰世界或西方发达。首先，这一点最为关键，中国没有自由城市。那里也没有渴望赚取利润的企业家，这一热望可能令人憎恶，也可能不令人憎恶，但它在西方肯定是促进进步的一个动力。早在13世纪，中国商人就乐于把钱花在荣誉的虚饰排场上；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的商人相似。但与西方同行非常不同，他们有品位，热爱文学。一个商人的儿子能够撰写各种形式的诗歌。“描写商人生活的所有文字（自宋朝的传奇以来）都证明，他

们的目的是赚到足够的钱去过舒适的生活，完成其道德和社会义务，尤其是履行自己对父母和整个家庭的责任。”对那些巨富来说，还包括让他们的某位亲戚步入享有特权的官宦阶层。

换句话说，他们只是与西方资本家在部分方面相同。另外，中国许多商人像手工匠人那样，是游移不定的，从一地迁到另一地，仅此就表明中国经济尚未达到成熟阶段。欧洲在13世纪已经从那一阶段崛起。在中世纪早期，行商是常规，但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固定在一地的商号。只有贫穷的商人才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商品游移，因为他们没有代理人或分号，不能通过单据经商。同样，只有贫穷的艺匠才背着自己的家当穿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找活干。但是在中国，甚至到了18世纪，制糖师傅仍带着自己的工具到甘蔗地里，用手折断甘蔗，加工糖浆和红糖……工业的集中同样非常罕见：在北方是几座非常原始的煤矿，在南方有著名的瓷窑。

此外中国也没有信贷制度。这要等到18世纪和（在某些地方）19世纪才会出现。这样一来，长期一直被视为中国社会毒瘤的高利贷主事有重要地位，此乃一个落后、令人窒息的经济的明证。

最后，尽管中国拥有河流、帆船、舢板、木筏，在各省之间存在自由贸易，有其搬运工，在北方有驮队，但它仍罹受内部交通不畅之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为局限。此外，它的人口也太多了。

·中国向外界开放得很少，倾向于主要靠自己的资源生存。事实上，它只有两个大的出口，一个是海洋，一个是沙漠。就连这两者也只能在条件有利时，在旅途的终端有潜在的贸易伙伴时才可能使用。

在蒙古人统治中国时期（1215—1368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1240—1340年），这两个出口都畅通无阻。马可·波罗及其家族的朋友和保护人忽必烈大汗（1260—1294年在位）做出很大努力建造了一支舰队，这样就可以摆脱穆斯林的舰船，并保护自己不受日本竞争者和海盗的侵袭。与此同时，他清除了一切障碍，使蒙古大道一直畅通到里海以远，到了黑海及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在喀法（Caffa）和塔纳（La Tana）地区繁荣的殖民地。

这一开放的中国不可否认非常繁荣，西方商人向它提供了钱币。奇迹中的奇迹，是它还发明了纸币。但这仅仅持续了一段时间。

不管怎样，明朝把蒙古人赶回到沙漠（1368年）和清洗这些无法同化的舶来因素的民族大革命，实际上是与关闭其海陆两条商道的举动同时发生的。沙漠又一次成为无法穿越的屏障，而海洋最终为事实证明同样令人失望。自1405年到1431年或1432年，海军元帅郑和进行了不下七次成功的远洋航行，其中一次远征舰队由62条大型平底帆船构成，船上士兵达1.78万人。

所有这些舰船驶离南京，以在巽他群岛（îles de la Sonde）重建中国的保护地，后者向它提供金块、胡椒和香料。舰队到了锡兰（Ceylan，今斯里兰卡），在那里留下了一支驻军，随后继续向波斯湾、红海进发，最终到了非洲沿海，从那里带回了几只令众人大吃一惊的神奇的长颈鹿。

这一插曲对热爱中国的人来说似乎非常奇怪，也更让人感兴趣。风再大一点，中国的舰船就会先于葡萄牙人半个世纪绕过好望角，可能发现欧洲，甚至可能发现美洲。但1431—1432年这一冒险结束了，而后再也没有恢复。中国疆域尽管广袤辽阔，也不得不重新集结其资源应对自己在北方的宿敌。1421年，它把首都由南京迁到了北京。

后来，在17和18世纪，清朝皇帝重新开辟了沙漠通道，占领了远至西藏和里海的大片地区，击退了游牧民族，把他们赶到了西方。这些征服活动使中国在北方实现了和平，并有力量到了东北以北的地方，夺取了西伯利亚部分地区，远届阿穆尔河 [18] （1689年与俄国人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自18世纪下半叶起，另一个后果是开辟了恰克图大型商业集市，在那里用中国的棉花、丝绸和茶叶交换来自极北的毛皮。至于海路，欧洲人在16、17和18世纪一直试图把它开通。他们在19世纪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

·人口太多：到了13世纪，中国的人口可能就达到了l亿人（南方9000万人，北方1000万人）。

这一数字在1368年蒙古人的统治结束、明王朝掀起民族革命时有所下降。到1384年，人口降到了600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估计），但随着和平的恢复，人口看来不久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水平。满族人征服时期（1644—1683年），这一数字可能又有所下降，但在和平降临后，在18世纪有了巨大增长。在那之后，人口的增长达到了疯狂的高度。

这一过分的人力财富毋庸置疑有其副作用，它可能妨碍了技术进

步。正如昔日奴隶制在古希腊和罗马那样，多产的人口使机器变得没有用处。

因为人力能够用在所有方面。1793年，一位英国旅行家看到，一条船没有使用任何一个动力装置，仅靠人力，就从一段水面上升到另一段更高的水面，惊叹不已。科尔特斯神甫（père de las Cortes）在1626年就已称羡中国搬运工运输一块巨型树干的行为，并为此吸引。换言之，对人来说没有任何活计是重得无法承受的。而在中国，人是如此廉价！

人口过多给中国的生活造成了重压，使之处在保守政府的严格管制下静止不变，尤其是阻碍了技术进步。科学在中国事实上是存在的，饱学之士从这种科学中每时每刻都可以发现其财富、早熟、独创性甚至现代性。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审慎地考察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他评论说，中国的“有机的”世界观实际上倾向于今天的科学，与19世纪结束之前盛行一时的牛顿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形成了对比，这种世界观构成了西方科学的根基。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中国，技术的发展跟不上科学的发展。它在原地踏步。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中国人力资源太过丰富。中国不必发明机器来节省人力，它是由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产生的贫穷的永久性受害者。

第十二章 中国的昨日与现在

古代中国并没有一下子消失。它一点点地消退，这一过程在19世纪才告完成。此后，事件发展得非常迅速。旧的中国是被外力以武力打开大门的，在很长的时期里都蒙受着耻辱。它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自己到底落在后面有多远。而要找到解救的方法，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在20世纪获得了成功，但也付出了各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因为历史没有提供任何最近的先例。

不平等条约时期：蒙羞和苦难的中国（1839—1949年）

中国既没有像印度那样被外国势力占领，也没有像它那样沦为殖民地。但中国的疆土遭到了侵略、劫掠和经常性的剥削。世界上所有强国都从中国拿走了自己的一份。只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渡过了严峻考验。

·自16世纪起，中国与欧洲贸易建立起联系。这一事实虽然重要，但它对中国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只是在后来，在列强开始把单方面的条约强加在中国身上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1557年，葡萄牙人在广州对面的澳门定居下来，并从那里出发，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到了17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此后，在18世纪后半期，“对华贸易的”黄金时期开始了，尽管这一贸易仅仅局限于广州一个港口。

对中国来说，这一贸易虽然非常重要，但它对中国整体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欧洲商人，其中多数是英国商人，面对的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中国商人圈子（即Co-hong），他们垄断了货物的采购和销售。这一贸易由于对交易双方来说都有利可图，因而发展得非常迅速。交易的物品包括黄金（黄金在中国比较稀少，价格较低，而银价较高；在中国，黄金与白银价格之比为8：1，而在欧洲为15：1或更多）；茶叶（欧洲此时对茶叶的需求增大）；棉花和棉织品，它们尤其从印度输入而来；最后是信贷，欧洲商人向中国商人预付金钱，后者把它们分发或放贷出去，以换取帝国最遥远角落的产品。这样就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已经相当现代的金融网。欧洲人在进行海外贸易时惯常的做法就是这样：在每一次航行时借钱给当地商人，后者用这些钱为前者购买货物，以便他在下次前来时运走，这样就可以在市场上占有先机。

毋庸置疑，对中国的贸易令欧洲人眼花缭乱。假如说不是一直如此，那么它至少经常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中国同样从中得到了好处，尤其是，它因而对外国方法和商品的输入并不表示憎恨：其经济影响限于一个小圈子，对作为整体的国家没产生多少冲击。

但到了19世纪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欧洲变得专横自大和贪婪。另外，它因英国征服印度、在东方获得一个牢固的立足之处而得到加强。结果西方的干涉变得血腥和具有毁灭性。

鸦片战争（1840—1842年）使中国向西方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其中包括广州和上海（根据《南京条约》）。太平天国起义使西方人得以于1860年进一步侵入中国，并迫使中国另外开放了七个通商口岸。随后俄国人迫使中国把滨海省割让给他们，他们在那里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事实上，这些麻烦在中国仅仅是开始。中日间的第一次战争（甲午战争）使中国失去了朝鲜；列强利用中国的软弱进一步内侵。俄国人拓殖了东北。旨在排外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招来了欧洲

列强的进一步干涉，美国和日本对此予以支持。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了他们过去从中国得到的部分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日本更加得利，这一次是从德国人手中夺取了德国人在山东占据的领土。

因而，到1919年，中国失去了其疆域中的重要部分。即使在其疆域之内，西方和日本享有自由、特权，建立了“租界”，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国际租界（万国租界）。它们控制了部分铁路和海关—旨在确保外国贷款利息的支付；它们到处设立自己的邮局，建立它们自己的领事裁判所、自己的银行、自己的商行、自己的工业和自己的矿井。1914年，它们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16.1亿美元，其中2.19亿美元来自日本。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进行干涉，1901年占领了帝都北京，那里的使馆区被军事占领，“四周设立了缓冲地带，中国人不得在此建造房屋”。“北京的外交使团对中国的所有事务，至少是北京政府控制的所有事务，进行如果说不是合法的、但事实上非常严格的监督。”

中国除在经济上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外，还遭到外国文化和宗教的大规模入侵。在被强加各种条约的时期（称之为“单方面的条约”不无理由），中国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桎梏。

·为了摆脱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枷锁，中国首先需要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使自身“西方化”。改革和解放是两项往往互相矛盾的任务，不过都必须加以完成。

中国花了很长时间，历经了许多磨难，经过许多犹豫和实验，才终于弄清楚奋斗的含义。中国是不可能像日本在明治时期进行现代化那样在一夜之间学会西方的方式的。它要学做的两件事都非常困难。

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曾短期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太平天国政权。这一强大、复杂和因为是农民运动而“传统”的革命具有民族主义和仇外性质。但与此同时它试图推翻中国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习俗。在其短暂的成功时期，起义者废除了奴隶制，解放了妇女，禁止一夫多妻，禁止妇女缠足，并允许她们参加科举考试和担任公职。他们还希望实现技术和工业的现代化，尽管其努力没有深入进行。太平天国本质上与过去爆发的（通常在改朝换代之前）许多次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不同。就此而论，这次起义是一次驱逐地主、对其地产实行集体化的尝试。最终它失败了，主要是因为西方为了保住自己在商业上的好处而对

清政府提供了援助。另外一个原因是太平天国的现代化设想太过空洞，而中国接受它的条件尚未成熟。

义和团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个带有神秘而可怕的仪式的秘密会社，其动机完全是仇外心理。但当时整个中国都具有这种仇外心理，上自可怕的慈禧太后，她发出的对外国人采取行动的信号（可能与义和团拳民共谋）事实上使义和团和中国在1901年遭到了灭顶之灾。此外慈禧还坚决反对一切改革。她聪明而手段高超地挫败了1898年一场旨在进行现代化的尝试[19]，致使这场改革进行的时间甚短，人称“百日维新”。至少在书面上，这场改革为中国在制度和经济领域进行的真正革命奠定了基础。

换言之，在20世纪初，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那些寻求改革的人不得不与“官僚机体上的重听现象”发生冲突，“这些官僚听取他人意见比中国口岸的开放还要艰难”（艾蒂安·巴拉斯语）。他们面对的还有民众的麻木冷淡，后者仅仅受到“没有出路的仇外心理”的诱惑。他们所希望的至多是学会外国人的“计谋”，即其效率的秘诀。

改革和解放这一双重问题仍然难以解决。西方“蛮夷”无疑必须被驱逐出去，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这非常缓慢的学习过程中，起作用的是接触过西方人、游历过海外的年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在清朝末年政府创办的现代大中学校学习的学子。他们帮助组建了一大批秘密会社，一些持公开的共和观点，另一些仍然是保皇分子，但都渴望“复兴”中国并进行激烈的改革。

·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运动，这一运动是与“孙中山”这一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孙中山（1866—1925年）是来自广东一个乡村的大夫，他曾参加了众多革命运动，并因此在海外流亡数年。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成为一个共和团体的领袖，该团体不久就在中国各地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制定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纲领。这一团体直接参与了1911年革命（辛亥革命），这一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并立孙中山为中国第一届共和政府的首脑（临时大总统）。然而，革命几乎马上就遇到了挫折。14天后，孙中山把职位让给了袁世凯（死于1916年），后者试图重建旧的制度，自封为皇帝。

因而，1912年的自由宪法被搁置起来，中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不久被称为军阀的各省军事统领与乡村贵族联起手来，不遗余力地榨取税

收和地租。他们很快就成为中国残忍无情的主人。孙中山又一次被迫流亡国外，他创建了一个新政党，即国民党（意为“革命的党”）。这是一个双关用语。国民党创建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最初几个月群情激奋的日子，是一个伟大的“国民的大党”。用Kuo-min（“国民”）替代Ko-ming（“革命”）表明的是原来的政党没有完成它的使命：革命尚未成功。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仍在一而再地遭受苦难和危机，这些苦难和危机仅仅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告结束。这一日期具有某种重要意义：自鸦片战争（1840—1842年）起，中国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努力和痛苦恢复了独立和荣誉。一位教授在1951年这样宣称：“从现在起，我们又可以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了。”

在那100年的等待和斗争中，旧的制度开始衰落，尤其是其最传统、最保守的方面。它废除了“顶戴水晶或珍珠的官僚等级制”，废除了“向皇帝进行汇报时由此天子用朱笔批注、听众身着锦缎长袍的礼仪”，并废除了过去授予西方人和日本人的过分的特权……

简而言之，中国在历经诸多磨难后达到了一个罕见的时刻，此时文明通过与过去决裂、牺牲它的迄今一直是其根本的某些结构性特征，获得了重生。对中国来说，它遇到的危机更为非同寻常，因为它挑战的对象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东西。另外，毁灭不是完全彻底的，而且它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除旧布新时，中国仍然忠诚于她自己的思想方式和敏感性。新的中国文明要形成其独特的形式，无疑需要许多个十年。

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唯有试着理解处在发展变化中、事实上刚刚开始的这些经验。

新中国

这里不是称赞——这是有可能的——或谴责——这同样是有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场合。我们的目的是去关注它已做过的事或试图要做的事，随后看看——或试图去看看——这对中国文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该文明正在经历其极为漫长的历史中最伟大、最激烈的人类实验。它正在做的一件事是着力在许多领域建立秩序：社会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知识文化领域和道德伦理领域。

这意味着把事物、人和阶级（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外部世界）放在由

中国人的意志力创造的新的位置上。荣誉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种荣誉感至少是把现在与遥远古代的中国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当时中国对自己占据世界中心的地位信心十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某些是真实存在的，某些是潜在的和需要加以开发的。它的经济发展仰赖这两者。

中国的人口持续增长：1952年，5.72亿；1953年，5.82亿；1954年，5.94亿；1955年，6.05亿；1956年，6.2亿；1957年，6.35亿；1958年，6.5亿；1959年，6.65亿；1960年，6.8亿；1961年，6.95亿。[20] 除1953年外（该年也必定有某些保留），这些人口统计数字并不精确，只是些估计数字，尽管非常可能。如同在世界上所有欠发达的国家（中国在1949年是世界上这类国家中最大的一个）中那样，因出生率上升（接近于40‰）和死亡率下降而出现的人口增长带来了可怕的问题。人口以这种速度增长预先制约了任何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

然而，中国自1949年到196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异常惊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非他国所能媲美。就连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未能超过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国经济总的说来是从零开始的。不过，别人吃一口自己吃两口是那些来晚的人的特权。从一穷二白的现状开始，它们未等变成富人就可以把其财富增长一倍。后来，当它们达到一定水平后，就有可能从属于收入递减法则，无论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在对中国非凡的经济发展速度进行评估时，我们还应当记住，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无情的意志力和努力的结果。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即计划经济是一门不仅为更早时期苏联的经验展现出来，而且为当代资本主义本身证明的手段。

这里无意制作一份详细的收支平衡表。根据1952年以来官方提供的有关总税收的数字，在不尝试对难以审核的数据进行细致入微的检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注意到如下一些递增级数：1952年，100；1953年，114；1954年，128；1955年，128；1956年，145；1957年，154；1958年，206；1959年，249。1958和1959年的增长率分别是34%和22%，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只能用神奇来解释。尽管有各种保留意见（尤其是鉴于统计出如此庞大、如此多样化的一个国家的总税收的难度），经济学家却无法掩盖自己的惊奇或钦羡。这确实是一个大跃进。

看看特殊产品产量的增长，非经济学家会发现更容易判断出中国的进步的数字。钢的产量（单位：百万吨）：1949年，0.16；1952年，1.3；1960年，18.4。煤（单位：百万吨）：1949年，32；1960年，425。猪肉（单位：百万吨）：1949年，0.25；1960年，27.5。电力（单位：百万小时千瓦）：1949年，4.2；1960年，58。棉布（单位：百万米）：1949年，1.9；1960年，7600。谷物，加上白薯和马铃薯，按其新鲜时湿重的1/4计算（单位：吨）：1957年，1.85亿；1958年，2.5亿；1959年，2.7亿。（由三部分构成的）中国铁路图提供了1949年铁路里程、到1960年修建的铁路和计划修建的铁路里程，向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数据。此外，我们还可以绘制出由三部分构成的（旧的、新的和计划兴建的）水电站和普通电站图。我们也不应忘记利用长江的宏伟规划，这一规划起自地势较低的四川盆地，直到西陵峡的急流、峡谷。这些巨大的公共工程将提供数量巨大的能源储备，使北方的大型水利灌溉成为可能，改善此蓝色河流（Fleuve Bleu）的航道，使数千千米的河流能够通行深水船只，并在三峡地区鼓励兴建超现代化的工厂。

·这些成就是在付出了超人努力后取得的，在对中国庞大的社会实行现代化改造后才成为可能。对中国这一社会不仅要强加给它政治热情，让它承担强迫劳动，而且对它要进行改造。

这不仅是一个手段，一个行之非常有效的手段，而且是一个目的和一场赌博。政权慎重地通过无情的现代化计划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在毫不犹豫地采取严酷措施的同时，它也确实赢得了中国大众的某种支持，因为它消灭了蒋介石统治末年甚嚣尘上的严重腐败现象。

整个社会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至于最富有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买办”，他们过去在中国商人和欧洲商人之间充当中介，1949年随着蒋介石的倒台纷纷逃走。工业资产阶级在1956年私人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后被融入现行制度；它只作为实业家存在，但地位显然很不牢靠。

在农民的世界，改革逐步而迅速进行。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农业法》标志着改革的开始，它无情地剥夺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所有权。稍逊于他们的富裕农民（中农）丧失了部分财产。最后，每一位农民都分得了一小块田地（15亩），仅此就证明了领受土地者人数之众：1954—1955年，中国计有人口6亿，其中5亿以上生活在农村。这些不计其数的小块田地仅仅是缩微形式的财产平等的开端。

1956年10月，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建立，集体化实际上开始了。进一步的措施是在1958年创建了人民公社，每一公社集结了多达2万名农民，而一个农业合作社仅有几百人。公社是一种原创性的组织，可能太过野心勃勃，它集政治、农业、工业和军事等角色于一身。农民也是一名战士，而且某些农民拥有武器，这使中国政权拥有一支现成的军队，随时可以召集，从而为它额外增加了安全保障。然而，到1960年11月20日，公社的特权和责任似乎被剥夺了，而让位给生产队，这样公社的前景看上去不妙。我们由此可以肯定的只是，鉴于粮食生产是唯一保持低缓发展速度的经济部门，中国当局对如何达到目的而不是目的本身犹疑不定。

工人同样被动员起来。他们的人数在不断攀升，工会协同共产党领导他们。政府要求他们像农民一样付出超人努力。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它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以实现五年计划未曾拟议的进一步的“大跃进”。这样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竞相完成生产目标的热潮，产生了一些引人的口号：“多、快、好、省。”“一天顶二十年，一年顶一千年。”“1958年将成为为未来一千年进行艰苦奋斗的三年中的第一年。”……

人们很容易地可以举出成千上万个英雄壮举。尽管工作条件差、工资低、食物缺乏和缺少住房，他们并不以为意。请想一想这么一位模范女工人——这一称号既意味着荣誉，也意味着额外的义务——她在工厂里上夜班时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就用冷水洗脸。

至于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党员，是他们的英雄主义不那么为众人所知，还是交派给他们的任务远不那么明显？可以肯定的是，加在他们身上的纪律更为复杂，更为反复无常，更为严厉。

党员从未免于遭受清理和被迫进行检查。他们不得不忍受类似“三反”“五反”运动这样的事件。[21] 前者开始于1952年1月和2月，运动的对象是文职人员的“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运动中暴露出一批丑闻，这些丑闻后来被蓄意夸大，给那些原来生活在农村、后来进城当上“党的干部”的人令人痛苦的惊诧，让他们失去了已非常舒心的、适应了的工作。同一年，“五反”运动（反对腐败、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出卖国家财产、反对欺骗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致使大批人遭受剧变，包括自杀和集体遭到严惩。其他人遭到清理，被迫进行检讨，接着又有一些人自杀。

对大学生来说，他们的人数在不断上升，但当局无时无刻不在对他们严加控制，从精神上控制他们，用纪律约束他们，并强迫他们在工厂或田地参加体力劳动。

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也根本无法逃脱遭受迫害的命运。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他们曾在非常短的时期里获准表述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百花齐放”时期，意思是说思想可以像花一样开放出一百种不同形状的花朵来。知识分子被号召阐释自己的思想，但他们犹豫不决。他们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形势下——尤其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一切都马上被刊登在报纸上。他们中的一位这样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旧的、过时的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应当对它进行修正。”一位教授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他说：“我对现在的自由感到担心。它的本质特征是人必须发言。这种压力让人痛苦。我们应暂时等待一下。将来我们是会看到发生什么事的。”另一位教授注意到“人民没有足够的粮食吃，某些人却仍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也许会想，这只不过是一些喧嚷，是不喜欢其马克思主义再教育课程的旧知识分子的作为消遣的牢骚。但事实相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百花齐放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连一个夏天都没有坚持下来，而仅“怒放了短短一个月”，自1957年5月8日到6月8日。随后整顿开始了，许多说话不谨慎的人当即因其言论而被开除公职。

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中国进行的不是一场公开的辩论，而是一场生死斗争。它的问题不仅在于改造社会，改变其意识形态，洗刷其过错，清理其遗产，弥补可能的遗憾；还在于试图赋予它荣誉感、工作和自我满足，尤其是强加给人们服从的精神。

“如果能够引导6.5亿中国人按照中国共产党认为对其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长征至关重要的规范正确地思考，他们就会采取正确的行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电台、报纸和不计其数的演讲进行了不间断的宣传鼓动，其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实验。它的主要武器是批评，在每一个工作场所通过强制性的辩论每天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团体中分辨出态度良好、可以说服及死不悔改这三类人。每一个人都被要求批判这些持异议者。“口头批判”（tou-cheng，斗争）是“一种让人感到耻辱的混合体，它把激烈批评与讽刺挖苦、谴责以及——非常罕见——轻微的暴力结合在一起”。

这一思想意识方面的行动被构想为一种“长期的、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毛泽东语）战役，其激烈程度因社会集团不同而有所区别——对

农民来说温和，但在工厂、机关、大中学校和部队非常激烈。思想灌输遭到了某些反抗，为了强制执行就实行了惩罚。刚开始时，惩罚严厉而粗暴，后来变得越来越温和，但仍然很严厉。

如此一来，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党就有了一个“文化”政委，负责在这些领域严明纪律，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的渗透。每一位作家都要立一个榜样，而且不仅仅停留在言语上。一位生活在农村的作家受到了表扬，他每天早晨带着“集体文学”情绪进行写作，同时种植白薯，并养猪……被证实犯有右倾异端思想的作家要受到惩处，比如著名小说家丁玲被发配到东北北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接受“劳动再教育”，不得不在那里待了两年。

显然，这些惩处相对于农村土改斗地主的前几个月 [22] 马上拉出去枪毙的可怕情景要温和些。另外，同样明显的是，官方文件中提到的反抗和怠工破坏是一些例外，而不是通则。真诚和热情地皈依的人要多得多，其中许多人以动人的方式表露了自己的情绪。拥护这一现在取得胜利的意识就是拥护祖国和民族，就是相信未来和中国。

·农业实验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唯一重大失败。少数创纪录的收成，某些夸大的统计数字，以及官方的乐观主义在1958年前设法掩盖了真实的情况。在西方，充满热情的书籍和报刊文章帮助维持了这种幻影。但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的灾难性歉收严重—部分地是不公正的——打击了这种乐观主义。

说它不公正，是因为这几年收成极差，主要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中国一直罹受着干旱和洪涝之苦，这两大灾害有时交替出现，有时同时肆虐。它们对北方的大省影响尤大。1961年，一半以上的作物被毁。飓风和洪水让百万人受害，而在同时，同年5—6月，在济南以下可以赤足蹚过黄河，因为干旱把它变成涓涓细流。干旱、台风、洪水和带有毒液的害虫，中国的所有这些宿敌都没有向新中国缴械投降。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补充说，中国像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为它在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功付出了惨重代价呢？它可能为其工业化付出了太多，而忽视了农业。官方新闻报纸把此归因于“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同时，还谴责了人，提到了人的破坏。“1960年8月，机关官员和救援工人被派到农村，帮助人民公社抢收作物，其中某些人失职了，没有服从党和政府的命令”，往往对“人民中的堕落分子”采取纵容的态度。我们不应当相信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解释”。看上去有可能的是，集体化在中

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遇到了农民的反抗，这些人普遍比其他人传统、保守。当局后来采取的一些措施可以看作让步，如把重点放在小型生产队即小队而不是大型生产队即大队上。

中国的歉收不久就产生了不少后果。它们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迫使中国不得不减少向苏联的粮食出口，而此本来是帮助中国偿付从对方进口的物品和服务的。它们还迫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寻求粮食供应：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缅甸，甚至还有中国台湾地区，进口900万—1000万吨粮食。在负责组织从海路运送如此巨额货物的伦敦，人们估算这三年中国每年为此要花掉8000万英镑。中国如何支付？可能用汞、贵金属或钱。

毋庸置疑，这对正在上升的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让人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怀疑。确实，这是其经济成功的一个阴暗面，因为它在其他方面都无法否认地充满活力和引人注目。

面对现代世界的中国文明

如果如此庞大的中国没有接受扮演一种民族主义角色，这一巨大进步是不可能取得的。这一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情感，某些人建议使用一个不规范的、让人无法接受的术语“文化主义”（culturalisme）：总的来说它不是一种民族的自豪，而是文化的自豪，如果愿意采用“民族主义”一词的话，是文明的一种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古老而持续存在的现象，需要加以开启。因为现在的中国虽然初看上去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但实际上与一个漫长而荣耀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在共产主义实验开始之前那一让人悲哀的世纪（1840—1949年）受到了重创。

·中国自视为一个大国和一个伟大的文明。她一直对其文明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深信不疑。在她看来，除中国之外，有的只是野蛮。

过去，中国有一种与西方人感受到的非常类似的自豪感。

由于这一原因，不平等条约的这一个世纪对她来说特别残酷。降身为多国中的一员，是第一个耻辱；而其科学和武器为蛮夷主导，是第二个耻辱。现在中国尖锐的和不无害处的民族主义，可以视为一种报复，发奋要成为一个大国，唯一的大国，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因此她渴望付出双倍的努力，毫不停息地向前进，并获取新的资源，比如

俄文版的马列著作。正如过去中国欣然接受佛教圣典和试图结识德先生（民主）和赛小姐（科学）那样，她现在着力研究历史、社会学和人种学……

无疑，毛泽东的中国感到自己负有一种使命，即率领世界上的无产者大众反对摄食过多、过于富裕的各国，并向其展示如何实现一场迅速的革命——在传授经验方面，她一直是非常乐于、非常慷慨和非常热心的。尽管自身遇到了困难，中国从未停止输出其供应和资金。就资金而言，1953—1959年，她共向阿尔巴尼亚、缅甸、柬埔寨、锡兰、古巴、埃及、几内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蒙古、尼泊尔、朝鲜、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也门等国提供了11.91亿美元。这一数字尚不包括她向阿尔及利亚反叛者提供的援助，或与加纳达成的一项协议（1961年）。这些以及其他事实（比如40%的贷款给了非共产主义国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扮演一种国际角色，这可能非其现有资源力所能及，但肯定未达到其雄心勃勃的高度。

1950年控制西藏地区以及随后与印度的潜在冲突；对蒋介石军队避难的台湾岛提出的权利要求（即收复台湾）；希望与日本和西方恢复正常关系，其经济远比苏联的经济更能满足中国的需要（通过香港和澳门半秘密地进口机床就是证明）；最后，还有希望进入联合国，其位置仍反常地为台湾的国民党占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对权力和影响的渴望，上一届莫斯科会议（1961年）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和近乎决裂也是如此。中国决心成为一个大国。1945年，她连一辆摩托车也制造不出来；到了现在，1962年，她已处在制造原子弹的边缘。通过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她重新发现了其原有的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荣誉和尊严。

·这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汉学家艾蒂安·巴拉兹的观点。我们在下面概述一下他对有关长期历史背景下的中国革命的看法。

如果中国的实验取得让人信服的成功，所有欠发达的国家都有可能试图加以效仿。无论是中国的朋友还是其敌人，都面临这样一个极为关键、极为头痛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的实验成功了吗？或者说她已经开始衰败？

我们坦率地承认，研究数字和统计数据起不了什么作用——部分是因为中国为了自己的事业对它们进行了人为操纵，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统计学家正在审视和在过错中摸索和挣扎。令人吃惊的不是他们的估

计不够可靠，而是他们竟能在未犯过多错误的情况下制订出可供执行的计划，是其精确得能够记录下总趋势的结果。就总体而言，这一趋势是无可怀疑的。

人们当然可以指出五年计划中某些有名的失败，如土高炉、粮食生产不足和人民公社遇到的各种困难等。但中国实验的基本的和稳定的特征值得人们注意而不是批评，因为它们看上去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A）最坚决的工业化，其增长率远比苏联、东欧或欠发达国家要高（而且无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要高）。平均而论，是20%对7%—10%。

（B）非常明确地决定“两条腿走路”，也就是说，把工业收入用作投资，以保持增长率，同时在其他部门继续利用现成的资源，由农村的工匠供应农民大众所需的农具和其他消费品。这种情况需要多长时间，就维持多长时间。

（C）不仅在普通大众中是这样，而且全社会普遍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这样就使它有可能强制他们做出牺牲。

（D）当局极具灵活性，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迅速改变方针。

所有这些仰赖的都是中国生活和中国文明的某些基本特征，没有这些东西，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数字。实验中带来的苦难，即使牺牲了某些人，甚或牺牲了许多人，也都不能损害实验本身的成功。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而且一直有太多的人口。

但尤其是，1000万名组织人员——他们是受过训练、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员——对6亿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动员。除个别特例外，位居党的首脑位置的仍然是老军人，这些领导人曾在30年的时间里遭受迫害，参加内战和抗日武装战争，并因此变得更加健壮坚强；他们精于军事战略和政治技巧，善于平静地前进和撤退，对人对物有着他人无法匹敌的经验。

人们禁不住要想到，他们是古代帝国伟大的官僚传统的后继者，是官僚的继承人，那些受过教育的官员习惯于用非常坚定的手段治理一个

大国。一批新的大胆而活跃的知识分子淘汰了旧的书生气十足、保守的知识分子。现在轮到他们用坚决的手段执掌中国的命运。这一强有力的组织由上到下浑然一体，能够让每一个人不停息地工作，这可能是中国进行的非凡实验的秘诀。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这一活着的最古老的文明就变成了所有欠发达国家中最年轻、最活跃的力量。但这反过来可能是因为她能够依赖其历史悠久文明的最长久、最坚固的特征之一，即其官僚制传统。

·中国的发展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中苏冲突。

苏共二十二大上的宣言和苏联及中国敌对的官方报纸《消息报》和《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低调的攻击文章所反映的是不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冲突？或者说，这些仅仅是外在的表象，而社会主义者的团结一直居主导地位？

事实上，分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隐含着对双方都非常危险的国际性后果。但双方的敌对看来是深刻的，其中潜藏着现存文明的历史原因。

这一冲突无疑有非常现代的原因。这两个伟大的民族都在进行旨在实现现代化的共产主义实验。其中一个在经过40年的拮据和苦难后想歇下来喘口气，另一个则正在进行超人的努力，不得不过着悲惨的禁欲生活。那个新贵坐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夸夸其谈，而其穷亲戚则在那里没有发言权，像个麻风病人那样被摒除在国际舞台之外。一个不得不不惜一切代价向前进，忍受着反冲带来的痛苦，另一个则变得明理、谨慎。这些当然是分裂的理由。

但敌对的根源无疑更深，在于中国多疑的民族主义和报复西方的愿望。至于苏联，无论它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仍是西方，仍是蛮夷。中国在消除过去的痕迹的同时，要求成为第三世界的首都。那时她将再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央帝国”。

1966年附言

自1962年以来，中苏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赫鲁晓夫的下台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请参阅本书第602页的“1966年附言”）。此后的两个突出事件：（1）中国原子弹爆炸（1964年10月16日，1965和1966年5月15日），在1959年苏联中断核技术支持之后，这曾被认为是在短期内中国

无法完成的技术进步。中国宣称从中看到令美国“所有核绑架企图无效的”办法。（2）法国和中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开启（1964年1月27日），这等同于承认了共产主义中国。这是双方因经济原因所迫而摆出的政治姿态：英国的商业（自1950年1月6日承认了中国）和联邦德国的商业，超过了法国。中国人认为非共产主义国家分为三个范围：第三世界、非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非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问题上与美国相左（中国人认为它们是“第二世界”，处于美国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首先就是欧洲和日本，它们是有可能向它开放的阵营。

第十三章 印度的昨日与现在

印度既是由不同地区、同样也是以不合常规的方式拼凑在一起的传统的混合体，它从未能把这些相异的东西成功地完全融为一体。它的面积过于广袤（包括巴基斯坦在内为400万平方千米，也就是说，相当于欧洲共同体6个创始国总面积的三四倍），人口过于密集（不把巴基斯坦计算在内，1963年其人口就达到4.38亿人）[23]。另外，它也太过分散，从未有过安宁的过去。南方的德干高原是一块居民和文明都很保守的地区，顽固地反对变化。西北部则是印度河流域干旱贫瘠之地，与伊朗相连，同时，越过开伯尔山口（la passe de Khaïber），与突厥斯坦和整个动荡不安的中亚连接在一起。这里大门洞开，易于受到外敌的入侵，是印度一个危险重重和悲怆动人的地区。

最后（除昨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力量把整个南亚次大陆置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昨天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1947年激烈而血迹斑斑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之后就是这样。

古代印度（英国殖民统治之前）

我们不必向前追溯到印度河神秘的文化（公元前3000—前1400年），就可以分辨出三个古印度，它们逐渐形成，慢慢地相互承继，并且交叉重叠在一起：

（A）一个是印度—雅利安文明，或者说吠陀文明，始于公元前1400年，结束于公元7世纪。

（B）一个是印度中世纪文明（印度教），它到了13世纪取代了前一种文明。

（C）最后一个是伊斯兰—印度文明，它是由征服这里的穆斯林在13—18世纪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就像束缚犯人的约束衣；自18世纪起，其富于活力且漫长的殖民主义被英国殖民主义所取代。

在此应再次强调指出的是，这三个文明都没有把整个大陆统一起来：它们中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地维系一个大的“世界性”帝国。直到18世纪之前，印度从来没有经受过像中国历史上那样的单一帝国——中国的历史因此而清晰和简单化——的统治。

·自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7世纪，吠陀时代的印度经历了三个或四个主要的阶段。这2000年中居主导地位的事件是来自突厥斯坦的雅利安人（Aryans）的入侵和拓殖，他们由西北部进入印度，慢慢地扩展到印度河中部平原，进而进入恒河流域中部。雅利安文明只影响到印度河—恒河平原的部分地区，但这里自很早的时代起就是印度富于活力的心脏地带。

这一最早的文明即“吠陀”（Védique，源自“Veda”一词，意为“神圣的知识”）文明部分地来自新来者随身带来的文化，部分地是从当地已有文化大量借鉴而来的。它发展得十分缓慢，并时常与成分极其复杂的棕色或黑色原住民发生冲突，其中包括久远的时代之前自非洲前来的俾格米人（侏儒）；年代稍晚、无疑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地中海人，其体质特征保存在南方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ens）身上；以及来自中亚的具有蒙古人特征的诸民族（尤其是孟加拉地区）。

就其主体而论，这些早于雅利安人的民族已经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充当农民和定居的畜牧业者。他们在印度河两岸的村落甚或城市里聚居下来，那里已经是一个由公民和商人构成的古文明的中心。这些早于雅利安人的民族人数众多，至今依然如此，仍构成印度总人口的多数。

相比之下，印度—雅利安人（一般如此，但并非一成不变）有着浅色皮肤，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他们是些游动不定的牧民，与公元前第二千纪侵入伊朗、小亚细亚及遥远的欧洲国家的许多民族有亲缘关系。侵入印度的这些人与古希腊人（Hellènes）、古意大利人（Italiotes）、克尔特人（Celtes）、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人血缘相近。

（A）第一阶段，公元前1000年之前：入侵。

雅利安人的入侵最早是从突厥斯坦向伊朗和印度进行的。这时它要面对一个自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河流域的已经同质和兴盛的文明，该文明由城镇、高楼大厦和定居农民构成。入侵者到达印度河流域各国时，这一文明可能已经陷入衰落状态，但这些国家为了维护其独立地位，与新来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大大延缓了他们向东推进的速度。

雅利安人用梵文（Sanscrit）记载的神圣文献描述了公元前1000年之前发生在旁遮普（Pendjab）地区和喀布尔河（la rivière de Kaboul）地区的这些无休无止的斗争，其中涉及人、神和伪神（asoura，或敌人的保护神）。

这一时间甚长的阶段反映在最古老的那部圣书即《梨俱吠陀》［*Rig Veda* ，或《智慧之诗》（*Hymnes* ）］之中，体现了最早的吠陀宗教的神话和信仰。书中至少包括33个神，分为大地神、天神和“中间地带”（空气）之神。在这些“略微有些苍白”的神灵之中，有两个神脱颖而出：一个是伐楼那（Varouna），“宇宙与道德法则”的维护者和“洞察罪恶之神，他使犯罪之人上当入彀”；另一个是地位更为重要的神灵首陀罗（Indra），他长着一头金发，曾在1000次战斗中获胜，并曾击败恶魔维拉特（Vitra），解救了天上之水，自此以后这些天水可以浇灌并滋润大地。所有这些神灵都与人类混杂在一起，就像希腊奥林匹亚山诸神与战士混杂在一起在特洛伊城墙下战成一团那样。所有神灵都要人提供供品：奶、小麦、肉和一种从某一神奇作物中提取出来的发酵饮料（soma）。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井然有序的、形式主义的多元宗教。雅利安人尚未完全放弃其游牧习惯而去过一种定居的生活。相比之下，定居生活对秩序要求更高，就连在宗教领域也是这样。

（B）第二阶段，自公元前1000—前600年：征服与定居。

入侵者在略远一点的地方或略微更靠东的地方逐渐采取了定居生活，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十字通道是现在的德里。这一东进趋势甚至到了现在的贝纳勒斯（Bénarès），其间据记载进行了惨烈的战役或战斗。到约公元前800年，入侵者到达了孟加拉地区，可能还到了印度中部。

凡此种种在地理空间、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造成了巨大变化，它们是新圣书中所记载的翻天覆地的宗教创新产生的原因。这些新圣书包括《梵书》（*Brahmanas*，《评论记》）和《奥义书》（*Upanishads*，《论接近》），后者开启了宗教思考的秘密之门。宗教尽管保存了其原有的基础，但逐渐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它开始显现出一神教的倾向，尽管胜利者与失败者的交融为它带来了大量非雅利安信仰。这些新信仰中包括瑜伽（yoga，"自我约束"），它与礼仪性的牺牲一起成为吠陀时期宗教的一个重要成分。

宗教信仰和宗教态度日趋变得更加阴郁起来。不久它开始认为人的灵魂服从于不断的转世化身，要不断地回到一个新的、充满无尽痛苦的世间存在之中。与此同时，在最初的"具有魔力的""伪封建制的""殖民"社会中，出现了最早的社会分工（瓦尔那，varna）——这一构成并不能（像过去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完全用胜利者和失败者把一切解释清楚。社会上最高的一层是婆罗门（Brahmanes），他们是祭司，掌管精神物质。在它之下是刹帝利（Kshatryas），包括士兵、国王、王公和大领主。处于第三等级的是小地产主、牧民、艺匠和商人，叫作吠舍（Vaysyas）。第四也是最低的等级是首陀罗（Çudras），他们至少在一开始时是处于奴隶地位的原住民。

后来，这一种姓制度慢慢固化下来，带有各种禁忌、排斥行为以及对跨种姓婚姻的多种限制和"纯"与"不纯"之间的严格区分。

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由最高的两个社会等级分享。原始的王权不久就发现自己被剥除了对宗教的任何专断权力——这与其他地方的统治者，比如中国，尤其是埃及的统治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帝制（imperium）精神和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在一个世俗制度中表现得极其明显……对国王即刹帝利等级来说，任用婆罗门主持公共仪式是不够的：他必须与一个婆罗门有一种永久的个人联系，此婆罗门是他的普罗希塔（purohita，字面意思是'在前一位'）。我们可以把它译为'牧师'，但必须牢记精神上前卫或获得授权的权威的思想——一个大的自我（majorego）。没有普罗希塔，神灵不会食用国王的供品，同时国王自己在采取行动时也要仰仗他，因为没有普罗希塔的帮助他不会取得成功。他与国王的关系就像思想与意志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像婚姻那样紧密。《梨俱吠陀》已经说过：'他在他的住所生存、兴盛，大地送给他大批礼物，人们自愿服从他。这就是国王，在其领域内婆罗门走在前面。'"［路易·迪蒙（Louis Dumont）语］至少婆罗门的文献是这样宣

称和一再复述的。

在路易·迪蒙看来，这一与政治权力相连但不等同于政治权力的宗教最高权力，是印度社会四分五裂的主要原因。由于前两个等级彼此关联，因而他们与社会上其余的所有等级处在敌对的状态；同样，前三个等级都与首陀罗大众隔离开来。

婆罗门享有的优先地位以他们激发的无限制的恐惧为根基。礼仪的复杂化致使他们作为牺牲仪式的组织者不可或缺：假如忽略了任何一个细节，受到祈求的神灵马上就会溜走，可怕的伐楼那就会施加无情的报复、惩处。作为礼仪秘密的看管者，祭司可以按照他们认为适宜的方式行事：他们可以攻击雅利安人旧的、朴素的神人同形说，或者贬低因陀罗和旧的赞美诗中所有的神圣英雄。出于自己方便，他们创造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梵天（Brahma），此神负责他们的牺牲。说句实话，这个神从来就没有在民间流行开来。

然而，另两个神则有一批热心的追随者——湿婆（Siva Rudra）在农民中间，被认同于英雄克里希纳·瓦苏德瓦（Krishna Vasudeva）的毗湿奴在贵族中间。此外，“武士”和“农民”（第二和第三等级）毫不犹豫地转向瑜伽修行（婆罗门也进行这种修炼）和其他土生土长的礼仪；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转向自由的哲学思考，这在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孕育了两个新的宗教，即耆那教和佛教。

（C）第三阶段：公元前6和前5世纪，耆那教和佛教取得了初步成功。

在印度慢慢地产生了一些面积狭小的公国，而后是贵族化的城镇，它们通过贸易联结在一起。不久人口就变得密集的城镇靠着王室宫廷的奢华和富有的中产阶级而兴盛起来。银行家和商人从海路和陆路商队中大获其利；通过这些商路，众多物品输入印度，其中包括精美的棉、麻或丝织品。自公元前6世纪起，如同在那一时代的坟墓中发现的武器所表明的那样，冶铁业兴起了。遥远的亚丁（Aden）成为大的商业城市，它把印度的铁制品转手输出到地中海。

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堪与同一时期两个世纪中希腊的情况相媲美的兴隆环境中，两个大的宗教，即耆那教（Jaïnisme）和佛教（Bouddhisme），应运而生了。这两个宗教都允诺救世、超度众生。佛教比耆那教更广为人知，更为重要，因为它传播到了印度以外的地区，

但在印度本土两者获得了同等程度的支持。两者同样是“非官方的”和“世俗的”，信奉它们的是独立于婆罗门之外的统治阶级，商人则把它们传播到各地。两者都创建了寺院，都提出了有关个人超度的准则。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佛教宣扬的是一种弃世的态度，否认生的欲望和生活的意义，试图打破罪恶的轮回往复，以实现涅槃。相比之下，耆那教把个人受难以及对苦难的追求视为获得解救的有效途径。这两个宗教都是由贵族创建的：佛教的创建者乔答摩·悉达多（Siddharta Gautama，公元前563？—前483年？）可能是一位王子，被称为“释迦牟尼”［Çakya Mouni，意为“萨克耶人（释迦人）的圣人”］或“佛陀”（Buddha，意为“智者”“觉悟的人”）；耆那教的创建者是摩诃毗罗（大雄，Vardhamana Mahavira，公元前540？—前468年）[24]，意为世界的“征服者”（Jina）[25]。

佛陀来自尼泊尔。约在公元前525年，他在菩提树下突然觉悟，获得了他的“天启”；此后，他把余生用于在恒河领域传道上。他的宗教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开始被修改。他的学说以其弟子汇集和传播的他的说教为基础。这些说教中不含任何关于上帝的陈述，但这种沉默不等于否定：正如它否认任何神圣的“一元论”一样。他的信条的一个特点就是相信在宇宙中只有一个本体之物或类似的东西。与他那个时代居主导地位的观念相吻合（《奥义书》中的那些观念），他也反对那种认为世界和宇宙存在是真实存在的看法。在他看来，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你们就像观察鸟，离开船，飞到各个方向去寻找陆地。但回到我这里时发现没有任何收获。因为元素（大地、火、水和空气）的根基在意识之中。意识失去时，它们也失去了。意识不再存在时，宇宙中的所有成分也将完全被毁掉。”

事实上，佛陀是一位“弃世者”（sannyasi，禁欲者）。所谓“弃世者”，是指一个人离开社会四处流浪，靠人们的施舍过活，以寻找一种能够让他自由的精神上的绝对。他关注的不是如何改造社会，而是如何使个人获得救赎。因而佛教是一种个人的宗教，是“脱离社会”之人的宗教。就此而论，它与印度时常产生的许多异端非常相像，这些异端采取的本质方式是通过个人苦行和求圣，摆脱婆罗门的宗教和与此紧密相连的社会束缚。与基督教徒（其目的是避免死亡）相对，佛教徒的弃世试图逃离生命和生命的轮回往复。“亲爱的僧人弟兄，下面是压制痛苦的神圣真理：对生存和欢娱的渴望导致由一个轮回到下一个轮回，循环不已……亲爱的僧人弟兄，下面是压制痛苦的神圣真理：绝灭这种渴望，办法是灭欲、禁欲、谴责欲望和不给它留出任何存在的空间。”这就是

打破轮回、实现涅槃所要付出的代价。

为了达到这一点，人们要遵循“八正道”[26]（其中包括把所有虚妄驱逐开来的科学）；人们要守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饮酒、戒妄语）；必须要避免犯十种罪孽（包括恶口、妄语、嫉妒、憎恨和犯教条方面的错误）；必须行六种善德（爱自己的邻人、耐心、道德纯洁、毅力、化缘和心善）。但要达到这些则意味着走得更远。它意味着成为一位Bodhisattva，即菩萨，随后是类似佛陀那样的人物（得到神秘的觉悟）。只有佛（菩萨，Bouddhas）才能达到涅槃境界。

（D）第四阶段：自公元前321年到公元535年所谓“帝国”时期，耆那教和佛教在印度许多地方传播开来，并在哲学和艺术中居主导地位。但它们未曾片刻取代当时流行的做法，无论它们是否源自吠陀。

为了捍卫其地位，婆罗门越来越依赖其汇集起来的广为流行的祭仪，意在建立一道防御墙。在这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中，印度教产生了。印度教是我们稍后不久将要回过来探讨的各种祭仪范围广泛的折中性综合。

因而，一个分为等级的社会脱颖而出，并硬化成型，尤其是发展成为构成印度一个非常独具特色的种姓制（système des castes）。种姓制形成于公元前300—公元700年之间。这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我们不要把它与过去的瓦尔那制混为一谈，后者与伊斯兰教传来之前伊朗的社会阶层更为相似。种姓制度至今在印度依然存在，它用了大约1000年的时间才显现出来，部分是由于种族和文化因机遇而产生的融合，部分是由于各不相同的行业越来越多。结果数千个种姓产生了（1960年时至少还有2400个种姓）。位于最低层、受到各种约束禁令限制的是贱民（parias），即“不可接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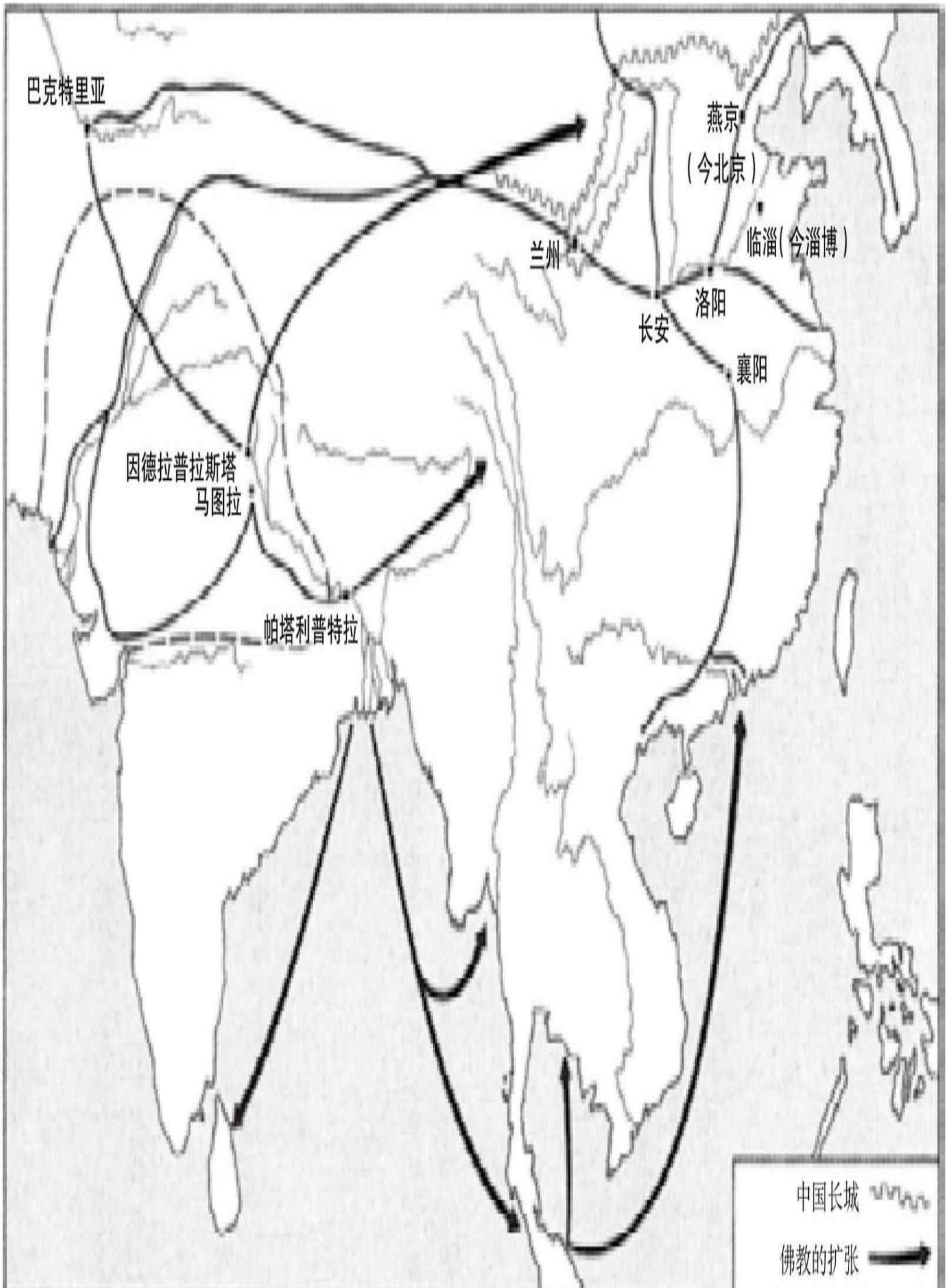
这一混合而成的文明得益于世界性帝国的建立。这些帝国包括公元前321—前181年的孔雀王朝（dynastie des Maurya），尤其是公元320—525年的笈多王朝（dynastie des Gupta），它们跨出了北印度之严格的界限，扩展到了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中国的西藏、暹罗（Siam）和印度尼西亚（尤其是在笈多王朝灭亡之后），同时不仅渗透到锡兰岛，向那里“殖民”，而且进入了德干高原达罗毗荼人的大本营。每到一处，它都把“古典和繁复的”梵文强加给它，使之成为印度各地一种王公文明的工具，与大众文化相对。

随着孔雀帝国的建立，在著名的国王阿育王（Açoka）统治时期（公元前264—前226年），佛教在印度取得了胜利。然而，几个世纪过后一个新的古典印度脱颖而出时，它是在获胜的印度教的标志下进行的，或者按人们所说的那样称之为印度教的“复兴”，因为当时印度掌握了它从其他地方学来的一切，是它在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时期。其中尤其包括希腊艺术，这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27—前325年在印度河领域征服的地区学来的。但印度艺术也向世人证实了它那独有的纯洁、有力的特点；而且可以说它发明了寺庙（sikhara，字面意思是“突出的尖塔”），后者在若干世纪中就像西方的大教堂那样是印度文化的特征。寺庙建在一个巨大的平台上，宽阔的台阶引领到它上面，四周由小教堂（佛龛）或回廊环抱。寺院的数量之多代表着须弥山（le mont Meru）；众神据说居住在那里，它相当于古希腊的奥林匹亚山。

这一时期还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兴盛时期。正是在旃陀罗笈多（月护王）二世（ChandragouptaⅡ，公元386—414年在位）的宫廷中，生活着“九块宝石”——当时出类拔萃的诗人和思想家。他们在那里进行写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迦梨陀娑[27]，正是在那里他创作了《沙恭达罗》（*Schakintala*），该剧在1789年被译成英文，1791年被译成德文，给赫尔德[28]和歌德[29]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由于印度教继承了某些非常古老的传统，因而我们难以准确地说清它源起的时间，到底是在笈多王朝末期，还是在持续时间甚短的戒日帝国（606—647年）解体之时。但总的来说，它确立自己的地位肯定是印度中世纪的这些阶段——大致在戒日王去世（647年）和1206年德里素丹国成立之间。印度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或一种社会制度，印度文明的核心，而且，虽然它的起源非常古老，但即便在潘迪特·尼赫鲁（Pandhit Nehru）及其继承人时期的印度仍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在考察这一现象时，我们可以通过借用从欧洲历史归纳出来的术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诸如“中世纪”“封建分裂”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这些术语，要记住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它们。虽然印度教对中世纪印度的重要性相当于基督教之对于欧洲中世纪，但印度与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或者封建时代的欧洲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巴克特里亚
燕京
（今北京）
临淄（今淄博）
兰州
洛阳
长安
襄阳
因德拉普拉斯塔
马图拉
帕塔利普特拉
中国长城
佛教的扩张

图11 佛陀之后的中国和印度（公元前500—公元500年）

在这一多灾多难的时期，佛教由海上传播到了印支半岛和印度尼西亚，通过陆地传播到了亚洲的腹地和中国。不过它在印度衰落了。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帝国（图中虚线所包括的范围，包括马图拉和因德拉普拉斯塔城）一度扩展到了帕塔利普特拉。这些希腊化地区充当着佛教传播的中继站。

（A）历史背景在起作用。

甚至在笈多王朝灭亡之前，贸易可能就已在萎缩、下降。这种衰落影响到了商人，他们是耆那教和佛教的信徒和支持者。不久，这两个宗教都受到了迫害，虔信它们的人被施以刺刑，遭到了杀戮，它们的寺院被毁，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

在印度整个历史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它最富裕的地区——自恒河到古吉拉特（Goudjerat）和阿拉伯海的边缘——不再在大规模贸易的刺激下兴盛繁荣，大型统一帝国就会倾覆。印度人口中的大多数不会因帝国的倾覆而受到太大影响：国王和统治阶级一直属于与其几乎所有臣民不同的种姓。由此产生的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现象，就是印度利用这些机会分裂为独立的邦国，每一邦国又再次裂变为一系列好战的公国和领主属地。印度“中世纪”的历史为地区性“武士”所主导，由成百上千个地方年代记构成；在研读它们时，即使有学识的专家也易于迷失方向。

具有趣味的既不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追溯这些邦国的历史，也不是仔细研究保持地方特色的愿望如何萌芽的——在孟加拉、古吉拉特或德干高原［如某些历史学家称呼它的那样，“印度的拜占庭”，这么说考虑到了它的特别的命运，它强有力的抵抗和它在公元888—1267年注辇帝国（l’Empire chola）时期通过海路的扩张］。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现象是地方文学环孟买湾和卡提阿瓦半岛（Kathaviar）的孟加拉、古吉拉特地区的发展，这些文学使用的是达罗毗荼语［“达罗毗荼”一词是在1856年由罗伯特·考德威尔主教（Robert Cadwell）很不巧妙地提出的，但现在不得不使用它；该词指的是德干地区的语言而不是其种族，这些语言中最重要的是泰米尔语］，而且主要在南部。

简而言之，印度的“中世纪”和经济的减退给印度人文和地理的多样化带来了新的力量和活力——而这种多样化不管怎样一直都比较强大。这一多样化就像“热带植物”那样迅速滋生蔓延；它是印度教的一个基本

特征，同时它给现代印度留下了多种多样的语言，是统一的一个严重障碍，令它头痛不已。但与此同时，尽管印度存在着差异，宗教和文化的统一性无疑正在成型。

（B）统一产生于婆罗门混同信仰的努力。

在北印度，印度教是婆罗门利用吠陀时代和吠陀时代之后的宗教成分，数世纪前同化的非雅利安人的宗教成分，最后还有特别的、多种多样的地方信仰，完成的一个宗教综合体。一个试图包容一切的宗教把它们接管了。

在这一缓慢的过程中，印度南部到底出现了什么事？逐渐逐渐，南印度在政治、艺术以及宗教思想的发展上在取代北方。7—12世纪之间，德干高原是产生了最高级别的、最为灿烂的艺术成就的故土：包括马玛拉帕拉姆（Mamalaparam）妙不可言的古典帕拉瓦艺术（l’art Pallava）、埃洛拉（Ellora）剧烈而技艺高超的艺术，以及库纳拉克（Konarak）抒情的和肉感的艺术。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早在这些艺术成就之前，南方就产生了商羯罗 [30] 和罗摩奴阇 [31] 两位大师，他们是印度最后两位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印度教能够以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名目流行开来，应归功于一位可以为人接近、慈悲为怀的神，他乐于提供帮助，欣然接受崇拜。其形象各异，但本质是一样的。传统宗教对佛教和耆那教进行了报复——尽管它接受了上述两个宗教中关于纯洁和非暴力的说教，甚至接受了它们的素食说。然而，总的说来，它不过是用新的语言对古代流行的一种信仰重新进行了阐释。

这样印度教得出的结果是三个伟大的神“在极顶”共存。一个是梵天（Brahma，他尤其受到“文学上的尊崇”），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一个是毗湿奴（Vishnu），他是世界的保存者；第三个是湿婆，他是世界的毁灭者。他们三者相互分离而又密不可分，以其不同的方式显现至高无上的实在，这一实在的作用是充当人类之间的天意。这解释了它们“下到”人间的原因，比如毗湿奴的化身（avatara）——他维持和平的众多化身。他可以以鱼、乌龟、一头硕大无朋的野熊、一头雄狮的形式出现，甚至以佛陀的形象出现，这是他的第九个化身，这样佛陀的工作被纳入了整个宗教体系之中。毁灭之神湿婆被等同于“死亡、时间；它是哈拉，即它所移动的东西”。与毗湿奴一样，湿婆往往向其女神显现他的权力。在印度南部，湿婆有一个妻子，名叫米纳什基（Minashki，意

思是“她长着一双鱼眼”），是一位国王的女儿。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充分探究这一丰富、多彩的神话。在这一方面，齐默尔（H.Zimmer）在其富有智慧且令人愉悦的著作《印度艺术和文明中的神话和象征》（*Mythes et symboles dans l’art et la civilization de l’’Inde* ，1951年）中做了有益的阐述。我们也不可能再进一步关注祈祷和牺牲中过于注重细节的仪式，关注死者崇拜，关注在印度大多数人中依然普遍实施的火化典礼（只有苦行者和孩子才被埋在土中），或者关注其费时而复杂的结婚程序。在对待这些仪式方面，印度过去极其保守，现在仍然如此。

对信奉者来说，关键问题在于个人得救。假如他们得到了好的评判进入了“太阳光线照耀下的”天堂，或者说假如他们遭到了谴责而进入了地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得到奖赏还是受到惩处，将来都不会长久维持这一决定。灵魂将被赋予新的肉体去延续其不幸的命运。然而，通过祈祷、礼拜、朝圣，或者借助于护符，人们时常可以逃离卡尔曼（kharman），即总是产生反响——尤其是导致转生——的行为。他们会以此方式“得到拯救”。但其获救是被动的，与佛教徒追求精神自由的过程迥然不同，后者要求个人的洁身涤罪、苦行和对尘世利益的神圣弃绝。

正如佛教过去对待耆那教那样，印度教之浑浊不透明的水淹没了佛教。佛教某些形式化的内容被印度教同化了，但其精神遭到了排斥，即便在它根基极深的孟加拉也是这样。不过这留下了一个有待填充的真空。不管在什么时候，苦行者、圣人或“弃世者”在印度都不乏追随者。在一个紧密的、严酷的社会中，人们只能卑躬屈膝，居主导地位的宗教给个人自由留下的空间只表现在自我克制即“不行动”上。在如此情况下，“宗派”自然而然地成倍地增加，它们是知识和道德解放的一种方式。

在12世纪佛教遭到最后几次镇压之后，导致人们在孟加拉大批转向伊斯兰教的可能正是佛教留下的这种真空。15世纪在巴尔干半岛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在历史上时常遭到迫害的波斯尼亚鲍格米勒派（Bogomiles）基督教异端在土耳其人到来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穆斯林统治下的印度（1206—1757年）。穆斯林的印度以7世纪马拉巴尔沿海建立的商业殖民地为先导，公元711—712年通过经由信德的一次入侵和建立各个内地殖民地而具体成型，之后极为缓慢地向印度各

地扩展，最后到了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后来，它试图征服整个南亚次大陆，但没有成功。

穆斯林为了据有北印度半沙漠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战斗。即便到了11世纪初，即公元1030年，他们控制的也只有旁遮普。又经过了200年的奋斗，它才在1206年建立了德里素丹国（sultanatde Delhi），并把疆土扩展到了北印度，这一至关重要的地区给它带来了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

这一征服是在遭受无数次的挫折后才取得成功的，结果是全面的军事占领。穆斯林在人数上居少数地位，且完全以较大型城市为根据地。他们要想统治全国，除采取系统的恐怖手段外别无他法。残酷成了常规：火刑，或当场处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或刺刑，各种独出心裁的拷打……印度教寺庙被毁，取而代之的是清真寺。有时还出现强迫改宗的局面。哪里出现反叛，哪里就当即遭到残酷的镇压：房屋被焚毁，乡村被夷为废墟，男人遭到杀戮，妇女则被充作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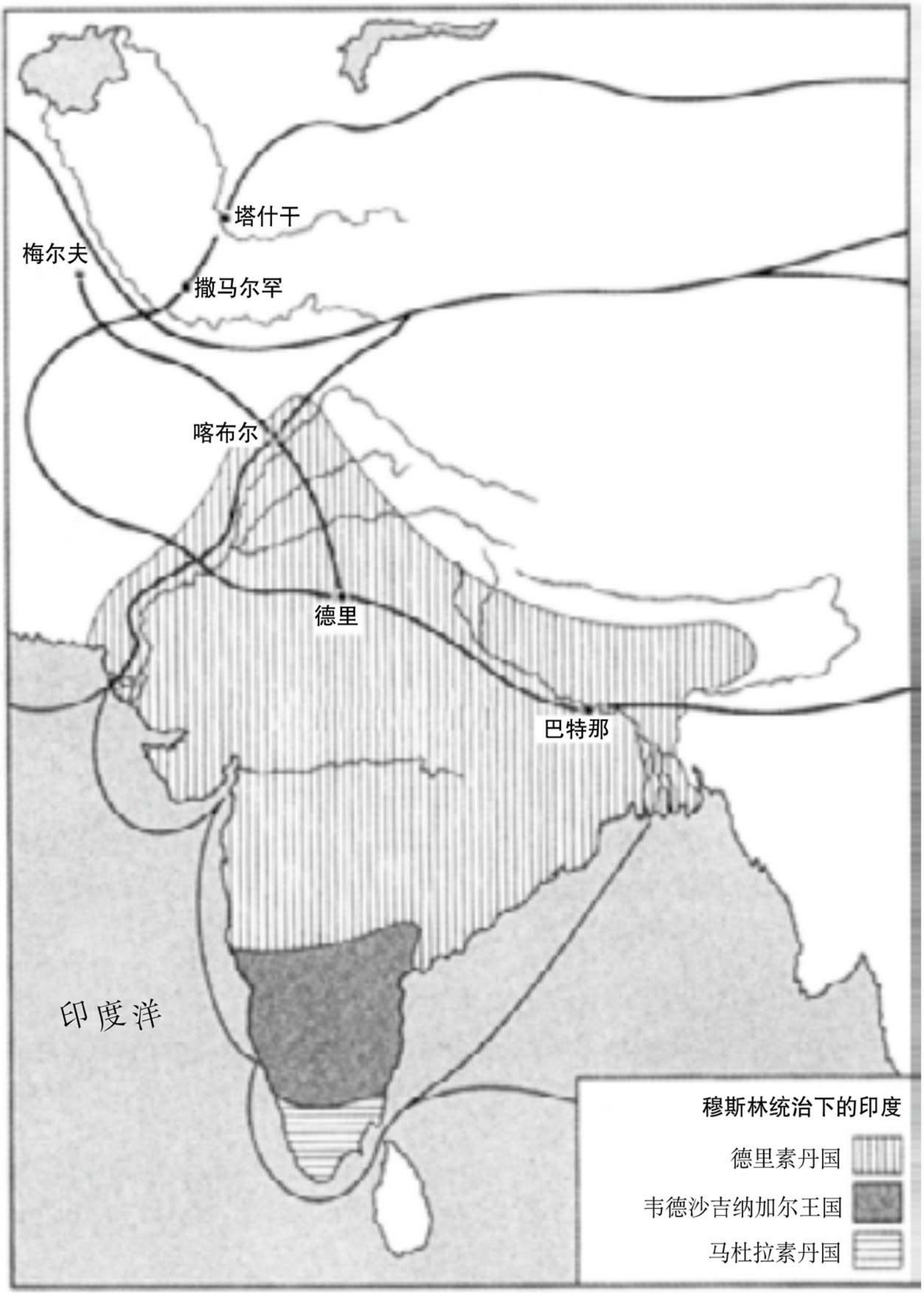
一般而论，平原地区仍交由当地的王公或人民公社治理。这些处在中间地位的权威负责征收重税，这时常是获得某种自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拉杰布达纳（Radjpoutana）的罗阇（rajahs）就是这样。

印度能够存活下去，完全靠的是其耐心、超凡的力量和辽阔的疆土。它要缴纳的税收是如此沉重，以至于一次灾难性的歉收就足以造成可以令100万人丧生的饥馑和瘟疫。一边是穷人极度的贫困，而在另一边，则是征服者的奢华无度，包括被素丹立为首都的德里的豪华宫殿和盛宴，此令伊本·拔图塔那样著名的穆斯林旅行家叹为观止。

德里的素丹们运气很好，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最直接的继承人发起的第一轮侵略狂潮。他们甚至从这些麻烦中获得了好处，向南进行他们自己的征服活动，那里在此之前一直抗拒着穆斯林统治者。潮流发生了改变，帖木儿侵入这一地区，并于1398年成功地进入德里，毫不留情地洗劫了这儿。然而，在征服这里之后，他马上带着战利品和大批俘虏撤离了，这样穆斯林多多少少能够重新建立他们对印度的控制，尽管他们再也未能恢复昔日的辉煌。

这是一个体弱多病、四分五裂的帝国，约130年后，即1526年，它被巴布尔率领的一支冒险队伍在帕尼帕特（Panipat）战役中击败，帝国倾覆了。巴布尔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所率军队人数不多，但装备

了火绳炮和野战炮（其炮车带有链条，在战场上能够抵御可能的骑兵冲锋）。此外，巴布尔在取得这一胜利后用来自伊朗、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各国，后来还有西方的雇佣军，扩充了他的军队。



塔什干
梅尔夫
撒马尔罕
喀布尔
德里
巴特那
印度洋
穆斯林统治下的印度
德里素丹国
韦德沙吉纳加尔王国
马杜拉素丹国

图12 14世纪的印度

该图显示出主要道路（粗黑线）和政治划分。图中最南端是1335年建立的短命的马杜拉素丹国（Sultanatde Madura）。

巴布尔是一位逊尼派穆斯林，因而，他的胜利是正统派伊斯兰教的胜利，是那些皮肤白皙、拥有火炮的人的胜利。随之而起的是一个莫卧儿帝国，它理论上存在了三个多世纪，直到1857年，在印度土兵叛乱（la révolte des Cipayes）爆发之后才姗姗来迟地被英国人废黜。实际上，早在1757年英国人占领孟加拉之前，随着其最后一位伟大统治者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的去世，这一帝国就已经失去了光泽。

自1526年到奥朗则布去世，穆斯林统治下的印度重现荣光，让人想起昔日德里素丹国伟大的岁月：带有同样的暴力，同样的强制性共存，同样苛重的税收，以及同样的成功。

同样的暴力：伊斯兰靠敬畏进行统治，并把其奢华建立在印度的普遍贫穷上。也许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一方面是令西方旅行家称羡不已的神话般的财富，另一方面则是一连串的饥荒，是高得惊人的死亡率和不计其数的儿童被其家庭遗弃或出卖。

同样的强制性共存：随着时间的流逝，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阿卡巴（Akbar，1555—1606年在位）是莫卧儿帝国最伟大的君主，他甚至试图建立一种不那么专断的统治，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把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融为一体（Din Ilahi，意为“神圣宗教”）。然而，除皇帝的亲近随从外，没有几个人皈依它，他一去世，这一宗教也就完蛋了。尽管如此，这一尝试仍是一个伟大的举措。

事实上，如果没有其印度教臣民，征服者将什么也办不成。印度大片的地区仍保持独立，不管它们是不是纳税。一位为大莫卧儿（即莫卧儿帝国皇帝）服务的名叫弗朗索瓦·贝尼耶（François Bernier）的法国医生在1670年写道：“在这一同样幅员辽阔的国度里，存在着众多不怎么把大莫卧儿视为主子的民族，因为它们大都有自己独特的统治者和领导人，只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才向莫卧儿纳贡，有的缴纳得非常少，其他一些则什么也不缴。”

由于不得不进行战争和应对各种持续不断的小型冲突，大莫卧儿的权威有受到限制的趋势，尽管在理论上他拥有绝对权力。大莫卧儿的宫

廷拥有一支5万—20万人的大军，他们驻扎在德里，包括骑兵、滑膛枪装备的步兵、炮兵，轻型野战炮（所谓的“悬镫炮”）和重炮，马和大象预备队——成群结队的士兵、王室侍从官和仆从。其首领（omerahs）享有津贴和红利（生时享用的田地）；他们是冒险家，常常出身极为贫贱，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街上列队。“穿着非常讲究，有时骑马或骑象，有时坐轿，身后通常跟着一大批马弁或卫兵；前面及两侧有大批步行人员，负责清道，用孔雀尾驱赶苍蝇或扫尘，拿着牙签，端着痰盂或饮用水。”贝尼耶继续写道：“有一位穆斯林，就有数百名异教徒。”整个大军不能从所谓的浅肤色的蒙古人中征集（他们因担心其后代会失去其特权，而偏爱娶来自克什米尔的白人女子）。因而士兵不得不从异教徒和肤色较黑的人中招募。

德里的士兵中总是有拉杰普特人（即来自拉杰布达纳邦的人），统领他们的通常是他们自己的罗阇。如果需要，一些罗阇可以募集一支由当地士兵组成的大军。他们有时甚至要与穆斯林雇佣军作战，或与一些危险的邻居进行战斗，比如属于什叶派穆斯林的波斯人、帕塔尼人，来自孟加拉的穆斯林，或与传统上敌视莫卧儿帝国的来自德干高原的印度教或穆斯林王公作战。不是这样吗？

所有这些都由大莫卧儿的充实的国库支付报酬。国库的收入主要来自其庞大国家的商业，而不是来自土地收入。事实上，国库是财富的集散中心。每当有一块银币存入国库，就要在上面打上一个小洞，因此许多银币上有这样的标记。

很大一部分非伊斯兰的印度地区参与了这一财富分配，或者像我们会说的那样，处于这个循环圈之内。随着时间的流逝，共存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妥协和有限的相互容忍。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德里和莫卧儿帝国其他都会中出现的混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艺术。有一件事是确切无疑的：这是一种真正的混合体，印度教因素与伊斯兰教因素同等重要。然而，在文化和宗教的层面上，印度仍然保存了自我。伊斯兰教虽然笼罩了一切，但它并没有对印度产生深层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杜尔西达斯[32]生活于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这个人是个婆罗门，后来成为用印地语写作的最伟大的诗人。

确实，伊斯兰的专断统治，不管造成了别的多么多的后果，但相比于与西方的接触，对印度社会的影响要小。印度与西方的接触始于15世纪末，16和17世纪有所加强，在18世纪大扩张时期进一步增多。除枪炮外［它不仅是1526年穆斯林获胜的原因，也是1565年维济亚讷格勒姆

（Vidschayanagar）毁灭的罪魁祸首］，伊斯兰与它征服的印度相比没有其他大的优势。

如上文提到的，随着奥朗则布的去世，莫卧儿帝国面对来自西方的和南部的威胁开始摇摆不定。1738年，阿富汗人夺取了德里。自1659年起，印度中央邦信奉印度教的马拉塔人（Mahrattes）就开始发起强有力的攻击，这一攻击只是短期遭到奥朗则布的遏制，到了18世纪成为胜利者。

不过，虽然我们对穆斯林讲了上面这样的话，但我们不应过于仓促地指斥他们在印度的记录。把这一特别暴烈和漫长的殖民经历与当时在世界上发生的不计其数的类似拓殖活动区分开来孤立地看待，是有失公平的。不管怎样，这一长达几百年的占领给人口众多的印度注入了大量虔诚的穆斯林，按1931年的人口统计，他们占总人口的24%（7700万人，印度教徒为2.39亿人），或者说大致一个穆斯林对三个印度教徒。现在，1947年的印巴分治非常不完善（人们估计在印度4.38亿总人口中有4400万穆斯林，而在巴基斯坦8500万人口中，也有不少非穆斯林），实际的比例应在20%—25%之间，但与第二个数字接近。因而，穆斯林印度也神奇地存在下来，且难以与它已化为其中一部分的共同的印度—伊斯兰文明分开。

英属印度时期（1757—1947年）：一个古老的经济制度与现代西方相搏斗

16世纪时，葡萄牙人在远东建立了一系列商行。1498年5月17日，瓦斯科·达伽马到了加尔各答（Calicut）；1510年，果阿被葡萄牙人占领。但葡属印度仅仅兴盛了不到一个世纪。到了17世纪，在舞台上唱主角的已经是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工厂。

甚至在法国人于1763年失败之前，1757年6月23日，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在普拉西（Plassey，即Palassi，离今加尔各答不远）的胜利事实上已经宣告了英属印度的成立。它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存在到1947年印度独立；这样它存世的时间实际上与莫卧儿帝国相当。与莫卧儿帝国一样，它是一点点地发展起来的，直到1849年征服了旁遮普后才大功告成；同样，除其直接控制的地区之外，印度还存在着众多实行自治的邦国，土邦和公司。但是，在英国的统治下它们的独立地位与其说是一种事实，倒不如说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就总体而论，整个南亚

次大陆都感受到了英国以巨大经济优势为后盾的咄咄逼人统治的冲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遥远的英国大致说来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商业和金融强国。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深刻影响了印度的所有的结构。

·印度成为一个原材料的输出国。经营开发权掌握在东印度公司（直到1858年才解散）的手中，这种开发随着印度被征服地区的增加而加大。自最早的极度腐败的克莱武勋爵时期起（他在英国下院中遭到攻击，1774年自杀身亡），它就采取了三种形式剥削地方王公、商人和农民。

刚刚被征服的富裕省份孟加拉、比哈尔（Bihar）和奥里萨（Orissa）遭到残酷无情的盘剥。1784年之前在那里没有建立任何的秩序和公正，此后，出现了较为适当的统治。

在最早的这些年，劫掠和侵吞已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9月18日，印度总督康华里勋爵（Lord Cornwalis）这样写道："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公司在印度斯坦拥有的土地有三分之一现在变成了丛林，只有野兽出没其中。"这基本上没有夸大。

确实，这些负有责任的新的统治者也是他们无力控制的历史进程的玩偶和受害者。人们提到的许多恶果，是在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建立货币经济时必须出现的，这里虽然很早之前就与世界贸易有着联系，但过去从不知道这么一种制度。英国的法律和西方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也事与愿违地带来了灾难。

不管怎样，一种历经艰辛取得、建立在印度遥远的过去之基础上的古老的稳定性，现在受到了严重冲击，在风雨中飘摇。

18世纪即将结束时，印度是一个由不计其数的村落和通常非常贫穷的农民构成的农业世界，一片片的草棚现在（1962年）在马德拉斯（Madras）附近和其他不少地区仍可以看到。"墙用晾干的泥坯砌成，房顶上交叉铺着棕榈叶，唯一的入口是一道低矮的门……用干牛粪作燃料燃烧起来的烟，尽其可能地从房顶的裂缝中冒出去。"但这些村落构成了联系紧密、稳定而自治自足的公社，它们由一个首领或长老议事会治理，这些人在有些地区甚至组织土地的重新分配。村子里也会有工匠，如铁匠、木匠、锯匠和金匠等，他们几百年来世代相传地从事同一种行当，换得的是实物报酬，分得村落收成的一部分。这些村落中有一些拥有奴隶，他们为较富裕的农民服务，负责饲养家畜、收拾家务和纺

织。公社作为一个整体负担向邦国或最近的领主缴纳税收或者组织劳动。它们的收成和劳动有一部分用在别的地方，供印度政府控制的地处遥远的少数城市使用，从中却得不到任何回报。税收是城市与乡村之间保持的唯一的联系，后者无力购买城市进口或制造的任何物品。城市的工业产品仍然是奢侈品，供城市中少数居民使用，或供出口之用。但如果来自特权阶层的压力过于沉重，让人无法承受，村民就会逃亡，在别的地方寻求安身之地，希望能够得到好的运气。

村落的这种古老的生存经济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村子里既有农民也有工匠，因而除盐和铁外，它对外界的需求微乎其微，形成一个几乎封闭的系统……村落的社会组织建立在等级基础上，使所有村民各安其位，而与婆罗门（他们同时既是教师，又是祭司，也是天文学家）、长老或者属于较高种姓的较富有的村民保持距离。处于等级制最底层的是在田间劳动的不可接触者，他们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

这一整套制度先是在18世纪，而后是在19世纪日趋恶化。为了征税，英国人利用了原有的税收人员，但赋予他们对村落的所有权，此乃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这样，自孟加拉开始，就出现了一大批虚假的地主，即柴明达尔（zamindars）。柴明达尔的任务是向英国当局提供一定数量的税收，但为了确保其职位，他们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税额要高于规定数量。不久，他们不再在自己负责征税的地点生活，而雇用代理人负责此事。孟加拉的农民发现自己处在中间人和寄生虫的层层盘剥之下，负荷重得让人难以承受。

在没有任命柴明达尔的地方，英国人自己负责征税，这些税用现金支付。现在任何手头没有现钱的农民都不得不向高利贷主求救。这些高利贷主在印度各地兴盛起来。过去，他们不得不担心农民会反抗，对农民的愤怒心存忌惮；现在，法律在为他们撑腰，法官站在他们一边。如果农民欠债不还，他们可以牵走农民的牲畜，还可以拿走农民的田地。可怜的农民，可怜的ryot[33]！由于地价在持续上涨，高利贷主有着各种便利条件变成地产主；另外，投机性的价格上涨也吸引投资商购买土地，把它作为保证收入的一种手段。结果是数量越来越多的大地产主通常对改良土壤不怎么关心，而只关心靠其收益生活。到了19世纪末，在一亿农民中可能有三分之一仍是小地产主，他们拥有的田地平均不到十亩，此为维持生存所需的田地最低限。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长老议事会十之有九不复存在（现在则正在复苏）。

由于下列原因，局势进一步恶化。

（1）由于来自英国和印度本土工业的竞争，乡村工匠遭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转为农民，从事田间劳动，而农民本身就已过多。

（2）英国资本家有系统地推行的双重政策：他们一方面把印度视为出售他们工业产品的一个市场（18世纪时，印度的染布或印花布在欧洲成为时尚，其非常古老的棉织业迅速发展起来。但如此一来，这一行业迅速遭受灭顶之灾），另一方面把这里变成购买某些原材料的市场，如孟加拉的黄麻，或孟买附近肥沃的黑棉土（regur）出产的棉花，由轮船运到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厂进行加工生产。

供出口的原材料由铁路运到港口。这些铁路早就建成了，它们在19世纪下半叶对印度内地造成了革命性冲击。单纯为了集散商品的城市兴起了。另外，印度越来越多的农民种植商品作物，这些作物不是供家庭或村落食用的。种植工业用作物的数量超过了食用作物种植量。旁遮普产粮区是个例外，但这里也出口其小麦。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在19世纪最后30年出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饥荒；虽然我们掌握的统计数字很不完善，但仍可以感受到，食品消费在普遍下降。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原材料价格的暴跌，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在地主和高利贷主手中。自由农民拥有土地的规模进一步萎缩，但其债务多得让人不可思议。农民因这一负担而受到严重削弱，他们相对于其债权人的地位比从前农奴相对于其主人的地位还要低。不管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多么大的自由，印度农民在经济上享有的自由越来越少。

·现代工业出现的时间要晚，大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与最早的保护性关税同时。在那一时期，地方性工业的发展得到了众多有利因素的佐助：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带有大量无产者的现代城市的兴起，易于购买到原材料，最后是资本家的干预。

这些资本家来自三大集团。一个是帕西人（Parsis），他们是一千多年前从波斯逃到印度的琐罗亚斯德信徒的后代，主要居住在孟买地区。一个是马尔瓦尔人（Marwaris），他们是来自拉杰布达纳内地一个高级种姓，因其地区非常落后而免于受到英国人的竞争。第三大集团是来自古吉拉特邦的耆那教徒。

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三个工业城市：加尔各答（往东150英里），那里有塔塔集团（Tata，帕西人的一个家族）的钢铁冶炼业，且大量出产黄麻；孟买，棉织业和汽车装配中心；艾哈迈达巴德（Ahmadabad），

位于靠北500千米处，是一个纯粹的棉织业中心。这些行业及其他行业，尤其是食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1942年后，像野草似的杂乱发展起来，而食物和纺织品的缺乏致使黑市价格疯涨，以致人们一度担心在日本的威胁面前，印度会完全覆灭。

1944年，工业家决定采纳孟买计划。这一半官方的计划过于乐观，它预见到大规模的投资因英国偿还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欠印度的债务而成为可能。该计划鼓励与英国工厂和商人达成协议，就像比拉（Birla）和纳菲尔德（Nuffield）在汽车生产方面达成的协议那样。此外，即便今天，在印度独立如此长时间之后，英国资本仍投资于加尔各答克莱武大街各银行所控制的许多行业……

这一工业高潮不过是加剧了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运动。塔米尔的一句谚语这样说："如果你破产了，就跑到城市里去吧。"在那里的车间、工厂和家族服务方面（在那里得到的工资"虽然很少，但总比没有强"），能够找到就业机会。卡提阿瓦半岛的某些种姓之间及孟买富家招收厨子时，或者德干高原西南部沿海的穷人与孟买工厂中用手卷制香烟的手艺人之间，出现了不期而至的联系。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印度人的普遍忙乱，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

这样，甚至在独立之前，印度就已出现了人口众多的现代城市，这些城市有其肮脏的贫民区，如加尔各答的棚户区（bustees），更为有名的是孟买的分间出租的宿舍（chawls）或马德拉斯的切里（cheris），其泥墙与农村的土墙没有什么区别。

·英国在1857—1858年的印度土兵叛乱后对其政策进行了反思。

这确实是英国修正自己对印度的整个态度，结束英属东印度公司统治（1858年9月1日），代之以在伦敦设立一个机构宏伟、权力很大的印度部（India Office），而在加尔各答设立一个副王取代从前东印度公司的总督的一个机会。

举例来说，英国人过去吞并印度从前属于王公的土地是不是太过匆忙了？从现在开始，他们决定尊重地方自治；1881年，他们恢复了过去接管的迈索尔（Mysore）素丹国的独立地位，这是英国对印度采取新的态度的一个标志。在这一五颜六色的印度世界中，如果他们不再直接进行统治，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小心地维持国家现有的区划并加以利用，尤其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大分裂。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分野必须在

军队中加以维持。关于这一问题，1858年埃尔芬斯通勋爵（Lord Elphinstone）用了一个重要隐喻，他说，大英势力的卫士是那些其安全因船体分为防水的舱室而得以确保的汽船。“我愿意按照同样的方针建构我们的印度大军，以确保我们印度帝国的安全。”也就是说，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喜马拉雅山区的锡克教徒，从此以后保持在不同的隔水舱里，永远不在同一个部门服役。

这些计划不久就被突发事件打乱。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场长时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到印度，造成了饥荒、瘟疫和农民起义。心怀好意的人民认为政权应实现自由，吸收某些印度教徒进入管理部门，甚至吸收他们到政府里来。1885年，在“副王的恩宠下”，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成立了。如我们现在可以说的那样，它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尽管在那时民族主义者仍仅为一个人数很少而活跃的少数群体。

国大党的成员来自正在城市和大学中崭露头角的中产阶级，这些人越来越多地加入该党。他们既不是一个贵族或王公的阶层，也不是大地主阶层，后者深深置身于传统的过去之中，其社会保守主义与印度的主子非常相配。反过来，他们是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来源不同，因条件的变迁而出人头地。这一阶级中既包括帕西人、马尔瓦尔人和耆那教徒这样的资本家，也包括以实玛利的后裔穆斯林，以及那些其种姓具有政治使命的人，比如克什米尔的潘迪特家族，该家族与婆罗门有关联，在莫卧儿人统治时期出了不少政治家（现在该家族又出了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今日印度的领导人）……圣雄甘地同样来自一个显赫的家族，该家族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产生过大臣，为古吉拉特邦卡提瓦半岛的小王公效劳。

在西方文明的吸引下，这些人在享受其好处的同时，既看到了其优势，也看到了其危险。比如，甘地的思想吸收了印度的非暴力传统、托尔斯泰充满激情的和平主义和耶稣基督的山上宝训……印度的这一知识阶层在动荡不安的水域航行，梦想实现印度教可借以实现纯洁的某种宗教诸说混合。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印度不计其数的异端中获得了灵感。我们可以举出10个或20个名字，首先可以举出的是达亚南德·娑罗室伐底（Dayanand Sarasvati，1824—1883年），他创建了印度教的一个新宗派，既反对基督教，也反对伊斯兰教，但承认自己受到了西方的吸引，试图从《吠陀》中发现某些现代科学的因素，包括电和蒸汽机。这份名单可以以甘地的几个精神导师为结束，其中有戈

帕尔·克里希纳·戈卡莱（Gopal Krishna Gokhale，1866—1915年）[34] 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年），后者以其诗歌闻名于世，曾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的一首诗《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 ），成了现代印度的国歌。

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宣传鼓动，伴随着法律程度方面的诸多争吵，印度最终于1947年8月15日实现了独立和分治。由于一方提出要求，另一方谨慎、退缩和虚伪，这一堪作楷模的非殖民化对话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东西（然而它却比所有其他非殖民化过程要好得多！）：一会儿理性，过一会儿则失去理智，而且做出的让步总是姗姗来迟。另外，让穆斯林满意的地方（1905年把孟加拉分为两个省，东孟加拉并入阿萨姆省以组成一个种族整体）却激怒了印度教徒；1911年这一决定推迟执行，反过来令穆斯林大为光火。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1906年组成了穆斯林联盟）联合在一起，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重大难题：与群众建立联系。圣雄甘地（1869—1948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就。甘地曾在孟买和伦敦学习法律，结业后于1893—1914年在南非纳塔尔充当律师，为移居南非的印度人辩护。1914年回到印度后，他很快就给民族主义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征服了他们，并动员起他们的力量。他的纲领是“神圣地利用政治力量”。他的称号“圣雄”（Mahatma）意思是“高贵”“最受尊敬”。他教导说，一个人能够约束另一人意志的唯一的力量是真理，是对所有有生命者实行非暴力，是纯洁。他在行动中强调宗教，这使其效力增加了百倍。甘地唤起了人民大众。这在第一次针对英国刚刚承认的1919年宪法的抵制运动（1920年9月20日）中表现得很明显；这同样体现在1921年12月甘地号召掀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在这种强有力的静坐示威之后出现了严重的骚乱和屠杀，此时甘地仍然忠于自己的信条，制止了抗议行动。八年后，1930年1月26日，他掀起了第二次大运动，结果导致对（政府出售的）食盐的抵制；在达成协议后，又爆发了新的、旷日持久的抗议运动（1932—1934年），最终导致一部新宪法，即1937年印度法案问世。

·因而，印度独立的条件在促使这一局面成为现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已成熟。

1942年8月8日，国大党接受了甘地的动议，要求英国人退出印度。1942年和1943年，随着日本军队向缅甸挺进和威胁阿萨姆，局势变得非常严峻：车站和公共建筑被毁。

和平恢复后，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1947年6月11日，英国议会终于同意印度独立。两地间的联系中断了。但这一获得自由的印度内部出现了分裂：8月15日，它分裂为两个“自治领”，一部分是印度联邦，一部分是巴基斯坦（它本身由两个不相连的部分构成）。这一分治进行得非常糟糕：给印度留下了44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而东部的政治边界把黄麻产地留给了巴基斯坦，却把胡格利河（l’Oughly）沿岸的纺织工厂留给了印度……难民向两个方向奔涌，此情此景骇人听闻，不计其数的人被杀。甘地试图与穆斯林达成某种协议，结果徒劳无益，却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1948年1月30日，一位印度教狂热分子认为任何协议都是对印度教的背叛，就刺杀了圣雄。分治在内战和难以言说的暴力中实现了。这么做的代价是二三百万人丧生。

人们常说，英国的政策应为这一分裂负责。这么讲公平吗？这一断言赋予了政治姿态和异常明显的骗术以过于重要的地位。印度的过去又一次决定了它的现在，并向现在进行了报复。真正负有责任的是这一过去。与此同时，1948年，锡兰也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自治领。该地具有自己独特的文明，从未附属于英属印度，一直是另一个世界。

因而，印度刚一取得独立就一分为二。如果我们把1947年缅甸的独立和分治计算在内的话，是一分为三。[35]

印度能够避过一场中国式的革命吗？

1947年以来，印度在工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其速度超过了前一个半世纪。如此一来，它比巴基斯坦更为成功地适应了印巴分治的局面。它在国内建立了秩序；它与法国达成了协议，后者放弃了在印度的商行；它占领并解决了王公和土邦主据有的各邦，尤其是海得拉巴（Haïderabad，1948年9月）；它从葡萄牙人手中以武力夺取了果阿（1962年）[36]。它在克什米尔确立了自己的权利，并在喜马拉雅山脉不确定的边界地区抗住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它在夺取果阿时采用的残忍手段无疑令印度在世界各地真诚的朋友失望，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认为它是世界上富于政治智慧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不过尼赫鲁的威望经受住了这次冲击，他一直是第三世界最杰出的全球发言人。

印度的议会政治运转得非常良好，1962年中央议会（人民院，Lok Sabha）和14个邦议会的选举证明了这一点；全国合乎情理地分为14个语言邦。这些情况，加上上文所说的情况，非常清楚地向人们表明印度在独立后取得了一系列极为珍贵的成功。

·然而这并不是印度呈现给世人和它自己众多的人口的真正具有独创意义的特征。这一独创性体现在其政府耐心的努力上，此努力在1961—196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加倍进行，带领人民走出极度的困境。印度的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接近5亿人。政府的任务是在不使用暴力、不夸大其词的情况下帮助实现经济进步，依靠自然、局势和人民，并使事态朝着切实可行和有可能成功的方向发展。

1962年4月18日，尼赫鲁总统非常精辟地向一位法国记者阐述了他的政策："我们不是空谈社会主义的人。我们只是想从长远看，率领人民走向繁荣；从短期看，我们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社会不平等状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正在对经济采取行动，但仍留下了大量空间给私有企业主：部分重工业部门、全部中小型工业部门，以及整个农业，这些都不属于公有制。在农村，我们鼓励实行合作，但我们不打算强制实行集体农作。又一次，我们不是空谈社会主义的人，我们是在一步一步地前进，试图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比如，我们不要忘记，虽然我们剥夺了土邦主的王位，但我们给他们留下了王宫，授予他们豁免权和特权，给予他们通常非常丰厚的可终身享用的养老金。请看看：我们在所有场合都试图走民主道路。"

确切的词可能就是"自由"，带有其各种美德、缺陷和模棱两可之处的"自由"。不管怎样，问题清楚地展示出来：印度采用了"自由世界的"方法和观点。它需要并想要实现一场革命。它能够在不采用中国模式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吗？

·赌注？革命的任务是结束，至少是减缓印度明显的和令人震惊的贫穷。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虽然令人痛苦，却实实在在；它是我们不得不开始出发的起点。

印度与其他如此多的国家不同，具有一大优点，即从不遮掩自己的伤病，无论这一伤病来自它自己还是来自别人。

这一悲剧景象一直存在。我们从最早的见证人那里就已了解到这一点，他们在公元纪元之前就已注意到那里预示末日来临之恐怖景象的饥荒。现在，在伟大的1962年，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些庞大的城市，如大得有些畸形的加尔各答，规模庞大的孟买，甚至包括位于其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地区之外的该国首都新德里，都提供了种种令人同情的景象：破衣烂衫，身体多病，茅舍简陋，吃的仅仅是一些粗食。

反映印度贫穷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其多得惊人的劳动力过剩。在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许多家长不得不把其孩子卖作奴隶，而购买他们就是行善事。1923年，安德列·谢弗利永（André Chevrillon）这样写道：“在这里，劳动分工达到了极致。马车夫就必须去驾车，侍者必须去开门，苦工必须喝‘让开！’欧洲人必须忍受这种排场。如果他步行，或者手里拿着一件行李，那才是咄咄怪事。身后如果不跟着一队人和行李，一个英国军官就无法动弹。去年，在伦敦，仅仅一位小小的下士就当着我的面评论说，在印度，连弯腰捡手帕这样的事，也要摇铃叫仆人去做……这同古罗马一样，那里的贵族拥有一大批家仆、被保护人和获得解放的奴隶。”

当然，这是过去的一幅画面，其中一些细节已经过时。但这在今天同样适用。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有10个或12个仆人，对此你做何感想？加尔各答那些沿河而居的处境悲惨的男男女女和孩子（1962年），“蹲坐在污物垃圾前……受到苍蝇的不断骚扰却不想着把它们赶走，或者伸出手来向路人乞讨”，对此又做何感想？向我们提供上述情况的同一位作者还提到了那些养路工像是出自地狱图景的工地：“赤裸的男子、身着莎丽的妇女、衣着褴褛的孩子，几乎是在用手摊开大锅里被木柴烧得滚烫的焦油。”睹此你有什么想法？工地应当实行现代化。但假如实现了现代化，失业人数马上就会上涨。在德干高原上的班加罗尔（Bengalore），有一座生产车厢的超现代化工厂，“但人蚁在生产线的终端重新出现，那里油漆活儿是由大量工人手工承担的”。

这些悲惨的景象是第一批被归入现代印度卷宗的，它们出自一个一直存在类似图景的印度。几个数字可以概括地说明这种情况：4.38亿居民（1962年）；死亡率高达25‰—30‰，而与此相对，“自然”出生率在45‰左右；因此人口增长率是20‰，也就是说，每年增加800万人。这些数字不能令人鼓舞。它们预先就遏止了人均收入的几乎任何增长，即便国民生产总值有了明显的增加。1962年，印度人均年收入为280卢比（1卢比等于1法郎），这样每个人每天的收入不到100个旧法郎，或者说不到1个新法郎。此外，在上面提到的养路工地上，工人的工资是每天1个卢比。

人口的增长能够减缓下来吗？单单更高的生活水平就是一个理由，但这首先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国家倡导的人口控制和绝育手术（150万例志愿绝育手术）宣传，并不足以堵住这一人口大潮。印度不像日本那样恪守纪律，而在后一国家，尽管成效比印度大得多，控制人口也不

是件容易的事。

此外，这些并不是印度仅存的问题。

·不必是一位经济学家，就可以理解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的内涵。

与前两个五年计划一样，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关注的是众多唾手可及的方面：农用化学肥料、运输、重工业、机械工业，诸如此类。也就是说，所有易于改变而且很快就可以改变的东西。它希望（从未让人失望）改革的结果能够产生更广泛的反响。政府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干预。1959年4月，福特基金会的一批专家提出建议说，正在拟订的五年计划的要旨应是集中解决农业问题。他们认为，应把印度的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约计7300万吨，提高到1亿吨或1.1亿吨。但他们的建议被弃之不理。如同其他专家认为和政府决定的那样，在坚信国家的粮食形势到1965年不可能有灾难性的变化的同时，不放弃在工业上的努力，不放弃在这一领域所需的投资，不是更为明智的举措吗？食物无疑依然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印度过去经历过类似的考验，并生存了下来。

一旦确定了优先发展的目标，印度面临的就是一个惯常的、几乎永不会发生变化的局面：把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保留下来，用于其必不可少的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5%，第二个五年计划是11%，第三个五年计划是14%。投资数额之巨大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预算亏空；由于不得不向国外大量贷款，通常是高息贷款，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因而国家不得不恳求外国援助，其中一些是私人援助，且绝非无息，一些是资助款或软贷款（长期低息贷款）。这又一次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引发了令人瞩目的竞争。两国都将提供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构想中的5%的外援。苏联把其资金主要用在大型项目上，比如比莱（Bhilai）钢厂。美国在过去给印度的援助是其竞争对手的20倍，涉及多个领域。但我们不应当停留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千篇一律的竞争上。我们也不必过分关注工业投资的细节，如建造钢厂的过程；或建造一家生产胶卷的工厂，它由一家法国公司承建，使印度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胶卷生产国。

让人感兴趣的是经济正在起飞。印度正在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之一，次于日本，落后于中国不远。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有一个相对的优势，即工业起步较早（至少自1920年起）。这样它从这一超前上获得了某些好处。现在，经济在与暴涨的人口的竞争中看来最终可以赢得胜

利。在今日（1963年），人们不可能相信到1970年人均收入会增加一倍。[37] 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已经成为希望之土，但它已经在朝这一方向前进。

·此外，前方的道路石块横立，布满了障碍：一方面是政治障碍，另一方面是社会和文化障碍。

政治方面的困难：尼赫鲁及其家族在道德方面的独裁，此人已经72岁，这造成了严重的继承权问题。国大党的主导地位本身并不是一种法定制度，这使富有成果的、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权力竞争难以发挥作用。反动的右翼不是在指责共产党和倾向共产党的左派吃牛肉吗？这一争论令人失望。在1962年的大选中，倾向共产党的左派只赢得了10%的选票。但在喀拉拉邦（Kerala）地方政府中，在被非常专断地剥夺权力之前，它显示出罕见的诚实品德和效率。共产党反过来指责尼赫鲁维护的是一个“腐败的政府”。但这些反对党仍处于边缘地位——谁会听他们的呢？

社会方面的困难：空谈平均分配财富总是要比具体实施容易。在土地所有权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各邦通过的诸多农业法规实际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大地产主尽管在法律上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但他们几乎在所有地方恢复了他们相对于弱小农民的优势地位。农民的身份是自由的，这是一大进步。但他们依然非常贫穷，农用工具很差。部分可耕地依然抛荒。就连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也对地产主有利，在水“供应紧张”或“需求量大”时，他们就把它把持下来。农民从这些水利设施中获得的好处微乎其微。更为糟糕的是，大地产主非常保守，不愿意接受任何技术进步。确实，在印度存在着一个“腐败的政府”和一种前革命的局势。

最后，传统文明仍以其多重的和严格的网络一直控制着印度大众。

对印度教徒来说，越过种姓制度，投身到构成现代生活一部分的社会革命中来，就像不得不步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那样困难。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过渡或现代化，任何时候都必须面对印度教这一巨大障碍，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难题。在某些情况下（比如1962年星辰相会，据认为这预示着世界即将步入末日时），自身营养不足、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印度民众向寺庙奉献的供品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由此可见这一宗教的力量。一群群牛儿四处游荡，在任何能够找到粗劣食物的地方填饱自己的肚子；一群群的乌鸦偷食着粮食；还有大群大群的蜂。这些生

物从未遭到过攻击，即便它们毁掉了收成——所有这些都是印度教的伴生物。牛神圣无比，同时所有生灵都应受到尊重。

印度教最不好的方面无疑是其种姓制，它使人民禁锢在如此众多的不同的区域里。确实，社会的不流动并不是绝对的，从长时期看来这一制度无疑会消失不见。但它现在继续存在着。不可接触者（les Haridjans，“贱民”）——人数至少有5000万，印度曾为其利益进行斗争——在法律面前变成了另类人。印度宪法废除了公民之间的所有法律差别，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它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性的。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别。在这一方面，变化非常缓慢，几乎只涉及知识精英。即便在这里它也迟疑不决：许多政治斗争既是政治家单个人之间的争斗，同样也是等级不同造成的，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无疑，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成长壮大，其成员通过进入印度不下46所大学中的这一所或另一所来寻求财富（但至少对一部分大学生来说，存在着所谓“教育失业”）；这一阶级培养了政府官员、律师、医生和政治家。

这一性质不同的中产阶级从外表上看向所有等级开放。对外它在服饰和行为方面是以英国中产阶级为榜样的。然而，对同样这一批人来说，家庭生活往往是其避风港，他们从中可以重新发现传统的服饰和饮食，能够重新回归旧的生活方式。而现代生活代表的是在几乎所有方面与宗教传统决裂。比如说，它把城市公共管道供水视为纯洁的而不是受到污染的，尽管它流经如此多的“不洁”地区；或者，尽管传统上禁止食鱼，但吃医生开的鱼肝油；同意各等级之间互相通婚，或登报宣布结婚，附带声明“种姓无关紧要”；或把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工人聚集在靠近某一新建工厂的同一座建筑里，不管不顾他们住在一起时打破了等级间的禁忌。

上述事例表明在印度教改革方面出现了一点进步，同时它对形式的拘泥正在松懈。确实，自佛陀以来，印度最有活力的宗教思想家一直在反对这种繁文缛节。1800年，拉姆·莫哈姆·罗易[38]试图以这种方式改革印度教，并朝着一神教而努力；他曾创建了一个新的派别，名叫梵社（Brahmo Samaj）。其他改革家随之而生，另外一些改革家也将崛起。

因为现在印度已经意识到其文化传统在其前进道路上设置的障碍。这一意识在圣雄甘地时代即已存在，他一方面通过他的热情，另一方面通过他掀起的反抗运动，在“唤醒”现代印度方面做得肯定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甘地事实上试图利用印度的所有精神传统，使之为他所看到的

印度的进步事业服务，为提高印度的民族自豪感服务。他正是这样以其正确的本能唤醒印度民众并发起一场狂热的群众运动的。不过与此同时，他试图复活的传统在印度许多地区意味着阻碍它们采取某些现代措施。

甘地最终之所以与其社会主义战友尼赫鲁分道扬镳，其根本的冲突就在这里。尼赫鲁本人这样总结说："此乃一个深渊，把那些心理朝向未来的人与那些心向过去的人分裂开来。"甘地信奉的原则致使他严格地与任何种类的社会革命保持距离。对他来说，革命应当在人们的心底发生。问题不在于改变现在的秩序，而在于劝说人们，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富，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全身心地致力于为其同胞福泽服务，并同意，用甘地自己的话来说，"坚信牺牲和自愿贫穷的艺术和美德……通过亲手纺织……投身于那些构成民族之本的活动……从心底祛除所有种族偏见，以各种形式为完全戒饮酒精类饮品和毒品而斗争……从总的方面来说，为实现个人的纯洁而奋斗。此乃一个人能够在贫穷的水平上生活的服务方式"，是一种偏爱在乡村生活框架中生活的方式。

简而言之，尼赫鲁在其著作《我的一生和我的囚徒生涯》中讨论甘地的观点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看来，那些希望为大众服务的人关注的主要不应是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应是如何降低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把自己放到与群众相等的水平上，在同样的根基上与他们融合在一起。在他看来，那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尽管尼赫鲁及其朋友对这种个人美德的某些方面和对甘地本人心存羡慕之情，但他们以为，把它作为一种集体的理想，是与"每一个现代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资本主义者"的逻辑概念相逆的，"它将意味着回到一种已经过时的父家长制精神中去，这一精神是极其反动的"。总之，他们认为，它意味着不去面对下述事实，即印度如果想从欠发达状态和大众贫困的局面中摆脱出来，就不得不与其过去的某些方面决裂。

现在印度事实上追随的是尼赫鲁而不是甘地的路线，这一点见于甘地的学生维诺巴·巴韦[39]的失败这一事实上：1947年，在"父亲"（bapou）去世之前，巴韦倡导了捐地运动（le mouvement du Bhoodan）。捐地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劝说地主自愿捐出土地来解决令人苦恼的农村问题。捐出的这些土地随后以个人或集体的形式重新分配给贫民。

要了解这一理想主义运动的意义，就必须记住，出身于名门、受过相当高的教育、精通数学的维诺巴·巴韦在1916年当着母亲的面焚毁了

他的所有文凭证书，一心去过“弃世者”或印度教苦行者的生活。引人注目的是，他参加了甘地发起的所有大型运动，也就是说经常身陷囹圄。在开始其捐地运动时，按他的设想，要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大约2500万公顷的可耕地。10年过去了，他仅仅争取到大约200万公顷的田地。从数字来看，他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

圣徒般的巴韦进行其捐地运动时，正是靠着双脚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行程上万里，吃的是粗茶淡饭，而且按照甘地的教导每天纺线。不过，这在甘地那个时代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一方面由于甘地个人的魅力，一方面由于时代不同。到了现代印度，再这么做就与时代不符了。维诺巴·巴韦激起了人们的某些热情，但古吉拉特邦某些村落向他发出的“呸”声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象征着一种新的意识。他的失败，尽管在一部教谕故事书中看上去或许让人伤感，却可能标志着印度的觉醒：它在寻找真正的、合乎情理的、现代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一种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旧制度。

“而今，”尼赫鲁得出结论说，“印度古代文化永远活在它自身之中。它在默默地、竭尽全力地与一个新的、无所不能的对手做斗争，这个对手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它将被击败，因为西方带来了科学；而科学对成千上万忍饥挨饿的人来说意味着面包。但西方也同时带来了摆脱一个残忍的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掠夺的文明的解毒剂；这个解毒剂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就是为了社会和共同的福泽服务的合作思想。这与旧的婆罗门教的‘服务’理想并无太大差异，但它也意味着所有阶层和所有集团的‘婆罗门化’（brahmanisation，当然是在世俗的含义上），意味着消除阶级差别。而且，当它更换服装时——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旧的服装已破烂不堪——印度可能将穿上按这种方式裁剪的新装，它既与现在的形势相合，又与旧的思想习惯相配。印度拥戴的原则必定与它深深植入大地中的根相连。”

1966年附言

尼赫鲁的去世（1964年7月27日），让印度失去了阳光和希望。中立主义在印度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政治方面，尼赫鲁的继任者夏斯特里（Shastri）不得不面对国大党的蜕化带来的消耗，议会的平衡也取决于它；英迪拉·甘地夫人确保夏斯特里死后国家的方向不被逆转，同时甘地夫人的前景更为美妙；经济方面，与昨天和前天一样，人口的增长吞噬和抵消了巨大的物质进步；外交方面，关于中印边界的外部冲突日

益尖锐化；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问题和巴基斯坦东部印度教少数族裔的问题无法达成协议。

1965年8月24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潜存的关于克什米尔的危机恶化为一场公开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态支持巴基斯坦，对印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拆除中印边界上的防御工事。9月22日，联合国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停战建议被双方接受，恢复了冲突之前的现状。为了保持在美英与苏联之间实际与表面的平衡，印度可走的道路非常狭窄，处境非常困难。如果印度开战，军事开支将会非常危险地严重妨碍它必须保证的经济发展。

第十四章 海上的远东：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朝鲜半岛

初看起来，把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朝鲜和日本放在一起有些武断。不过这些地区虽然彼此相隔遥远，但从历史上说都与两个大的人海——中国和印度——非常接近，后两个大国从未停止过范围广泛的影响。随着海路变得容易通行，这一近邻关系更具重要性。东亚和东南亚的海洋，比如日本海、黄海、东海、苏禄海和班达海，不少都是面积不大、海水不深的陆缘海，受到邻近陆地的限制。除菲律宾和日本附近水域外，大的深海只能在东方和南方发现，处在把这些窄海与印度洋和太平洋分开的火山岛屿带之外。事实上，这些海是众多的“地中海”，它们为陆地包围，上面点缀着岛屿：都已提前具有了人性。

它们共有的另一特征是都受到了阶段性风力的影响：在初夏和初冬一般说来是方向相逆的季风。在每一个地方，也都有台风，有时达到了飓风的风力。这些季风尽管通常是悲剧性的，却并非永远刮个不停。一般而论，船只能够借着稳定的风在岛屿之间或沿海岸平静地航行。航海在这里意味着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这样可以躲避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能够看见长着海榄雌的海岸。如果大海太过狂暴，它们可以在非常接近水面的海底抛锚。由于得到了这样的保障，阿拉伯三桅帆船、中国的帆船或荷兰的货船能够非常容易地脱离恶劣的天气，成百的记述证实了这一点。风浪过后，它们继续航行。

这些就是相似的、处在陆地之间的海洋的有利方面和它们提供的各种可能性。那里到处都是感觉自如的水手，沿着一个早已确定的航线进行贸易和私掠巡航。如果有必要，他们会航行到更远的地方：某些马来人远航到了马达加斯加岛，波利尼西亚人（Polynésiens）则驾着带有舷外托座的小船到了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待在自己熟知航道的故乡的水域里。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是这样。科尔特斯神甫1626年这样宣称："中国人不往公海上航行。"然而，航海把阿拉伯人带到了与他们相隔遥远的岛屿，后来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是这样。

繁忙的海上交通不久就使这些内海具有了人性，把其海岸、文明和历史联结起来。这样的实体每一个都保存了自己永久的特征，但大海完成了文化接触的奇迹，鼓励互相交流，并导致彼此非常相似。

印度支那

印度支那并不是这些航海社会中的最佳实例。它是东南亚的一大部分，得名于丹麦地理学家马尔特-布戎[40]。这是一个宽阔的半岛，高山把它分隔开来，宽广的河流大致由北向南穿过半岛流向大海，看上去有点类似于伸出的手指。半岛到了南部，缩小为狭长的马来半岛，东面和西面是大海。而在较为宽广的北方地区，自史前时代起就不断地有种族穿行，以致可以辨别出的所有史前民族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美拉尼西亚人（Mélanésiennes）和来自原史时期（Protohistorique）中国的蒙古人种。这些人种构成了现代东南亚人的基础（美拉尼西亚人种则在原始山地居民中仍可以见到）。

在历史上，共有四次大的人口迁移影响了印度支那。第一次来自中国，是靠武力进入的；第二次通过海路来自印度，采取的是和平方式。另两次同样自海路而来：一是穆斯林，他们到了这里，占领了马来半岛；另一次是欧洲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入侵，这股浪潮在19世纪大大加强。它淹没了一切，直到最近在痛苦而旷日持久的非殖民化冲突中再次被冲刷干净。

·处在两大地区中国和印度之间，这种地理位置从根本上说明了印度支那的古代文明。

中国文明是以武力方式在一千多年之前到达东京（Tonkin）和安南（Annam，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殖民征服过程，同

时具有军事、行政和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性质。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事件是向华南的扩张，占领东京和安南即是这一南扩的结果。当地原住民要么被赶走，要么被制伏。就这样产生了安南人的富有生命力的低级文明（sous-civilisation），它向南进一步扩张，最终到了印度支那的南部。

印度的影响是指商人的影响，这些人在他们经商的地方建立了停靠港和商行，并常常与当地酋长结为联盟。后一部分人中有一些通过这种接触发财致富，他们在技术和文化上的优势使他们能够扩张其影响，树立起威望，随后建立起王国：一种新的、部分地具有印度特色但非常复杂的文明由此产生了。这些王国包括位于越南中部沿海地区的占婆王国（Champa），位于东南亚最西部的孟人[41]王国，以及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扶南王国（Founan），它在很晚之后被车栗人（le Tchel-la）吞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帝国，即高棉帝国（Empirekhmer），该帝国在9—14世纪在整个东南亚居主导地位，最为强大。吴哥城（Angkor）废墟向人展现了它昔日的辉煌。

11—14世纪之间，缅甸人和泰人（意为“自由之人”）的侵略和征服活动导致了一些更为本土化的王国的出现，而此对高棉人和孟人造成了损害。这些王国最终催生了缅甸人的澜沧国，其东部在今天继续存在，构成了老挝和紧密团结的暹罗或泰国（意为“自由之人之地”）。

·欧洲人于19世纪到达，20世纪离开，只是临时占领这些国家。

尽管如此，东南亚因这次武力殖民征服而被深深地打上了印记。法国在东部，英国在西部，中间是独立的缓冲国暹罗，它的独立地位在1896年仍被承认。法国人在1887年把东京、安南、交趾支那（Cochinchine）、柬埔寨和老挝合并起来，组建了印度支那联邦。英国把缅甸并入其印度帝国，并在远端的马来半岛对马来诸邦实施统治；它把新加坡变成了远东最大的港口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迅速把其控制区扩展到整个东南亚，当即摧毁了这些短命的殖民结构。得益于英国的明智政策，马来诸邦、新加坡和缅甸未经任何斗争就获得了独立，但越南人则与法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战斗，直到1954年7月21日签订《日内瓦条约》后，才获得了完全独立。

法属印度支那就这样被一分为四。《日内瓦条约》以北纬17度线把

安南一分为二，北半部与东京一起组成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南半部则与交趾支那一起组成了越南共和国。老挝王国的独立地位早在1949年7月19日就得到了法国的承认，柬埔寨在同年11月正式获准独立。从广义上讲，老挝和柬埔寨在争霸世界的两大集团——苏联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属于共产主义世界，与中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保持着联系。越南共和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在这种有限的独立的初期，这些国家都不得不面对所有欠发达国家都必须面对的各种可怕的问题：对其工业和农业实行现代化，改善收支平衡，与一直形成重压的人口增长保持同样的发展速度（如果可能的话，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政策是不是比其他几乎所有地区采取的自由主义政策更为有效？我们不可能这么讲：政治和潜在的冲突妨碍了自由选择和适当的比较。比如，我们从下述事实，如越南民主共和国拥有军备——俄国旧的传统的军备——或柬埔寨的组装厂出口雪铁龙牌两马力轿车等，推导不出任何东西。

所有这些年轻的国家面临的都不是简单的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尽管充满活力，却是东南亚唯一的共产主义实验；虽然它从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中得到了某些优势，但它对其庞大而紧邻的邻国中国的同化力感到有些不自在。越南共和国从它与美国的联盟中获得了好处，但它不得不面对由此在其领土内产生的一场战争：维持美国式的半殖民主义遭到了部分国人的反对，他们更偏爱与共产主义的北方结盟。[42]

因而，在这一地区，实际的平衡仍很靠不住，就像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地位那样……这里关涉的不同利益为数众多，且相互矛盾很大，以致谁都不能合理地预测现有的冲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除这些迫在眉睫的争论问题之外，旧有的文化问题仍然存在。

平原上人口过多与山区半空虚的状态仍然形成了对比。两个历史时期彼此矛盾。平原种植的是水稻，使人口有可能在红河、湄公河、湄南河（即昭披耶河）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大量集中起来……居主导地位的文明正是建立在这种农耕方式和密集的人口上。安南人是中华文明的后代，一直占据着红河三角洲的低洼地区。17世纪时，他们消灭了受印度教影响的占婆王国；18世纪时，他们从柬埔寨人手中夺取了湄公河三角洲。总的来说，这些都是相对新近的胜利。

在东部，柬埔寨、暹罗和缅甸平原上联系紧密的文明受到了印度教的深刻影响，而佛教也保持了它的印记。

然而，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在所有这些国家的山区，人数不多、原始和半独立，持泛灵论信仰的民族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作物。他们仍继续存在。

在这一五花八门的印度支那，基督教传教士获得了某些引人注目的成功，虽然这些成功几乎都是在佛教和伊斯兰教地区（如前文所述，伊斯兰教地区主要是指马来半岛）之外的地方取得的。1954年以后，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信奉基督教的30万农民集体向南方逃亡，因为在南方，在西贡掌权的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宣传在持泛灵论信仰的人中取得的成功最大，这并不令人奇怪。因而，在缅甸联邦，大批克伦人（Karens）皈依新教，强化了他们的团结，增强了他们反对主要由缅甸佛教徒把控的中央政府的力量。

这些细节并不是东南亚复杂而不确定的未来的主导性特征，但它们照亮了它，正如英语学校和法语学校在那里仍然存在一样。东南亚依然是一个十字通道；它欢迎所有这些影响，根据自己不同的种族构成及文化构成，吸收或拒斥它们。

印度尼西亚

由马来半岛往外，“亚洲淹没于太平洋之中”。印度尼西亚正是亚洲向东的延伸，其数千个岛屿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它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许多色彩的交汇之所。但这一多样性并没有消除它的某种统一性；现在如同过去一样，这种统一性需要不间断地加以维护，很需要重建。

·像过去一样，印度尼西亚群岛一直是一个向位圈的中心；它不断地感受到非常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冲击。

早在史前时期它就是这样。

在基督纪元的前几个世纪，如同在缅甸、暹罗或柬埔寨那样，来自印度的水手和商人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并带来了印度教和佛教。这两种宗教同时兴盛起来，既适应了当地的岛屿“文化”，又对新兴的王国形成了支持。

这些新王国中，最早的一个是在苏门答腊岛建立的，但最重要和最有权势的一个兴盛于爪哇。然而，它们的影响多多少少受到了局限——正如把它们带到这里的文明一样。爪哇有高山、广袤的原始森林和组织为村社的农业人口，拥有活跃的、能够自给自足的传统。结果印度——爪哇文明一直是一层镶在表面上的薄薄的饰板，包括其源自印度巴利文的文字、其诗歌、其建立在印度范式上的故事，以及其坟墓和寺庙。这些寺庙构成了布满婆罗浮屠山丘（Borobudur）的建筑群（8世纪），是“根据摩诃衍那[43]佛教构想出来的世界形象”。

在克拉通（Kraton）森林的“国王”之间，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其结果是最终在13世纪末兴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印度教帝国，麻喏巴歇（Madja-pahit）帝国。它依靠其强大而活跃的舰队，通过一种庞大的诸侯和依附人网络，以爪哇为中心统治着其他岛屿。在西面，它控制了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岛屿上的“狮子之城”新加坡；在东面，它达到了新几内亚（Nouvelle-Guinée）；在北面，则到了菲律宾。1293年，它令蒙古人控制下的中国所派遣的海上远征军缴械投降。

但这种辉煌只能维系一时。1420年，穆斯林占领了马六甲；1450年起，他们的胜利入侵倾覆了帝国，或者说倾覆了帝国的残部。政治上的自私自利和圣战合在一起彻底摧毁了帝国的宏伟结构。16世纪初葡萄牙人到达这里时，帝国一无所存，留下的只是废墟和回忆。只有巴厘岛存在了下来，并仍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古时的婆罗门遗产。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次年占领了摩鹿加（Moluques）群岛，即香料群岛。1521年，他们登上了苏门答腊这一大岛。葡萄牙人的入侵因令印度尼西亚群岛四分五裂的内部政治纷争而得利，不过他们占领这里的时间并不长，也没有真正采取措施在此生根发芽。它基本上没有触及群岛传统的生活方式，保持其多重潮流不变。其中包括阿拉伯船只由苏门答腊岛西端的亚齐（Achem）进行的贸易，它们把那里的香料和沙金运往红海；以及中国南部帆船的定期航行，它们自马可·波罗时期及更早的时候起（就婆罗洲东北部来说，实际上是自7世纪起）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群岛，带来了小装饰品、瓷器、丝绸及厚重的铸币（铜币和铅币，sapèques），以此换取珍稀木材、胡椒、香料和由婆罗洲及西里伯斯（Célèbes）淘金工人淘洗出来的砂金。

葡萄牙的入侵是对自爪哇到中国澳门（靠近广州），甚至远至日本的古代贸易联系的武力剥削。17世纪时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外敌入侵，即荷兰人的入侵。1605年，他们到了摩鹿加群岛的安波那岛（安汶）；

1607年，他们到了西里伯斯；1619年，他们建立了巴达维亚，并征服了爪哇。在那里他们实行了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各岛素丹和中世纪的王公［其克拉通（半法庭、半堡垒）占据了制高点］之间挑起争斗。在把葡萄牙人赶出马六甲后（1641年），荷兰人成为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统治者。

自那时起，荷兰人控制了两条重大海上航道：一条是苏门答腊岛和马来海岸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为通往西方、暹罗和印度的要道；一条是位于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大型帆船自好望角不经印度直接来到这里，并沿原路载着满满当当的东方货物返航欧洲。一伙商人进行开发之后为另一伙商人所取代，这种开发，尽管在早期受到了英国人的竞争，但其高潮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组建。该公司成立于1602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表（迟至1798年才一方面由于它自己的失误和混乱状态，另一方面也由于特别的政治局势而瓦解）。荷属东印度群岛曾短期为英国占领，但1816年它重新回到荷兰手中；荷兰人又一次有条理而安稳地在那里安置下来，直到1942年2月28日，这里遭到日本人的入侵。

在那时，典范性的结构瓦解了。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既曾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也曾与他们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945年日本失败后，即1945年8月17日，在民众疯狂的热情中，他们宣布印度尼西亚实行独立，艾哈默德·苏加诺（Achmed Soekarno）出任总统。“一个月后，即9月28日，当盟军统帅克里斯蒂森（Christison）将军率领英国和印度部队在巴达维亚登陆时，他发现城墙上涂满了反荷口号。”

荷兰政府冥顽不化，做出了顽固反应，努力要恢复旧的秩序，至少部分地保全旧秩序。这引发了一场与法国近年历史上数次出现的危机类似的典型的非殖民化危机。“殖民者”虽然在人口稀少的西里伯斯和婆罗洲等岛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那里总的说来是印度尼西亚的真空地带，但在苏门答腊岛遇到了顽强抵抗，在爪哇岛遇到的抵抗更为强烈。游击战令荷兰部队陷入瘫痪，把他们在大城市周围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荷兰人规模庞大的警察行动（始于1947年7月21日）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困难。他们对爪哇反叛地区的封锁较为成功，但造成了无尽的灾难。在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和联合国的干涉下，双方最终于1948年2月17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非常不完善，此后出现了第二次警察行动，但与第一次一样没有成效。1949年12月27日，荷兰女王在海牙签字，同意让出她对前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最高权力，仅保留新几内亚“荷兰”部分。在更

名为雅加达的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的红白旗取代了荷兰的红、白、蓝三色旗。

上面叙述的这些细节，虽然不足以概括这一漫长而戏剧性的冲突，却对理解印度尼西亚的现在具有根本意义。在其内心深处，它尚未从其近年的斗争中崛起；它仍在复活它们，而对荷兰的仇恨常常被用作为自己的困难开脱的借口。对新兴共和国来说，那种仇恨是一种必要的团结力量。关于西伊里亚（荷属新几内亚）[44]的争执没有别的任何理由。

印度尼西亚的最后这一部分是不是专断地由该国原来的统治者保有？这是一个原始的岛屿，无疑拥有资源，但开发利用它们却为印度尼西亚或荷兰力所不逮。至于其居民，那些原始民族，巴布亚人（les Papouasiens）既与印度尼西亚人也与荷兰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谁又关心这些呢？

·种族、宗教、生活水平、地理特征和文化，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其混杂的文明。

所有岛屿，甚至包括爪哇岛，都生存着原始民族，他们通常仍处在石器阶段。此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种族。在爪哇，共有三个马来集团：巽他人、马都拉人，以及爪哇人本身。在苏门答腊有马来人、非常奇怪的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us）、巴塔克人（Bataks）、亚齐人。这尚不包括居住在城里的华商。华商遭到憎恨，却又不可或缺。他们充当批发商、零售商、放贷人和高利贷主；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是寄生虫，但谁都离不开他们。

所有这些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或方言。但他们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一种“通用语”，来把其紧邻的世界联系起来。自16世纪起（无疑还要更早），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或更为人们熟知的马来语在起这种通用语的作用。这种语言构成了印度尼西亚语（Bahasa Indonesia）的基础，甚至在它成为新兴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之前就成为民族主义者规定使用的语言。尽管如此，它必须能够满足新的用途，尤其是在科学领域。请想一想，一个有关术语的委员会在一项法令中就采用了37795个新术语！

如此说来，它就像一个新语言，这种语言在印度尼西亚的作用确实无法与印地语在印度的作用相提并论。在印度，印地语当然是一种通用语，但同时还有英语，后者仍然非常具有生命力。荷兰语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在印度尼西亚继续存在下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在于

荷兰人（除少数姗姗来迟的、仅部分实现的努力外）没有发展现代技术教育，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教授。一位经济学家宣称，他们希望“在本土居民无知的基础上确立他们的优势。使用荷兰语会缩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而此是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避免的”。

印度尼西亚语言上的多样性反映在文化上的多样性甚至文化混乱上。在这一群岛，大的宗教都有奇怪的冒险历程。它们从未靠自身取得胜利，而是与包围着它或围攻它的民间信仰共存，时常与其一个大的对手合并。

在这一方面，离雅加达（荷兰人重新占领巴达维亚后曾短时期成为爪哇的首都）有大约25千米的某些村民可作证明。他们与一位来自欧洲的旅行者进行交谈。一位名叫卡尔约迪科洛莫的农民毫不迟疑地宣称：“在爪哇我们都是穆斯林。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谈论你们的神呢？穆斯林只信奉一个神。”卡尔约迪科洛莫看上去困惑不安，他的父亲帮他解了困。“这很困难，”他平静地说，“……我们不能忽视其他的神。他们能帮助我们，也能给我们造成伤害。我们的稻子仰仗毗湿奴的妻子雪山神女[45]。”（蒂伯尔·门德语）

进而言之，在整个国家都看不到清真寺。穆斯林村民在雪山神女的祭坛上供献水果和点心；而且，为了驱逐恶魔，他们在田里竖起竹笛，风儿吹过，它们会呼啸发声。同样，他们被要求用阿尼阿尼（ani-ani），“一种小的手持镰刀”，安静地收割庄稼。安静而迅速，这样善神就不会逃走。

神奇之岛巴厘也呈现出类似的画面。这里保存了印度—爪哇大帝国及其印度教信仰的遗产，但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在这一岛屿，死者必须火化，以让其灵魂升天。不过，与此同时，整套的泛灵论信仰和做法都残存下来，与现在仍很流行的祖先崇拜联系起来。

·维持这些四分五裂的民族的团结统一并不容易。

对荷兰的仇恨并不是万应良药。当所面临的问题是让一个原始的、悲惨的经济实现现代化，或至少向其大部分由劳累过度的农民构成的人口逐渐灌输坚韧时，统一变成一件难事。荷兰殖民给新政府带来的最大帮助是它对农业人口的剥削非常彻底，以致只有小地产主能够保持自己拥有的土地。这样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没有对大地产进行重新分配的任务，不必担心农村骚动。所有农民都同样贫穷。

事实上，贫穷的农民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其生存经济的囚徒。稻米是他们的基本食物，也是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远远超过了玉米、芋头或西谷米……水牛只是作为役畜或驮畜来饲养。人们很少吃肉，或根本不吃肉，仅仅食用少量的鱼。简单地说，这种经济处在市场之外。少量稻米、一点布、一个手工制作的玩具，在城里出售几种类似的物品就能挣到足够的钱以满足其微小的需求，包括廉价的香烟，“上面充满丁香香气，形态类似于小的椭圆锥体”。

工业仍然处在襁褓期，只有石油设备、橡胶种植园及其相关的工场、煤矿和锡矿除外。煤矿和锡矿都在苏门答腊岛（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也产锡），在苏加诺博士对它们实行国有化之前由英国—美国公司经营。但无论属于欧洲、中国还是国有，印度尼西亚的工业活动难以起到加速其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此同时，自从与荷兰断绝关系之后，其主要出口产品——橡胶、咖啡、烟草、干椰子仁和糖——的外销途径变得更少了；这些产品是荷兰人以牺牲传统的食用作物为代价发展起来的。

尽管如此，今天印度尼西亚75%的出口产品仍然是诸如橡胶、石油和锡这样的原材料。

因而，印度尼西亚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国家依然处在一个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状况之中，非常危险地仰赖世界市场的波动。因而，1951年，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中止给印度尼西亚的预算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通货膨胀的飞扬，再加上每年约100万的人口增长，致使现在（6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如果不是从海外大量进口稻米，爪哇就会出现饥馑。此外还应加上缺少称职的管理人员、行政部门头重脚轻、地方性的缺乏安全保障以及组织不善的军队。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反对派政治家这样说：现在是喊口号、进行宣传和发起诸如收复西伊里亚等引人注目的运动的时期，而不是制订系统性的计划的时期……我们难道不能以他的这一说法作为结论吗？

事实上，计划已成为当务之急。自由的恢复和由此引起的人民情绪高涨，肯定不会鼓励人们在人口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但这一努力是必须做出的。印度尼西亚本身应当团结起来。国家如果没有一支海军和空军，在如此分散的岛屿中，又会存在什么样的统一呢？

爪哇岛众多的人口使它在印度尼西亚“太阳系”中完全占据中心地

位。1815年，它有500万人口；1945年，人口达到了4500万；1962年则达到了6000万，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同时也拥有国家总资源的四分之三。但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400人）已接近于所能承载的最高限。现在已根本不可能从森林中夺取更多的土地，因为林地已减少到了最低限，进一步采取行动就会“进入危险区”。一个希望之地苏门答腊岛，那里每平方千米仅有30人，土地和矿产资源丰富。但苏门答腊的土地不如爪哇岛肥沃，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而这是一般农民无力解决的。

爪哇岛的中心地位令许多印度尼西亚人耿耿于怀，引发了活跃的分离主义和众多要求建立有效的联邦的呼吁。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最近（60年代初），分离主义起义成倍地增加，包括安波那的摩鹿加共和国，西苏门答腊的伊斯兰运动（Dar ul Islam），爪哇的泛巽他运动（Pansunda），哈特博士（Dr.Hatte）在苏门答腊巴东地区开展的运动，以及“上校们”在西里伯斯的分离运动。这些上校中的最后一位，辛伯隆（M.Simbolon）上校，于1961年7月27日投降。

此外还有别的困难。印度尼西亚政府感到它不得不限制共产党、社会党和自由主义的穆斯林党的自由。从而“苏加诺主义”就变成了一党专政，其纲领是“有指导的民主制”。

随着自由受到压缩和反对党尽管得到原谅但被置之一旁，“强人”——“邦加诺”（Bang Karno，“兄弟苏加诺”）——认为自己能够且应当执行引人注目的政策。这样，在昨天（1955年），中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大会在万隆（Bandoeng）召开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做出了种种努力来争取荷属新几内亚，即西伊里亚。得到满足的民族主义者对这样一个在所有领域、在未来许多年面临的只有困难和令人生厌的任务的政府，表示了某些支持。[46]

菲律宾

菲律宾的历史不属于法国正式的课程表中授课的内容。它与东南亚的通则没有相悖之处。这些岛屿也是不同民族相会的引人注目的十字路口。

至少自新石器时代起菲律宾群岛就有人居住，冶铁业早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几百年就已出现了。自公元5世纪起，印度—马来文明传到了这里，该文明的主要来源是爪哇；在富裕的满者伯夷帝国（Empire du

Madjapahit）的统治下，该文明在列岛传播开来。中国商人不久也到了这里，他们构成了一个商人和船员精英阶层，向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农奴行使其权威。

15世纪，伊斯兰教出现在大岛棉兰老岛（Mindanao）。到了16世纪，菲律宾群岛为费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领的西班牙人发现，麦哲伦本人1521年在那里丧生；1565年，西班牙人殖民到北方的另一大岛吕宋岛。随着他们的到来，基督教重新开启了与异教徒的由来已久的斗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远东，对手是摩洛人[47]。

尽管起义经常发生，尽管西班牙在马尼拉进行的统治非常不善，但它对菲律宾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898年。该年菲律宾内部爆发了大起义，美国舰队介入进行干预。结果菲律宾并没有马上获得独立，因为美西战争结束时双方签订了巴黎和约（1898年12月10日），把菲律宾置于美国的托管之下，这令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大为愤慨。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做贼心虚，宣称他的使命是“教导开化菲律宾人，使之成为耶稣基督为之死在十字架上的民族”。

直到1946年，菲律宾群岛才获得了独立，至少是理论上的独立。

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过去之后，菲律宾拥有众多人民（高达2500万人，每年增加70万人，而其国土面积仅为30万平方千米左右，仅为法国国土的一半）。其人口非常杂乱：95%是马来人，但其中掺杂了其他民族成分；40万—50万人是难以辨别的原始民族；20万人是中国移民；另有7万人是矮小黑人。

菲律宾共有2000万名天主教徒，是远东唯一如此庞大和联系紧密的基督教团体。第二大基督教团体包括200万名天主教持不同见解者，即阿格里庇亚宗，它得名于该宗派的创始人，一位名叫阿格里庇亚（Aglypya）的前神甫，此人曾帮助组织了1898年大起义；再下是50万名新教徒。穆斯林人数在200万左右，另有50万名异教徒……自1898年起，除少数几个名门望族外，英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西班牙语的地位；而在同时，马来方言的一种他加禄语（Tagal）重新抬头。最后，是数量众多的其他方言。今天（60年代初），至少一半的人口仍不识字。

菲律宾非常贫穷（假如说不是赤贫），以农业为主体。然而，大地产一直在以牺牲小农为代价发展着。一位美国观察家所说的“寄生性封

建制”社会阻碍了改革，并对外援形成了障碍。事实上，只有马尼拉存在着货币经济，国家其余部分靠的是物物交换。农民处境的悲惨说明了为什么会爆发大规模共产主义起义（布克人起义，Buks），这一起义在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上风时受到了欢迎，但在“二战”结束后和美国占领时期遭到了残酷镇压。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的榜样，古巴卡斯特罗的榜样，仍萦绕在人们的想象中。虽然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和监管），国家进步的速度实际上非常缓慢。另外，人口的增长把国家的任何进步都抵消了。

朝鲜半岛

就在昨天，1950—1953年间，朝鲜半岛扮演了一个过去和现在一起令它罹受灾难的戏剧性角色。这几年的朝鲜战争本质上是两大强国的一场冲突，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场武装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此后，同年12月，朝鲜半岛的独立看来已是当然的事实。该国的北部是由苏联军队解放的，南部的解放者则是来自日本的美军。这两个占领区仅仅通过一条人为的北纬38度线区分开来。但尽管联合国进行了干预，这一分界线仍把朝鲜半岛分裂开来。在南方，一个独立的大韩民国于1948年8月建立；而在北方，是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1950年，来自朝鲜的共产主义军队攻入南方。随后美国及其盟国进行了武装还击。在朝鲜一侧，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进来，以恢复平衡。1953年7月，交战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重新确定了北纬38度分界线。但无论对北方还是对南方来说，朝鲜半岛的这一任意的分裂都不会使生活变得容易。

·首先是地理。

朝鲜半岛为日本列岛、西伯利亚和中国包围，一直是其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的受害者。小国与大国为邻的坏处在朝鲜半岛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国认为自己有权对它做什么事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朝鲜半岛是一个拥有22万平方千米的巨大的半岛，大致由北向南伸展。它仅仅通过两个与高耸的长白山平行的狭窄河流——鸭绿江和图们江——与中国分开。长白山脉这道屏障事实上保护了朝鲜，最初可能确立了它的独立。自北纬43度到34度，朝鲜半岛是一道长800—900千米的土地，粗看起来与意大利非常相像。

与意大利一样，朝鲜半岛也不幸成为一个天然通道。中国把它视为一个门户，认为应当像对突厥斯坦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那样加以监视；日本如果不能通过正当或邪恶的手段进入这个半岛，就会感到自己消失在海中，因为地理在这里似乎系留了其群岛——绞船索未免有些过长了。因而，一旦日本感到自己尤其强大，或感到自己受到特别威胁，朝鲜半岛就会遭殃。自1592—1598年丰臣秀吉试图夺取这一半岛（未获成功），到1910—1945年日本成功地占领朝鲜半岛，日本不止一次地这么做。

为了填满它的不幸，朝鲜半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被冰封住时”还是“苏联的门户”。日本海在南至北纬38度的地方会结冰；而早在20世纪初沙皇俄国就对这一要道产生了兴趣。过去，在日本人对朝鲜半岛的帝王形成威胁时，他跑到了俄国大使馆避难。

朝鲜半岛是一个贫穷的半岛，虽然至少远至汉城这样靠北的地方仍生长着竹子，但很寒冷，北方为广阔的针叶林覆盖，只是在西部和南部有着繁忙的海岸和广阔的平原。对其高达3100万的人口（每平方千米超过140人）来说，平原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半岛的南部延伸到大海深处，有一系列岛屿。其中最有名的为位于朝鲜海峡中央的对马岛：它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到两地的距离为100千米稍过。朝鲜半岛与长江口之间的距离为500千米。

因而朝鲜半岛受到了大海的很大影响；它不仅是一个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的国度，有着森林和矿藏，也是一个渔民、航海家和商人的民族。自其历史非常早的时期开始，它就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富有成效的接触搭建了桥梁；自中世纪起，它尤其充当了进行阿拉伯和波斯贸易的中国南部与北方地区之间的联系纽带。作为一个通道和十字路口，朝鲜半岛是一个商人和移民的国度。

·朝鲜半岛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岛屿，自愿地关闭了自己的大门，但也情愿或不情愿地向外部世界敞开，借此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三国时期（公元前1—公元7世纪）遥远的历史是中国从文化上征服朝鲜的历史。这三个王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先是新罗（Silla，公元前57年），其次是高句丽（Kokuryô，公元前37年），最后是脆弱的百济（Paekche，公元前18年），它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因而，它们彼此大致属于同一个时期，但中国文明来到它们中间是分先后的。佛教先在高句丽立足，随后是在百济（公元384年），最

后是新罗（公元527年）。

三国中最原始的一个王国新罗超过了另两个国家，并在公元668—935年把整个朝鲜半岛控制在自己手中。该王国大大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在中国唐朝统治的整个时期（618—907年），都享有兴盛的大型贸易；它尤其生活在那种通过折射得到的光辉上。

庞大的新罗瓦解后，朝鲜半岛的统一因一个新的统一王国高丽（Koryô，913—1392年）而得到恢复。朝鲜的国名即源自这一王国。高丽文明因印刷术的发明而繁荣。这种技术源自中国，是在9世纪发明的。佛教以简化的禅宗的形式（中国人读作Tch’an，日本人读作Zen，朝鲜人读作Segn）在文人和普通民众中间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儒教在此扎根并兴盛起来，而且根基更为牢固。铸铁雕塑出现了，随后是真漆塑像和五光十色的瓷器，“从中能够发现朝鲜传统金银匠的品位”。

这种全盛局面无疑与整个远东普遍的进步分不开。但朝鲜半岛幸运地躲过了当时笼罩中国的蛮族袭击，后者在很长的时期里只是触及半岛。然而，试图打开中央王国所有大门的蒙古人在日本失败后，最后在朝鲜半岛取得了成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自1259年到1368年，控制了该国。

朝鲜半岛恢复独立后，处在其最后一个王朝李朝（Yi）的统治之下，该王朝掌握政权一直到了1910年日本入侵。除几段动荡时期外，比如1592—1635年相继遭到中国明朝和日本的入侵，李朝是朝鲜半岛一个和平独立、富有成果的时期。

毋庸置疑，这几百年的主要特征是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作为其结果，兴起了一种部分地从其普通民众无穷无尽的想象中获取灵感的文明。文字书写的变化促进了这种对大众文化的吸收。“在那时之前，中国的文字书写只能让文人用口头语言进行思考和书写。过去用中文撰写的小说现在开始用朝鲜文撰写，而且社会的整个新兴阶级得以接近文化。到了18世纪，这种丰富多彩引发了一场堪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美的文化沸腾。”（Vadime Elisseeff语）

然而，在朝鲜社会的顶层，仍然存在着一种贵族的、精雕细琢的文明。这种文明以新儒教的胜利为特征，具有某种理性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倾向。正是在那时那些家族信仰和新儒教由以立身的伦理思想生根发芽。即使到了现在，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朝鲜人仍然是“其最虔诚的

代表”。

·现在。

关于朝鲜半岛的现在，我们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一个大自然预先决定了它的统一，一个几百年来历史上有过牢固统一的国家，却因现实问题而分裂为两个国家，兄弟反目为仇。原有的首都汉阳（通常人们称之为汉城，意为“首都”）现在属于韩国，不再控制横向的汉城—根山大道（Séoul-Gen-san）。请想象一下，意大利一分为二，罗马被剥夺了通往安科纳的道路后会是什么一种样子。北方有工业、钢铁和电，南方（在60年代初）则只有稻米、大地产和外海。

此时它们看上去像是两个静止不动的木偶，由于自1953年以来不再运动或不再有人牵动绳索而被遗弃了。

1966年附言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上升为明星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荷兰于1963年4月30日被迫退出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荷兰曾经力图通过武力维持统治，并在国际法庭上争取对上述国家的权力。

于是美国认为赢得了一个中立国家，因为它已经通过联合国和自己的援助项目强有力地帮助过印度尼西亚。1963年7月8日，在英国的庇护下新马来西亚国家（马来西亚联邦、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新加坡）宣告成立时，这种努力宣告失败。友好谅解的努力（马尼拉会议，1963年7月30日—8月5日）也告失败。自同年9月16日起，雅加达爆发反英示威。米高扬（Mikoyan）的来访（1964年6月22日—7月2日），共产党（亲华）自1964年8月5日进入政府，表明道路的彻底改变。最终印度尼西亚脱离了联合国，随后在中国和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威胁要建立“革命的联合国”，但是它把自己改造成了“民主国家”。不过印度尼西亚的这一变化持续时间很短。

1965年9月30日夜—10月1日，一支印度尼西亚军队政变的企图引发了对军队阶层的强烈反抗，后者在苏哈托将军的命令下取得了国家政权。军队迫使苏加诺总统保持中立，并夺走了他所有的实权。军队进行了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屠杀之一，无数被怀疑为共产党人的印度尼西亚人被杀害：根据不同的估算，有大约20万—50万人被杀。军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与北京中断关系，结束了与马来西亚之间的斗

争。后者由英国扶持，目的在于限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包括马来半岛、新加坡和英国在婆罗洲的两块土地，沙捞越和沙巴州。这一人为组合抵挡不住政治斗争的考验，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大马宣布独立。印度尼西亚的政治逆转无疑为世界的这一地区带来了暂时的休整。

上述这些事件在这一地区是如此的敏感，进而对世界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样，在世界面临或公开或潜在的纷争本已困难的局势中，越南南部和老挝内部的冲突与紧张局势可谓火上浇油；越南不断的政变反映了其内部的不确定，但人们无法追根溯源。从1965年初开始，越南南部政治和军事局势的恶化，令美国发动的对北方的空中行动，密度越来越高，但除了几次停歇，这些行动并不能解决冲突。越南战争越来越影响到世界整体局势的演变。

第十五章 日本

日本位于人类世界的末端。其北方的岛屿虾夷（Yéso，即北海道）气候寒冷，与苏联的鄂霍次克海在同一纬度。东面有其最好的港口，那里面对的是广阔无边的太平洋，让人生出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西方和南方的海洋不那么可怕，但常常大雾弥漫，在朝鲜半岛和九州南岛之间变得有些狭窄。

作为一个群岛，日本常常被与英伦三岛相提并论。不过，英伦三岛更接近于它们毗邻的大陆。日本较为孤立，具有海岛特性，遗世自立。为了打破这种寂寞孤独状态，它不得不有意识地经常做出努力。倘不如此，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闭关自守。不过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这样宣称：“在我们的文明中，任何看起来本质上属于日本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舶来品。”

事实上，早在6世纪，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的日本。自1868年起，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西方的日本。尽管如此，这些至为关键的影响都融入了一个“日本的”日本，其岛国源起非常清楚，是让人无法置疑的。在这一缩微园林的国度，其茶道和樱花树，甚至包括佛教，虽然都是经由中国传入的，但无不经过了改造以使之适合日本人。同时这一日本版的佛教比中国版的佛教离原始佛教更远。

尽管日本具有非常明显的可塑性，但它把借来的许多东西转化成了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文明。现在它仍信守其古老的传统，这些传统与一个世纪前它开始接受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西方化并存。在进行西方化时，日本没有作任何保留，把它作为成为一个更强大国家的关键手段热切地推行。这一奇怪的双重性说明了一位记者使用的一个词（1961年）："日本最不寻常的东西是什么？是日本人。"

中国文明到来之前的原始日本

自其非常遥远的起源（始于公元前第五千纪）到公元6世纪中国文明首次对这一国家产生令人瞩目的影响，日本一直被一种原始而富有活力、发展非常缓慢的"文化"占据。这一早期的日本为人所知甚少，以致专家通常宣称公元552年佛教传入之前日本没有历史……实际上，遥远的古代似乎预告了后来所发生的事：在入侵和外国创新的冲击下，日本总是通过模仿他人创造和重新创造自己。

·自绳纹文化到弥生文化和稻米文化。

自公元前第五千纪到基督教纪元开始，日本为人所知的地方很少，只有一个运气好的地方例外，这一地区是一个中央平原，位于今京都和其东南部的大和（Yamoto）之间。古代文献称这一地区为近畿（Kinki）。它构成了大岛本岛（Hondo）的腹地，离日本狭窄和美丽的地中海——濑户内海——不远，它把它与南方的四国岛和九州岛连在一起。

这一中心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三次重大变革。

（A）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日本列岛最早的居民是原始阿伊努人（Aïnos，虾夷人），其踪迹仍可在琉球群岛找到，但现在的活动地区局限于虾夷岛（北海道）和萨哈林岛（库页岛）。考古学家发现的最早的文化包括来自朝鲜、中国东北和地处遥远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的成分；其中著名的是在黏土未干时把绳压在上面印出绳纹的原始陶器—因此这一文化得名为绳纹文化（Jômon，意为"绳纹"）。人们从这一复杂的遗产中可以推断，来自大陆的民族很早就到了日本，由此开始了在日本历史上长期进行的与阿伊努人的斗争。

（B）到了大约公元前3—前2世纪，看来出现了一次新的外族入侵，这一次来自中国（尤其是华南）和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

新器物出自这一时期：陶工的陶轮、青铜和青铜镜、钟、铁、中国汉朝的铸币，最后是水稻和南方风格的、宽阔的、空气非常流通的房屋……这就是所谓的弥生文明，得名于东京一个出土了这种风格的器物的街道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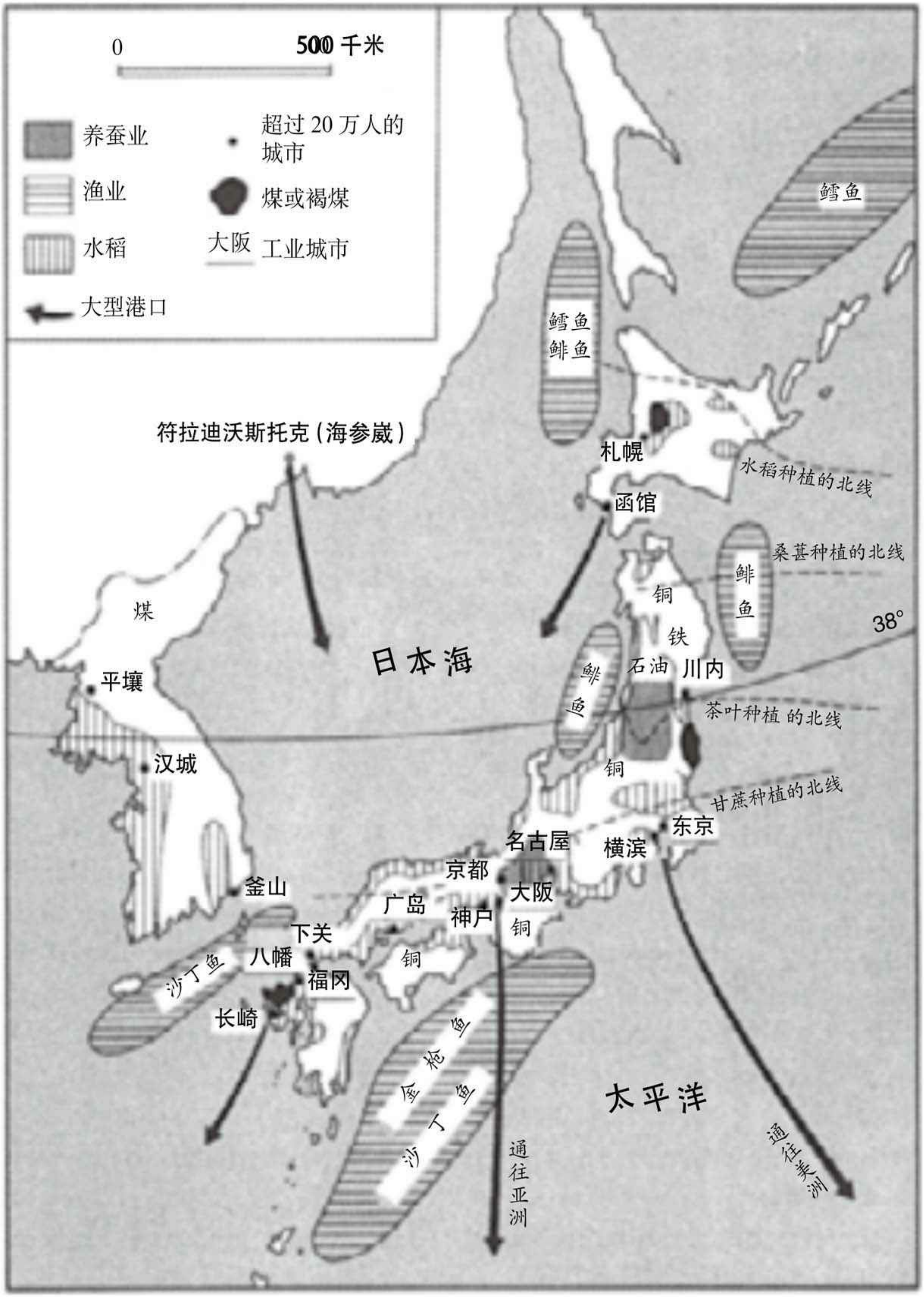
在各种新发现中，大米（水稻）取代小米（粟）本身即是一场革命。

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把国王视为活着的神的观念，是不是也是在这一时期由来自南方的原始马来人带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C）公元2世纪和3世纪以修建了大量贵族陵墓为标志，这些陵墓一直保存到了现在。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氏族，有英勇高贵的首领、半自由的农民和工匠以及已经相当重要的大量农奴。首领们宣称自己是地方神祇的孩子。在朝鲜的影响下，工匠的行会采用了be（部）的称号（意为集团或部门），在前面加上行业名［书吏叫作fuma-be，织工叫作ori-be（织部），马具匠叫作kuratsukuri-be（鞍作部），说书人叫作katari-be，等等，后一种人向人传诵英雄事迹］。

此时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和宗教制度，其原始信仰把各种自然力量进行了神化。日本人骨子里非常保守，从未抛弃这种宗教；非常晚的时期之后，即到了19世纪，这种宗教逐渐被称为神道（神的道路），西方人通常称之为神道教。

·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在与阿伊努人国家进行斗争的同时，自大和地区开始，首次尝试组建一个帝国。



0
500 千米
养蚕业
超过 20 万人的城市
渔业
煤或褐煤
水稻
大阪 工业城市
大型港口
鳕鱼
鳕鱼
鲱鱼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札幌
水稻种植的北线
函馆
桑葚种植的北线
鲱鱼
铜
煤
铁
38°
日本海
鲱鱼
石油
川内
平壤
茶叶种植 的北线
汉城
铜
甘蔗种植的北线
东京
名古屋
横滨
京都
釜山
大阪
广岛
神户
下关
铜
八幡
铜
沙丁鱼
福冈
长崎
金枪鱼
沙丁鱼
太平洋
通往亚洲
通往美洲

图13 日本：太阳和大海的国度

日本位于中国之东，其国名即源于此："太阳升起的地方。"

这一帝国把其根源往上追溯到日本传说中的、源自天照大神（Amaterasu）的帝制王朝。1945年日本战败时，它仍在神道教寺庙里庆祝这一生命力极强的传统。在美国占领者的压力下，日本天皇最终放弃了他为神的后裔的说法。

帝国建立的过程非常缓慢。到了8世纪日本最早的编年史撰写时，该国仍未实现完全统一。把帝制王朝与各种各样的地区性氏族联系起来，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各地区性氏族（氏，uji）像帝制王朝一样，有自己的首领、土地、农民和工匠。氏族首领往往具有外国血缘（朝鲜或中国），这使帝国的形成变得更加困难。由于需要携手反对来自"东部边界以外地区的阿伊努人"，这一组织过程变得较为容易。

这一具有浓厚封建制特点的君主制在6世纪时完全形成，当时朝鲜人把中国的文字、儒教和佛教引入日本。儒家思想的影响反映在公元604年圣德太子颁布的敕令上，该敕令宣布了不可侵犯的中央权威的权力："国无二君，民无二主……"

这是为人所知的日本历史的开端，此时有了等级制、书吏、编年史，并于公元607年首次委派出使中国的使节。在太子周围出现了一个宫廷贵族阶层（公家，kuge），他们负责分配土地和采邑（shoen），每一个都试图把它们变成西方人所说的"封地"。

这一帝制的日本不久就在一种新的巨大影响——中国文明日益增长、最终无所不能的优势地位——的作用下发展起来。中国甚至给这个群岛取了教名——日本（"太阳升起的国度"），汉语读作Je-pen，日语为Nippon（同一会意文字的日语发音）。

日本学习中国文明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文明主导了日本。它在那里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兴盛繁荣。在引入日本后，中国文明时常被改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出来（比如说佛教就是这样，由于一次独一无二的变形，它自12世纪起以禅宗的形式变成了"嗜血成性的武士"的信条）。在其他方面，日本保留了它从中国借鉴过来时的古朴形式，而此早已为中国自

己遗忘（比如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中国已经失传，但在日本仍在演奏）。然而，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中国文明都因一个迥然有异于中国的民族、社会和传统的影响而有所改变。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种原因是，中国的文明方式是通过朝鲜传到日本的，而朝鲜未必总是忠实地抄录原本。

·最早的中国式日本文明是古代日本的黄金时代。在这一长期的移植过程中，日本对中国的任何东西都采之不拒：中国的经典、书法、绘画、建筑、制度和法律（唐律）。

因而日本与中国一样划分为省，尽管它的省与中国范围广大的省相比面积要小。公元710年其首都奈良（“奈良”一词在朝鲜语中意为“首都”）修建时，按照的是中国都市的布局，模仿了洛阳城的样式，呈棋盘形状，并把帝宫建在北端。994年，首都迁至平安城（Haïankyo，意为“平安之都”）或京都（日语中意为“首都”）时，仍按同样的格局兴建。自那时起，日本的首都不再像过去那样每位皇帝都修建自己的都城，由一地到另一地迁移不定。到奈良修建时，宫廷及其官僚已经变得过于庞大，无法经常地随着新帝的登基而迁移别处。在迁至京都后，那里在几百年间一直充当首都。

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书吏撰写的记录那一时期历史的编年史用的是国语风格和中国表意字，尽管使用的是日本语言。不过，我们仍不应因日本从中国借来了许多东西而产生幻觉。如饥似渴地吸引中国文化的京都不过是一个面积广袤得多的国家的一个小小的中心，而这一文化在日本其他地区的传播很不均匀，且速度缓慢。京都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但在它周围仍有许多阴影。

然而，在其狭窄的舞台上，大致说来自10世纪晚期到12世纪，这种转化催生了一个早熟的黄金时代。在这种辉煌的背景后面，没有隐含着一种物质生活的繁荣吗？情况看来是这样。此后的经济退潮说明了为何这种黄金时代昙花一现。几百年的阴暗时代接踵而来。

京都的那一黄金时代残存下来的包括一种出色、珍贵的诗体文学，即物语（monogatari），它部分地是小说，部分地是童话。其中一部叫作《地下室故事》（*Ochikubo monogatari*，《落窪物语》），与《灰姑娘》（*Cendrillon*）很相像。更打动人的仍然是nikki，这是宫廷女子用日文写作的诗体日记，而在当时男性用中文写作。这一非常动人的女性文学向我们再现了宫廷的节庆——音乐会，舞蹈，诗歌竞赛，皇帝到附

近的乡村远足，“喜悦受到了严格礼仪的制约，使得宫廷生活就像是一种永恒的表演，像舞剧一样受过严格训练”。毫不令人奇怪，它还向人们展现了一系列政治插曲和爱情插曲，以及“在这些未充分隔离的区域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杂乱无章”。

这看上去是一个空虚的、游手好闲的世界，“受到了文学的侵蚀”。有一位宫廷女子，我们只知道她的绰号叫清少纳言 [48] ，生活在公元1000年前后，留下了一些信手之作，这些作品往往冷酷无情，但无不有趣好笑。其格调集中反映在纳言对有趣的东西和无趣的东西所做的区分上。她说，无趣的东西当然比有趣的东西数量要多，它们包括“一个人写字台上的一根头发，或者墨棒上的一粒沙子，它在人们摩擦它时嘎吱作响……一位无足轻重的人喋喋不休，捧腹大笑……或者说，正当人想听什么东西时，婴儿哭喊起来……一条狗在看到一个人夜里出来与人秘密约会时吠叫起来……你把一个人勉勉强强藏起来，而他开始打起鼾来。或者，仍然是一个人与人秘密相会，戴上了高高的、显眼的帽子，而当时间到了准备离开时，做了一切准备不让人看见，却撞倒了某样东西，它在倒塌时发出了巨响”（据R.Sieffert译文）。

在特权阶层以这种方式生活和玩耍时，佛教以一种新的民主的形式慢慢地在日本各地传播开来。一批新受到感悟的僧人与“中产阶级”——艺匠和小地产主——进行了接触。一种高度简单化的崇拜仪式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献给了救世主佛陀，阿弥陀佛（Bouddha Amida），他保证信徒进入西方天国。与在中国非常相似，思想知识和对真正的佛教的信念不久局限于少数罕见的神学家和精英成员，而民间流传的佛教把一切都带上船，包括旧的神道信仰。这样一来这两种宗教实际上合二为一。这就是真言宗（Shingon），在这里地方神祇变成了佛教神灵特别的和临时的显现。

神道教的寺院逐渐受到这一也叫作二元论神道教的新宗派的控制。随着阿弥陀佛崇拜产生了一种新的佛教肖像学。出自这一时期的富丽堂皇的“卷轴”还展现了日本的山水，描绘了各个社会等级在往往充满幽默的场景中的活动。

其他方面的传布：文字很大程度上以一种简化的字母表（仅有47个音节）形式进一步传播。

·自12世纪起，帝制崩溃了。它早就显现出软弱的迹象。在照抄中国灿烂的唐朝制度的同时，它没有设法建立起一批使它能够与旧的贵族

制的权力和野心决裂的受过教育的文官阶层。不久，帝国让位于幕府将军，日本进入了自己的冗长的中世纪（1191—1868年）。

自8世纪末到1186年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封建家族对帝国的权威形成了威胁。天皇仍然在位，但他们基本上不治理国家。他们是掌有全部权力的藤原家族的囚徒和玩偶，后者控制了关键职位，并向天皇提供完全从藤原家族亲戚中挑选出来的后妃。该家族甚至废黜并遴选后继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天皇（御门）的权力就像一个空匣子，钥匙在小心翼翼不许别人摸碰的藤原家族手中。"

藤原氏的漫长统治结束之后，日本进入了一个叫作"幕府"的冗长时期。这一出乎意料的转折几乎可以说宣告了天皇正式受制于领主家族，具体体现在幕府将军身上。这些大家族通常是天皇众多子女的后代，构成某种享有特权的贵族。在他们统治即幕府制时期，不同家族以欺骗手段争夺权力并彼此取代，但这些争斗是在潜在协议的框架内进行的。至少是为了统治分成不同等级的国民的其他部分，他们联起手来。这些等级包括领主、农民、艺匠和商人。只有前一种人生活得舒适自在。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那些最为贫穷的不可接触者——尤其是皮革工人，不过他们的人数远比印度要少。

由于经济不太繁荣，幕府制代表了匮乏时期封建制度和军事力量的一种反作用。它还以好战的贵族为标志。这些贵族远离宫廷，在本岛北部和东部新拓殖和仍处于反叛中的地区，"在边界之外"，为自己开发出面积非常广袤的领地，大量饲养马。与京都及其女人气的、非常遭人恨的朝臣新贵相对，新政权以平等主义的军人政府（bakofu，或"露营政府"）的面目出现，其首脑为将军。这种统治与欧洲墨洛温王朝后期衰微年代的宫相统治有些相似。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个区别：在日本，没有实际权力的名义上的统治者从未遭到废黜。天皇仍然在位，但不参与治理；他根据其神圣权威参加将军的授权仪式，就像在欧洲教皇为皇帝加冕一样。

最早的将军在名叫镰仓（Kamakura）的靠近京都至江户大道（Tokaido）末端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那里实际上成了日本的首都。他们在那里待到了1332年，随后迁回到京都郊区室町（Muromachi，1393—1576年）。1598年，幕府最终在此前一直是个渔港的江户安营扎寨，一直待到1868年。历史学家通常把这些时期分别称为镰仓时期、室町时期和江户时期，三个时期合在一起构成了整个漫长的幕府时期（1192—1868年）。

在所有这三个时期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都是战士，即武士（bushi）。作为居支配地位的等级，他们可以容易地推行其观点、品位及其凶残特性，以及——尤其是在开始时——在政府和服装与家庭生活方面推行某种简朴，水干（suikan，绸子服装）和直垂（hitatara，礼服）这些非常素净的衣服，取代了臃肿、笨重的长袍（noshi或sokutai，指朝服），后者一般说来是古礼所要求的。另外，狩猎、格斗和马上比武，取代了昔日沉闷乏味的乐趣。

幕府将军移至京都后（1393—1576年），这种习惯性的暴力风气得到了某种制约。这一古代的城市恢复了它的权力和地位，这样古时的黄金时代没有在军人和骑士时代彻底失去光辉。

16世纪末年和17世纪初年以漫长的幕府统治猛然一分为二为特征。事实上，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川革命使日本与世界其余部分隔离开来，并强化了封建习惯和制度。

16世纪末年，一位名叫丰臣秀吉的农民之子在日本列岛建立了独裁统治。尽管他没有采用将军的称号，但他恢复了秩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或许考虑不周的对朝鲜战争（1592—1598年），这场战争到他去世才告结束。此后不久，德川家族在德川家康（Tokugawa）耐心而娴熟的领导下取得了优势。他被天皇册封为将军，决心在江户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德川家康有一种非常明智的信念：只有以那一动荡不安的地区而不是京都为根据地，才能治理日本，而且应当如此。他正式把将军职位让给自己的儿子，借此使这一职位在德川家族内部世袭。就这样，德川家族一直“统治”到1868年。

1639年，江户政府做出了向外国人关闭日本大门的重大决策。自那时起，只有中国和荷兰经过特许的船才可以进入日本，同时荷兰船只能运来火药、武器、眼镜和烟草。至于其他东西，日本列岛能够而且确实可以靠自己的资源生存。禁令既包括日本的船只，也包括其他国家的船只，而且自外国船只开始（1633年）。这一决定产生了长远的后果。我们能够看清它产生的原因吗？

表面看来是由于日本统治者对西方人感到担心。葡萄牙人是最早到达这里的西方人，1534年就到了九州。他们的火炮、火绳枪和巨型船只给日本人留下了印象；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新来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大批人皈依基督教。这一宗教会不会像1638年那样，鼓励贵族和农民起义呢？

与此同时，一次程度非常深、范围非常广泛的经济衰退开始了；这一衰退始于中国，但也影响到遥远的印度。日本是不是感到紧迫，需要保护自己，尤其是阻止其贵金属的外流？自丰臣秀吉神勇的时代起，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其海盗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掠夺骚扰——看来表明，这个国家越来越可以己之力养活自己。明王朝的辉煌根本没有触动它。最后，日本领导人急于使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固定下来，同时农民渴望自由，尽管经常陷入失望之中。这一自称强加的封锁“冻结”了日本的制度，直至1853年佩里准将的“黑船”到来后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佩里到来时，日本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保留了其家族和古老的贵族制，其他阶级相对于这一基本的阶级都是附属。佛教的一个奇异的变种禅宗（Dhyâna，或Zen）获得的长时间的成功就是一个证明。不过，日本尽管用三道锁把自己封闭起来，但可能不比初看上去不幸和贫困。它不得不开发利用自己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其健康状况和财富的一个征兆是民间文学在16世纪的出现和1650—1750年在“大阪世纪”的发展。这样，除能剧外，在那里产生了一种半舞蹈、半歌唱的活跃的歌舞伎（kabouki）戏剧形式。在幕府时代，黑暗并未笼罩一切。

当然，幕府的统治能够行得通，只能通过严格的纪律和我们可以称之为警察国家的东西。

大贵族或大名（daimyos，人数在270名左右）是家族和地区的首脑。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使唤大量“忠诚的仆人”，即武士（samouraïs）；武士因这种服役可以换得金钱或实物津贴，但从未像西方那样换取可永远享用的土地，这会使他们获得某种独立地位。浪人（ronin）是失去了或（但这可能吗？）放弃了其领主的人，他们受到的惩罚是要么饿死，要么成为土匪。

所有的记载都陈述、重复并宣称武士是按照其神圣的礼仪规则，即口头的武士道准则，把身心都献给了主人。有这么一个广泛传诵的故事：47名浪人在其主人切腹自杀（harakiri）后为他报了仇，随后于1703年冬在主人陵墓前集体自杀。这一壮烈的礼仪规则在持续的内战这一毫不仁慈的学校里得到了发展。

日本人进行的最多的战斗是在自己人中间或彼此之间进行。阿伊努人仅出现过一次，此后再也未被提起。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试图用大舰队征服日本，但一股“神风”（Kamizé）卷起了风

暴，阻止了入侵的舰队。日本与朝鲜的战争，如前文所述，仅仅持续了六年。因而正是在他们自己中间，他们使用了长矛和剑；同时这种持续的战争迫使他们尊重一劳永逸固定下来的等级制。就此而论，在日本语言中，晚至1868年，动词仍“既表示客体的地位，也表示主体的地位”。比如，使用助动词“ageru”表示“由独立动词陈述的下级为上级承担的行动”。

结果怎么样？日本成为一个极其遵守纪律、等级森严、统治牢固、既奢华又非常贫穷的国家。这一财富和荣耀为一方面、赤贫为另一方面的双重形象，在一位威斯特伐利亚医生基普弗（Kämpfer）先生的游记故事中有生动的描述。基普弗曾为荷属东印度公司服务，他的著作（出版于1690年）是一部观察的杰作。任何读过他的书的人都不可能忘记他所描绘的让人精疲力竭的旅行；人们不得不在艄公列队帮助下从此岸徒步涉水到另一岸的那些河流，当时艄公手挽着手站在水中以减缓河水的流速，从而减少涉水的困难。同样引人的还有基普弗关于有着破旧茅舍的村落的记载和所描写的农民在大贵族的豪华队伍经过时跪在路旁的情景。在京都和幕府将军的大本营江户之间的大道上，大名脚步匆匆，他们的职司就是按期拜访将军。其随从声势浩大，有手持枪戟的武士，也有仆人，他们陪着自己的主子前往首都。

富裕的封建领主每年要在他们建在江户的宫殿里待上六个月。宫殿建筑的外表装饰着图案丰富的纹章图案，对此罗德里戈·比韦罗（Rodrigo Vivero）曾怀着钦佩的口气加以描述（1609年）。这些宫殿独处城市的一区，集中建在将军府第的附近。不过，虽然它们美轮美奂，实际上却是监狱。大名住在这里时会受到监视，他们离开时要把家人留在那里作为人质。他们几乎无法逃跑——任何人也不可能逃跑，因为道路两旁，城里和小酒店里，有着成群结队的审判员、观察哨和检查员。在城里，如同在中国一样，每条街道都被街道末端的城门分隔开来，一有任何事件发生，诸如盗窃、小偷小摸或别的什么犯罪行为，城门就会关闭。被控犯罪的人——无论真正的罪犯还是嫌疑犯——当即被抓起来，处罚措施很快也会颁布，通常涉及死刑。

对于1639年后得到允许但附加各种限制的唯一商业活动，即与中国人和荷兰人的贸易，也进行了同样严厉和细致的监管。（荷兰人曾于1638年没有羞耻地把其船只和火炮借出去帮助镇压日本的基督教徒起义。）无论何时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一到达，它们马上就被领入长崎港内出岛（Deshima）的隔离区，在那里所有货物、水手、商人、代理人

和公司的官员都受到严格审查。同时代的记载给人留下的是这一统治戒心重重，非常多疑；这一国家布满了要塞，到处都是军人。司法在西方很严苛，在这里更严。每位旅行家看到示众架和遭到拷打、折磨的躯体，都会感到震惊。京都附近的一座山丘被称为“断耳山”。

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封建制的日本当然也在发展。如同在中国和朝鲜一样，佛教在日本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其中之一是狂热的善信莲宗，它把日本视为唯一真正的佛国；另一个是禅宗）。禅宗也是从中国传来的，但自20世纪起变成了武士的教派。如果说理性主义的新儒教是幕府将军方便的信条，那么禅宗变成了军人的信仰，远离了其原来作为一种爱和非暴力宗教的作用。当然，这种变化是那一时代和那一社会的特征。

禅宗的教导用非常短的逸事（koans）进行高度概括，有意显得荒诞可笑，予人以出其不意的道德教谕。它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唤醒通常处于半沉睡状态、无意识、本能的自我。“抛弃你的精神，就像山间奔流中翻滚的球。”这是一种奇怪的自律，释放并唤醒人的本能，而后相信其冲劲！回想起来，它就像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分析疗法。它似乎在叫喊：不要“各种情结”。“你走路时，就走路吧；你坐下时，就坐下吧。一句话，不要犹豫！”实际上对任何事都不要犹豫：这是最常见的建议，显然对军人非常适合。“清除挡在你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如果佛陀挡你的路，杀了他。如果你的兄弟挡你的路，杀了他。如果挡路的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杀了他们。如果是你的亲戚，杀了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解放你自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摆脱你的束缚，得到自由。”

当然，对这种语言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佛陀、先祖和亲戚不过是一个迷恋礼仪的社会的所有束缚，在这里从刚一出生，男孩和女孩都被束缚在一种全是铁的法则的教育的紧身衣中。每一个人都被训练着去服从一种制约着人们的吃、讲话和坐的法则，这一法则甚至规定了人们睡觉的姿势：一动不动，头枕在一个小型的木制横档上。人们“永远不能失去对自己心灵或肉体的控制”，此为条件反射的结果，其目标是平息最自然的反射作用，而不是抑制植物自然生长的缩微园林。禅宗的所有教导（打上了军人的标志）看来针对的都是禁止和限制日本的所谓“礼貌规则”。如同在所有社会一样，真正的生活是修正和调和对立的方面。日本在同时既苛刻又富于灵活性。禅宗是其不可或缺的平衡砝码。

现代日本

日本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那场开启了明治维新的革命（1868年）才告结束。在那之后不久，日本开始了激烈的工业化。日本的工业化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是一个照亮了日本文明的“经济奇迹”。它的速度，尤其是它取得的非同寻常的成功，无法仅仅用经济学家惯常的解释加以说明。尽管这些解释有其重要意义，但仅仅它们是不够的。

·部分原因在于与世隔绝的这两个多世纪。自1639年到1868年，尽管日本几乎与世界所有地区断绝了关系，但它仍取得了巨大进步。

到了18世纪，这种进步已变得非常明显。人口有所增加，稻米的产量也是如此，同时新式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扩大了……城市发展得更大了。18世纪时，江户至少有100万居民。如果没有剩余的农产品（尤其是稻米）投放到城市的市场，经济的这种普遍加速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也得益于粮食的储存和运输变得方便，得益于有可能向城市供应充足的燃料（这时是炭）。

社会本身也鼓励经济发展。大名因遭到政府的疑忌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到江户居住，他们由于要不断地进行费用不赀的旅行而被有条不紊地毁灭了。17世纪货币经济真正开始时，尽管与中国相比规模要小，但更为剧烈；同时城市的奢侈品意味着——实际上是需要——现金消费。这迫使大贵族出售其数量巨大的稻米收成的一部分，另外还要去借款。信贷制度早就为人所知，但此时开始在日本变得普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票据和汇票。这使得借贷变得更加容易。贵族与武士一样不得经商，因而他们雇用傀儡。就这样，一个商人阶级产生并兴盛起来，他们借钱给大名，溜进其侍从队伍，并模仿他们的穿戴；日本比世界其他国家还要以穿戴取人。不久商人设法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家庭，通过婚姻和收养渗透到贵族行列。几次轰动一时的死刑（政府把此作为没收可观的财产的借口）令商人警觉，他们大都消失不见了。

商人在日本当时的经济中心大阪尤其重要。正是在这里，所有富人，无论贵族还是实业家，都在“花都”相会：“花都”是大阪内的一个娱乐城，那些“花大力气培养出来的”艺伎（geishas）扮演“由Eïan（京都）宫廷贵妇人完成的角色”。有关花都的传闻、丑事、自杀和谋杀让没有什么教养的公众看得津津有味，因为真正的文人看不起这些大众消遣，而偏爱“儒家经院哲学的乐趣”。

所有这些都表明，即便在1868年之前，日本的生活也处在快速流动之中。到了18世纪，经济高涨造成了一种活跃的、随时准备起飞的前资本主义类型。19世纪时，运动进一步加速。如果说此前没有发生移动和定位，明治时期就是不可理解的。这一时期预先积聚了经济资源和资本，同时出现了种种潜在的社会紧张形势。

过多的大名被政治或奢华吞噬了。日本逐渐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没有主人的武士，即浪人，他们是些贫困潦倒的骑士。这里有点像15世纪“力量就是真理”的德意志。不管怎样，正是这群被剥夺了财产的人成功地对革命进行了最初的推动。1853年到达日本的美国舰队是“点燃火药的火花”。1868年睦仁天皇（Mutsu Hito）夺取政权时，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推翻了旧的封建制度及传统的等级。他所推翻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

·工业化从来都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而总是与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社会的变迁既能帮助也能阻碍经济发展本身。就日本而言，社会没有起阻碍作用。

普遍说来，工业化打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在西方，如卡尔·马克思所说，它产生了一个无产者大众、阶级冲突和工人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此而论，日本更引人注目。

日本是一个特例。它以一种开始让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没有在社会结构方面造成任何革命性断裂的情况下，完成了其工业革命，实现了相应的各种变化。“这一巨大的变革为一个已经处在变化中的社会消化了；细想一下，它走的是一条可能表现为全新的道路。”

造成这种状况的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日本的社会非常守纪律，它在1868年后进行新的实验时保持了其传统的纪律。它对等级制表示服从、尊敬，总是毫无抱怨地接受奢华只应由少数人享受的说法；虽然未必一直有清楚的认识，但它同样接受了下述事实，即日本应在依然保留着封建关系的社会中建设现代资本主义。我们可以想想，俄国的工业家是在乌拉尔山区的农奴中安身的……略做修改就可以把此拿到日本来，日本的大工厂中有着类似的画面。正是他们在19世纪确保了行动的成功，并在没有激起劳工大众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实现了利润。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最多15个家族控制了日本资本的80%。在口语中，他们被称为财阀（zaïbatsu）——这一术语变成了经

典。其中有著名的三井（Mitsui）、三菱（Mitsubishi）、住友（Sumitovo）和安田（Yasuda），另外还可以加上皇族，据一位专家说，它目前是这些财阀豪门中最富有的。在社会等级方面，这些大企业的领有者相当于过去的大名家族。劳动人员是其奴仆，而工头、管理人员和工程师是现代的武士。日本的企业仍然保留着家庭企业的性质，是这一“自由企业和共产主义都被视为奇怪的、舶来的、有可能毁掉Kodo（日本的帝国道路）”的世界上封建主义和父家长制的混合体。当局过去可以、现在仍可以把其意志强加在获得很少的劳动报偿即非常满足的驯顺、极为俭朴的人民身上。

这说明了为什么日本在1868年能够神奇地转向。幕府将军把权力交还给了天皇，他在理论上是该国最传统的权威的化身。（请想象一下，在西方，教皇对人民和财产行使世俗权力！）而行使这种权力的天皇坚定地选择了革命：他废除了封建制度，下令兴办工业，并寻找必要的投资，自己建了工厂。工厂建成后，他常常把它们让给经过精心挑选的私人，有些类似于他把各种不为人所知的采地让与出去。与此同时，他强加给日本一种庞大的民族主义的劳动计划。该计划得到了贯彻执行。这位由其神圣出身而在寺庙里受到尊崇的天子下令国家进行工业化。为此日本不需要某种新的意识或信念：它们已经存在，能够使国家像一个人那样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能够既非常现代又非常传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了。“具有神秘特性的天皇权威扮演了两种角色：一是维持现状，一是进行革命。具体说来，在社会方面静止不动，在经济方面实行革命。”

这种解释不会让人产生误解：它受到了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有意识地复活一种非常古老的国家信仰的运动的制约，这种信仰以神道之名进行。神道意思是神（kami）的道路，但“kami”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更接近于“mana”（玛那），后者是遥远的南海中人和事物身上所体现的一种永恒的超自然力量。至高无上的“kami”属于天照大神，她把它传给了她的所有后裔。

·1945年灾难后的日本：日本在广岛（1945年8月5日）和长崎（8月8日）遭受原子弹轰炸后宣布投降，接踵而来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崩溃。这个国家刚刚征服了东南亚许多地区，现在它把这一切都失去了。雪上加霜的是，它失去了它自明治维新以来（1868年）建造的一切；这场维新在20世纪前半期把日本变成了远东一个非常奇特的例外。

1945年后日本的奇迹（其历史上和第二次），就像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奇迹一样，为其繁荣重新奠定了基础，并赋予它一种过去从未达到的发展水平。现在日本不再像1942年以前一样是一个军事强国，它是一个经济强国。

1961—1970年的计划要求日本的国民收入到计划结束之年翻一番，并在一些经济领域有突出的增长。按照1955年基数为100计算，到了“目标年”，工业和矿产产量要达到648，钢产量296，机床448，化工为344……当然，这些目标都不是确定的，但也并非不负责任的空想，近年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

19世纪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的平均年增长率是4%；1946—1956年，是10.6%（法国同期为4.3%）；1957—1959年，9.2%；1959—1962年仍保持了很高的增长率。这些都是些创纪录的数字，如果有别的国家曾经达到过的话，那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可以与它媲美。日本确定的1961—1970年的年增长率为8.3%。

出现这种进步的原因并不神秘。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这一事实，即美国占领当局最终允许托拉斯多多少少像从前那样重新建立起来。他们把旧的父家长制的财阀永远解散了，尽管少数后来重新出现。不过许多新的大型公司出现了，一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胜利地取得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的日本资本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一样，也是以规模巨大而取胜，能够比小型艺匠作坊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和资本；这些小作坊仅仅由于家庭劳动和非常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继续存在下来，而且不无困难。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大型公司不再像1945年之前那样自筹资金，工业的成功就包括在日本银行的保护下，建立一整套大银行和信托投资体系，它们比在法国享有更大的自由。借助于美国式的宣传鼓动的一切手段，这些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吸引了小储蓄者的资金。结果是出现了购买股票的狂潮，就连天生谨慎的农民也加入到抢购的行列，东京交易市场在其鼎盛时期提供的神话般的回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的交易额是战前的400倍。然而，自1961年6月起，股票价格的下跌抑制了这种过分的赌博，并使个人投资重新回到定期存款或储蓄银行上来。

大量小储蓄者的存在说明了日本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的投资水平（1962年，占国民支出的20%），外国尤其是美国资本家为什么对日本公司表现出如此的兴趣。他们的兴趣迄今仍然停留在理论上，因为1960

年日本尚未充分对其外汇控制实行自由化，在那里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很难外流出去。一家瑞士报纸在1961年4月在分析实现完全自由化的可能性后宣称：“不管怎样，相对于南非，在那里大量欧洲资本正陷入停滞状态，我们更倾向于日本。该国无疑正处在全面发展时期，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着罕见的技术，而其领导人不仅对其成功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而且有着令人吃惊的能力。”假如外国资本真正介入，日本的增长率会变得更加引人。

我们有可能找出隐藏在这种成功背后的驱动力吗？对一个快速流动的经济进行分析总是件难事。统计数字很快变得陈旧而脱离了现实。但可以肯定，直到最近几个月，一个强有力的刺激是劳动力过于充足。1961年，日本的经济计划估计其人口为9400万，1970年将达到1.04亿——也就是说年增加100万，大年、小年都是如此。[49]

这种增长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上述经济计划估计到1970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同时，人口控制有望使出生率的增长幅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此外，在1962年，战时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较少，导致出现了劳动力供不应求（尤其是技术工人）的现象。因此，近年来工程师和教师的工资有了增长。

毋庸置疑，日本的工资和生活水平现在仍远低于西方和美国的水平。然而，鉴于日本不同的习惯和需求，这种情形无伤大雅。当然，大阪和东京（在后一城市，人口每年增加40万，30万是移民）附近出现了贫民窟。但人们每天平均食物消耗量是2100卡路里，年均收入为200到300美元（为印度的四倍）。[50] 捕鱼业有了飞速增长，日本每年从远至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水域捕鱼600万吨，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农业产量有所提高（在这方面美国当局坚持个人持有的凡超过6英亩的田地都要出售），在冬天实行塑料大棚种植，使一年两季和水稻早熟成为可能，避免了夏季台风的破坏；最后是慢慢开始开发北方寒冷的岛屿北海道：所有这些都对稳定的高速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国内市场同样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要购买新的东西：洗衣机、缝纫机、电视机和照相机（日本的大型工业首先涌向国内市场）。新的品位带来了消费需求的变化，人们要吃更多的猪肉和鱼，要吃西式糕点、罐装和速冻食品，服用药品（尤其是镇静剂），喝啤酒（日渐取代米酒）和锡兰茶（取代了日本自己年产7.7万吨的绿茶）。服装和室内装饰也开始追随西方样式。应当承认，普通日本人仍然是记者罗贝尔·吉兰（Robert　Guillain）所说的“双重文明人”，

白天在街上穿西装，晚上则重新穿上日本的服装，遵守日本的习惯。但日本人显然越来越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受到这种方式的吸引，并屈从于它们。

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各种障碍。并非所有事物都预示着日本经济良好。尽管这是通过努力、耐心和聪明的工作造成的奇迹，但这是有限度的，有其弱点和危险。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农业改革产生了无数小地产主，其中最贫穷的依赖那些情况比他们略好的，而且所有人都无力组织起来，采取真正现代和科学的方法。一位记者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成功地做到那一点。"甚至社会主义实验也正是在农业领域遇到了挫折！此外，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所有进行农业改革的尝试在试图以迅速和激进的方式进行时，收获的都是深深的失望。农业结构是最根深蒂固的结构。

进而言之，日本的人口几乎是法国的两倍，而其面积仅为法国的一半（30万平方千米对55万平方千米）；日本的耕地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5%，而法国为84%。其自然资源也比较贫瘠。羊毛、棉花、煤、铁矿石和石油等工业用原料都不得不依赖进口。由于增长率太高，日本还不得不大量购买外国的机器和设备。因此在1961年出现了贸易平衡受到破坏的令人不安的信号，尽管池田（Ikeda）政府持乐观态度。根据一种有根据的估计，没有美国占领军在日本的适时的消费，看来有利的平衡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可见，日本的这一成功是何等脆弱……

对日本这样一个严重依赖其工业繁荣的国家来说，问题主要不在于生产，而在于销售。在这方面，处境更加不牢靠，因为它仍要依赖"自由世界"各贸易伙伴的繁荣和善意。这种善意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西方，尤其是法国（它在这些事务上总是犹豫不决）仍记得日本在1939年之前不断进行的贸易倾销，对现在日本通过低工资而形成的强有力的价格竞争感到担心。西方迟迟不愿签订哪怕不完美的贸易协定，不断地对它们提出疑问，其保留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所有这些都令日本满腹烦恼，诱使它成为一个"尼赫鲁那样的中立主义者"，并完全涉足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不可避免地担心，美国一旦撤离日本，许多社会成果就会受到威胁，尤其是1951年的议会法；更担心的还有工会组织，它在一个如此驯顺的国家发展得非常缓慢，而大型资本主义在接受它时表现得非常勉强，这进一步加大了它的困难。这些相互矛盾的挂虑说明了1960年大选为何会出现那种结果；大选中"温和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大企

业，据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说，它们拿出了50亿日元（100日元大致等于1法郎）来“拯救这一最后的机会”和击败社会党——仅仅取得了“例行公事的胜利”。

但问题并不能永远搁置下去，因为日本的繁荣强加了超人的任务，包括持续不断的紧张。东京连同郊区在内共有1000万居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它发展得过快，已经感到有些窒息，正在考虑填平其部分海湾进行建造。大阪已经树立了榜样，通过庞大的劳动力储备为吸引到那里的重工业提供空间。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地证明，在日本神奇般的成功中雄伟壮观与如履薄冰严重并存。

但是，正是在政治领域和在更宽广的文明领域，产生了最大的不确定性。日本没有根据美国的法令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我们也不能期望它做到这一点，众多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证实了这一事实。日本的工业家一直具有父家长制性质，而且小心翼翼。昔日民族主义者的侵略性绝没有被清除。日本有暴烈而狂热的右翼政党，乞灵于该国一直非常强烈的传统主义。天皇家族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胜利者的羞辱，但仍坐着天皇宝座；任何人胆敢公开反对天皇或其家族仍有可能遭私刑处死。过去的永恒的日本远没有死去或被遗忘。

1960年11月12日，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有“日本的米拉波”之称的浅沼稻次郎[51]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谴责了“所谓日美安全条约的不忠”，说它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成百上千万人应能听到他的讲话，并从屏幕上看到他的形象。随后他们看到一个中学生，一个尚不满17岁的中学生，跑上前去刺伤了他；中学生双手交叉握着匕首，采用的是柔道运动员（judoka）推荐的握法以保证笔直地刺过去。三个星期后，这个学生在牢里自杀身亡。这一犯罪和自杀事件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巨大波澜。日本不禁对为自己的思想献身的人表示羡慕，哪怕他犯的罪非常不足取，让人生厌。把这种态度和其他态度视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反映是不对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人的宗教意识并不是特别强，并不特别关注来世。在这方面，它与印度截然相反。主宰日本的是社会和教育中的某种法典，是某种礼仪规则，我们何不这么说：是它的文明。

1966年附言

日本越来越让人感到是一支重新为人发现、巨大的和有智慧的力量。但所有的成功都是一种压力。日本只有在保证市场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它的扩张。它越来越着迷于中国的市场，这个市场如此庞大，而且离

得如此近；同时它还着迷于与苏联达成象征性归还千岛群岛中几个岛屿的协议和参与东西伯利亚发展的可能性。在自己不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面对中国和苏联，日本能够保证安全吗？日本宣布反对一切核武器，甚至不能容忍在中美协议框架的某些条件下美国核潜艇的存在。大量的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证明日本是独裁的而不是极权的。池田勇人首相因身体原因辞职后（1964年10月25日），这项政策由佐藤荣作首相和自由党接手（1964年11月9日）。

[1] 奥朗则布（Aureng Zeb，1618—1707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第六代皇帝，1658年登基，在位达49年之久。早期实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混居的政策，以残暴凶狠著称。后期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区分开来，把印度教徒降低一等。他曾四处扩张，但统治末年内部动荡不安。——中译者

[2] 1公顷等于100公亩，或2.47英亩，合我国的15市亩。——中译者

[3] 魏特夫（Kari A.Wittfogel）：犹太人，1896年生于德国，曾先后在莱比锡、柏林和法兰克福等大学攻读中国学和社会经济史，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3年移居美国，1939年加入美国籍。他一生主要研究中国问题，曾在许多大学任教，任美国太平洋学会会员，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研究室主任和华盛顿大学中国史教授。代表作为出版于1957年的《东方专制主义》。该书主要论点是治水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并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中译者

[4] 语出《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中译者

[5] 这段话出自《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译者

[6] 此指《老子》，亦叫《道德经》。——中译者

[7] 语出《老子》第一章，原文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译者

[8] 语出《庄子·人间世》，原文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中译者

[9] 语出《庄子·大宗师》，原文为：“……三日之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中译者

[10] 长春真人：即丘处机（1148—1227年），亦作邱处机。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曾受命掌管天下道教。认为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宣称“一念无生为自由，心头无物即仙佛”。对内丹的理论和方法多有阐发，提出人的先天真气和后天之气可以经修炼结成大丹而成仙。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和《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中译者

[11] 涅槃谓脱离一切烦恼，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后来僧人死，也叫涅槃。“涅槃”一词在佛教传入之前即有。据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六《释僧肇涅槃无名论》：“涅槃，秦言无为，亦名灭度。无为者取乎虚无寂寞，妙绝于有为；灭度者，言乎大患永灭，超度四流。”——中译者

[12] 此即受持五戒。此为佛教徒在皈依佛法僧三宝后具体的实践措施。五戒即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和饮酒戒。有意触犯上述五戒者，一律“坠地狱、饿鬼、畜生”。——中译者

[13] 此指唐武宗会昌五年的灭佛事件。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记载：“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长安）、东都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四州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等留僧博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余僧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等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财货田产并没官……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中译者

[14] 拉丁文，意为“公众之声，即天之声”。——中译者

[15] 原文见《孟子·滕文公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中译者

[16] 远西地区（Far West）：美国历史术语，本指今美国中西部，尤指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现指落基山脉和太平洋沿岸间地区。——中译者

[17] 梅佐焦诺（Mezzogiono）：意即意大利南部地区，大致指罗马所在纬度以南地区，包括撒丁岛和西西里岛，那里普遍比较贫穷。——中译者

[18] 即黑龙江在今俄罗斯境内部分。——中译者

[19] 此指戊戌变法。——中译者

[20] 到1984年，中国的人口超过了10亿。—英译者

[21] 按准确的说法，“三反”运动起讫时间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开展的范围是国家机关、部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反对的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五反”运动1952年在全国各地开始进行，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的是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中译者

[22] 此种情况后来也有。—英译者

[23] 20年后，印度的人口上升到了7.3亿人。—英译者

[24] 或译尼乾子、尼乾陀、尼犍子。他姓若提，名增益（筏驮摩那）。——中译者

[25] 耆那教源于Jina（征服者）一词。大雄与佛陀一样出身于刹帝利等级。——中译者

[26] 按《佛本行集经》，八正道是指八种修涅槃之道：一是正见，即离诸妄见而正观苦集灭道四谛的真理。二是正思惟，即离诸妄想而正思四谛的真理。三是正语，即以真智修口业而离诸虚妄不实之语。四是正业，即身口意三业清净，远离杀盗淫妄酒。五是正命，即以法活命。六是正精进，不懈地修道，勇猛精进不息。七是正念，即不起邪念，念念不忘正道。八是正定，即集中精神，一心不乱地修习禅定。佛教宣称，为要渡过生死海达到涅槃境界，必须修此八正道。八正道也称八船，意即乘着它可以航行至涅槃之彼岸。——中译者

[27] 迦梨陀娑（Kalidasa，活跃于约公元4—6世纪）：古印度笈多王朝时期著名诗人、剧作家。传世作品除剧作《沙恭达罗》外，还有叙事长诗《罗怙世系》《鸠摩罗出世》等。——中译者

[28] 赫尔德（Johann Herder，1744—1803年）：德国思想家、作家，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其著作以总体主义、民主主义和历史主义为基本思想，主要有《论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和《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中译者

[29] 歌德（Johann Wolfang von Goethe，1749—1832年）：德国著名诗人、作家。青年时代曾投身于狂飙突进运动，在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哲学和政治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代表作有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等。——中译者

[30] 商羯罗（Cankara，788—820年）：印度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吠檀多不二论理论家，认为最高真实的梵是宇宙万有的始基。著有《梵经注》《广森林奥义注》《我之觉知》等。——中译者

[31] 罗摩奴阇（Ramanuja，约1050—1137年）：印度南部地区印度教神学家、哲学家、灵修界思想家。强调人在寻求终极真理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推论思考，认为现象世界是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的变通对于灵修既无损害，也不抵触。承认物质、我、神三者的存在，与商羯罗一样，认为这三者最终融而为“不二”，但认为此不二是神经过物、我两者的作用而受到限制的不二。主要著作有《梵经注》《薄伽梵歌注》。——中译者

[32] 杜尔西达斯（Tulsidas，1532—1623年）：生年不详，或说是1543年。印度神圣诗人，其代表作《罗摩功行录》是中世纪印地语文学最伟大的成就，对于印度北部的印度教文化有持久影响。该诗写于1574—1577年，用东部印地语的一种方言阿沃提语写成，极其卓越地表现出对毗湿奴化身的罗摩的“巴克提”（献身热爱）宗教感情。——中译者

[33] 印地语，意为“农民、佃农”。——中译者

[34] 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莱：印度社会改革家，曾创立一个教派组织，从事救济印度下层人民的工作。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初期，是温和派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1902年辞去大学教授职务，成为国大党的重要人物。1905年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同年创立印度公仆社，要求入社者发誓终生为下层人民服务。他反对虐待不可接触者。——中译者

[35] “如果把1971年东巴基斯坦分裂出去自成孟加拉也算在内，是一分为四。”—英译者

[36] 英文本为：“1961年它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果阿、达曼和第乌。”——中译者

[37] 到1983年，印度的人均收入由280卢比增加到了2400卢比。—英译者

[38] 拉姆·莫哈姆·罗易（Ram Mohan Roy，1772—1833年）：印度宗教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和爱国主义者。出身于富有的婆罗门家庭，在家里接受教育，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梵文和英文。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在宗教方面，努力纯洁印度教，简化崇拜仪式。在社会改革方面，力图结束种姓等级间的区别，主张一夫一妻制，反对歧视妇女。主张吸取西方和东方教育方面的成就；提倡印度的工业化，相信印度人可以在民主制下管理好自己。——中译者

[39] 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1895—1982年）：印度一位苦行者，出身于高级种姓婆罗门家庭，早年追随甘地，1951年倡导捐地运动，呼吁地主捐献土地给无地的不可接触者，即贱民。撰有多篇论文阐述自己的主张和生活哲学，辑为《捐地运动》一书，1953年出版。——中译者

[40] 马尔特-布戎（Malte-Brun，1755—1826年）：丹麦人，因发表诗歌和小册子支持法国大革命而于1800年被逐出丹麦，在巴黎充当新闻记者和地理学家。著有六卷本的《世界地理概论》，为巴黎地理学会的创建者和第一任会长（1822年）。——中译者

[41] 孟人（Mons）：高棉民族，9世纪曾建立勃固王国。——中译者

[42] 当然，越南战争的结束把这一联盟转变成了北方和南方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联合。—英译者

[43] 摩诃衍那（Mahayana）：佛教的一派，亦意译为大乘，主要流行于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强调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自利、利他并重。——中译者

[44] 1963年5月1日，它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中译者

[45] 雪山神女（Devi Chri）：实际上被认为是湿婆之妻。——中译者

[46] 事实上，1967年，苏加诺总统遭到废黜，由T.N.J.苏哈托取而代之。—英译者

[47] 摩洛人（Moros）：居住在菲律宾南部的一个民族，以制造武器闻名，大都信奉伊斯兰教。——中译者

[48] 清少纳言（Sei-Shônagon，966/967—1013年？）：日本女诗人，才华横溢，学问渊博。991年到皇后身边供职，同年开始撰写《枕草子》，一直写到公元1000年。书中一部分是生动的感想回忆，另一部分则阐述了她的见解，如“无趣的东西”“有趣的东西”等。传说其晚景凄凉悲惨。——中译者

[49] 到1984年，日本的人口达到了1.2亿。—英译者

[50] 到198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8810美元。—英译者

[51] 浅沼稻次郎（Inegiro Asanuma，1896—1960年）：日本社会党前中央执行委员长，1960年遇刺身亡。——中译者

下编 欧洲文明

我们是从欧洲以外的文明开始研究的。这些文明包括伊斯兰世界、黑非洲、中国、印度、日本、朝鲜半岛、印支半岛和印度尼西亚文明。从离欧洲有一些距离的地方开始我们的研究是有好处的，它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认识到欧洲不是或者说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不过，就任何严肃地对世界做出解释的尝试而言，欧洲与非欧洲间的对比都仍是根本性的。

因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欧洲及其精美的、卓越的文明。在研究过其他文明之后，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它们。应当指出，我们这里使用的“欧洲”这一大的标签，指的不仅是西方，指的是历史悠久的欧洲，而且包括新的地区：直接肇源于欧洲的南北美洲，以及欧洲的这种多重的体验，即苏联独特的体验，这里尽管常常有着各种说法，但一直属于欧洲，即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是如此。

第一部分 欧洲

在开始正文之前，预先回顾一下几个基本概念，可能是非常有益的，尽管它们看上去显而易见。

一、欧洲是亚洲的一个半岛——“亚洲的一个小岬角”，因而它扮演双重角色。首先，它通过一个愈益宽广的大陆块与东方连接起来。这一广袤的大陆块一度是难以穿越的。昨天，铁路横穿这里；现在，飞机旅行实际上使它变得微不足道了。其次，欧洲在各个方向与世界的七个海洋相连。构成欧洲历史一个基本部分的，就是船只、护航队和征服遥远的海洋的历史。俄罗斯的彼得大帝1697年第一次访问欧洲时，就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附近赞丹（Saardam）一家非同寻常的村落的造船厂劳动，他的眼光可谓敏锐。早在15世纪末，通过造就地理大发现的航海活动，欧洲的扩张业已决定性证明了它的双重作用。

二、在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之间存在着对立：对立存在于南方温暖的地中海——南方的内海（Mare Internum）——与北方寒冷的“地中海”——拉芒什（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不同是各种各样的：种族不同，饮食不同，品位不同，各个文明存在的时间也不同。各种“地峡”把北方和南方连接起来，包括俄罗斯地峡、德意志地峡和法兰西地峡，而且越向西行进，距离越短。对一位地理学家来说，西欧就像漏斗狭小的一端，东方则是其宽广的一端。

三、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间的这些对立既是历史造成的，也是地理造成的。

从历史上来说，西方注视的是罗马，东方注视的是君士坦丁堡。公元9世纪的大分裂是圣美多迪乌斯（Saint Methode）和圣西里尔（Saint Cyrille）在传播福音和沿着希腊正教路线构造东方的未来方面取得的决定性成功。

相当晚的时间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分裂，这一次是在北方与南方之间。非常奇怪的是，新教改革大致沿着罗马帝国时代的古“防线”（limes）“分裂了”天主教世界。

第十六章 空间与自由

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libertés）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这些自由往往互相冲突，或者互相排斥。

非常清楚，这些自由只有在西欧发展成型并变得相对稳定的时候才能够存在下去。如果没有设防的工事，或者罹受倾轧之若，自由是没有可能的。自由与稳定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欧洲发展成型：5—13世纪

下文所附的两幅地图（图14和图15）显示出欧洲遭到的主要侵略。它们使我们不必详细叙述欧洲半岛的西端在逐渐变成一个紧密的整体的过程中所罹受的种种灾难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

·欧洲的空间是在一系列战争和入侵过程中确定下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开始于罗马帝国的分裂。这一分裂由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去世所确认，但并不是因此而造成。

东地中海一直（或者说几乎一直）有人居住。那里富产非常古老的文明，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赋予它生机。自罗马人的征服开始，也出现了一个西地中海，也可以说一个远西方（Far West），那里如果说不是野蛮之地，也是原始地区。在那里，罗马通过创建城市而部分地建立了一个文明。这一文明如果说不总是严格的罗马文明，至少是原有罗马文明的仿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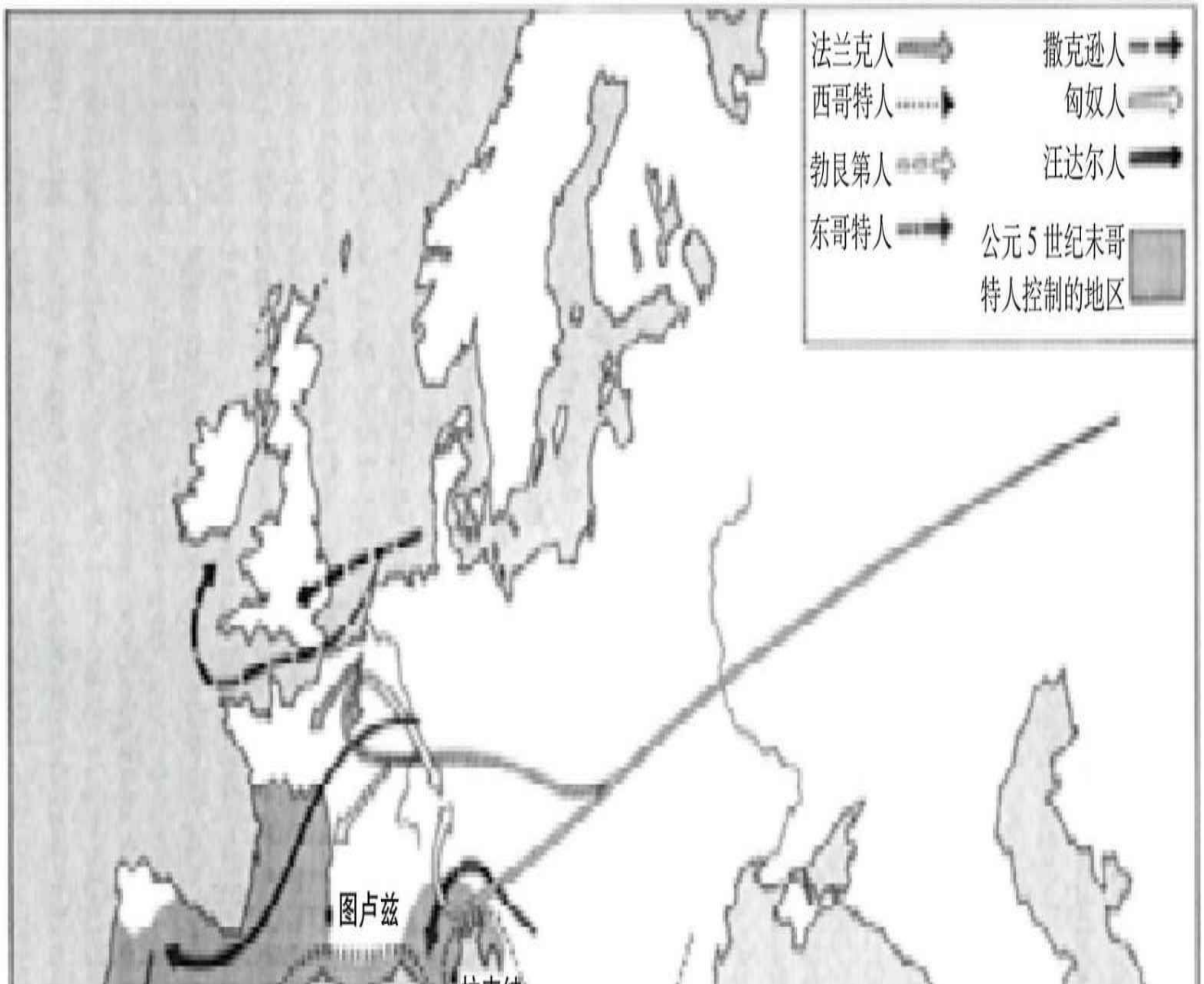
395年罗马分裂一旦成为现实，西罗马部分（pars Occidentis）在环绕着它的三个边界上就经受了一系列灾难：沿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东北部边界，沿地中海的南部边界，以及自丹麦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广袤的“海洋边界”，那里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平安无事。这些新的危险以及对这些危险做出的反应，界定并确定了欧洲的地理空间。

（1）在东北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双重“防线”未能抵抗住蛮族的压力，他们为了躲避匈奴人到了这里。405年，拉达盖苏斯（Radagaise）率领的一支蛮族军队进入意大利，到了远至托斯卡纳的地方。不久之后，406年12月31日，一群野蛮部落在美因茨（Mayence）附

近越过冰封的莱茵河，蹂躏了高卢诸省。

大门一旦被打开，直至451年匈奴人在卡塔洛尼平原（Champs Catalauniques）被击败后才重新开始关闭。在那之后，重建工作相当迅速。墨洛温王朝的高卢重建了莱茵河边界，不久这一边界就移到了更靠东的地方；加洛林王朝远在河的东面维持了这一边界，对整个德意志施加其权威，并一直向前推进到匈牙利地区，后者当时处在阿瓦尔人（Avars）的统治之下。皈依基督教巩固了这一向东大力推进的举动；在这一转变信仰过程中，圣卜尼法斯（Saint Boniface）起了主要作用。实际上，西方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小心翼翼行事时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自那时起，德意志保护西方世界免遭来自亚洲东方的袭击。933年，它在梅泽堡（Mersebourg）挡住了匈牙利骑兵；随后，955年，在奥格斯堡（Augsbourg），它粉碎了它们。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从其扮演的保护角色中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的：962年，它取代了加洛林帝国（l’Empire Carolingien），后者是由查理大帝（Charlemagne）于公元800年圣诞节创立的。



法兰克人
撒克逊人
西哥特人
匈奴人
勃艮第人
汪达尔人
东哥特人
公元5世纪末哥特人控制的地区
图卢兹
拉韦纳
托莱多
罗马
君士坦丁堡
萨珊王朝
迦太基
汪达尔王国
亚历山大里亚

图14 大入侵（一）：蛮族的入侵


阿拉伯人
匈牙利人
维京人

图15 大入侵（二）：9—10世纪的入侵

东部边界不再受到威胁，成为一个发展点，并随着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在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建立而向东推进；这些应归功于11—13世纪德意志人的殖民活动。在这里确实出现了相对的和平，直至约1240年蒙古大军的入侵：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蒙古人的推进在波兰边缘和亚得里亚海被阻挡下来。唯一的受害者是俄国西南部。

（2）在南部，在地中海，由于穆斯林征服活动在那里取得的首批成功而造成了一个危险的边界——这种危险因北非（迄至那时一直属于基督教地区）、西班牙随后是西西里的一系列“背叛行为”而加剧。在西方，地中海成了一个“穆斯林湖”。西方对此做出的第一个有效的反应是建立重装骑兵，它使查理·马特于732年在普瓦蒂埃（Poitiers）取得了胜利。那一胜利的后果是加洛林王朝非常巨大但极为短命的成功，它的影响扩展到了莱茵河以外地区，甚至远及萨克森和匈牙利。

但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邻居，基督教不得不发起困难而戏剧性的战役反对它，进行了它自己的“圣战”，即十字军东征（croisade）。十军军东征时断时续地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注意，这显然不是第一次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而是第一次由集体力量进行的、有着自我意识的战争——开始于1095年。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是1270年圣路易（Saint Louis）对突尼斯的远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

尽管埃及在1291年夺回阿卡（Acre，Saint-Jean-d’Acre）结束了西方在东方进行的这些大的冒险，但进行“圣战”的呼声仍在困扰着西方，让它激情澎湃，结果在15和16世纪导致了出人预料的高潮……到了17世纪，又一次出现了阿尔方索·迪普隆（Alphonse Dupront）所说的“孤独的十字军战士”。迪普隆这位历史学家把这一让人难以摆脱的信仰狂热一直下延到19世纪。这让人联想到昨日的种种殖民奇遇。

根据近来非常令人怀疑的统计，1095—1291年间，十字军东征令西方损失了400万或500万人，而此时其总人口仅仅有5000万。谁也说不清这些数字是不是准确。但不管怎样，这是正在形成的欧洲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体验，是它的第一次真正的胜利。至少从两个角度我们可以这么说：首先，它不稳定地、临时性地占领了圣墓（Saint-Sépulcre）；其次，它对富饶的地中海明确无疑的重新征服。十字军东征完成了这一过程，西方的南部边疆借此得以固定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直至15、

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它们是最重要的成就。

（3）在西部和西北部，向南一直到了地中海，欧洲在8—10世纪并没有觉察到北欧人的入侵。它没有觉察到，而且没有力量应对，因而更加感到苦恼。除低地国家（Pays-Bas）、爱尔兰和意大利外，欧洲迟迟才发展起自己的海上力量来。不过，从长期的角度看，这些入侵对欧洲是有好处的。

这么说并不是要为残酷无情的北欧海盗辩护。他们在欧洲造成了重大人员损失。不过，要找出比这更值得羡慕的劫掠活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横穿整个俄国的旅行，他们对美洲的发现——不过他们刚刚发现就把它丢掉了，这是因为，如亨利·皮雷纳所述，“欧洲尚不需要它”。经济史学家对这些所谓的维京人（Vikings）更加着迷，认为他们通过把劫掠到的财富，尤其是从教堂劫掠到的财富重新投入流通，激活了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经济衰退以来作为贵金属不能流通、闲置不用的资本。他们认为，维京人的劫掠活动使他们成为金钱的供应者；正是这些金钱又一次刺激了西方的经济。

·要想理解这最早的欧洲文明，我们必须记住欧洲罹受的灾难，想象一下9和10世纪骇人的“黑暗时代”，认识到整整一个大陆每天都必须为生存而斗争的压倒一切的贫穷。

实际上，由于缺少宽广的出口，欧洲的经济退化成了生存经济。这一贫困的欧洲，用马克·布洛赫的话来说，成为“一个被围困或不如说遭到侵略的城堡”；在那个时代，它没有力量去维系非常庞大的国家。这种庞大的国家衰落或倾覆的速度比建立的速度还要快。查理大帝的帝国建立的速度非常快，但它在814年这位伟大的皇帝去世后不久就分裂了。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很快就变成一个摇摇欲坠的大厦，西欧分裂成为无数小的公国。封建制度（它建立在采邑或用拉丁文说feodum的基础上）在西方各个王国中维持了理论上的而非实际上的统一，其中一些非常缓慢地实现了现代化，比如法国，另一些则任性地固守“非常古朴的”特色，比如在德意志帝国（Reich）。

不过，这一骚动不宁的世界尽管面临来自内部的压迫和来自外部的攻击，却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是一个同质的文明。尽管其内部有着种种差异和不同，但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话说，它不得不被称为一个“封建文明”；在这种文明内部，所有地区面对的都是同样的重大问题，形势和解决办法往往也大同小异。这一文明产生于种族的和经济的多重混合体

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斗争，有着共同的信念，尤其是面临需要加以解决的“同样的困难”。

·封建主义打造了欧洲。11和12世纪，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欧洲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青春期，达到了它的第一个富有活力的阶段。这种封建统治是一种特别的和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建立在一个业已经过第二次或第三次发酵的文明之上。

但对这一色彩斑斓的文明应当如何界定呢？

如果没有此前更大的政治实体的分崩离析，就不会有封建主义。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上面说的那个政治实体是广袤的加洛林帝国，即第一个“欧洲”，它的名字这样显示出来（Europa，vel regnum Caroli，“欧罗巴，或者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它在其伟大的皇帝 [1] 死后不久就消失了，这个皇帝被一个宫廷诗人赞誉为pater Europae，即“欧洲之父”。

封建主义是加洛林帝国分裂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结果。1940年6月，当法国就要沦亡于德国纳粹手中时，一个法国军官产生了这样一个梦想。他希望法国的每一个军事单位能够通过某种神奇力量暂时恢复自治，拥有见机行事的权力，而不必服从最高统帅部的统一命令；这个统帅部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虽然心中不愿，却在把所有人拖入失败的深渊。封建主义就产生于类似的反应之中，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激起这种反应的灾难不像1940年6月的那场灾难那么迅速。封建主义的形成用了好几百年的时间。不过，其真正的本性一方面是防御的反应，一方面是地方的反应。城堡位于小土岗（motte）上，它保护的村庄挤在它的附近：这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现象，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一种防御的武器。

尽管如此，封建主义还是其他的东西。它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一种依附链上的社会；它是这么一种经济，其中土地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常见的靠服役得到的酬报。领主从国王（他的封君）那里，或者从一个地位比他本人要高的领主那里得到采邑（feodum）或领地。作为封臣，他反过来要向其领主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四种情况下的帮助：（1）他应支付他的领主的赎金；（2）当其长子获授骑士称号时，他应向其领主缴纳实物或金钱；（3）其长女结婚时，他应缴纳钱财；（4）当其封君参加十字军时，他应缴纳钱财。领主依次把他自己的领地的一部分让渡给那些从属于他的人，这些人可能是小的领主，也可能是农民。他授予后者土地［我们仍倾向于称之

为“采地”（tenure）和租用地］，农民耕种它们，向领主缴纳租金（免役金），缴纳收成的一部分（什一税，或实物地租），或者负担徭役（corvée）。领主反过来要保卫他们，为他们提供保护。

这一带有其义务、其规定、其忠诚，动员起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社会金字塔，使西方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并卫护着古老的基督教遗产和罗马遗产。在这上面它还添加了领主统治的思想、价值和意识形态（它自己的文明）。

实际上，欧洲那时已经忘了欧洲之名。它变成了一个彼此分隔的世界，在那里起作用的都是小的地区，是狭窄有限的母邦。

当然，在欧洲生活的这些早年岁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有利之处，即各个地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成长，就像荒野中一个植物那样。因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健壮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随时准备保护它的疆土和它的独立。

让人感兴趣的是，尽管存在这一政治分隔状态，在欧洲文明和文化中出现了一种聚合。一位到圣地（比如，圣-雅克-德·孔波斯特拉，Saint-Jacques-de-Compostelle）朝圣的香客或为了贸易业务四处走动的人，在吕贝克（Lubeck）像在巴黎那样，在伦敦像在布鲁日那样，在科隆像在布尔戈斯（Burgos）、米兰或威尼斯那样，都有一种在家的感觉。道德、宗教和文化的价值，以及战争、爱情、生活和死亡的准则，在各地都是一模一样的，从一个采邑到另一个采邑，不管那里出现了什么样的争执、反叛和冲突，都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像马克·布洛赫所说的那样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单一的基督教民族和基督教世界（Chrétienté），出现了一个可以称为骑士文明的文明，一个有着行吟诗人、抒情歌手和典型爱情（amour courtois）的文明。

十字军东征表现出了那种统一性，因为它们是集体的运动，是集体的冒险和激情，是无数小型母邦所共有的。

自由或不如说各种自由：11—18世纪

假设一下，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历史上自5世纪到现在，也许可以说到18世纪的所有知识都汇总起来并把它们存储在一个电子记忆装置里（倘若这种记录设备是可以想象的）。假设一下，那时计算机被要求证实一下在欧洲整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哪一个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最常出

现。毫无疑问，那一个问题就是自由（liberté），或不如说欧洲的各种自由。“自由”一词是一个要害之词。

不管怎样，到了今天，在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西方世界为自己选择了“自由世界”（mondelibre）的称号。尽管其动机各种各样，但从欧洲在这若干世纪的历史来看，这是既适当又公平的。

·至于自由，应从其所有的形态、从其所有的言外之意上加以理解，包括其各种恶习流弊。

实际上，这些自由是彼此互相形成威胁的。一个自由限制另一个，而且后来从属于又一个新的对手。这一过程从来就不是平安无事的，不过它是解释欧洲进步之因的秘密之一。

但对“自由”一词我们仍需加以准确的界定。在这里，它指的与其说是个人的自由，此为现今“自由世界”惯常的标准，倒不如说是团体的自由。在中世纪时代，人们说到的更多的是“libertates”（各种自由），而不是“libertas”（自由），这并非偶然。使用复数形式，该词在非常大的程度上相当于“privilegia”（特权）或“jura”（权利）。实际上，“libertates”指的是保护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这一利益或那一利益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它利用这种保护剥削其他人，采用的手段往往不知廉耻。

这些集体的自由是慢慢才发展到充分的程度的。后来，它们同样非常缓慢地被导入合理的界限之内，或者被废除。总的说来，它们顽强地长存下去。

·农民是最早得到解放的人之一，但肯定是最后获得充分的自由的。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解放至今仍是不完全的。

按照我们对该词的理解，农民是不自由的，除非没有外部利益——领主的、城市的或资本家的——来到他们和其土地之间，除非他们不受到奴役的束缚，最后，除非他们的劳动所得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而且会有剩余，同时这一剩余倘若到了邻近的市场不只是能够获得居间的财富，而且让农民有能力至少购买他们个人所必需的东西。

这是由诸多条件构成的。尽管过去欧洲农民可以说享有某些有利条件，甚至拥有某些自由，这只是相对于其他处境肯定更差的农民而言。

从广义上讲，欧洲农民从每一次经济高涨中获得了好处。

因而这恰恰开始于10世纪以后的欧洲经济复苏之时。在这一时期，农业产量在各地都有所增加：不仅在北方“新兴的”国家，在那里作物三年轮作制从德意志地区和波兰传播开来，而且在南方各地区（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在那里两年轮作制（一年种植谷物，一年抛荒）依然是通例。

农产量的这一增加与人口的增长和城镇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城镇是农业有更大的产量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它们也从这里获得了好处。

11世纪以降，只要经济增长持续下去，农民的命运会迅速得到改善。在此之前，他们被固着于土地上，是农奴。“在归属于持剑之人和他的对手教会人士之后，土地落到了扶犁之人的手中……它被抛弃给任何试图接过它的劳动者，所交换的是向土地原主人缴纳的非常少的年息。”这种免役金适用于“土地充足、人口稀少的时候，这样劳动力比土地更能寻找到”［达维纳尔（d’Avenel）语］。无疑，在大片地区（但不是所有地区），农民可以享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到了12世纪我们自由了。”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爱这么说，他指的是西方的农民。

但这一解放既不完全，也不普遍；尤其是，这也是不明确的。确实，存在着某种平衡，而且范围很广。实际上，它把土地留给了农民，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成为领主和主人，能够转让或出售掌有的产业。另外，土地的租金是很早就确定下来的，从长期看对农民有利，因为经过几个世纪后钱币的价值在下降，这样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租金按其实际价值看变得非常可怜得少。

然而，这些好处并没有非常可靠的法律根据。领主对土地继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如果时间、地点和局势合适的话可能恢复其实施压迫的权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是这种状况的一个证明：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58年），英国由瓦特·泰勒领导的工人和农民起义（1381年），德意志突然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1524—1525年），以及法国在17世纪上半期再一次爆发的农民运动。每一次，这些起义，这些“大罢工”，都被平定下去了。只有他们一直存在的威胁帮助农民保留了过去获得的部分自由和好处。

随着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些特权实际上又一次成为问题。自16世纪开始，在17世纪更甚，资本面临了经济衰退：它在别的地

方找不到便捷的出口，就掉转头来朝土地杀来。一场范围广泛的“领主的反动”——既有贵族，同等程度上也有中产阶级——自大大小小的城镇向外蔓延，到了邻近的乡下。新型的地产建立起来，它们宁可只要一个单一的租佃者，尤其是以牺牲农民小地产为代价。［这些新型的地产叫作“农场”（fermes）、“谷仓”（granges）、“分成制租田”（métairies），具体术语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而且并不总是具有其现代含义。］它们的主人通常感染上了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为放贷者，他们寻求的是产量和利润。农民成为他们放贷的对象，这样不知哪一天他们的地产就会被夺走，或者其土地不得不向富人上缴不计其数的登记在案的田租中的一种；这类契约在公证人卷宗中比比皆是。当时的一切东西都对农民不利——甚至租佃契约也要求支付实物、小麦，而不总是金钱。

尽管这一反作用在欧洲各地都可以看出，但在中欧和东欧——在德意志易北河以远地区，在波兰、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甚至还有巴尔干半岛和莫斯科公国——特别具有悲剧性。随着16世纪的终结，在这些地区的各个地方（某些地区“仍然是蛮荒之地”）都出现了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的第二次农奴制。农民又一次陷入领主统治的泥淖之中，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严重。领主是农场的首脑，是实业家，是小麦商人。为了满足市场上对粮食日益增大的需求，他迫使农民增加他们应负担的劳役量——在波希米亚是每周5天，在那里农民只能在周六耕种自己的田地；而在斯洛文尼亚，15世纪时是每年10天，到了16世纪末，变成了每年6个月。劳役在领主直接拥有的田地（所谓家用农场或保留地）上进行。这种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制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些地区相对于西方异常落后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在西方，在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下，对农民有利的变化在18世纪开始发生了——法国，随着约翰·劳（John Law）的银行制度而出现，它引燃了一切（包括农村的酗酒）。法国大革命使农民土地摆脱了封建赋税而完成了这些发展。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一实例被其他地方所效仿。

·城市的自由。城市是从不停止运转的发动机。它们是欧洲第一次飞跃的主要力量，所得到的报偿是它们的“自由”。

西方长期的衰落导致在10世纪时城市几乎绝迹：残存下来的很少。但当经济潮流发生变化时，随着11—13世纪高潮的到来，城镇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复兴。在这一大复苏中，城镇繁荣的速度似乎比笨重的地域国

家要迅速得多。最早自15世纪开始，这些城市才开始显示出现代城市的一些特征，但早在11和12世纪，它们就打破了它们由以产生的封建国家的框架。城镇摩登而又超前，它们宣告了未来。它们实际上已经代表了未来。

当然，它们并不是一直享有严格的独立，在一开始也不是这样。不过大的自由城市首先在当时西欧最先进的国家意大利产生了。有“第二意大利”之称的尼德兰（低地国家）也出现了城市。当路易九世（圣路易）的王国仍然具有典型的“中世纪”特征时，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根特和布鲁日已经是“现代”城市了。

在这些城市之后，受制于大公、总督（doges）或行政官（consuls）的无数较小的城镇进行了斗争，赢得了（通过其特许状）自己进行治理、照管它们的金融、法律制度和它们拥有的土地的权利。

总的说来，完全的自由只有通过足够的物质繁荣才能取得。这种繁荣应能使某些享有特权、地位有利的城镇不仅可以确保它们的生存，而且可以提供防御外部力量入侵的能力。它们就是所谓的城市国家。只有少数城镇取得了这种地位，但它们都依靠其贸易和行会的劳动赋予它们某种独立性和个体种种自由的权利。

行会既为当地市场生产，也为长距离的贸易生产。无疑，城市经济能够繁荣到它事实上的那种样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它越过了地方的界限，不然不可能如此。15世纪时，吕贝克城是人们称为汉撒同盟（la Hanse）的波罗的海与莱茵河之间城市大型贸易集团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它与整个已知世界建立了联系。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巴塞罗那（Barcelone）的情况也是这样。

在这些享有特权的中心，最早的资本主义作为“长距离贸易”的结果而取得了胜利。这是商人冒险家时代的开始。他们提供原料和劳力，确保产品的出售，行会师傅则越来越变成挣工资的受雇者，就像他们在这一“Verlagsytem”中的“伙伴”那样。“Verlagsytem”这个德语单词是德国历史学家常用的一个词，无法准确地翻译，意思大致是指“按订单生产”（travailàfaçon）。商人是富有的资产者（popolo grasso [2] ）中首屈一指的明星。他们的“下属”（loges）即“瘦人”经常举行相当不成功的反叛。比如说，在根特，或者在佛罗伦萨，那里在1381年爆发了梳羊毛工（Ciompi）激烈的革命。

制造业城镇中的这些内部冲突预示了已经成为阶级斗争的社会紧张局势：用博马努瓦（Beaumanoir）在提到佛兰德艺匠时使用的一个词“taquebans”，现在我们应称之为为了争取高工资而举行的罢工。逐渐地，在行会师傅与其“伙伴”之间也出现了鸿沟。后者受到了制作费用高昂而困难的“精品”以确保得到发展晋升这种需要的阻碍，组成了自己的集团，自己的协会，自己的“共济会”，经常由一个城镇旅行到另一个城镇。他们实际上是最早的工人阶级无产者。

然而，这种无产者，如果他们是“公民”的话，也因其公民权而享有特权，至少在城市独立或半独立的那些辉煌岁月能够延续时是这样。

那么，有没有一种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想的那样的适用于中世纪城市的特别的类型学（typologie）呢？韦伯自己称之为“封闭的城市”。

确实，这些城市非常排外，拒绝对其城墙外的那些人表示丝毫的关心。任何东西都不能高于它：不存在与中国官员充当国家代理人时行使的卓有效率的专制主义相对应的东西。它们周围的乡村常常处在它们的控制之下，不能成为其公民的农民必须而且只能把其粮食拿到该城的市场上出售，同时他们不得拥有织机，除非城市需要他们提供这种服务。这一制度与古代世界的城市国家肯定迥然不同，那时它们在政治上向周围的乡村开放。比如说，那时的雅典农民是公民，其地位与城市居民一模一样。

毫不值得奇怪，授予外人公民权是城市很不情愿做的事，除非它迫切需要增加它的人口。举例来说，1345年，在黑死病过后不久，威尼斯允诺授予任何愿意到它那里定居的人公民权……一般说来，“市政议会”（Seigneurie）更不宽宏大量。它承认两种形式的公民权：一种叫作de intus [3]，只创建二等公民；另一种叫作de intus et de extra [4]，授予全部权利，一个急于保护它自己的特权的贵族阶层心怀妒忌地对此严加审查。在威尼斯，要获得deintus地位需在该城居住15年，获得另一个地位需要在城里居住20年。有机会的时候，在“新”“老”公民之间也要做出区分。1386年的一个法令规定，只有“老”威尼斯人才可以与扎根于此城的德意志商人进行交易。

城市自私自利，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残酷无情，随时准备为了捍卫它的自由与世界其余的部分进行斗争，时常对别人的自由不表任何关心。城市之间血淋淋的角逐是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斗争的先声。

然而，城市的自由不久就受到了威胁。现代国家虽然发展的速度较慢，但到了15世纪已变得较为强大了。

那时，国家常常迫使城市就范，它既可以授予特权，也可以施加惩罚。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危机，比如1521年卡斯蒂利亚（Castille）的“comunidades”（城市公社起义），1540年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摧毁根特……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某些妥协，因为现代君主制需要得到城市的支持。城市不得不臣属于权威，为了保住其他的特权而放弃某些特权。作为放弃某些自由的补偿，它们得以进入现代国家的某些新的领域——更大规模的贸易，可以获得利润的借贷，另外，在某些国家，比如在法国，可以购买公职。地域经济（économie territoriale）成长起来，取代了在此之前的城市经济。但这一地域经济仍由城市控制。它们与国家一起继续当家做主。

·所谓“地域国家”（即现代国家）在欧洲属于后来者。建立在血缘联系和封君封臣关系上的古代形式的王权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消失，至少是得到改造。

转折点出现在15世纪，起初几乎一无例外的是在城市革命最不明显的地区。无论意大利，或者尼德兰，甚至还有德意志，都不是被选中建设这种新型政府的地区，这几个地区有着众多自由、富裕和活跃的城市。现代君主制首先是在西班牙、法兰西和不列颠发展起来的，出现了新型的统治者：阿拉贡的约翰二世（天主教徒费迪南之父）、路易十一，以及兰开斯特王朝的亨利七世。

为这些地域国家服务的是“公务员”，或者，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可称之为“官员”；所有这些官员都是国家的仆人，就像按罗马法律接受训练的“法理学家”，以及重要的国务秘书，即“大臣”。

群众的孝忠对地域国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视君主为天然地保护他们免受教会和贵族欺凌的人。在法国，君主制直到18世纪都可以依赖人民大众的忠诚：历史学家米什莱称之为“一种爱的宗教”。

现代国家是为了应对新的和迫在眉睫的战争需要而产生的。火炮、战舰队和庞大的步兵，使战争所需的费用空前。战争是万物之母（bellum omnium mater），它也造就了现代世界。

现代国家不久就认识到，任何权威都不能高于它的权威：神圣罗马

帝国的皇帝不能，他们越来越受到它自己的王公的忽视；教会也没有这个权力，尽管它在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权威一度非常显赫。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不受控制和自由的，国家的理由（raison d’État）变成了最高的法律（ultima ratio）。（现在相当于ultima ratio的“raison d’État”这个词最早是由德拉·卡萨大主教使用的，当时他向查理五世做了一个演讲，谈论的主题是在1552年占领曼图亚期间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这是西方政治制度脱离传统的王权及其父家长制的和神秘的腔调，朝着法理学家的现代君主制演变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迈进。

一些作家就注意到现代国家的产生所昭示的某些精神，用14世纪法理学家巴尔托洛-德·萨索费拉托（Bartoli-de Sassoferrato）使用的术语，即“superiorem non recognoscentes”（不承认存在任何更高的权威）。但这走在了政治现实的前面。

在法国，直到1577年，让·博丹[5]在其《共和六书》（*Traité de la république*）中提出了国家不可分割的主权的理论。在这里，“共和”按其拉丁文词源，意指公共事物。在博丹看来，主权国家是高于除自然和神圣法律之外的任何法律的：在人类舞台上没有比它高的东西。“正如教会法学家所说，教皇从不束缚他的双手，那么主权君王也不能缚他自己的双手，即使他这么希望。因而我们在敕令和法令的最后看到下面这些话：这是我们乐意做的。它们在那里清楚地表明，至高无上的君王的法律，一方面建立在良好和充足的理由之上，但另一方面也完全仰赖他个人纯粹而单纯的意愿上。”

主权意志侵犯了国家。“我就是国家。”（Das Ich wird der Staat，“朕即国家”）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这样写道。这就是通常被归到路易十四头上的著名格言“国家即朕”（L’État，c’estmoi），但至少有一次也曾被归到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头上。尽管西班牙君主自称“天主教国王”，法国君主自称“非常基督教的国王”，但他们一有机会就反对教皇国，捍卫法国天主教（l’Église gallicane）的自由或西班牙世俗的及精神方面的利益。这些都是时代变迁的标志。当然，在此之前出现过类似的行动，但现在它们变成了系统性的、自然而然的行动。它们现在不言自明。

随着现代国家加强了它的控制，欧洲文明变成了“地域”文明和民族文明。迄至那时，欧洲一直是城市文明，在许多小而分散、享有特权的城市中达到成熟。现在，西班牙的黄金世纪（1492—1660年，实际上不

止100年）和法国的伟大世纪都与整个国家处于同一广度。

在这些面积更大的文明实体的中心，都市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的存在和消费行为维系着它的存在，并因而把它们提高到史无前例的超级城市（super-villes）的地位。巴黎和马德里获得了持久不衰的声名，伦敦实际上变成了英格兰。整个国家的重心和生活都开始围绕着这些城市怪物进行，它们从今以后成为无以匹敌的奢华工具和既创造文明又制造人类苦难的机器。

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描绘出这些广袤国家引发的人口、资本和财富的巨大流动——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由的再分配，一些自由被废除，或者表面上得到保存，另一些自由得到鼓励或被创新。一些享有特权的城市被创建，其中包括马赛，与黎凡特地区进行贸易的事实上的大本营；洛里昂（Lorient），建于1666年，不久就被授予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还有塞维利亚，它在1503年获得比别的城市大得多的特权，即与有“卡斯蒂利亚的印度”之称的美洲进行排他性贸易的权力。然而，1685年，塞维利亚的垄断权被转授给了加的斯（Cadix）。

由于国家不能承担所有的职司或保留所有的权力，因而一些自由被保留给了城市。举个例子来说，在法国，自柯尔贝尔（Colbert）去世（1683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实行绝对主义统治的国家逐渐变得不那么有效率了；购买到国家“职位”的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分享到了政治权威。正是通过与国王的斗争，外省的自由得到了维护。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的特权被镶嵌在法兰西国家政治结构的外表之上。它无法摆脱它们，结果因而错失了18世纪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开明”改革。

就连那些在那一时期赢得了政治自由的国家，所做的也不过是把治理国家的责任交给由有特权者组成的强大集团。联合省的情况就是这样，把事务交由其中产阶级商人来处理。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也是这样。英国议会代表了一种双重的贵族制，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贵族，但肯定不是作为整体的国家。

·在特权者的“种种自由”越积越多时，个人自由的情况如何呢？

如果说“个人的自由”具有今天那样的含义——每一个的自由，只要他是一个人——那么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种形式的自由概念过了很长时间才变得清晰起来。因而，人们至多只能看一看个人的自由是不是事实上在增加。对此问题的答案必定是既矛盾又悲观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热潮，宗教改革时代也是这样（就其提高了个人理解天启真理这一原则而言），为意识的自由打下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宣扬尊重人类作为个人的伟大，强调个人的才智和能力。在15世纪的意大利，“virtu” [6] 不仅意味着美德，而且意味着荣耀、效能和权力。从思想、知识的角度讲，理想是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 [7] 所说的“l’uomo universale” [8] ——他本人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17世纪，随着笛卡儿而来的是一种源于“Cogito，ergosum”（我思故我在）的整套哲学体系，即个人的思想。

加诸个人之上的这种哲学上的重要性与对传统价值的放弃同时出现。这受到了16和17世纪逐步建立的一种卓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的鼓励，因美洲贵金属的到来和信贷设施的成长而加速发展。金钱倾覆和削弱了像市政当局、工匠行会和商人行会那样的经济和社会集团，它们在同一时期既失去了其原有的僵化特性，也失去了其某些用途。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个人重新发现了某种选择的自由。但与此同时，现代国家机器强加给他们一种严格限制这种自由的秩序。个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必须尊重特权和享有特权的人。

笛卡儿的一封信清楚地陈述了这一问题。如果说在理论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是自给自足的，那么此时社会何以生存？它应遵循什么样的准则呢？詹姆斯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1645年9月15日，笛卡儿做出了这样的答复：“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别的东西有别的人，且因而被赋予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一切的利益，那么我们必须总是想到，我们人不能孤独地生存下去，我们实际上是宇宙中各部分中的一个，更特别的还是这一地球各部分中的一个部分，是这一国家、这一社会、这一家庭各部分中的一个部分，他因居住地、因誓言和因出身而与它们连在一起。我们必须一直为我们构成其中一部分的那个整体的利益服务，这一利益优先于我们个人特别的利益。”

在这些“整体的利益”的名义下，17世纪不仅对穷人，而且对社会中所有“无用的”部分，对所有那些不参加劳动的人，实施了一种严格的“培训计划”。确实，部分地由于整个16世纪人口的增长，部分地由于开始于16世纪末、在17世纪进一步恶化的经济危机，穷人的人数有了让人忧心的增加。穷人人数的增加反映在乞讨、流浪和偷窃等现象上，凡此种种均引起了压制性的反应。1532年，巴黎议会不是下令逮捕首都中的所有乞丐，“迫使他们在纺织厂劳动，且成双成对地用链子拴在一起”吗？此外，我们还可以看一看1573年特鲁瓦（Troyes）城是如何对

待城里贫困无助之人的。

但这些都是临时性措施。在整个中世纪，穷人、流浪汉和疯子都受到慈善救济法的保护，使用的是上帝的旗号，因为耶稣基督在某一天穿上了穷人的服装从而使穷人神圣化了——而且穷人可能总是可以转变成为上帝的使者。圣弗朗索瓦（Saint François）加以具体化的整个精神运动提高了贫穷圣女（Dame Pauvreté）即神圣的贫穷的神秘价值。不管怎样，社会中的不幸者、疯子和被遗弃者倾向于从一个城市漫游到另一个城市；大多数人都急于把他们打发走，而不是把他们留在自己的城墙之内。

因而某些形式的自由，至少是身体上的自由，是允许农民享用的，他们可以从一个领主跑到另一个压迫不那么厉害的领主那里，或者在城市里避难。同样，寻找征兵的官员的士兵也有这种自由，一个抛家离舍去寻求更高的工资或到新大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的幻象的移民也是如此。此外还有失业者、积重难返的流浪汉、乞丐、精神上有缺陷的人、残疾人和小偷，他们不参加劳动，靠别人的慈善或犯罪维持生存，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的。

所有这些人迄至那时都在无所不能的主的荫庇之下受到保护，但到了16世纪，他们成为社会的敌人，这是一个城市的、已经资本主义化的、迷恋效率和秩序、按照同样的精神、为了同样的目的塑造国家的社会。在欧洲各地，无论是天主教地区，还是信奉新教的地区，穷人、病人、失业者和有精神障碍者都被残酷无情地扣押起来（有时与其家人一同），与形形色色的过失犯罪者关在一起。这就是米歇尔·福柯（他研究了近代早期与疯癫相关的社会现象）所说的对穷人的“大囚禁”，此为煞费苦心的行政机构组织按法律程序进行的拘留穷人的行为。这不仅是应其家庭之请收押一个伤风败俗、挥霍无度的儿子或乱花钱的父亲，而且是按国王密信（lettre de cachet）的要求监禁一个政治对手。

为了上述目的，各国设立了数量繁多的机构：医院、慈善工场、济贫院（workhouses）、教养院（Zuchhäuser）。不管它们的名称叫什么，它们都仅仅是管理非常严的临时营地，另外也是强迫人们劳动的工场。在法国，在1656年建立总收容院（Hôpital Général）的敕令颁布及在同时推行这一整套新的社会政策之后，巴黎居民中竟有1%被监禁起来！这一严厉的压制措施直到18世纪才有所缓解。

在一个已经存在自由但仅限于那些有特权者享有的世界，17世纪就

这样帮助对基本的逃避及漂流浪荡——这直到那时一直是穷人唯一可以享用的自由——的自由强行实施真正的限制。与此同时，如我们前文所述，农民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在“启蒙运动”之前不久，欧洲陷入了悲惨的深渊。

面对这种悲观的图景，只有一个匡正的方法。绝大多数人无法享受的自由，在欧洲仍然是一种人们可以想象的理想，但其历史也在慢慢地向前发展。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主要趋势，17世纪的众多农民暴动，同样频繁的民众起义（1633年巴黎起义，1634—1639年鲁昂起义，1623、1629、1633和1642年里昂起义），以及18世纪政治和哲学的发展，都证实了这一点。

法国大革命本身并没有成功地建立完全的自由，现在我们也没有能力这么吹嘘。确实，大革命在1789年8月4日夜废除了封建特权，但农民仍要面对债权人和地主。1791年，通过列霞白利法[9]，它同样废除了同业公会，但这听任工人受雇主的宰割。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1884年，工会在法国才成为合法的组织。尽管如此，1789年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仍然是人类自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欧洲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

自由，还是寻求平等？拿破仑认为法国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在寻求平等。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封建特权。一句话，结束私人的种种自由和特权。

自种种自由到自由（一种自由）：这一公式照亮了沿着其根本性方向之一前进的欧洲历史。

·自由之概念仍然是“抽象”的和理论上的，它自文艺复兴经宗教改革一直发展到法国大革命。当它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公开宣讲出来时，变得更加强大了。随着自由主义的出现，它变成了一个信条。

自此以后，自由——单数形式的自由——变成了世界事务和历史运动上一个明确的因素。19世纪的种类异常繁多的运动推出的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和要求都——以合法的方式或滥用——借用它的名声。这些运动包括一个人为制造的词“自由主义”，这个词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意义极其模糊不清。

根据它的一个定义，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信条，寻求增加立法

会议和司法机构的权力而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就此而言，它反对专横独裁。按照另一个定义，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信条，其胜利的征象是“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10]，寻求避免国家对个人之间、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最后，自由主义是一种哲学信条，鼓吹思想自由，坚持认为宗教统一不是社会或民族统一的一个“sine qua non”[11]。这必然隐含着对别人和个人表示宽容和尊重的意思，按古代的一个说法就是：“Homo homini res sacra”[12]。

因而，自由主义不只是“一个政党的信条……一种舆论氛围”。在与19世纪许多不同的问题进行搏斗时，它完成了难以计数的任务，遇到了难以计数的障碍。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它被等同于民族主义：民族本身赢得自由，难道不是首要的自由吗？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与一个得到教会支持、壁垒高耸、固若金汤的旧制度之庞大无比的力量发生了冲突。相比之下，在英国和法国，它实际上实现了其政治目标。虽然速度很慢且不尽完善，但自由主义的、立宪的国家发展成型，体现了根本的自由（舆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以及议会自由；个人的自由以及选举权逐渐扩大）。

·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前半期，自由主义充当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商人贵族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一个屏蔽。

“在一个小圈子之外，自由主义以如此大的热情卫护其权利的个人仍然只是一种抽象概念，不可能从这些好处中获益。”拥有保守党和自由党、旧钱与新币的英国是这样，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也是这样。自称自由主义者的这一有产阶级当即反对普选，反对人民大众。不过，这种政治上的自我主义，面对不久就会显示出其惊人现实的工业社会，如何能够抵挡得住呢？以人与人之间平等竞争为前提条件的经济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出于好心的谎话。时间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显示出这种谎话之虚伪。

事实上，这第一种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首先是针对贵族制旧制度的一种防御行动，而不是有任何兴趣这么做——“对500年的传统使之神圣化的既得利益发起的一个挑战。”通过这种方式，它来到了它所消灭的旧制度的贵族社会和无产阶级正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的工业社会之间。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对自由主义的支持绝非它表面上显现出来的那种样子，而与昔日真正目的在于寻求特权的集团争取自由的斗争极为相似。

对自由主义来说，1848年革命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里程碑（正是在那时，法国实现了普选。而在英国，关键性的选举改革发生于1832年）。自那时起，不管有没有选举权，自由主义只可以以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此即政治自由主义，原则上向所有阶级开放的民主自由主义。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13]和赫伯特·斯宾塞[14]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注意到这一必然的发展和群众的胜利，对此他们都表示担心。尽管自由主义靠这样聚集了新的力量，但它不久就与来自社会主义的空前、直接而有力的攻击发生了冲突，同时也与像卡莱尔（Carlyle）或拿破仑三世这样的倡导专制独裁——有些人现在甚至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人发生了冲突。

因而，政治舞台的一侧是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有许多不同的变种），一侧是反革命力量，它既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它会走多远。在这两者之间，自由主义继续它的生命，组成了许多自由主义的政府，施行着资产阶级的智慧和自我主义。在法国，它重又冒出了一点火焰，但只是在与教会的斗争之中。从此以后自由主义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使命和事业。1902—1903年，明智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刊登了以“自由主义的危机”为题的一系列文章，尤其关心教育的垄断。但真正和最后的危机出现在数年之后，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不过谁有如此胆量，敢说现在被从活跃的政坛赶了出去、在知识文化上没有价值的自由主义，现在真的已经死亡了呢？它不只是一个政治阶段，不只是某一阶级的机巧或伪装。对西方文明来说，它是一种高尚的理想；不管它已经在多大程度上遭到玷污或遭到背叛，它依然是我们的遗产和语言中的一部分，变成了我们的第二本性，即生理反应。对个人自由的任何侵犯都会冒犯我们，让我们怒火中烧。在政治上也是这样。面对专断或实行技术统治的国家，面对总是进行高压的社会，某些挑战性的和无法无天的自由主义以个人及其权利的名义，在西方或全世界正继续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十七章 基督教、人文主义与科学

欧洲的精神生活和智识生活总是受到社会剧烈变化的影响。它热爱并创造分裂、中断和急风暴雨，没完没了地寻求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

界。

不过，这些戏剧性的变化不应让我们分心，以致注意不到欧洲思想和文明根深蒂固的连续性。从圣托马斯·阿奎那[15]的《神学大全》（*Somme*）到勒内·笛卡儿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欧洲历史彼此相连的各个阶段自始至终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本身都没有打断它。就连工业革命这一与过去决定性的断裂，也没有影响欧洲生活和思想的所有方面。

基督教

所有宗教都在发生着变化。然而，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构成其不同的世界，带着自身的忠诚、自身的持久性和自己独创的坐标。

西方基督教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欧洲思想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理性主义思想，它虽然攻击基督教，但也发端于这一宗教。在欧洲的整个历史上，基督教一直是其文明的中心。它赋予文明以生命，即便在它听任自己被这种文明占领或被这种文明曲解时也是这样；它包含了这种文明，即便在做出各种努力逃避这种文明时也是这样。因为要想反对某个人，就要停留在他的轨道上。一个欧洲人，即使他是无神论者，也仍是深深植根于基督教传统的一种道德伦理和心理行为的俘虏。

人们可以说他仍然具有“基督教的血统”（sang Chrétien），就像亨利·蒙泰朗[16]过去说他具有“天主教血统”（sang Catholique）那样，尽管他已失去了其信仰。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已经广泛传播。公元313年，基督降生三个世纪后，随着君士坦丁敕令的颁布，基督教变成了官方宗教。

罗马帝国版图包括所有地中海国家，以及处于橄榄树和葡萄园地之外的一些欧洲地区。这是这一获胜的新宗教在初始时承袭的地区。借用保罗·瓦莱里在玩弄文字游戏时用的名言来说，是“基督教的葡萄园”（aire[17] Chrétienne），以此表明基督教与土地、面包、葡萄酒、小麦、葡萄藤，甚至圣油的关联。所有这些都是地中海这一基督教信仰的起点的特征，后来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

通过这种方式，在遭受5世纪蛮族入侵和7—8世纪之间随伊斯兰教获胜而出现的各种灾难的严峻考验之前，基督教有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使

自己适应罗马世界。它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度；它学会了明确区分世俗事务——“皇帝们（恺撒们）的事”——和精神事务；它解决了激烈的教条之争，这一争论不仅是因希腊语言和希腊思想的灵活与难以捉摸造成的，而且产生于界定基督教的神学根基、赋予它形式并决定它往何处走之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这一困难的任务落在了前几届宗教会议头上（325年的尼西亚会议，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431年的以弗所会议，451年的卡尔西登会议，诸如此类），落在了教父们头上。这些教父中包括护教学专家（Apologistes），他们在君士坦丁之前与异教对垒；此后还有教义学者（Dogmatiques），他们面对持不同见解的宗派的说教界定了基督教信条。这一过程步履迟缓（一些人认为这一过程持续到了8世纪，甚至还有人说到了12世纪）。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并不是这一系列中的最后一位，但他显然是对西方最为重要的一个人。奥古斯丁是一个柏柏尔人，354年出生于非洲的塔加斯特（Tagaste，今苏格艾赫拉斯），430年死于希波（Hippone，后为博讷，现为安纳巴）主教任上，当时汪达尔人（les Vandales）正包围该城。他在其著作（《上帝之城》和《忏悔录》）中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才华，他的矛盾天性，他把信仰与才智、古典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老酒与新酒结合在一起的愿望——这些审慎的努力使他在某些方面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对他来说，信仰是第一位的。不过他这样宣称，“cred ou tintelligam”（“我信以求理解”），他还说，“Si fallor，sum”（“假如我错了，我存在”），以及“Si dubitat，vivit”（“如果他怀疑，他活着”）。如果从这些话中联想到遥远的时代之后笛卡儿的名言“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那会把人引入歧途。但他们二人在这方面显然有密切的联系。后人无疑把注意力放到了作为神学家的圣奥古斯丁身上，放到他撰写的关于命定论的著作上。但奥古斯丁主义赋予西方基督教某种色彩，赋予它调适和辩论的能力——即便仅仅是出于一种极端的必要性，即通过坚持以全部的意识、在进行深刻的个人反思之后、具有相应地付诸行动的意愿来接受信仰。

被蛮族入侵这种末日来临般的灾难压倒的不是一个新生的、对其前进道路不清不楚的教会。面临5世纪种种灾难，它已经像罗马帝国本身那样，像它所接手过来、在某些方面准备通过拯救自身来加以拯救的古代世界的文明那样，崭露头角。

·基督教会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拯救了自我，但以成千上万种英勇壮举为代价。

它要皈依新来者，它要让那些基本上不信基督教、随时可以置教会的说教于不顾的农民信奉这一宗教，它要向西方新征服地区的居民传播基督教福音。在封建制度把西方分裂成为小块地区和众多主教管区的时候，它必须保持一种与罗马和罗马主教即教皇相联系的教阶制度。它必须进行许多次艰苦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帝国与教皇制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结束于1122年有关授职仪式的沃姆斯协约（le concordat de Worms sur les Investitures），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总之，这是一项巨大且劳心费神的工作，是一场重复的、枯燥乏味的劝导运动，以失败和重新开始为标志，一切都再次受到质询，没完没了。但隐修生活的发展［本笃会（Bénédictins）和西多会（Cisterciens）］，致使在11和12世纪出现了对乡村地区的物质殖民和精神殖民；随后，在13世纪，多明我会（Dominicains）和方济各会（Franciscains）修士的福音宣传运动对城市产生了强烈影响。

每一个世纪都有其挑战和战斗。在13世纪，是与纯洁派[18]的斗争；在激烈的13世纪，是教务会议与教皇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和巴勒（Bâle）主教会议上的大辩论。在16世纪，爆发了宗教改革，随后是耶稣会士领导的反宗教改革，新世界皈依基督教，以及特伦托（Trente）主教会议（1545—1563年）上所做的权威性界定。在17世纪出现了詹森派[19]的挑战。18世纪爆发了一场更为坚决的斗争，这一次针对的是一种新型无神论的追随者，该派别在言行上比17世纪的“自由思想家”（libertins）更不谨慎。基督教直到18世纪快要结束时才赢得了这一战役的胜利：它几乎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才开始。

最后，除具有自觉的和明确的意识形态的敌对力量的敌对行为外，基督教还必须不断地应对一种有规律的、千篇一律的非基督教化过程（déchristianisation），这一过程常常不过是普普通通的非文明化（即由文明退回到野蛮）。在任何交通联系不便的地方，在车轮碾轧不到的地方［比如说阿尔卑斯山区或欧洲的边缘，在梅克伦堡（Mecklembourg），晚至13世纪仍是如此；在立陶宛和科西嘉，到了15和16世纪依然交通不便］，旧的异教崇拜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四处蔓延。一个地方可能尊崇蛇神，另一个地方可能尊崇死者和星辰。迷信大行其道，而且极为顽固地深深扎根于民间传说之中，以致教会常常不得不满足于给它们穿上“薄薄的教会的外衣”。

在这些战斗中，基督教会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教育、传教、世俗的权力、艺术、宗教戏剧、神迹以及在民间流行的对圣人的崇拜。这

些崇拜蔓延的范围极广，以致教会中虔诚的信徒们对此表示担忧，采取各种行动表示反对。

1633年，在里斯本，两个纯洁派信徒感到必须承认，“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看上去像是里斯本的上帝……穷人只以他的名义施舍……在面临危险时只向他求救。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安东尼就是一切：他是他们的北极，而且如布道者所说，缝衣针圣人；假如一位妇女想找她的针，在圣安东尼的帮助下就可以找到”。圣安东尼风行的情况甚至漂洋过海到了对岸，因为一个世纪过后一位法国游客在巴西看到了这种对圣安东尼“奇妙的忠诚”。

实际上，民众的迷信总是可能从内部逐渐侵蚀或损害宗教生活，扭曲这一信仰的根基。当它起到这种作用时，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

当十字架的圣约翰[20]和两个同伴在卡斯蒂利亚的杜尔维洛（Durvelo）安身时，圣特蕾莎[21]曾在此建立了第一所加尔默罗改革派的隐修院。他们打算在这里的漫漫雪野中度过俭朴的修道院生活，但并不是任何隐修意义上的生活。“他们经常光着脚沿着最糟糕的道路到农民那里，向他们传播福音，似乎他们是野蛮人……”这证明——如果这种证明是有必要的话——皈依依然是必要的，即使在基督教国家也是如此。

因而，基督教的工作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一个层面是知识生活，在那里它不得不与对基督教虽不乏好感但还是对手的人做斗争以捍卫自己。另一个层面是群众，其艰辛的生活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也极易于使他们失去宗教感情和朴素的信仰。

·基督教潮起潮落：它取得过成功，也有过衰落和长时期的停滞不前。我们只能粗略地从外部追溯它盛衰的历程，因为作为日常经验的宗教，作为普通人的存在方式，往往依然不为人所知。然而，非常笼统地说，基督教总的演变情况是明确无疑的。

自10世纪到13世纪，基督教在各地都发展得非常迅猛。教堂和隐修院至今依然耸立在那里，在许多情况下充当着见证：整个教会都被一种同时是经济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强有力运动裹挟着向前。欧洲处于活跃状态，充满着生机，迅速向外扩展。随后黑死病降临了，欧洲进入了严重的、灾难性的衰落阶段。在史学家称为“百年战争”（guerre de Cent Ans）的旷日持久的一连串骚动不安和斗争的时期（1337—1453年），

所有一切都遭到了挫折，基督教的进展也是如此。受到影响的远不限于百年战争中的主要交战方，即英国和法国，实际上扩及整个西方。

在15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复兴，它影响到了整个正在回归和平但仍有着严重的忧虑不安的欧洲。自约1450年到约1500年，是吕西安·费弗尔所说的“苦难时期”（temps inquiets）。一些历史学家简单地给它打上“前宗教改革”的标签。但这一名称属于使用不当，因为当时忧虑是普遍存在的，无论如何并不注定会导向“抗议者”（新教徒）和宗教改革的抗议态度。在那些依然效忠于罗马的国家，同样的宗教忧虑情绪导向另一类型的改革，一种天主教改革，多数历史学家称之为“反宗教改革”（Contre-Réforme）。在这里，术语的使用又一次不是特别恰当。

不管情况到底会是怎样，16和17世纪是一个有着炽热的宗教热情、出现了尖锐的精神争端的时期，这些争端之激烈的程度不应让我们吃惊。比如，在圣西朗主教（Saint-Cyran）、波特罗亚尔[22]诸绅士（Messieurs de Port-Royal）、塞维尼侯爵夫人[23]、拉辛和帕斯卡尔的时代，富有活力的詹森教派和较为简单、较为松散但非常注重人类伦理道德的耶稣会士之间的激烈冲突就是这样。

进入了18世纪，在欧洲出现了大倒退。这一次，物质的进步没有起到促进教会事业的作用。物质的进步与一种科学和哲学运动一并产生，这一运动打着进步和理性的旗号，反过来反对教会。

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者

不从与基督教进行对话的含义上加以理解，就无从理解欧洲思想，即便这种对话充满杀气，这种争论非常激烈。这种视角对了解人文主义至关重要，而人文主义是西方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探讨一下词语的问题。“人文主义”一词具有多重含义，模糊不清，除非对其用法和世俗地位马上加以界定，不然就会产生风险。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的表述，是由德国历史学家在19世纪创造出来的（准确地说，是在1808年）。《彼特拉克与人文主义》一书的作者皮埃尔·德·诺亚克（Pierre de Nolhac）“1886年在高等研究院讲座课程中首先使用该词，享有把它正式引进到法国大学官方语言之名”。这

样“人文主义”相对来说是一个出现较晚的术语，对它的解释易于因人而异，随个人的爱好而定。直至那时之前，人们使用的只有“人文主义者”（humanistes）一词，指的是15和16世纪中给自己取了那个名字的范围有限的一群人。

不过“人文主义”并不局限于这些“人文主义者”，并不局限于他们所体现的“意大利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精神”。它包含的意思——除此之外还有多种——非常多，到了现在内涵极其丰富。1930年的一份研究出现了诸如“新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纯粹人文主义”，甚至还有“技术人文主义”和“科学人文主义”之类的说法。现在进行概括考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这证明，假如说该词曾经是一种学术的或技术的说法，那么现在它趋向于通俗化，具有了许多新的含义，因而与生存问题和对生命的关怀联系起来。

在历史研究领域，我们可以找到的说法有：12世纪的人文主义（构成经院哲学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或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文主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文主义（这么表述通常是指其原创性和多重性），甚至“卡尔·马克思或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e Gorki）的人文主义”……对此我们只能感到困惑，除了需要和明显渴望把它们都作为一个语族的问题之外，这一系列“人文主义”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性？

或许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借用奥古斯丁·勒诺代（Augustin Renaudet）的下述说法？这位托斯卡纳和欧洲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所下的广泛定义似乎包括了这一非常普遍的含义：“‘人文主义’一词可以用来指代一种建立在人类高贵品性上的伦理。转用于研究和行动，它承认和超越了人类天才的伟大和其创造力，而反对无生命自然之原始力量。具有本质意义的仍然是，个人通过严格的、有条不紊的纪律发展自己之所有人类机能，以不失任何能够扩展和提升人类的努力。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分开头这么说：‘凭借不间断的努力，达到生存的最高形式。’与此相似，司汤达在1850年1月31日对欧仁·德拉克洛瓦说：‘不要忽略任何能够使你变得伟大的东西。’这么一种建立在人类高贵品性上的伦理道德要求社会做出不断的努力来具体体现人类关系中最高度完满的形式：一种庞大的功绩，一种伟大的文化成就，对人类和世界空前多的了解。它奠定了个人和集体道德的基础；它建立了法律，创建了经济；它引发了一种政治制度；它培育了艺术和文学。”

这一雄辩的定义应当说是足够充分的。不过它没有对那种运动感予以足够有力的强调；在这方面，艾蒂安·吉尔松（d’Étienne Gilson）简短

的定义则反过来夸大了那种运动感：他宣称，文艺复兴本质上属于中世纪，它“没有增加人性，而是削弱了神性”。这一断言是不公正的，过于极端，但它有意无意中确实显示了所有人文主义者思想中天然的趋向、偏好。人文主义解放并夸大了人性，削弱了上帝的作用，如果说没有完全把它忘却的话。

在某种意义上，人文主义也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反对排他性地从属于上帝，反对一种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任何忽略或看上去忽略人性的信条，反对任何会减少人类责任的制度……它是一系列永恒的要求，它是荣誉的一种表现。

约翰·加尔文（Calvin）完全没有这种幻觉。“当我们听人说要依赖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时，我们不是被抬高到一根芦苇的顶端吗？它承受不住我们的重压，马上就会断裂，结果把我们也摔了下来。”加尔文不属于那些首先相信人性的人。

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一个人如果有信仰，他的信仰就必须把其信心建立在人性之上。正是借助于欧洲人文主义的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我们才能够理解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做出的评论：“我的朋友，马克思主义研究了经济学和社会阶层。我的朋友，那非常了不起，但它忘了研究人性。”

·人文主义是朝向逐步解放人的战斗的征程，同时对人类来说，不断关心着它可以变更和改善人类命运的可能性。

它的历史是复杂和间歇不定的，以挫折、逆转，以充斥于欧洲历史各个时期的那些显著的矛盾为标志。

欧洲似乎总是在焦急地寻找着除它已经掌握的办法之外的别的某些解决其问题和困难的办法。因而它几乎是在病态地追求新奇、困难、遭到禁止和通常非常丢脸的东西——在这一方面西方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库。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讲述三个例外但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几乎与它同时的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文主义，以及相当晚的时期之后，即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狂热的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像罗马与罗马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在异教徒的罗马与基督教的罗马之间、在古典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进

行。

它无疑是西方有史以来经历的最富有效果、最持续不断的争论之一。

（A）这是一个与古典历史一起生存，或者说再一次与古典历史一起生存的问题。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结尾那句简短而有决定意义的话经常为人引用："这个国家（指意大利）看上去天生是要复活已死之物的。"但是，如果这些cose morte（已死之物）如此急切地被重新赋予生命，那就证明生活中需要它们，它们是唾手可得的，根本没有死去。

说句实话，异教的罗马从未在西方完全消亡。厄尔斯特·库丘斯（Ernst Curtius）在他在技术上细致入微的研究中向人们表明，晚期罗马帝国的文明具有何等惊人的生命力，西方是如何在闻所未闻的程度上依赖其文学主题、其思想方式、其象征，甚至它的陈词滥调。

对基督教的欧洲来说，接受这种与古代罗马的无所不在的接触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它别无选择，没有其他文明可以借鉴。同样，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就默认了这种共存状态。公元2世纪，圣查斯丁[24]宣称，任何高贵思想，"无论它们源于何处，都是基督教徒的财产"。圣安布罗西[25]说："所有真理，不管其阐释者为哪一位，都来自圣灵。"只有德尔图良[26]这样问道："雅典和耶路撒冷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他的话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不过，虽然古典的遗产进入了西方中世纪的生活、语言和思想习惯，但古典文学和古典诗人、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往往不再激起人们的热情，甚至不再引起人们对知识的兴趣。虽然拉丁语仍然是一门活的语言，但希腊语现在几乎不为人所知。在最优秀的图书馆中，古典作品的手稿上落满了尘土，无人去翻阅它们，被人们遗忘了。人文主义者到处寻找这些文献，重新阅读它们，对它们进行编辑，添加上他们自己的充满激情的评注，借此激起公众对这些作品以及他们此后生活于其中的古典古代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尊崇。

可能没有人表述得比马基雅维利更好的了。他是在其生命的末年，在第二次流放时期，在1513年讲下面一段话的。当时他生活在农民和伐木工人之间……"夜降临了，我回到了住所。我进了图书馆，在穿过入口时，我脱掉了日常穿的沾满污物、泥土的衣服，换上了上朝的礼

服……如此着衣打扮之后，我进入了古人之古朴的庭院。他们热烈地欢迎我，我饱食着生来属于我的美食佳肴。我与他们交谈丝毫不感到不安，并询问了他们行为的动机。他们从其人道出发，耐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以这么一种阅读、这么一种持续的对话为标志。拉伯雷[27]和蒙田[28]就是这种人文主义者；他们充满阅读回忆的著作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在每一位人文主义者身旁，人们都可以认出——带着一种共谋或怨恨的笑容——古人，他们领着他的手，借此向他做出解释或显现于他。现在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王的鹿特丹的伊拉斯谟[29]，在当时被贬损他的人称为“卢奇安”（琉善）。其他“卢奇安信徒”包括拉伯雷和博纳文图拉（Bonaventure des Périers）；马基雅维利则被称为“波利比乌斯”[30]……

（B）为这一广泛的思想潮流确定日期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使用的杜撰的词“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这一术语（该术语是由儒勒·米什莱和雅各布·布克哈特[31]发明的，几乎也可以说是杜撰出来的）彼此伤害。这两个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交叉重叠在一起。

阿维尼翁（Avignon）无疑是人文主义的起点，随之而来的还有文艺复兴。该城随着1337年彼特拉克（Pétrarque）的回返而变得活跃起来。幸亏教皇待在那里，它才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最“欧洲化”和最奢华的城市。即便在教廷于1376年回到罗马之后，敌对一方的教皇仍有能力使它保持其荣华和光泽。然而，正是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在后来充分建立起其“文化霸权”；这一霸权至少延续到1492年洛伦萨（绰号“庄严者”，Laurent le Magnifique）去世，甚至到了1530年该城被克雷芒七世和查理五世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占领之时。

年代上的这一界限，1337年和1530年，肯定也适用于不仅影响意大利而且影响整个西方的大多数现象。最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1467年生于鹿特丹（Rotterdam），1536年死于巴塞尔（Bâle）。

但是，除非把历史之网张得更大一些，把时间追溯到1337年（在任何意义上这都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日期）之前，向后推到1530年之后，否则就无法充分理解这两个漫长的世纪。

之所以把时间向前追溯，是因为由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并不是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样是完全彻底的断裂。文艺复兴并不处在与中世纪

哲学相对的一极，尽管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哲学大加嘲讽。一位历史学家在1942年写道：“50年以前，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区别就像白人和黑人、白昼和黑夜那样明显。此后，一个论点与另一个论点混杂在一起，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不清，以致要区分开它们都需要一个罗盘。”

之所以把时间由1530年或1536年向后推，是因为在伊拉斯谟（他是现今所有持自由主义观念者心目中的英雄）死后，在宗教战争的血雨腥风笼罩下一个世纪及更长的时期，根本就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文艺复兴文明失去了自由，丧失了生命。

宗教战争打乱了文艺复兴的胜利进展，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就文明实体而言，已经延续两个世纪的东西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毁掉的。从长时期来看，人文主义者在某些重要方面取得了胜利。他们在教育领域取得了胜利，以致古希腊罗马文化至今几乎仍是必修课程：我们现在只是开始偏离它。但尤其重要的一点在于，由于有了人文主义者，欧洲从未对人类的能力和才智丧失信心；它们曾得到人文主义者的歌颂，至今仍然是西方生活和思想中最大的灵感之源。

人文主义是“少数高贵人物”的功劳；这些人物圈子相对不大，包括狂热的拉丁语言学家，人数没有那么多但狂热程度丝毫不减的希腊语言学家，以及像制绳者托马斯·普拉特尔[32]（或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33]）那样的希伯来语言学家。但他们的影响绝不限于少数城市，或者像弗朗索瓦一世宫廷的那样金碧辉煌的王宫。人文主义者分散在欧洲各地，通过大量书信互相联系起来［P.S.阿伦（Allen）、H.M.阿伦和H.W.加罗德（Garrod）编辑了伊拉斯谟用拉丁文写的不可思议的信函，竟有八开本十几卷之多］。整个欧洲都受到了人文主义现象的影响：由意大利开始，但也有法国、德意志（不要忘了波希米亚的特殊作用）、匈牙利、波兰、尼德兰、英国……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列举名录，比如在法国设立了“皇家讲师”，实际上，这些多余的教授被弗朗索瓦一世派去教授大学禁止的科目，后来他们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核心。

（C）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不是对基督教的一个打击呢？能不能把它视为朝向无神论或不信宗教的一个运动？或者，应不应当至少把马基雅维利、拉伯雷或者蒙田歌颂为自由思想的名副其实的先驱？

这么做可能就过于根据现在的标准来判断文艺复兴了。它逆转了经院哲学和神学的传统教导，这是确确实实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它喜

爱完全属于异教的古典文学，它的思想趋势是提升人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人文主义反对上帝或者教会。

吕西安·费弗尔对拉伯雷的作品做了详尽、细致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拉伯雷的时代，任何一个人在哲学上持坚定的无神论都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极其困难的。那一时期人们的知识修养很少允许人们产生那种思想：它缺少关键的术语、结论性的论断和不可或缺的科学支持。文艺复兴没有忽略科学研究，但它绝没有赋予它至高无上的地位。

说实在的，除非我们准备一而再再而三地评估那一时代的思想和感情，再现那些遥远岁月中的气氛，一个接一个地重新考察因当时人的攻击或历史学家的激情而得出的过于仓促的无神论指控，否则就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效的结论。在几乎每一个个案中，法官们都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错误和含混不清之处。

洛伦佐·瓦拉[34]所作的对话录《论快乐》（*De Voluptate*，1431年）在当时遭到多方诋毁，实为伊壁鸠鲁派与斯多葛派之间用西塞罗风格的拉丁文进行的一场争论。由于后者在那时之前非常盛行（彼特拉克、萨卢塔托[35]和波焦·布拉乔利尼[36]均置身其中），这一对话试图通过支持伊壁鸠鲁派而略微恢复一下平衡。但在这一纯粹的文学争论的结尾，作者再次登场，重申基督教的超自然秩序。

虚伪！现在人们可能会这么想。但如果我们不承认无神论是在很晚以后在坚实的唯物主义科学形成过程中才出现的，那就是轻率地重新撰写历史。作为一种通则，在16世纪，否认上帝的存在基本上没有进入人们关心、期望或需要的范围。

我们也不要因为马基雅维利批评教士和教会“使我们不信宗教和变成恶魔”，不要因为他谴责基督教“把卑贱和深思默想神圣化起来，把谦恭奉为最高美德……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宗教颂扬的是灵魂之伟大”，而匆匆忙忙地指责他是一名异教徒。说他从他生活的可怕岁月中吸取了教训，说他从政治中把道德伦理——这一做法至今仍有待逆转过来——排除出去，这种指责可能对他来说更为公平……

同样，请允许我们为美第奇的洛伦佐（Laurent de Médicis）创办的学院说几句话。这一学院的基础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它支持柏拉图的理想主义而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可能是想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和基督教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加入该学院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就人性的高贵

做过一个讲演——“De dignitate hominis”（《论人性的高贵》）。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妨碍他在其不长的一生的末年希望去宣讲福音，“手里拿着十字架，光着双脚在城镇和乡村行走”；没有妨碍他穿着第三骑士团多明我会修士的长袍下葬。他的经历不过是成百个类似例证中的一个实例，现在人们称之为“宗教人文主义”。就连蓬波纳齐 [37] 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位明显的无神论者，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仍难以断定。波纳文都拉（Bonaventure des Périers）是一部非常奇怪的著作《打击乐器》（*Cymbalum Mundi* ，1537—1538年）的奇怪的作者，吕西安·费弗尔在1942年出版的一部非常精彩的著作中对其经历做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假如这些对话中的墨丘利（水星）代表的是基督，看起来这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这一次基督受到了攻击，这是无神论的一个标志。我们既不要忽视也不要夸大波纳文都拉著作的重要性，这是那一时期作品中一个非常异乎寻常的例子。

菲利普·莫尼耶（Philippe Monnier）是一位专门研究15世纪（Quattrocento，欧洲文艺复兴的初期）佛罗伦萨的热心的历史学家，他宣称人文主义者着迷于古人的声望威名，“拷贝他们，模仿他们，重复他们，采用他们的模式、他们的例子、他们的神祇、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语言”，而“这么一种运动，在逻辑上发展到顶点，其倾向无异于消除基督教现象”。按照我们的逻辑，可能是这样。不过按照15和16世纪人们的逻辑，可能不是如此。社会学家亚历山大·罗斯托（Alexander Rüstow）这样写道：“寻找这么一种敌对，然后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对教会的胜利……认为这一成就是完全彻底的，而且正在教会内部发生，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罗马没有作为文艺复兴的一个繁荣的中心而向前发展吗？教皇不是这一运动的始作俑者吗？正是亚历山大六世处决了人文主义者在佛罗伦萨的敌人萨沃纳罗拉 [38] ，1498年5月20日把他烧死。另外，在人们的心中得到了复活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其精神是宽容。不管他们是否相信，希腊哲学家参加上帝的盛宴和祭祀上帝。他们为什么会攻击一个对他们表现出如此少的敌意的教会呢？下面一句正是出自伊拉斯谟之口：‘圣苏格拉底，为我们祈祷吧！’”

（D）与现实生活本身相比，在思想领域，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基督教的距离要短得多了。

可以把这称为一种文化而不是哲学的背叛。其氛围是活生生的享乐，品味着耳目、心灵和肉体等方面多重的快乐，就好像西方正从长达数百年的斋戒期中崛起一样。

文艺复兴为社会学提供了证据，提供了有关娱乐心理的证明。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少有像现在这样强有力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幸福时刻的时候。“中世纪的Memento mori（死亡压力）现在为Memento vivere（生存压力）所取代。”15世纪后期对死亡的深思和死神舞蹈（danses macabres）像中了魔法似的神奇地消失了，似乎西方在精神上与有关死亡的沉思分割开来（partagé，用米歇尔·福柯使用该词的含义），也就是说割断了自己与此的联系。这一变化可以从后来出现的许多Artes moriendi（关于如何有意义地死去的小册子）中追溯出来：死亡越来越不再是达到更美好生活、达到真实生活的一种平静的天国之旅，它变成了一种尘世的死亡，带有肉体腐败的所有可能的迹象——这是人的死亡，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最大的考验。再也不会有人自愿地像圣奥古斯丁那样说：“我们是人间渴求死亡的旅客。”但与此同时，没有人会相信“此生与其说是生不如说是死，是一种地狱”。人生重新有了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人们正是在现世要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一新的悔悟为“现代文化中”所有“积极力量”——“思想自由、不相信权威、知识教育胜过出身［用15世纪的话来说，就是教养（humanitas）的概念胜过了名望（nobilitas）］，对科学的兴趣，以及个人的解放……”（尼采语）——的产生涂上了重重一笔。

人文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了各种思想的这一新的发酵。菲奇诺[39]曾这样宣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黄金时代。”1517年，伊拉斯谟讲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话：“我们必须祝这个世纪好运：它将是一个黄金时代。”乌尔里希·冯·胡滕[40]在其1518年10月28日致纽伦堡人文主义者威利巴德·皮克海默（Willibad Pirkheimer）的著名信函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啊！什么样的文学！能够活着该是多么的幸运！”我们没有胆量再把拉伯雷杜撰的泰雷姆修道院的例子补充进来，因为它太有名了……虽然如此！

没有人会否认，这一对人性之广泛而各异的潜能的深刻认识为近代时期的所有革命，包括无神论，早早地铺平了道路。但人文主义者把其精力完全放在了组建他们自己的王国上，而无暇对上帝之国提出疑问。

自16世纪前期起，文艺复兴的动力和兴奋劲开始受到遏制。“忧郁的人”逐渐充斥了西方舞台。就像所有欢乐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像所有遭受幸运垂青的伟大时期，不管是真的还是想象的，就像亚历山大里亚辉煌的世纪，就像奥古斯都的世纪，就像启蒙运动时期那样，文艺复

兴的完美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新教人文主义。这是15—16世纪之间汹涌澎湃的宗教改革这股滔天洪水的发源地。至关重要的一个日子是1517年10月31日，该日马丁·路德把其《九十五条论纲》贴到了威腾堡宫廷相邻的教堂（Schlosskirche）的大门上。

伴随着宗教改革而来的是宗教战争骇人听闻的过度行为。战争开始于路德去世那一年，即1546年，一个多世纪后方告结束。与此同时，它们扩展到了其他国家；在每一个地方，它们留下的都是大片的灰烬。姗姗来迟、多多少少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妥协性协议达成了：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1598年的南特敕令，1609年的波希米亚敕令。但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同，宗教改革很快变成了一种群众现象，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为了捍卫他们的信念，不得不面对内战和遭到残酷镇压（就像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尼德兰，或者1685年南特敕令被取消后及塞文山区骚动时期的法国）。可以做出的另一种选择是流亡，目的地是新大陆，或者是某个按照“Cujus regio，ejus religio”（谁执政，就以谁的宗教信仰为官方信仰）的随机原则选择他们所信宗教的国家。

所有这些暴力行为在18世纪，甚至更早一些时候，都烟消云散了。新教继续存在下去；现在西方世界相当多的地区信奉它，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德意志和北欧各国，同时存在的还有其具有自己特色的人文主义。然而，弄清新教的准确含义并非易事，因为新教教派不仅仅有一个，而是有许多，每一个都表达了不同民族的不同观点。尽管如此，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家族，尤其是在它们与其邻居即信奉天主教的西方相对比时。

此处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宗教改革本身，而是它留给现代欧洲的遗产。因而我们不打算在传统的新教改革史上耗费时间。假如必要，在埃米尔·列奥纳德（d’Émile Léonard）提供的有益的提要中，那种历史是可以研究的。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两种类型的新教——两股“长”波——相继涌现。一个为马丁·路德（1483—1546年）狂热的活动所主导，另一个由富有思想、专断的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充当领导。他们俩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路德是一位来自德意志东部边远地区的农民，在其质朴的精神反叛中存在着某种直截了当、强烈和天然的东西——尼采称之为“精神上的农民习性”（Bauerstand des Geistes）。他谴责

教会的弊端、荒谬和混乱；通过把一应万物捆绑在因信称义（“人仅仅因其信仰而得到拯救”）上而消除了不确定性；满足于自发的、情感的观点而不试图使之变为过分注重细节——这就是年轻的路德明确而得意的话语。这种话语浪漫而具有革命性。“上帝不会再容忍这一切了。”他叫喊道，“我们不是生活在昨日的世界上，那时人们像猎物一样被猎捕和看管。”确实，路德不可能永远坚持这种惹恼了有钱财、有势力者的观点。1525年，他不得不使自己与易北河、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农民保持距离，这些农民部分地在他的教导的激励下举行了起义。

不过他一直处在与约翰·加尔文相对的另一极，后者是位城市居民，是位冷静的知识分子，一位耐心的、不知厌倦的组织者，一位必须总是按其逻辑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律师。路德把命定论视为天显的真理，加尔文则把这当作数学公式，由此推导出结果来。如果选民总是预先注定会得救，那么统治其他人不是他们的天职吗？这是加尔文1536—1538年和1541—1564年在日内瓦时得出的逻辑结论，当时他在那里实行强有力的控制，但乞灵于谦卑行为。在清教革命严厉无情的日子，奥里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英伦三岛就是这么做的。


新
教
东 正 教
天 主 教

图16 欧洲的三个基督教教派

这就是新教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不同的地点占据主导地位，但双方有一些共同的观点：与罗马和与圣人崇拜决裂，废除正式的教士，把圣礼由七个减少为两个（圣餐和洗礼），尽管在圣餐方面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

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为了简单起见可以称为新教反常的或边缘的形式，比如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变种（苏黎世的茨温利 [41] ，巴塞尔的奥科兰帕迪乌斯 [42]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或遭到严重迫害的“虔信派”新教。

天主教与新教世界的分野至今仍然是欧洲文明的一个看得见的特征。它仅仅是因战争而确定下来的吗？

就像树干中一圈一圈的年轮，欧洲的成长分为不同的层次。它最古老的年轮——树的核心部分——是指罗马帝国征服的部分，在一个方向，向西和向北远届莱茵河和多瑙河，在另一个方向到了不列颠群岛（尽管它在这里的统治并不稳固，而且统治的不是全部而只是部分地区，主要是东南部）。

在这些界线之外，欧洲文明是后来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出现的：在这里，白木质是新生的，而且薄。中世纪的欧洲向周边地区殖民（按该词最好的含义），向那里派遣传教团并兴建教堂。遥远的罗马在那里建立的修道院和主教管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罗马帝国的这一旧的边界，这条介于古代欧洲和新的、刚刚“被殖民的欧洲”之间的界线，从广义上说与区分天主教世界与新教世界的界线相同，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当然，宗教改革有其纯粹宗教方面的因素：它是整个欧洲都明显可见的宗教之日益高涨的浪潮的结果，这种浪潮让信仰宗教的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教会的弊端和混乱，认识到过于注重细枝末节、过于关注仪式而不是真正的虔敬的崇拜的局限性。这些情感对作为整体的基督教王国来说是很常见的。但旧的欧洲无疑更附着于使之如此紧密地与罗马保持联系的宗教传统之上，它保持了那种关联；而新的欧洲更为年轻，更为复杂，与宗教教阶制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因而彻底决裂出去。人们在此已经可以感觉得到某种类似民族反应的东西。

两个世界后来的发展经常为可以称为宗派荣誉的东西提供营养。新教的美德被认为对资本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兴起，也就是说现代世界的兴起，起了促进作用。但从经济史和通史这一背景来考察，可以对新教和天主教相对的地位做出更理性的解释。

事实上，从新教中难以看出使它在思想知识上优于——或者逊色于——天主教的成分。

与此相反，它肯定无疑地影响了欧洲文化，对它做出了它自己的新的、原创性的贡献。

要想弄清这是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必须把16世纪好斗的早期新教与18世纪已取得胜利的、成为官方宗教的新教区分开来。

打着自由和反叛的大旗起事的宗教改革，不久就变得与它所指责的敌人同等程度地不妥协。它建立了一个与中世纪教会同样严格刻板的结构，“其中万事万物都臣属于源自天启的精神价值——国家、社会、教育、科学、经济和法律——并受到这一天平的衡量”。在天平的顶端是“书”，即《圣经》，以及v作为其阐释者——新教教会和国家。后者（可以是王公，也可以是城市）享受旧有的“jus episcopale”主（教管辖权）。

毋庸赘言，这一体系绝没有带来人们最初为之奋斗的宗教自由。秩序、严格和铁腕：这些是早期新教教会的口号，无论在巴塞尔还是在苏黎世都是如此。宗教改革家可以是伊拉斯谟的追随者，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淹死可怕的再浸礼派教徒。尼德兰出现了类似的屠杀事件。这看上去自相矛盾。“惟教皇是听者”会追捕、吊死、屠杀或淹死那些否认圣三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或圣子的神性的不幸者，而在同时攻击教会、国家和富人——如果说这绝不仁慈，至少合乎某种逻辑。但宗教改革出于什么原因施加同样的迫害呢？一个例子是“tragoedia serveta”（塞维图斯的悲剧）。米歇尔·塞维图斯[43]是一位信奉新教的西班牙外科医生，一天，在走出教堂时他被逮捕了。他被指控犯有泛神论和否认圣三位一体论，遭到拷打，被长期以来就让人监视他的加尔文下令烧死。1554年，一位“萨伏伊”（savoyard）人文主义者和倡导自由主义改革的人，即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翁（Sébastien Castellion，1515—1563年），向他此前曾服侍和钟爱的日内瓦统治者[44]递交了一份动人的愤愤不平的小册子，就烧死塞维图斯一事提出抗议。他之所以愤愤不平，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热切地感受到作为胜利者的宗教改革者的错误

和罪行。他写道："几乎没有一个教派不把其他教派视为异端；其结果是，如果你在这一个城市或地区被认为是正确的，到了另一个城市或地区就会被认为是异端。现在，一个人如果想生存下去，那么世上有多少个城市和教派，他就必须信奉多少个宗教——恰如一个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旅行，必须每天兑换钱币，因为这里有效的，到了别的地方就变得毫无价值。"至于卡斯特利翁本人，他立志继续信守对圣书（《圣经》）的自由解释。"至于再浸礼派信徒，"他说，"应由他们根据他们对上帝话语的感悟、理解或写作来做出决定。"

卡斯特利翁的声音依然得不到响应。他死于贫困交加之中，身旁围着少数忠实的追随者。但在17世纪，在严格的加尔文派教徒与阿米尼乌斯派（Arminiens）或索齐尼派（Sociniens）持不同意见者发生争执的时期，他的著作在阿姆斯特丹重印再版，其中一部取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书名——"萨伏伊之灯"。事实上，萨伏伊人卡斯特利翁成为新教最终走的新道路的先行者之一。

后来新教赞成信仰自由。随着来自天主教和精力旺盛的反宗教改革之强大压力的衰落，死抠教条的苛刻行为可能逐渐减少了，尤其是在18世纪。

但是，新教也以与启蒙运动同样的精神，并主要在科学进步的影响下，自觉地朝着信仰自由迈进。历史永远是这样，把原因与结果细分开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通过回归其精神本原和对《圣经》的自由研究，新教是否帮助欧洲走向了心灵的更大独立？或者说，新教自身的演变是不是欧洲总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演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种可能性或许是混杂在一起的，相互产生了影响。

不可否认，与其天主教对手不同，新教与这一伟大的自由主义世纪相符合。但也必须承认，具有天主教传统和训练的那些国家，比如法国，在那一演变过程中也起了领导作用。

不管怎样，现在新教倾向于对《圣经》的自由研究、对《圣经》文献的历史批评和某种自然神论理性主义。通过这类举措，它消除了自己内部的纷争，而这是问题之所在。在此之前一直被作为嫌疑犯遭到摒弃的各边缘教派——英国的清教徒（Puritains）、德意志和尼德兰的再浸礼派教徒（Anabaptistes）——现在兴盛起来，信徒人数甚至成倍地增加。以摩门教（Mennonistes）之名在英国兴盛起来的再浸礼派教徒到了美国，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成为

美国一个很有势力的新教教派。17世纪末，那里重新出现了——16世纪“受神灵启示者”的后代——自称“公谊会”的集团，人们更普遍地称之为贵格会[45]。1681年，贵格会教徒威廉·佩恩（William Pen）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在德意志，随着菲利普·雅克·斯彭内尔（Philippe Jacques Spener）的虔信运动，出现了类似的高涨浪潮。斯彭内尔是一位牧师，受到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保护，后者后来在1701年成为普鲁士的第一任国王，即弗里德里希一世。斯彭内尔还参与创建了非常有影响的哈雷（Halle）大学（1681年）。到了18世纪中叶，德意志整个信奉路德宗的地区都被他的信徒搅动起来。但这些运动，在力度上没有一个可以与英国的卫斯理兄弟[46]和乔治·怀特菲尔德[47]的卫斯理会（Méthodisme）相比拟。

在这里，与其罗列这些成功的宗教教派，更有意义的不如说是展现新教自由的思想是如何在一场不再从属于任何严格的神学的宗教运动中兴盛起来的。“神学不再等同于宗教，”一位名叫费迪南·布易松（Ferdinand Buisson）的新教大学教师在1914年这样写道，“人们应当绕过这一问题以让别人可以忍受。”

从本质上来说，这正是现今新教与天主教社会有别的一个标志。新教永远是单独一人面对上帝。顺带说一下，他可以构造出他自己的宗教并维持它，同时继续与宗教世界保持联系，使两者协调起来。不仅如此，他可以从世上各种教派中毫不费劲地选择一个能够解决他个人问题的宗派。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不同的宗派都是与不同的社会集团或阶级相联系的。

结果，新教社会没有受到构成现代天主教社会一个标志的世俗与虔信分裂这一问题的困扰。在后一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精神上有某一信仰及与教会决裂之间做出抉择，因为教会是这样一种共同体，人们要么属于它，要么不属于它，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就此而言，在天主教中，精神冲突是公开的：人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因而，行为和态度上的一系列不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之间画出了一条难以觉察而又无法克服的界线。

·受革命影响的人文主义。欧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革命的欧洲。它的所有历史都证实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它一直是、而且仍然是无休无止的反革命的欧洲。

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又一次不是一系列革命运动本身，而

是它们对未来的影响——我们应称之为受革命影响的人文主义。我们使用这一不为人熟悉的术语，意思是说大革命的人文内涵和知识“遗产”。其他人更愿意把它称为“革命的神秘气氛”或“革命精神”。

当然，我们上面说的是法国大革命，它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唯一在欧洲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

（A）革命运动与大革命。

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总是被称为——至少在法国是这样——“革命”（la Révolution），意指它是第一个和唯一的革命。在此之前，在气氛紧张、难以驾驭和不愿忍受最恶劣的状况的欧洲，出现过众多革命运动。但历史学家并不太情愿把它们称作“革命”。

举个例子来说，他们很少把“革命”之名用在上文提到的14—17世纪之间在欧洲各地爆发的众多农民起义上。而且，通常是在某种特别的含义上才使用“革命”一词，比如说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412年真正获得自由的瑞士各州，1648年最终获胜的尼德兰联合省，1774—1782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即早期的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及1810—1824年西属美洲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个词还被用以描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v瑞典、挪威和丹麦——的诞生，它们或者通过和平手段，或者通过武力斗争，赢得了自己的独立。所有这些无疑都是针对现代国家的反应，但它们仍然更是针对外国人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微差别。

一场“真正”的革命总是针对一个现代国家的：这是核心所在。而且它总是来自内部，意在国家自身的改革。1789年之前，在欧洲（如果我们对天主教联盟和弗隆德运动 [48] 不加考虑的话）只有英国的两次革命配得上“革命”之词——第一次涉及一场激烈的内战（1640—1658年），第二次是和平性质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但从内部推翻了西方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响。在1789—1815年，它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来说，关于它的记忆获得了一种强有力象征的价值，被每一代人视作新鲜之物，总是能够激起新的情感。

那一象征的力量至今仍然非常强大。1958年在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旅行时，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非常吃惊地发现，当苏联同事说起“革命”时，他们指的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这位历史学家1935年

在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时，对阿尔贝·马蒂耶（Albert Mathiez）的话做出回应，指出国民公会中所谓的“巨人”大都仅仅是些凡人，其中一些非常平庸。他的巴西学生马上做出了反应，好像受到了亵渎，其中一位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正盼着法国大革命呢！”

因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活在世界各地人的心中，即便在它作为一个神话可能为其他革命，比如说俄国十月革命所替代时仍然如此。在法国，俄国革命与当时的具体现实密切相关，倾向于完全控制工会和革命舆论。但是，甚至到了相当晚近的时候，1789年激起的热情只有那些记得阿尔丰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死于1928年）索邦演讲所激起的巨大喧哗和激动，记得到这里来听阿尔贝·马蒂耶（死于1932年）或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死于1960年）演讲时的渴望之情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大革命在欧洲人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的残留影响了他们的论辩和态度，即便他们对大革命持敌对态度也是如此。

（B）共有两个、三个或四个法国大革命。大革命就像现在的多级火箭，包括前后相继的数次爆炸和推进。

初看起来，法国大革命像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的革命”，尽管涉及某些戏剧性插曲（比如攻陷巴士底狱和大恐怖）。第一次法国大革命进展得十分迅速，包括前后相继的四个阶段：贵族起义（1788年的贵族会议）；资产阶级起义，或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律师”的起义（国民会议）；而后是城市革命和农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二次革命是一场剧烈的革命，始于1792年4月20日向奥地利宣战之后。“正是1792年的战争把法国革命领上了歧路。”阿尔丰斯·奥拉尔这样写道。确实如此，热马普（Jemmapes）战役后法国对荷兰的占领致使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我们也应当承认，大革命通过把法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早在自卫军联盟上台表演之前），证实并展现了它的力量，并为后来的几次爆发做了准备。革命的第二阶段在国内如同在国外一样激烈，以1794年7月27—28日（革命二年热月9—10日）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倒台告终。

第三次革命（但我们还应当称之为革命吗？）始于热月，结束于雾月（自1794年7月28日到1799年11月9—10日），包括国民公会最后几个月及整个督政府（Directoire）时期。第四次革命包括执政府（Consulat）、帝国和百日王朝时期（1799—1815年）。

拿破仑无疑在继续推行革命。他使之稳定下来，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在其广阔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中又添加了他个人事业的极度不牢靠和一个非法政权的脆弱性；为此他不得不为自己正名，办法是接连不断的胜利。

弗朗西斯二世皇帝在奥斯特利茨遭到失败后，他在其忠实臣属的欢呼声中对法国大使说："先生，你认为你的主人如果像我这样输掉如此重要的一个战役，在巴黎会受到欢迎吗？"

这种妙语可与一位法国保王党人为拿破仑的胜利所发出的感叹相比拟。他这样说："真遗憾，他不属于波旁家族！"

（C）假如法国大革命按其本意进行，它会类似于"开明专制主义"。

在这一起伏不定的历史中，只有革命的第二阶段涉及激烈的暴力：这是在无意中偏离了常规。

人们常常这样说，假如大革命没有被淹没在1792年春天的洪水中，那么它就会像众多法国思想家希望的那样，按英国模式成为一个几乎和平的、温和的革命。这些思想家中有一位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他在《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1721年）中这样写道："对现行法律，只能小心翼翼地触摸。"另一位是卢梭，他认为一个古国经不起革命的动荡。他宣称："一旦打开它的羁绊，它就会散架，不复存在。"

大革命的开始阶段看来反映了这一思想，寻求的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改革。一位坚定的国王应能维持或恢复现状。但无论米拉波（Mirabeau）还是巴纳夫（Barnave）的建议都无法使路易十六疏远在他周围团团转的特权贵族，这些贵族使国王成为他自己宫廷的囚徒。这一古老的争论真的应当复活吗？

明智的政治解决方法遭到拒斥，这并不是第一次。自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开始（当时，1776年，他解除了杜尔哥的职务），启蒙改革家的计划一直遇到障碍。同样顽固的反应在开明专制主义（despotisme éclairé）的欧洲各地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都相信，他们现在要做的只是说服王公或国王，一旦他成为"哲学家"，一切都会变好起来。但启蒙运动时期的君主偏爱的是不彻底的折中办法。即便是把普鲁

士贵族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édéricⅡ），他执行的政策也非常有节制，以致1787年他去世后贵族在普鲁士广泛复活。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失败的地方，又怎么能够指望路易十六取得胜利呢？最后，路易十六向国外寻求援助，采取了熟练的反革命和欧洲保守主义的阴谋。在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下，革命朝着与其倡导者本意不同的道路走去。

他们承认这一点："革命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发展而成的。"［卡诺（Carnot）语］"事件的压力可能把我们导向了与本意不符的结果。"［圣鞠斯特（Saint-Just）语］革命沿着这条出人意料的道路走了仅仅几个月，既有损于自己，也有损于别人；随后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开启了反革命之路，生活的乐趣重新恢复了。"巴黎又一次变得生动活泼，"米什莱写道，"热月过去几天后，一个仍然活着、当时仅10岁的孩子被父母领着去了剧场。在外出的路上，他对他过去从未见过的一长排的漂亮马车非常眼热。一位身着仆人制服、手拿帽子的人向外出的人招呼道：'先生（mon maître），您需要马车吗？'这个男孩对这种新的说话方式几乎听不懂。那人解释给他听，说只是在罗伯斯庇尔去世后才带来了这种明显的变化。"

不过，米什莱在其《法国大革命史》（1853年）中，将法国大革命结束于热月10日，这么做正确吗？从逻辑上讲，这是不正确的。一旦热月的反动结束，法国又回到了"第一次"革命的温和道路上来，督政府和执政府把其基本的成就保存了下来。它们放弃的是恐怖主义的国民公会的做法。

不管怎样，在国外，没有人相信大革命已经结束。1797年9月12日，俄罗斯驻伦敦大使致函其政府（用法语）："在巴黎发生的情况……可能是：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专制的三头逮捕了2位督政官和64位两委员会成员。这些人将被发配到马达加斯加。法国精妙的宪法和其了不起的自由就是这种样子！我宁愿住在摩洛哥，也不愿生活在这么一个可疑的平等和自由之地。"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积怨？并不是法国以外的所有人都以嘲讽的口吻提到法国"了不起的自由"。拿破仑正是在大革命的名义下进行其征服活动的；而且在他建立统治的所有地方，法律、习惯和情感都受到了深刻影响，尽管占领也激起了仇恨或敌视。歌德和黑格尔就对拿破仑表示支持。面对远远落后于法国所达到的政治和社会阶段的反动的欧洲，他们把他视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黑格尔语）。

拿破仑战争本为法国的内战，现在扩展到了欧洲。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所有那些受到拿破仑威胁的国家来说，大革命既是一种现实，又是一种威胁。作为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受到如此理解的大革命的话语，不管是令人羡慕还是遭到憎恨，都在西方取得了强有力的进展，激起了人们的热情，分化了舆论。最后，带着其色彩强烈的场景、其圣徒和殉难者、其教训及其未能实现却永远复活的强烈愿望，大革命几乎像《圣经》似的瞩望着20世纪。

（D）法国大革命的话语。

确实，就其所有外在表现而言，大革命在1815年后陷入沉寂状态。然而，它活在人们的心中和思想之中，同时其主要成就得到了保持。

复辟并没有恢复所有被大革命废除的社会特权（当然也没有恢复旧的封建权利）。国家财产没有归还给原主；即使财产分配并不平均——财产经常到了富人手中，但大革命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得到了保护——同样，人权原则得到了1814年宪章的确保。当查理十世的政府看来准备采取反动措施时，马上就遭到了强烈抗议，随后出现的是七月王朝，法国重新回到了三色旗下。革命的语言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出现了。

早在1828年，两个格拉古[49]的同道，弗朗索瓦·巴贝夫[50]和菲利普·比奥纳罗蒂（Philippe Buonarotti）在其《为平等而密谋，又称巴贝夫密谋》（*Histoire de la conspiration pour l ’ Égalité,dite de Babeuf* ）一书中描述了“平等派”如何策划了某种“平民的旺代”（plebeian Vencdée），他们如何失败和遭到处决——尽管他本人为了逃脱处决而于1797年3月26日刺伤了自己。这是一场“共产主义”运动或公社运动，忠实于卢梭的格言：“如果你忘记了土地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忘记了其果实属于所有人，那么你就会迷失方向。”这一榜样和这部书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事后看来没有人不喜欢的不知悔改的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51]就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比奥纳罗蒂的著作。

这一例子有助于表明为什么即使到了现在，大革命总是多多少少地讲述着每一代人都想听的话语。自1875年起，大革命在第二帝国时期明显地黯然失色了，但其符号象征继续构成第三共和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思想基础。

革命人文主义在本质上相信的是，暴力如果用于捍卫法律、平等、社会正义或人们钟爱的祖国，就是合法的。革命家可能是其发起者，也

可能是其受难者，因为“走上街头”就像取得最终胜利那样，也同样意味着会在那里死去，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抗议。但胆敢拥抱暴力——胆敢去死或去杀人——只有在它是扭转命运的唯一手段、使命运变得更人道和友爱的情况下才可以为人接受。一句话，大革命意味着为了某一个理想而采用暴力。反革命产生于同样的根源。用历史术语来说，它的失败在于它向后看，试图倒退。而回到过去只有在歪曲事情本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只能取得一时的成功。从长期来看，没有一个行动能够持久和经受得住历史的重压，除非它沿着历史方向前进，跟上历史的步伐，而不是徒劳无益地试图让它减速。

不管情况到底如何，引人注目的是1789年后至20世纪仍对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产生激励作用。首先是由于大革命最初的本意及其结果，一直是以审慎为准则。随后，其充满了奇迹和半神半人或“巨人”的英雄传奇，被部分地抹去，因客观主义史学家辨明真相的非神话努力而失去了光泽。在这方面再也没有比左派付出的努力更有效的了，他们急于从文献中为其革命狂热找到实实在在的根据。就这样，大革命失去了它的许多圣徒。但与此同时，它的话语变得更加清晰了。

事实上，历史修正主义修复了“红色的”大恐慌时期，辨明了它所受痛苦和所造成痛苦的重要性，并以辨明为借口，弄清了局势的悲剧性方面。自此起，“廉洁正直的”罗伯斯庇尔和迟到的英雄格拉古·巴贝夫与丹东和“胜利的组织者”卡诺相比占了上风。正是他们的语言，一种强有力的语言，传到了我们这里，因为它预测了将来会发生的事。全民普选，教会和国家分离，规定对财富进行某种再分配的风月法令（décretde Ventôse），所有这些在“第二次”革命时取得的、热月事变后遭到废除的为时短暂的成就，都是有先见之明的实例。在某些情况下，在我们的时代复活它们用了非常长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好处。

无论如何，1789年的革命人文主义能够至今犹存，应感谢他们。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表现出的迟疑不决和保留态度，尤其是在最近面对共产主义（及其不同的革命理想和不同的革命形式）时，都是一些征兆，表明某些靠回忆和某些关键词语活着的左翼意识，不愿把自己的革命与马克思或后来苏联的革命等同起来。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在1905年让·饶勒斯在与盖德签订“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联盟的协议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的批评。在其《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一书的开头，饶勒斯宣称它应“一会儿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一会儿是米什莱的神秘主义”，即忠实于米什莱的“革命神秘主义”，大革命活的遗

产。只是晚至那时，而且非常不完全，法国和其他地区的西方文明才设法让自己与1789年的遗产和理想保持距离。

19世纪之前的科学思想

18世纪之前科学思想在欧洲的发展引发了一个现代科学的婴儿期，即前科学（其含义与人们所说的工业革命之前的“前工业”相同）的问题。

这里不打算概述科学的演变过程，甚至也不想明确前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界限。问题不在于发现科学如何发展，而在于科学为什么发展，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的含义上。正如化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明确无疑地指出的那样，“欧洲创造的不是仅仅一门科学，而是世界科学”。另外它几乎是单独完成这一点的。

那么，为什么科学没有在更早的文明中，比如说中国文明或伊斯兰文明中产生？

·所有科学方法都是在某种世界观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果没有可供确定某人的立场、随后选择其方向的一整套的基准点，就不会有任何进步，不会有任何推理，不会有任何富有成果的假说。不同的世界观彼此相继的方式为研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背景。

如果从某一距离来看，各门科学（以及科学）的历史，就像是从一种总体的理性解释到另一种总体的理性解释的极其缓慢的演变过程，每一种这样的解释都被视为一种考虑到了现在所能掌握的所有科学资料的理论，直到这一无所不包的理论由于新的与它产生激烈冲突的资料的出现而发生爆炸。这样另一种假说不得不尽可能完善地进行汇总、整理。这反过来成为新的进步的起点。

自13世纪起，西方的科学仅仅承认三种总体的解释或者说世界体系：一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它虽然非常古老，但在13世纪进入西方的阐释和推想之中；一是笛卡儿和牛顿的体系，它奠定了古典科学，除自阿基米德（Archimède）的著作中借来一些重要概念外，完全是西方的创造；最后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于1905年公布，宣告了现代科学的问世。

对世界的这些广泛的阐释支配了科学，但当然从未完全把它封装起

来。它们的权势地位造成了复杂的问题，其最终的解体也是如此。一旦它们不再与事实相符，这通常预示着真正进步的来临，是科学总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遗产，源自公元前4世纪的逍遥派（亚里士多德派弟子）。其教导的核心内容进入西方的时间要晚得多，是通过阿拉伯人在托莱多（Tolède）的翻译，并加上了阿维罗伊的评注。在巴黎，这意味着一次名副其实的革命。1215年，巴黎大学的教学大纲做了彻头彻尾的改变，形式逻辑取代了对拉丁文学（尤其是拉丁诗人）的学习。“哲学在侵入，并废除了一切。”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作充斥各地，形形色色的注疏层出不穷。在这之后出现了旧派和新派之间非常尖锐的争论。在那一时代的一首诗歌（写于1250年左右）中，哲学家对诗人说：“我把自己献给了知识，你却醉心于幼稚之物，诸如散文、韵律和格律。这些东西有何用？你知道语法，却对科学和逻辑学一无所知。你为何如此盛气凌人，难道你仅仅是个蠢货？”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世界体系一直统治欧洲至17世纪，甚至到了18世纪，因为它并没有在哥白尼（Copernic）、开普勒（Kepler）和伽利略（Galilée）的攻击面前马上屈服。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说当然完全过时了。但它是一种虽然没有经过数学运算却经过精心构思的理论。它既不是对常识所做的简单的文字延伸，也不是孩子气的臆想。它是一种信条，尽管天然地以常识中的发现为基础，却经过了系统的精心构思，风格极其严格，条理非常一致。”［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语］毋庸置疑，亚里士多德声称，存在着一个“cosmos”（宇宙），而且只有一个宇宙，并把这作为一个公理。但爱因斯坦与此有什么不同呢？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曾这样问爱因斯坦：“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自然的统一？”他回答道：“这是一种信念。”［保罗·瓦莱里：《固定观念》（*L’Idée fixe*），第141页］爱因斯坦在别的地方也说过：“我不相信上帝会与宇宙赌博。”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世界统一体是一种“秩序”：在那里每一个存在都有自己的自然轨迹（lieu naturel），并永久地在原地静止不动。这就是地球在宇宙中心及其相继的球体所处的固定的位置。然而，宇宙受到了各种各样运动的扰乱。有些是天然的，如一个重的物体坠落地面，或一个轻的物体——如火或烟——升向天空，抑或星辰或不如说天体的环形运动。另一方面，某些运动是激烈的和反常的，是通过推或拉赋予物体

的：推拉力量中止时，运动就会停下来。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例外：一个物体被投掷出去，即一个抛物体，此时物体的运动是不正常的，但它不再依靠驱动力——它既未被推，也未被拉。因而抛物体必定受到它所穿过的气流旋转的推动。这一解决办法解救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体系，但这也正是所有批评它的人进行攻击的弱点。

他们不停地在问："a quo moveantur projecta？"（抛物体运动如何解决？）这一疑问引发了众多问题，包括惯性和重物体下落时的加速度。14世纪巴黎的"唯名论者"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其中包括奥康姆的威廉[52]、让·比里当[53]和尼古拉·奥勒姆[54]。奥勒姆是一位数学天才，他发现了惯性法则，发现了物体下落的速度与下落的时间成正比，诸如此类。但他的思想并没有马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遵循。

亚里士多德的体系被牛顿的古典物理学和科学推翻所引发的实验和争论的历史，叙述起来总的说来非常迷人，而且非常漫长。

欧洲各地互相有所接触的杰出人士造成了"大跃进"。到了现在，科学变得国际化了：它超越了政治和语言的障碍，占领了整个西方。这一进步，无疑也得益于16世纪经济的高涨，同样也得益于因印刷术而成为可能的古希腊科学著作的广为传播。比如，阿基米德的著作，在非常晚的时候，到了16世纪末期才为人所知。他的思想富有成果：他提出了非常有用的数限的思想，预示了微分和积分。为了充分理解这一思想的价值，我们可以想想圆周率π的计算。

但进步极为缓慢。如科学史家所列举的那样，在数学方面共有五次大的进步，其间有着长长的间隔：皮埃尔·德·费马（1629年）和勒内·笛卡儿（1637年）的解析几何，费马的高等数学（约1630—1665年），组合解释（1654年），伽利略（1591—1612年）和牛顿（1666—1684年）的力学，以及牛顿的万有引力（1666年和1684—1687年）。

并不仅仅只有数学领域如此。在范围广泛的天文学领域，尽管希腊人自己曾短暂地提出过太阳中心论的概念，但自托勒密那里承继下来的地球中心说顽固地拒绝变化，恢复哥白尼（1473—1543年）和开普勒（1571—1630年）的清白费时甚久。

超越于上述所有努力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一种新的世界模式的确立：笛卡儿，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有牛顿，他们的抽象的、几何化的宇宙，其中的万物皆仰赖一个原则，即万有引力，借此物体根据其质量之

比和彼此之间距离的反比互相吸引（1687年）。

世界的这一画面同样黏着性很强。它历经19世纪的所有科学革命的考验而存在下来，直到一种新的有关世界的神奇的解释——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905年）和广义相对论——问世。任何在1939年之前完成学业的人在精神上仍会生活在牛顿宇宙论的明晰和绝对之中。

·笛卡儿，“一个自由人”。

那一几何化的或机械化的宇宙不是我们前面所引或能够引述的任一学者单一的创造。不是屈从于被误置的民族主义，我们仍要特别关注勒内·笛卡儿（1596—1650年），给他理应得到的关注。

我们必须从一个插曲讲起。笛卡儿之所以为传记作家抓不住，是因为他用心周远，十分谨慎地躲避他人，具有一种自我克制的品性。1628年之后，除几次出访外，他一直生活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在荷兰。他于斯德哥尔摩去世，当时是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座上客。在度过了一生中大半时间的阿姆斯特丹，他乐于让自己消失在芸芸众生之中，“永不为任何一个人认出”。要重构他的思想，重现其思想运行的轨迹，就像探究其不为人知的生活那样困难。

他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 ，1637年）易于让我们对他的看法简单化。我们一直被诱导着只注意其绝对的规则——而它实际上是三部著作的序言：《屈光学》（*Dioptrique* ）、《流星》（*Les Météores* ）以及非常著名的《几何学》（*Géométrie* ）；而且，它们彼此不是孤立存在的。此外，《方法论》在某些方面是《准则》（*Regulae* ）的简写版、压缩版，后者在笛卡儿死后才正式出版。《准则》是不是像看上去那样写于1629年前后，1637年又一次进行这一工作，并从中提炼出《方法论》？或者，作为一种替代，《方法论》的前四篇训导像《方法论》中明确说的那样，完成于1619—1620年那个著名的冬天？那样一来，《准则》就是《方法论》的一个后来完成的、篇幅更长的、更为复杂的版本。事实是，这两部书的思想风格不同。严格、克制的《几何学》与笛卡儿在《书信集》中展示给我们的更丰富、更有创造力的数学形成了对比，在后者中他似乎受到了“批评他的人的挑战”的刺激，为他们所激怒。

因而，必定依然存在着众多的疑问，但它们绝不可能改变这一整体的重要性。从笛卡儿那里我们得到了对知识的第一个系统的、现代意义

上的批评性赞扬，看到了第一次与所有知识的或形而上学的虚妄、所有产生于“诗歌的直觉”的错误的英勇斗争。

在科学层面上，仅仅几句话是不够的，哪怕我们把对其著作的研究局限于有关未来和残存到我们现今的那些方面，而把他显然不具有革命性的物理学和光学抛开，集中精力于其几何学上——据他自己的看法，他在其方法中运用的最好的一个学科就是它。

笛卡儿不无困难地使自己避开了希腊人的“几何现实主义”。他的数学引入了纯粹抽象。“空间，不应强加以现实主义的思想方式，而是由一个相互关联的组织组成的。”在这方面笛卡儿比其先辈——尤其是他认识的弗朗索瓦·维埃塔（François Vieta），以及他应当认识的卡瓦列里（Buonaventura Cavalieri）——走得更远；他这么说，就“大踏步地”推进了“方程式理论。至于数学领域更进一步的发展，则要等到伽罗瓦（Evariste Galois）之时”。

现在，一个学生刚刚开始学习这一课程就能够理解笛卡儿的数学。这一事实不应使我们产生错觉，由此看不到笛卡儿所获得成就的重要性。就这样，与一个方程式“真的”（肯定的）和“假的”（否定的）根基一起，他唤起了其“纯粹想象的”根基。就这样，尽管没有把它们准确地确定下来，他的论证的含义在于坐标的轴线（互相垂直或不是）。就这样，他分解了，或者说提前组合了一个由某些二项式数字组成的函数，这些二项式的形式是些简单的相乘的方程式，如（x-1）（x+4）（x-7）等等。

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认为笛卡儿既活在他的信念中，也活在其理性中。他树起了一道屏障，抵挡16世纪自然主义的寓言、近似值、前逻辑学思想、定性物理学，并抗拒文艺复兴时期所有那些“理性主义者”，他们从大自然中看到的只是“一个神奇宝盒，或者刺激人做梦的东西”。

·1780—1820年这一转折年代引发了最后一个问题：迈过导向真正现代科学的门槛。

尽管18世纪辉煌无比，但在现代科学领域未保持同样的水平，没有掌握它的态度、它的语言和它的方法。

加斯东·巴舍拉尔（Gaston Bachelard）最精彩的著作之一《科学精

神的形成》（1935年出版）向人们展现了这一点。它试图枚举科学家经历的困难与棘手问题：尽管不无困难，这些科学家试图使自己免受通常偏见的左右，免受某些其力量和重压在现今看来令人吃惊的前逻辑的心智的束缚。对18世纪科学精神所做的这种分析显然仅仅集中在它较阴暗的方面，集中在它的错误、偏差和荒谬之处。但荒谬不是永远与科学思想的进展相伴吗？就其与明天的科学的关联而言，我们有可能受到它的伤害吗？

18世纪妨碍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可能是科学分化为各不相同的若干部门，彼此独立，互不关联。一些科学部门发展得非常迅速，如数学、化学、热力学、天文学和经济学（如果可以把它算作一门科学的话）。另一些则落在了后面，有时则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如医学和生物学……在那时，不同的学科依然是各不相同的。数学语言尚未得到普遍使用，而且——这一缺失同样严重——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是时断时续、时冷时热的。

这些困难逐渐得到了解决。在法国，直到约1820—1826年，法兰西科学院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卓越的学者聚会场所：安培[55]、拉普拉斯[56]、勒让德[57]、毕奥[58]、普安索（Poinsot）、柯西[59]……"［路易·德·布罗伊（Louis de Broglie）语］新的基础才开始破土兴建。在整个欧洲都出现了类似的辉煌。

严格地说，为什么这个门槛能够迈过，打造出一个当时（但只有当时）肯定无疑地被其动力裹挟着前进的文明的科学未来？

对此有一个明显的唯物主义的解释。18世纪在经济方面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进步影响了整个世界，欧洲则成为其支配力量。物质和技术的条件增加了它们的要求和它们的限制。一点一点地，一种合作的反应出现了。下一章的主题即工业化就这样成了决定性因素，成为变化的发动机。这相当于用另一个明显属于西方的现象——工业化——去解释另一个西方的现象——科学。这两者看上去彼此呼应，肯定是并肩前进的。这正是上文所引李约瑟文章中喜欢加以强调的。在西方之前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已以优雅和先进的形式掌握了科学的基本原理。但她没有达到决定性的阶段，因为她从未出现激励欧洲向前的经济动力，即那种资本主义张力，它在赛跑的最后，或者在赛跑过程中，使欧洲能够迈过具有决定意义的门槛。那种激励，随着中世纪大型商业城市的产生，尤其是自16世纪起，早就为人感受到了。

整个欧洲的力量，物质和精神的力量，合在一起造就了这一发展，这是在一个文明充分成熟并充分认识到它所担负的责任时采摘下来的文明的果实。

第十八章 欧洲的工业化

欧洲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把它那已向外扩展、至今仍在扩展的工业革命，带到世界各地。这一令人目瞪口呆的技术进步是欧洲自身的成就，而且是文明史上较为晚近的一项成就，因为它仅仅发生在两个世纪之前。

在那时之前，尽管欧洲有种种卓尔不凡的方面，但就物质而言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么说不是出于与它周围世界的对比，而是出于与欧洲不久就要突变而成的样子的对比。

那么，当时欧洲是如何成功地越过这一工业门槛的？它的文明是如何对它自身的成就所带来的结果做出反应的？

这些问题是马上就会引发出来的。

对它们的兴趣具有现实意义：

（A）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欧洲实现工业化之前的状况。这种经济上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在世界上许多试图超越这一阶段的地区仍居主导地位。

（B）工业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在任何地方都不是靠单一过程完成的。某些部门长期落在后面，我们只以一个国家即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为例吧，约克郡的羊毛业或伯明翰周围的五金制品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如此。在今天，这种对比是所有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的范式，比如说，在南美，对比非常明显。

（C）欧洲的例子证明，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任何着力使自身工业化的国家同时必须正视这么一个现实，即社会结构的变化，如果它想避免出现革命的意识形态长时期酝酿的状况的话——这

些意识形态曾深深地影响了欧洲，给它带来了各种痛苦。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

总共出现了四次前后相继的工业革命，后三次中的每一次都建立在前一次革命的成就之上。这四次革命分别是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内燃机革命和核能革命。

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尽可能严密地考察这一系列革命是如何开始的。那就意味着需要审视英国在1780—1890年的领先位置。它为什么能够第一个实现工业化？这是如何发生的？另外，1780年之前，欧洲在工业方面总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在18世纪之前，甚至在19世纪之前，“工业”一词有给人留下错误印象的危险。在那个时候，至多只有可以称为“前工业”的东西。

真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可以说发生在12世纪，当时风磨和水磨在整个欧洲得到了使用。但在那之后，在将近七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任何重大的技术创新。甚至在18世纪，前工业利用的只是中世纪的资源和能源形式。水磨的能量通常为5马力。至于风磨，在像荷兰这类风力比较大的地区，有时会超过10马力，但这种能量时断时续。没有充足的能源和大马力的机器，尽管有那么多小型的、通常非常精巧的技术革新，工业生活注定只能处于半静止的状态。这种工业被一种古朴的经济制度困住而不得动弹：低得可怜的农业生产力，费用甚高而原始的运输系统，以及很不充足的市场。只有劳动力是超充足的。

而且，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都是不存在的。当地的艺匠在离自己家很近的地方工作，通常仅能满足邻近居民基本的需要。只是在少数地区才有一些为更广大的市场而生产，或者专门生产奢侈品的作坊。在法国，这类作坊包括17世纪以来的某些“皇家”制造厂。类似的例子在最新的纺织工业中不胜枚举。英国工业革命实际上正是从这一领域开始的。

事实上，在一个依然保持传统特性的工匠世界中，纺织业比其他行业都更有可能进行相对来说较大规模的生产。在16和17世纪，甚至早到13世纪，意大利和佛兰德的纺织城市中，“负责派活”（qui faciunt laborare）的富裕商人鼓励在城镇中建立非常大的组织——一些大的工场和某些零售渠道。“师傅”（通常是带着两三个徒弟的一般的挣工资者）在家里工作，在城外的农民和从事同一行当的人中这种情况也非常

普遍。

16世纪的一份文献描述说，靠织布致富的塞戈维亚（Ségovie，卡斯蒂利亚）商人“充当真正的家长，在自己的家中和外面支持一大帮人，不少情况下有二三百人，借此雇用其他人手生产各种各样最精美的布匹”。

公元1700年左右，在拉伐尔（Laval），活跃的纺织工业在城里和郊区共有大约5000名工人（连同家人在内，总数约为2万）。“他们中的最富裕者拥有的财产不到100法郎。”另有500名师傅织工，他们从粗麻布商那里购买纺纱拿回家加工。“这些粗麻布商被称为‘cancers’，因为他们把不幸的织工剥削得一干二净。”在他们之上有30位批发商，他们是这一行业的真正组织者：他们漂白未加工的亚麻，把它们送到遥远的市场。

这些商人实业家代表了一位类型学历史学家所说的“商业或商人资本主义”：他们供应原材料，支付工资，储存货物，并出售它们，通常是长途跋涉出口它们，并通常用这些款项购买其他有利可图的产品。

由于旅行速度极为缓慢，这些商业交易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在15世纪，羊毛在西班牙漂洗，送到佛罗伦萨加工，随后作为细布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出售，反过来从东方买来货物，在佛罗伦萨或欧洲其他地方销售——这一整个过程用时三年或更长的时间。因而这一活动尽管可以获利，却是一种长期的事儿。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用一大笔资本，而且并非没有风险。商人实业者控制了整个系统，因为只有他有资金进行此活动——通常是与其他人联手，以分摊风险。他既担负责任，也享受获得的利润。

·制造业：回想起来，这个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明确定义的词，似乎非常切合工人在工头的监督下集中在同一幢建筑物（或者彼此接近的建筑物）中劳动的情景。

在18世纪，这一做法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在工场中出现了某种劳动分工。1761年出版的《百科全书》把里昂工厂的优势归结为它们雇用了大量工人（城里有3万名丝织工人），这样一来“一个工人只做一件事，而且他终生就做这件事，其他人则做别的事；因而每一个人都能很好地迅速完成分配给他们的工作”。

然而，这一组织是作为一个例外列举出来的。一般的劳动并没有分工，甚至在工业革命最早的迹象就要出现时仍然是惯常的样子。

·因此，前工业的欧洲既没有企业主，也没有资本；它并非对市场的需求，包括对国际市场的需求，置若罔闻。在许多地方，它已部分地动员大量劳动力，随时准备为企业主服务。

然而，就像现今世界上的较不发达的国家，它罹受经济组织不良之苦。农业部门尤其虚弱，不能提供任何经济高潮充分发展的条件。市场出口不足；竞争非常残酷，最轻微的危机都会把一切毁掉。工业家和商人破产的情况屡屡发生，人们已司空见惯。18世纪中期的一份经商指南提醒人们注意制造业中“时尚”的危险：“在外省我们发现了制造业工场倒闭的种种迹象；每一年它们中的一家都会关门停业，其他工场冒了出来，不久则又轮到它们倒闭了。”

事实上，前工业是在非常低的工资条件下残存下去的。在因为繁荣最终致使工资可以上升的某些地区工人的处境有所改善吗？非常荒谬的是，他们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在外国竞争的残酷环境下，凡提高工人工资的，工业都完蛋了，至少状况非常糟糕。17世纪的威尼斯和18世纪的荷兰，情况就是这样……

1777年，皮卡第（Picardie）行政长官注意到：现在，工人需要两倍的钱才能生存下去，但他们挣到的并不比50年前多，而那时食物的价格是现在的一半；这样他们拥有的仅为他们所需的一半。

·没有技术革新，任何变化都不会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但我们马上就应当承认，这种革新本身并不能决定一切。从英国这一特例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在那里，技术创新在两个关键性的行业出现了——纺织业（主要是它）以及采矿业。创新引起的反响、回应并不一定总是非常迅速，但它们在历经漫长的路程后才进入经济的其他领域。

英国的矿井，尤其是科尼什的锡矿，已开采了很长时间，开采面也越来越深。它们不断受到渗水的影响。这是一个老问题了：16世纪时阿格里科拉[60]在其论文《矿物学》（*De re metallica* ）中就已注意到渗水问题。但当时使用的水轮车产生的能量能够带动足够强大的水泵或数排水泵吗？为了创造一种真空状态，它们利用了气压，且不能超过其势能

（每一次，它们都产生了一股约10米高的理论水柱）。

对大功率水泵的开发研究工作最终致使大而笨重、非常昂贵的蒸汽机的问世，它是由托马斯·纽科门[61]在1712年发明出来的。在修理这种蒸汽机时，来自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年）完成了一个重大发现，由此他设计出他自己的廉价得多且更有效能的机器。瓦特的蒸汽机最早是在1776年设计出来的。因而蒸汽在瓦特之前就已为人们使用了：自18世纪初叶起，它就在驱动机器；新近的研究证明，它们使用的程度远比人们过去认为的要普遍。到了1750年前后，在法国靠近瓦朗谢讷（Valenciennes）的安赞（Anzin）煤矿，这类蒸汽机仍在使用。更引人注目的成就——第一辆汽车以及伯尼奥（Beugnot）和茹弗鲁瓦（Jouffroy）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船——在1770年前后分别问世。

然而，在19世纪中叶和铁路问世之前，纺织工业一直都是主要的驱动力量。它带动了所有其他行业，既是基本必需品的生产者，又是奢侈品的供应者。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纺织工业的兴衰决定了西方整个物质的历史。首先出现的是亚麻时代（查理大帝穿的是某种类似粗帆布的东西），随后是羊毛的时代，再后是18世纪棉花的时代——或者说人们为棉花而发狂。正是由于有了棉花，最早的真正的工厂出现了。棉织品与印度、非洲和美洲的贸易联系在一起，与黑奴贩卖活动有所关联，棉纺织业在诸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大型殖民口岸或其周围建立起来。它得益于这些口岸的能源和它们聚集的资本。毫无疑问，这些广泛传播的工业要求甚至开启了技术改造活动。

新的机器出现了，它们每一次都有一个绰号：1733年是约翰·凯伊（John Kay）的飞梭，1767年是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进行改良的多轴纺纱机（珍妮纺纱机，Spinning-Jenny），1769年是理查德·阿卜赖特爵士（Sir Richard Harkwright）的水力纺纱厂（水床），1799年是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ampton）的骡机（走锭细纱机）。这些成就的顶点，尽管出现于法国，值得一提的还有约瑟夫·马里·雅卡尔（Joseph Marie Jacquard）1800年发明、1801年首次展出的改良织布机。

这里拟提供第一种解释：经济的突飞猛进鼓励了某一特别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技术对此要求做出了回应。这一切都是自发产生的，以经验

为根据。

·技术对科学提出了要求，后者自然而然地迅速做出了回答。Homosapiens（智人）从现在开始与homofaber（能工巧匠）联起手来，他们协力向前进。

18世纪科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总的说来，它限于深思熟虑的理论层次上，与技术无法协调配套起来，后者仍处于工匠的阶段，很少向它提出任何问题。

到了17世纪末，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工业本身向纯科学而不仅仅是技术——手工和手艺的学问——提出了要求。

例如，令人称羡的詹姆斯·瓦特并不只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工匠：他有一副科学头脑，对工程和化学非常精通。约翰·布莱克（John Black）是一位职业科学家，1728年出生于波尔多一个苏格兰家庭，曾任爱丁堡大学的化学教授，在强碱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799年去世。可能正是他提出了瓦特蒸汽机所依据的潜热原则：他用一个外罩护住圆筒，让它保持温热，通过这种做法利用了蒸汽的膨胀力，而在那时之前，蒸汽进入冰冷的圆筒凝结成水，被白白浪费掉了。

科学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成百上千个类似的贡献。其中一个与漂白亚麻相关。传统的做法是把布摊在地上，用水浇湿，用各种办法浸泡，首先用碱，然后是不很浓的酸。这需要很大的场地，费时也长，有时甚至要六个月。对一个迅速发展的工业部门来说，这是一个限制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因为这道被称为“用弱酸处理”的工艺使用的弱酸是脱脂乳，而这种材料在当时尚未进行工业层面的生产。一种改良办法是用稀释得很淡的硫酸，它很快就会产生作用。不过这种东西必须大量生产。正是在这一方面，一位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名叫约翰·怀特（John White）的医生，做出了特别的贡献。怀特原为莱登大学的学生。1774年，瑞典人卡尔·谢勒（Carl Scheele）发现了氯，法国人克洛德·路易·贝托莱（Claude Louis Berthollet）用它漂白织物，英国开发出一种实际使用它的方法；凡此种种都使这一工艺臻于完美。这显然是国际性科学努力的结果。

谈到科学与技术的合作，可能没有一个例子会比马休·博尔顿（Mathew Boulton，1728—1809年）的经历更形象、更能说明问题了。作为一个出生于现代的人（一位“新人”），他是一位务实而有创造力的

工业家：他资助了詹姆斯·瓦特的工作。但他本人也是一位科学家，非常热心地致力于化学研究。他交往的圈子不仅包括瓦特，而且包括一位医生和数学家威廉·斯莫尔（William Small），医生和诗人埃拉斯穆斯·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弗兰西斯·哥尔登的外祖父），以及其他许多人。工业的英国正变成科学的英国，尤其是拥有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资本的英国。伦敦是商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它在非常长的时间里仍然置身于这些新奇玩意儿之外，只是在大约1820年才恢复它在英国科学生活中的地位。单单这一事实就很值得注意。正是工业的发展迫使科学做出行动的。

但是，这么一种解释足够了吗？在法国，应用科学无疑领先于英国：我们只要想想像马凯（P.J.Macquer，1718—1784年）、克洛德·路易·贝托莱这样的化学家就够了。那么为什么法国工业发展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英国呢？显然，事实在于工业革命也产生于其他原因。某些（最为重要）是经济方面的，其他的是社会方面的。

·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做出广泛的考察是最好的解释。

许久之前，由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实现了政治稳定。它的社会向资本主义开放：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创办。英国的经济得益于在许多对全民有利的项目上的投资，比如兴修道路和运河：在18世纪英国甚至出现了“运河热”。

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作为18世纪普遍经济高潮的一部分而爆发的，后来它影响到整个世界。

不过，假如没有18世纪英国人口的飞速增长——增长率达到了64%——工业革命有可能发生吗？类似的人口增长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如此。但是在法国，增长率只有大约35%。对英国来说，人口增长的结果是廉价劳动力异常充足。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由英国农业的变化扮演的。圈地和新的科学方法缓解了食物生产不足这一经年的束缚和压力。

英国的工业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次出现于棉花工业，时间在1780—1830年；第二次出现于钢铁生产。后者涉及的是重工业，它因铁路的修建而成为可能，但它得到了前一次革命所获利润的资助。棉花起了开路作用；要对工业革命如何开始做出任何判断，必须回到棉花上来。

棉织品时尚波及了当时的整个欧洲，英国也是其中之一。英国人长期以来为自己和欧洲的其他市场进口印染棉花制品，这些制品来自他们在印度的贸易据点，在法国叫作“indiennes”[62]（指原产印度的印花棉布），这些织物的流行致使英国制造业主竞相模仿。在技术进步的刺激下，棉纺织业规模越来越大。非洲沿海对棉纺织品的需求很大。（在那里，奴隶被称为“一件”，按古葡萄牙语的表述方式为“uma peça d’India”，意思是指他被用来交换的印花棉布。）另一个大市场是巴西，这一市场1808年由英国人开发出来，并由他们垄断；两年后，他们在整个西属美洲复制了类似程序。后来，英国棉制品在英国本土直接与印度棉制品进行了竞争，完全击败了其印度对手。英国人还把其产品输出到地中海。1820—1860年，英国棉纺织品在世界其余地区的销售量持续上升。其棉纺厂使用的原棉数量由1760年的200万磅，剧增到1850年的不下3.66亿磅！

这一空前巨大的成功产生了许多反响。以急剧增长的棉织品为依托，英国各种各样的货物在世界市场上泛滥开来；通过这种方式，它把其他国家排挤出去。它那富于侵略性的政府一有必要就乐于诉诸战争，为其工业保留了这一看上去似乎不知边际的庞大领地。

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向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这种强势地位发起挑战，因为随着产量上升而来的（后来这成为一种通则）是价格有了惊人的下降。（1800—1850年这半个世纪中，棉制品的价格下降了五分之四，小麦和其他食物的价格也大致下降了三分之一。）

工资多多少少保持稳定，但由于机器大大节省了人力，人力对物价的影响大大降低了。毫不令人奇怪，人类历史上的这第一次大生产大大改善了人的命运。在讨论1842年法国的棉花危机时，米什莱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

冶金工业是在很晚之后才开始有大发展的。在这一领域，直到19世纪，生产完全依赖战争。一位英国人在1831年写道：“在18世纪，铸铁就意味着铸炮。”但英国除舰船外几乎没有什么炮：与它相关的陆地战争相对说来寥寥无几。实际上，在18世纪，英国生产铁的数量少于俄国或法国，而且经常从瑞典或俄国进口。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发现是17世纪的焦炼法。但这种技术未得到广泛应用，在很长时间里仍然是用木炭熔铸铁块。

1830—1840年间铁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它们需要大量消耗铁、铸

铁和钢。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英国都着手修建铁路。与此同时，铁甲蒸汽船的出现把英国造船业转变成为一门规模庞大的重工业。随着它的出现，棉纺织业不再是英国经济生活中的关键部门。

工业现象在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的扩展

在欧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工业现象在不同的时代、略有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虽然如此，历史从总的说来每一次似乎都在重复自身，尽管涉及的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经济条件和不同的文明。事实上，经济学家会说，仅就其经济要素而言，每一次工业革命都遵循着同样的相当简单的“模式”。

·共有三个阶段：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WaltW.Rostow）在1952年提出的一个假说。对这种说法尽管可以提出异议，但它肯定可以使讨论变得清晰。

（A）起飞。

在一开始，关键的时刻是起飞（take off）：恰如飞机沿跑道加速滑行、而后起飞那样，一个就要扩展的经济脱离牵制它的经济旧制度，非常急剧地崛起。通常而言，起飞是在一个经济部门、至多两个经济部门进行的。在英国和新英格兰（“美国”起飞的特例），这个部门是棉纺业；在法国、德国、加拿大、俄国和美国，是铁路；在瑞典，是建筑材料和铁矿……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关键的部门迅速冲到前面，快速地实现了现代化：其技术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速度恰好就是使这一现象区别于以前的工业发展的地方。以前的工业发展既缺少爆发力，也缺少长时间的持久力。由此奔驰在前的工业部门增加了自己的产量，对其技术进行改良，组织市场销售，进而刺激了经济领域其他部门的发展。

在那之后，充当发动机的那一关键部门在其续航高度安定下来：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时，它帮助积聚下来的资本储备转到了另一个工业部门，往往是与第一个部门相关联的部门。现在轮到这一部门起飞、实现现代化和达到理想高度了。

（B）随着这一过程由一个部门扩展到另一个部门，整个经济体系达到了工业化的成熟状态。

在西欧，在铁路（也就是说铁、煤和重工业）事业起飞之后，下面

轮到的是钢、现代造船业、化工、电力和机床。在相当晚的时间之后，俄国走了同样的道路。在瑞典，至关重要的角色是由木浆（用于造纸）、木材和铁扮演的。总的说来，正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达到了成熟状态。1850年前后把它们抛在后面的英国，现在发现它自己与其同伴多多少少处在同一个层面上。

到那一时刻，这些经验丰富、收支相当平衡的经济此前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收入，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充足，因而不再把工业发展视为首要的目标。那么现在它们如何指导其权力和可能的投资呢？在面临选择——因为选择是有可能的——时，各个工业社会做出的反应不尽相同。它们不同的回应反映了到此时为止它们所历经的历史的性质，这部分地决定了它们的未来。它们有意无意地基于其不同文明的本性做出选择，了解到这一点是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

（C）进行选择的时机。事实上，选择出来的东西应当是一种与其整个社会相合的生活类型。

可供选择的方面很多。一个国家可能集中精力进行审慎的社会立法，把全体国民的安定、幸福和闲暇娱乐视为首要的选择。一个国家可能认定，幸福有赖于普遍的大众消费，有充足的食物，有可供绝大多数人享有的高水平的服务。最后，一个国家也可能利用其社会或国家比较强大的力量，去进行主宰世界政坛这一通常不会有成果但任何时候都很危险的事业。

到了世纪之交，1900年左右，美利坚合众国发育成熟：时间不长但有重要意义的是，它在那时尝试玩弄权力政治，具体表现形式为1898年与西班牙进行的争夺古巴和菲律宾群岛的战争。我们似应把这看成是一种有意识的姿态，因为西奥多·罗斯福在那时这样写道："美国需要一场战争"，它必须去想着"某种超出物质收益的东西"。几年过后，美国进行了一种缩手缩脚且非常短命的尝试，追求一种进步的社会政策。但在这一尝试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之后，美国全身心地投入了大众消费这一选择，汽车、建筑和家用小装置兴盛起来……

在西欧，选择的时机因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建的需要而延迟。笼统地说，大众消费在1950年后显露头角，但在强大的社会主义传统的压力下，政府政策对此施加了种种限制和更改。比如，在法国，这些限制包括自免费教育到"社会担保"的医疗组织的一系列社会立法。进而言之，一些部门由于环境的力量或由于迟迟不愿意放弃传统的方式而完全

落在了后面。就举一个例子吧，农业革命，美国式的农业革命，在欧洲大陆遇到了不计其数的障碍。苏联在这一方面不断遇到的问题是广为人知的；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也非常复杂，这两个国家至今仍未能完全实现其农业的现代化。

最后，并非所有地区同样地参与了这一过程。正如美国南部在1900年后的很长时期里依然落后那样，欧洲的大片地区落在了后面。这些地区包括法国西南部和西部、意大利的南部地区（mezzogiorno）、除工业中心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之外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除苏联本身、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巴尔干其余各国以及土耳其……

简言之，一直存在着两个欧洲，用1929年一位记者的话来说，一个是汽车的欧洲，一个是马车的欧洲。

要想从成千上万的表征中找出一个，我们只需走到克拉科夫（Cracovie）附近，那里的道路上走的是装着木材和成群鸭鹅的四轮运货马车，车把式坐在上面，这些马车的数量比汽车还要多。不过猛然间我们看到了新胡塔（Nova Huta）庞大的设施，这一冶金工业城市是由社会主义波兰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这种强烈的对比仍是欧洲生活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信贷、金融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一场信贷革命伴随着工业革命而爆发，并充分享受到工业革命成功的好处。

某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是一直存在的，古巴比伦就是一个证明，那里有银行家、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和各种各样的信贷工具，比如汇票、期票、支票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历史“从汉谟拉比（Hammourabi）一直延伸到洛克菲勒”。

但在16和17世纪，信贷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仍非常有限。18世纪时信贷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到那时，如果仅就与印度和东印度公司或者与中国的贸易——这一贸易促进了广州的发展——而言，已经出现了一种国际资本主义，涉及欧洲大多数贸易中心。然而当时这类真正的金融家自己很少关心贸易或工业：他们经营公共资金，为国家服务。

随着工业化的成功，银行业和金融业迅速发展起来。它们甚至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在工业资本主义身旁，一种金融资本主义占了上风，或

早或晚控制了制约经济生活的所有杠杆。

在法国和英国，它们的优势地位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清晰可见。旧有的和新兴的银行不断扩大自己的网络，出现了专业化分工，形成了储蓄银行、信贷银行和商业银行，诸如此类。要想研究银行业现代化的过程，在法国，比如说追溯一下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的历史，在美国追溯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或者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银行国际网络的历史，是会非常有用的。在每一个地方，银行都成功地吸引了大批客户，吸引了“所有有储蓄头脑的公众”；它们寻求并占有“所有未得到利用的或无益的储蓄”，不论这些储蓄数量多么小。“股票”狂热开始了。工业、铁路和船运公司逐渐都被卷入这一复杂的银行网络，而金融资本主义的交易活动马上就变成国际性的了。法国银行越来越听任自己受到外国借贷的诱惑。就这样法国储蓄者走上了向俄国放贷的危险道路。不过向外国的这些放贷一度是法国经济中一项重要的财源。一项有利的支付平衡抵消了贸易平衡中的亏空。1850年以后，法国银行还向欧洲许多地区及欧洲以外的地方进行了基础投资。

现在，在欧洲，金融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尽管这一主题在理论上总是会引起争论，尽管仍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例外情况。因而，像巴黎和低地国家银行这样的一家商业银行仍然是一股很大的势力，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苏黎世和米兰依然是至关重要的金融中心。但——尽管人们已对国家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限制公共消费（部分地通过私有化）——国家资本主已成为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在国家控制有所增加的那些经济中的“国有化”部门，国家本身成为工业家和银行家。甚至在其他领域，国家的作用在19世纪以来也有了巨大增长。税收增加了，再加上公共资金投资，比如（使用法国的术语）邮政支票（chèques postaux）、储蓄银行（caissesd’épargnes）、国库券（bons du trésor）[63]，都使政府掌握了数额巨大的金钱。在工业基础设施方面，政府是进行投资的大家长，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增长政策，不可能有有效的社会规划项目，一句话，就不可能有未来。

每一年，为了确保哪怕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进步，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要投资出去。投资刺激了一系列经济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是其最初的好几倍。如果仅仅就确定一致行动的目标和结果而言，国家看上去越来越需要对其经济发展做出计划。苏联著名的五年计划在世界各

地都得到了效仿。1962年1月，约翰·F.肯尼迪总统实际上为美国贸易宣布了一个五年计划！法国自己特有的五年计划（1961年）在过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形式不同，它们既是经济上的一份资产负债表，也是国家内心的反省。它们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它们所说的“培训政策”帮助落后地区实现起飞。

·回过头来看一看工业革命及其反响，我们既不能忽略也不能夸大殖民主义的推动力量。这并没有赋予欧洲在世界上居于中心的、起主要作用的地位，但可能恰好帮助它维持这一地位。

所谓“殖民主义”——这是另一个会引起争论的词——我们指的是整个欧洲的扩张，在时间上至少是自1492年以来。

不可否认，扩张有利于欧洲。它使欧洲有机会得到新的土地，安置其多余的人口，而在附近，是那些他们不会不去剥削的富裕的、有利可图的文明。这一剥削过程的主要里程碑有：16世纪，来自美洲的“金银财宝”（金锭和银锭），普拉西战役（1757年6月23日，在此战役中英军击败了孟加拉的王公）之后英国野蛮地打开了印度的大门，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强迫中国开放其市场，以及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瓜分非洲。

结果是，在欧洲，在伊比利亚半岛、低地国家和不列颠群岛建立了大型贸易公司，它们合在一起大大加强了那些帮助它们实现了工业化进程的某些资本主义网络。欧洲从海外这些遥远的地区得到了大量剩余产品。

而且这些剩余产品发挥了作用。在海外如此成功的英国第一个实现了“起飞”，这不是偶然和巧合。现在仍有待确定，工业革命是不是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后来通过确认欧洲的优先地位和特权而巩固了殖民主义，让欧洲得益。然而无疑，法国工业的发展与它在塞内加尔的存在，或它在阿尔及利亚（1830年）、交趾支那（1858—1867年）、东京和安南（1883年）殖民地位的建立，是没有联系的。

同样值得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殖民主义的人文和道德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罪过与责任并不完全是单一的。殖民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种类型的殖民主义史已经成为过去——书页翻了过去。

社会主义与工业化

西方值得表扬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不遗余力地试图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的和人文主义的方法，以对工业化带来的许多艰难困苦做出回应。它创造出了我们可称之为“社会人文主义”的东西，假如说我们在上文尚未过度使用这一非常方便的词汇的话。

寻求适宜的解决办法，这一求索过程贯穿于整个19世纪——这是一个既悲哀也富于戏剧性而又以天才辈出为标志的时代。说它令人悲哀，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丑陋；说它富于戏剧性，是指持续不断的动荡起伏和战争；说它天才辈出，这既表现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上，同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表现在社会事务上。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结论都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在19世纪逝去很长时期之后，一系列冷静的社会立法，尽管在现在看来仍有加以改进的余地，却被旨在让人民大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消除其革命要求的法律规定尊为神圣。

这一复杂的、不尽完善的成就并不是自动地或轻而易举地产生于从精神和现实两方面所做的不带情感的分析。这是经过非常坚决的斗争才取得的；在西方，这一成就的取得至少经过了三个阶段。（后文我们将专门论述俄国和美国这两个特例。）

（A）第一个阶段是革命和意识形态的阶段，即社会改革家或“预言者”（他们的敌人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的阶段，始于1815年，结束于1871年，即自波拿巴·拿破仑倒台到巴黎公社成立这段时期。该时期真正的转折点可能是1848年，即革命层出不穷的那一年。

（B）第二个阶段是好斗的有组织劳工（工会和政治党派）的阶段。它实际上始于巴黎遭到围困之前，但主要集中在1871—1914年。

（C）第三个阶段是政治或政府阶段。它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9—1929年之后，国家开始采取社会措施；1945—1950年直至现在，借助于社会更大的富足，它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措施。

这一年代框架表明，面对工业化，随着物质繁荣程度的不同，劳动人民抗议和要求的方向及调子经常改变。在经济艰辛困难的岁月（1817—1851年，1873—1896年，1929—1939年），它们表现得非常激烈；在

经济发展的时期（比如1851—1873年，或者1945年以来），则缓和得多了。一位历史学家在讨论德国的这种摇摆不定时宣称：“在1830年，‘无产者’（prolétariat）一词尚不为人所知；到1955年，该词差不多已经过时。”

在我们谈论的三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它只涉及社会思想）可能最为重要，因为它代表着整整一个文明的转折点。

·统而言之，自1815年到1848年和1871年，在思想、尖锐分析和预言方面的这一伟大运动把人们的思想意识由政治转移到社会上来。

自那时起，国家不再是人民要求针对的目标：现在，必须去理解、医治和改善的正是社会本身。

新的规划的出台，引发了新的语言。伴随着诸如“工业的”与“工业家”，“工业社会”和“工业公司”，“无产者”和“大众”，“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等词，革命的意识形态找到了新的词语。

发明“industriel”（源自旧有的“工业”一词）这一名词和形容词，无疑还有“工业社会”（société industrielle）这一词组的，正是圣西门伯爵（Comte de Saint-Simon），后者为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和其他许多人牢牢抓住，大量使用。就孔德而言，“工业社会”这一表述指的是作为军事社会（société militaire）替代品的那么一种社会；而（在他看来）军事社会是到那时为止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如果说军事社会是好战的社会，那么，他认为，工业社会应当是和平的社会——赫伯特·斯宾塞则正确地拒绝做出这种断言。“无产者”一词被收入1828年版的法兰西学院词典。“大众”（masse），作为单数，尤其是作为复数，变成了关键词，是“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具有爆炸性的种种变化在词汇上的表征”。阿方斯·拉马丁（Alphonse Lamartine）在1828年说：“我对大众有一种本能：那是我唯一的政治财产。”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其《消灭贫困》（1844年）中也这样宣称：“在今天，等级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人只能在大众的帮助下才能进行统治。”

这些“大众”首先是贫穷的、遭受剥削的城市劳动阶级大众。由此就产生了现在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所主导的思想——马克思称之为“阶级斗争”。当然，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在过去所有物质进步的社会都存在着。但这么说绝不是要否认在19世纪阶级斗争大大加剧了，让人产

生了深深的内心反省。

“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为人普遍使用。模糊经济和社会平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一词也是这样。因而，有“革命大众之将军”之称的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感到他可以这么说：“共产主义是个人的卫士。”路易·布朗（Louis Blanc）在其《劳动组织》（1848—1850年）、蒲鲁东（Proudhon）在1857年使用了“资本主义”一词；1867年，它出现在拉鲁斯的词典里，但直到20世纪初才广泛流行开来。“资本家”一词生命力更强。1843年，拉马丁大声喊道：“从现在的样子中有谁能够认出革命来？我们看到的不是工人享受独立劳动和工业，而是法国被出售给资本家！”不那么成功的新词还有“布尔乔亚主义”（bourgeoisisme）和“集体主义”（collectisme）等。

尽管如此，1789年的记忆尚未失去其威力。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公共安全委员会——所有这些词语和思想都作为模型或作为怪物萦绕在人们脑际。对大多数改革家来说，“革命”仍然是一个法宝，是一种力量源泉。1871年，在巴黎公社时期，拉乌尔·里戈（Raoul Rigault）宣称：“我们不是在寻求合法性，我们是在制造革命。”

·从圣西门伯爵到卡尔·马克思，借用马克西姆·勒鲁瓦（Maxime Leroy）对因大众问题激发而产生的哲学的表述，“大众哲学”的展开就其主体而言是到1848年才完成的。

该年2月出版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该书至今仍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

在19世纪上半叶活跃着许多改革家。把他们分门别类地列出一份详尽的名录，能够相当清楚地看出当时正面临工业化的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所起的领导作用。

这份名录还会告诉人们法国思想家在这一主题中是何等地重要：下文不久我们会回到这一问题上来，此处暂且打住。最后，还应当强调一下圣西门伯爵所起的作用。这个非同寻常的人，虽然略有点疯狂，却也是一位天才。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所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先驱，实际上是法国社会学本身的先驱（正如乔治·居尔维奇所说的那样）。他无疑对另一位更为伟大的巨擘卡尔·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年轻的马克思在特里尔（Trier）阅读了圣西门的著作，他自己的许多论断和思想是从圣西门那儿吸取过来的。

除了圣西门这一例外，我们可以把社会改革家分为三个年龄段：一部分是出生于18世纪最后30年的人，包括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年出生）、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年出生）、艾蒂安·卡贝（Etienne Cabet，1788年出生），以及奥古斯特·孔德（1798年出生）；一部分是出生于19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人，包括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维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érant）、路易·布朗；以及在种族上更为类似的一代人，包括卡尔·马克思（1818年出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出生）和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年出生）。来自德国的这一团体殿后。有人这么说，1864年拉萨尔在决斗中丧生，结果失去了唯一一个能够与马克思匹敌的同事，这样就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但更准确地说，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归结在《资本论》（*Capital*，1867年）的权威影响之上。

此处不可能逐一地研究这些“大众哲学”。实际上它们都是对“发展中的社会”——用圣西门典雅的话语来说，“société en devenir”——所做的分析。可以说，它们是一些冥想录和论述过程。对圣西门和他的弟子［巴泰尔米·昂方坦（Barthelemy Enfantin）和米歇尔·舍瓦利埃（Michel Chevalier），后者在第二帝国时期经商赚了钱］来说，应把精力集中在生产组织上。他们认为，他们不太喜欢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把经济组织起来。同样厌恶大革命的傅立叶认为，优先考虑的应当是组织消费。

阿尔芒·巴尔贝斯（Armand Barbès）、奥古斯特·布朗基、路易·布朗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都对1789年的各种原则保持忠诚。前两者充当的是活动家，后两者意在“完成和完善”那些原则。维克多·孔西德朗则反对那些原则，尽管不像他的老师夏尔·傅立叶那么激烈。

除更晚一些的马克思外，这些思想家中最有独创性的是蒲鲁东，他极度推崇自由，几乎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步，既反对国家，也同等程度地反对教会。他寻求的是一种社会辩证法，希望它能够在其一切矛盾中科学地引导社会向前进。他认为，必须解决这些矛盾，以抓住它们隐含的社会机器。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推测，与宗教狂热或行动有非常大的差异。蒲鲁东的思想与欧文、卡贝和创建了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s）的傅立叶等人的精神相反，同样与革命家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相左，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他们在其中充当预言者的更美好的社会。

·法国思想家在这一领域所处的领先地位在19世纪初期非常明显，

这构成了一个问题。

法国无疑是革命之国，是大革命的国度。它肯定在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1871年，虽处在外国的征服之下，它依然燃起了骄傲的革命火焰，即巴黎公社。

不过，除这些特征之外，法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是国家工业化的后果之一。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法国改革或革命的思想是由知识分子提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上享有特权。同时，又一次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些思想只是在工人阶级接过手并付诸实际行动之后才获得了生命和力量。但是，与其他地方相比，法国知识分子的反应更早，更为极端——而法国工业化开始的时间晚于英国，它的起飞是在大约1830—1860年。

事实确实如此，但起飞理论把真正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它提出一个H时间，在此时庞大的工业火箭据说是一下子腾空升天。是否存在一个如此明确的经济上的H时间呢？这么想象，就是置任何这种突然爆发之前的整个孵化时间于不顾。新近的研究发现，法国在1815—1851年的工业增长率非常高，约为每年2.5%。这么一种增长足以加大18世纪向城市移民的浪潮，改变现存的社会，并赋予已经受到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震撼的法国“拆除与建设工地”的形象，令同时代目睹此事的人大为震惊。

单单城镇的发展就导致其人文和物质条件迅速恶化。自巴尔扎克到维克多·雨果，所有观察家都看到了这一令人忧虑的现象。贫穷、乞讨、劫掠、懈怠、玩忽职守、传染病和犯罪：所有这一切都因劳动人员迅速集中到贫民区难以言状的混杂状态而增多了，而且往这里涌来的人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晚至1847年，米什莱注意到农民“对城里的一切都感到羡慕；他渴望一切东西；如果可能，他也将待在那里……一旦他离开了土地，他几乎绝不会回来”。不过在1830年，这是一个动荡不安、麻烦不断的年份，奥尔良不得不向城里4万名居民中1.25万名衣食无着的贫民——也就是说居民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一——提供援助。同一年，在里尔，需要提供援助的比例是2.21比1。

如此看来，在这一时期城镇社会似乎尤其受到工业的折磨。工业影响了城镇，吸引人到这里来，但它并不能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甚至不能提供被它吸引而来的那些人的日常所需。当时城镇的贫困现象可能不比全国的贫困现象严重。但在城镇里，在所有人看来，出现了工人罹受工业之害的惊人场景：工业给了他们工作，却对他们如何生存不怎么关

心。

因而，当工业化的开端开始改变城镇时，最早的“思想理论家”面对的是一个与今日欠发达国家没有什么两样的社会。

相反，自1851年起，然后是伴随着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出现的经济高涨和发展，劳动阶级的处境开始得到改善。

·从有组织的劳动到社会保障。

这一问题过于庞大，过于复杂，此处无法深谈。

不管怎样，这是有可能的吗？这将意味着把一方面即社会主义思想（一整套思想，彼此延伸、互补和相互矛盾），与另一方面即有组织劳工的要求，在真正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含义上协调起来。那么，坚强不息和骚动不宁的劳工大众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思想的？

这一问题殊难回答，尤其是由于有组织的劳工经常追求自己的政策，比如在英国，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谨小慎微的和务实的方式，而忽略意识形态和极端主义的、富于战斗精神的政策。

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社会理论家的阶段，第二个是工会的阶段，第三个是工人的政党组织的阶段，那么又一次说最后一个是国家的阶段。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拒绝工人的要求（或者出于审慎的理由勉勉强强做出让步，这与拒绝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满足他们的要求，甚至预见到这些要求，提前化解他们的苦痛。

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涉及四个集团：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带有多种多样不同态度的工会分子，来自劳工（或同情劳工）的政治家，以及国家的代表。不过，大致在同一个阶段，至少在三个关键国家，即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它们的邻国荷兰、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欧洲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变化。在这些特别的地区之外，进步速度要慢一些，甚至到了今天仍未彻底完成。下面是这一进步过程中的一些里程碑。

1871年之前——

在英国：自1858—1867年以来，成立了大量工会。在一开始，它们

为废除旧的有关“师傅与徒弟”的法律而斗争。第一届工会代表大会是在1866年召开的。在那一时期，工会只限技术工人加入。

在法国：当时只有极少的几个积极步骤。1864年，通过了一项允许工人进行合法罢工的组合法；1865年，第二国际法国支部在巴黎设立了一个办公室，此前一年英国在伦敦设立的第二国际第一家支部为先例；1868年，它在里昂设立了另一个办公室。法兰西第二帝国融“进步和压制”于一体：它改善了工人的处境，但小心翼翼地限制工人的自由。

在德国：事态的进展同样非常缓慢。1862年，拉萨尔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Alle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 Verein）。七年过后，在爱森巴赫（Eisenbach）大会上，成立了工人社会民主党，它在思想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1914年之前——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巨大的进步。

在英国：1881年，亨利·海因德曼（Henry Mayers Hyndmann）建立了社会民主联盟，立意在此前对政治无动于衷的工人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大致在同一时期，1884年，工会运动开始把较为贫穷、没有技术的工人吸纳在内。然而，只是在十年之后，伦敦码头工人才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罢工。1893年，独立工人党成立；五年后，全国总工会成立。工党在全国大选中取得胜利后，这一运动有了几乎革命性的发展，出现了1906年的所谓“激进”政府。随后一系列社会福利法案问世了，向英国展示了逐步改进的前景。

在法国：出现了与英国类似的发展。1877年，儒勒·盖德（Jules Guesde）创办了第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平等报》（*L’Égalité*）；两年后，又创建了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er Français，简称POF）。1884年，工会得到了法律认可；自1887年起，工人合作社开始组建。1890年，举行了第一届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1893年，代表卡尔莫（Carmaux）选区的社会党人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成为第一位当选的国会代表。1895年，全国工人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du Travail）成立。1901年，先后有两个社会主义党团成立，一个是儒勒·盖德领导的法国社会党，一个是让·饶勒斯领导的法国人社会党。1904年，《人权报》（*L’Humanité*）创办；1906年，这两个社会主义党派合并为社会党联盟。

在德国：社会党人受到了俾斯麦在1878年颁布的紧急状态法的阻遏，但自1883年起，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1890年俾斯麦退职后，工会得到了重建，不久会员人数就发展到了100万以上。工会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功，1907年大选中获得了300万张左翼选票，1912年大选中更是达到了424.5万张选票。

在工会运动如此迅猛的发展势头下，不必夸大1901年以来第二国际的力量，我们可以这么说，1914年，西方不仅处在大战的边缘，而且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边缘。社会党人离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像现在一样现代的欧洲——可能还要现代——并不远。但仅仅几天或许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大战就毁掉了他们的希望。

就欧洲社会党人而言，未能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失败。那些对社会主义最为同情、非常急切地想知道谁尤其应对这一倒退负起责任来的历史学家毫不客气地承认这一点。1914年7月27日，莱昂·儒奥（Léon Jouhaux）和他的同事迪穆兰（Dumoulin），法国全国工人联合会的两位书记，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德国工会的总书记莱吉恩（K.Legien）。他们是在一家餐馆里偶然相遇，除了承认失望难道别无其他目的？对此我们无从知晓。我们也不知道让·饶勒斯在遇刺的当天（1914年7月31日）何以做出他最后的那些举动的。他到了布鲁塞尔，试图劝说德国社会党人举行罢工而不是接受战争动员这一局面，但徒劳而返。

现在，西欧接受了社会主义理想，通过全民投票，通过立法和建立一种社会保障体系——法国是在1945—1946年，英国稍晚一些——在这么做时行动迟缓，而且做得非常不完备。欧洲共同体宣布了所有国家在这一方面应负起同样责任的原则；它这么做，实际上已经选择了最终在其所有会员国采取类似的措施。

第十九章 欧洲的统一

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弗朗科·西莫内（Franco Simone）提醒我们，所谓统一的欧洲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我们认为他也对也不对。这么回答不过是要表明，欧洲一方面是统一的，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多样性；经过深入思考，这似乎是个明显的事实。

前面几章叙述了整个欧洲共同承载的许多东西，从宗教、种族思想、科学技术的进步、对革命和社会公平的偏好以及王室的成功诸方面来讲，都是如此。但是，它随时随地都能轻易地打破这一“和谐”，而且只要愿意，就可以恢复潜在的民族多样性。蓬勃而必不可少的民族多样性迅速增长。但是这种多样性同样存在于布列塔尼和阿尔萨斯、法国北部和南部（地中海）、意大利的梅佐焦诺[64]和皮埃蒙特（Piémont）、巴伐利亚（Bavière）和普鲁士、苏格兰和不列颠、比利时的佛拉芒人（Flammands）和瓦隆人（Wallons）之间，或者在加泰罗尼亚（Catalogne）、卡斯蒂利亚（Castille）和安达卢西亚（Andalousie）之间。然而，人们却不能因此否认上述各有关国家民族的统一。

这种民族的统一性同样也不是对现实欧洲的否定。每一个国家都倾向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世界，而“民族心理学”很高兴能分析这些不同的有局限的文明。埃利·富尔（Élie Faure）或者赫尔曼·亚历山大·凯泽林[65]伯爵曾写过一些颇为引人注目的书，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看法并不完全是引人误入歧途。不过我们只指出这一点就够了：他们过于贴近地观察清真寺的每一块方砖、每一片瓦——而从高处，拉开一些距离看，能够清楚地看到清真寺的全貌。人们为什么必须断然地在整体和细节之间做出选择？一种现实不必把另一种现实排除在外：两者并不矛盾。

光辉的统一：艺术和精神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欧洲共享的某些特征用“辉煌”来形容。正是它们从文化、品位和精神的最高层次上，赋予欧洲文明一种近乎兄弟般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气息，就像它沐浴在单一的、恒定的光芒中那样。

这是否意味着所有欧洲国家拥有完全同样的文明？当然不是。但是欧洲所有的运动，无论来源于它的空间的哪一个点，都有蔓延到整个欧洲的倾向。我们说：仅仅是倾向。某种文化在欧洲的这一部分或者另一部分有可能遭到拒斥或反抗；抑或出现相反的情况，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往往越过欧洲的边界，甚至不再是“欧洲的”文化，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开始属于整个人类。不过，就整体而言，欧洲构成了一个结合得非常紧密的文化整体，很久以来就扮演着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的角色。

·艺术与它众多的谐和音：在欧洲，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超越了源起的国家向外蔓延，不论它是加泰罗尼亚（那里也许是最早的罗马式艺术风格向外传播的源泉）、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伦巴第（Lombardie）、15世纪（Quattrocento）的佛罗伦萨，还是提香

（Titians）的威尼斯或者印象派的巴黎。

一般而言，在所有建成豪宅、宫殿、教堂的中心，都会出现欧洲各地的艺术家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情景。15世纪勃艮第（Bourgogne）众位公爵和雕塑家克劳斯·斯吕特[66]的第戎，就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巡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城镇的流派会对邻近城镇的流派产生影响。由一位艺术家开始创作的某幅壁画，可能会由另一位艺术家来完成；某个教堂可能需要一连串建筑师来完成。比如，佛罗伦萨的圣马利亚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就是在后来由大胆的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67]建成圆顶后才告完工的。

王公、富商的奢华无度和兴之所至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没有他们，人们就很难理解，在那个通信速度极慢、手段比今天少得多的年代，艺术何以如此迅速地传播开来。在15和16世纪，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这样的君主召进王宫的意大利人，实际上是整个欧洲的老师。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成为古典艺术的传播者，人们甚至在俄罗斯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整个欧洲到处是凡尔赛，到处是法国式的园林！

就是这样，欧洲经历了无数的波浪，甚至巨大的浪潮。浪潮慢慢覆盖了欧洲全部，随后再慢慢消退。请想一想那些获得了巨大成功、风靡整个欧洲的艺术：罗马式艺术，哥特艺术，巴洛克艺术，古典艺术……

每一次，记载这些史实的厚厚的记录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哥特艺术竟持续了三个世纪。在南方，它没有越过布尔戈斯（Burgo）和米兰。真正的地中海精神不喜欢这种艺术。相反，在16世纪，威尼斯却成为哥特式的城市，而且是以其完全特有的方式。巴黎在16世纪中期依然是哥特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只占据了几个点：建设中的卢浮宫；今天已经消失的马德里宫；弗朗切斯科·普利马蒂乔[68]曾为之工作过、列奥纳多·达·芬奇在那里辞世的枫丹白露。来源于罗马和西班牙的巴洛克艺术是反宗教改革运动（过去，人们称之为“耶稣会艺术”）的杰作，其广泛而强有力的成功始自16世纪。然而，我们同样注意到，它也传播到了新教欧洲，并向东部大大地推进（直至威尼斯、布拉格、波兰）。

在18世纪，法国的建筑艺术用更少的时间就站稳了脚跟。要理解我们法国如此众多的城市（图尔、波尔多）是如何被模仿的，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原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是在空地上建设起来的，没有任何建筑妨碍建筑师的自由发挥，它肯定曾是、现在仍是18世纪最美的城市，也是最好地表达了那一世纪透视、整体概念和林荫路景观的

城市。

关于绘画和音乐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推想。无论是音乐技艺还是绘画流派，都毫无困难地进入了欧洲的多重循环。

我不知道该如何用短短几行文字讲述欧洲音乐的技巧和器材革新的历史。它的每一个阶段，伴随着历次迅速的普及，都标志着继承的时代，来自远古的乐器，从长笛到竖琴，代代相传。随后是风琴的普及，羽管键琴的出现，小提琴尤其因意大利人的高超技艺得到推广（但是现代的琴弓是在18世纪由一位法国人发明的），当然还有形形色色钢琴的出现，等等。

音乐形式的继承无疑与乐器的发展紧密相连。在中世纪，有伴奏和无伴奏的歌唱统治着音乐界。9世纪出现的复调音乐在抒情歌唱的低音伴奏中使用了风琴。14和15世纪，佛罗伦萨的新艺术（Ars Nova）是一种复调音乐，有多少声部，就加入多少乐器。这种“新艺术”在帕莱斯特里纳[69]的“无器乐伴奏”（a cappella）中臻于完美。

但是声乐很快就要让位于器乐，尤其是在使用弓弦的乐器取得进展之后。这时出现了被称为“室内乐”的音乐会，此为一种专为一组乐器谱写的音乐（比如弦乐四重奏）。起初，这种室内乐指的是与教堂音乐有别的世俗音乐、宫廷音乐。1605年，对萨伏伊的阿马戴乌斯（Amédée de Savoie）来说，恩里克·拉德斯卡（Enrico Radesca）是musique di camera[70]高手；1627年，卡罗·法里纳（Carlo Farina）成为suonatore di violino di camera[71]。室内乐首先是一种交谈形式：它是对话的艺术。意大利是它的摇篮，音乐会也诞生于那里：成组的乐器彼此交谈，随后一种乐器回应整个乐队。阿尔坎杰洛·科莱利[72]是第一位独奏的音乐家，安东尼奥·威瓦尔第[73]则是室内乐的大师。德国人更喜欢奏鸣曲（用两种乐器，有时用一种乐器演奏）。在法国，组曲将好几种舞蹈的韵律节奏非常灵活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随交响乐一起出现的是大型乐队音乐，这是一种由众多乐器和演奏手段构成的群体音乐，同时也有大量的听众。在18世纪，斯塔米茨[74]家族已经以交响乐形式演奏奏鸣曲。在下一个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朝着扩展乐队的趋势发展，但也赋予独奏和技巧以更加突出的地位（尼科洛·帕格尼尼和弗朗茨·李斯特是独奏的佼佼者）。

我们还应该给16世纪末起源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歌剧一个特殊的位

置；歌剧后来逐渐征服了意大利、德意志和欧洲：莫扎特[75]、韩德尔[76]和格鲁克[77]最早写的都是“意大利风格的”歌剧。随后当然是德意志歌剧的出现，应该为它们也保留一席之地。

就绘画而言，它的革命——谈到绘画时几乎可以使用“革命”这个词——遍及整个欧洲。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各种绘画观念显得相互矛盾的时候，所谓的矛盾也是整个欧洲共有的。绘画领域或许可以说有两次大的革命：第一次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当其时，出现了透视法则，绘画空间由平面成为立体，远远早于伽利略和笛卡儿的科学将世界“几何化”起来之前；第二次发生于19世纪末的法国，这次甚至对绘画的内容（substance）提出质疑，导致出现了立体派和抽象艺术。我们提到意大利和法国，只是为了给出事件发生的地点；实际上，如果看看那些伟大的名字和伟大的创新者，就知道革命涉及的是作为整体的欧洲的绘画，而且两次都是如此。事实上，我们今天必须说“西方的绘画”，因为它远已发展到欧洲本土以外。

确实，欧洲的伟大城市，从建筑或博物馆的角度来看，呈现出同样确定的层理和同样的艺术特质。从中我们可以辨认出相似的颜色。如果说这座城市肯定是巴洛克式，那座是文艺复兴式，第三座又是古典式，如果说威尼斯建造了一座奇异的哥特式建筑，帕维亚（Pavie）撰写了一部伦巴第小说，那么所有的欧洲公民总能从中找到他熟悉的东西，找到他立刻就能理解的东西，也就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哲学也带来了独特的统一信息。欧洲在命运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几乎都有某种单一的哲学，或者非常相似的东西。

至少欧洲一直存在着一种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乐于称之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反映了那一时代社会的需求。这无疑是因为，在整个西方，在任一特定的时刻，都有一个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论笛卡儿的哲学是否属于上升的市民阶层的或缓慢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哲学，它都肯定地主导着、充斥着古典的欧洲。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或者不是（但怎么可能不是呢？）上升的工人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哲学，或者说工业社会的哲学，它明显先是主导着西方，然后是世界。直至最近，欧洲和世界都还根据支持它或反对它的立场而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种哲学的统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无限的联系为前提。

让我们列举德国哲学的两个重要时刻：（1）从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1781年）到黑格尔之死（1889年）；（2）从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到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不考虑德国这些思想家每部著作的大量法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等等语言的译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重要性。纳入欧洲生活的德国哲学思想的两个重要运动，是依靠这些译本才得以发扬光大的。

需要注意的是存在主义的例子，正是经由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通过法文所做的阐述，存在主义才被推向世界其余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

·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不存在任何问题：从最初取得成功开始，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泛欧洲特征的。

很难将这种或那种发明归功于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因为很多发明是在欧洲各地、依据学者各自感兴趣的程度同时得到开发的，欧洲的所有科学家相继参与了发明的不同阶段。

无论列举哪一个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比如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刚刚出版的关于开普勒革命的著作（1962年）。约翰·开普勒（Johann Kepler，1571—1630年）属于一个智慧的群体，其中有他的前辈（首先是哥白尼），有他同时代的人（首先是伽利略），还有他的学生。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画上他们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地点，那么整个欧洲将被涂满黑点。

医学、生物学、化学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这些学科，即使在一个极有限的时段内，都不能说是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波兰的……它们一直是欧洲的。

·与此相对，至于与人相关的特殊科学，即社会科学，则与哲学相似，表现出的特征是发源于特定的国家，而后迅速传播到欧洲其余地区。

社会学最早起源于法国；最近50年来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在英国或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即英美）取得了成功；地理则主要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弗里德里希·拉采尔[78]和保罗·韦达-拉布拉歇[79]）的成就。在

19世纪，历史学主要受德国和一个伟大的名字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de Ranke，1795—1886年）的统治：德国的历史编纂学令整个欧洲的历史编纂学带有它那博学和细致构建的特征。今天的情势远没有这么简单，但欧洲历史编纂学——已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编纂学——依旧以唯一的和相同的律动前进。其中，一个法国学派占据着统治地位，它来自亨利·贝尔（Henri Berr）、亨利·皮雷纳、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亨利·欧塞（Henri Hauser）和乔治·勒费弗尔的理论，建立在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这样的经济学家和譬如莫里斯·阿尔布瓦克斯（Maurice Halbwachs）这样的社会学家的理论基础上。

·文学方面表现出来的统一迹象最少。与其说有一种欧洲文学，倒不如说有多种民族文学，它们之间一方面存在着众多的联系，另一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对比。

这一领域的统一最不理想（幸好如此），文学——散文、小说、戏剧——建立在使不同民族的文明迥然相异的东西上，包括语言、日常生活、对痛苦和欢乐的反应方式，还有爱、死亡、饮酒、工作、思考等等的方式。通过他们的文学，各个民族重新化身为人，成为可以分析的个人，而且多亏这一特性，我们甚至可以对它进行心理分析。

这些文学之间当然也存在显著和持久的整合情况：文学自有其时尚新潮。比如在19世纪，在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之后出现的浪漫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随后浪漫主义为社会现实主义所替代……“影响”成为一种无止境的相互作用——流派的影响、个人的影响——不停地由一部作品来影响另一部作品。但同样明显的是，每部文学作品都沉浸在其特殊的社会和精神环境里，植根于完全属于个人的经验。我们几乎不能说存在一个民族文学的统一，那又怎么好大谈特谈欧洲文学的统一呢？

不是还有另一个巨大的障碍，即语言的障碍吗？任何翻译都无法充分传达一种文学体验。欧洲所有大语种都在其他语种面前掩藏起部分财富，即便其中的一种语言能战胜其他语言，构成某种通用语，就像往昔的拉丁语和18世纪的法语！……伏尔泰在从圣彼得堡到巴黎各王室受到的礼遇，唯有法兰西语言的强势地位可以解释得了。今天，至少在科学上，回归唯一的语言是可能的（这实际上创建了一种带有国际技术术语的人工的通用语言），但在文学领域行不通，更何况文学日甚一日地成为大众的语言。18世纪法语的“国际化”归根结底只存在于少数精英阶层。

·应当维护欧洲在文化上的统一性，还是需要完善它？

这种既有成功也有不足的统一的文化，是否足以促使欧洲做出打破疆界的决定？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倡导欧洲在政治上统一的那些人，特别关心通过推行经过深入思考的教育改革而能达到的统一效果。入学资格的协调一致使得转赴其他大学继续深造成为可能，同时（原则一经确立）也可以创办一个或几个欧洲大学和开创欧洲研究生活。

实际一些说，这必然要强调现代人道主义，后者向欧洲所有活的语言完全敞开，难道不是这样吗？

坚实的统一：经济

欧洲长久以来陷于单一经济的罗网中；在任一特定时代，它的物质生活都围绕着特权和影响的中心进行。

在中世纪后期，一切都汇聚于威尼斯，又从那里向四周传播开来。至现代之初，经济重心一度在里斯本，后来移至塞维利亚，或不如说，在后者和安特卫普之间摇摆不定，直至16世纪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随后，在17世纪初，阿姆斯特丹的商业霸主地位得以建立，直到18世纪初叶。之后是伦敦的商业中心地位，这一地位一直持续到1914年，甚至到了1939年。乐队总是需要有一个指挥的。

这些经济重心在其飞速发展之际总是非常有效的，不仅欧洲的经济生活被吸引到这里，同时还伴随着更广袤世界的经济生活。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伦敦不仅是信贷、海运保险和再保险的巨大市场，而且还是美洲小麦、埃及棉花、马来西亚橡胶、邦卡（Bangka）和比利敦（Billiton）的锡、南非黄金、澳大利亚羊毛、美洲和中东石油等等的巨大市场。

·欧洲很早就成为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物质和地理整体：灵活的货币经济，再加上围绕欧洲的海岸线、纵横交错的河道以及运输和驮畜通道构成的活跃的流通。

人们依靠役畜很早就取道布雷纳山口（Brenner，通往威尼斯方向）、哥塔尔山口（Gothard）与辛普隆山口（Simplon，通往米兰方向）并经由塞尼山口（Mont-Cenis）征服了阿尔卑斯山的天然屏障。在当时的日常用语中，人们很奇怪地用“大车”来指称活跃在这条穿越阿尔

卑斯山的运输线上的骡队，它们使意大利经济得以向欧洲的北方和西北方辐射，那里渴望意大利奢华的纺织品和黎凡特（Levant）的产品。16世纪，由于车队运输、河运和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大车”运输在那里的会合，里昂的商业和交易市场空前繁荣起来。

19世纪中叶铁路的出现，最终打破了欧洲大陆的僵硬局面和惰性，致使一种物质富裕、交往迅捷的文明传播开来，兴盛的工业和商业城市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段长长的历史中，有两个例子可以形象地揭示欧洲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尽管它们并不能说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威尼斯的大型商业船队（mude）。在15世纪，这一商业船队的网络主要在地中海地区，但有些船只航行到远至伦敦和布鲁日（Bruges）；而穿越布雷纳山口的通畅的陆路由北方直通威尼斯，德意志商人在那里拥有庞大的货栈，此即位于里雅尔托桥（Rialto）附近的Fondego dei Todeschi（德意志人的基地）。

另一个例子：在16世纪，以塞维利亚为中心，金钱和汇票在欧洲各地之间频繁流通和传送。实际上，在交换和支付过程中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的几乎就是同样的钱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欧洲不同地区几乎在相同的时刻会出现相同的经济循环节奏。16世纪，因为来自美洲的大量贵金属突然涌入，西班牙的物价开始飞涨。这次通货膨胀覆盖了整个西欧，甚至影响到了莫斯科这个在经济上仍然非常原始的地区的中心。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欧洲生活以同样的步伐前进或者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一条始自吕贝克或者汉堡，穿过布拉格、维也纳，远及亚得里亚海的线，将欧洲从经济上分为发达的西部和落后的东部，农民的境况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这一区别不久将会被抹去，但还没有成为现实。

进而言之，甚至在繁荣兴盛的西欧内部，也存在着较为富裕的中心——所谓“发达的地区”，它们被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分割开来，后者中有一些是落后或“欠发达”的地区。直至今天，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里，一些地区依旧落后于总体，因为新的投资总是自然而然地被最活跃的中心吸引过去。

实际上，如果没有电压（voltage）或发展水平的区别，没有领导潮流的地区和被引导的地区，就不可能有贸易流通，也就不可能出现共同的经济，在经济上互相依赖。发达与欠发达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彼此依靠。为了简单形象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以法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为例证。19世纪后半叶，法国银行业有了飞跃发展。这应归功于法国外省和农村地区储蓄和游资或半游资姗姗来迟的流通。马上从这一现象中获益的是银行，比如成立于1863年的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而且它们注定要变得非常强大，但曾经提供了这些资金的落后地区不久就感受到反冲力，其经济发展受到刺激，并与国家总体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

·共同市场的开端：尽管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地区经济或国家经济，但这一经济联系长久以来就将欧洲聚合起来。我们可否建立一个协调的统一体，使所有的部分都依赖这个整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做出了一系列尝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种种尝试中，共同市场是最成功的一个，尽管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选择。

无疑，一切都源自1945年战后欧洲的悲惨状况：彻底的崩溃威胁着世界的平衡。由此就产生了最早的建设性措施：在伦敦建立欧洲统一委员会（1947年5月）和马歇尔计划（1947年7月3日）。马歇尔计划考虑到了各种动机，一方面是政治的、军事的，另一方面是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欧洲——某种欧洲——就这样开始重建起来。

目前阶段，我们只想谈论经济问题。从这一点看，欧洲贸易自由联盟[80]

即欧共体七国遇到的挫折（有位记者曾形容它为“遇难者”），打开了通往“欧洲六国”——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共同市场的道路和未来；共同市场在当时为欧洲六国，它实际上把欧洲共同体分成了三个法律实体：1955年根据巴黎条约创办的C.E.C.A.[81]，C.E.E.[82]和Euratom（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后两者都是1957年3月25日的《罗马条约》的产物。这还只是部分解决办法，但如果欧洲真能建立共同体，加上土耳其、希腊、丹麦、爱尔兰、瑞士、奥地利和英国的加入要求，这些办法将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展开。（但即使到了20世纪末，欧共体也没有把整个西欧包括在内，更别说全部欧洲了。）

（1962年本书撰写时）所有加入的请求还只是停留在提出阶段（这些纲领起草于1962年2月）。共同市场有着明显的成长机会（即使它被禁止扩展“到乌拉尔地区”），有望占据古典欧洲的全部空间。在要求加入共同市场的这些国家中，英国的申请至关重要。

因而，通过对欧洲共同市场的研究，我们可以估测一下实现欧洲经济的统一究竟有多少机会。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型，换句话说共同市场的成型，是历经艰苦的协商达成《罗马条约》（1957年3月25日）的结果，其复杂的条款于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

这还只是一个简短的实验，对它做出判断时要审慎。

近四年来，欧共体六国的经济获得了不可否认的强力增长，这既得益于有利的世界局势，也得益于欧共体自身最初的各项措施引起的同样有益的反应。边界的逐渐开放也明显是一种加速器，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一实验命运攸关的地方仍在未来。《罗马条约》及各会员国政府随后做出的一些决策规定了一系列陆续采取的步骤。问题产生了：迄今采取的在纸上规划了美好未来的步骤，预示了一种经济统一体，它们对未来会是个好兆头吗？

和悲观的预兆相反，欧共体六国的工业（包括法国的工业，人们曾经担心它们比其竞争对手德国要脆弱）都非常好地适应了共同市场。它们进行了结构的调整，包括有利于大企业发展的合并的趋势，例如法国的雷吉·雷诺（Régie Renault）、佩希讷集团（Péchiney）、圣-高本（St.-Gobain）……另外，还要着手进行转产，比如在煤炭部门，一些效益差的矿井应该被关闭。重组尽管很痛苦，却是必要的。

确实，如果现在只有工业，协议和契约就很容易。以目前的技术水准，工业相对于干预和计划而言具有明显的可塑性。同样，建立在货币一致与彼此支持基础上的信贷也没有困难。欧洲货币刚刚经历了相对长期的稳定和团结，至少美元暂时不再是国家储备中除黄金外的唯一标准货币。

因而，这些可以说是共同市场出现后有益的一面。但是阴影同样存

在：政治（我们很快会谈到）上的阴影，还有经济上的阴影。

经济上的阴影包括：（1）共同市场在欧洲范围内的地理界限；（2）在欧洲之外的界限，即它与世界其余地区的关系；（3）进行棘手的农业改革时出现的各种内部问题。

六国的欧洲无疑是不完整的。西部还有重要的空白。向东则遇到“铁幕”这一障碍，它后面实际上正在形成另一个共同市场，即C.O.M.E.C.O.N.（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最大的问题还是英国加入的可能性，英国在1961年提出了申请，但还存在困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了和年轻的欧洲联合在一起，英国必须严格提防依旧将其附着于英联邦（Commonwealth）的联系，并抛弃旧日的帝国和享有优先地位的经济制度。这就从经济角度提出了问题，尤其是要征得英联邦各国的同意；从心理上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等于为历史上最辉煌的皇家企业画上了句号。

同样重要的还有共同市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关系问题。根据新的经济秩序，北非（狭义的北非，不包括埃及和利比亚）各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法国为轴心。共同体的对外关系问题还包括与英联邦的未来关系问题。此外是自1962年出现的与美国市场的关系问题：这是个可以吞噬小小共同市场的“巨大的”大西洋市场。因此人们可以说：欧洲是第一步，大西洋是第二步，整个世界是第三步。但这只会让人陷于狂热的乐观主义。所有这些问题同样也存在于政治方面，而且解决起来丝毫不会更为容易。

另一方面，首要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共同市场未来的主要价值问题，在于其内部的农业问题。它们极其复杂。

这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带动着根深蒂固而奇妙的欧洲农业世界，但根据数字显示，农业的生产率相当一般。

相对于1.6亿的总人口，欧洲六国有大约2500万农业人口（包括家庭）。曾任荷兰前农业部长、时任负责农业政策的欧共体副主席的曼斯霍尔特（M.Mansholt）先生最近宣称，将来800万农业人口将转移至非农业岗位。

实现农业现代化实际上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单位效率，减少农业人口。这么做的前提在于两点：提高效率要求推广机械化，以及总的农业

收入不会落后于欧洲整体的经济节奏增长。

膨胀的经济中增长的成分必然是工业和服务业。收入的增长在发达的国家里不会再度导致对食品的部分需求。我的收入增加了，我会买汽车、无线电报机、书籍、服装，我会旅行、去剧院，但我不会增加对面包、肉食的消费，我们还希望不会增加葡萄酒和烧酒的消费。

总之，为了使农业收入以与国家其他部门同样的节奏增长，三分之一的农民需要在1975年以前离开土地，随后农民要以少量的人数生产更多的产品。农业人口每年递减的速度应该是4%，现在，英国是2%，法国是1.5%。按这个速度，英国需要22年、法国需要27年才能完成预想的转化。这一估算尚未考虑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在农业人口最多的意大利（450万农民），人口减少实际上意味着令农业工人失业：农业结构几乎没有变化，尽管在登记册中有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记录。

在这样的条件下，欧洲的农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美国和加拿大的剩余产品源源不断地以低价涌入，因为有政府补贴，价格甚至比在它们的内部市场还低。只有在得到海关保护、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之后，欧洲农产品的价格才能高于国际市场。

共同市场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在于不同国家的产品和农业价格的巨大差异。

法国是生产过剩的国家，它的剩余产品（尤其是谷物）只能以国际价格进入流通领域。这迫使政府不得不以内部价格购买，再亏本转卖到国外。1961年，法国的小麦和大麦卖到了中国，冷藏肉卖到了苏联……意大利的水果、蔬菜以及荷兰的奶制品和法国一样过剩。相反，德国需要进口许多农产品，但它从共同市场以外的地区购买，同时不情愿失去作为这些进口对等物的出口之机。

每个国家的农业价格各不相同，因为生产率不同，政府的保护意愿和实际给予农民的保护也不一样。比如，谷物价格最低的是法国，最高的是德国，奶制品价格最低的是荷兰，等等。按照共同的农业政策，到底应该把价格维持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呢？

最后，既然农业必须实行现代化，代价会很昂贵，谁来承担这笔可观的开支呢？布鲁塞尔会议（1962年1月14日）采取的解决方法是由整个共同体承担。这个方案对工业构成其经济主体的德国不利。但如果第

一阶段的农业政策不能确定下来，那些农业在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荷兰——将拒绝进入第二个工业化阶段。彼此达成一致是极其艰难的事（整整经过了200小时的谈判），在布鲁塞尔，人们甚至开始为共同市场本身的命运担忧。一位记者笑着说：“欧洲愉快地吞掉了钢、煤炭和原子，却在蔬菜和水果面前退却了。”

协议商定了期限：初期措施只能于1962年7月开始实施。政府和农业工会明白，今后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而且时间紧迫。

按照设想，在附加了不同价格水准的补贴税后，农产品可以自由流通。这个原则必然会导致对惯例、监督和规章进行调整。需要预见到所有这些矛盾。同时，还要在六国的共同边界制定统一的关税系统，按照联盟各个成员的关税平均数计算，否则内部的平衡将被不合法的壁垒打破……

一个统一的关税体系，Zollverein（关税同盟），就这样成形了，成为共同经济的保障。人们会停留在这个阶段吗？不会。由此又产生了政治体系统一的问题。

临时的统一：政治

在建立欧洲统一问题上，文化会立即答应，经济差不多答应，相反，政治却有所保留。后者有它自己的原因。一些原因是好的，一些是不那么好的，一些则是错误的。一些原因建立在旧的已经过时的（19世纪的）考虑上，另一些则建立在非常现实的甚至“预见性的”考虑上。

事实在于，整个欧洲长久以来处在同样的政治游戏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不冒迷失危险的情况下逃脱出去。但这个游戏不会使欧洲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相反欧洲被分成几组，每组的成员经常发生变化，阻止霸权将其法律强加于其他成员国家之上是通行的规则。

这肯定不是出于对他人自由道义上的尊重：实际上每个国家都自私地为自己打算，追求其一己的利益。除非它玩得太好，太过于成功，不然或早或晚总有一天它会发现，其他国家在联合起来反对它。

这就是“欧洲平衡”的总体原则。1962年的欧洲能真的放弃这个古老的手法吗？

·19世纪虽然在不断地玩着这种政治游戏，但既没有发明“欧洲平衡”，又没有发明“四国同盟”，也没有发明“权力平衡”。

实际上，这个强制的体系可以上溯到很多世纪以前。这不是那些大使们精确计算出来的结果，也不是他们的主子的发明，正好相反，这种为人们部分地意识到的自发的平衡感早已存在于政客们的头脑里了。

基本规则总是相同的。一个国家表现得过于强大（比如1519—1522年弗朗索瓦一世统治下的法国），即便是假象，它的邻居们还是涌向天平的另一侧，加大另一个秤盘的砝码，以使强国保持相应的分寸，做事更为明智。弗朗索瓦在帕维亚（Pavie）的战败（1525年）和被俘证明人们搞错了：太过强大的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人们于是涌向天平的另一边，并邀请土耳其加入到这一方，作为新的砝码。

各国力量的不断增长使得这些不完备的计算越来越危险。唯有英国可以在它的岛上不被惩罚地实践力量的平衡：它处在这种持续的平衡游戏之外，满足于用金钱和军队，尤其是它的金钱来维持平衡。它在很长时间内反对法国人，自动地与法国的敌人结盟。但如果德国变得过于强大（1871年它战胜了法国，因为当时英国和英国背后分裂的欧洲没有进行干预），尤其是1890年以来它的经济飞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于是就有了英法协约，然后是法俄联盟。处在对手包围中的德国，确实强大到根本不怕被如此对待，但还没有强大到让其对手信服其不可动摇的优势。最终的结果就是战争爆发了。

现实的世界同样处在一个控制着从欧洲到整个星球的“平衡”的魔法之中。世界分成两个阵营，“东方”和“西方”，处在两者之间的中间派力图走第三条路，这条路只有在它们拥有实力时才是可行的。这肯定是一种旧的体系，一种旧的齿轮传动系统，在很长的时间里以平衡的失灵给整个世界造成威胁，就像历史上欧洲频繁罹受这种平衡失灵之苦那样。

·以暴力实现统一总是以失败告终：这一单调历史的唯一教训就是，无论是谁，暴力永远不足以从整体上掌控欧洲。

不必上溯至查理大帝，我们只需要稍稍看看查理五世（1500—1558年）就可以了。他也许是谋求欧洲霸权的诸多不幸的候选人中最不令人仇恨、最可亲的一位。他的梦想是这样的：征服基督教世界，用他的威势保护基督教国家，反对伊斯兰异教徒和新教教徒。在查理五世的头脑

里，“帝国理想”（idée　impériale）根源于历史上有名的西班牙十字军东征。

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什么都不缺：军队、令人钦佩的将领、狂热的信徒；他得到了像富格家族（les Fugger）这样的大银行家的支持；他拥有举世无双的外交手段，有对海域的控制，最后还有来自美洲的“财富”。在他的统治下，西班牙成为分发产自美洲的金银的宝库，这一方面符合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政治的急需。他是不是像某位学者宣称的那样在与法国的斗争中失败了呢？既是也不是。是，因为他的任何成功都不足以令他控制法兰西辽阔的领土（以当时通信的速度，或者可以说通信的缓慢），而法国处在他治下诸国的中心。1529年，他与法国签订了一份和平协约（《康布雷和约》）。后来，他在与信奉新教的各德意志邦国的斗争中失利（1546年，1552—1555年），并以武力对抗土耳其穆斯林：穆斯林不仅威胁着维也纳，而且骚扰西班牙海岸，直至直布罗陀以远地区。

实际上，正是四国同盟利用一切手段战胜了查理五世，包括与土耳其素丹的联盟。

路易十四只是在17世纪经济局势恶劣的时候控制了欧洲。这一时期出现了向传统势力的倒退，这种倒退后来被法国利用。当时（直至1683年科尔贝尔[83]死去）法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资本主义仍处在原始阶段，刚刚起步。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时，也许是自1680年左右开始，局势急转直下：早在1672年，荷兰的洪水泛滥即已使法国军队无法靠近阿姆斯特丹；1688年，奥兰治的纪尧姆[84]登上了英国王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不列颠的主宰；1692年，海军上将德·图尔维尔（de Tourville）率领的舰队在瑟堡半岛东海岸附近水域的拉乌格（La Hougue）战役中遭到惨败。在规模庞大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既无力与其所有敌手抗衡，也无力夺取伊比利亚半岛以及西班牙所属美洲的财富。

拿破仑的传奇不是也归于同样的失败命运吗？一方面他取得了众多的胜利，但另一方面是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无可挽回的失败（1805年）！当法国的征服活动限于欧洲大陆时，尽管面积非常广，但英国可以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铺展开它的力量。只要100—150只木船就可以封锁住加莱海角[85]，1805年时法国人还以为可以“横跨”过去；墨西拿（Messine）海峡的情况也是这样。因而，当那不勒斯归属法国人或缪拉[86]时，西西里一直是波旁王朝的避风港。

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是这样，在它周围聚集了一个可以与它所带来的威胁相抗衡的同盟：这一同盟包括了世界的大多数。

·共同市场与政治统一：今日欧洲政治的统一是否已经不再需要暴力，而是通过各有关成员国的共同意愿达成？一个计划已经确定成型，它激起了人们明显的热情，同时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困难。

我们已经列举了其中一些困难：尤其是，西欧是唯一的参加者（必须建立“包括欧洲其他部分”的整体欧洲）；随后还有，如果说它的统一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影响着世界的平衡，却也在欧洲以外引起了问题。一位银行家宣布（1958年11月14日）：“在世界的某些部分，有人担心欧盟会对第三国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简言之，它要做出选择：选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热带产品，而不要拉丁美洲的产品……

但首要的困难是来自内部的和制度性的。这绝不是一个协定或妥协就能轻易解决的。

“欧洲国家”的政府有没有可能，用戴高乐将军的话说，做出牺牲其部分神圣主权的让步？

早在1950年8月8日，安德列·菲利普就在欧洲议会上宣称：“一年来，为了避免冲突，我们的大会接受所有的妥协。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做。如果我们不能马上聚在一起创建真正的欧洲，舆论会对我们不感兴趣。”8月17日，还是这位政治家威胁要“创建另一个欧洲”。

11年之后，1962年1月10日，比利时外交部长保罗-亨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在农业协议签订（14日）的前夕（当时他还无法预测到这一点）于布鲁塞尔宣布：“一切的一切促使我相信，没有超国家精神（supranationalité），就不可能有统一和有效的欧洲。所谓‘各国的欧洲’是一个狭隘的概念，远远不够……我活一天，就要为一致的原则和否决权斗争。几个星期之前，我在联合国，亲眼看到了苏联行使否决权的情景。最近我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了相同的经历；在关于德国和柏林的问题上，某一个国家的态度阻挡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取坚决和建设性的态度。现在在议会大厦进行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切讨论无法改变我的观点。我从所有的争论中看不到集体精神。每个国家都在保卫本国农民的利益……如果该死的一致原则并不存在，那么六国会议的会谈会进展得更快……我们面前呈现的欧洲只是对外政策意义上的欧洲。我们除了制造混乱之外还做了些什么？比如五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问题上持

一致意见，而第六国使所有的决定泡了汤……我于是在想，在这方面放弃超国家精神是不是一件好事。”

所有这些论据都不错。但在一个非常有分歧的会议上，多数原则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大多数可以是交易和集体妥协的产物，即某些与会成员所说的“走廊谈话”之类的东西；它们与其说产生了一种协调的或公正无私的政策，倒不如说是就否决权进行讨价还价。主要的问题在于，目前欧洲国家的政治倾向在至少几个深层的根本问题上存在多少协调一致的可能性。否则，“欧洲权力平衡”的棘手问题将会在新的共同体大厦里再度出现！

但愿统一是自由决定的结果，这是参加者们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话题。

一位德国商人宣称（1958年），无论是拿破仑的欧洲还是希特勒的欧洲，都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建立在武力上的统一，一旦统治国的控制松弛下来，只会引起爆炸。顺带说一句，我们今天眼下就有一个很好的典范：通过《华沙条约》集结在俄罗斯权力周围的各国（原文如此），尤其在经济和政治上更着眼于俄罗斯的利益（原文如此）。”

在数以百计的言论中，这句话把问题挑明了。对于当下很多人而言，目标在于集合欧洲或欧洲的“剩余部分”来对抗苏联的威胁。这明显是美国的政策，即用作防卫苏联的“盾牌”的政策。1951年12月15日讨论舒曼计划[87]时，法国议会主席保罗·雷诺（Paul Reynaud）的立场非常明确：“请回想一下，五角大楼放弃只在比利牛斯山脉保卫欧洲的政策，应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不断强调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想要建设整个欧洲。如果舒曼计划遭到拒绝，你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面对这种在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进行明显算计的精神，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因为更现实所以更合理的精神。请看看身为欧洲议会参议员的安德列·阿曼戈（André Armengaud）在1960年2月的著名演讲中是如何给问题定位的吧。在他眼里，欧洲陷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起飞和世界各地昔日遭到欧洲国家殖民的各民族获得大解放之间，至于前者，“所有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诞生于1917年10月彼得格勒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明天”，因而欧洲也必须以革命的方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为“少数人利益”的制度，更是为了使劳动力得到最佳的使用。换句话说，来个急刹车，掉头再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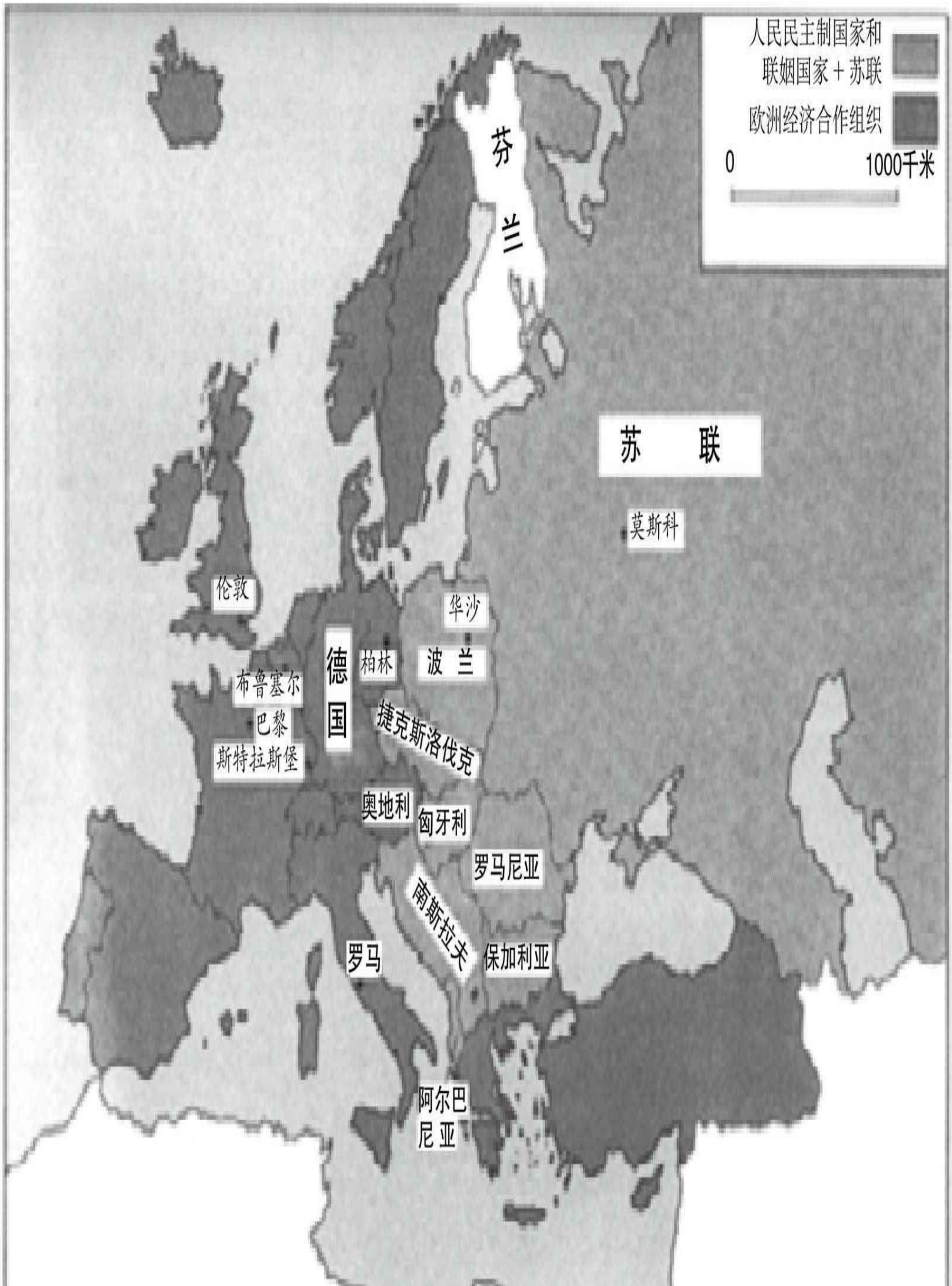

人民民主制国家和
联姻国家＋苏联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0
1000千米
芬兰
苏联
莫斯科
伦敦
华沙
德国
柏林
波兰
布鲁塞尔
巴黎
斯特拉斯堡
捷克斯洛伐克
奥地利
匈牙利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
罗马
保加利亚
阿尔巴
尼亚

图17 两个欧洲

这种不以自己的利益而是以人类能从中获得的好处作为问题定位标准的智慧，在东西方之间引起了关于什么是解决20世纪人类社会问题的最好方法的竞争，这种智慧有机会让人倾听吗？

这不仅仅是欧盟能否实现、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也是欧盟能否被掌握世界霸权的两个集团接受的问题。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可能会对欧盟的经济要求或其可能的政治取向感到不安。虽然德国接受了疆界的修改，但以它现在的繁荣发展速度，它会带来一个平静的欧洲还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欧洲？这个新欧洲是否同意为解决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在整个世界的命运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依赖于这一改善——做出自己的贡献？或者，它是没有能力抓住未来，并继续相信民族主义的自我利益仍具有意义，同时“欧洲的民族主义”能够在过去欧洲各民族国家不得不祛除的地方继续进行下去，抓住旧的野心不放吗？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对富于创造性的、旨在谋求和平的欧洲，还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仍在制造各种为我们太过熟悉的压力的欧洲？

·这一问题实际上触及了事物的根本：欧洲文明对于明天的世界还有可能做些什么？

是否可以说这是欧洲建设者最不关心的一个问题呢？他们关于海关、产品价格的理性的讨论，就像他们互相做出的最宽宏大量的让步，只涉及算计的精神。这些讨论似乎从未超出技术的层面，很高级的技术层面，是由精通计划和指导经济的著名专家们进行的。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是不可或缺的。

但这些人的计算在另一些人的热情和不乏智慧的疯狂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后者曾缔造了欧洲的昨天和往昔。欧洲的集体意识可能仅仅建立在这些数字上吗？会不会正相反，避开数字，以不可预知的方式超越这些数字呢？

让人感到担心的是，欧洲值得发扬的理想文化却在日程表上退居末位。人们既不关心绝对信仰，也不关心某种理念；没有人关心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表面的死水下仍在流动的深层的活水，没有人关心宗教信仰的活水。如果欧洲不依靠古老的力量——这一力量曾经缔造了欧洲，而且还在起着深刻的作用，一句话，如果人们忽视各种各样有活力的人道主义，欧洲将不成其为欧洲。

它实际上别无选择：或者依靠人道主义，或者有一天，人道主义会打乱欧洲的发展，并战胜它。各民族的欧洲是一个美好的口号，但还需要人们努力去实现。

1966年附言

欧洲六国没有像理性的支持者甚至对它的诞生保持热忱的支持者希望的那样迅速地老去。在这件事上做错了的英国不想付出代价；1963年1月由戴高乐将军发起的吸收英国加入的谈判中断，这显然是一个失败，虽然这种失败可能是临时的，但代价沉重。

如果欧洲六国尽可能大量地联合合作者，它不会是明日的“世界第三力量”。1963年土耳其被吸收进来，但在吸引西班牙、奥地利时问题出现了，面临此问题的可能还有丹麦，以及非洲、尼日利亚……

经济方面的困难变得越来越清晰，但逐渐得到解决。农业的欧洲慢慢出现（分别于1962年1月14日和1963年12月23日达成协议，尽管不无困难；1964年12月15日达成谷物的共同协定，也同样不无困难）。牛肉和奶产品的价格问题尚未解决。然而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经济为组成联盟做好准备，促使国家和政府开始了不可逆转的进程。由此政治问题紧急出现了：机构的融合，超国家权力机构的创立，欧洲议会和政府。

同样还需要为共同的农业基金制定规则。由于这个问题，但同样也是由于“委员会的权力”问题，1965年6月至1966年1月出现了“六国”产品方面的严重危机。1966年1月31日，各方达成了协议。但是法国不同意讨论把重要的国家利益交由多数决定这一问题。显然，新的欧洲排除了狭隘和审慎的国家主义，唯有法国没有做出榜样（可惜！）。

1981年的欧洲（保罗·布罗代尔的笔记）

1978年，米兰博科尼大学（Université Bocconi）建议布罗代尔领导的人文科学之家建立一个协会，“对欧洲的统一造成的问题进行明晰和建设性的研究”。三年后，即1981年，在米兰，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一次致词中说，他热情地接受上述建议，“深信该提议值得尝试，它应该被尝试，它应该现在就由我们来尝试。这首先有两个原因”。

“欧洲——尤其是人们说还很‘小’的这个欧洲，即使它一下子长大

了，从六个增加到了九个，问题也越来越多——欧洲对我而言，既不是一个显著的事实，甚至，也不是一个信念，充其量是一个在我们面前隐约显露的、有形的事实，一个脆弱的、不确定的、可能是临时的事实，而且肯定是含混的：既是自由也是约束，我们必须逐个来证明。我们学会在其中生存，归根结底与其说是不错不如说是糟糕。我们已经知道它所有的弱点和所有的自私，而它既不能掩饰，也不能克服。但我们也知道它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东西，甚至还有它的失败，会令我们失去什么。也许已经太晚了，就像吕西安·费弗尔所想的那样。无论如何，我们感谢他改变了我们面临问题的论据和维度，感谢他用崭新的语言清晰地提问。现在，该我们来直面讨论了（既然我们的行动已经开始），我们有最优秀的专家加入或参与，他们形容自己是‘科学的’或者像‘开业医生’，来自欧洲的各主要国家。

“除了第一个原因，我还想再说一个无疑更为个人的原因。我一直这样认为并支持这个想法，如果人文科学必须统一到历史学之下，那么只有当它可以成功地成为它本来应该的样子时，即一种当下的科学，它才可能做到。13—18世纪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眼中无疑还只是萌芽，历史学家就专注于它的出现并表示肯定，因而我很难不对我们面临问题的持续性着迷。就好像经济和国家至今仍在进行的一场赛跑，其中经济总是面临被国家追上的威胁，不过到今天经济一直保持领先——可能，在我们眼中，今天更是——又重新领先。胜利既来之不易，当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经济允许自己避开人们想强加给它的规则，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把游戏规则变得对它有利。对我而言，这就像是16世纪的游乐庙会或者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外行只看到表象，都不会让我惊奇，而只会令我心醉神迷。我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并向组织者和参加者致敬。我还要向加斯帕里尼（Gasparini）、博科尼以及整个意大利和欧洲致意，亲爱的欧洲正在成形。”

费尔南·布罗代尔

[1] 指查理大帝。——中译者

[2] 意大利语，意为肥胖者，转指富人。——中译者

[3] 拉丁文，直译是“在内”。——中译者

[4] 拉丁文，直译是“在内及额外（的东西）”。——中译者

[5] 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法国政治哲学家，以其理想政府学说著称。在这一政府中，民主的君主政体在国王与议会之间取得平衡，同时这一政体还拥有以神圣的权力为基础，并且只受到自然法则限制的绝对立法权力。主要著作为《共和六书》（1576年）。——中译者

[6] 意大利语，有“道德”“能力”等意。——中译者

[7]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年）：意大利艺术家、文艺理论家、建筑师，还从事数学、制图学和密码学研究，著有《论绘画》《建筑学十书》等。——中译者

[8] 意为万能之人、多面手。——中译者

[9] 列霞白利法（loi Le Chapelier）：或译制帽法。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法令，承认制帽工作的联合行动是合法的。此法令到1884年被废除。——中译者

[10] 法文术语，意思是“自由放任”和“许可”。——中译者

[11] 拉丁文，意思是“必要的条件”“不可或缺的事物”。——中译者

[12] 拉丁文，大意是说“人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译者

[13] 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2年）当选制宪会议议员，并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著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中译者

[14]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00—1864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哲学是各学科原理的综合，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提出“适者生存”说。主要著作有《社会学研究》《生物学原理》和《综合哲学》等。——中译者

[15] 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d’Aquin，约1225—1274年）：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其哲学和神学被称为“托马斯主义”。《神学大全》是其代表作。——中译者

[16] 亨利·蒙泰朗（Henri Montherlant，1896—1972年）：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以自我为中心，鼓吹刚强的美德，主要作品有小说四部曲《少女们》《可怜的妇女》《善良魔鬼》和《女麻风病人》，剧本《马拉泰斯塔》和《内战》等。——中译者

[17] 该词具有双关含义，既指“地区”，又指“打谷场”。——中译者

[18] 纯洁派（les Cathares）：是12和13世纪流行于西欧的一个基督教异端派别。信奉新摩尼派二元论，宣传善恶二元并存，物质世界为恶。曾形成严格的组织，有各级神长、礼拜仪式和系统教义，对斋戒等有严格规定，崇尚遁世苦修。13世纪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70年代后衰落，15世纪初最终绝灭。——中译者

[19] 詹森派（Janséniste）：是天主教的一个非正统的派别，主要倡导人是荷兰天主教神学家、曾任伊普鲁主教的詹森（1585—1638年），17和18世纪出现于法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认为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反对新教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人的责任而贬低天主的主动性。17世纪中叶遭罗马教皇谴责，一度被取缔。现仅存在于荷兰。——中译者

[20] 十字架的圣约翰（1542—1591年）：西班牙天主教奥秘神学家、诗人、教义师。曾改革隐修院制度，参与建立赤足加尔默罗会，并任高职。——中译者

[21] 圣特蕾莎（Sainte Thérèse，1515—1582年）：天主教奥秘神学家，著名女信徒，倡导加尔默罗会改革，要求修女完全与世隔绝，以便认真思念上帝的律法，祈祷忏悔以“尽为人类罪恶补偿之责”。曾于1567年在阿维拉成立加尔默罗会改革派的第一所女隐修院—圣约瑟女隐修院。——中译者

[22] 波特罗亚尔：法国天主教西多会女隐修院，建于1204年左右，位于凡尔赛以南。因此处环境对身体不利而于17世纪20年代迁往巴黎，不久成为詹森主义和文学活动中心。1709年隐修院解散。巴黎的波特罗亚尔女隐修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用作监狱，19世纪改作妇产医院。建筑物现保存良好。——中译者

[23] 塞维尼侯爵夫人（Mme de Sévigné，1626—1696年）：法国女作家，其书信为书简类作品中划时代的典范。生于勃艮第，由舅父抚养成人。1644年与H.德·塞维尼结婚，进入宫廷社会的女才子界。其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是与其女儿的通信，文笔节奏明快，不拘于形式，描述了当时的新闻、上层社会的奇闻逸事和她自己日常生活的细节，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译者

[24] 圣查斯丁（Saint Justin，约100—165年）：即殉教者查斯丁，基督教早期教父，生于巴勒斯坦，本为异教徒，后改奉基督教。135年后不久开始在罗马宣讲其宗教哲学。他第一次把基督教义同希腊哲学结合，并奠定历史神学的基础。认为上帝安排历史，历史是上帝所设计的救世过程，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导向超自然的历史长河的一部分。主要作品有《护教文》和《与犹太人特里风谈话录》等。——中译者

[25] 圣安布罗西（Saint Ambroise，约339—397年）：古代基督教教父，出生于罗马，曾任罗马帝国行省总督。374年被米兰市民拥戴为主教，始受洗礼入教，接受圣职，任主教时以擅弄政治权术著称。熟悉当代希腊著作，并用新柏拉图派哲学解释《圣经》的寓意。——中译者

[26] 德尔图良（Tertullien）：古代基督教著作家、雄辩家，在使拉丁语（而不是当时通行最广的希腊语）成为教会语言和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工具方面做出了贡献，许多神学词语系由他制订或由他推广，是一位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他约于155—160年间出生于非洲迦太基城。著述甚丰，主要有《护教篇》《驳赫莫金尼斯》《论基督的肉体复活》《论灵魂》和《论洗礼》等。——中译者

[27] 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约1483—1553年）：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中译本译作《巨人传》），文风粗野幽默、讽刺尖刻，反映了新兴中产阶级的要求。——中译者

[28] 蒙田（Michel Eyquemde Montaigne，1533—1592年）：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作家，持怀疑论立场，从研究自己扩大到研究人，反对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的原罪说。主要作品为《随笔集》。——中译者

[29] 伊拉斯谟（ Erasmus，1469—1536年）：荷兰人文主义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首次编订附有拉丁文的希腊文版《圣经·新约》，代表作为《愚人颂》。——中译者

[30] 波利比乌斯（Polybe，约公元前200—约前118年）：或译波利比阿，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生于希腊阿卡狄亚，曾随罗马将军西庇阿到西班牙和北非。他以长达40卷的《通史》确立了自己的不朽名声，该巨著叙述了自汉尼拔的西班牙战争到彼得那战争（公元前220—前168年）罗马主宰世界的历史。——中译者

[31]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年）：瑞士杰出的文化艺术史家。曾在柏林大学学习艺术史，通过绘画和建筑艺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后获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几个大学专门讲授艺术史，包括自古希腊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化史。代表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1860年），分析了当时的生活状况、政治气氛及显要人物的思想。另著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和《世界史观》等。——中译者

[32] 托马斯·普拉特尔（Thomas Platter，1499—1582年）：瑞士作家和人文主义者，以其自传闻名。经历过多年苦难生活，曾在苏黎世聆听过茨温利的教导，熟悉希腊、拉丁和希伯来文化。后移居巴塞尔，教授希伯来文。其自传完成于1576年，叙述他与艰难困苦进行斗争的经历。——中译者

[33]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 de la Mirandole，1463—1494年）：意大利学者和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曾在博洛尼亚、帕维亚学习，并访问巴黎和佛罗伦萨。他从希腊、希伯来、阿拉伯和拉丁的各类作家中搜集了900篇论文，为它们辩护，但其中13篇被斥为异端。其《论人的尊严的演讲》（1486年）吸取了其他哲学的精华。——中译者

[34]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保守思想的批判家和杰出的雄辩家。在帕维亚大学教授修辞学时出版《论快乐》，为伊壁鸠鲁辩护，攻击斯多葛主义。1440年，完成其最重要的著作《论君士坦丁的赠礼》，认为教皇所称的得自君士坦丁的赠礼实为后人伪造。另著有《论自由意志》《优雅拉丁语》和《新约全书集注》等。——中译者

[35] 萨卢塔托（Lino Coluccio Salutato，1331—1406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早年，在波洛尼亚学习法律，1375年起任佛罗伦萨首相，直至去世。——中译者

[36] 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文学家、政治家。曾发现许多古典拉丁文手稿，为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主要作品有《论吝啬》《论命运》和《论令名》等。——中译者

[37] 蓬波纳齐（Padouan Pomponazzi，1462—1525年）：意大利哲学家。曾在帕多瓦大学攻读哲学和医学，后在该校教哲学。精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及其注释者的著作，并按人文主义精神加以解释。主要著作有《咒文论》《命运论》和《辩护书》等。——中译者

[38] 萨沃纳罗拉（Savonarole，1452—1498年）：意大利基督教宣教士、改革家和殉教者。1475年加入多明我会，后任佛罗伦萨圣马可女隐修院讲师。提出整顿教会，通过鞭笞它使它获得新生。曾对佛罗伦萨的洛伦佐进行攻击并抨击罗马教廷。1498年被教会法庭判处绞刑和火刑。——中译者

[39] 菲奇诺（Marsilio Ficin，1433—1499年）：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和语言学家。曾任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主持人，后出任神职。他对柏拉图和其他古典希腊作家作品的翻译和注释促进了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影响欧洲思想达两个世纪之久。主要作品有《柏拉图的神学》《论基督教》和《生活三书》等。——中译者

[40] 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ütten，1488—1523年）：德国法兰克尼亚骑士和人文主义者，以爱国者、讽刺诗文作者和路德事业的拥护者著称，为《蒙昧者书简》第二卷的主要撰稿人。——中译者

[41] 茨温利（Zwingli，1484—1531年）：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曾在巴塞尔、伯尔尼和维也纳学习，后受神职，博览教父著作。1518年任苏黎世大教堂民众司铎，两年后获准宣讲“真正经义”。1523年发表六十七条论纲，鼓吹取消神职人员独身制，改革礼拜仪式等。著有《论洗礼》，认为洗礼象征上帝与信徒立约。他在圣餐礼问题上与路德发生严重争执。1531年作为随军牧师死于战场。——中译者

[42] 奥科兰帕迪乌斯（John Oecolampade，1482—1531年）：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布道师和教父著作研究家。曾在海德堡大学求学，后移居巴塞尔，协助伊拉斯谟编订希腊文本《新约》。他在该城圣马丁教堂用三种语言布道，听讲者甚众。所著《论正确解释主的话》等书支持茨温利的观点，反对路德，鼓吹圣餐只是基督受难的纪念而不是受难的重演。——中译者

[43] 米歇尔·塞维图斯（Michel Servet，1511?—1553年）：西班牙医生、神学家。1531年发表《论三位一体论的谬误》，攻击正统教义。1546年他把其观点扩充写成《恢复基督教义的本来面目》，将手稿呈送给加尔文。但同为改革家的加尔文在他1553年到日内瓦时把他逮捕，并在审讯中力主把他处死，罪名是犯有异端罪，就三位一体论和洗礼提出了谬误观点。同年10月27日他被处死。塞维图斯还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现象。——中译者

[44] 此指加尔文。——中译者

[45] 贵格会（Quakers，震颤派）：原意为"震颤教徒"，是教友会（the Society of Friends）会员的绰号。该教派的创始人是英国宗教领袖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年）。——中译者

[46] 卫斯理兄弟（约翰·卫斯理，1703—1791年；查理·卫斯理，1707—1788年）：基督教卫斯理宗（循道宗）的创始人。1729年两兄弟与科克汉、摩根等人在牛津大学林肯学院成立宗教研究小组，因强调遵守正道而被诨称为循道宗。1735年该组织解散。后来约翰在英国各地宣讲自己的宗教经验，1739年建成循道派团体。——中译者

[47] 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在牛津大学时与卫斯理兄弟结为挚友，1738年应邀与他们一起到北美佐治亚殖民地传教，并曾在十三州不少地方和英伦三岛各地布道。他在北美殖民地宗教"大觉醒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译者

[48] 弗隆德运动（la Fronde）：或译投石党运动，系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间，即1648—1653年，在法国发生的一系列内战，得名于巴黎儿童不顾当局的禁令在街上玩耍用的投石器（fronde），为抵制王权、反对专制政府运动的一部分。此为法国大革命之前对君主制权威的最后一次严重挑战。——中译者

[49] 格拉古（Tiberius Sempmnius Gracchus，公元前169/前164—前133/前106年）：古罗马护民官（公元前133年），倡导农业改革，恢复个体小农阶级，后在元老院里敌对派别的暴乱中丧生。其弟盖约·格拉古也因倡导改革而丧生。——中译者

[50] 弗朗索瓦·巴贝夫（François Babeuf，1760—1797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早期政治宣传家和鼓动家。1788年开始从事政治宣传活动，1790年曾一度被捕。获释后创办《皮卡第通信》，提倡激进的土地改革纲领。后又曾两度（分别在雅各宾派当政时期和热月派当政时期）被捕。提出平分土地和平均分配收入的学说。1796年因策划起义再次被捕，后被处死。——中译者

[51] 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年）：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者。1827年开始参加学生示威，反对复辟后的波旁王朝。认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要建立民众政府，首先必须组成纪律严明的秘密团体。撰写过《武装起义教程》，主办《祖国在危急中》等报刊。普法战争爆发后，呼吁巴黎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入侵者。巴黎公社爆发后当选为公社主席。因从事革命事业，在其一生中，他有33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中译者

[52] 奥康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1347年或1349年）：英国方济各会修士、哲学家、神学家、政论家，被认为是晚期经院哲学家中唯名论的创始人。他一方面偏爱逻辑，强调对人的自然理性和人的本性的巨大信赖，另一方面又维护上帝的至高地位，认为唯有上帝的恩惠才能拯救人类。主要著作为《七十日集》等。——中译者

[53] 让·比里当（Jean Buridan，1300—1358年）：法国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逻辑学家和光学与力学方面的科学理论家。曾随奥康姆研究哲学。认为意志可以自由推迟理性的判断。——中译者

[54] 尼古拉·奥勒姆（Nicholas Oresme，约1325—1382年）：法国天主教主教、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和经济学家。曾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著有《天体论》《天空与世界之书》《货币论》和《占卜之书》等。其著作为现代数学和科学的发展，为法国散文，尤其是科学词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中译者

[55] 安培（Andre Marie Ampère，1775—1836年）：法国物理学家，电动力学奠基人之一。制定安培定律，首创电磁学理论。主要著作为《由实验导出的电动力学现象的数学理论文集》等。——中译者

[56] 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年）：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因研究太阳系稳定性的动力问题而被誉为法国的牛顿。1796年出版《宇宙体系论》，提出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关于行星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另著有《天体力学》《概率分析理论》等。——中译者

[57] 勒让德（Adrien-Marie Legendre，1752—1833年）：法国数学家，在椭圆积分和大地测量方面均有突出贡献。代表作为《几何基础》《椭圆函数论》和《数论》等。——中译者

[58] 毕奥（Jean Baptiste Biot，1774—1862年）：法国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与萨伐尔共同提出了关于磁场的毕奥-萨伐尔定律，此为现代电磁理论的基本部分。后发现在化学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非破坏性判明蔗糖水解程度的方法，从而创立了偏振技术。著作甚多，主要有《物理天文学初阶》等。1856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中译者

[59] 柯西（Augustin-Louis Cauchy，1789—1757年）：法国数学家，在数学分析和置换群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对数学的伟大贡献还在于引进了清晰的和严格的方法。主要著作有《皇家综合工科学校分析教程》《无穷小分析教程》和《无穷小分析的几何应用教程》等。他在天文学和光学方面也有较突出的成就。——中译者

[60] 阿格里科拉（Georg Agricola，1494—1555年）：16世纪德意志采矿和冶金学者、作家，被誉为矿物学之父。所著《金属学》于1556年他去世后出版。——中译者

[61] 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1663—1729年）：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发明的大气式蒸汽机是瓦特蒸汽机的前身。——中译者

[62] 在英国叫作chintz，源自印地语chint。—英译者

[63] 英译者梅因在此补充了下列内容："或用英国的术语，国民储蓄、政府贷款或财政部债券。"——中译者

[64] 梅佐焦诺（Mezzogiorno）：指意大利南部地区，尤其是指罗马所在纬度以南地区，包括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中译者

[65] 赫尔曼·亚历山大·凯泽林（Hermann Alexander Keyserling，1880—1946年）：德国社会哲学家，著有《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不朽》《创造性的认识》等。他研究哲学的方法主要是非学院式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流行一时。——中译者

[66] 克劳斯·斯吕特（Claus Sluter，约1340/1350—1406年）：荷兰早期雕塑家之一，其写实主义风格作品既充满活力又宏伟壮观，对北欧15世纪画家和雕塑家影响很大。主要作品有《摩西之泉》《耶稣受难》等。作品主要是在第戎完成的。——中译者

[67] 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建筑师。早期建筑作品有佛罗伦萨的育婴堂，其拱廊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式建筑的最早实例。他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此教堂1296年开始兴建，14世纪中期完成了中堂，并开始建造东墙复杂的八角形体。但如何在此庞大的八角形体上建造穹顶这一难题，直到1418年才由布鲁内莱斯基完成。穹顶于1420年动工，1436年完成（穹顶小亭不在内）。1434—1437年，他设计了佛罗伦萨的圣马利亚教堂，许多评论家认为它代表他的作品开始步入成熟阶段。应当说明的是，布罗代尔在正文中所述事实似指佛罗伦萨大教堂而不是圣马利亚教堂。——中译者

[68] 弗朗切斯科·普利马蒂乔（Francesco Primticcio，即Le Pirmatice，1504—1570年）：意大利风格主义画家、建筑师，曾任枫丹白露首席画师。——中译者

[69] 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1525—1594年）：全名乔瓦尼·皮耶路易吉·达·帕莱斯特里纳，16世纪中叶最著名的作曲家。其作品以精神品质和技巧完美著称，一生创作了大量高水准的宗教和世俗音乐，包括不同风格的105首弥撒曲（4—8声部）、250余首经文歌、68首奉献曲、12首连祷曲、35首圣母颂和许多牧歌等。——中译者

[70] 此处原为意大利语，意为"室内音乐"。——中译者

[71] 此处原为意大利语，意为"室内小提琴音乐家"。——中译者

[72] 阿尔坎杰洛·科莱利（Arcangelo Corelli，1653—1713年）：17世纪意大利主要小提琴家、作曲家。创造了自己的小提琴演奏风格和大协奏曲的形式，其小提琴奏鸣曲也成为后来发展的典范。主要作品有《大协奏曲》（作品第六号，由两把小提琴和大提琴协奏）、《12首奏鸣曲》（作品第五号，为小提琴、低音大提琴或古钢琴而作）。——中译者

[73] 安东尼奥·威瓦尔第（Antonio Lucio Vivald，1678—1743年）：生于威尼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指挥。一生创作了43部歌剧，虽音乐品质很高，但因宣叙调过多、剧本较为沉闷而不受现代人欢迎。其宗教音乐显示了高超的威尼斯复调传统，但也多半不为世人所知。最受人欢迎的是其器乐作品，计有450多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中译者

[74] 斯塔米茨（Stamitz）：是捷克一个擅长音乐创作的家族。第一位斯塔米茨名叫约翰（1717—1757年），他创立了交响乐作曲家的曼海姆乐派，把曼海姆管弦乐团的精确性和表现幅度提高到当时无可比拟的水平。其风格的一个标志是渐强与渐弱的管弦乐效果，另一特点是采用"叹息式"留音法。他的两个儿子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卡尔·菲利普（1745—1801年）以中提琴和抒情古提琴演奏家著称，J.A.斯塔米茨（1754—约1809年）则创作了大量器乐作品。——中译者

[75] 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年）：奥地利作曲家，音乐奇才，5岁开始作曲，主要作品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及大量交响曲、协奏曲和室内乐等。——中译者

[76] 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endel，1685—1759年）：德国作曲家，后移居英国。一生创作歌剧、清唱剧70余部及大量康塔塔、声乐曲等，代表作有清唱剧《弥赛亚》、管弦乐曲《水上音乐》等。——中译者

[77] 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von Gluck，1714—1787年）：德国作曲家，曾任维也纳宫廷歌剧指挥。倡导歌剧革新，主张音乐服从戏剧的要求。代表作有歌剧《奥菲欧与欧律狄刻》《阿尔西斯特》等。——中译者

[78]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年）：德国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对这两门学科对现代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首次提出"生存空间"的概念，认为人种与其生成的空间环境有关。主要著作有《人类史》《人文地理学》《地球与生命》《政治地理学》和《美国政治地理研究》等。——中译者

[79] 保罗·韦达-拉布拉歇（Paul Vidaldela Blache，1845—1918年）：是一位对现代地理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法国地理学家。一生研究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认为人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改造环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主要著作有《法国地理概观》和《法国东部》、论文集《人文地理学原理》等。——中译者

[80] 法文缩写为A.E.L.E.，英文缩写为EFTA。——中译者

[81] 欧洲煤钢联营的法文缩写（英文缩写为ECSC）。——中译者

[82]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法文缩写（英文缩写为EEC）。——中译者

[83] 科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年）：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海军大臣，大力振兴法国工商业，扩大其国际贸易，保护关税，发展海军，致力于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中译者

[84] 奥兰治的纪尧姆：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来自荷兰奥兰治家族的威廉（Quillaumed'Orange，1650—1702年）。威廉本为尼德兰联合省执政（1672—1702年），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被邀请出任英国国王（1688—1702年），与其妻玛丽二世共同执政。任内接受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中译者

[85] 加莱海角（Pas-de-Calais）：即英美人所说的多佛尔海峡。——中译者

[86] 缪拉（JoachimMurat，1767—1815年）：拿破仑手下大将，法国元帅，曾统率法国骑兵屡建战功，并任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年）。1815年被奥地利军队俘获，后被处死。——中译者

[87] 舒曼计划：简称C.E.C.A.，即欧洲煤钢共同体舒曼计划。——中译者

第二部分 美洲

第二十章 另一个新大陆：拉丁美洲

美洲是由两个大的文化整体构成的。“美洲”一词本身，如果不加任何修饰语，指的是美国（有时还应加上加拿大，尤其是在它卷入美国轴心之后）。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新大陆，一个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新大陆，一个拥有“未来生活”的新大陆。另一个美洲，即美洲大陆最广袤的一半，看来接受了较为晚近出现的定语“拉丁”，接受了“拉丁美洲”的称呼。“拉丁”一词是法国首先使用的（时间是1865年前后，当时它有它自己私下的打算），后来在欧洲流行开来。这是一个多种多样的美洲，它色彩浓艳，富于戏剧性，四分五裂，彼此不和。

谈论美洲从拉丁美洲开始，可以避免直接与北美进行比较，不致事先在北美的巨大进步的习惯重压下被压碎，从而能更清楚地看一看拉丁美洲本身，因为这里是非常值得观察一番的：从它的高质量的人道主义方面，从它的种种特殊问题中，从它明显的进步方面进行观察。昔日，它比另一个美洲即北美先进得多，是第一富饶的美洲，因此，人们对它垂涎三尺。昔日如此，后来运气转了。现在拉丁美洲的命运远非幸运：重重阴云压在它的头上。对拉丁美洲来说，天还没有真正、完全地亮起来。

空间、自然与社会：文学证据

比起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拉丁美洲更是不断变化，而且变化更加迅速。昔日的景象明日很可能就不值分文，或者听起来就像是假的。

如果无法亲临那里一览其景象，我们至少必须读一读拉丁美洲令人赞美的文学。这一文学是直截了当的，不大矫揉造作的，天真的，而且持非常直率的政治态度。它向人们提供了无数次精神方面神奇的旅行；它提供的证据清晰明白，既超过了种种报道，也超过了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尽管许多历史著作无疑非常出色）所能提供

给我们的东西。

文学还揭示了一种不可估量的东西：拉丁美洲始终独处、常常不为人知的各个国家和社会的芳香，尽管迎接它们时可感受到明显的暖意和坦诚。

·拉丁美洲是一个广袤的空间。它人烟稀少，实际上仍缩在其过分宽大的外衣中。那里空间极其广袤，广袤得让人陶醉。

可以肯定，航空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庞大的区域变小了，使它变得更加文明，并使得距离感几乎消失。这样外国旅行家越来越有可能忽略拉丁美洲地域辽阔这种基础坐标、这一基本事实。

几年前，人们就已可以用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穿越亚马孙河流域，或者说，是乘飞机飞越，因为亚马孙河流域穿越起来要遇到最棘手的难题（正如巴西人所说，isto é matto，“这就是森林”）。飞越阿根廷和智利之间的安第斯山脉（des Andes），当时用的是双引擎飞机，这些轻型飞机进入拉孔布雷山谷（la Cumbra），就从那里小型的齿轨铁路火车的头顶飞过，大山谷中的风一会儿从这一侧，一会儿从另一侧，推动轻型飞机，但总之是在山脉之间，事实上是在山脉之下飞行。今天，四引擎飞机每天从这天然屏障上飞过。穿过安第斯山脉之后用了不消一刻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冰川上飞行10分钟，飞机就可以向空旷的阿根廷平原或智利海滨俯冲了。尤其是航空变得普及了：航行的轻快音响如今在拉丁美洲各处都可以听到。

但实际上，只有享有特权的旅行家才能体验到这些奇妙的冒险尝试，这些奢侈的游览，它们使你离开墨西哥，那里的Nortes（北风）在夜里仍在把花园里的绿色作物冻坏，几个时辰过后，又把你抛入尤卡坦（Yucatan）半岛或巴西韦拉克鲁斯（Vera Cruz）的炎热天气之中，或者把你放在阿卡普尔科（Acapulco）太平洋海滨那些天堂般的温泉和花朵旁。同样，只有那些贵重或能够赢利的商品才被空运过去销售：智利的海产品由飞机运至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尚未屠宰的牲畜或优质肉从蒙多萨（Mendoza）出发，由飞机在科迪勒拉山系（la Cordillère）上空颠簸摇摆，奔向圣地亚哥（Santiago），或运送到智利沙漠北方的矿工手中。

这种新的距离算术，即距离缩短，尽管可能，但仍旧是一个例外。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飞机场上，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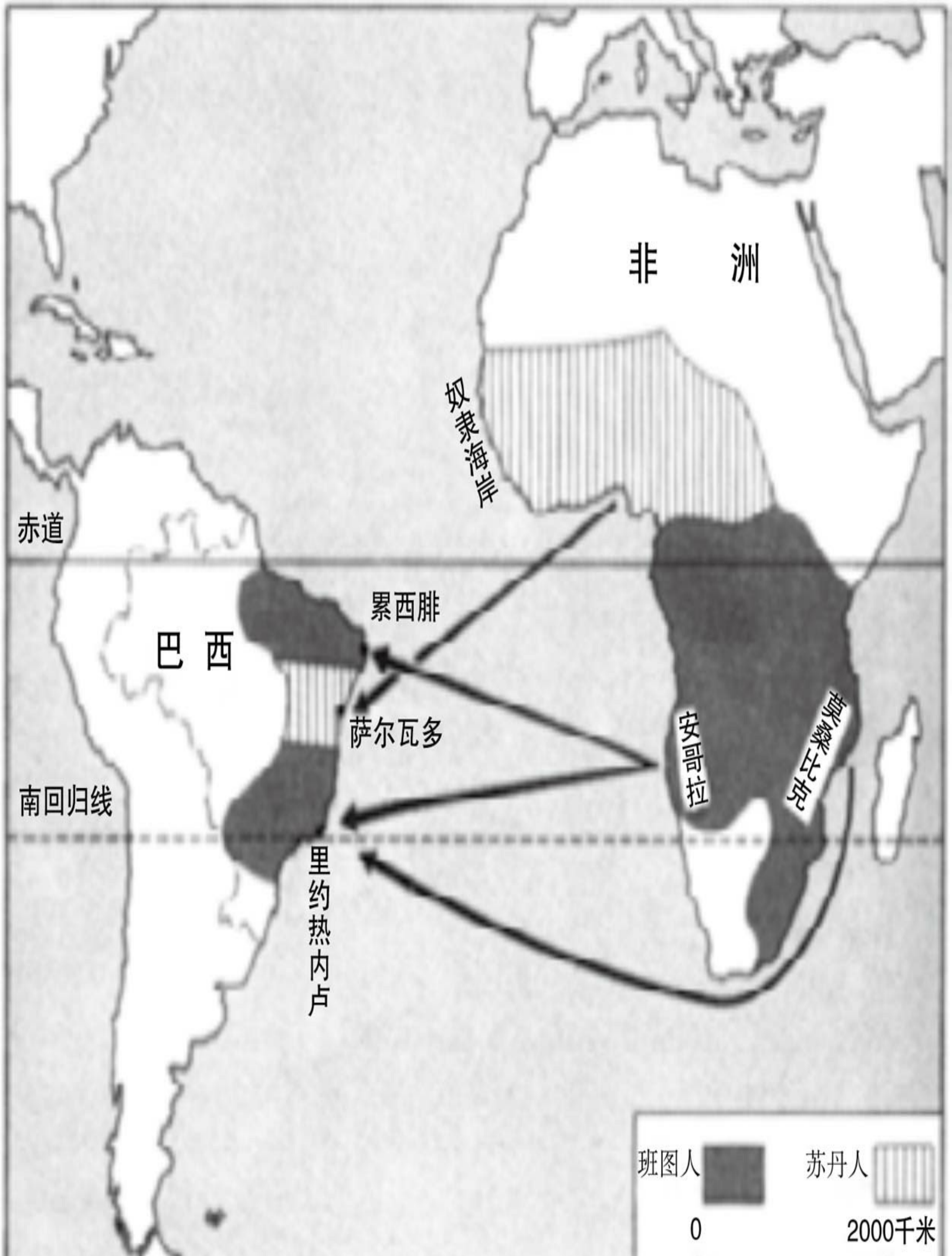
或降落。但是运载的旅客只代表人口中微小的一部分，只代表人口中的资产阶级，人们若想这样说的话。而飞机在拉丁美洲并不能起大众运输体系（比如火车、公共汽车、私人汽车）的作用。大众运输体系给欧洲带来了一个如此严密的交通网。

拉丁美洲曾经在一个靠人和兽的脚步丈量的空间存活过，而且现在依然存活着，正像它过去形成时那样。它的步伐过去不是由铁路决定的，因为铁路很稀少；也不是由公路决定的。有些公路的路况非常优质，比如墨西哥的carreteras（公路），但它们同样为数不太多，需要不断地建造或修整。拉丁美洲仍然具有闲庭漫步的印迹，在许多方面缓慢迟钝。

如果在想象中要与马丁·菲耶罗，这个由何塞·埃尔南德斯 [1] 在1872年创造的英雄时代的加乌乔人（le Gaucho），或者与甘多·松勃拉，这个由才华出众的里卡多·吉拉尔德斯 [2] 创造（1939年）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最后一位自由流浪的加乌乔人，一起徒步或骑马而行，人们必定能够认识并接受拉丁美洲空间巨大、距离遥远的事实。同样的认识还有助于人们看清巴西东北部的“荆棘丛林”（les brousses），即厄克利德斯·德·库尼亚 [3] 在《腹地》（1902年出版）中描述过的干旱饥饿的“四边形土地”（le quadrilatere）。这还有助于人们阅读吕西奥·曼希拉（Lucio Mansilla）日复一日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论坛报》（*La Tribuna* ）撰写的有关印第安人尚在居住的阿根廷内陆无边无际的空间的最优美的报道，这些报道在1870年以《朗克印第安人之旅》（*Una excursión a los Indiosrarqueles* ）一名结集出版。一个更好的例子是自然学家和小说家恩里克·赫德森 [4] 的作品，这位在阿根廷长大、后来加入英国国籍的作家在书中对当时完全空旷无人的巴塔哥尼亚（la Patagonie）高原做了最优美的记述。


西语区
葡语区
平方千米
1200 万
800 万
人口
1.25 亿
6200 万

图18 西属美洲与葡属美洲



非　洲
奴隶海岸
赤道
巴　西
累西腓
萨尔瓦多
安哥拉
莫桑比克
南回归线
里约热内卢
班图人
苏丹人
0
2000千米

图19 拉丁美洲黑人的起源

这里还应该提及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5]和法国人奥古斯特·德·圣提雷尔（Auguste de Saint-Hilaire，1799—1835年）的美不胜收的游记，他们虽然都是外国人，但都被他们所描述的国家完全接受，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南美洲文学归入自己的行列了。

这些经典游记中最生动的一个景象无疑是骡队。它们有固定的路线，还有几乎固定的时刻表，有正常的“车站”，即那些棚屋（ranchos），牲口、货物和人晚上在这儿休息，以便翌日再上路。这些骡子商队，正如人们所说，是最早的卡车运输，是最早的铁路……它们是最早的穿越非常空旷的空间的手段，这些地方即便到了今日仍然非常辽阔、原始。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如果人们不能像在西欧那样牢牢定居一地，如果他们过于轻易就放弃其土地，那只能是因为不太远的地方空间极其丰富。今天的情况依然是这样，畜群的长河仍像16和17世纪一样继续穿过大陆的中心地带，在行程的终点突然出现在传统的牲畜集市上，比如远离海岸线的内地巴伊亚（Bahia）的牲畜集市。那是一种原始的、费用甚少地利用资源的方式，是一种廉价的资本主义，只要有足够的空间就可免费给予，或差不多免费给予。

因而，人们迷失或者说淹没在广袤的空间之中，孤立无援；城市离得很远，非常遥远，尤其是远离欧洲母邦或殖民地的首都；有些省份甚至比整个意大利或法国还要大。那么一来，人们最终按他们自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尤其是在过去，是最自然不过的了。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首先必须生存下来。在南北两个美洲，实行self government（自治）原则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tie américaine）部分地是空间的产儿。至少在空间没有被征服之前，这空间使一切减弱，也保存了一切。

·使农民摆脱蛮荒自然——昔日的伟大梦想。南美洲的大自然造就了，并且还在造就着令人钦佩的、贫穷的、吃苦耐劳的人：潘帕斯草原的加乌乔人，巴西的caboclo（铜色皮肤原住民），墨西哥的农民（peón，贫苦农民）。这后者只要有一位真正的首领，比如1911—1919年控制墨西哥城周围战场的可敬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6]，就会揭竿而起。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不是在于使他们摆脱构成其“野蛮”实质的贫困呢？19世纪乃至20世纪狂热的知识分子都曾抱有这种幻想。不是像制伏

野马那样驯化这些人（除非必须这样），而是教育他们怎样生活，怎样保重自己的身体，怎样阅读。迫在眉睫的任务远未完成：现实还在发生这类运动，成批的小学教师、医生和卫生工作者满怀激情地联起手来进行所谓的扫盲运动。

这些农民，这些草莽英雄，在19和20世纪大量的小说中自然而然地占有位置，在昔日的传奇中，他们常常被描绘为以某种形式的爱情决斗与文明搏斗。这种象征性的多情常常变为爱情小说，它们同样是一种证据：把它们稍做调整，轻轻的几笔，就可把它们变为感伤小说（romans noirs）。

《马丁·菲耶罗》（1872年）中的主人公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一个庄稼汉，但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是一个吟游诗人，诗歌的温文尔雅更增加了他最初所有的文雅，使他摆脱了艰苦生活——因为他歌唱，他写诗——也增强了他的自尊心（pundonor）。通过《堂娜·芭芭拉》（*Doña Barbara*），罗慕洛·加列戈斯[7]（委内瑞拉进步总统，1948年政变中被迫下台）把一名妇女搬上了舞台。之所以给女主角起“芭芭拉”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她什么都不会搞错。她美丽、迷人、粗野，而且下流和无所顾忌；她有优点，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使她恬不知耻地夺取她所要的东西。然而，放心吧，她战胜不了天真、温柔而有同情心的“法学博士”，继承遗产的偶然性使博士回归伊拉诺斯（Ilanos），那是一个位于河流源头的牧人放牧的平原，人们必须乘慢得叫人发愁的渡船溯流而上。这至少给人带来消遣，可以射击凯门鳄那静止不动的目标，而我们的博士当然是射击高手（Buffalo Bill）……《黑种女人安古斯蒂亚斯》（*La Negra Angustias*）使作者弗朗西斯科·罗哈斯·冈萨雷斯（Francisco Rojas Gonzales）荣膺1944年墨西哥国家文学奖。书中的女主角也是一位美丽而天真的人。即使小说靠不住，也必须老实承认她同时是一个残暴冷酷集团的头领。这个头脑简单的悍妇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突然间在教她读书的微末的小学教师面前被驯服：奇迹出现了。安古斯蒂亚斯嫁给了她的老师，和文明联了姻。

这一类型的小说并不都像这样带有重重的感情色彩。哥伦比亚人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8]的《旋涡》（*Vorágine*，1925年）是关于一对被亚马孙河流域丛林吞噬的英雄的凄惨史诗。但是，这些书是玫瑰色还是黑色（乐观还是悲观），取决于自然。自然使人变得粗野，只需驯服它，就可同时使人变得文明或获得解放。我们如果相信智利小说家本哲明·苏贝尔卡索（Benjamin Subercaseaux）的话，那么智利的不幸只会在

于它“不可思议的地理”［《智利区域性地理》（*Una geografía loca*），1940年］。

这种文学，这种看法，乃是昔日的写照。它们今天正逐渐地、往往无可奈何地从活生生的地平线消失。

·战斗的社会与农民的文学开始活跃：今天，被自然、空间或贫穷本身与世隔绝的不幸者，尤其始终是文学的主角，但是这主角被新的战斗文学弄得过火得可笑。新文学感情强烈、平铺直叙、色彩浓艳。它们首先把穷人展示为社会的乃至文明的牺牲品，它对生活的恐惧，就像对荒无人烟的自然本身那样无动于衷。

这种文学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一个新的时刻：它确实是富有革命意义的，显示出对南美洲特有问题的尖锐觉醒，对从“文明”本身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丧失信心，不再对它抱有希望,由此产生了它阴郁的现实主义和它的悲观绝望。

墨西哥小说家马里亚诺·阿苏埃拉[9]的作品《在底层的人们》（*Los de abajo*，1942年），只是一声抗议的长啸。它把我们投入这场复杂的群众革命之中，这一革命尽管没有完成，还是把墨西哥至少自1910年以来变成了现代国家；此次革命使墨西哥可能付出了死难100万人的代价，这100万人都是穷困交加之人。书中描述的是少数被杀的革命军人（作者目睹了他们的死难，因为他本人是革命家团体的一位随军医生）的历史，是不幸的人醒悟了的历史，他们在不共戴天的社会面前被解除了武装。在这个社会里，富人太富有，太残忍；穷人太穷，人数太多，而且太天真。

巴西非常伟大的作家若热·阿马多[10]的长河小说[11]涉及的都是巴西东北部这块饥饿不已、迁移不定和苦难无穷无尽的地区，小说集异乎寻常的美感和力度于一体。不论它们对当代问题表什么样的态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论它们的辩护词口气如何，它们都是不同寻常的真凭实据，证实了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农民与饥饿进行斗争的一幕幕惨剧。在这么一个几乎属于封建制的乡村，人甚至感受不到土地的温馨。

阅读这类文学作品，我们处处都可找到类似的缠人的证据。作家若热·伊卡萨[12]把我们带到了厄瓜多尔。在地图上，厄瓜多尔是一个面积非常小的国家。实际上它并不算小，其面积为45万平方千米，比意大利还要大。1962年，厄瓜多尔只有200万居民，它曾表示愿意接收100万移

民。这对它来说轻而易举；20年后，其人口达到了900万。伊卡萨1934年创作的小说《瓦西蓬戈》（*Huasipungo*，法译本1946年出版）的主角阿方索·佩雷拉和他的家族通过崎岖的骡子路，在远离基多（Quito）的高山里，获得了地产。他不能继续留在城里，因为他的女儿竟然傻到听信一位印第安人的话，怀了他的孩子。只有在山里，这个不合法的孩子不合时宜的出生才不会引起丝毫轰动。山中旅程非常奇怪，事件迭起。到达高地的沼泽时，骡子陷入了泥潭。每个人都下了马，这时，“三个印第安人用袖口擦拭因下雾而结霜的面颊，准备背起主人一家；他们脱去披风，将劣质麻布做成的肥裤子卷到大腿根，摘掉羊毛帽，把披风盘在脖子上，与土匪的头巾很相像，寒风刺骨，严寒穿透了棉布的破洞和裂口……他们伸出臂膀，以便全家人（父亲、母亲和女儿）能从骡背上转到人背上”。于是这群人挣扎着在冰冷的烂泥里跋涉……

这部作品作为文学有些生硬，但每次读起来都令人激动。大概仅仅是因为它所描绘的社会现实非常严酷：它实质上用很长时间描写激烈的土地问题，并因此仅仅满足于审视农村独有的苦难。工业郊区或遥远矿区中工人的苦难，不在它的叙述范围之内，也超出了该书的体验。已出版的描写城市苦难的罕见的震动人心的证据之一（除了只对小批专家有用的社会学家的研究外），是一位半文盲的巴西女黑人卡罗琳娜·玛丽亚·德·赫苏斯（Carolina Maria de Jésus）的日记。此人生活在圣保罗贫民窟。这部日记不是一部文学作品，甚至也算不上是社会学研究，而是纯粹的文献［法译本，《垃圾场》（*Le Dépotoir*），1962年，斯托克］。

除了这少数几个例外，充斥于整个文学的都是农民的苦难，这苦难使人断绝了一切希望。无论如何，只有一剂良药可以补救，那就是造反、采取暴力行动和进行革命。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领导的古巴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农民的革命，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原因无疑就在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都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无论如何，所有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不论他们个人的见解如何，都清楚地知道，严肃地考察政治和社会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法，具有绝对的必要性。

面对种族问题：准博爱

·拉丁美洲往往能够解决，或者至少（无论是缄默、拖延，或心理上有所保留）正在解决摆在它面前的一个最严重的难题：那就是种族问

题。

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第一个差异（虽不是唯一的），当然是后者自发的和日趋强烈的得到肯定的自由主义，这种差异越来越体现在摆脱种族偏见上。无疑，在肤色这个方面，并不是所有一切都尽善尽美。但是在世界的哪一部分，人们能够做得更好呢？就这一方面而言，拉丁美洲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历史没有为此做准备，因为历史在拉丁美洲并排安置了世界的三大种族：黄种（印第安人被错误地命名为“红种”）、黑种、白种。所有三个种族都蓬勃有力，谁也不愿向其他两个种族表示屈服。

假如哥伦布以前的美洲一直不与外界接触，并保有其协调一致的文明，这类种族问题显然就不会存在：阿兹特克人［l’Aztèque，加上玛雅人（les Mayas）］的文明，大体上就是墨西哥文明；安第斯山脉文明，即那一系列辉煌灿烂的高山文明，它们在印加帝国的假“社会主义”权威下大致联合起来，还不算新大陆剩余地区所属的庞大的原始文化区。

如果说15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地区，能够使一切都服从其法律和其现实存在，而不是一个渺小的当时只有5000万居民的世界，忙于（而且必须这么去做）生产每天所食的面包，只是偶尔地派少数几个人到美洲进行冒险，那么任何种族问题都不会存在，也不再存在。整个15世纪期间，离开塞维利亚前往新大陆者，总数可能有10万人。他们或许可以征服那里，但他们从美洲世界真正能够得到什么？

最后，如果首先是几内亚湾海滨，继而是整个非洲沿海地区没有提供美洲所缺乏的人力，即那些黑奴——没有他们，糖、咖啡、金粉都不会存在——那么，第三个问题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再存在。

因而，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三个种族今天便会聚在一起：没有哪一个强大得足以消灭，甚或试图消灭其他的种族。他们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生活，尽管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但他们可以和解，互相融合，达到某种程度的彼此宽容与尊重。

·种族空间依然存在：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比不同种族目前的地理残存与地理界限更清晰的了。这事实上是过去的遗存。

白人征服者首先遇到的是印第安文明。新来者野蛮无情地对待印第

安人，把他们洗劫一空。实际上，在征服破坏之外，还有更大的灾难，即剥削与强制劳动。原住民人口以前所未闻的比例减少。在印第安人尚处原始状态（游移不定，常以木薯为食）、以部落方式生活的地方，自最初与欧洲人接触以来，印第安人几乎到处都被扫地出门；只有几个实难接近的地区保护下来，如亚马孙河河谷，白人绞尽脑汁，到了很晚的时候才进入那里。

但是真正的印第安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明，最终都成功地幸存下来。印第安文明被解除了武装，所配备的工具拙劣（印第安文明不知道车轮、铁、火药、家畜，羊驼除外），在没有任何戒备的情况下其心脏地带（墨西哥——当时的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当即遭到攻击，因而肯定轻易地就成为别人的猎物。尽管如此，印第安人由于他们并肩协力而得到了拯救。今天，墨西哥断言自己是令人自豪的“印第安之地”；在安第斯高原上，古代的本土生活依旧存在，它异常贫穷，但富有生命力，根深蒂固，它的存在不可替代。

至于黑人，则依旧待在气候、种植园、金矿沙、城市的奢华、种种机遇将他们带到的地方。这一过程始于16世纪，奴隶制结束后依然滞留在那里。此后，黑人频繁地向活跃的工业中心迁移。因而，人们能够在大西洋海滨和缺乏印第安劳动力的地方找到黑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黑人在巴西北部——殖民地时期巴西的心脏——占人口的大多数，在巴西所有现代大城市广泛出现。在安的列斯群岛[13]，黑人到处安家。

至于白人，他们占有美洲大陆的历程至少可分为两大阶段，而每一次卷入的都是不同的民族。

在第一次征服过程中，白人在他们能够生存的地方到处定居下来，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定居在印第安伟大文明发祥地的环境中，在那里他们非常自然地找到“臣民”和丰盛的餐桌。这就是西班牙人的情况，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大城市是墨西哥城、利马（由征服者所创建），在现今玻利维亚的上安第斯山脉是波托西（Potosi，征服者创建的另一城市），在那里建城是因为它有银矿（1600年，15万居民生活在海拔4000米的波托西）。西班牙殖民地艺术，尤其是巴洛克艺术，今天仍可在那里看到，足见这些殖民地城市新富享受到何等的富丽堂皇。但是绝不能忘记，他们的居民，大部分是印第安人。

与此相反，葡萄牙人在巴西只遇到一个人数稀少且分散、不稳固的

印第安人口。由此一来，黑人在当地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殖民时代的巴西大城市实质上具有非洲特点：旧的首都巴伊亚，连同365所教堂（一年的每一天有一所教堂）；累西腓（Recife），北方的大糖业中心，系荷兰人在短暂的占领期间（1630—1653年）所创办；欧雷普雷托（Ouro Pretor，字面意思是“黑金”），随着淘金热而创建于内陆；里约热内卢（Riode Janeiro）于1763年成为首都。相反，圣保罗（São Paulo）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居住着冒险家和海盗；圣保罗城内白人很少，印第安人很多。此外，城里还有混血儿，当时人称“烧焦的木头”（bois brûlés），葡萄牙语称为mamelucos（印欧混血儿）[14]。

殖民时代的所有这些细节令人想起克里奥尔人[15]美洲的种种成就，安的列斯群岛的形象就产生于此。圣多明各和牙买加，先是糖岛，而后是咖啡岛。相对于所有别的地方，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想象中，它们的地位更高。然而这景象到处都一样。到处都呈现出一种原始的、中世纪的、奴隶制的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奇怪的混合。只有田野或榨糖厂，或大银矿，或金沙的主人，才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其奴隶或仆人则不然。这便产生了古代特色的家族（paterfamilias，家长实际上长期拥有对其家族所有成员及其全体仆役的生死之权），主人的豪宅俯视着一排排奴隶的茅屋。而后，城市与豪门富户（sobrados[16]，殖民地时期巴西对多层楼房的称呼）、商人店铺、贫民陋室（昔日巴西所谓的mucambos，今天的favelas，意思均是贫民窟。它们相当于今天那么多城郊的bidonvilles，贫民窟）一起成长起来。

1822年和1823年以后，拉丁美洲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宗主国那里获得了独立——同时从加的斯商人和里斯本商人那里获得了解放。但那时它将遭受整个欧洲的资本家，首先是伦敦资本家，有条不紊和恬不知耻的剥削。新的独立国家是欧洲工业家或银行家过分天真的顾客。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1821年，伦敦把有点过时的战争物资卖给墨西哥，这些东西曾使伦敦在滑铁卢战役中获得胜利。

但是，与此同时，南美洲向欧洲移民比昔日更大地敞开了门户（不再只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这在起初规模不大，来到这里的是艺术家、知识分子、工程师、实业家。后来自1880年起，轮船航行于南大西洋，欧洲向此移民的规模迅速增大。乘轮船航行使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大量抵达这里，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的其他欧洲人了。

整个南美洲并非都同样地欢迎他们。他们帮助圣保罗所在纬线以南的南方巴西（旧巴西以北方为中心）、阿根廷和智利发家致富。在广阔

的空间，这次移民，这种人口轰炸，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其速度不仅仅是很快，而且是非常迅速。它开始向农村移民。《堂娜·芭芭拉》一书中“法学博士”未能完成的事，移民即将使其变得现实可行。它造就了现代巴西、现代阿根廷、现代智利。1939年之前，一位欧洲旅行者在其旅行的途中，在这儿会重新找到意大利，一个勤劳得令人称羡的意大利；而在另一个地方，在南里奥格兰德（le Rio Grande do Sul）或圣卡塔琳娜（Santa Catalina），或者在智利，骤然间他会重新找到一个一贯忠于它的文明，忠于遥远的祖国，忠于祖国轰轰烈烈的历史的德国。

正是这些移民造就了拓荒区、拓荒工业的光荣。还是这些移民又出现在移民区的边缘，面对着比奥-比奥（Bio-Bio）正南的智利“边疆”，面对着昔日荒无人烟的巴塔哥尼亚高原，或者和新的咖啡树种植园（cafezais）一起，又出现在圣保罗州的深处：咖啡树耗尽了地力，种植园（fazendas）必须搬走，到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土地，寻找森林，并立即烧毁树木，争得土地进行种植。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熟知、能够复述的决定命运的故事，我们可以长时间讲下去。但是就我们的观点看，这是要点吗？

·要点，是各民族的博爱：所有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地方，在拉丁美洲的建设中，携手合作。

他们也屡屡因社会原因互相冲突。的确，肤色界线曾经是而且仍旧是一条社会界线。谁发财致富，谁进行统治，无论其皮肤确切的颜色怎样，都越过或将越过这条界线。在秘鲁，在黑白混血儿中，尤其是在印第安人口中，进行指挥的那些人被给予“白人”（blancos）的称号。换句话说，财富和权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最经常地掌握在真正白种人的手中。

迄至现在，在“真正的”白种人存在的范围内，情况是这样。不过，就大多数而言——这具有重要意义——是各种族非常广泛地互相融合。“我们都有，”累西腓的社会学家吉尔维托·弗雷尔[17]自娱时写道［显然他是为他的巴西东北——“东北地区”（O Nordeste）而说这话的，尽管这东北地区已经蔓延到整个巴西地区］，“我们的血脉中都有一品脱黑种人的血。”在融合最经常发生的地方，在墨西哥（白人和印第安人），在巴西东北部（黑人和白人），种族宽容和种族博爱也较其他地方更为明显。

然而，即使在这些得天独厚的地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障碍。混血

的美洲面对遥远的欧洲，长期具有一种自卑感，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过分鼓励这种情结。北美洲也给它树立了人们所知的坏榜样。尽管如此，在美国旅行，对皮肤尽管是白色但并非绝对一清二楚（即绝对纯洁）的许多南美洲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反面教训，一个必须宽容的教训，同时是宝贵的满足，意识到必须在更爱自己国家的同时，彼此更互相爱戴。

显露出这一点的所有情结与偏见并没有神奇地消失。可是1919年之后，或者1930年之后，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刮过来一阵大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疯狂过后，突然降临的经济灾难（1929年以外）过后，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过后，人们还会那样热爱欧洲吗？（会，但是否像过去一样尊重？）拉丁美洲各个自由与好客的国家，逐渐为自己赢得了尊敬。变化的确很迟缓，而且没有彻底完成，但已经毅然决然地启动了。吉尔维托·弗雷尔这位社会学家，不再按照传统的文学模式，不再讲小说或杂文的诗歌语言，而是讲年轻的人文科学的爆炸性的语言（1933年）。他的首部著作在巴西，在整个新大陆中这个面积最辽阔、人口最多，同时可能也算是最具人文气息的国家出版，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同样，从1910年起，墨西哥的亲印第安人的革命不仅开启了一系列政治革命的周期，或者说土地革命的周期，它还打开了希望的大门。

尽管如此，种族平等博爱这一战果在美洲各地或多或少是赢得了，但具体程度随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它还是屡屡碰上过去的社会分层的障碍。因为拉丁美洲也有完全是白人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在那里，只是远在北部或极南部有一些印第安人遗存，而且人数很少）。这种情况与其他一些国家相反；根据人类学家的看法，种族混合在那里已经产生了不变的、稳定的新种族类型：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就是这样，在其他地方，无疑也一样。

然而，即使有时种族间的这种博爱发挥不了充分作用，或不可能总是发挥作用，在整体上它还是存在的，构成这“另一个美洲”的特点之一。这个基本特点，肯定是它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使它显得非常突出，让人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返回祖国途中在巴拿马中途停靠时，一位南美旅行家极为高兴：肤色的这种多样性，这种清脆的嗓音，这些喊叫，这些歌唱，无疑让他已经有了身在家中的感觉了。

经济：文明受到考验

拉丁美洲，尽管它漫不经心，欢乐活跃，民众节日沸沸扬扬，但在面对现实世界，如同面对昔日世界一样，也深深地感到痛苦。因此它是“悲伤的大陆”（le continent de la tristesse）（凯泽林[18]语）。

像所有真正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一样，拉丁美洲必须面对其结构和行为举止的彻底转变，这种冲击对它来说尤其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冲击实际上是在打击这一不稳定、变幻不定、靠不住的、经济社会结构欠佳的世界。多少世纪以来，它的过去不断地破坏它又不断草率地重建它，这是一个形成强烈对比的矛盾的世界。在那里，最为原始的人类生存方式与非常现代化的生活并存。总之，这是一个充满生命力、更加难以确定、更加难以领导、更加难以指定方向的世界。

·经济动荡是无法预料的海啸。美洲正在朝着物质财富高速前进。在这条路程中，几个世纪以来，不管愿意不愿意，它都被迫更经常地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受益者。

无疑，拉丁美洲因此只能跟着国际形势走。但是当戴着锁链、许多人一边跑一边互相帮助时，这就是一个在前领跑或在后大步追赶的问题了。南美洲正是这种跑在后边的人，没有资格嘲笑别人的唯有他。它必须加速，如果它想出售东西，那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生产糖、咖啡、橡胶、腊肉（charque）、硝酸盐、可可子，而且必须廉价出售。然而，每次它都被卷进连续不断的“周期”之中，这种“周期”还会突然意外地中断，呈下降趋势。

这个过程既是南美洲过去的也是南美洲现在的经济的关键。南美洲在首先是严格的殖民主义类型的经济中，屈从于世界对原料订购的所有要求；殖民主义类型的经济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在依附经济的形式下永久延续。

外国资本家（更确切地说是国际大企业）与本地的大所有主和政界人物联盟，领导着朝向出口原料的生产，因而迫使生产地区尽一切努力，动员一切人员、资源，从事一种专一活动，其他活动则受到损害。如果需求的频繁变化不会有规律地撤销这些投资，久而久之，由此产生的飞跃便会给国家整体带来收获。当需求变化时，必须突然把种种努力转向另一个生产部门，而司空见惯的是，一下子转向另一个地区。气候千变万化，空间极其丰富，使得南美洲能够经受得住这些非常的方向突

变，实际上，在国家方面，这些非常的方向突变是一场空间与人员的闻所未闻的浪费：它们处处妨碍了持久、稳定、健康的经济结构的建立，妨碍了一个农民阶级的牢固形成。

这些周期中的第一个是贵金属（métaux precieux）周期。贵金属周期是与欧洲的征服一起开始的：黄金周期，几乎不超过16世纪中叶；白银周期（尤其是墨西哥和波托西的矿山），直到1630—1640年前后。为此而付出的代价非常非常沉重：如果没有残酷地征募印第安人，在波托西，谁能接受矿山和金属熔化的任务，在海拔4000米，缺少木柴、粮食，往往连水都没有的寒冷高山上，筋疲力尽地工作呢？银条一直运到太平洋，然后运到利马的港口卡亚俄（Callao），最后运抵巴拿马，从那里由骡子商队，继而由查格雷斯河（la riviere Chagres）上的小船，运到安的列斯群岛的海岸。随后，西班牙船队将它们一直送往西班牙。

那么，谁从这庞大的体系中获利呢？西班牙的商人和“官吏”，已经具有国际性的实业家，比如热那亚的商人，或者hombres de negocios（商人），即获得授权的西班牙国王的老放款人……获益者肯定不是美洲本身，不是这个不断被剥夺金条、银块，被掏空货币，为了一些织物、面粉、油坛、酒桶、黑奴……而遭地狱之罚的美洲。

17世纪时，波托西银矿的白银产量逐渐减少，这样，金属的西班牙美洲几乎一下子被扔给命运去摆布。

1680年，轮到葡萄牙美洲经历黄金热了，这回，黄金是多亏黑奴劳动才开采出来的。1730年前后，由于其他原因，在新西班牙（现在的墨西哥）银矿复兴的同时，葡萄牙美洲的黄金开采速度变慢。当时巴西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意为“全部矿山”）州的金矿大部分被采空，勉勉强强地转向棉纺织生产。

人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追溯畜牧业周期，它有许多复杂的变种，一直延续到今天阿根廷的畜牧业；大规模糖周期的形成开始于巴西，随着17世纪临近结束而滑向安的列斯群岛（牙买加、圣多明各、马提尼克岛）；咖啡周期自19世纪起在巴西变得尤其辉煌、重要，耗用了许多空间，并越来越向内地推进。阿根廷的查科（Chaco），昔日的quebracho（丹宁小灌木）区，1945年以后棉花种植出现迅速的发展。

整整一部书也无法穷尽这个单一生产或单一种植“周期”的庞大课题。在我们看来，现在这个被公正地指斥为灾难性的制度，当真正的工

业部门和国民经济开始时，便可能看到了自己的末日。但是南美洲整个的经济结构，都打上了这种陈旧的、不稳定的、不合理的发展的印记，同时还伴以突如其来的觉醒、突如其来的决裂和不间断的迁移：每一次，一个州、一些城市兴旺发展起来，而后被抛弃，或被迫进行可怕而费用不赀的转产。

·严重的危机跟随着周期的变化而来。其破坏力能一下子使一个蓬勃兴旺的国家的整个经济衰退萎缩。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它带有最坏的现实性，此即今日阿根廷的例子。

对阿根廷来说，1880年前后开始了大繁荣。在几年之内，由于旧结构的全面改造，阿根廷变成欧洲市场谷物和肉类的巨大出口国。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的大平原——阿根廷拉潘帕省（La Pampa），直到那时，还只是野兽成群、荒无人烟的地方，加乌乔人捕获野兽几乎只是为了皮革出口。

这片平原有点像美国的大草原，即将变成小麦产地和精心饲养良种畜并把它们育肥的畜牧场。

直到1930年（如果将1890—1900年之间的困难十年排除在外），在阿根廷，一切都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上升：生产由于定期出口在上升，设备马上跟上（贮藏库、面粉厂、冷藏库等）。轻工业因此立即正常发展起来。雇佣劳动者的购买力，资本的利润，直至每户居民拥有汽车的数量，当时都达到了最大值。

从1930年起，危机开始了。人们由于普遍患有欣快症而一开始没有觉察到，但危机就是那么强烈地发生了，接着是战争。战争对原料出售者有利，战争推迟了危机必将发生的时日。但是从1945年起，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暴跌，整个阿根廷的经济恶化起来，而且恶化的速度极快。官方数字显示，自1948年以来，每个居民的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减少0.4%左右，但是美国经济学家估计，这个减少比率至少达2%。衰退更为严重的是每个居民的平均投资比率，平均每年达3%。阿根廷的贸易平衡陷入逆差；人们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如此一来，阿根廷维持相对十分发达的民族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皮革工业等）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失业人数增加；城市出奇地膨胀，为了城市的利益，农村变得空虚，尽管城市已没有什么工作可以提供（国家总人口的

5%，即1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在阿根廷，人们习惯性称之为villas miseria）；工业化是唯一获得救助的希望，它也遇到了阻碍。尤其是，人们看不到出路：国家预算本身已到了破产的边缘。

简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阿根廷得天时、地利、人和，是整个南美洲的首富之国；当然，今天它仍不是最穷的国家——它有太大的超前的地方——但它是下降速度最快的国家。欣快症导致的自信心让位给了惶惶不安。这种气氛可以说明，为什么随后几十年间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

然而阿根廷经济学家不无理由地认为，全部是肉类和小麦生产的土地结构，今天被证实是有害的。细小的“不经济”开垦不计其数，相当于耕地总量的34%，在其旁边是少数大经营者，他们拥有土地的42%，牲畜的64%。无疑，这就是国家复兴的主要障碍。国家复兴要求重组土地，确保合理的生产和重建民族市场，不这样，阿根廷的工业肯定无法存在。

·经济结构松散是现代工业化的障碍：南美洲的发展导致经济结构不太紧密，失去平衡的经济。

在南美洲，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交通线不合理、不充足的特征：修建它们不是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连接生产点和装船港口，在它们之间的广大地区连最差的道路也没有。航空港虽然无所不在，但也只是不完善的补救。《瓦西蓬戈》一书中的主人公阿方索·佩雷拉由印第安人背着穿过沼泽进行其旅行，自己连脚也不湿。他并不对特权表示赞叹。“啊，”他叹息道，“如果我父亲再聪明一些，他就会强迫他所有的peones（雇工）修建道路。那么我们今天也就不会到这步田地！”

另一个不协调的情形是：不发达地区，或一段发展时期之后被抛弃的地区［人们还知道巴西内地一些富有诗意的小城市，如米纳斯韦拉斯（Minas Velhas）仍像中世纪极差的城市一样过着原来的生活，与世隔绝，一些贵族的屋宇是旧时美好日子的唯一证明］，与相对过度发达的地区形成了强烈对比：“文明”地区过分经常地局限于沿海地带，靠着海洋，与货物出口的各大路线相连。

最后是缺乏某些东西：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欧洲那种有牢固基础、有千年以上耕作经验的能干的农民。

农民人口的大部分被投入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的狂热雇佣劳动中，受雇于外国进口商用资本匆匆建立起来的大地产，接着他们突然间由于这样那样的需求变化，与地产本身同时被抛弃。流浪农业工人构成了农民人口的大部分，有朝一日，他们因没有工作而流向邻近城市，谋求成问题的工作机会，或向另一个州迁移。由此出现了下面这种明显的反常现象：在空间极为丰富、农业人口达到居民的60%和70%的这样那样的南美国家，粮食作物种植缺乏，或者至少是不足。因为一方面缺少真正懂得耕种土地的一代定居农民，另一方面，土地分布太不完善，仅此就足以阻止他们真正定居下来，进行正常的生产。每每见到这种情况，人们就会想到barines[19]的俄罗斯封建时代。

在这古老的农业世界旁，工业在一些地区——一般为沿海地区——发展起来，这些地区得益于新近的过去。在那里，本地或外国资本的积累，与欧洲或美国接触而产生的内行人员，由于移民而有所扩充的一些科技干部，使农业出口部门的活动能够转向工业部门。结果往往是惊人的：摩天大楼林立的超现代城市像蘑菇一样拔地而起。巴西圣保罗市就是一个特别的例证。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南美洲经济是双重的；现代生活发达的，甚至相对来说，过度发达的、过度工业化的狭隘部门，与尚且极其原始的农业生活绝对古老的那些庞大部门，在同一个时间共同存在。所有新的发展全部集中在已经非常发达的部门，这种分化因此愈加恶化。

请看看巴西这个例子吧。巴西的发展与阿根廷的发展相反，开始得较晚。然而，到1930年前后，它的发展已初见端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强有力地发展起来。在直到1962年的过去15年间，它的实际产值翻了一番；1948—1958年间，人均国民总收入甚至年均增长近3%。在这段时间，圣保罗、里约热内卢以超过美国最著名的新兴城市的速度建设起来。首先是纺织业和轻工业，而后不久是建立起重工业。统计数字显示出惊人的经济增长。

这无可置疑。然而这种增长主要是工业的增长。在这段时间，农业生产几乎只以人口增长的节奏（即每年1.5%左右）在增长。耕地占国土的2%！将近70%的人口生活在农业部门，或毋宁说在这狭窄的农业部门（用地2000万公顷）苟延残喘，而且农业部门的产量极其低下。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巴西东北部，因此一直陷于饥饿状态（就“饥饿”一词的精确意义而言），遭到因食品品缺乏而引发的各种疾病的蹂躏。

这种局面不可能迅速改观，因为一切都流向国家中已经发达的部分：私人投资、国家援助、贷款乃至由于北方的出口（可可子、糖、棉花、油料）获得的外汇进款。

关于巴西或墨西哥，不少观察家已经让人看到，与昔日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一样，处在同样的位置，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只有两个部门（发达部门与一直处于这种发展之边缘的部门）。国家的广大部分因此既不能获得产量，也不能获得收入，从而也不能满足其维持生活最低营养的消费，它是在为另一个部分做牺牲。

无疑，在与迫在眉睫的工业化问题做斗争时，巴西政府看来有望找到解决办法，取得最有成效、同时最有可能产生快速成果的进展。但是这些结果是不是最为持久呢？

几年以来，巴西工业扩展的速度已经显示出下降的迹象：由于缺少足够广大的国内市场，巴西工业已出现生产过剩。失业、通货膨胀、生活费用过高，更缩小了民族市场的规模，凡此种种同样预示着，今后工业的发展，如果不果断地采取转向农业部门并设法使之改善，以获得这种消费增长，使群众可以达到一种体面的生活水平的政策，就无法继续进行；没有上述条件，现代工业也不能牢固地建成。

·社会问题：这种修改政策的必要性，差不多以同样的字眼摆到了工业化中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面前；再加上尖锐的社会问题，这种必要性就愈发迫切。

协作发展和由此获益的社会，与始终处在发展之外的社会之间，差距在不断增大。这里存在着爆炸性因素。

另一个爆炸性因素是，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高于其他任何地区：大约为每年2.5%（非洲大约为2%，亚洲为1.3%到2%）。农村无产者大众转变为城市无产者，常常是失业者，当他们触及工业化社会的奢侈时，他们就更加不幸，因为他们接近奢侈品的所有道路都被堵死了。

近些年以来，社会学家搜集了各种证据，对今天拉丁美洲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做出总结，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拉丁美洲工业的建立不能不说令人赞叹，因为它们从现代技术的最新进步中获益。南美洲建筑师、工程师，不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国的，丝毫都不羡慕世界上

其他地方的同行。但是在这一故事中人类的方面非常可怕；在秩序、豪华的入口处，立着悲惨、混乱。

在这里，可以引为例证的是智利圣地亚哥最南端的瓦奇帕托（Huachipato）高炉炼钢厂……6000名雇佣劳动者在这儿工作，他们：

技术出色，干净整洁。这与一部分工人家庭的处境形成何等对比，在工厂边上，他们常常10口人拥挤在一个小板棚中，公司老实地（向调查人员）披露种种困难，让我们参观。尽管如此，形势还是远比邻近的矿山城市洛塔好得多。我很少看到比这些矿工更凄惨的景象，他们在房门口度过可以成为消遣的时光，在煤尘中居住；这里那里，处处是孩子，他们在街巷的垃圾和洛塔巴哈市场的肉铺周围转悠，带有恶臭的肉就抛在露天里，上面落满苍蝇和尘土。而在同时更多的孩子仍然挤在贫民窟里，在塔尔卡瓦诺邻近的阴暗码头上挤来挤去……洛塔的穷孩子，人们就地对我说到，几乎有四分之一最终离开这凄惨的地方，四分之三将在这里生活和终老。［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语］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圣杰罗尼莫（San Geronimo）煤矿，或玻利维亚锡矿的这类报道，也不比这更让人乐观。在拉丁美洲最豪华的城市周围，工人生活的这种现实显示着苦难，即使在圣保罗周围也是这样。类似的情况一直延展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那里的600万居民中，55%是工人，工人中的60%是脱离农村的原先的乡下人。像昔日的欧洲一样，这些乡下人是低劣的工人，不适于从事工厂工作：有朝一日进了工厂，第二天就不再露面了。许多工厂每年更换人员达75%。他们的愚昧无知使其苦难进一步加重（人们到处都可看到，由于不遵守最起码的饮食规定，造成最严重的营养不良后果）。我们欧洲人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少数专业工人，与那些现存的专业工人，得到的报酬很高，他们在城市里组成一种资产阶级，脱离普通工人世界。这个阶级索性很少倾向于与普通工人团结一致。

因此，一切都促使这个苦难的世界孤立无援。劳工立法常常是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正式的、最自由的立法，但是从法律条文到实施，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工会是存在的，但只是在名义上与工业区的工会有共同之处；它们没有组成全国性的组织。总而言之，一个不幸的、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组织起来、常常是文盲的工人阶级，常常被迫与激情浪漫的政治生活［倘若有必要的话，庇隆[20]主义（le Péronisme）是其例证］接触，而他们却没有任何物质的或精神的坚固支持。所有这些形象在长时期里还预示着困难的未来。

·领导阶级与精英的脆弱。

作家、令人钦慕的教授、一些非凡的政治家、一些有学问的医生、律师，这些知识精英，已勇敢地注意到这些新问题。不幸，在政治经济上负责的那些阶级的脆弱性，是南美洲严重持久的脆弱性的另一种表现。工业增长的危机无情地摧毁了古老、文雅而且确实不大能被纳入这个新世界的古老社会，而它是如此地给人好感！不幸的是，还没有任何东西可真正取代它。

昔日，1939年以前，拉丁美洲仍是半殖民地的美洲。占据政治生活和文化的狭小舞台的，看上去只是少数演员，同时他们还操纵着清闲的事务。他们可爱、有魅力、有教养，拥有几百几千公顷的土地，还是庋藏丰富的图书馆的所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奢华亲王，令来自欧洲的记者、旅行家或知识分子为之着迷。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已经给人留下落后于时代、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印象；这些人物常常身负重大责任——这个人负责英国在巴西的几乎所有资本，那个人担当某个迪尔伯恩化学公会的代理人，还有一个人是公共财政的主宰，或是国家总督，还渴望成为共和国总统，另外一个人是来源于民众的总长。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有的人都过于愿意从他们图书馆的高处，从他们思想的高处，进行统治，仿佛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宇宙之中。他们相信文化、文明、理性的美德。在专制或更确切地讲是开明家长制的氛围中，他们有些类似于欧洲19世纪闻名一时的自由主义的贵族类型。

在他们旁边，远离他们小心翼翼地封闭起来的圈子，是一些新人物，一些暴富的移民、工业家，他们已经开始闪电一样迅速地获得经济成功，而且只有他们的子弟最终才能学会某种程度的优雅风度。

今天，社会演变已经完成，车轮已经运转。大致上，地主向工业家和银行家转变，美丽庞大的家族房地产转变成豪华的别墅——在巴西里约（Rio）海滨，或位于彼得罗波利斯（Petropolis）；在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Vera Cruz）、阿卡普尔科（Acapulco），或在墨西哥城富丽的市郊，或在首都下方的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处处可见。同时，这些城镇呈现出大城市的种种面貌，豪华宾馆、饭店坐落在美国式的30层雄伟摩天大楼楼顶，更不用说那使其他一切都逊色的最新奇观巴西利亚（Brasilia）了，这是一座在巴西大陆中心建立的人工都城……这整个新宇宙在对旧宇宙狠狠地进行报复。

南美洲依然缺乏的东西是坚定的政党，尤其是精英和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或者照特指这种社会中间人的智利说法，le medio pelo，“中间毛”（在普通意义上，这一说法是指用二代亲本杂交的牲畜）。屈屈几个知识分子是根本不够的。要使至今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平衡不可缺少的这个阶级确立起来，必须要有时间，要有安定的形势，要有在极贫者和极富者之间比较灵活地进行分配的经济体系。

严肃政党倚为靠山的中间阶级的相对缺乏，可以说明南美洲的政府传统何以不稳定。这不仅涉及政党之间的斗争，而且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按照libertadores（解放者）即19世纪初为拉丁美洲赢得独立的那些浪漫派将军们的始终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军队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甚至极粗鲁的群众中，城市化现象所造成的迅速觉醒，也可以迫使拉丁美洲走上极其困难的严格变革全部现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道路，一位墨西哥作者最近说道，不这样做，美洲就会待在——而不能进入——真正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个财富与福利的创造者的入口，那时就会被始终无心地抛入暴力之中（况且暴力不会必然地给美洲打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门）。

一位名叫霍苏埃·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的巴西人不无理由地写道（1962年）：“毋庸置疑，巴西（但也可以说拉丁美洲）必须实现社会历史的大跃进。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为大跃进确定方向，让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抵达悬崖的对面，而避免最终坠入深渊。”

·南美洲人感受到的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实感，肯定是有理由的。感受可能较少的东西，是他们的悲观主义。这种不稳定首先是在艰难但强有力的现实之强制下，正在进行自我认识、自我确定的一种文明的不稳定。

南美洲长期就有的唯一文明对它来说是外在的：这只不过是出于极其狭小的一群极有特权的人之手，是欧洲文明尽善尽美、正确无误的抄本。同样，文学也是一种证明。19世纪南美洲作家的书籍，竟然没有一部能使人相信是在欧洲大陆以外撰写的！对这个时期的许多人来说，文化是他们不时自我封闭的小岛，远离周围的生活，生活参加不了这些高等思想游戏。

这个intelligentsia（知识界）一心追寻欧洲思想，从中找到满足，找

到激情。正是由于这个知识界，人们才能穿过南美，重新看到极其活跃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的这些支系，乍看起来真是千奇百怪。（人们知道，作为巴西国旗组成部分的箴言Ordem et Progresso[21]，就是对孔德主义的尊崇。）

这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南美洲文明在触及日益增长的城市化人口大众的同时，如今必须向强大的本地生活开放；如果不令欧洲遗产至少经受极其剧烈的改造，本地生活就不会接受它。拉丁美洲正在制造独特的文明，一个属于自己的文明。

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所传播、所强加给人们的大众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来临，或迟或早都会使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对拉丁美洲来说，重要的是，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已经走在这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前面，并早已赋予它一种形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欧洲的声望衰落了，美国的霸权受到了一定怀疑，对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来说，这与他们自身财富和他们真正任务的发现，是一种巧合。我们在本章开始所谈的那种因社会不公而产生的负罪感，把其余的一切完成了：人民，caboclo[22]、péon（雇工）。他们不再粗野，人们对他们关照，只是想给他们从文明带来借以成功的手段。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本身，对他们的思想，对他们的谚语，对他们的宗教，产生了兴趣；他们在变为建设中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同时，成为社会学家研究与同情的对象。

一方面，这是我们前边所谈的那部日记得以发表的原因，这在50年前是不可设想的；另一方面，这也是其成功的原因所在（该书在巴西售出12万册，如果没有乔治·阿马多的几部小说，此乃前所未有）。正如一位评论这一成功的巴西评论家所云，卡罗琳娜·玛丽亚·德·赫苏斯的这部书，除了是一部艺术作品外，还是一切。“这是来自人民的一位妇女所写的文献档案，是毫不含糊的博爱、理解与社会公正的启示。”它不光给作者带来了有限的财富，书中所描绘的那些居住区［人们在电影《黑人奥菲尔》（*Orfeu Negro*）中可以看到］，就要在即将来临的重建中被部分拆除。

人们对南美洲人民的民间创作感兴趣，是出于同样的思想。只要想听，民间创作到处都有，富有活力而独具特色。像墨西哥的mariachis（流浪乐队）那迷人喧闹的音乐，往往早已掺进一点杂质，那些乡村小提琴师组队混在墨西哥城和别的地方的小酒馆中演奏，而游客的关注却败坏了这些乡村小提琴师。据说，它们的名字maniachis源自法

国占领时期的“结婚”（mariage）节庆。尽管词源不大可靠，它却顺便告诉我们——谁信呢？——墨西哥民众保留的对法国远征军的记忆不是太坏。

当然，要接近真正的民间创作，必须远离旅游路线，这样才能听到古老的巴西歌曲，感伤的或凄凉的歌曲，唱歌跳舞即兴之作，加以原始音乐乐器，人们应当习惯性地向忧伤的月亮招魂。巴伊亚州（Bahia）腹地偏远的市场上，情况就是这样；牲畜市集旁，少得可怜的货摊上，提供一份热气腾腾的米饭，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猪，一大块极瘦的家禽肉，供你选择，花上几个tostos（托斯通）[23]，便可买到所有热带水果；一位盲人乞丐当场一遍又一遍地祈求布施，表示感激，甚至即兴歌唱……外国人被认为更慷慨——是叫人描写成这样的——一大篇即席演说应当献给他，讲究实际的恭维话与传统的感恩在这里混合在一起。

实际上，日常生活的所有事件，都是这些民间歌唱家的主题。位于大西洋“圣保罗会”[24]海滨的小港乌巴图巴（Ubatuba），在1947年只由一辆旧汽车与世界连接。这辆汽车每周两次沿一条怪诞的骡道从马尔山（la Serrado Mar）下来……但是人们已决定给乌巴图巴至少架设一条电线，电线杆一根接着一根，穿过森林，向城市移来。这chegadadaluz（灯光的到来），一夕之间，成了歌曲的主题，violão[25]（原始乐器）演奏者唱着没有休止的饶舌歌曲，总之是在赞美文明。

在拉丁美洲，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民间创作，有它自己的音乐、故事，它们源自印第安传统、西班牙传统或者黑人传统……这种民间创作也给宗教生活打上强有力的印记。不管新教传教团怎样别出心裁，虽然它们往往看上去非常壮观，却没有多大实效。天主教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是一种原始的、中世纪的天主教，坚定地相信奇迹。基督教的传说与印第安神话会合于此，古老非洲不可思议的宗教仪式与古罗马宗教礼仪也在这里交织在一起，或被掺和在一起（candomblés）。少数教士鼓励人们做这种自由解释，这不仅危害基督教的宗教虔诚，而且危及当地原住民的传统。有朝一日，拉丁美洲必须整顿其修道院。对于新教历史学家且本人就是新教教徒的史学家埃米尔·G.莱奥纳尔来说，这种思想形势使人想起宗教改革的局势，或欧洲宗教改革前的形势：可以说，一方面精神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又难以满足。但是变革的迹象比比皆是。

南美洲的现代文学，它的整个生活和整个文化都在回溯民族的源头。

从这个观点看，最好的典范是墨西哥。通过一场大型的运动，墨西哥滑向它的印第安特质（Indianité），滑向它的生气勃勃的起源。墨西哥在那里重建了自己。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有种种考验，会有革命，会有灾难。但涌现出这种民众主义的文学，更好的是这种革命的艺术，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 [26] 在瓜达拉哈拉大教堂拱顶成为这种艺术的预言者，他孕育了整整一个绘画流派。最后，人们还可以补充说，还有这种本土电影，这种电影早期的成果之一是令人赞赏的《玛丽亚·坎德拉利亚》（*Maria Candelaria* ）。

1966年附言

古巴革命是导火索，是拉丁美洲命运的分界线。事实上，一系列潜伏的、酝酿中的、可能发生的但组织不力的革命活动，一直都对广阔的拉美大陆的人民大众起着煽动性影响，同时也印证了古巴悲剧的发生。

“革命”总会遭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重重阻力。外国势力（即“美国人”）包围着古巴，盘踞在加勒比海上，就像巴拿马的情况一样。1964年1月9日和11日发生在巴拿马的斗争事件，曾引发了巴拿马共和国和美国外交关系的中断。而同年4月份外交关系恢复后，巴拿马运河的状况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开凿一两条新的航线（通过核爆炸的手段），加倍提高运河运输量的计划，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和紧张的局势。

巴西在1964年3月31日的革命之后，遭受了来自内部的反革命阻力（新政权的反对者嘲笑这次革命为4月1日的愚人节革命）。古拉特总统（Président Goulart）正要朝着改革之路迈进时——这次改革也许是严肃的，起码有这种可能性——他的政府被颠覆了，政权落在了卡斯特略·布朗库（Castelo Branco）将军的军队手中——布朗库后来以陆军元帅的身份就任总统。作为“管理者”，军队将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州的极右组织逼到了边缘地位。然而，军队不得不向反动派的压力做出让步，进行一次“猎巫运动”（chasse aux sorcière）——目标包括一小撮知识分子和地下共产党员。它还不得不抛弃中立主义的立场，比如与古巴政府断交。然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当时糟糕的经济状况，来自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这导致物价飞涨，同时克鲁赛罗币（cruzeiro）不断贬值。

拉丁美洲陷入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交织的困境中，国家荒草丛生，政府机构废弛，领导人员缺乏，同时也出现了物质的匮

乏。老牌的欧洲国家会是它的救星吗？这个问题赋予戴高乐将军的出访一些意义。1964年10月16日—12月21日，戴高乐访问了拉丁美洲9个国家：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巴西。然而，法国仅靠一己之力，无法给一个如此广阔的大陆提供根本性的援助。整个欧洲，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德国到英国，都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完成这个在有责任感的西方人眼中最为重大的任务。

1965年，有两个重要事件：

（1）在智利，爱德华多·弗雷（Edourdo Frei）当选总统，他推行了一次民主改革，这与经济发展政策息息相关。这是一次具有智利特色的尝试，吸引了拉美所有具有民主意图的国家的目光。

（2）在圣多明各，前总统胡安·博什(Juan Bosch)发起的宪政革命受到了美军的阻挠，之后又遭到了联合国各方压力的压制。1966年，特鲁西略（Trujillo）前总理、在独裁者被刺杀后担任代理总统的巴拉格尔（Balaguer）重新当选为总统。

1966年1月，三大洲联合会议在哈瓦那举行，这次会议使古巴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关系，也使苏联重新获得了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某种掌控。然而，在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和委内瑞拉，游击战仍在继续，各种形式的军人统治仍然存在。继巴西的军人统治之后，阿根廷共和国的军队在1966年获取了对政府的直接统治权。

第二十一章 杰出的美洲：美国

这个美洲自强不息，一直坚持使自己出类拔萃。作为一种文明，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一位不带行李的游客，它相信，在它面前展现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只等它去把握。1787年宪法的缔造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断言：“亚美利加在形式和原则上都是全新的。”自那以来，它坚信自己日日都有新气象，像杰斐逊一样认为“土地属于生存者”。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以自信的步伐跨过经济、社会或政治危机：它的内在力量，它充沛的乐观主义，仿佛永不衰竭。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较晚近的时代，至少一直持续到始于华尔街的1929年那场完全出人意料的严重危机降临之际。这场危机给人的感觉更加严峻，因为它击中了美国经济的心脏，美国经济当时正值大扩张之际，信心十足，喜气洋洋。此时美国发现自己正面临着第一次物质灾难。要从这场灾难中复苏，仅仅恢复空前的大繁荣还不够。美国第一次长时间地回首自己的过去，但不是为了认识自己（普通的美国人本能地不相信历史学的解释价值），而是为了寻求安慰。杰出观察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27]这样说道（1955年）：

追溯往事的怀旧倾向的发展，是伴随传统信仰的慢慢衰落而产生的。在竞争与企业飞跃发展的时期，美国人想到未来；在竞争与企业兴旺繁荣时期，美国人想到今天；现在，在集中、巨大型公司和垄断的时代，竞争的空间压缩，可以把握的机会在减少，美国人怀着惋惜之情回顾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

依然如此年轻的美国刚刚有点见老。越南战争使它变得更老一些。它终于意识到它的历史，正在接近它真实的时刻。它发现，在它对历史兴趣的排斥之中，在不合群的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之中，在抛弃所有使个人或国家丧失自由的限制之中，存在着“一个文化与政治传统的统一，美国文明便建立在其上”。

确切地说，这种暗含的传统不会遭到美国现代生活环境的反对吗？过去无疑开始压在它的肩膀上。

令人欣慰的过去：机会表

美国长期以来都相信它在铸造一种新的命运，一种新的未来，它没有先前那些日子的阴影，因为过去即刻自动消失。逃避与过去的一切联系，或断绝与根深蒂固的事物的关系，把赌注压在无法预料的事情上，此为金科玉律。“opportunity”（机会）一词乃是关键词：所有配得上这个词的人，在“机会”到来时都应该把它抓住，开发利用它，一直达到它所允许的极限。正是在这种“竞争”中，人才能脱颖而出，显现出自己的价值。

因此，美国作为一个集体也是这样表现自己的：美国的过去是一系列的机会，一经提供，几乎立即就完全被把握住；它的过去是一系列“碰运气”的过去，这些“碰”通常成功了。让我们首先只列个机会表，这些机会既包括原先的，也包括新近的。

殖民与独立

·第一个机会是对美国沿海地带姗姗来迟的征服与牢固占领。安顿下来，就是开始谋求生存。

克里斯托夫·哥伦布（Christophe Colomb）的革命性航行（1492年）为整个美洲开辟了航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Castille）是赢家。8年以后，即1500年，在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Alvarez Cabral）的领导下，葡萄牙人夺得了圣克鲁斯陆地（la Terre de Santa Cruz，意为“圣十字之地”），被用作红色染料的树木（paobrasil）将把它的名字“巴西”给予这块土地。随后，法国人的船舰——商船或海盗船，或二者同时，经常出入于新大陆所有大西洋海岸，自纽芬兰岛（Terre-Neuve，16世纪初始为人所知），直到安的列斯群岛、佛罗里达和巴西海岸（当时在理论上而非在实际上由葡萄牙人占有），法国人考察清楚加拿大（1534—1535年）后，最终在加拿大定居（1603年）。英国人是最后一个到达这里的：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在16世纪最后那几年停靠在当时就成为弗吉尼亚的沿海地带，但在这里建立的定居点瞬息即逝：“五月花”号上的新教徒1620年抵达科德角，登上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的海岸。

乍看起来，新大陆的这一片地区并不怎么让人愉快：喇叭形河湾、海湾以及真正的如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那样的内陆海把本就不令人愉快的海岸切割开来，而且多沼泽、森林，朝西则又被阿勒格尼山脉（montagnes des Alleghanies）的崇山峻岭卡住。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辽阔的地区，各个不同部分连接不紧密，只能通过沿海缓慢的航行互相联系。而且，还必须应对后来的竞争者——荷兰人、瑞典人，最后，还必须从印第安人的突然进攻中存活下来。尽管如此，法国人从圣劳伦斯河（St.Lawrence River）出发，夺取（至少是勘探了）五大湖区和直至三角洲的庞大的密西西比河河谷地带，随后占领了这些地区；后来新奥尔良就建在三角洲。法国人取得了大规模围地运动的胜利。他们赢了第一局。



波士顿
纽约
芝加哥
旧金山
新奥尔良
最早的十三州
1783年《凡尔赛条约》后的疆域
1800—1850年的疆域
“边疆”

图20 美国地域的扩张

从那时起，英国人的桥头堡在佛罗里达和这个辽阔的甚至有些过分辽阔的法兰西帝国之间被卡住。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建立起前哨阵地，法国猎人则深入加拿大印第安民族地区打猎，皮货商在那里寻找毛皮，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则在那里积极地进行传教活动。当18世纪英国人真正开始向西扩张时，他们就撞上了法国驻军的要塞。

在所有这一切中，“美国人的”机会在哪里呢？或许在不太广阔、比较融洽、已被牢固占领的英国殖民地，尤其是在北方，特别是在马萨诸塞（波士顿在这里建立、壮大起来），以及中心地区［纽约（原先的新阿姆斯特丹）和费城这座贵格会之城］，在这里生根发芽。

这些“在蛮荒中”（in the wilderness）生长起来的城市附属于宗主国及其商业生活，它们有进行自治的优势，过着一种差不多自由的生活，令人想起中世纪欧洲那些典型的城市。英国动荡不安的局势给它们帮了大忙：它从“北大西洋”的另一侧，不仅把不安分的新教教徒，而且把那些被克伦威尔的英国弄得泄了气的“骑士”抛了出来。这些新来者数量之多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当真正的斗争结束时，1762年，那里有100万名英国人，却只有6.3万名法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机会，是在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之间，实现了这种爆炸性的居压倒地位的力量的积累。

既然这个大陆上已有100万英国人，相形之下仅有不足7万法国人，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在魁北克，战争之神已向蒙卡尔姆 [28] 微笑（1759年）。早在伏尔泰之前，殖民，尤其是移民，就不是法国政权主要关心的。担心法国人口减少，（况且）根据也不充分……加之内部困难重重，忧心忡忡。这样一来，（要记住两个国家版图的相对比例，）如果说有30名左右英国人离开欧洲，那么法国仅有1人动身。因果出奇地不成比例：倘若英国语言和相伴而来的英国文化今天主宰着世界，那是因为法国每年只有少量船只运送极少的老百姓到新大陆，而且他们大部分是文盲。［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语］

彻底改变历史，就是屈服于一种毛病，而且这种毛病有一个名字，就是虚构事件，再造历史 [29] 。有一位美国人，他是热情专一的亲法国派。一天他在消遣时不无懊悔地想象：如果北美大陆整个被赋予法国生活与法国美食的鲜明魅力，那该多么好啊！实际上，这个梦想大部分超出了历史本当允许的范围之外。

·美国人的第一次跃进发生在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经济背景之中。但是其成功（与加拿大有分寸的跃进相比这种成功显得如此明显）也与一个额外的机会相关：航海使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水和所有水路扮演了重要角色，小船、打渔载货的帆船，连同打劫的灵巧的快船（clippers），都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它们跑遍大海，抵达欧洲、地中海、安的列斯群岛、南美洲、太平洋……它们说明，1776—1782年之间，“起义者”的打劫帆船，一直远行到了拉芒什海峡，给英国的贸易和船队造成了威胁；1812—1815年，在对英国的胜利战争中，它们再度给英国贸易和船队以狠狠的打击。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一门心思关心拿破仑的伟大历史，对此语焉不详。

这些海上冒险活动尤其说明了17世纪的一些美国城市何以走运。无疑，英国重商主义立法条例一方面要求美洲殖民地在宗主国购买所需的一切制成品，即使它们是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到英国的制成品，另一方面要求它们在英国或其殖民地出售几乎一切农产品（除了一些自由产品：谷物、鱼，因为它们被禁止进入英国）。这并不妨碍宾夕法尼亚1766年向英国输出了价值4万里弗（4万英镑）的商品，而向英国购买了价值达50万里弗的商品。明显的反常现象屡见不鲜。

“那么，您如何解决这种逆差呢？”人们问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被召到城镇议会前，对这种反常形势做一番解释。“差额，”他解释道，“要由我们运往安的列斯群岛的产品和销往我们自己的岛屿，或者销售给法国人、西班牙人、丹麦人与荷兰人的产品来补偿；或者由发往北美其他殖民地，新英格兰、新斯科舍、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产品来补偿；另外，或者由我们发往欧洲不同国家的产品来补偿……我们到处都收到货币或汇票或食品，使我们能够偿付英国。再加上环球航行中我们的商人与水手活动的利润，加上他们的船舶所进行的运输活动，所有这一切最后都为了平衡那架天平而被集中到了英国那里。”

这些大规模三角贸易增加了英国允许的异国至异国之间运载货物和进行贸易合法获得的利润。不要忘了，此外还有某些非常活跃的走私活动和往往带来收益的私掠航行。我们还不应当忘了渔业：美国的水手没有忽略大海提供的任何可能的机会。

确实，将近18世纪末，下述情况是没什么疑问的：美国所有商船的吨位，超过了除英国以外所有其他国家。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成

了世界第一大航海国。不管愿不愿意，美国就这样加入世界经济之中，不得不接受由此产生的种种限制和压力，但这也使它可以从世界经济的跃进中获利。就像其他任何建立在信贷上的社会的所有早熟的计谋，其原由都在于它必须掩饰自己的劣势，必须匆匆忙忙寻求它所缺少的贵金属，而且刚刚到手，它就必须尽快放弃它们。

在海上寻求好运的所有历史叙述的都是遥远而令人惊奇的冒险活动。在冒险之中，只有做出尴尬的抉择："美国的"小麦船队抵达地中海或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港口；同一时期美国朝向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的"走私"贸易获得成功；不久将要进行的经过合恩角、再往后是从旧金山出发的太平洋冒险方式。刚刚摆脱英国的统治（1782年），原先的十三州殖民地就千方百计地到达中国。[30] 总之，正是要为驶往中国的美国船舶和为太平洋的美国捕鲸船建立一个中途停靠港的欲望，推动美国于1853年派遣马休·佩里海军上将的"黑船"到达东京湾，大家都知道，这一事件将产生非常重大的后果。

没有什么比与昔日跨越世界七个大海的美国船舶的相遇更有启示性的了。

运送英国国王的使节马戛尔尼勋爵（Lord McCartney）来华的三桅帆船"狮子"号，中途停靠在南大西洋圣保罗岛，在岛上发现5个猎海豹者（3个法国人，2个英国人），他们准备发送2.5万张海豹皮到广州出售，载货的是一艘半法国半美国的波士顿海船，而且这船还将给他们带来一船加拿大海狸毛皮的货物，同样是为了到中国销售。几个月以后，在广州对面，马戛尔尼特使将有幸作为战争掳获物扣押这艘不谨慎的船只，因为它多多少少是法国船只，因为1793年1月英法之间已经宣战，因为马戛尔尼特使刚刚获悉这一消息。

还有一个极小的例证：在德国诗人和戏剧家[31] 之子科策布（Otto von Kotzebue）为沙皇服务进行环球航行时期，在南阿拉斯加港口遇见（1825年4月26日）一艘经合恩角由波士顿直接来到俄国这个小口岸的美国双桅帆船，船上载有粮食，用来在俄国小驿站交换2.1万张"海猫"皮，这些"海猫"皮虽然不及贵重的海獭毛皮，但买主希望取道三明治群岛（the Sandwich Islands），到广州去销售。"船抵阿拉斯加港时，所有船员，包括船长在内，全都酩酊大醉，他们完全靠着运气避开了暗礁和浅滩，但这些美国人是如此机敏，尽管喝醉酒，仍能够处处摆脱困境。"

这也是捕鲸业的大好时机。捕鲸尤其是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的拿手好戏。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年）描述了这个他亲自体验过的野蛮的世界，它的艰辛危险的生活，以及由于这唯一的活动而繁荣起来的小城市，比如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或南塔凯特（Nantucket）。1850年后，随着矿物油和燃气取代了作为照明手段的鲸蜡，捕鲸业衰落了。

大约在同一时刻，美国船队遭到竞争的打击，而且竞争非常惨烈：竞争对手是英国的蒸汽铁甲船。在受到这一打击之后，美国当时把注意力转向大陆内部，但越是如此，越是把注意力转向内陆，转向它的西部边疆，美国船队就越是无法重新崛起。征服这片地理空间，美国自己的地理空间，驱使美国逐渐向西部推进，修建铁路、鼓励建立沿海和内陆航线以提供更多的联系手段：这个庞大的任务使美国脱离了海洋。这是美国新的机会。

正如美国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一桩事务不再举足轻重，另一桩事务就出现了：人们趋之若鹜，纷纷放弃前一事务。可以说，美国把一半以上已被瓜分完的海洋，交换为美国土地的广大部分，美国即将夺得全部土地，并且是独家所有。

·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比英属美洲十三州殖民地的独立（1773—1782年）更有名的了。即使如此，仍必须精确地确定美国独立这个事件的地位。

随着法兰西在美洲的帝国的终结（1762年），英国对殖民地的援助马上变得无足轻重，同时它对它们的要求变得更加不堪忍受。然而，不论殖民地还是英国，事先它们都不愿意决裂。裂痕变得越来越大，这是由误解、让步不充分、武力没有起到作用造成的。在后来出现的每一次非殖民化（décolonisation）运动中，即使今日也是这样，都与类似的一系列不太理智的事件相关。

英国没有做出更迅速、更大的让步，它要求征税以偿付对法战争沉重的负担，自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而后它取消捐税，同时却坚持征收独一无二的茶税，以致1773年12月16日，在波士顿港，东印度公司两艘货船上装载的成箱茶叶被倾倒于大海之中。这难道不是它的过错吗？没有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是英国的政治传统；而身在美洲的英国人在伦敦的国会中却没有代表。这确实是天大的谬误！

此外，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1933年撰文指出，从18世纪中叶起，大英帝国引力的重心由美洲和大西洋转移到了印度和印度洋。他这么说是不是完全搞错了？1757年，英国占领了孟加拉。而且，“对华贸易”从此开始推进。把英国卷向远东和使英国脱离新大陆，这里是不是含有那么一种资本主义寻求过高的利润率的渴望？

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原因，导致了一场惊人的冲突，最后导致英国的奇耻大辱。法国和西班牙的介入，加速了起义者的成功。然而1782年，起义者抛弃了同盟国，私下与英国签订了和约……因此，在《凡尔赛条约》（1783年）中，英国遭到的损失比人们原先所担心的要少。英国也非常快就意识到，经济繁荣不仅能够补偿它在政治上的失败，而且可以做得更多些。历史学家还在想，却又不能加以回答，如果没有那场给予英国长久优势的各种要素的即将来临的工业革命，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此外，如果说令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感兴趣，那么这种兴趣必定既不在这个故事的种种重要国际方面，不在拉法耶特（La Fayette）身上，又不在巴耶·德·苏弗朗（Bailli de Suffren）海军上将遥远的远征上，甚至也不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善良而注重现实的精明能干上。至关重要的是独立本身，是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以及1787年美国宪法，尽管这部宪法的制定过程非常缓慢。在这些决定性的年代，年轻的美国找到了自己。

我们说一个“年轻的美国”，指的是某一个首次成型的美国。在地理上，它缩小到大西洋谷坡（大西洋沿海地带及其腹地）；在经济上，它首先是一个农业国；在社会方面，它由持有土地的阶级，“美国国父”（Founding Fathers）自己，即“美国民主”的缔造者自身来统治。埃皮纳勒[32]的图片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理想化肖像。

请看一看从乔治·华盛顿到托马斯·杰斐逊这些有毅力、有坚定的信念、要制定世界最好的宪法的人，是何等人物。这不是不敬，大概也不无益处。人们早就说过：开国先辈们（Fathers）“在霍布斯哲学和加尔文教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部宪法。他们也认为，人“对人像狼一样”，人的“肉欲性情”与上帝是截然对立的。在谢斯[33]起义翌日，诺克斯将军就此写信给华盛顿道：“美国人毕竟是人——带有属于这种动物的不安分激情的人。”（1787年）《独立宣言》宣布人们有进行反叛的权利，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使这些所有者、这些实业家、这些法律界人士、这些种植园主、这些投机商和金融家——这些“贵族”——深为

着迷并感到兴奋的伟大思想，乃是保护财产所有权、财富和社会特权。美国是新生儿，但它早已有了富翁，他们的财产，不管多么有限，却使他们有资格领导别人。作为证明，人们只需听听那些为制定宪法而集聚于费城大陆会议的开国先辈们的话，或者读读他们的信件和他们同侪的信件。他们的基本假设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年轻的种植园主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他提议只有拥有不少于10万美元财产的人，才有资格出任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要求人们遏止“民主制度的恬不知耻”。对于他们所有的人，就像对这位州长的女儿佩吉·哈钦森（Peggy Hutchinson）一样，民众是“肮脏的暴民”（the dirty mob）。同样，我们可以听一听年轻州长莫里斯所说的话：“大众开始思想和进行思考。可怜的爬行动物！他们晒太阳取暖，一会儿过后，他们就要咬人……上流社会（gentry）开始惧怕他们。”梅森也持同样的认识：“我们过分民主了……我们怕在另一个极端走得太远了吧。”没有人比新英格兰的那位牧师杰里米·贝尔纳普（Jeremy Belknap）更坚信民主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他致函他的一位朋友道：“让人们把政府来源于人民这个事实作为一个原则确立起来吧，但是要迫使人民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

上文所述确定了一种总的思想。人们以自由（liberty）和平等（equality）的名义所强加的秩序，就已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秩序，作为资本主义秩序，可能还有所节制。给有钱人权力、职务（种种责任）。对其他人，则有受反对富人的法律所保护的那种伟大特许权，就像富人受反对其他人的法律所保护一样。随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美国宪法，在力图一个一个地平衡永远自私残酷的人类兽性的冲动范围内，被认为是革命的、新颖的、平等的、公正的。

1787年宪法确实是一个巧妙的平衡力量的机制。托马斯·杰斐逊说道：必须“在不同机构之间分权和制衡……任何机构不得超越合法限度，否则另一些机构就会有效地遏止它”。至于社会，人们当然不会废除种种特权，尤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特权，但是人们务必使特权的——即金钱的——道路向一切人开放。在美国这个广袤的“新”国家，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用有趣的讽刺概括这一理想道：“奠基者们相信，一个设计良好的国家在互相阻挠的和谐制度内，利益与利益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派别与派别之间，一个政府部门与另一个政府部门之间，彼此互相制约。”

实际上，必须承认，如果说19世纪美国的历史把“健康的竞争”转变为各种私人利益之间广泛而残酷的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在美国比在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更“有利可图”，因而也更为公正。在美国，利润不是保留给一个严密封闭的阶级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在一个比其他地方更开放、更优越的社会中碰碰运气，都可能随时随地跨越阶级间的巨大障碍。“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人”（self-made-man）是这个美国的典范形象，这种形象今天可能正在消失。

西部的征服

·从一开始，美国就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拓荒者国家。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同样的话用在任何拥有幅员辽阔的国土需要控制、开化使之适应人类的国家，不论它们是俄罗斯、巴西还是阿根廷。地理扩张是全部发展的第一个形式（而它支配着其他各种形式），它关系到经济、民族（une Nation，民族国家）、邦州[34]，也同样关系到文明。

历史把事情办得井然有序，体体面面。它使得美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我们不妨以法国为例想象、对比一下：法国在几乎平平安安地、未遇任何妨碍的情况下从大西洋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l’Oural）！1803年，美国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1821年，它获得了西班牙所属佛罗里达；1846年，它从英国人手里取得了俄勒冈（这可能损害了加拿大的利益）；随后，1853年，在一场不费吹灰之力的战争中，美国从墨西哥夺取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进一步扩展了它的疆土。人们如果想象一下，比如说阻挠俄国或欧洲本身扩张的可怕的灾难和外敌入侵，那么美国的这部拓荒历史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尽管这是以牺牲印第安人为代价的……但实际上任重道远。光靠年轻的美国是远远不够的。

从一开始，1787年宪法就明智地将西部尚未被占领的领土，保留作联邦的公共财产。后来，随着移民，新州在那里建立起来，一共有48个州（第49个州是阿拉斯加，第50个州是夏威夷）。殖民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它至少始于1776年，大概以1907年俄克拉荷马最后一些小块地皮获得分配而告结束。历史记叙、小说和电影使拓殖活动广为人知，从最初移民的大篷车和他们与印第安弓箭手的斗争，直到由缓慢的越洋铁路运送的最后移殖民的旅行。但重提英雄的远西部（Far West）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情景是否有益呢？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边疆”（frontière），白人所征服的空间，在

多大程度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冒险，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所谓物质的，是要阐明信贷，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起着原动力的作用。所谓精神的，是要看看新教教义的新维度，而且更远些，要看看美国文明在它的第二阶段也是决定性的阶段，所具有的新维度。

·资本主义是这次向前进军的组织者。

想象一下，刚刚得到小块地，160英亩（64公顷）homestead [35] 的移殖民，一边装好各种零部件，一边首先耕种山丘的疏松土壤，然后逐步把工作推向低地上不易翻耕的土壤，即一直推向山谷。他往往必须清除丛林灌木，有机会的时候，还得砍伐树木。确实，这位农民一点儿不像农民。也许前一天他还在操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业。要想坚持，唯一的条件就是学会驾马套车；耕种，一般是种小麦，无须复杂的备耕即可，同时土地不用施肥……尤其是，这个农场主如果是第一个到达那儿的人，他肯定只有一个念头：转卖掉小块土地。他在那儿住上几年；他刚刚有了一些“预付款”，因为在他那偏远的角落，一切都将预付给他，他靠罐头食品度日（早就这样），靠煤取暖，如果铁路到达邻近地方的话。假如赶上两三个好收成，让他有了一笔资本，那时他便毫不犹豫：转卖掉小块地，从在此期间新到达的移民所给予他的增值中获益，此后他继续迁移——进一步向西，也就意味着，重新开始。向东返回，就是自认失败。［按照路易·吉拉尔（Louis Girard）的说法］因此，这些移民不是在土地上扎根的农民，而是投机商。“他要花招。”正像一位历史学家确切所云。当然，他总是在赌，而不是总赢。但他坚持赌下去。

另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是1860年前后中西部建立了一座城市。想象一下这座被缩小到基本要素的城市吧：简陋的火车站，同样简陋的旅馆、食品商店、百货店（store）、教堂、学校、银行……这座城市刚刚问世，但每个人都已经就城市发展进行投机，购买好地皮，吸收新来的人。当然，城里有电气照明和有轨电车。不久之后的1871年，电话“出现了”。我们可以再引用一下路易·吉拉尔的话：“旅游者们司空见惯，人们在还没有房屋的街道上安装电灯照明，让有轨电车在街上穿行。但是对人们宣称，正因为如此，才要建设房屋，这样地皮才能更快地售出。”1878年建立的北达科他州首府俾斯麦，德国移殖民占了大多数，五年后，即1883年，美国国会大厦在这儿举行落成仪式。

俾斯麦城的居民因此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他们不仅邀请了颇有名望的人物詹姆斯·布赖斯［此人在五年后，即1888年，写出了《美利坚共和国》（*La République Américaine* ）一书］，还邀请了前共和国总

统和杰出的军人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此外还有坐牛（Sitting-Bull），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苏人（Sioux）的一位大首领，他在一次反抗白人的起义中成名。他来是为了烘托仪式的光彩，他还用他的语言讲了一些亲切的话语。然而使布赖斯这位讲究实际的苏格兰人吃惊的是，未来的国会大厦离该城1500米。他的惊异使俾斯麦居民感到惊讶。人们对他说：既然城市要变大，当然必须使国会大厦远离现在的城区。（路易·吉拉尔语）

你们看到的很清楚：这座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一样，超出了现时代的范畴。依据所有经济成功的秘诀，它也生活在未来之中。它不依靠它已拥有的金钱，而依靠未来的金钱，不论这金钱是会到手还是不会到手。令人称羡的是，除例外的几年，例如1873年的衰退，金钱始终能够到手。赌注常常得到报偿。

·征服西部和远西部的美国，基本上是信奉新教的美国。新教曾单枪匹马地面对移民这种突然产生的困难的人文局势，面对移民如此迅速地分散到如此广袤的地区的局面。

入境移民来了，他们没有牧师，剩下的（没准儿连这也达不到）只有阅读《圣经》而已。无疑，这些入境移民过着一种中世纪的生活，他们自发的宗教生活平常非常活跃，往往富有脱离常轨的发明，如犹他州的开创者摩门教 [36] 教徒。美国新教的功绩是使这火焰维持不熄，而且更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一页。

要成功，就应该适应自己的任务，使自身更为简化，也就是说超脱现有的各教派（公理会教派、主教派教会教友），减少神学教育或礼拜仪式，把希望寄托在感情上，寄托在引人入胜的集会所产生的震撼效果上。浸礼会教徒（Baptistes）、卫理公会教徒（Méthodistes）和基督门徒派（Disciples du Christ）的巡游牧师，做得异乎寻常地好。他们没有发明下面这种内心宗教[37]：新教的觉醒（réveils）或者复活（revivals）预先提供了内心宗教的范例。起码他们善于使之适应，使之简化（比如说，浸礼会教徒摆脱了他们的宗派性，卫理公会教徒摆脱了他们的英国国教遗产），始终依靠“个人的神性”（théologisme individuel），依靠“个人的主权”（la souveraineté），最后“靠行动，不靠信仰”。从此，基督的语言更缩减为一种直截了当、简便易行的圣餐仪式。

在他们追求的严格目标之外，这些西部的福音传道者无意间造就了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即美国生活的“模式”，美国文

明的图样。从19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起，新来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即使不是新教徒，也必须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在基督教徒方面亦如在牧师方面，这些自发运动的都是地位微贱的普通人——“唯一创造教会的人”的所作所为。此外，像充当征服者时一样，他们在地理上共同分享“边疆”的广大地产：基督门徒派在西部和中西部创办了自己的小教堂，卫理公会教徒朝西北方向走，浸礼会教徒朝西南方走。大体上，他们的行动可与西班牙传教士的事业相媲美。实际上，从16世纪起，西班牙传教士在将大多数印第安人吸引向基督宗教从而奠定今日拉丁美洲的基础的同时，不得不向抵达新大陆的西班牙移殖民传递上帝的福音。

工业化与城市化

·光是“工业化”一个词，不足以指明从1880年至今美国物质生活方面发生的全部变化。在这个世纪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正如下表所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如果没有城市的巨大推动，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这里，问题不在于增加数据和量度，详细跟踪这个巨大变化。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和地理学书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在历史上，像英国一样，新英格兰的首次工业起飞是纺织工业的飞跃发展，像欧洲许多国家一样，最后的建立是与从1865年到1873年铁路的飞跃发展同时发生的。

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值（单位：10亿美元）

	1880	1899	1909	1919
农业	2.4	4.7	8.5	23.7
工业	9.3	11.4	20.6	60.4

农业人口（单位：100万人）及百分比

	1880	1899	1909	1919	1950
农业人口	32.9	39.3	41.6	44.6	—
百分比（%）	65.0	51.7	45.3	36.4	15.6

重要的是要证明：（1）至今仍在深深影响美国自己空间地理的美国成就的巨大［参见墨西哥湾边“深南部”（Deep South）最近的飞跃发展］；（2）预言“未来生活”的一些成就具有的新颖、先进性质；（3）不断与自身决裂的资本主义的适应性（我们下一章将重提这个问题）；（4）欧洲劳动力的到来：工业和大城市的建设也好，西部的建设也好，都不是美国独有的事件；（5）这种人与物惊人的进展，勉勉强强被铸入现在的这种美国文明之中，一种不适当的语言名之为：American way of life（美国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只涉及这些数量众多的问题中的后两个。

直到1880年前后，美国接纳的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殖民——美国第一批欧洲人口资源；随后，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大批到达：后者使美国有一点非英国化，甚至有一点非新教化。不过，尽管它在1880—1914年期间接纳了差不多2500万斯拉夫人和地中海人——这些人往往是天主教徒，美国却始终处在英国文化和新教的严格控制之下。

农业的西部吸收的移殖民没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东部各州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州处在变革而不是动荡之中，至少比阿根廷动荡少，阿根廷在与意大利人的入境移居做斗争。刚进入19世纪80年代或稍前时期，意大利人的入境移居淹没了一切，城市和乡村，比比皆是。这种差异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欢迎新来者的美国拥有飞跃发展的城市、工业，既有惊人的劝导力量，又有惊人的吸纳融合力量。对新来移殖民的同化、吸收速度惊人，而且惊人地有效。

仔细端详一下无意中遇见的一群美国人（1956年）吧。北欧民族的特征在他们当中根本不占突出地位，人们既会认为他们来自那不勒斯或者维也纳，同样会认为他们来自伦敦或者汉堡，然而这就是美国人，其

行为和举止皆为美国方式。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同化的机制起了作用。［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语］

获胜的是各种因素的集合体，包括语言、美国生活方式以及新大陆对外来移殖民的巨大吸引力。唯独这后者，或差不多唯独这后者，堪与所有其他因素相对垒。美国还通过所谓限额（quotas）法（1921—1924年），通过1952年的麦卡伦法，几乎关闭了进入美国的大门。从那时以来，尽管这些移居者中有些人在科学领域取得惊人成就，但它们被淹没在这人的海洋中。

今天，南部的外来移民非常少，只来自墨西哥和波多黎各；北部的则只来自加拿大法语区，迷路的孩子在底特律、波士顿甚至在纽约，可以重新找到道路。但是现在这些国外移民乃是涓涓细流。确实，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波多黎各”城市，但巴黎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北非大城市，原因很类似：所有大城市在其底层都需要大量非技术的穷苦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如果不能在国内招收到，就要到别处去寻找。

新来者为美国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启动，而后是跃进。他们也给庞大的城市提供了贫民和无产者，纽约在这方面堪称典型，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与它匹敌。异乎寻常的大规模城市化不断扎下根来：实际上，从波士顿到华盛顿高地，整个大西洋沿岸今天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聚集区——一种Mégalopolis [38] ，一位地理学家说道——只在罕见的间隔中留一点儿地方植树，留一点儿地方耕种，留一点儿地方给互相连接而变得模糊不清的郊区。于是普林斯顿大学在纽约城郊和费城之间的这些草木自然保护区中心建立起来：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所大学就会被这些相邻的熟悉的怪物淹没。

然而，尽管有这些异常大的改变和这些新人的大量到来，美国文明却岿然不动，固守其宗。它吸收了一切：机器、工厂、“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惊人发展，汽车充斥各地——欧洲的生活今天只描绘出汽车的近似远景；最后，美国接受了非新教入境移民的到来。

·美国文明是分三个阶段构建而成的：大西洋之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最后因工业化而“变得垂直”。正是在第二阶段，远西部和新式新教，可能确定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尊重个人，极其简单化的宗教信仰，非常关注道德行为（互相帮助、一起唱歌、社会义务等）的宗教信仰，英语至上，其他语言在英语面前均黯然失色。

这样的社会能不能说是宗教社会呢？是，种种测验统计都表明，这一数字几乎达到100%。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在1782年（也就是说在整个美国的婴幼期）就这样说过：“在美国，无神论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不信宗教是非常罕见的和秘密的。”今天仍然是那样，没有不在上帝影响下的官方语言。不论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还是艾森豪威尔将军，都自愿地把美国的所有对外活动视为“十字军东征”。同样，社会差异无不，或差不多无不具有其宗教表现。在阶梯的底部，是由卑微的人组成的浸礼会社会，他们直到最近仍然非常贫穷。肯定“更漂亮的”是卫理公会教徒的世界，最后是因其礼拜仪式盛大而非常雍容华贵的主教派教会（Épiscopaliens，就是说该教派拥有主教），这套礼拜仪式源于英国圣公会。正像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这也是新的有钱人的教会，是“用钱买来的官爵”。

的确，在他们自己的眼中，美国人以何种方式怀有信仰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宗教社会是宽容的、多元的，划分为不同的教派，有着不一致的“名称”，拥有唯一真正的教会，习惯意义上名为：天主教徒。例如，用不着大惊小怪，同一个家庭竟分成若干“教派”，因为每个人都有按自己方式去信仰的自由，只要他本人相信：此乃唯一的义务。在波士顿可以看到一个最新式建筑的小“教堂”。入口处有一块简洁的牌子，任何特殊崇拜都不得在这些场所举行，这些场所乃用于世间所有信仰进行祈祷，不论他们信仰如何。在明暗交界处，唯一明显的不协调之处是一块大石板，令人想起祭坛，从教堂屋顶开的窗洞洒下一束光，由许多面小镜片组成的大帷幔反射着那束光，使人想到亚历山大·考尔德[39]的“活体”[40]……

令人赞叹的宽容，欧洲人会想，倘若他不知道西欧式的政教分离和无神论，尤其是法国模式的政府与教育的非宗教性质，在美国几乎无法实现，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某种形式的非宗教，某种形式的理性主义，在某些区域却颇为风行，正如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或勒南的《耶稣的一生》（1865年）问世以来，在欧洲开辟道路的那种时髦。日益风行的自然神论的高涨，给这种理性化打上了印记。

对于美国的文化凝聚力来说，重要的是先天的困难障碍，入境移民，以爱尔兰人为首，接着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墨西哥人，他们信奉的天主教呈现出种种障碍，这种天主教最终要适应和完全适应美国生活，要将就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此而论，到达美国的最

初的一大批天主教徒——爱尔兰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不管怎样，如果天主教会保全了它的世界性的统一与教阶制，在美国它也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政教分离。与天主教会居多数派的其他国家相比，它的态度截然相反；天主教会也完全接受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最后，天主教会同意毫不犹豫地突出道德行为，此举仍旧是听凭美国生活的驱使。十个宣言中的一个清楚地说道（宣言出自美国大主教）：“诚实的投票和在社会关系中作风正派，对于上帝的荣耀与灵魂的拯救所做的，要比半夜的自笞或到孔波斯泰拉[41]朝圣，还要多。”

像新教教派一样，今天在美国拥有3000万信徒的天主教会懂得组织起来，懂得拥有自己的联合会、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大学，当新教教会在城市无产者的福音布道方面成果甚微时，天主教会已在这个领域成果斐然。

新教教会对于城市的这种相对无效力，也许应归因于它19世纪在农村取得的成功，同时也归因于要它日益增多的财富，这些财富使它更加资产阶级化，常常使它的热情变得冷淡下来（尽管近来有复萌的迹象）。因为宗教在美国，更普遍地说，作为整体的文化美国，不断地受到威胁：它的信徒经常地由贫穷转变为富有，转变为资产阶级，造成了这种威胁。

宗教这方面只是美国文明如此具有凝聚力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它们无疑关系到美国文明的根本崛起，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吸引力；在这个社会里，阶级的界限只由金钱标记；在这个社会里，至少直至新近时期，致富的门路看来是大大敞开的。对于欧洲入境移民来说，接受这些社会准则，就是与欧洲古老的范畴一刀两断，就是打开希望之门。

这就是一个文明的自由的方面，但在另一方面它具有强迫性质，几乎不准个人脱离美国生活方式默许的各项准则。假如入境移民本人入乡随俗有些困难，有时思乡心切，其子女会怎么样呢？至于他们，则急于融入美国大众之中。所有社会学家都注意到了入境移民的子女想使自己的血统痕迹消失的这种欲望。

最后，在这个过程中作用最大的，是美国“机会”（chances）的丰富：边疆，然后是工业化，再后是大城市的推动，同样是创造财富的因素，而发财致富使民族的同化变得容易。19世纪30年代居住在陋室

或“破旧房屋”（bicoque）的喜欢吵架的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和第二代或第三代使用“花边帏幔”的爱尔兰人，他们的道路是伟大的。因此，美国财富上涨的波涛，确保了美国最早文明的先祖凌驾于登上大陆的这些新人潮之上。

如果说这最初的文明不久就有力地区别于它的英国源头，但它仍然是盎格鲁-撒克逊性质的，而不是真正欧洲的文明。大陆欧洲始终将地中海传统与斯堪的纳维亚传统混合在一起。“美国缺少两种文明之间的互相贯通、互相渗透，盎格鲁-撒克逊的吸引力吞并了一切。”（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语）无疑，如果说历史的偶然使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加拿大英语区除外）成为清一色的拉丁世界，尤其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世界，而后，意大利人的移居又打上强烈印记，那么这种情况是令人懊恼的。两个美洲很难彼此互相理解，生来就不能互相理解，这是事实。这也是现时的悲剧。

1966年附言

在美国，近年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搅乱了整个世界。约翰逊登上总统宝座之前不久的选举中，他的对手、上议院议员戈尔德特（Goldwater），作为他的第一次参选，其个性与纲要的过分夸张令世界舆论哗然。共和党因此力量缩小，四分五裂。更具戏剧性的是，黑人问题不断加剧。活跃的非洲穆斯林少数族裔把自己激烈的口号强加给有色赤贫无产阶级。他们参照伊斯兰文化和《古兰经》，倡议在南部建立独立的国家。但是，外部世界的悲剧仍是危害极大的：世界的历史性事件这次在美国发生：1962年9月的古巴导弹事件，以及1964年8月的东京湾事件。世界政体包含了一系列的谅解、不愉快和冲突。

当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时，越南国家和军队的框架逐渐由美国一支编制超过17000人的“顾问”来保证，1964—1966年之间的美国历史越来越被越南战争主宰。越战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尤其是肯尼迪执政时期。但是，战争在那时还没有达到大规模冲突的程度，吴庭艳总统极其反动的统治也不一定要推翻；同年11月1日，人们有时会以为最终会在越南南部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改革。但是，新的越战在1964年夏天发生悲剧性的转折，该年8月份发生了北部湾事件，约翰逊总统决定下令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第一次轰炸。1964年末，越南共和国的美国远征军有十几万人。一年后，即1965年末，轰炸

成为家常便饭，美军在编人员达到225000人。1966年春天，超过30万人，预计年末将达到40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人们预计将接近1965年和1966年全部预算997亿美元的一半。实际上，军费超过了520亿，美国政府以军费开支的名义要求1966—1967财政年度的600亿美元贷款。但是，美国的权势和经济活力可以消化这些新的负担而不会造成物价的明显上涨，1964年新创造出15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到5%以下，这是美国经济史上最低失业率之一。约翰逊政府唯一担心的就是顽固的账目平衡赤字，尤其是大量国外开支和美国境外投资的发展引起的账目平衡赤字。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美国的未来有赖于越战的走向，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战争的依赖度更高。

第二十二章 阴影与困难：从昨天到今天

至此，我们已经指出了美国的种种机会和所取得的种种成功。的确，困难和厄运并非没有。它们在当代积累成堆，随着人们越过那一道又一道“分水岭”，甚至还在增加：1880年、1929年，或许还有1953年。但是这种幻想有可能是双重的，甚至还会误导我们。仔细看看，人类哪一种团体不受到其生活本身固有的各种困难的影响呢？其次，在像美国文明这样一种如此巨大的文明中，幸运与不幸运之间的区分可能既不清楚也不具有决定性。一切困难都要求人们努力，激起人们做出反应，或者（用数学术语来说）“改变它的符号”。不幸使人警觉，不幸是一种考验。它实在很少封住整体的命运。海因利希·海涅[42]脍炙人口的诗句——“冬天夺去的，新春将还给你”——对个人常常是真实的，对各民族来说往往更具有价值。美国有重重困难，种种危机降临到它的头上，但是它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可能比它自认为的还要好。

一个古老梦魇：黑人问题，难以根除的殖民地

在美国的各种机会当中，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不可能消除的巨大难题：从17世纪起，由于南方种植园的飞跃发展（从1615年开始，弗吉尼亚的烟叶；从1695年开始，先是卡罗来纳而后是佐治亚的稻子；从19世纪开始，整个弗吉尼亚州西南地区的棉花），于是在美国土地上出现了非洲黑人。

·历史和地理对此负有责任。

美国由以开始建立的大西洋沿海地区，呈现一连串彼此接近的气候区。尽管处在与那不勒斯相同的纬度上，但由于拉布拉多（Labrador）半岛寒流的影响，纽约的气候与莫斯科相似——纽约离热带地区和它们的外来产品，只有一夜火车的路程。在这南方，奴隶制度作为18世纪如此繁荣的安的列斯群岛经济的一种扩张，几乎自然而然地安置下来。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法国人在新奥尔良（从1795年起，为了种植甘蔗），和乔治·华盛顿或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他们自己的田产上一样，都实行奴隶制度。

这样，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美洲便引进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畸变的非洲，什么也不能再阻挡它，无论是暴力，是偏见，还是让步。我们要注意，1787年宪法，尽管色彩自由，却没有废除奴隶制。它只是规定取消贩卖黑人奴隶活动，但拖延20年后，即1807年，这种贸易才真正被废除。

从那时起，黑人被输入到美国至少在法律上不再得到认可，不过走私贸易还长期继续，而且黑人像牲畜一样被喂养；19世纪棉花的飞跃发展甚至使黑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昔日，奴隶在主人提供的房屋里生活；现在，他们被大群大群地聚集在一起，就像古罗马时代的田庄里的情况一样。在这些悲惨的有色劳动者头上，殷勤而有教养的白人社会组成一个殖民地贵族国家。哈丽特·比彻·斯托（斯托夫人[43]）描写黑人苦难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1852年激起一场人们内心深处的革命。另一部更为新近的小说，玛格丽特·米切尔[44]的《飘》（1936年），描写了南方生活的甜蜜和魅力，尤其涉及有特权的白人农场主的自由生活。就是在这同一外部背景下，发生了福克纳[45]的复杂紧张的故事：这种南方的生活，充满对昔日文明时代的怀恋，狩猎聚会，喝着玉米烧酒“月光”[46]酒聊天。所有这些著作都展现了一种双重真理，黑人的与白人的，无疑也包含着双重谎言。

总之，在同欧洲人的斗争中，首先被殖民化的印第安人销声匿迹了，乃至人们只能在那些保留地中作为一个已消失种族的遗存再见到他们。此时黑人却无意间显露出自己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于是美国国内有了一块殖民地，一块没有真正得到解放的少数民族的殖民地，不管官方采取了各种什么样的措施，少数民族的压力与存在虽面临众人的反对而依然如故。

·19世纪中叶，废除还是维持奴隶制的问题引发了南北战争（1861—1865年）这场龙卷风，但是它只是使南方各州与北方各州分裂和敌对的复杂的自相残杀的争论的一个方面。

1.北方是工业地区，赞成高关税；南方出售棉花，宁愿购买质量上乘的欧洲工业产品。这都要求建立门户开放制度。

2.争论的政治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都在争夺权力，民主党尤其拥护南部，共和党尤其支持联邦政府。

3.这种竞争因下列问题愈加激烈，愈加具有赌注色彩：西部新建各州到底倾向于哪一个集团?

4.实际上，危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构成合众国（联邦）的各州单个是否可以反对中央政府决定的这项或那项措施？它们是否有权脱离联邦？如果必要，是否有权闹分裂?

所有这些竞争动机都凝结为关于废除奴隶制问题敌对双方的强烈不和。南方发动了战争（1861年4月12日，向萨姆特要塞发起进攻）；经过可怕的几年内战之后，于1865年4月9日，战争以南方投降告终。1865年12月18日宪法第13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该措施关系到将近500万黑人（1870年为480万，面对的是3300万白人），即总人口的12.7%。这个比例后来更大：1880年13.1%，随后因欧洲移民而递减，一直达到1920年的10%；这个比例似乎稳定在10%左右。

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轻易便可证明，特许给黑人的政治好处乃是一纸空文。虽然政治权利得到了改善，但黑人还是处在“下层地位”。1914年以前，黑人没离开南方（由于习惯和传统，这种低下地位自发地在南方维持下来），黑人的处境因此更加恶化。黑人在1880年前后肇始的工业化中，只能找到不太好的位置，找到干粗活者、非技术工人的位置，最有利的位置则留给那些“贫穷的白人”（Petits Blancs）。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黑人北迁，他们对于北方才变得重要，在纽约黑人区哈莱姆，在黑人占据“黑色腰部”的芝加哥，在底特律……情况都是这样。

·黑人少数民族跟随美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加入进来。黑人少数民族今天也有了自己的有钱人，甚至新富，有了自己的大学，自己的音乐家、诗人、作家，有了自己的教堂。但是真正的平等仍是他们无法触及

的。

1956年，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写道：

正如事情发生的那样，乐观主义的偏执愿望会使人相信问题从此以后便解决了，而好些欧洲游历者就上了当。真实的情况是，无论在有所缓和的北方，还是在实际上没有丝毫缓和的南方，传统的社会排斥性仍在继续。无疑，在东部和中西部，人们将越来越看到黑人确实加入了白人的生活；有可能这样杰出的有色人有机会被接纳去吃饭或出席社交聚会；越来越多昔日受到迫害的种族的代表被毫无歧视地接纳进民选政府职位。由此便以为障碍即将倒塌，或当真会降低，未免为时过早了。美国的黑人自认为是美国人，不提种族，而愿单单提美国人，但是对白人来说，他们仍然是“美国黑人”，这就显示出强烈的色彩差异。人类肤色对于彻底的民族同化来说，似乎必然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的确，黑人问题被人在令人失望的拖拖拉拉中得到考虑，当文化变革发生时，文化变革也进行得拖拖拉拉。偏见、反感、所采取的立场（请看福克纳的小说）在这里还是昔日那一套，而绝非今天的东西。种族隔离、私刑处死（而今是极其罕见的）、潜在的或明显的敌意，落在驱魔运动的后边。但是运动终于发动起来了。小石城（Little Rock）学校事件，联邦政府最终占了上风（阿肯色州州长支持的白人学校，拒绝按照最近联邦法律要它们承担的义务接纳黑人入学），是早期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事件表明，未来会走向何处，种族隔离问题和种族隔离狂热同未来一样可怕。尽管如此，这一未来却慢慢临近，只有惊人的忍耐力，只有黑人种族的政治忠诚，才能够使问题有望得到和平解决。

作为结论，我们能否把这一问题视为既是美国整体也是给人好感而有耐心的这个黑人美国的厄运呢？无疑不能，因为美国人道主义在提出这一问题时要面临一个它通过这点进行判断和提高的困难。无疑不能，因为这个非洲已给美国提供了特有的原创的文化财产，这份文化财产已并入了美国文明（特别是并入了美国的音乐）。另一方面，这个非洲在物质上和智力上，是全世界黑人共同体中最发达的，它非常勤劳，也在享受美国文化和美国文明的冲力。时代对它有利，如果消除不了美国生活中这一严重的内部矛盾，理智和道德的苦恼根源将长久继续存在。没有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希望如此。美国必须创造和采取一种巧妙的解决方法。

资本主义：从托拉斯到国家干预和卖主控制市场

不知是幸运还是厄运，这次评判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对我们应站在什么立场上，人们也犹豫不决。美国资本主义也是这样，既有益于也有损于打上了它的（反之亦然）难以磨灭的印记的文明。

在这个美国欲成为的自由民主制度中金钱曾经是，而且依旧是至上的国王。商业帝国有目共睹，它公开炫耀，岂止在曼哈顿那些高耸入云的宏伟的buildings（大楼）上。但是这种资本主义，这种自由的游戏，往往供求过分自由，活跃起举世无双的物质冲动，每个国家不管政治制度如何，都试图照搬这种资本主义，又转过来达到这种资本主义。最后是美国理想主义本身，人们不能否认它的活力和常常彻底的大公无私，部分地是对商业那种无孔不入的物质主义的一种回应、回避和反击。在这里，资本主义常常良心败坏。

更进一步地说，在一个实用主义的而非革命的、过于富有以致无疑可能像1914年前或1848年前欧洲那样具有颠覆性的社会的压力下，美国的这种资本主义不是在逐渐变得更为人道一些吗？

我们已经看到，直至1880年临近，美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但它只一下子就被卷入最惊人的变革中，仿佛无意中发觉自己被这突如其来的推动升向工业，升向富有，升向强国。欧洲六国[47]，在共同市场的初期，得知了物质生活能够蓬勃进步的情况。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法国，什么都逃不过这样的涨潮。恰好，在今日这个欧洲，看一看实用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推动力吧。同样在美国，资本主义只有一边适应，一边越来越让步，如果可以说的话，一边分享发展，才能继续它的历程。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的trusts（托拉斯）最终发展为大企业，两三家便主宰了庞大的国内市场（oligopoles[48]）。

显然，发展中的总在变化的这种资本主义，无论它们是不是受到抑制或者变形，仍旧是美国物质生活，更远些说，是美国政治及美国文明的推动发展者。在自我转变的同时，它改变了它们。美国文明当前的和长久的危机的原因，部分地就在于此。

·为了领会这个发展，暂时必须回到托拉斯时代（trust：信任；trustee：代理人）。

从法律上说来，trust（直译为“信任”，托拉斯）必须理解为拥有不同公司身份的股东的联盟，股东委派trustees（代理人）去代表他们。结果，trustees组织实际上合并各公司，而各公司按照它们的契约，本无权

合并。因而，这可以成为规避法律的一个方式。这些托拉斯中一些从事相近活动和互补活动的公司可能聚集起来；当它们的力量强大到足够的程度时，它们自然而然地力求达成一种垄断，尽管美国地域广大，致使要做到垄断一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1839—1937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从1870年创办（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Ohio），到1879年有效地组成美孚托拉斯（the Standard trust），成功地实现了垄断。美孚托拉斯超出了商业的严格界限，因为它囊括了一系列的企业，既负责石油开采、运输、提炼，又负责石油出售（尤其是销往国外），后者不久便与汽车的巨大飞跃发展联系在一起。

1897年建立的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也肯定是个托拉斯，并且更加肯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企业。约翰·洛克菲勒退出了美孚石油公司的业务，但并没有退出投机活动，他乘当时还没有税务控制之机，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来他从这一财富中拿出了巨额数量用于慈善事业。与此同时，约翰·洛克菲勒买下了靠近苏必利尔湖（Lace Supérieur）的铁矿层。实际上，他得到这些铁矿是作为那些没有清偿能力的客户偿付的债务。过了不久，他以秘密方式建立了一支货轮队，通过五大湖运输矿石。而后，出于被迫而非情愿，他与钢铁大王、匹兹堡大炼钢厂厂主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年）达成了一个协议。在银行家皮尔庞特·摩根[49]的帮助下，这个庞大无比的美国钢铁公司成立了，我们可以说，该钢铁公司使美国钢铁生产的60%“托拉斯化”。此后又有了最后的一幕：在将集团股份引进交易所之际，皮尔庞特·摩根把资本增加了一倍，因此使价值也增加了一倍。他在拥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利用股份的直线上升进行投机。

这些交易，人们还可举出别的（人们常提及关于铁路公司的斗争的例子），给一种技术和一种氛围下了定义：冷酷无情、丧尽天良的资本主义，就像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政治一样。况且，一个洛克菲勒，一个卡内基，一个皮尔庞特·摩根，像这样的人，肯定地说，在某些方面离文艺复兴时期果断的君主相差不太远。

这种商业跳跃，必须给它确定时间，是从加利福尼亚黄金热（1849年），或更确切地说是从1865年（南方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之后），直至20世纪初。这些君主，依据场合而面容冷酷或面容温厚，都强烈地想要“他们的”美国。他们打碎或者绕过他们前面的各种障碍，几乎明目张胆地支付必要的酬金进行贿赂。他们中有一人写道：“倘若你要获得公

正的解决，就该付钱，这样做是简单合法与公道的。假如一个人拥有作大恶的权力，只在被收买后才品行端正，因为这样时间将被节省下来，那么一往无前和收买法官就成为一种义务。”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中我们意的，就是正义的……

这是取得了伟大经济成就的时代，铁路、加利福尼亚黄金热、西部移民、新人、暴发户，他们具体证明了一再得到保证（即使并非永远精确）的self-made-man（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人）……的神话。这是无意中恬不知耻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在斗争与妥协中，商人显然不会用我们的眼光看待他们自己。正是那些好斗者迫不及待，无所不用其极，只考虑他们追求的目标——强盛、合理化，甚至还有公益。的确，所有这一切都肯定可以使其财富大大增加，可以提高他们的地位，使他们飞黄腾达，但是既然“最优秀的战士获胜”，那么公平地说，他们就完全没有权力这样做吗？

·然而，以为这些行径或这个时期晚期力求把所有成功的商人（因此，一个像皮尔庞特·摩根那样的人，就是大骗子）都描绘成self- made-man的宣传活动，只会遇到称赞和轻信，那是不准确的。

远非如此。公众，甚至商人，对垄断或看来鼓励垄断的措施，显露出极度的担心。商业“组织的”常常自发地集中，再加上1900年后长时间的经济高涨，全都有助于增加托拉斯和垄断。它们像雨后春笋一样疯长起来（1887—1897年为86家；1898—1900年为149家；1901）1903年为127家）。但是它们之间马上开始斗争：1896年的总统竞选运动，部分地产生了拥护托拉斯（麦金莱）与反对托拉斯（布赖恩）的两派。继而一些野心勃勃的托拉斯自行失败，如皮尔庞特·摩根梦寐以求的商船托拉斯。

由于1903年和1907年出乎意外的短期危机，舆论对这一主题高度敏感。1904年，在公众舆论的赞许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解散了一家真正的铁路托拉斯。政府采取的这类措施以及众多反托拉斯和垄断的运动导致了loianti-trust（反托拉斯法）产生，或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位民主党朋友之名，称为克莱顿法（1914年）。

许多观察家说此举只不过是抽刀断水，靠一纸法律就想扼制住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经济集中，乃是乌托邦空想。美国社会主义领袖丹尼尔·德·利昂（Daniel de Leon）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人类沿着梯子升向文明，这道梯子是工作方法、越来越强大的生产工具的进步。托拉斯占据

梯子的顶端。当代社会风暴正是围绕托拉斯而发出怒号。中产阶级力图打碎托拉斯，从而使文明的进展倒退。无产阶级力图保留托拉斯，改善托拉斯，使之向所有的人开放。”

这样的态度很清楚：不要触及成为技术进步、美国的成功与骄傲的东西，但是要使进程更文明，可能的话，投托拉斯发展股。为了这样的政策，唯一的仲裁人要具有足够的规模和权力，此即联邦国家，因为托拉斯实际上超出了美利坚合众国中个别州的范围，它们的经营活动同时在好几个州进行。唯有联邦国家才有它们真正的大小。即便如此，联邦国家还必须增强、巩固，进一步树立威望，成为有资格的谈判对象；托拉斯，或大型企业，从它那方面也要认识到，不论高兴还是不高兴，只与一个权力机关打交道，取得它的支持，尊重它的异议，支持权力机关的各项决定，对它是有好处的。其中一个例子，是1962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反对提高钢价。

·今天，因为有了卖主控制市场、辛迪加（les syndicats，工会）、国家“补偿权力”“美国正在建立某种类似新资本主义的事物，以其发达的形式适应20世纪的环境，新资本主义已经截然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

这种新资本主义难以把握。它在多方面表现出来，而整个美国文明通过它的秩序，它的社会网表现出来。因此，如何列举它的所有成分呢？从现在起直奔自动化奇迹的合理化[50]；在无孔不入、强大无比的广告影响下，合乎标准化的口吻，为清一色庞大的市场进行批量制造；加上在大企业中设置了纠缠不休的human relations（人际关系）和public relations（公共关系）部门——它们类似于外务部和内务部，它们的任务是在面对公众舆论、消费者，最后尤其是面对工人时替自己辩解，表明企业的做法是正当的。虽然无数的细节都有自身的价值，但重要的是统率全局的经济事业。因此，必须指明带来一切的运动的规则、限制、结果。为此，我们要逐个地加以考虑：在19世纪自由经济中，市场昔日的作用、卖主控制市场、辛迪加、联邦政府。

市场（当然假定是自由的）对自由派经济学家来说，是整个经济生活的调节器，是整个经济生活的伸张正义者。通过竞争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方法，它使每一个人或每一个事物安分守己。根据资本主义传统，理想的经济是充分竞争的经济（因而没有垄断），是国家不进行干预的经济，是由于供求作用而自行确立平衡的经济，是危机、失业、通货膨胀为异常现象、必须与之做斗争的经济。对失业必须好好加以解释，因

为失业并非始于20世纪，人们直至指责辛迪加（工会）非正常的压力。

为了使这一传统的画面变得完整，我们应当重复一下，生产始终被视为善举。实际上，生产创造的所有福利，按照让-巴蒂斯特·萨伊[51]从1803年起制定的销售市场规律，都加快了交换："产品换产品"；那么，制造一件产品，就是把一块供交换的附加钱币交他本人支配，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52]和李嘉图[53]，到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大阿瑟·马歇尔[54]，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样教导过。总之，在经济生活的这种竞争"模式"中，一切都自我调节，其中包括储蓄或投资倾向。此外，为了管理储蓄或投资倾向，在它失常的情况下，调整一下利率，恰如其分地抬高或减少利率就可以了。

然而，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开始，原有的这些被传授和一再重复以致令人生厌的旧规则，都被事实推翻了：垄断、隐性垄断（crypto-monoples）、卖主控制市场，在20世纪变成了经济领域中广大部分而且是最发展的领域的支配性规则；它们违反了竞争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国家进行干预（人们可以想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美国之外那么多的五年计划）。最后，长期的危机从1929年开始，露出了面目；失业和通货膨胀共同携手，终究显示出它们是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确实令人遗憾但非常正常的现象。由此可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的革命性的《通论》[55]（1936年）的重要性，它标志着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竞争模式的决裂。美国将把它作为20世纪新经济具有预言性质的规律来接受，并将经常把它作为美国采取政治行动的基础。

卖主控制市场：当一些大卖主"努力满足数量众多的买主的需要"时，便存在卖主控制市场，或者不完全竞争，或者不完全垄断。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反托拉斯斗争并没有结束企业有机的生物竞争。在大量的部门中，而且不仅限于美国，合并导致产生了巨型的公司企业。因此，1939年之前，在制铝业领域只有一家大公司，即美国铝业公司，它控制了铝市场。通常，几家大型公司瓜分这个或那个工业部门，比如，三四家企业负责烟草种植和卷烟制造。

然而，在这些巨型企业周围，小型企业继续存在，默默无闻地勉强维持下去，而且说不定哪天就得消失。它们只不过是幸存物，只不过是过去的遗产。它们也一样很容易被接纳进新兴产业，这一产业吸纳资本和敢冒风险者（洛克菲勒年轻时代的石油，或亨利·福特开始起步时代的汽车）。在工业部门已经牢牢确立、根深蒂固，经验、企业规模、技

术进步和自供资金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唯独享有特权的那些企业拥有所有这些条件的时候，要想进去则困难得多了。

调查和统计数字也表明了下列事实：200家大型企业控制了美国差不多二分之一的多得令人惊异的物质财富。这是一些常常不带个人色彩的企业，匿名的甚或由被雇用的全体职工所拥有的公司。在这些帝国中，相对于欧洲公司来说，负责人和雇员的工资薪水都是巨额的，但是，它们通常是固定的而不是与利润连在一起。“本来意义上所说的利润，”正像亨利·福特解释的那样，“属于公司本身：利润是公司的保障，利润使公司能够发展壮大。”

这样，这种例外形式的资本主义单独地建立起来，“巨人”的统治也建立起来，反托拉斯法对这些“巨人”无能为力（人们看到，1948年政府对“切斯特菲尔德”“走红运”和“骆驼”牌香烟制造者采取行动的情况）。必要时，如果有一家垄断者也无妨，但竟有200家！必须来一场彻底的改革，进行一次革命，可是没有人想到这点。卖主控制市场不会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型企业。

重要的位置于是被占有和牢牢掌握着。“在商业贵族制中，公爵的高位属于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杜邦·德·内穆尔化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根据他们不同公司的资产的严格比例，伯爵、男爵、骑士和骑士侍从接踵而来。”那些已经获得这种地位的人力图保住它们：“现在一代美国人，如果想继续活下去，就要在现时提供这些物品的一些公司的这家或另一家，购买钢、铜、黄铜、汽车、轮胎、肥皂、开关、早餐、腊肉、香烟、威士忌、收银机和棺材。”（J.K.加尔布雷斯语）

当然，人们常说，这些巨型企业有其优势。它们跟得上技术的进步，出色地利用了这种进步，并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优质产品……像我们概括指出的那样，一下子集中合并起来的现代化部门，与始终处于这种运动之外、仍处在19世纪路线上的那些企业相比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美国既建立在旧的资本主义之上，也建立在新的资本主义之上，至少是建立在双重结构之上。农业（总体来说）、服装业和矿产业属于旧资本主义的范畴。这就是说，企业在这里规模很有限，有关农业的企业不值一提：在密苏里，一个重要的农业生产者可以把9000大包棉花送交到市场。按绝对数量来说，这一数字本身是巨大的，但相对于总的生产规模而言所占比例低得可怜，低到可以说对棉花价格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实际上，价格支配着他，支配着他和所有其他的棉花生产者。

同样的，在进步惊人的美国石油公司的“石油垄断”组织，与处于古朴状态的6000家煤炭企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煤炭企业依然依靠报酬甚差的矿工的劳动，技术的进步只因最近国家进行干预才有可能（恐怕还到不了这个程度）。

然而市场在恢复它的作用。显然，价格从不会令大企业感到吃惊。大企业事先控制价格，并忠实于“最纯洁和最诚实的”竞争，在该领域，它们只有对能对它们还击的竞争组织受涨价或降价决定的影响进行估计之后，才进行干预。由此可见，为了确保巨型企业的安全与利润，价格要定得相对高一些；幸亏有了这种相对高的定价，小型企业才可以在大型公司的阴影下能围绕大企业设法生存、死里逃生。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战被排除，只进行广告战就行了。显然，广告是“富裕经济”独有的奢侈品。无法想象，一个名副其实的贫困社会中还会有广告。

不过，这200个巨人（被1929年危机所动摇的银行权力，看来再也不能控制它们）不能无可争议地进行统治，或更有甚者，完全支配一切。把销售集中于几个人的手中，至少有集中到某些现代化的机构之中的天然趋势，同样也把购买集中到几个人手中。

因此，生产者的“经济权力”撞上了购买者的“补偿权力”。凭这种两面制衡的手法，垄断利润能从这一方或从另一方出来：一个大的供应商可以面对许多买主，一个大的买主也可以面对许多供应商，或者是最后一种相当常见的情况，一方巨人面对另一方的巨人。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达成妥协。假定钢铁商人起了念头，要在底特律定下“专断价格”。但要把专断价格强加给像底特律汽车制造商一样重要而强有力的买主，是很难办到的。

显然，卖主垄断市场能扮演两种角色，卖主（供应商）与买主，轮番或同时运用经济权力，而后是补偿权力。但是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在这两种活动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紧张。

辛迪加。正是在劳动市场上，补偿最显著地增强了。工业巨头在自己的部门，看到庞大的辛迪加（工会巨头）在它们前面直立起来。而辛迪加也试图从垄断、从大企业对价格市场的干预权中获益。既然大企业能使价格上升，只要迫使它们提高工资，允许工人与它们一起分享它们的特权就行了。假如人们想到，实际上美国一些辛迪加是富有的公司，有高楼大厦、巨额经营有方的资本、付酬极高的董事长和职员……那么使用“特权”一词就不算过分。

相反，在最新型的资本主义还没站稳脚跟的地方，辛迪加的行动几乎施加不了同样有效的压力。活跃的辛迪加网几乎把整个农业活动置于其组织之外，其原因是否在此？

无论怎样，生产者与辛迪加经典性的对立在今天的美国，趋于呈现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是一种往往类似于协会的形式，消费者有支付协会费用的可能。产业巨人使社会巨人的产生成为可能，它们相互制约的权力起着工资与物价调节器的作用。

然而，由于这个调节器易于发生很多错误，它会被卡住或咬死，而它的每一欠缺，在一个患有巨人症的国家，都有可能产生同样巨大后果的危险。因此，国家作为最高调节器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它负责照管着机器良好运转。从1929年以来，没有一个人怀疑这种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尤其是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一种否定。

显然，美国经济的发展迫使联邦国家进行认真的干预，发挥“补偿权力”的作用。对联邦国家来说，问题不再是按照1914年克莱顿法奉行的反托拉斯措施盲目地进行干预，而是认真分析经济形势的各种因素。幸亏现代经济科学在这一点上给了所有可能性，联邦国家才得以预测经济形势的发展，时时准备对这个或那个部门采取行动，旨在消灭失业，刺激生产，防止通货膨胀，诸如此类。

人们懂得为何罗斯福新政以来，联邦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大。赫伯特·胡佛政府班子只有37人，而杜鲁门政府却拥有325个直属官员和1500个雇员。过去，仅仅白宫就可以满足总统工作的需要。今天在白宫对面立起一座行政公署大楼（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新官僚在这里已感觉到狭小。渐渐地权力集中到白宫，整个国家都感受到影响。庞大的官僚制度依靠的是一支精明强干的技术人员大军，他们不受旧的政党分肥制度（Spoils System）的盛衰的影响，这种政党分肥制度随着选举结果的变化，常常引起官员的替换。官僚制度的这种新的固定，仅此便是一个革命。从此以后，总统统领的是有资历的行政人员。

联邦国家的整个庞大制度，是根据经济应该或能够借以确定方向的那些决定性问题而组织起来的，同时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美国的各种社会问题。经济统制主义即使是有限度的，但如果没有社会统制主义，焉能想象？

自从国家在经济组织中担负起一定职责那一刻起，国家就变得对社

会不公正负有责任。它不能无视那些没有组织起来、处在辛迪加的边缘或干脆在辛迪加之外的美国人，比如那些没有任何权利的200万名农场雇工，他们组成了一种农村无产阶级贱民。是否必须为他们确定最低定额工资？美国是不是必须建立具有欧洲特色的社会保险制度？

这么做，就是在一个解决了许多旧问题、但是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有些问题迫在眉睫的富有经济中，引进了有倾向性的社会政策。问题还在于：这肯定是对美国文明传统的新的破坏；美国文明是极度个人主义的，它首先尊重一个人靠自己"获得地位名誉"的本领。国家侵入社会组织本能地使所有美国公民反感。但是今天有没有可能避免这一点呢？

为了形象说明这种选择的困难与必要性，让我们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逃亡美国的苏联人，在社会学家问及他们初来乍到的印象时他们的那些感想。如果说总体上他们承认在美国新的物质生活的优越性，但他们对以前所熟悉的苏维埃制度下的公费医疗，尤其是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则一致非常留恋。甚至一个法国人在大西洋的彼岸也发现他自己的社会保险制度的价值：尽管美国非常富有，却不会提供相同的社会保险。一位在美国名牌大学任教的年轻教师突然发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他再也不能任教。他该怎么办呢？人们会告诉你，他忽视了保险。他和妻子孩子一起流落街头……

许多权威人士相信，美国应当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种社会福利。同时，公众舆论的发展促进人们关注这一问题。不管有关报刊说什么，国家征收的金钱不再被视为是为了无能者或懒汉的利益，而打击强者、精明强干者、财富生产者的不公正的惩罚。自罗斯福新政以来，联邦政府在一切必要情况下，都是"基本上乐善好施的"。

这一巨大变化越来越改变和缩小单个州——这些昔日实际上自治的共和国——的作用。它也有深刻改变美国社会和美国文明的结构的可能。同样，作为民族国家，美国更是开始修改它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任务、作用和责任的意识。

面向世界的美国

在20世纪，在广泛孤立主义的漫长传统结束时，美国刚刚与世界相遇。世界作为一系列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令人不快的问题，摆在美国面前。美国本能地希望退出这个世界。但是美国的力量本身把它与全世界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在对外政策方面，如同在国内事务方面，它没

有别的选择。世界已变得太小了；美国的每一个举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产生世界性的后果。

·人们永远说不清楚孤立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构成美国的基本特征之一。

美国的孤立主义部分地是迸发于从独立最初时刻起就很明显的那种感情，即美国已建立一个与旧欧洲截然不同并且比旧欧洲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反抗父母。”精神分析学家诊断说。美国的孤立主义的产生还在于美国人的下述意识，即他们本能地认为自己在幅员辽阔的美洲大陆有着自主独立的过去，同时距离赋予他们一种安全感。

实际上，美国曾自由地、不受别人干扰地独自照料在其国境内所发生的事务，维持自己国家的繁荣；自由地筑起一道道像中国的长城一样的保护性、孤立性的关税壁垒，不必害怕邻国的威胁；自由扩大自己的宅院，不必有任何羞耻感，不必受到良心的责备。美国的领土征服仅仅是一次扩张；而其他国家的海上征服则是令人可憎的殖民活动。在19世纪，美国只感到与美洲大陆其他国家建立联系是有必要的；这种团结一致体现在1823年公布的门罗主义中——“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致国会的这份咨文——确实是一份咨文，而且来自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詹姆斯·门罗——也显示出美国对欧洲事务漠不关心。门罗主义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以后常常被重新采用和重申。

但是别人的世界是无法被忽略的：它们与美国存在商业、进口、出口和外交关系。1898年，好战的冲动甚至把美国人引向波多黎各，他们今天还在那里；引向古巴，今天他们不再在那里；引向遥远的菲律宾，尽管群岛已经获得独立，美国人实际上并未离去。世界也向美国走来，欧洲、日本、中国移民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美国凭着经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反应，认为这很危险，就在1921—1924年对外来人流关闭了大门。对世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些极度紧张和悲惨年代中的欧洲来说，大概没有比这更具灾难性的决定了。总之，一个安全阀被取消了。

同时，1918年决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命运的美国，从《凡尔赛条约》以后起，退出了积极的国际政治舞台。美国曾是凡尔赛条约的发起国，但并未加入国际联盟（la Société des Nations）。美国把世界托付给虚伪脆弱的英国支配，我们看到，这是建立在长期海上联系基础上的旧杰作，而战争把它原封未动留下来。此外，在1918年美国对大战进行干

预的种种动机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拯救英国的这种世界霸权，美国自己能将就英国，英国保卫着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他们的文明的未来。

面对本不愿意做这种退却的给人好感的伍德罗·威尔逊，面对他的失败，是否反过来必须谈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雅尔塔（Yalta），在德黑兰（Téhéran），在拉巴特（Rabat），在他去世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那些首脑会议上的完全成功呢？当时，通过一系列诺言，他约束和解除了一个世界，我们应当承认，预言这个世界的未来是很不容易的。但罗斯福是否对瞬间的必要性，对比威尔逊的原则还要缺乏价值甚而常常在道义上有争议的原则让步太多？支持殖民帝国的解放，好吧，肯定合乎美国传统的原则。但这也意味着削弱西方的力量，并或迟或早随时对拉丁美洲发难，这在经济事务上可以视为拉丁美洲对美国“殖民地式”的依赖。继而，在同一时期，把欧洲的一半作为礼物赠送给苏联人，这离民族自决权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是罗斯福认为，世界和平要求弱小民族不再生事，不再制造麻烦。让我们裁减除当时四强——中国、苏联、英国、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备，此即罗斯福的愿望。也许他不怀念孤立主义：如果必须用武力照管世界，至少我们要尽量使之保持平静。……

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这种观点和这种解释的方式，可见于美国人笔下。这种方式确实值得争议。但它表达了非美国人尤其是西方人中相当流行的一定看法。新大陆以外的远距离旁观者认为，美国并非有意如此，它事先也没有意识到，就成了世界的领导（leadership）。他们还认为，美国通常把问题看得简单——出于共识和善意——认为困难是与旧世界的偏见或利己主义连在一起的。然而美国的许多动议令人遗憾，很快就不受美国的控制。它们无可争辩地证明，信誉和良好原则不足以领导世界，同时，商业贸易与金钱的统治地位，按照美国传统的看法多么合法，在今天几乎像旧的殖民统治那样引起同样多的怀疑、不信任。美国人在他们那一方面认为，这些失败乃是他们曾经援助或打算援助的那些民族忘恩负义的证明，是他们嫉妒的证明。

实际上，美国像任何人一样，必须从头开始学习，必须采取确切的世界措施。对这个世界它如此长时期地无知，或成心不予理睬。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美国必须，如果可能的话，进行监督和领导。美国已认真地承担起这项任务，承认自己犯下的一些错误。因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信心，同时随时乐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求虚荣，讲究实效，也是美国的传统：越快校正射击姿势，就能越快击中靶心。

因此，肯尼迪总统试图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或政治学专家聚集到自己周围，对当前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一位记者指出了这点并补充说（1962年5月21日）："在让聚集到自己周围的这些'才子'和'智囊'做了大量工作之后，他从他们的结论中，综合提炼出指挥他行动的原则。这里那里，阴影地带继续存在。某些选择仍旧是公开进行的。但是，重要的方面，他所选定的路线是明确的。很长时期以来，人们第一次知道对美国总统的意图应该怎么对待。"不要把那只看作总统个人思考所达到的结果，或归功于为了澄清问题而延请过来帮忙的知识分子和哈佛大学教授们的努力。事实上，从马歇尔计划到朝鲜战争，再到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或老挝目前的紧张状态，在这些戏剧性的紧张的年代中，美国直至公众舆论的最深处，都意识到美国的世界性角色和美国的责任。孤立主义的时代烟消云散了。

·国力带来了责任！实际上，美国跻身于世界首强，它必须在这个行列中生存，否则将危险地倒退，这是美国国力奇迹般发展的后果。要想说明美国国力的特点，需要用所有形容词：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军事的、世界性的。

实际上，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这种国力已很明显，立即使欧洲的（以及世界的）领导权问题的争斗宣告终结。过去，欧洲几乎一直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其构成依来自这个或那个优越国家的危险或威胁性的国力而变化。今日世界，用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话来说，是按这种旧的两极图式而生活的。分隔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并非只是意识形态。随着年代流逝，自由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相似之处增多了：社会主义世界也靠巨型单位组织其工业；自由世界这一方面，也在为明显的必需的国有化而绞尽脑汁……

今天较之往日，领导权（leadership）更增加了强国的意义，提出一种抉择：不是华盛顿，就是莫斯科。第三世界的中立国，以及这些超级大国的盟友或卫星国，只不过是它们所经受的这部历史的目击者；它们的作用只不过是能在天平的各方添加极其有分寸的重量。故而问题在于，同控制它们一样，超级大国也要诱惑它们，吸引它们，让它们保持忠诚。

1945年，美国是获胜者，在优势中暂时罢手，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用惨绝人寰的决定性方式确定了美国的这种优势。1953年7月12日，苏联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世界恢复了平衡。1957年，苏联发射了

第一颗人造卫星（Spoutnik），苏联人赢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起点，因为征服太空也是调整远程导弹，使其射程达1万千米。自那以后，种种成就交替而来，平衡无法确定。双方军备竞赛越来越可怕，“冷战”因军备竞赛激起的互相忌惮而维持，世界其他民族看着这番景象，双眼圆睁，两手空空，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无比的愤怒。这是因为，如果说世界两大巨人的危险游戏既不比昔日欧洲的危险游戏更坏，也不比它更好，但是它却给世界带来了另一种不同的危险。人类处在自我灭绝的危险之中。

不管怎样，很明显，这种斗争困扰着美国，不仅使美国政治改变方向，而且使美国的整个生活，甚至思想都改变了方向。由于不同的但却同样不容置疑的原因，俄国氢弹爆炸的年代同1929年一样，都是一个令美国生活发生转折的年代，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这里。因每一个时机而助长的这种紧张状态，折磨着人们的头脑、想象力和心灵。它使一切都变了形，使曾是自由国家的国家在这种多疑的束缚中生存下来，通常，这就是战争气氛。昨日麦卡锡主义（Maccarthysme）甚嚣尘上，给我们标明了这一点，但是从那时候起狂热并未真正消失。全世界都有被卷入这场敌视思想如同敌视人类幸福的精神狂热的危险。建立休戚相关的世界和平的黄金律毋庸置疑应是执意地想着avec（赞同），而不是contre（反对）；然而美苏两国执意互相contre。

“冷战”中，双方阵营互相诽谤、积聚起大量任何一方都不敢使用的防御武器。“冷战”让人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

·为结束本章，要在美国小说这令人赞赏和多种多样的见证上多花些笔墨，以此给它阐述的文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结论。

无疑，为了全面、完整，不仅必须从诗歌到戏剧到电影，对文学领域加以全盘探讨，而且也必须对艺术进行探讨，给建筑保留一个特殊的位置，还必须对科学，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加以探讨。人类才智的充分发展，使哈佛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的美国经济学家大放异彩，也使美国艺术家展示了才华，美国工业的工具、技术和功能形式的美也尽显于世。

如果我们选择——因为在这过于简短的概要中必须选择——小说的记载，一方面是因为20多年来，它对欧洲和世界文学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自20世纪初以来其发展说明了我们刚刚谈论的这场危机。

美国文学是在1920—1925年开始被欧洲“发现”的，但是它在欧洲的

流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广泛。为数众多的译本经让-保罗·萨特、安德烈·马尔罗[56]、塞萨尔·帕维斯[57]这类作家的推荐和评论而大受欢迎，它们的影响在法国，在英国，在意大利，在德国非常显著，一位评论家把刚刚过去的时代誉为“美国小说的时代”。甚至还必须说这是“美国方式”的时代，在爵士乐、舞蹈，甚至在青年的穿戴方面，在卡通片（cartoon，动画片图画）——《纽约客》（*The New Yorker*）周刊提供了最有趣的样本的这些幽默画方面，人们都可步美国方式的后尘。

在涉及小说的方面，欧洲人发现的基本上是一种新的“风格”，一种远离欧洲心理小说传统的叙述技巧。人们把这种叙述技巧称为“客观而朴实无华的报道艺术”，一种“摄影风格的艺术”，旨在描写，不在评论。为把读者引入人物的心理世界，人们会让他直接地剧烈感受该人物的感觉、感情，绝对不想说明其中的含义；这也是电影的手法，它的影响在这里也非常明显。

对欧洲人来说，美国小说是以这种技术，以暴力、粗犷的一定气氛为其特征。一位法国评论家写道：

美国文学顺从于电影并为电影而创作，它是由hot news（热点新闻）和侦探小说的习惯造成的……粗犷、热情、狂热和疯狂的文学，没有一丁点儿的过分讲究。美国文学就像拳击的第一拳，虽然如此，它因种种气质的不同而讨人喜欢。它迅速而强硬：可以品尝到别的地方所缺乏的一种健康、活泼和有力的东西。

事实上，这些话语描述的是美国小说的一定时刻（moment），美国人所谓的“自然主义”时刻，它基本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大名鼎鼎的代表作家包括厄内斯特·海明威[58]、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59]、约翰·多斯·帕索斯[60]……

然而这些人物，无论是已故或尚在的，都是在1890年和1905年之间出生的。由于他们的年龄和作品，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他们属于“另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今日美国离“自然主义”风格小说越来越远，而回到更古老的美国文学传统，19世纪的美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尽管不大为欧洲公众所知，但同样光辉，同样具有独创性。这方面大名鼎鼎的作家有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年）、纳撒尼尔·霍桑[61]、亨利·詹姆斯[62]。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使我们感兴趣的普遍运动，是从美国文明

中所能显露出的东西。一个常数可能要从头至尾标明：在美国社会中，欧洲意义上的“作家”的确不存在，作家在美国社会中没有自然而然的可令人尊敬的地位；美国作家始终是孤立的个人：他们过着远离社会的生活，司空见惯的情况是，在或多或少短暂的成功以后，便消失在悲剧性命运中。“美国的人生中没有第二幕。”他们中的一位作家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63] 说道。这话对他本人和他的同辈都适用，他们中没有几个人有过“成功”的晚年。因此美国作家尤其是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他不满足于表达他的反叛，或在周围世界面前他的苦恼，但是他体验这种反叛，每天用焦虑与极端的孤独来抵偿这种反叛。美国小说的发展因此强烈地反映着其内部社会紧张状态的发展。

在19世纪，在梅尔维尔、霍桑的调子阴暗的作品的背景中，大的幽灵就是美国的加尔文清教主义。它迫使他们接受善与恶之间悲剧性斗争这个纠缠不休的主题，即使他们同时抛弃这种纠缠不清的负担。梅尔维尔和霍桑两人都以某种方式揭露他们周围的社会，而社会变本加厉地还之以颜色。

20世纪一开始，就兴起了一场反对清教主义各种不妥协行为的广泛运动。无疑，时至今日，清教传统仍很强大，今天仍以社会的各种禁忌标榜自己的力量——可以说，在美国，社会的禁忌代替了道德的禁忌。但是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清教已不再是社会危害的象征。就在此时，左拉式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然主义小说开始问世。这一时间恰好与1880年以后美国国力的巨大扩张一致。

从此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未来主义”的生活，将成为反习俗热衷的目标；对于辛克莱·刘易斯 [64] 来说，其著名的《巴比特》（1922年）是美国商人的漫画式的报复写照，但是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寄居巴黎的自愿流亡者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法雷尔（James Farell）、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情况都一样，他们的领袖人物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迷惘的一代”；斯泰因在巴黎的沙龙是Americana broad（海外美国人）的重新集合的地点。还有，对于福克纳、斯坦贝克、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赖特（Richard Wright），总之，对所有这一代“左派知识分子”来说，萨科与万泽蒂 [65] 1927年被处死（多斯·帕索斯此时也将被投入监狱），西班牙内战（谁都知道海明威的书《丧钟为谁而鸣》），墨索里尼的侵略，罗斯福新政的争论，使他们满腔热情，万

分愤慨；对于这些人来说，在社会主义中，看到了拯救当时社会的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产生的后果，即“冷战”的开始，推翻了人们的这种希望。美国小说家们首先重新找到对国家的连带责任感，而后确认马克思主义梦想对于他们无济于事。

美国年轻一代脱离社会现实主义。他们偏爱一种小说，在那里，象征、诗歌、为艺术而艺术夺回了他们的权利。美国年轻一代参照亨利·詹姆斯、梅尔维尔，也参照菲茨杰拉德的做法；菲茨杰拉德这位“迷惘的一代”中特立独行的作家，由于其他原因英年早逝。难道说反叛在美国文学表现的主题中不再存在了吗？人们一时可以这么认为，因为伴随战争和一代大学作家的问世，出现了向民族主义的强烈回归，大学作家因之安享太平，自愿支持他们自己的文明。但是战后也诞生了垮掉的（beatniks [66] ）一代，与周围社会的强制命令彻底决裂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与他们的先辈“迷惘的一代”一样，但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响。继20世纪20和30年代相信社会主义未来的那些人而来的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唯一的避难地是艺术、酒精或毒品；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社会中，这些作家的主要题材是孤独和“老死不相往来”[67] 。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因为美国提前就在现代性中生活着。美国仍然是未来的国家，至少对美国来说，未来的国家是希望的证明，是生命力的标志，是可能使美国恢复它旧有的乐观主义、恢复它的自信的众多资源的一个标志。克洛德·鲁瓦[68] 在其《美国锁钥》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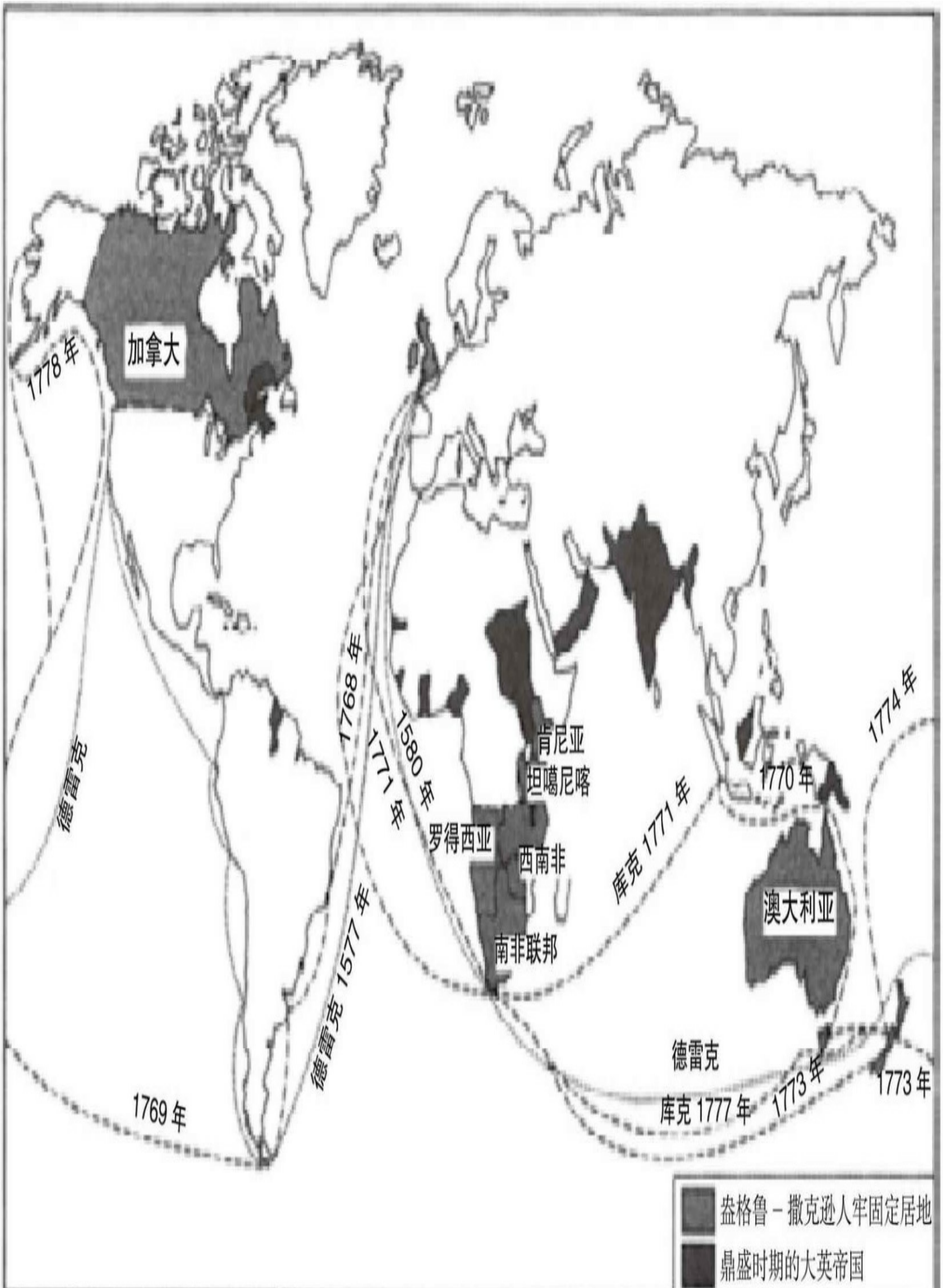
美国是世界的一块土地，在那里——不论怎样——人类的种种可能性继续显示出来……从美国归来，人们完全有信心，新的人类能够诞生，其能力更有把握，更加充满着尘世的、智慧的和有形的幸福。人们能够将电冰箱和维生素、机器的粗糙外表重新集合……我不相信谁能重新集合某种美国人的类型，在美国人身上已经实现了生活的艺术，实现了将他一向以为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服从于人类权力的艺术。

第二十三章 横穿英语世界

从18世纪起，至少到1914年，伦敦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今天如果有暇到伦敦一游，即使来去匆匆，也会使人想起其昔日庄严荣华的情景：

白金汉宫、圣詹姆士宫、唐宁街、证券交易所、泰晤士河拐弯处的大码头，所有这些景观依然历历在目。不列颠群岛在遥远大海的彼岸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口岸，令西方任何一个地区都相形见绌。谁不赞美这巨大的成就呢？拉迪亚德·吉卜林 [69] 一生曾在印度、南非、加拿大、埃及和其他许多地区度过。他有理由认为，只有从远方，从帝国与战争的英国边缘，尤其是从印度着眼，才能透彻理解英国。吉卜林的一位法国朋友正是出于同样原因，在1930年抵达阿尔及尔的一天，给他去电："抵达阿尔及尔，我将最终可以理解法兰西了。"

无论大英帝国还是法兰西帝国，都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是帝国思想给英国人保留下一种特殊的力量，至今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说明了远比在法国多得多的一系列政治结构或政治思考问世的原因。由此产生即将摆在大不列颠面前的各种抉择的悲剧性特点：是保持英联邦还是加入共同市场？选择后者，就意味着与欧洲大陆的力量联合在一起，而直至现在英国始终是"光辉地"孤立在欧洲之外的，意味着放弃英国古老的和固有的世界维度——这本是英国的骄傲——放弃它的一个最强大的传统。



加拿大
1778 年
德雷克
1769 年
1768 年
1771 年
1580 年
德雷克 1577 年
肯尼亚
坦噶尼喀
罗得西亚
西南非
南非联邦
库克 1771 年
1770 年
1774 年
澳大利亚
德雷克
库克 1777 年
1773 年
1773 年
盎格鲁－撒克逊人牢固定居地
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

图21 英语世界（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西南非，今纳米比亚；南非联邦，今南非共和国）

在加拿大：法国与英国

英国丢掉了“美国”，但保留了加拿大，甚至帮助加拿大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a mari usque ad mar[70]）。

这种安置和这种发展的主要年代是：1759年，路易·蒙卡尔姆[71]在魁北克（Québec）城下战败身亡；1782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和殖民地中仍然忠于英国国王的效忠分子抵达安大略和沿海诸省；1855—1885年，英国人居住的沿海诸省越来越繁荣，他们的帆船和水手在大西洋上不久向美国水手发起挑战，而且取而代之；1867年，经过许多波折变化之后，建立了加拿大自治领（安大略、魁北克、新苏格兰、新布伦斯维克）。后来其他一些地区加入了自治领：1870年，马尼托巴（Monitoba）加入；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加入；而后，1873年，爱德华王子岛加入（成为第七个省）。从1882年到1886年，修建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它实际上“与美国边境平齐”。这条铁路使拓殖北美大草原成为可能，讲法语的加拿大男人和印第安女人的“混血儿”则从大草原上被赶走。拓殖是由相当混杂的人口开始进行的。他们西进的过程与美国的西进运动非常相像，并且又建立了两个省——艾伯塔（Alberta）、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1907年）。最后是纽芬兰岛，它在1948年经全民表决后，最终成为加拿大自治领的第十个合伙者。

·法裔加拿大人今天占该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即大致有600万人。恕我直言，法裔加拿大人局限在广袤的魁北克省，总的说来拥有加拿大东部周围地方、圣劳伦斯河的喇叭形河口湾及其中下游地区。虽然受到英语区的包围，但它同样根深蒂固。

现在这些讲法语的美洲人是来自法国西部的大约6万名农民的后代。这6万名农民分散在圣劳伦斯河与密西西比河之间。他们在因1763年巴黎条约而遭到抛弃之后，成功地占领魁北克省，在魁北克牢牢地扎下根来。法裔加拿大人是农民，而不像讲英语的加拿大人的祖先那样是农场主。他们没有受到来自西部的召唤的诱惑，而只是相对缓慢地朝城市迁移，并且在很晚的时候才被纽约或底特律的诱惑力吸引。这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淳朴快乐的民族。

加拿大英语区在加拿大法语区以西建立起来，它将法裔加拿大人同朝着大陆腹地的种种大冒险分隔开来，在某种意义上把它包围起来：沿

海省、美国、安大略省最终团团围住魁北克省，把魁北克省变为一种岛屿领地。法裔加拿大接受了这一事实：他们紧紧抓住自己的土地，依然对其教士忠贞不渝——1763年以后，教士的确拯救了他们；最后，法裔加拿大人对自己的语言始终忠诚，这种语言基本上是18世纪的法语。加拿大法语区今天是作为一种社会和一种文明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社会和这种文明自我封闭，首先是农民的，其次是保守的。强有力的教士捍卫和保持着传统，传播着经典的传统文化。

1763年与法国的决裂让人感到是永远难以消除的创伤，对法裔加拿大人来说是无可辩驳地遭到抛弃。加拿大后来失去了与“故国”（vieux pays），与昔日和今日的法国的联系。相会始终不快。因为法国18世纪以来已发生了变化：它经历了大革命、共和国、政教分离，它也像烈焰一样，激励着前卫的、按它的方式进行革命的、关注社会的天主教教义。

加拿大法语区——人们可能过于经常地说到它——理解不了这些创新，它感到吃惊，感到被遗弃。然而它也在发展变化。它的天主教的和农民的文明不再是原封不动的样子；它的文明向必不可少的进步开放，它的大学现正对各种各样的人文科学做出巨大的现代化的、开放的努力。而这个运动肯定是由固执地对另一个加拿大即加拿大英语区，其实是对“美国化”的反抗精神所推动的。

·英裔加拿大人大致占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48%）。他们完全采取了美国生活方式（这也触及法裔加拿大）。他们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美国。

在他们的主要城市、大力朝南转向的多伦多，美国化趋势非常明显，而且是全方位的：住宅、套房、家具、烹饪、儿童教育，这种教育很早就放任自流，儿童很早就可以有boy-friends（男朋友）与girl-friends（女朋友），与边境对面美国的风尚一模一样。更有甚者，实业界也是按强大而活跃的美国模式组织起来的。简言之，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加拿大，在与遥远的英国分割开以后，没有感到丝毫困难就滑向其强大的邻邦；最近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不同国家的移民浪潮（他们主要在安大略以外地区定居下来），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吸引力。最后，维持加拿大独立地位的是其内部的各种矛盾，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法裔加拿大人之间隐蔽的紧张状态。加拿大独立所带来的经济福利普遍上升，丝毫没有使这种紧张状态消失。

加拿大在1962年拥有1800万人口，并以年均28%的速度增长，20年后达到了2500万。它的国土面积有900多万平方千米，为法国的16倍。由此看来，加拿大事实上是一个“国际强国”。它的经济发展速度极为迅捷，部分原因在于它所拥有的多种自然资源和庞大的水能储藏量上。另外，在加拿大全国各地，美国特色的工业都有所发展，尽管其根深蒂固的旧经济形式继续存在：森林开发就是这样，大河里漂着的到处都是由树干编成的木筏。

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一点，即加拿大是一个独立国家：效忠于大英帝国只是一种理论联系，代表大英帝国的总督只扮演着礼仪的角色，而且他实际上是加拿大人。

这些政治和经济事实都消除不了有意的或无意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使加拿大法语区陷于孤立。加拿大法语区受到了“英国”银行、饭店和商店连锁的剥削。蒙特利尔是仅次于巴黎的世界上第二大法语城市。但即便在这里，这种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在商业圈子里使用的是英语。

不过，穷困的、讲法语的加拿大地区对于富裕的、讲英语的加拿大地区的这些经济抱怨，并不是对立的本质。对立首先是一种文明被另一种文明拒绝。加拿大毗邻美国，美国是个迅速彻底同化的不可思议的范例，而加拿大在两个世纪以后，并没有完全同化6万名法裔加拿大人，从那时以来，法裔加拿大人已增加了9倍，现在达到了600万。看到这种情况，人们理所当然会感到吃惊。也许这是因为英国人并非总是有意地把法国人排除出征服草原和西部的活动。这可能有助于法裔加拿大人把目标转向自身，转向一个农民的因而先天（a priori）就墨守成规的封闭的共同体里，不大易受来自外部的影响。无论怎样，今天如昔日一样，两个人群之间的裂痕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和非常深刻的。

借助于一个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的时代，它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采取一种政治形式吗？这是另一回事。无疑，有些人谈到独立，甚至提出了日期：1964年、1967年……存在一个具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劳伦斯同盟”（Alliance laurentienne），但是它也特别表现为“一场民族教育运动”。运动的一位支持者在1962年宣布：“我们不是群众运动。”事实上，一个“加拿大的法国”存在着，异常坚决地存在和继续生存着。但在美国的庞大世界里，600万人有可能合理地组织成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经济统一体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南非：荷兰人、英国人与黑人

在南非，这个昔日主要为驶往印度的帆船在航道上设立的一个古老的海上驿站，英国人于1815年取代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自1652年开始）定居在南非的荷兰人，并迫使他们接受它的统治，就像1763年英国人迫使法裔加拿大人接受他们一样。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出现了动荡不安和严重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悲剧性的后果，布尔战争（guerre des Boers，1899—1902年）是其顶点，但悲剧性的命运并未就此结束。

白人的非洲业已遭到来自内部的这些猛烈争议的蹂躏，同时它还面临着印度移民来到其东海岸的危险（律师甘地便是1914年以前到达那里的印度移民之一）。尤其是，它面临着与非洲黑人发生激烈冲突的潜在危险。这场暴烈而具有悲剧性的冲突才只是开始。狂风暴雨——或者解决方案——在明天。

·"边疆"的发展，就美国意义上的"边疆"而言，是南非命运的主要事实。如果不把这个边疆与美国、巴西、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那么多运动中的边疆进行比较，我们是无法理解它的。在这里起着支配作用的与其说是本地的或者说非洲的历史，倒不如说是世界的历史。

在南非，从有节制而谨慎的殖民化的第一步起，从白人（黑人奴隶制几乎立即相伴而生）与各部族建立联系之日起，边疆就存在着。这些部族包括从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ochimen）到朝北、朝东的不同名称的班图人，他们饲养牲畜，急于用牲畜交换铁、铜、烟叶和各种小商品。这个边疆逐渐移到开普敦以外，穿过干旱而实际空旷无人的地区，不断远离新兴城市：因为卡菲尔人（les Cafres，即非洲原住民）尽管偷盗牲畜和偶尔进行暴力抢劫活动，却不是能置白人小块殖民地于险境的敌手。

只有在1836年的"大迁移"[72]之后，白人殖民者才迈出了向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决定性的步伐。弄清它的原因，便抓住了这第一次跃进的方方面面和问题所在。

动因与其说来自开普敦城本身，该城在很长时间里面积不大，影响力也很有限，倒不如说来自在开普敦港，或更往北，在萨尔达纳赫港湾（labaiede Saldanah）停泊的船只。所有船只都要购买食物，特别是新鲜食物，让全体船员登上陆地，把受坏血病折磨的病人留在医院里……

小麦生产在南非能够获得的利润很低：人们发现在印度，在苏拉特（Surate），或在孟加拉，能够买到更便宜的小麦。生产葡萄酒同样获利微薄：开普敦葡萄酒名声不佳，这是活该。这样当地的农民只好去生产更赚钱的肉类。他们开始贩卖屠宰过的牲畜，尽管屡次禁止，还贩卖活畜，牛或羊……畜牧业在设施上所需花销少，而可望获得的收益较为丰厚。另外，距离也不像对小麦或葡萄酒那样对畜牧业有什么不利。牲畜可以直接走到港口。

就这样，从18世纪起，饲养牲畜的人再次推进到边疆地带，并进一步向内地深入。同样的运动在19世纪继续进行，随着船只停泊数量的多少和需求的变化，时而加速，时而平静。18世纪英法战争是生意兴隆的大好时机。

但是这种扩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1815年，英国攫取南非。1828年，开普殖民地的英国政府通过了著名的第15道敕令，将白人与有色人种置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地位上。更进一步，1834年，大英帝国范围内有偿废除奴隶制，原奴隶主获得了赔偿（但他们抱怨赔偿金定得太低）。1828年，据估计，南非计有5.5万白人、3.2万奴隶和3.2万自由黑人。这些解放奴隶的措施，再加上1834年卡菲尔人对东部边疆的入侵，在两年后引发了那场重要的运动，即大迁移，它即将把Boers（布尔人，意为“农民”）或“福尔特里克尔”[73]一直引向奥兰治和德兰士瓦草木茂密的广阔高原，组成独立的邦国。这两个邦国分别于1852年和1854年得到英国承认。相反，10年以前，英国却无条件地吞并了纳塔尔。

以大迁移为开始的大扩张，像与美国命运攸关的西部征服一样，是阿非利卡人[74]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次扩张导致了白人人口的大分散，同样增强了与黑人人口，特别是与组成联邦的祖鲁部族的联系与冲突。祖鲁联邦各部族此时正在向南扩张，其势头在1879年以前不可阻挡。

·英国一直没有明确承认布尔共和国的独立，直到布尔战争爆发后，才在1884年正式承认。

在此之前，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金矿和钻石的发现已经导致了新的冲突。开普殖民地总督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既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代表，又是矿业公司利益的代表（他是德比尔公司创办人），他通过在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和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建立获得特许的公司，包围奥兰治和德兰士瓦这两个共和国；他还利用为

矿山工作吸引来的外国人挑起事端，1895年组织了一种纯粹的陆上海盗行为——詹姆森医生劫掠（leraiddu Dr Jameson），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决裂。[75]

然而公开的战争直到1899年10月才爆发，并立即成为英军的灾难。只是在设立了集中营之后，以与难以平息的游击队长期斗争为代价，英军才慢慢有了转机。1902年5月31日，双方签订《费雷尼欣和约》，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这两个自由邦向英军投降，被并入大英帝国，但英国允诺最终让它们实现自治。1907年，英国兑现了诺言。又过了三年，1910年，南非联邦成为英王统治下的一个自治领。

·种族隔离的悲剧今天是主要问题。

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南非工业和城市飞跃发展。但是这种飞跃只是使人类冲突加剧。冲突威胁着南非。今天，从17世纪起抵达开普敦的荷兰移殖民和源自法国的其他信奉加尔文教的难民，主要是农民。他们的农场面积很大，每人平均拥有750公顷土地。由于气候条件不佳和土壤贫瘠，在这里产量一般很低。此外，全国国土中只有4%得到耕种。今天必须做的，是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农业，同时，为了减少人数众多的挤在类似于金矿和各种行业的木板房（compounds）里的季节工数量，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此外还要更多地使用肥料，建立作物轮作制度，以此取代在广大地区还如此有势力的玉米连作制，把畜牧业与农业结合起来，结束过分原始的畜牧业。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借贷和投资，最后还需要维持大地产所有权，唯有大地产才能承受得了必需的费用。

这些粗鲁、有时暴躁的大地产所有主，带着怀旧心情想起英国人到来以前遥远的时代，那时一切都在“《圣经》气氛”中进行，自己周围有温顺的、天生就为了伺候人的奴隶。

绝大部分地产主是布尔人的后裔，讲的是派生于荷兰语的阿非利卡语（Afrikaans，南非荷兰语），并反对讲英语的南非人。后者是英国人的后裔，他们在人数上与阿非利卡人几乎相当，但他们大都居住在城市里，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并获得工业化的所有好处。

直至1939年，英国人和阿非利卡人一直力图和睦相处，共同对付有色人种给他们提出的可怕问题。但是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76]博士领导的国民党在1948年赢得大选后，这种政治谅解破裂了。马兰推行一种排

斥异己的民族主义政策，既打算使英国成分“阿非利卡人化”（Afrikanérisation），又打算对黑人实行绝对的种族隔离政策（l’apartheid）。

1961年，南非联邦脱离了英联邦。英国不愿意把自己与南非联邦危险的种族政策联系起来，这种政策在世界上遭到强烈谴责。无疑，种族隔离政策是毫无希望的。人口与经济的同样飞跃发展使局势有了很大缓解。相关的数字如下：1962年，1500万居民中，有1000万是黑人，300万欧洲人，150万混血儿——“私生子”——亚洲人占总人口的0.5%。白人因此占了总数的20%。这一人口比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只有些微的变化，白人所占的比例仅有略微的，非常略微的下降。

这种白人对黑人和对黄种人（黄种人只在纳塔尔存在）的种族隔离政策始终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非常有效的利己主义政策。由此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政策构成了一道没完没了地细心修补、加固以抵抗各种侵蚀力量的堤坝。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目的在于使黑人（甚至黄种人）远离某些地区，禁止他们拥有财产权，把他们固定在原住民辖区（Native Reserves，原住民保留地）上，一边保护他们，一边限制他们。不过，这引起了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方面，对于黑人来说，他们不大可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存，因为他们持有的土地面积狭小，空间缺乏，同时他们的原始农业方式使地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对白人来说，他们需要农业劳动力，充分扩展的工业领域情况尤其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它是为大生产和非熟练原始劳动力设计的。结果怎么样呢？与种族隔离狂热政策的主旨相违背，是“白种人的领土被侵占”。在德班（Durban）或约翰内斯堡，黑人数量众多，超过了白人，但其工资比白人低17%—40%。

为了阻止离开原住民保留地的人流，南非做出了如下尝试：（一）提高本地农业的产量，组织专业化教育；（二）而后使这些原住民保留地或他们最接近的边疆工业化，但是这样的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已经成了问题：它重又从白人工业中夺走了廉价劳动力，同时还与种族隔离政策相违背，组织起令人可怕的竞争者。

原住民保留地问题还与斯威士兰、贝专纳兰、巴苏陀兰（今莱索托）等英国的保护领的命运相关。尽管相关条款规定在1910年把它们移交给南非联邦，却从来没有付诸实施。尽管在经济上相近，但它们最终先是实行自治，继而在政治上实现了独立。南非和英国各自的立场，并没有使争端的解决较之其他问题更加简单。

总之，“从很多观点看，南非联邦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中，它还确实不得不应付另一场革命，即社会革命”，以及种族革命。总之，它还未能把它的不同文明——欧洲文明或本地文明——结合到一起。于是任何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仍然看不到。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终独成一体的英国

在其海外拓殖活动中，英国曾三次成功地成为独自一体：在美国，至少是开始的时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两个地方是从头到尾。这种独处结出了硕果。在澳大利亚同在新西兰一样，我们接触到充满生气、清一色的英国；这既不是拥有两个民族的加拿大，也不是存在着各种悲剧性问题的南非。这些自治领“离母国最远，却是所有领地中最具有英国特征的”。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样，也是比较新近的创造。它们刚刚开始它们欧洲的和世界的生活方式：澳大利亚是从1788年开始，或者说刚刚两个世纪之前；它的开端长时间里都是很有节制的，1819年有1.2万名欧洲人，1821年有3.7万名欧洲人；新西兰是从1840年开始，倘若把新教传教士在那里的定居（1814年）或天主教传教士在那里的定居（1837年）忽略不提的话。几乎一个多世纪前，即1840年，英国人在北岛安顿下来，比捕鲸人定居的时间（1843年）稍早一点。大致在这个时期，新西兰只有1000名移殖民。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应把它们人种的清一色归因于原住民在白人到来之后实际上已被清灭殆尽。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几乎可以说消失了，在新西兰，毛利原住民起初也消失了，但后来略微有些复苏。

同样，两国在地理上截然不同。澳大利亚是一个庞大的大陆，新西兰则是由一些岛屿构成，这些岛屿上地形起伏变化很大，有高耸的山脉，沿着清晰的海岸，大海掀起惊涛骇浪。原住民的历史在两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澳大利亚，非常古老的人类迁徙发生在公元前第六千纪——澳大利亚先民古澳大利亚人（Australoïdes）抵达澳大利亚，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去碰碰运气，而后落入圈套之中，被囚禁在这个土壤、动植物都极端贫瘠的地区。古澳大利亚人的部族在这里生长、退化，不断处在饥饿的边缘。他们成了活的古朴的、太古生活方式的博物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这里获得了有关原始社会的丰富资料。关于图腾崇拜

（totémisme）的讨论和解释，都是建立在对这些苦难生活的研究上的。

尚处于石器时代的这些居民无法忍受与白人的接触，这是一个事实。他们脆弱的群体发生崩溃。塔斯马尼亚（Tasmanie）最后的原住民于1876年消失了。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差不多都被驱逐到昆士兰和北部地区（总计有2万人左右）。

在新西兰，与白人接触的后果更为悲惨，但最终的结果对毛利原住民却不那么悲惨。毛利人属于波利尼西亚人，主要居住在北岛。波利尼西亚人属于一个古老的波利尼西亚航海者那种充满生气的文明；他们抵达新西兰无疑是在9—14世纪之间，处在他们探险活动的南部边界，远离曾为他们起源地的热带国家，即种植香蕉、芋头、薯蓣的国家。新西兰与这个热带世界迥然不同；它是个处于温带的国家（在地球上完全处于西班牙的对称点上，可是气候与西班牙不同），这一点使来自欧洲的移殖民喜出望外。

毛利人因此必须尽其所能地适应北岛的情况。他们猎捕当地多种鸟类——鸟类是当地唯一的野生动物。他们饲养狗，这是他们随身带来的唯一家畜；他们捕鱼，但不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而是在湖泊与河流中；他们采集根菜……他们建造木屋，制作亚麻布外衣，以适应寒冷的气候。他们对部落与部落之间无止无休的战争习以为常，对欧洲人则顽强抵抗。

他们进行的战争对于进攻者，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1868年，他们最终被击败。更为严重的是，由白人带来的新的疾病造成他们中许多人死亡。然而，随着人类步入20世纪，毛利群体开始战胜这一几乎致命的危机。1896年，他们有4.2万人；1952年，增加到了12万人；1962年，则达到14.2万人。高出生率，家庭补助金，可以在像奥克兰那样的大城市找到工作，决定了这种复兴和这种向前的运动。不过在223万新西兰人中，他们所占比例仅为6%略强，目前看来没有对新西兰文明的统一构成危胁。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时不长的历史，是以通常与世界形势或世界历史的变化连在一起的一系列经济机会为标志的。这些机会突如其来，必须立即抓住。这就像一列运行中的火车，人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

对澳大利亚来说，一个机会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英国必须

把苦役犯（convicts）转移出原来的流放地弗吉尼亚。第一个作为教养院的殖民地就这样在澳大利亚产生了。1788年1月18日，第一批囚犯抵达杰克逊港停泊场，该港后来发展成长为悉尼。教养院这种地位在1840年才被取消。

然而，差不多从开始时期起，在小地产主（settlers）旁边，毛用绵羊饲养者（squatters）就开始了饲养美利奴羊[77]。畜牧业不太艰苦的工作，适合好逸恶劳的囚犯（convicts）的要求；同时，大地产主的金钱、英国与世界的需求也使澳大利亚羊毛扬名世界，今天仍在世界上居于主宰地位。

稍晚一些，加利福尼亚淘金热（1849年）之后两年，从1851年至1861年，澳大利亚也出现淘金热潮。黄金狂热把难以管理的成帮金山矿工（diggers）分布到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各个角落。但是，淘金热潮有助于建立移民地，并促进经济起飞。因为必须向这些新来者供应食物。

新西兰也因羊毛，因小麦，还因1861年首先在南岛发现的黄金，而出现连续跃进。尽管北岛一时因这场淘金热潮而陷于混乱和不利境地（就连新西兰首都也在1805年从奥克兰迁往惠灵顿），但新西兰经济从这场大的跃进中大大获益，因为新西兰也必须供应淘金者生活的必需品，供给他们食物。从1869年到1879年，新西兰诸岛出现了大繁荣。但是这些繁荣，这些跃进的景象，常常伴随着停滞与倒退（因此1929—1939年的形势对两国都是严峻的），限于篇幅，此处就不费笔墨详加叙述了。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是，澳大利亚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直到现在，尽管拥有巨大的水电资源，新西兰还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就。

整体证据非常清楚：这些地处遥远的欧洲口岸，它们的繁荣与世界的繁荣密切相连，其程度比它们一门心思所想的要多得多。它们也许被它们生活的方便舒适蒙蔽，也许被格外显著的福利和飞行几个小时之隔的远东不发达国家的情况蒙蔽。在远东那些国家，贫困和人口过剩主宰一切。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是“欧洲”而不是殖民地，尽管它们效忠和归属于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是它们最大的供货人和至关重要的主顾），实际上它们是独立国家（澳大利亚从1901年起独立，新西兰从1907年起独立）。

·这两个南半球国家的一贯政策是把广大空间给它们提供的美妙机会留给自己，牢牢关紧移民的大门，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高生活水平和实用主义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是建立在丰衣足食之上的。

从20世纪初起，新西兰就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1856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877年实行政教分离，1893年妇女享有投票权，这同一年还剥夺了大地产所有权，1894—1895年强制调解工会与工厂主的冲突；1898年实行养老金制）。澳大利亚也有同样的发展，1891年关闭的移民大门，只为这一场新出现的最后的黄金潮才打开，结果1893年在澳大利亚西部一片大漠中建立了库尔加迪（Coolgardie）。新西兰式的社会政策于是轻而易举地建立起来。在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统治下，这片大陆变成了“工人的天堂”。

它们在福利和社会保险方面花费的所有这些巨额支出，其有益后果体现在工资、生活水平、婴儿死亡率极低、平均寿命延长上。但它们都不能不浪费政府财政和国民收入。所以在澳大利亚，随着工业和类似悉尼和墨尔本这样的人口接近200万的巨大城市的发展，频繁的罢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根据1949年10月的《商会日报》（*Chamber of Commerce Journat* ），从1942年1月到1949年6月，罢工已使澳大利亚蒙受了2080万吨煤的损失”。这些困难和这些需要，说明了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工党政府会下台。但是工党下台并没有引起太激烈的争论，整个政策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虽然节目主持人换了，但节目仍旧是老一套。

然而这种政策是不是合乎情理？从广义上说，它将这块准大陆的财富保留给1000万澳大利亚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2人），将比英国更广阔的新西兰诸岛的财富保留给230万居民（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8.7人）。但是，在当前世界上，可怕的“外部无产阶级”（prolétariats extérieurs）快速成长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曾经兵临澳大利亚边境，只是靠着美国人在珊瑚海战役中取得的海上胜利（1942年5月），它才得救。这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教训。为了增强实力和支持工业的发展，就要欢迎移民。澳大利亚曾经做出过尝试，但没有取得太大成就。可是这个教训并未触及遥远的无忧无虑的新西兰；福利在新西兰开始产生了习惯性的效果：出生率下降（1962年是29‰），人口老龄化（同年死亡率为9.3‰）。由于老龄化，像新西兰这样一个新兴的过早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1966年附言

在不列颠世界的中心，英国的命运复杂繁复，从来没有简单过。工党曾经赢得了几次大选，1964年10月18日，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出任首相一职。这是工党自1951年失败以后如此长的时间里首度重新执掌政权。但是哈罗德·威尔逊内阁走得很惨。实际上，经济和政治形势非常不妙。英镑遭遇了极为严重的危机，自此以后都没能完全地恢复过去的地位，而且恢复也非易事。关税上涨了15%（10月26日），与欧洲协会（A.E.L.E）自由交换的保证大相径庭，不仅没有立即带来商贸平衡的奇迹，反而激怒了英国的贸易伙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内关于多边力量交易的失败没能树立工党的威望。实际上，英国饱尝犹豫不决的苦楚：作为世界与欧洲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或者成为邻近欧洲的一部分，或者成为美国的第N个州……

1965年10月15日选举中工党的胜利未能明显改变政府面临的两难境地。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威尔逊政府希望进一步更长久地保护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利益。这一政策包括将亚丁的基地最迟维持到1968年，还有继续持有新加坡基地，以及对沙特阿拉伯和大马来西亚的军事保证，在印度洋建立新的半岛基地，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协议，如果可能，还有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协议。如果英国只与美国结成紧密的联盟，这一政策将无法实施。

在不列颠世界里，加拿大法语区的冲突日益严重，成为关键性区域。加拿大法语区要求获得与英语区越来越多的平等地位，它甚至异想天开地想在联邦的框架内成立国家。漫长而艰巨的工作需要独自完成，或几乎是独自完成。昔日的暴力事件因此而生，未来的暴力行动也与此相关。

[1] 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1834年11月10日—1886年10月21日）：阿根廷诗人，以描写南美草原上的牧人即加乌乔人而闻名。他曾在大草原上居住，学会了加乌乔人的生活方式。1872年发表《加乌乔人马丁·菲耶罗》，描写一个受迫害的加乌乔人的生活，被认为是加乌乔诗歌的最佳典范。1879年发表第二部诗歌《马丁·菲耶罗的归来》，叙述主人公重新回到他抛弃过的社会。——中译者

[2]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Richardo Guiraldes，1886年2月13日—1927年10月8日）：阿根廷小说家、诗人。自幼生活在农场，十分熟悉加乌乔传统。其小说《堂塞甘多·松勃拉》成为西班牙美洲文学的经典著作。另著有小说《死亡与鲜血的故事》《萨伊马卡》及诗歌《玻璃铃铛》等。——中译者

[3] 厄克利德斯·德·库尼亚（Euclydes de Cunha，1866年1月20日—1933年1月3日）：巴西作家。本为军事工程师，后脱离军队，成为土木工程师和新闻记者。曾作为随军记者到卡努杜斯进行采访，后把其所见所闻栩栩如生地记录下来，此即历史著作《腹地》（Os Sertões）。他看到的不仅是当时发生在那里的叛乱，而且是巴西腹地的穷山恶水及其未开化居民在民族生活中具有的更重大的意义，呼吁国家把落后的同胞纳入巴西生活的主流。——中译者

[4] 恩里克·赫德森（Enrique Hudson，1841—1922年）：即威廉·亨利·赫德森。他是一位英国作家、博物学家和鸟类学家，以写充满异国情调的传奇著称。童年时代在阿根廷大草原度过，1869年定居英国，1900年加入英国籍。撰写过一些以南美为背景的传奇。第一部为《英国失去的紫色土地》（2卷，1885年）。成名作《绿色公寓》发表于1904年，描写森林中一个半鸟半人的神秘动物的恋爱故事。其他作品有《阿根廷的鸟类》《英国的鸟类》和描写英国农村生活的作品《英伦漫步》和《牧童生涯》等。这些作品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返回自然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中译者

[5] 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re de Humboldt，1769—1859年，或译洪堡特）：德国著名博物学家和旅行家，近代地质学、气候学、地磁学、生态学创始人之一，著有《1799—1804年新大陆亚热带区域旅行记》（30卷本）等。其兄是德国洪堡大学的创建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年）。——中译者

[6] 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1879—1919年）：墨西哥农民起义领袖。1911年2月率领起义军进军首都墨西哥城，建立革命政权。1919年遇害。——中译者

[7] 罗慕洛·加列戈斯（Romulo Gallegos，1884年8月2日—1969年4月5日）：委内瑞拉小说家，曾任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1947—1948年）。其作品戏剧化地再现了委内瑞拉草原粗犷的自然面貌及地方民间传说。长篇小说《堂娜·芭芭拉》是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的作品，描写一个庄园里发生的故事，其中女主人凶残的程度远胜过荒原上为非作歹的罪犯、暴徒。其他作品有《坎塔克拉罗》《卡纳伊马》等。——中译者

[8] 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Jose Eustasio Rivera，1889年2月19日—1928年2月19日）：哥伦比亚诗人、小说家。职业为律师，诗集《上帝许给的土地》使他获得文学名声。《旋涡》被评论家认为是诸多以南美洲丛林为背景的小说中最好的一部。它把第一手的知识和诗意的景象与生动描写的才能相结合，有力地谴责了亚马孙河上游丛林中割胶工受到的剥削。——中译者

[9]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Mariano Azuela，1873年1月1日—1952年3月1日）：墨西哥作家，其20部小说几乎记录了墨西哥革命的每一个方面，从初期的动乱，直至其后的社会后果。著名作品《在底层的人们》是他在潘乔·比利亚的军队里任军医时在营火旁写成的，描写了革命的恐怖。其他作品有《苍蝇》《财阀》《一个体面家庭的灾难》《厄运》《清算》和《萤火虫》等。——中译者

[10] 若热·阿马多（Jorge Amado）：巴西著名小说家，以描写巴西东北部生活的小说获得国际声誉。1912年8月10日出生于一可可种植园，2001年8月6日去世。20岁时出版第一部小说。最佳小说是《无边的土地》（1944年），描写种植园主之间争夺可可园的斗争。其他作品有《加布里埃拉、丁香与肉桂》《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和《奇迹的店铺》等。自1961年起担任巴西文学院院长至2001年去世。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中译者

[11] 长河小说（romans-fleuves）：指描写的年代长、人物多、背景广阔的长篇小说。——中译者

[12] 若热·伊卡萨（Jorge Coronel Icaza，1906年7月10日—1978年5月26日）：厄瓜多尔小说家、剧作家，因对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被剥削状况所做的严峻现实主义描写而获得国际声望。他以戏剧开始其创作活动。《瓦西蓬戈》是他的第一部小说，描写白人的贪婪、吝啬和残暴以及印第安人遭到的压迫和屠杀。其他作品有《在街上》《光辉的半生》《六次死亡》和《低贱的罗梅罗·伊·弗洛雷斯》等。他对厄瓜多尔及整个拉丁美洲的一代作家都产生了影响。——中译者

[13] 安的列斯群岛（les Antilles）：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西印度群岛（the West Indies）。——中译者

[14] 巴西方言把他们称为美斯蒂索人。——中译者

[15] 克里奥尔人（Creole）：一般指出生于美洲的白种人及其后裔。——中译者

[16] 葡萄牙语，原意为地板。——中译者

[17] 吉尔维托·弗雷尔（Gilberto Freyre，1900年3月15日—1987年7月18日）：巴西作家和社会学家，被视为20世纪巴西东北部社会学的先驱。主要著作为《豪华邸宅和奴隶小屋》（1933年），叙述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与其非洲奴隶之间的关系。其他著作有《大厦和贫民窟》（1936年）、《东北部》（1937年）和《秩序与进步》（1959年）等。——中译者

[18] 凯泽林（Hermann Alexander Keyserling，1880—1946年）：德国社会哲学家，曾在欧洲几所大学学习。1911年开始环球旅行，这次旅行为他最著名的作品《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1919年）提供了材料。他研究哲学的方法是非学院式的，其思想集中在精神的新生这一主题上。其他著作有《不朽》《创造性的认识》和《南美冥思》等。——中译者

[19] 俄文原作барин，意为“老爷”。——中译者

[20] 庇隆（Juan Domingo Pero，1895—1974年）：1946年当选阿根廷总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庇隆主义党”，宣传民族主义，提出经济独立的口号，实行有利于本国工业发展的五年计划，并推行一些改良主义的措施。1955年因军人政变，被迫辞职。1973年再度当选总统，任内病逝。——中译者

[21] 葡萄牙语，意为“秩序与进步”。此口号是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思想的再现。孔德认为，实证主义社会与国家确实将有自己的宗教（人类崇拜）和道德，道德格言即“爱为原则，秩序为基础，进步为目的”。——中译者

[22] 指巴西的一种古铜色皮肤的原住民。——中译者

[23] 葡萄牙旧货币名称，1托斯通原合100雷阿尔（real），现合10分（centavo）。——中译者

[24] 圣保罗会（Pauliste）：或译保禄会，是一个天主教会组织，1858年创建于纽约。——中译者

[25] 维奥拉琴，一种中提琴。——中译者

[26] 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1883—1949年）：墨西哥画家，1921年与里维拉（D.Rivera，1886—1957年）和西凯罗斯（Siqueiros，1896—1974年）签署了《革命艺术宣言》。奥罗斯科是墨西哥现代壁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主要作品有《普罗米修斯》《人类的斗争》和《火人》等。——中译者

[27]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1948年出版《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书，从思想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对美国文化传统尤其是政治传统做出了新的解释，提出了美国历史“一致论”的学说，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另著有《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中译者

[28] 蒙卡尔姆（Louis Joseph Montcalm，1712—1759年）：法国将军，1756年任加拿大法军统帅，在保卫魁北克战斗中败北。——中译者

[29] 再造历史（l’uchronie）：指按历史出发点和一套法则，用虚构的事件重新构筑历史。——中译者

[30]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抵达中国广州，美国与中国以及远东的商业关系由此建立。——中译者

[31] 此指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科策布（Auguste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1761—1819年）。这位德国剧作家曾流亡国外，在俄国任官职，后由俄国派往国外，被怀疑为间谍，遭到暗杀。写有《恨人与悔恨》《捕猎》等。——中译者

[32] 埃皮纳勒（Épinal）：法国孚日省的区首府，设有国际民间图片博物馆。让·夏尔·佩尔兰（Jean Charles Pellerin，1756—1836年）曾绘制印刷民间图片，在埃皮纳勒创办了著名的图片作坊，1800年开始印刷。——中译者

[33] 谢斯（Daniel Shays，约1747—1825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过战功的陆军上尉，贫苦农民出身。1786—1787年间，他领导马萨诸塞州西部农民起义，提出平均财产权的纲领；要求废除一切债务；废除迫害人民的法院和法令；被没收的殖民者财产应归劳动者所有。参加者约1万人。起义冲击了邦联政府的统治，对制定联邦宪法起了推动作用。——中译者

[34] 邦州（un État）：或译为国家，指的是国家制度，含有政府、监狱、军队、警察等暴力色彩。——中译者

[35] 意为宅地或份地。南北战争期间，1862年5月20日，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或依照入籍法志愿入籍者，为实际垦殖之目的，缴纳10美元，可以从公有土地上占有总数不超过160英亩的土地。在此土地上居住或耕种达5年者，土地即归其所有，发给证书或执照。该法令还允许私人廉价购买一定数量的公共土地。——中译者

[36] 摩门教：基督复兴教，1830年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1805—1844年）在美国创立的基督教的一派，过去以一夫多妻为特征。史密斯死后，布里格姆·扬（Brigham Young，1801—1877年）成为其领袖，率领教徒西进迁移到犹他州，1847年建立盐湖城。——中译者

[37] 原文为religion du coeur。英译本作“他们并不是这样富于激情的崇拜形式的发明者”。——中译者

[38] 意为“特大城市”。——中译者

[39] 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1898—1976年）：美国雕塑家、画家。1926年赴巴黎学画，1927年举办沙龙幽默画家画展，展出作品《马戏团》，小巧精致，有铁丝、木块、瓶塞做的小木偶。——中译者

[40] 活体（mobiles）：1932年考尔德制作的装有发动机的作品，而后展出了这种称为“活体”的艺术品。布勒东、萨特、阿尔普均给以好评。——中译者

[41] 孔波斯泰拉（Santiago de Compostelle）：西班牙宗教圣地，中世纪时期圣者如云。——中译者

[42] 海因利希·海涅（Henri Heine，1797—1856年）：德国诗人、政论家，以其爱情诗《歌集》著称。主要作品有《时代诗歌》、长篇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中译者

[43] 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Stowe，1811—1896年）：美国女作家，其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旧译《黑奴吁天录》）在当时引起轰动，对废除奴隶制斗争起了促进作用。——中译者

[44] 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ret Mitchell，1900—1949年）：美国女作家，曾任亚特兰大地方报纸的记者，所著小说《飘》（Gone Withthe Wind）获1937年普利策奖，并被改编成极为轰动的电影（《乱世佳人》）。因车祸丧生。——中译者

[45]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2年）：美国作家，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多以南方为背景，运用“内心独白”手法，叙述南方种植园主和资产者腐朽没落的生活，其作品充满恐怖犯罪和变态心理的描写。——中译者

[46] 月光（moonshine）：意为私自非法酿造的酒，走私酒，尤指威士忌酒。——中译者

[47] 欧洲六国（l’Europe des Six）：即1957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C.E.E.，European Community），因包括六个成员国故名。1972年以后，丹麦、英国、爱尔兰加入，名称又叫共同市场（Marche Commun）。——中译者

[48] 英语作oligopoly，意为卖主控制市场。——中译者

[49] 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1837—1913年）：美国金融家和工业组织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间世界上金融巨头之一。他成立的摩根银行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银行之一。——中译者

[50] 合理化：原文作rationalisation，英译本作efficiency（效率）。——中译者

[51]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1766—1832年）：法国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创始人。180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提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生产"三要素"论。认为商品的供给会自己创造需求；社会上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是相等的。这一学说被称为"萨伊定律"。——中译者

[52] 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认为利益是行为的唯一标准和目的，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就会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主要著作有《道德与立法原理》《义务论或道德科学》等。——中译者

[53] 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英国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提出劳动价值论，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中译者

[54] 阿瑟·马歇尔（Arthur Marshall）：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英国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其代表作《经济原理》（1890年）中，他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需求弹性、消费者剩余、准地租、典型性企业等，另著有《工业与贸易》《货币、信贷与商业》等。——中译者

[55] 全名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译者

[56]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年）：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戴高乐的追随者，曾任法国情报部长和文化部长。著有长篇小说《征服者》《人类的命运》（获龚古尔奖）和《希望》等。——中译者

[57] 塞萨尔·帕维斯（Cesare Pavese，1908—1950年）：意大利作家，曾翻译梅尔维尔、福克纳和斯坦贝克等美国作家的作品。——中译者

[58] 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年）：美国小说家，早期"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为《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风格独特，文笔精炼，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

[59]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年）：美国小说家，多以农业工人为题材。代表作为《愤怒的葡萄》《胜负未决的战斗》，中篇小说《鼠与人》等。获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

[60] 约翰·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1896—1970年）：美国"迷惘的一代"主要小说家。运用"新闻短片""人物传记"和"摄影机镜头"等手法进行创作，代表作为《美国》三部曲。——中译者

[61]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年）：美国小说家，擅长心理描写和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其作品开创了美图象征主义小说的传统。代表作为《红字》。——中译者

[62]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年）：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晚年加入英国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位妇女的画像》《鸽翼》及文学评论《小说的艺术》等。——中译者

[63]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年），美国作家，以其描写"爵士时代"的作品著称，有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中译者

[64]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年）：美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小说主要描述中产阶级生活，多以乡村和小市镇生活为主题，主要作品有《大街》《巴比特》和《阿罗史密斯》等。——中译者

[65] 这是一起震动美国和世界的冤案。尼古拉·萨科（Sacco）和巴托罗缪·万泽蒂（Vangetti）系意大利入境移民，无政府主义战士，1920年被捕，被推定犯有谋杀工厂司库和保管员罪，虽被证明无辜，虽有各界声援释放运动，仍被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宣判死刑（1921年）并被处死（1927年）。——中译者

[66] beatniks指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之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感到幻灭的一代人（包括作家），鼓吹离经叛道、反叛社会和性自由。——中译者

[67] 原文为incommunicabilité。——中译者

[68] 克洛德·鲁瓦（ClaudeRoy，1915—1997年）：法国作家，著有多部游记，《美国锁钥》（1947年）是其中之一，《中国锁钥》（1953年）是另外一部。——中译者

[69]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年）：英国作家，生于孟买，曾在印度从事新闻工作。作品大多描述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表现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丛林故事》、长篇小说《吉姆》、诗歌《军营歌谣》等。——中译者

[70] 拉丁文，意为"从海洋到海洋"。——中译者

[71] 路易·蒙卡尔姆（Louis Joseph Montcalm，1712—1759年）：法国将军，1756年率军在加拿大夺取多座英国要塞。但三年之后，即1759年，在与沃尔夫所率英军战斗中失利，其本人也受重伤身亡。——中译者

[72] 大迁移（Grand Trek）：指1836—1845年布尔农民因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而从南非开普殖民地出发进行的一次大迁移。他们迁往南非腹地，想在那里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中译者

[73] 原文为Voortrekkers，为南非用语，指1836年开始迁移的布尔人。——中译者

[74] 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指南非具有荷兰血统的白人。——中译者

[75] 此事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制止。罗兹本人在第二年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中译者

[76] 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Daniel François Malan，1874—1959年）：南非国务活动家，南非国民党领袖。1948年任南非总理，采取种族隔离政策。——中译者

[77] 美利奴羊（merinos）：原产西班牙的细毛绵羊品种的统称。该词也指美利奴羊毛、美利奴毛料。——中译者

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

另一个欧洲也是很晚才发展起来的，其时间几乎和美洲一样晚。但它是在欧洲大陆本身发展起来的，因而和西方结合起来。这个所谓的另一个欧洲就是俄罗斯，古代的莫斯科公国，今天变成了苏联。我们必须领会下面几点：

一、它的起源和它的无休止的过去；

二、1917年革命后不久，它对马克思主义的采纳；

三、它当前的成就，它的隐德来希（entéléchie，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用语，意谓“完成”，指的是实现了的目的，或将潜能充分发挥的本原。——中译者），哲学家可以这么说。当然，事情关系到的总是同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名望无疑与进行伟大革命实验的国家相连，但也越来越与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实实现了工业革命的事实联系在一起。1917年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化，但到了1962年，它就成为世界上与强大美国相抗衡的力量。这一惊人的成就是今天不发达国家的希望所在。它们能否也一跃而跨过历史时期呢？社会主义是不是这种迅速成功的条件呢？

第二十四章 从起源到1917年十月革命

用几页篇幅合情合理地概括如此漫长的、被猛烈灾难割断的过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欧尽管发生那么多事变，但在激烈程度上无法与俄国相提并论。

第一个难点在于：俄罗斯地理舞台非常广阔，这部形形色色的复杂历史由此引入，重新掀起高潮。

第二个难点在于：斯拉夫民族很晚才进入这个地方，况且他们也绝

非唯一的民族。俄罗斯人的祖先斯拉夫人的摇篮是由喀尔巴阡山脉和当前的小波兰（la Petite Pologne；波兰是斯拉夫各国中唯一具有纯粹的斯拉夫民族特征的国家）构成的。因此俄罗斯这个演员并不是最先登上舞台的，在后来却独占鳌头。

基辅罗斯

·这一空间过于辽阔，长期空无人迹，或者说差不多空无人迹，使人想起美洲大陆光秃秃的辽阔大地。

人在这儿会迷失方向。广袤的平原，巨大的河流，无情的距离，没完没了地从一条河流把小船经陆地搬运到另一条河流，庞大的行政区：这已经是亚洲的庞然大物了。

从基辅到彼尔姆（Perm）画一条线。在这条假想线以北，是大片大片的森林，它们继续延伸着北欧的森林，与乌拉尔山脉另一侧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泰加 [1] 群落森林连接在一起，乌拉尔这座古老山脉南北走向，类似孚日山脉（Vosges），是一道次要屏障，但却是欧洲东部非常恰当的界线，是俄罗斯欧洲部分与俄罗斯亚洲部分之间的分界线。

在这条线以南，是树木不多的辽阔大草原（steppes，它源于俄语степь一词）：黑土（tchernoziom）沃壤的黑色大草原，生长蒿草的灰色大草原，在那里，旱季的时候，骑手腾上马背，简直能整个消失在茂密的草丛之中；白色大草原，它位于里海沿岸，带有里海边上的盐霜。

俄罗斯的空间是由白令海、北冰洋和波罗的海为一方面，里海和黑海为另一方面之间的这些地势较低的低地构成的整体。波罗的海与黑海是这些海洋中最生气勃勃、最有吸引力的海域，对俄罗斯至关重要。俄罗斯的使命是从这个海走向另一个海，将它们连接起来，让它们充当把俄罗斯与西方和地中海也就是与欧洲文明连接起来的窗口与门户。

但是俄罗斯也向大草原上动荡不安的亚洲敞开了门户。这里是游牧民的亚洲，是我们前文提及的直到16世纪都在争论不休、飘移不定、有入侵危险的游牧民的亚洲。这也是俄罗斯的使命。如果这些来自东方的游牧民胜利地越过伊朗，向巴格达前进，那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们走他们的路好了！风暴转变了方向，这对俄罗斯的空间大大有利。但是由于没有容得下近东（Proche-Orient）阳光下整个世界的地方，许多来自亚洲的造访者，因没有更好的去处，便一直推进到伏尔加河乃至顿河、第

聂伯河、德涅斯特河甚至更远的俄罗斯大草原。这些入侵屡屡打击着莫斯科公国。

俄罗斯的领土因此充当了欧洲与亚洲之间庞大边疆地区的角色，它保护着欧洲，以俄罗斯领土为代价，替欧洲减轻来自亚洲的始终非常猛烈的打击。

·只有控制住从波罗的海到南方大海整个地峡，控制住它们之间的所有通道，才会有真正的俄罗斯。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俄罗斯的存在只能从基辅大公国（9—13世纪）开始算起。

东方斯拉夫人像所有斯拉夫人一样是具有雅利安血统的民族。继各种各样的变化之后，他们把其部落和民族一直推向第聂伯河的城市、乡村和平原。从基督纪元起开始的这个运动，7世纪前后才告完成。在东部，这些斯拉夫人与长期以来就生活在那里的各民族相会，这些民族有：从遥远的乌拉尔山脉下来的芬兰人；源自中亚的各种民族（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卡马河的保加利亚人），他们的幸存者成群结队；维斯杜拉河与尼门河的哥特人；源自里海和顿河岸边的阿兰人和卡扎尔人（后者后来皈依了犹太教）。

最初的俄罗斯是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各民族的混合，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小俄罗斯人”（Petits Russiens）的俄罗斯。这种种族融合与城市的繁荣——北方大诺夫哥罗德和南方基辅城之间所有这种生活的推动力——如果没有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经黑海或直到拜占庭（Byzance），或直到巴格达的繁荣商路的作用，便无法解释清楚。拜占庭这座巨富城市，它的光辉迷惑着基辅人，唤起他们疯狂地向它发起远征，甚至到了当时正处于全盛期的巴格达。从北方到南方，沿着这些道路流通着琥珀、毛皮、蜡和奴隶；从南方到北方，则流通着布料、珍贵的丝绸、金币。考古学家在这整个路线上发现了金币；发现黄金的点线向人们证实这些路线当时是何等地繁荣。实际上，一切都依赖这后者。它支撑着对周围尚采取原始农作方式、无力供养对这些农村来说过于庞大的城市。城市之间跨过千山万水牵起手来，从诺夫哥罗德到基辅，交换着它们的商品、纠纷和君王。

基辅罗斯必须不断地进行自卫，尤其是防止来自南翼的进攻。但是地处遥远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一直乐于向基辅罗斯提供有用的外国雇佣兵，他们朝为奴才，夕为主宰，始终是好争执爱打架的武士。这些“诺曼人”（Normaîtres），或者不如说“瓦朗吉亚人”[2]，大都来自当

时仍然野蛮、原始的瑞典，但有时也来自丹麦。他们往往受连接俄罗斯各城市和通往“希腊人”的第聂伯河航道的吸引，受这个光辉灿烂的国家的吸引，他们给这个国家起了一个颇有特色的名字，Gardarikki，即“城市王国”。这些冒险军人的一个家族建立了罗里克王朝（ladynastiedes Rulik），虽然该王朝的起源不详，但到10世纪时，它控制了基辅和其他城市。人们以各种不同的名称称呼基辅时代的俄罗斯。一个是基辅罗斯“公国”，另一个是“罗里克维奇”（Rurikovitchi），意为罗里克王朝。

这最初的俄罗斯的光辉壮丽要从整个历史背景来加以说明。西地中海早就因7世纪和8世纪的伊斯兰征服而封闭起来；从诺夫哥罗德到基辅的陆路这时成为北方国家和南方富饶地区之间替代性的交通路线。当11世纪和12世纪穆斯林在海上的霸权终结、西地中海重新向各国开放后，依靠江河航道和小船的陆上搬运的这条漫无止境的通道可带来的利益大大缩小。1204年，拉丁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这条道路最终被打断：海路毁灭了陆路。

甚至在那个时期之前，基辅的君主们就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保卫其边境，越来越难以与巴尔干半岛与黑海连接起来。一句古老谚语道：“当事关吃喝时，就去基辅，但当事关保卫基辅时，再无人问津。”这可真是一语中的。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推进，不断把骑兵投入到对基辅公国土地和城市的侵凌上：佩钦涅格人（Petchenégues）之后，出现了土耳其人（Torgues），再晚出现钦察人（Kiptchaks）或库曼人（Koumanes），俄国编年史家称之为波罗夫茨人（les Polovtzy）。

从11世纪起，一部分基辅居民迁移——简直可以说是逃离——到东北地区，在罗斯托夫（准确说是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克，一个北方小城，切莫与今天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混淆）附近，农民在大森林中开辟的林中空地上定居下来。就是在这里，一个新的俄罗斯成型了，并开始了斯拉夫人与芬兰人新的融合。芬兰人属于蒙古人种，构成移民的主要成分：他们构成了所谓的“大俄罗斯人”（Grands Russiens）群体。这个新俄罗斯虽然野蛮但却健壮，在基辅的光辉熄灭以前，就已在崛起了。事实上，1241年12月6日，蒙古人发起强有力的进攻，强占基辅，推翻了一个长期以来即已失去号召力的国家。五年以后，一位旅行家在城市遗址上只发现200所破烂不堪的房屋。

·旧有的俄罗斯各城市是西方城市。整整几个世纪中，基辅罗斯就以其物质成就和城市的光辉为人所知。在当时东欧和西欧之间没有丝毫差距，东欧相对于西欧也没有丝毫落后的痕迹。

然而比较历史学家注意到，基辅公国的这些城市在各方面都不像西欧当时出现的城市。它们不像西欧那时的城市拥有结盟小城市的光轮，这些结盟小城市是半城市半村庄的，分担邻近大城市的工作。尤其是，俄罗斯的这些最初的城市不像在西方那样明显地与平原地区相分离。大诺夫哥罗德邻近农村的领主因此参加大诺夫哥罗德议会，即维切（le Vêtché），议会的决议在城市内部和它统治的广大内地（hinterland）都是非常具有效力的。他们与商业贵族理事会（Soviet）一起是它的主宰。在基辅，首要地位不是也属于构成王公卫队，他的战斗队（droujina）的那些领主（波伊尔，boïars）吗？

因此，这些城市是像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城市那样的“开放”城市，比如雅典向阿提卡的世袭贵族（Eupatrides）开放。它们与中世纪西欧那样仅限于他们自己、心怀猜忌地捍卫着其公民特权的城市完全不同。

俄国东正教会

·通过其皈依东正教基督教的做法，基辅罗斯决定了此后几个世纪中俄罗斯的未来。

事实上，经由基辅的商路上不仅流通着商品，而且带来了福音传道者的布道活动。

基督教在大公国的普及应归功于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I）的政策。这位君主也被称为圣人弗拉基米尔，或者美丽的太阳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一度想为他本人和他的臣民选定犹太教，但后来被拜占庭的礼仪之美迷住了。988年前后，他带领他的所有臣民正式皈依基督教：基辅人民在第聂伯河河水中接受了洗礼。但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借助于一场普遍运动，该新兴的宗教特别在南方和基辅本身传播开来。这场运动是随着861年圣瓦西里（St.Basile）在哈扎里亚[3]具有决定意义的布道，862年摩拉维亚人的皈依，864年保加尔人的皈依，879年塞尔维亚人的皈依……而发生的。因而，俄罗斯的皈依只不过是若干事件中的一个，是古老的拜占庭教会这种异乎寻常的威望的又一个证明。拜占庭教会正值破坏圣像运动（iconoclaste）的长期危机终于在尼西亚宗教会议（787年）上被平息后不久。这也表明这一古老的教会恢复了健康，它的布道这时引起的反响甚至远至亚洲的心脏地带。

尽管如此，先是小俄罗斯，然后是大俄罗斯，要被基督教完全渗透，还必须有一定时间。光辉成就姗姗来迟：1025—1037年在基辅建造

了圣索菲亚大教堂；1045—1052年在诺夫哥罗德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1051年在基辅建成了早期的修道院之一，克里普特[4]修道院。

这是因为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信奉的是异教崇拜，这种异教崇拜被连根拔掉，时间不会太迅速，同时也不会太彻底。基督教创立之前的信仰和心态，直到今天在许多方面还继续存在着，尤其是在婚姻、死亡、治病救人等问题上。它们使基督教永远带有俄罗斯色彩，在对东正教礼拜仪式比如圣像崇拜和对复活节的格外重视上，独特的地方常常很突出。

·从10世纪起，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世界被纳入拜占庭轨道，这就促使东欧与西欧分道扬镳。

天主教徒与希腊东正教徒之间的差异常常可以在这种或那种各不相同的意义上加以解释。这些差异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主要是在列出（如果可能的话）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些差异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

西方基督教经受了种种特殊的考验。它部分地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遗物。基督教曾征服过这个帝国，但是它的胜利“与基督教的帝国化”不谋而合。这在西方产生了硕果。5世纪（西）罗马帝国在西欧消失后，基督教承继了帝国的任务，重建“世界性的结构”。西方教会是普世性的，凌驾于社会、国家之上；它使用自己的语言——拉丁文，这种语言为全体教会所共用，成为维持其统一的一个工具。最后，西方教会保持了从罗马帝国传下来的教阶制度，保留下了中央集权，保留下了古老神妙的首都——罗马。更有甚者，西方教会在西方文明第一夜（第一个黑暗时代），就开始面对政治、社会各方面如此众多的问题。它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共同体，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既有灵魂的需要，又有肉体的需要，能够适应布道，适应教育，甚至适应新土地的开垦。

·拜占庭教会在10世纪处于牢固的帝国框架之内，帝国继续存在，既不把尘世扩张的任务，也不把尘世扩张的危险，留给拜占庭教会。帝国统治教会，使教会屈从，将教会限制在唯一的宗教任务上。在俄罗斯根深蒂固的东正教教会，不像西方教会那样有别于世俗，它在政治上也持半漠不关心的态度。

东正教教会准备接受提供给它的任何国家框架，它绝少关心组织国家框架使之等级制度化的问题。东正教会唯一关心的是照10世纪希腊思

想传送给它的那个样子，灌输精神传统。

至于礼拜仪式上使用的语言，希腊教会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自己的语言，“视之为蛮族所不配的精英们的语言”。因而礼拜仪式上使用的语言在斯拉夫国家将是斯拉冯语[5]，此即圣西里尔（St.Cyrille）与圣美多迪乌斯（St.Méthode）把圣书翻译成的语言（858—862年之间），供他们进行布道的不同斯拉夫民族使用。他们甚至不得不创造一种字母体系，因为他们在传播圣书时使用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que）附近的斯拉夫方言仅仅是一种口头用语。由此产生了礼拜仪式上使用的斯拉夫语，即斯拉冯语，这种最早的书面语言在斯拉夫民族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两大教会之间宗教传统的差异不止由一种方式标明。因此，“vérité”（真理）一词，在希腊语和更直截了当地在斯拉冯语中，特指“永恒不变的、在创造的世界以外、真实存在的”事物，像我们的理智所理解的那样。“pravda”（лравда）一词因而同时意为真理与正义（vérité et justice），与“istina”（истина），即世俗的真理（vérité terrestre）相反。“印欧语系的形式‘var’在斯拉夫语言中产生了‘vera’（Bepa，信仰）一词”，而非真理（vérité）。相反，对拉丁语来说，“vérité”（真理）在其法律、哲学或科学的含义上，始终特指“对我们的理性而言的可靠性、真实性”。同样，“圣事”（sacrement）一词，在西方涉及的是宗教教阶制：只有它才能赋予圣事神圣的性质；在东方，它首先意味着“神秘仪式”，是“超越我们的感官和来自高处的东西”，即直接来自上帝的东西。

一些礼拜仪式的细节也显示出非常深刻的差异。复活节前的圣周，在西方，是以哀伤、受难、痛苦、耶稣基督这个人（Christ homme）之死的气氛为标志的。在东方，圣周是在兴高采烈、赞美耶稣上帝（Christ Dieu）复活的歌声中度过的。俄罗斯十字架表现的是死亡中安详的基督，而非西方受苦受难的救世主。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西方，基督教一开始就面临着人类的、集体的、修会的甚至法律的种种问题，而在东方，宗教思想一向更受限制，更为个性化，容易导致神秘主义，是纯粹精神上的。有些人认为千百万这种差异的根源主要在文明方面，阿列克塞·丘米亚科夫（Alexis Khomiakov）用“神秘主义的东正教徒与理性主义的西方人”这样的话描述这两个文明间总的文化差异。西方基督教因此就部分地对这种理性精神负责吗？这种理性精神是如此特别地属于欧洲的，它如此迅

速地发展成为自由思想，西方基督教先是反对它而为自己进行辩解，但是最终看来还是适应了它。

相反，俄罗斯公认的教义，直到最近时代，都未曾面临如此具有危险性的战斗。然而它在17世纪，在官方的、净化的宗教（因此清除了与希腊教会相反的用右手双指作十字架标记的习惯）与民众的、形式主义的、进行道德说教的、不久就不声不响地举行反叛的宗教之间，必须进行抉择。人民的宗教改革家被开除教籍，这就是那里出现的教会大分裂（Raskol）。从那个时候起，反对分裂派（Raskolniki）的斗争持续不断。当然，这些只是教会内部的斗争。来自外部的反对自由思想的攻势几乎只在沙皇制度的最后一个世纪才开始。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东正教教会确实不得不为自己的存在本身，为自己的继续存在，通过秘密行动和接受妥协而进行斗争。东正教教会看来没有从这场严酷战斗中获得任何新生的可能，也不希望试着走新的道路，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制）并行的道路，20世纪的天主教在以往50多年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些新的道路。

大俄罗斯

·第二个俄罗斯，森林俄罗斯，它也在横跨北方与南方海洋之间的地峡时，达到了它的成年。正是在此时，有伊凡雷帝之称的伊凡四世［或者不如叫格罗兹尼（Grozny：可怕的人），1530—1584年］占领了喀山（1551年），而后占领了阿斯特拉罕（1556年），从此以后控制了从其源头到里海的巨大的伏尔加河。

这一双重成就是靠大炮和火枪获得的。已经“深入西方侧翼”的骑着马的亚洲入侵者，终于在大炮火药面前退却了。伊凡雷帝在南方到达了里海，这里地处通往波斯和印度的要道上。至于黑海，伊凡雷帝未能把它控制在自己手中。自15世纪以来，黑海就已成为土耳其人的领地。要达到土耳其小心翼翼地着力防备的这个大海，在当时还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个新的俄罗斯显现出模样，获得了辉煌成就。新俄罗斯是在另一个纬度下，在困难的环境中慢慢形成的，这种环境与主宰基辅罗斯的总的说来令人愉快的诞生环境截然不同。相比之下，新俄罗斯的最初遭遇是贫穷、农奴制和封建割据。

俄罗斯空间的整个南方——大草原——从1241年基辅陷落前起，一直被蒙古人——按俄罗斯人的说法叫鞑靼人（les Tatars）——所占领。

随后，一个面积庞大的独立的蒙古国形成，此外，在这片广袤的平原地区的腹地，还有北方的俄罗斯诸邦国和城市，它们承认它的宗主权。这个国家，即金帐汗国（le Khanat de la Horded’Or），首都设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拉伊（Saraï）。

金帐汗国的建立和维持靠的不仅是它的军队，而且是它的征税人和它的财富。这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至少只要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蒙古道路（routemongole）保持畅通就行。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340年。利用这条道路的主要是来自意大利，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在这条道路中断之后，尽管金帐汗国在南方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它逐渐丧失对森林地带北方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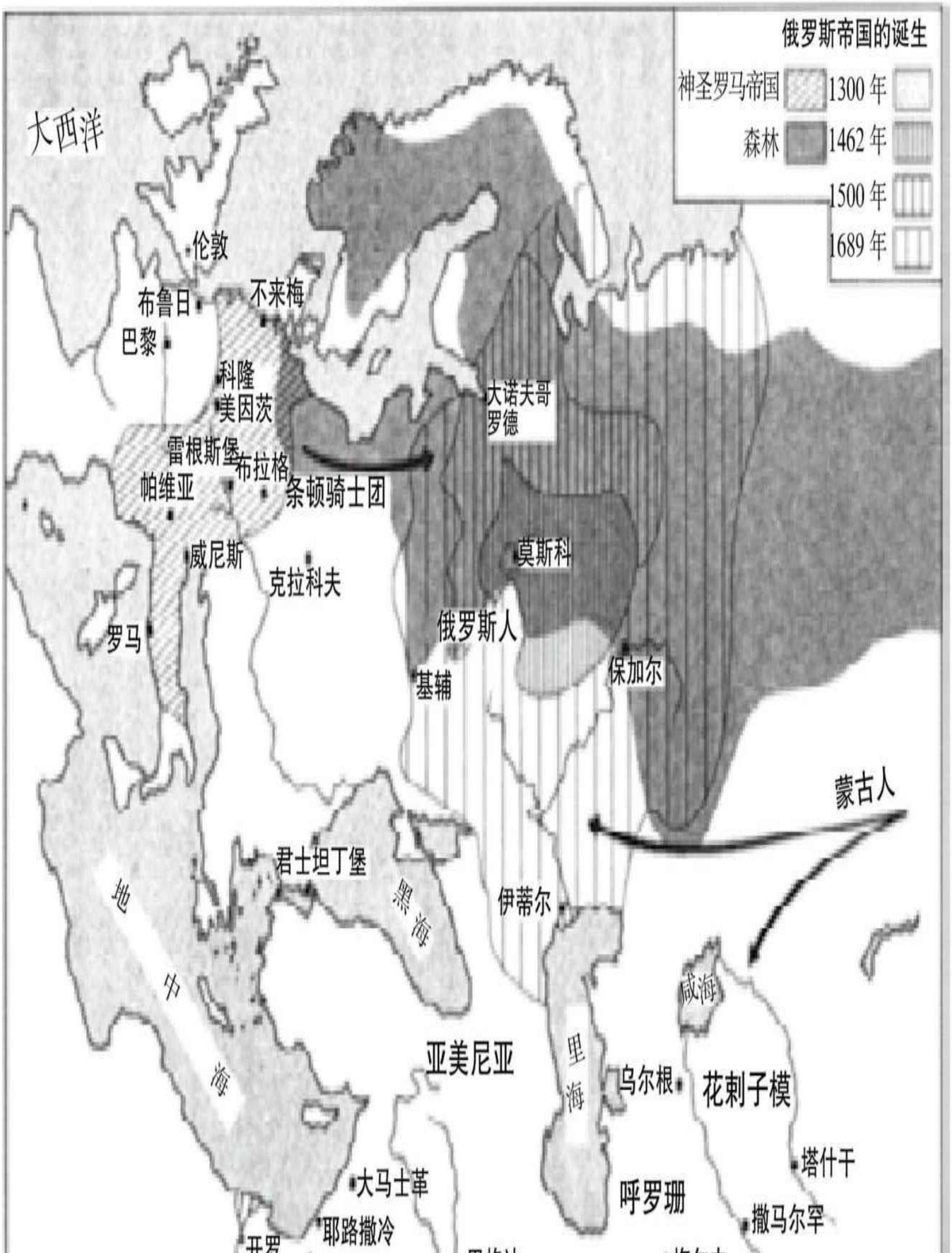

俄罗斯帝国的诞生
神圣罗马帝国
森林
1300 年
1462 年
1500 年
1689 年
大西洋
伦敦
布鲁日
不来梅
巴黎
科隆
美因茨
雷根斯堡
布拉格
帕维亚
条顿骑士团
大诺夫哥罗德
莫斯科
威尼斯
克拉科夫
罗马
俄罗斯人
保加尔
基辅
蒙古人
君士坦丁堡
黑海
伊蒂尔
地中海
咸海
亚美尼亚
里海
乌尔根
花剌子模
塔什干
大马士革
呼罗珊
撒马尔罕
耶路撒冷
开罗
巴格达
梅尔夫

图22 俄罗斯领土的形成

11世纪初，第聂伯河上的基辅统治着现时俄罗斯的南方（60多个公国）。基辅是斯拉夫国家与拜占庭之间、西方与远东之间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驿站。12世纪末，基辅失去其重要性，接着遭到蒙古人的蹂躏。14世纪，莫斯科在森林掩护下，在一段时期里避开了入侵。达尼埃尔（Daniel），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是大诺夫哥罗德的君主）之子，引导莫斯科国家迈出了前几步。伊凡大帝（1462—1505年）是第一位大大扩展了俄罗斯领土的统一者。在他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的战士越过了乌拉尔山脉，在西伯利亚站稳了脚跟。彼得大帝（1672—1725年）是俄罗斯强国传奇式的奠基者，瑞典人和土耳其人的征服者，伟大的改革者和圣彼得堡的建造者（1703年）。保加尔和伊蒂尔城在13世纪已被蒙古人摧毁。

正是在这里，在众多小的封建割据势力阴暗的斗争中间，莫斯科公国成长壮大起来。莫斯科公国建立于13世纪，它逐渐“收拾”起俄罗斯土地（与法国加佩王朝诸王从法兰西岛开始收拾法兰西土地一样），而后摆脱了鞑靼人的控制（1480年）。以这种解放的名义，莫斯科的“沙皇”（tsar，царь）取代了金帐汗国的大汗。金帐汗国的残余，主要是位于伏尔加河与黑海之间的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多亏奥斯曼土耳其人[6]的支持，一直继续存在到18世纪，成为土耳其人或多或少温顺的仆从。

但这一整个过程用了三个世纪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比斗争和对立——不过这可也不少——多得多的，是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之间的贸易、和平往来，通常是对双方有利的服务。一般说来，金帐汗国的君主们支持和促进莫斯科的崛起。他们很晚才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信仰并不严格，所以他们大致上是宽容的，允许各被征服民族按照自己的意愿信仰和举行宗教仪式。在萨拉伊，实际上有一座东正教教堂。

此外，在主人和臣服者之间，还存在为数众多的通婚现象，以致在莫斯科公国，人们会谈到“半东方的”贵族。不管怎样，在15世纪，当鞑靼势力的衰退已经成为定局、毋庸置疑的时候，许许多多穆斯林在俄罗斯各邦国定居下来，在此皈依基督教，开始为君主们服务，引起本地臣民最大的嫉妒。因而一些大家族，比如戈都诺夫家族、萨布罗夫家族，都具有鞑靼人血统。

很长时间，蒙古人的威望令莫斯科公国的君主们仰慕不已。他们代表着一种比莫斯科公国君主们的文明更为优雅的文明，一种组织更加完

善的堪称典范的国家，拥有在北方一带无与伦比的货币经济。今天的俄语还保留着一定数量的源于蒙古的有特色的词：kazna（казна），国库；tamojnia（таможня），海关；iam（ям），邮站；dengui（деньги），货币；kaznachei（казнаией），司库……这种更为先进的文明给莫斯科公国的风尚和习俗打上了某些亚洲的印迹。事实上，莫斯科公国表现得就像一个被高等文明照亮和征服的蛮族世界。双方的这种共处足以使人想起冲突不那么纷乱的基督教西班牙与辉煌的穆斯林西班牙的关系。莫斯科的沙皇在1480年前后开始占据穆斯林可汗的上风，此时正值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la Reconquista）接近它的最后一幕，即攻克格拉纳达（1492年）。

莫斯科的胜利是在无数隐约的与毗邻公国的斗争中酝酿而成的。伊凡三世（1462—1505年）统治时期，莫斯科的轮廓才显现出来，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昔日把这段统治宁愿比作彼得大帝的统治。伊凡三世登基不久，便于1469年迎娶君士坦丁堡希腊末代皇帝、帕雷奥洛格家族[7]的女继承人索菲亚。因此莫斯科在1453年土耳其人攻克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城池陷落后不久，得以成为第三个罗马，得以“统治和拯救世界”。但是这种长期的、很大程度上是声望方面的成就［“沙皇”（tsar）一词的称号，可能是“恺撒”（César）一名的变形，1492年才被莫斯科的皇储采用］，不如对立陶宛人，对金帐汗国（1480年臣属关系破裂）以及对诺夫格罗德商业大城市的那些胜利，意义更加重要。

最后的这场斗争，即与诺夫哥罗德的斗争，是困难的、旷日持久的和富于戏剧性的。1475年，莫斯科发起“冷战”，和平地进入了诺夫哥罗德城；1477—1478年，伊凡叫人解散了维切；1480年，他流放了近百个贵族家族；1487年，7000名诺夫哥罗德人不得不离开城市。这是这座人们称为伟大的诺夫哥罗德殿下（Gospodine Velikyi Novgorod）的城市的终结。

与成为“第三罗马”或与采用“沙皇”这一新称号的思想一样，莫斯科飞跃发展的标志，就是意大利艺术家抵达首都：博洛尼亚人里多尔福·菲奥拉旺蒂（Ridolfo Fioravanti），人称“亚里士多德”；马可·吕菲奥（Marco Ruffio）；皮埃特罗·索拉里奥（Pietro Solario），宫殿和教堂的建造者：“克里姆林宫正是在那时有了现今的轮廓。”用强大炮兵装备伊凡三世军队的大炮铸造商也是一位意大利人，名叫保罗·德博西斯（Paulo Debossis）。因此，差不多在雷帝伊凡四世取得对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一个世纪，莫斯科强国最初的步伐就被有力地打

上了印记。无疑，这些最初的步伐早已和恢复与西方接触交织在一起。

所有这些成就，所有这些更新变革，都要求国家付出巨大的努力。伊凡雷帝时代的一位空想家伊凡·佩雷斯维托夫（Ivan Peresvetov），制定了一种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政治理论。人们也知道，oprichina（禁卫兵），这套由伊凡雷帝建立的警察制度，使伊凡四世能够“粉碎王公和特权贵族的对抗，加强俄罗斯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

·俄罗斯越来越转向欧洲。在俄罗斯近代几个世纪期间，直至1917年，甚至1917年以后，这都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关键事件。

在这种一厢情愿、顽强追求的事业中，俄罗斯获得了现代技术，并通过自己把它迅速加以改进。工业时代很快将使它报复几个世纪期间威胁着它的亚洲——甚至在更晚一些的时候，报复欧洲本身。

在俄罗斯的这种飞跃发展中，亚洲是否起了一些作用？历史学家吉利切尔兄弟（Kulischer）坚持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中亚诸民族按照时代，经历了长期的摇摆，时而将诸民族推向欧洲和地中海，时而将诸民族推向远东，尤其是推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命运部分地将由这场大规模的运动决定，从15世纪起，这场大规模运动将游牧民推向亚洲和中国。结果是在俄罗斯南部，亚洲的压力缓和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国家为了向远东冒险，损失了一部分兵力。当18世纪形势再度逆转时，它把矛头指向了欧洲，但已为时太晚：17和18世纪，在来自中国的压力下，吉尔吉斯（Kirghiz）和巴克奇尔（Bakchirs）游牧民向西推进，但其前哨撞上了建筑坚固的堤防。即使普加乔夫 [8] 在中亚的暴动（1773—1774年）也没有能够把它炸开。

这种解释无疑过分简单，需要完善。很明显，如果说来自亚洲的压力得到缓解，那么从西方获得的并开始引起反响的技术优势，也起着重要作用。俄罗斯经济出现飞跃发展，这是因为在波罗的海入口处与越来越活跃的欧洲贸易接触的结果。无论怎样，没有比俄国人16世纪在波罗的海上临时占领纳尔瓦港（Narva）更有特色的了：打开的门户几乎立即重又关闭，但是不久之后俄罗斯就进行了报复。

莫斯科公国与西方之间的对话。我们已经看到，至少从伊凡三世起就已开始进行，它即将继续进行并加强。德意志的一位游历者，黑尔拜斯泰因男爵（le barond’Herbestein），被人看作像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发现”了莫斯科公国（1517年）。不论怎样，形形色色的

商人、冒险家，各种建议或规划的兜售者，建筑师、画家，越来越多地抵达这另一个新大陆，这一时间处于弱冠的彼得大帝有机会在斯洛博达（Sloboda）市郊与外国人结交并延聘他们为自己的顾问之前。从1571年起，阿尔瓦公爵（le duc d’Albe），当时的西属尼德兰总督，难道没有提请德意志国会为了整个基督教国家，注意朝莫斯科公国，它可能的敌人的方向，进行活跃的军火走私吗？约20年前，即1553年，英国航海家理查德·钱瑟勒（Richard Chancellor）丧失了其余的船只，驾驶一艘船（它是整个航行活动中仅存的一艘船）到了圣-尼古拉-阿尔罕格尔。伦敦商人创建的莫斯科公国公司（Muscovie Companie）在那里进行了持续多年的、穿过广阔的莫斯科公国远至波斯的贸易。

事先有了轮廓的与西方的长期接近在加剧，并且像电影里的特定镜头里一样，由于彼得大帝（1689—1725年）的胆略和迫不及待，由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即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长期统治时的对外炫耀，而逐渐明确。因此，面对欧洲，近代俄罗斯的边疆和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事实上，在18世纪，俄罗斯不断地进行征服活动，尽力扩展自己的空间，并侵入别国的空间。与西方主要的往来自圣彼得堡开始组织，这是从1703年起在涅瓦河上翻新建造的新都。随着英国与荷兰越来越多的大船造访那里，圣彼得堡的贸易规模不断增大。俄罗斯越来越变成欧洲的俄罗斯。对这一变革，各方都在进行合作，但帮助尤其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居民和德意志人。邻国处在看得最清楚的前排位置。

南方的最后征服（由彼得大帝开始进行，但没有完成）和1792年在克里米亚的殖民活动，是在相对真空的状态中进行的。人们认得这些村庄，可以拆卸的简单布景，是在其著名的航行期间，由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宠臣波特金[9]将军移到跟前的。在这方面，与黑海的真正联系仍姗姗来迟；在19世纪初和黎世留公爵[10]创办敖德萨省之后，它才真正完全建立起来。乌克兰小麦首次抵达西地中海港口，引起意大利地主、后来又引起法国地主的不安，时间是在1803年。

总之，在俄罗斯多种多样的事业的细节和总体上，18世纪和19世纪的俄罗斯历史是伴随着幻想、错误、滑稽、赶时髦，也伴随着卓有成效的大规模“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历史。“除掉俄罗斯的假象，你将发现莫斯科公国的本质。”这句可能源于俄罗斯的谚语，无论怎样，在欧洲广泛受到欢迎。但莫斯科公国为什么由于其癖好、其独创性、其迟疑，而不再是莫斯科公国了呢？在莫斯科方面，人们今天能参观作为博物馆保留下来并维持原状的府邸（奥斯坦基诺宫），这是18世纪谢雷

梅杰夫（Chérémétiev）亲王叫人给自己在奥斯坦基诺兴建的，由他的农奴工匠施工，风格是最纯粹的古典风格。内部绘画的鲜艳、镀金、装饰、逼真的装饰天花板的图画，大都保存了过去的原样，游客对这一切叹为观止。导游向人们解释说，整个建筑的厚墙壁看上去像是用砖石砌造的，但其实是用木头建成的，能够抵抗潮湿。谢雷梅杰夫亲王不无理由地宣称，他始终感到，没有什么比俄罗斯木头房屋再令人惬意的了。因而他依然使用木材，但按法国特色（à la française）加以装饰。

这是俄罗斯整个18世纪历史中的一小段，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当时俄罗斯延请不可胜数的欧洲人来进行方方面面的建设，其中包括俄罗斯工业，或者说与那一时代相称的工业。大批大批的工程师、建筑师、画家、工匠、音乐家、歌唱教师、家庭女教师涌到这个渴望学习、决心为达此目的而容忍一切的国家。大批的建筑在像圣彼得堡这样的城市里耸立起来；在圣彼得堡，有一个象征性的小细节，伏尔泰图书馆仍旧完好无损地被保存下来，加之公共档案中堆积了大批闻所未闻的法文通信和文件，显示了俄罗斯的知识界（intelligentsia）致力于巨大的试验，而且他们是相当心甘情愿的。

在这一处于运动中的俄罗斯文化中，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属于法兰西。此外，作为反响，在法国存在一种“俄罗斯海市蜃楼”。独裁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法国被说成自由主义者，因为她在路易十六批准在法国上演《费加罗的婚礼》之前，就在俄国上演了这出戏。不过这种海市蜃楼今天不应再次使我们迷失方向。事实上，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在社会阶级关系上是逆潮流而动的：她加强贵族的权力，使农奴地位恶化。

唯有一种贵族文化兴高采烈地注视着凡尔赛和巴黎。贵族文化本身有限的一部分不久就倾向革命，成为革命的种子，这些种子扩展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那里。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当时怎么会不倾慕1789年那些即便说未能改变整个旧欧洲、但至少搅乱了它的事件呢？但正是在与俄罗斯巨人做斗争时，法国大革命（至少是使法国大革命延长的拿破仑帝国）失败了。这是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事实。

·不过，处在深层背景之中、不为人们看到但也时常露出水面的革命，贯穿现代俄罗斯的整个历史，它从16世纪逐渐发展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

基辅罗斯虽然放射出各种光辉，但它自身蕴含着不计其数的混乱和社会紧张。在它灭亡之后，庞大的俄罗斯国家经历了一个发展迟缓的中

世纪。当封建制度在西方消失之际，它在俄罗斯却扎下了根。的确，从15世纪起，直到20世纪，欧洲化在加强，但只触及人口中一个微小部分，一些非常大的领主、所有主、知识分子、政界人物。更有甚者，在俄罗斯和在中欧一样，同欧洲贸易的发展把领主改造成小麦生产者和商人。从易北河到伏尔加河，“第二农奴制浪潮”是其明显的后果。农民的自由这时变得空洞而无内容。直到那时之前，农奴除非负有债务，享有每年在圣乔治日（la Saint-Georges）更换领主的权利，现在他们丧失了这项权利。伊凡四世（伊凡雷帝）颁发的一道沙皇敕令（1581年），禁止农奴进行新的迁移。同时，他们肩上的徭役和佃租的负担加重了。

无疑，他们只剩下一条出路可行，那就是逃往西伯利亚或逃往南方大河流域，甚至在边境与亡命之徒哥萨克们同流合污。莫斯科地区酷爱冒险和自由的农民走空了一半。但是从在这些边远地区建立政府，或者由其直接控制，或者由受赠人直接控制之日起，他们在事实上获得的自由在法律上便存在争议。没完没了地赢得自由，没完没了地得而复失，这就是俄罗斯自由的永恒的历史。领主不是永远有权抓获逃亡者吗？关于这一点，1649年法典甚至取消了所有的时间限制。

俄罗斯毋庸置疑发生过为数众多的、规模庞大的、令人生畏的暴动。比如，1669年，20万名造反者，哥萨克、农民、亚洲原住民，攻克了阿斯特拉罕、萨拉托夫、萨马拉；他们成为下伏尔加河的主人，杀死所有主和资产者。带领他们的是斯滕卡·拉辛（Stenka Razine），他在1671年才被捕，在莫斯科红场上被分尸处死。一个世纪以后，在同样这些地区，普加乔夫起义取得同样大规模的初步成功：顿河与乌拉尔河、巴克希尔、吉尔吉斯的哥萨克，领主领地的农奴，乌拉尔高原大型铜铁铸造厂的农奴工人，参加了暴动，参加了普加乔夫（Pougatchevina）队伍。普加乔夫队伍一直推进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途中，沿途吊死所有主，答应给所有的人土地和自由。喀山被攻克，但是造反者没有立即进军莫斯科，普加乔夫1775年被捕斩首。秩序似乎恢复了，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

这些史实人们耳熟能详。苏联的历史编纂学喜欢将它们阐明，是不无理由的。时间越是流逝，俄罗斯农民的处境就越是恶化。正是在同一时代，在“第二次农奴制浪潮”开始之时，也出现了“第二次贵族化浪潮”。伊凡雷帝时代的博伊尔（沙俄时代的特权贵族）不再是基辅罗斯那种同西方领主——土地之主一样的博伊尔。伊凡四世善于系统地摧毁独立的贵族，他成百成千地处决他们，没收其土地，把土地授予自己

人，那些禁卫兵（opritchniki）。这是一些服役贵族，他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封地”，我们会说：只是由其终身享有。在这种情况下，彼得大帝的非常大的倒退性改革，是1714年颁布的财产长子世袭法，确认这些服役贵族本人及其继承人，对其占有的封地，拥有完完全全的所有权。这些人就是经过认可的、植根于自己封地中的第二贵族，他们的地位通过礼仪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彼得大帝的宠臣缅希科夫（Mentchikov），就这样从彼得大帝那里获得10万名农奴。俄罗斯的双重面孔在强烈的矛盾当中一览无遗：面对欧洲，是现代性；面对自己，是倒退的中世纪。

从那时起，一种行之有效的协约把沙皇制度与围绕着它并为之服务的贵族结合在一起。在主子的任性乖戾面前，贵族终日心惊胆战，百依百顺。农民的处境受到了影响；他们陷入难以摆脱的重重困难。即使1858年、1861年以及1864年大规模的农奴解放，也没有消除这些困难。Mir（мир）——村庄的集体约束手段——部分地继续有效。从领主取得的土地靠的是赎买，更有甚者：领主将保留一部分领地。只有在1917年，通过俄罗斯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土地革命，问题才暂时解决，这是大革命深刻而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仅仅片刻而已。因为不久集体化就开始了。在俄罗斯，农民不能完全单独地长期享有所有者的地位。

这种一触即发的农村局势，在整个俄罗斯生活中，造成了革命的紧张形势。它说明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在俄罗斯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回响：在圣彼得堡，在莫斯科，但也同样在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Tobolsk），所有的报纸日复一日地都在评论；从法国大革命初期起，在自由贵族中，但同样也在出身平民的商业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和政论家中，人们都怀着激情注视着这场革命。就此问题，可以读1960年莫斯科出版的法译本、米歇尔·斯特朗日的《法国大革命与俄罗斯社会》这本小书。《人权宣言》，法国骚乱的消息，大恐慌的消息，按当时人的说法，“直接触及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最棘手的问题”；它们是在俄罗斯可以“在每个农民的前额上”看出的那些感情的外在表现。

伴随19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化，其他紧张形势又给这个根本的农民问题火上浇油。正是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年）（当然他不必对此承担责任），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界因为有了普希金（1799—1837年）、莱蒙托夫（1814—1841年）、果戈理（1809—1852年）、屠格涅夫（1818—188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托尔斯泰（1828—1910年）……而辉煌一时。事实上，这是俄罗斯大规模自我

觉醒的伟大时刻。

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décabristes）的规模有限的运动，直到冬宫前的枪杀事件（1905年），革命的新形式，革命骚动的新形式，马上创始并迅速繁衍：从19世纪60年代的虚无主义者到1898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明斯克（Minsk）形成；从斯拉夫人（往往是沙文主义的革命家）到愤激的西欧人。知识分子、大学生，以及流放者，尤其是年轻人，将革命的火炬一直举到了未来。整个俄罗斯的历史一直通向这片光芒。

第二十五章 1917年以后的苏联

本书上一部分（第二十四章）已经研究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既研究了它的开端，也研究了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结果，本章只涉猎苏联文明史上那些比较重大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与俄国革命相遇，而后又怎样指导俄国革命的？

（2）抛开那些明显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计划和数据，从人道上讲，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现实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3）在所有这些撞击、强制和变迁之中，苏联文明的现在与未来，能否被人理解？

从卡尔·马克思到列宁

马克思的思想相当迅速地就赢得了俄国知识界和革命家的关注。这一思想在西方得到了人们的赞同，因而与亲斯拉夫的传统主义者相冲突。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圣彼得堡大学的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中迅速找到了信徒吗？据说，圣彼得堡大学与保守的莫斯科大学是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人合作的成果，起主要作用的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起次要作用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后者与马克思携手工作了40载，马克思逝世后，他又继续工作了

12年。

这个庞大的学说标志着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思想、行动和解释的一个根本性转折。它把革命与现代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是发源于这种社会的天然的、不可避免的果实。它提供了整个世界观，把社会分析与经济解释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的辩证法（辩证法是指通过矛盾或肯定与否定来寻求真理）一方面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另一方面受到了黑格尔的启示。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主宰物质世界（思想先于物质），意识是人的本质特征。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说，物质世界相对于精神世界而言居主导地位。“黑格尔体系头朝下倒立着，”马克思写道，“我们把它颠倒了过来，让它两脚着地。”尽管如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仍然接过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时间（temps）即接连相继的经验[11]：1.肯定；2.否定；3.否定之否定。就是说真理的肯定由此变出，它同时考虑到前两个时间，并使之调和。

这种推理方式始终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背景。正如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12]所云：“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无论怎样，这是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指出矛盾、确定矛盾、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认识矛盾、而后解决矛盾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唯物辩证法（dialectique matérialiste）：这一说法并不是不准确，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它，尽管按照列宁的意见，马克思强调辩证法，远比强调唯物主义要多。另一些人跟在列宁的后边，在历史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historique）这个由恩格斯创造的很不巧妙的表述问题上，提出了同样意见：马克思强调历史远比强调唯物主义要多。这无疑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历史分析获得了有关其革命学说的辩证法论据。社会历史分析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伟大创新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正经受着一大矛盾，对这种矛盾的辩证分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让我们简要概括一下他的这个分析。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摆脱自然界、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一种手段。正是在劳动中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本质，认识到他是那么多劳动者当中的一员，是社会的一分子。在一个既意味着劳动又意味着自由的社会中，同时存在“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e de l’homme）和“自然的人文主义”（humanisme de lanature）。“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存在。”这就是对人类劳动的价值与意义的肯定。

接着是否定：马克思眼中的社会，存在着荒谬的自相矛盾，劳动并

没有解放人类，让人类获得自由，而是奴役人类。人被排除在生产资料（土地或工厂）所有权乃至这种生产的利润之外。他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被迫为他人的利益而使自己的劳动异化（aliéner）。现代社会使劳动成为一种奴役手段。

那么，什么是否定之否定，这种矛盾的出路之门呢？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实行大规模劳动和大批量生产，就导致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广泛的、清楚地知道自己受奴役的被奴役者阶级，即无产阶级。这时创造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获得了一个结果。无产阶级自动地加剧进行阶级斗争，即阶级的战争，因而不久就会导致一场革命。

马克思相信，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个历史过程依次使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度转入封建制度，然后转入资本主义制度（先是商业的资本主义，而后是工业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世界在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同时，也达到了革命的阶段，达到了废除私有制的阶段；明天，世界将达到共产主义阶段。

然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la société capitaliste，资本家社会）并非一朝一夕可至。［人们知道，起码从1846年起，马克思就知道“资本家”（capitaliste）一词，但还尚未使用“资本主义”（capitalisme）这个方便的词］，正如马克思本人阐明（1875年）的那样，存在一个“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在这个时期，新社会勉勉强强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今天，专门用语“社会主义”特指这个“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此阶段的口号是“按劳分配”。只有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才称为共产主义。它有点像是希望之乡。社会（这时）可以在它的旗帜上题写：“各尽所能（在生产阶段），按需分配（在消费阶段）。”人们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乐观主义的，正如乔治·居尔维奇[13]所写的，它是一种“上升的”学说。

·可是，1880年前后，对于再次传来的俄国革命的消息，不论马克思怎样犹豫不决，他毕竟得出结论说：在俄国进行革命行动在理论上暂时是不可能的。对俄国的革命者来说，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怎能不令人失望？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在俄国，工业无产阶级过分不足，造就工业无产阶级的进程还须持续整整数年。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环境还要经过数年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到了那时，“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才将宣告来临。至于目前，各种条件还未汇集在一起，革命的条件尚未成

熟。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国为范例所思考、所探究、所讨论的问题。当《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问世（1867年）时，英国早已达到工业革命的核心阶段，更确切地说，对工业革命引起的重重困难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加以克服。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法国和德国为范例进行推论，后者此时只是略微落后于前者，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总之，他们是按照与沙皇俄国所置身其中的形势相距甚远的形势进行思考的。

19世纪末，在俄国，农民一方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工人仅占总人口的5%。在这个刚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怎么能设想会出现一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呢？

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世的时代（1899年）起，更进而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和之后，列宁非常清楚地屡次看到这一矛盾。应当承认，列宁这个马克思的信徒，受困于他所激扬、赞美的思想，在这个思想内部，他感到灵活自如。总的说来，列宁的所有思想几乎都见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然而，尽管列宁的真正才能主要体现在策划革命行动上，但即便是在思想领域，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独创性也比人们通常所说的要大得多。

事实上，列宁出身于俄罗斯一个小贵族家庭，他讲话的声音和他家乡特有的口音表明了这一点。因而，他不再因其简朴，因其“务实的才智”而仅仅是“俄罗斯人民的代表”，他更不是一个仅仅被行动所吞噬的人。事实上，他反复进行了具体独到的分析和一针见血的批判，这使他赢得了“清扫第二国际的奥吉亚斯牛圈[14]的荣誉”。当他采取行动时，他总是事先怀着激情，以清醒的头脑对此进行思考。因此，他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产生在革命进程中一开始必然出现对立之处：在革命的战略和革命技巧方面。他肯定是在俄国之具体条件下，根据“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来构想革命进程的。

简而言之，列宁赋予政治相对于社会或经济事务系统性的优先地位，赋予“政党”相对于无产阶级群众的系统性的优先地位。人们几乎可以说，他赞成“政治第一”，政治优先。

对于马克思来说，革命是几乎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爆炸的结果，在工业化和阶级斗争的重压下，社会爆炸是会在它自己适宜的时刻出现的。由于工业化而挤在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是革命的和有爆

炸力的。在无产阶级的身旁，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曾经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发源地，但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其革命的使命。在某些场合，也许仍要利用这个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参与、支持和帮助。但是关于这项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长时期里一直犹豫不决。1848年以后，他们不无理由地尤其不信任法国农民，对其反革命可能性心存疑惧，认为他们是依恋其小块土地的假无产阶级。

马克思去世（1883年）以后，关于革命行动应采取何种形式的争论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德国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年）恪守马克思的原本忠告：在她看来，唯有工人无产阶级值得信任；工人无产阶级必当是革命的唯一动力；所有其他阶级都是敌人，因此，“党”应当为工人无产阶级所有，他们应密切地从内部对它实行监督，从基层对它加以控制。她认为，这是防止党的官僚化的唯一手段。

列宁的方向与卢森堡不同：与一些改良主义者的意见一样，他对无产阶级天生的自发的革命性（此外，他厌恶“自发性”一词）表示怀疑（“在帝国主义时代”）。他认为，强调党和强调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有可能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到了，不管这些阶层属于何种阶级。1902年，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主张，没有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并不会选择革命，而会转向改良主义和某种工联主义，甚至可能陶醉于工人贵族的乌托邦之中。当时在英国，新生的工党不得不与工会迟疑不决的保守主义做斗争，正如在法国，工联主义比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多地反对社会主义，妨碍社会主义的发展，难道不是吗？此外，与罗莎·卢森堡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相反，列宁认为民族战争的时代仍然没有结束，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势在必行。进而言之，列宁赞成土地改革纲领，无论怎样都拒绝认为农民是反革命成分，在这一方面，他又一次与罗莎·卢森堡和“卢森堡主义”意见相左。在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列宁肯定受到了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他像他们那样，在受奴役的农民身上，看见了革命的根本动力；他不想弃置这一庞大的爆炸性力量不用。人们知道，农民确保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无论如何，在有关俄国的问题上，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考察这些争论和思想立场，它们中有一些在1917年以后在苏联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文化转移已经发生，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转移到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形式，就像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对马克思主

义做了“重新解释”，以适应沙皇俄国这个在20世纪初尚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仍居主导地位——如此接近而又如此遥远——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吕西安·戈尔德曼[15]这样宣称：“无产阶级在俄国占有重要性，但数量太微小，因此它在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所占的重要性不足以靠一己力量引发马上使无产阶级与整个社会对抗的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共产党，是经在国外建立劳动解放社（Grouppa Osvobojdenija Trouda）的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16]、帕维尔·阿克塞尔罗德（Paul Axelrode）、维拉·查苏里奇（Vera Zassoulitch）、列夫·捷伊奇（Lev Deutsch）］同意，由第二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尤里乌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菲奥多·伊利奇·丹（Fyodor Ilich Dan）］创立（1898年）的。

然而，当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1905年）时，分裂产生了：一方面是布尔什维克（Bolcheviks，即俄语的“多数派”，况且越发指发出一个声音的多数派）；另一方面是孟什维克（Mencheviks，“少数派”），普列汉诺夫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少数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将重新成为“多数派”。）这次分裂原因何在？因为在党章的第一条，列宁引进了名为“民主集中制”的著名条款。这些条款规定：1.“职业革命家”（总之，技术专家）的决定性作用；2.严格的（铁的）党的纪律；3.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尤其对基层组织的广泛而专制的权力；4.在有必要时，把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一个人数有限的局。这够清楚明白了吧？它把党变成了一部自动的战争机器。对此，孟什维克叱责党进行独裁活动，叱责党抛弃了民主原则。（托洛茨基当时就预见，列宁的构想将导致一个人，即中央委员会首脑的独裁专制。）

然而，从俄国社会工业的发展观点看，俄国的特殊环境决定了采取这种策略态度的必要性，由此存在许多考验。1905年，列宁旗帜鲜明地与人数并不太多的一些社会党人的论点进行斗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请注意：由无产阶级进行）”是可能的，“似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对于这样一场革命来说，已经足够发达”。1917年，在革命党人夺取政权的前夜，两派在最后时刻的论战更加明朗化了。论辩在列宁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之间进行。列宁否认他计划夺取政权；如果他夺取政权，那只是寄希望于得到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援助。（这是幻想，我们注意到，俄国革命从一开始，或几乎从一开始就被迫自力更生。不久他们就不得

不抛弃这种幻想。）普列汉诺夫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工人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农民人口占压倒性多数。他警告列宁，如果列宁夺取了政权，无论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求助于独裁专制，求助于政府的恐怖手段。列宁反唇相讥，这样说就是对他个人进行侮辱。然而，他夺取了政权，掀起了一场土地革命……

即便如此，这些问题仍继续困扰着他，让他不得安宁。1921年，由于采取新经济政策（N.E.P.），列宁一时开起倒车时，他的宣言极有特色地与这条思想路线和这些旧日的争论联系起来。“我们搞错了，”他总体上这样宣称，“我们的一举一动似乎表明可以在一个几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在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我们必须重建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随着列宁的去世几乎完全寿终正寝。从1928—1929年起，斯大林从反对转而赞成工业化，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历经重重困难，工业化最终获得了众所周知的伟大成就。

但是让我们退回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那一年），更清楚地描述那场争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设想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革命者“偶然地”或“靠密谋”夺取政权。他写道，“他们那时只能够建立一个类似印加帝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实行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因此重提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讨论类似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局面时曾谈到“修道院式的社会主义”，或“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我们像人们常做的那样重提这些话和这些争论，目的不在于重新考虑1917年十月事件及其后果，以便以“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指责事件的进程，当时历史自当使“纯马克思主义”无法应付，或遭到嘲弄。需要指出的事实是，社会主义革命意外地在一个当时欧洲最不工业化的大国开始了。这一次，革命不可能遵循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方案展开。政权已被共产党（这是社会民主党后来取的名称），即在俄罗斯众多人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可能在10万人左右，所控制住。这个有着高度组织性的少数，利用了1000万—1200万农民的惊人的溃乱，利用了军队官兵开小差的机会。他们在必要时互相残杀，涌回他们的村庄，开始占领贵族的、富有资产者的、教会的、修道院的、王室的和国家的土地……

据说列宁曾这样问道：“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所有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不能依靠拥有13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据说列宁还以拿破仑方式这样说道：“向前冲，然后再看。”

“坚持几十年”，事实上，一直坚持到俄罗斯达到某种发达和工业化的程度，那时一场“理性的”革命必然会接踵而至：实际上，这将是此后若干年里俄罗斯的关键性问题。这也是实行无情的专政的动机，这种专政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借用正在产生中的无产阶级名义的共产党首脑的专政。“在斯大林统治下，这种共产党首脑的专政甚至变成了独裁者的专政。”俄国生活的这些阴暗悲惨的岁月，一再使人想起法国1793—1794年公安委员会的范例。但是俄国的专政没有很快失败。这种区别的原因无疑在于单一党的铁的组织，它使一切“派别”不能立足，这与1794年在巴黎发生的情况截然相反。

马克思主义与今日苏联文明

如今苏联已在政治独裁制度下生活了45年 [17] ，很快就将半个世纪了。这里没有出版、言论、信仰、结社和罢工的自由，只有一个坚守纪律的、“坚如磐石的”党，党内隐蔽的冲突只显露为个人的悲剧性对立。1953年斯大林死后仅仅数年，就出现了自由化——毋宁说人道化（humanisation），因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自由化在当时还是一个贬义词。人道化是慢慢地、有节制地，但似乎不可逆转地显露出来的。人们所谓的“非斯大林化”（déstalinisation）现象产生的原因，难道不是很久很久之前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安委员会面临的悲剧性的紧急时刻吗？苏联无疑还没有摆脱所有的内部困难，但是它从此以后进入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步入享有特殊利益的民族之林：它靠辛勤的劳动赢得了这个位置，但是它占用了它。同时，不论愿意与否，它建设了大众文明所必需的新机构。也许正是现在，它第一次可以自由地至少在国内方面选择自己的革命，或者选择自己的道路，因为它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重要性，它扮演的社会主义国家leader（领袖）的角色，从此以后强加给它另一种类的限制，一种来自外部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变化。在各条战线上做出努力和进行战争的50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空间。在这些年月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学说，一边捍卫其重大主题和习惯解释（信条），一边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不这样，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如果说官方言论反复提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式或陈词滥调—阶级斗争、实践（praxis）、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相对贫困化、唯物辩证法、物质基础，或者一个没有阶级的完善的幸福社会即将来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一时一刻庞大的意识形态，像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所有

的宗教那样，因为它们的胜利而没有被拖入成为生活本身的变化发展中去。此外，一种思想只有在实际生活中，在实践中具体化，才有价值，这点不是在20世纪初早已成为全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信念，而且为革命家们反复提及吗？马克思主义是彼此有力联结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投入千百万人的实际经验才有价值。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成就中自我“现实化”，那么它也经受住了影响。此外，按照其门徒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世界观本身的世界观”。这也是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所说的：“20世纪的共产主义经历了类似于公元l—4世纪基督教的改造那样的改造。”

要列举这些变化、背信弃义行为和异端邪说，把它们逐一编订出来，也许必须成为决疑论者。在这些方面，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受到指责，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互相指责。制订出目录不无裨益，只要决不把这个或那个可能显得同样有意义的细节孤立起来。同样的目录只有与解释目录和被目录解释的全部经验相比，才有意义。这里我们要说，这并不是苏联经验所提供的最重要或最清楚的试验。

确实，对过来人来说，1917年以来的50年关系到一系列革命和苦难，这一时期非常漫长，可是编年史的空间还远不足以使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经过如此剧烈的结构断裂，显示出它的全部意义来。我们必须在所有经验中区分出脱离常轨的东西，尤其是过渡年代（至少直到1930年之前甚至1930年之后）期间的东西和过去有效而且还将有效的东西，以便在粗暴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被沿用的社会传统之间，建立确定的关系，这种社会是取自它并未决定要经历的经验，而且它对这一经验始终没有充分清楚的认识。

因此，在什么范围内，列宁早已做出计划恢复差距非常大的工资等级的做法，是一个意外事件，是斯大林力量无限的意志所为，或者干脆是一种社会必需，抑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进程？沿着这条路，社会等级制度连同明显的特权，重又建立起来。一位苏联大学教员笑着宣称：“我们是苏联资产阶级……”但是这种等级制度，只有当它仅与职权有关的社会、阶级的特权可以传给后代时，就是说这些享有特权者的后代，又转道来从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中获取（教育、金钱、职权方面的）好处时，才能恢复成为一种社会等级制度。这种倾向在家庭生活永久延续的一切社会，都是很自然的，共产主义在苏联一点也没有摧毁家庭生活。斯大林甚至还加强了家庭生活。

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性问题是农业问题。苏联企图用集体方式重组农

业生产，结果一败涂地，而且遭到昔日受斯大林制度虐待的农民的反抗。但是俄国小说以压低的声音如此经常地加以反映的贫困农民，难道不是被迅猛的现代化经济运动，从百年框架中骤然拖出“传统”文化的正常的、差不多不可避免的反应吗？看来不论采取何种解决办法，这种问题在所有加速工业化的国家都会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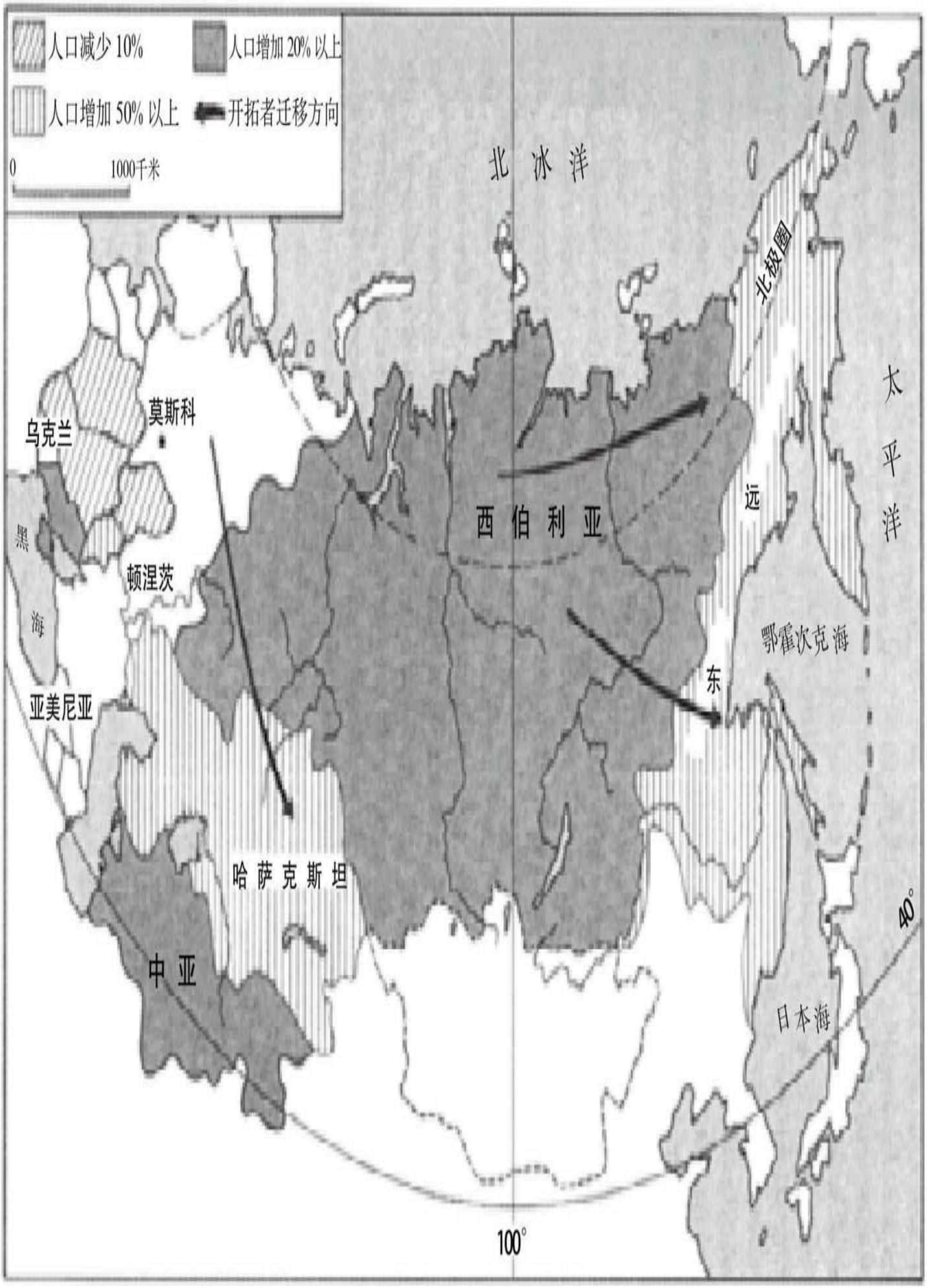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在苏联意识形态和东正教会之间或多或少紧张的对话中，可否说获胜——有没有获胜？面对“宗教异化”，国家政权（社会制度）采纳的是好战的唯物主义，富于进攻性的理性主义——不否定上帝，但热烈地肯定人类关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恢复东正教信仰的价值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教会和斯大林之间的妥协。斯大林不是恢复了曾被彼得大帝取缔的莫斯科大主教吗？1951年11月7日，斯大林在演说中，祈求东正教会的君主和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保佑。无疑，心甘情愿地前来祈祷的基督教徒，大部分是老年人。然而，对于洗礼、婚礼、死亡，大多数人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呢？国家围绕非宗教的婚礼仪式试图组织的礼仪或许可以证明，它必须进行斗争，至少必须填补一个空白。

最后，对于后继的几代人，他们没有逐渐地忘记悲惨的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本身在大步退却吗？这是不是有点像西方的笛卡儿主义，虽然它仍然无处不在，但在西方的意识中，越来越淡薄？这还不包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抛弃。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用不着时时刻刻加以讨论。在2.2亿苏联人中，有900万名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们的采地、特权，是他们的口号，是他们的日常语言。但是其他人呢？

·尽管如此，最深刻地改造苏联生活的是它所经受的强大工业化和即将胜利完成工业化的前景，也就是说进一步发展它的成就，克服困难，弥补所遭到的失败。

无疑，就人力而言，工业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17年，俄国不存在一个“资本主义事先提供的”现成的工业化基础。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必须建设一个这样的基础，这就是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为何采取这一独特步骤的部分原因。斯大林独裁专制肩负起极其重要的、“在别处由铁器时代的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斯大林制度的严峻冷酷，不能完全由被其权力搞得飘飘然的个人的反复无常来解释，也不能由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来解释，更不能用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来解释。它们部分地也是不发达状态的一幕惨剧，为在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靠人力劳动投资，迅速跨过工业化阶段而发明的无情的国家公式。

那一经济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专家们还将长时间争论不休。因为数字为争论提供了好的场地。他们的语言是国际语言。民族之间互相比较，就像孩子们比量身高。量身高器还必须是同样的。在工业生产方面，1953—1959年之间，法国平均每年增长7.7%（1959年指数156，相比于1953年指数为100）；联邦德国平均每年增长83%[18]（1959年指数为169，1953年指数为100），苏联平均每年增长11.3%（1959年指数为190，1953年指数为100）。这是官方统计数字的语言。不过这些统计数字并不是完全可比的。西方人按纯价值计算指数，苏联人按毛价值计算指数。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里宁（Strulinine）证明，工业生产的官方增长，以毛价值计算，1950年是1928年生产的22.9倍，但是若以纯价值计算，则跌落到14.7倍。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有多少苏联的反对者会就这些数字进行争论。



人口减少 10%
人口增加 20% 以上
人口增加 50% 以上
开拓者迁移方向
0
1000千米
北冰洋
北极圈
太平洋
莫斯科
乌克兰
黑海
顿涅茨
亚美尼亚
西伯利亚
远东
鄂霍次克海
哈萨克斯坦
中亚
日本海
40°
100°

图23 苏联内部的移民

但是，假定经济目标没有完全达到，它也肯定在望。巨大的发展已经发轫，在西伯利亚和别的地方已经取得辉煌的奇迹般的成就。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发生了巨大社会变化。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工业化都已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事实反过来影响苏联整体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新的结构都开始产生。

（A）第一个重大变化是农民纷纷涌入城镇。苏联将美国（boom[19]时代的美国）的发展节奏，强加给1917年基本上还是农民的一个传统上很懒散的民族。这种常常顽强地坚守传统、反对变革的懒散与任何东西也无法逃避的变革压力之间，这种节奏与和平之间的紧张状态和矛盾，到处爆发。在中亚的联邦共和国，美国方式（américanisme）与东方风格的这种混合，更是千奇百怪。

数字说明变化的重要性。1917年，俄罗斯农民占总人口的80%，产业工人占15%；1962年，农民勉强高于二分之一（52%），工人及其管理人员占35%。同一段时间里，官僚至少增加了10倍，知识分子增加了100倍。结果巨大的诱惑把人们引向城市，城市人满为患，损害了农村。

这一运动刚刚完成。除了原首都列宁格勒保留了老城风貌外，新旧城市，包括莫斯科（变成了硕大无朋的芝加哥一类的城市），都带有农民的面貌。它们的生活乡村化了。知识分子、大学生也逃避不了这一切。“一个新的种族在俄罗斯产生了”，它侵入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从最不重要的职位到科学研究的职位（俄国社会阶梯的顶端）。在斯大林以前所未有的节奏使苏联工业化的同一时刻，他对农民进行了全面集约化，一下子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不顾他们反对，把他们抛向城市，罹受城市的征服。这一切几乎也就是在几年之内发生的。

1947年，在遭到侵略、被征服的城市中，从他们原始的服装，从他们迟缓的行动，一边大声叫嚷一边跳上电车和公共汽车的举止，仍能辨认出其农民特征来。从1956年起，形势就已开始改观。农民已经城市化，与此同时，其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获得了更好的穿戴。1958年，人们再也碰不到赤脚行走的孩子或妇女；在戏院和电影院，穿戴已成风尚，农民的笨拙消失了。然而不久之前的乡村出身的人们在行为举止的许多细枝末节上还是露出马脚。相反在列宁格勒，正是因为如此，一切

显得更加文雅，妇女显得更加漂亮，口语显得更加纯正。1945年以后，列宁格勒令人赞赏地恢复了其外在的布局，给人留下了可爱精美、有宏大气派的欧洲古城的印象。列宁格勒有繁忙活跃的港口，靠此永远生活在更广阔的世界之中。农村并没有把它淹没。但是，尽管它拥有工业化的郊区，它仍可与这种看来是未来俄罗斯形象的鱼龙混杂保持一定距离。正是这种鱼龙混杂无可争辩地赋予莫斯科一种首都的气派。

（B）农民的征服：工厂、学校。

农业劳动力涌向城市，淹没了昔日的技术工人。农民占领了工厂，他们对机器一无所知，没有经过良好训练，愚笨无能，同时，像所有农民一样，对机器表示怀疑。这些笨手笨脚的乡下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人，在一开始只能达到很低的生产力。因而，在当时，为了弥补产量不足的状况，就从农村征召更多的劳动力到工厂来。

农民，至少他们的子女，还同样涌入学校，稍晚一些，涌入大学。1917年，俄国人口的至少有75%是文盲（甚至更多），而到了今天（20世纪60年代），文盲据称已经被完全消灭。这肯定是图书馆、阅览室、俄罗斯经典作品普及版（也有例外，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尔盖·叶赛宁的作品直到1955年才被广泛出版）数量增多的原因。这些作品，连同经过选择的外国的经典作品译本，发行量常常多得令人惊奇（有时印数可达1000万册）。图书一般用不太好的纸张印刷，书的价格确实非常低。这是不是经典作品如此流行的原因呢？是否还必须找一找其他原因呢？或者说，这是因为当代作家力量薄弱，没有可供消遣的有趣、易懂的出版物？不管怎样，广播、电视、唱片同样把大量精力用在提供进一步的教育上。

“这场文化革命”（O.罗森菲尔德语），光是它，就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一种要解放、渴求受到教育、尽快爬上社会阶梯高层的强烈欲望。“疯狂地向上爬。”一位严厉的观察家也许会这么说。我们倒不如这样说，渴求文化，这既等于名望，又等于金钱。不论其动机如何，大学、技术学校的在校生，以及接受函授教育或上夜校的人与日俱增。农家子弟常常获得最优秀的成果。通过这种方式，苏联从这个取之不竭的人才库里，造就了自己需要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研究员、官员、教授。儒勒·费里[20] 进行教育改革后出现的情况，继而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实行免费，确实在法国发生过，但与苏联相比，速度缓慢，规模狭小。这些事在苏联则组织得大张旗鼓，速度为人闻所未闻，常常一蹴而就，尽管有一些意外的困难。因此人们惊异地听说，从1947年到1956

年，苏联的中等教育需要付费而不是免费。

（C）不过，按照人们普遍的说法，现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教育水平在下降。

但是这种断言刚一提出，人们就感到后悔。无疑，现在人们谈论的俄国人不再是昔日文雅的俄国人。苏联如此广泛地实施的教育是实用主义的教育，它批量生产、制造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所需的知识分子，从小学教师起，直到工程师，甚至到大学教授的一系列专门人才。这是一些“半知识分子”，一位通常非常宽容的观察家这样说道。

这么讲是否完全公正呢？大多数人的半文化，是否像人们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新国家产生的事情，或更仅仅是一个正在脱颖而出的大众文明的典型特征呢？在世界上所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欧洲或美洲都是如此，正在普及的教育都呈现出专业化和普通文化水平较低的趋势。不过，构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的数量，可能并未就此而减少。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是与过去一样（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在传统文明中，人数较少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处于文盲状态的无数大众并存。现代文明不赞成这一点，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复杂的画面：人数不多的精英，文盲人数甚少。大多数人接受的主要是职业教育，对于他们，教育只起劳动工具的作用，而非一种较高的知识教养的形式。

无论怎样，当人们达到较高的水准时，在我们看来（同时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差异），苏联的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就作为与欧洲或美国的那些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平等的人出现了。他们也是同一文化的继承人。例如，对一位巴黎知识分子来说，从法国的大学转入莫斯科科学院，就是重新回到自己国家，不论立即进行什么讨论或开什么玩笑，都是适宜的，他自己都能立即懂得应答。人们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俄国自十月革命起与世隔绝了40年——这种外在的隔绝切断了苏联与欧洲一直保持的所有关系——在这一学术层次上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乍看起来这令人非常吃惊。但回过头来想一想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人们会想起，20世纪初，欧洲与俄国都浸润在同一种文明之中。那么40年相对于文明现实来说有什么价值呢？尽管经历许多社会结构的风雨飘摇，但1962年的苏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与1917年的俄国同样的文明，也就是说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

（D）说真的，文学艺术似乎与这种断言背道而驰。

因为，如果我们像惯常那样从文学艺术中寻找一个关于支撑着它们的社会的最好的画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的形象肯定显得苍白无力。但是，这些不现实到荒谬程度的虔诚地按照官方意志撰写的作品，能不能视为苏联作家和艺术家的真正代表，甚或说关于社会、日常生活的证据呢？它们无疑是特殊环境的成果。

不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作品的这种苏联艺术和文学的特殊语言，只在1930年前后斯大林统治开始时才出现。当时，苏联当局攻击任何对斯大林为了执行五年计划所要求的铁的纪律和“文艺战线”动员表示疑问或者表示反对的知识分子。第一个牺牲者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拉普（R.A.P.P.），它与造型艺术和音乐领域的类似组织同时被解散（1932年）。取代它们的，是一个直接受共产党控制的单一的组织。

与此同时，艺术家和作家被请去（被命令去）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934年，苏联共产党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Jdanov）对他们的教条做出了界定，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艺术家和作家必须去做的是“真实地”描绘社会主义现实，特别是生产环境的“按照历史规律具体的特点”，从而为“以社会主义精神进行思想改造和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做出贡献。按照日丹诺夫的原话，他们的职责是要有“倾向性”，要写“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要壁垒分明，让人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正面人物”、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反面人物”以及所有其他人。十月革命初期在艺术各个领域风行一时的先锋运动，这一运动在俄国继续被称为“左派艺术”，从这时起，被指斥为“形式主义的”作品，受到了追究。许多作家或戏剧导演因此被逮捕，神秘地消失了。众多有才华的作家息声遁影，销声匿迹或半销声匿迹。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ial Cholokhov）是《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该书前三卷于1925—1933年之间出版，第四卷于1940年出版。就是这位作家，多年没有撰写任何东西，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重新执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抵制来自“腐朽的西方”的影响，“日丹诺夫路线”增强了对文学艺术的控制。文学、戏剧、电影遭到严密的监督，稍有偏离就会遭到揭发、惩处。1948年，大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Chostakovitch）、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 Khatchatourian）受到猛烈攻击，因为他们的音乐晦涩难懂和滥用不谐和音……

总之，在整个斯大林专制独裁期间，像苏联其他居民一样，艺术家

也必须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和平庸乏味是这个时期全部作品的标记。

斯大林的死是否使一切改观？是，也不是。无疑，在斯大林死后马上出现了反动，又突然出现了缓和，但是这种自由爆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不久这种状况就被限制住了。

1953年末到1954年，引人注意的是讽刺苏联社会污点的剧作大量出现；《新世界》（*Novy Mir*）杂志上发表的一位年轻评论家关于“文学的真实性”的文章，嘲笑把人物对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进行的传统划分。尽管这些大胆妄为给它们的作者带来惩罚，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和非斯大林化，还是引起其他的言论自由。几十万流放犯的归来，今后取消粗暴处罚的保证，导致了一场如此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极力抗议，以至于可以称为一次班子大变动。（现在那些在斯大林统治下出名的作家变得沉默无语了，而那些遭到斯大林的迫害、侥幸活了下来的人重新抛头露面，重新发表作品。）人们的兴奋情绪是如此高涨，以至于当局和国家领导人为之动容，对此表示担心。1957年，作家和艺术家被劝告或被告诫要戒除一切“修正主义”，并且不要以不“美化和粉饰”苏联现实为借口，系统地诋毁苏联社会。这种立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的一个明确的表述。

斯大林的方法遭到取缔是确定无疑的，甚至那些被打倒的政治反对派也不再被处决，不再成为肉体暴力（体罚）的对象；在文化事务和对外往来方面出现了一定的自由化。但是，在斯大林的罪行被揭发出来、深深震惊曾盲目赞美斯大林的年轻人之际，对猛烈的批判运动敞开大门，看来就是使苏联制度和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地位，一下子陷于危险境地，或许就是拿苏联的一部分国际力量去冒险。因此苏联政府毫不软弱地做出了反应。

那么公众是否会跟随这场斗争呢？广大民众的兴趣趋向于俄罗斯的或外国剧目中的古典戏剧，趋向于民间创作，“纯正的、风格化的或改编的”作品，趋向于这些前一天还是农民的人刚刚发现的古典歌剧。歌剧于是获得了成功，从《浮士德》（*Faust*）到《茶花女》[21]或《卡门》（*Carmen*），它们与苏联红军的舞蹈，或者与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天鹅湖》，一争高下。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在这些领域存在两套“轴承”，粗俗公众和知识精英。作家与艺术家要求和希望的表达自由，实际上是苏联那时与将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E）数学和科学的光荣。文学艺术方面的这些问题很少影响到这

些精确科学。就其主体而言，它们处在近乎辉煌灿烂的境况之中。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许多。科学通常是不大受到控制的知识部门。科学家与政治或意识形态争夺一般没有任何瓜葛。他们能够避开它们。同时，俄国人始终是出类拔萃的数学家。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既不吝惜金钱，也不忌讳表示鼓励，又不过多指令；制造一个世界，甚至想象新的从未见过的事物，是一项令人振奋的任务。最后，必须承认，在研究领域，实行专制制度是有优点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倾向于按照产业部门分布，同时这种研究部分地为产业的需要所决定。在苏联，研究集中于政府选择的领域。产业失去作用，更何况苏联生活的起居设备，直至最近还相当地被人不屑一顾。但是研究以及科学队伍的组织，无可怀疑地由此获益。不过，今天研究获得成功，依赖的主要不是最出色的学者个人，而是一个最出色的队伍。这不是应当感谢苏联科学院吗？

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摆脱了前所未闻的重重困难，在物质领域行将取得令人惊异的成功。这些成功已在眼前。但是这些新的结构的建立远未完成。它纠缠于种种悲惨的回忆，甚至纠缠于苏联经验在全世界的声誉本身。在它差不多可以自由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之际，它必须考虑它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反响。

凡此种种，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联的自由，这种限制在非斯大林化以后依然存在。苏联在艺术、文学之“上层建筑”领域（这个消遣领域，没有它，文明既不能自动地贯彻到底，也不能全面地表达），也付出了代价。但愿这些上层建筑，像莫斯科博尔绍伊（Bolshoï）广场的苹果树，在春天稍有暖意的初阳下，一下子突然开放。

1961年10月的苏共代表大会

1961年10月富于戏剧性的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给苏联目前形势投下了古怪的光线。当然，现在问题不在于抓住不同人物的戏剧性冲突，不在于列出被批判、被开除党籍、“会喘气的死人”或“行尸走肉”的名单，或从容地分析那经常使人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受折磨者和折磨人者的一场骚乱。

重要的是在国内和国外方面，面对种种抉择、种种艰难任务的苏联文明本身。它的未来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艰难的任务有三：第

一个任务关系到非俄罗斯各民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非俄罗斯种族和文明；第二个任务，从总体来看，是苏联文明的物质未来（但仅仅是物质吗？）；第三个任务，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命运。在1961年，国际共产主义已不再是昔日的铁板一块，变成了“多中心的”共产主义，并向“祖国的共产主义”（各国共产主义，communismes des patries）让步。

·关于第一个问题，问题如下：苏联，正如其名称所指，是一个想成为一个各共和国的、原则上独立但联合为整体的国家的联盟。这种共处能够好转和导向一个统一的强大文明吗？

从1917年以前起，这个由沙皇帝国首次实现的联盟就历经灾难。分裂、重振、巩固、重开争端，它仍旧是一个得不到完满解决的棘手问题。即使它们的自治再明显不过，却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是真正独立的，因为它的国防、警察、交通隶属于中央政权，由每个共和国列席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来代表。存在着地方民族主义，地方“沙文主义”，它们遭到检举告发。冲突产生了。格鲁吉亚因此在1921年被归并入联盟；今天（20世纪60年代），非斯大林化触犯了它对格鲁吉亚最杰出的人的忠诚。波罗的海诸国1918年获得解放，1940年被兼并，1945年被重新占领。它们在沙皇统治下享有特权地位：问题不在于重新给予它们特权地位。1949—1951年，吉尔吉斯在其民族史诗《马·阿斯》（*Ma As*）问题上出现危机。《马·阿斯》这首民族史诗遭到苏联当局明令禁止的打击。在阿塞拜疆，1958年最高苏维埃张明其意图，不承认该共和国的唯一语言为阿泽伊语（Azei）。

地方的利益和文化，独创的语言，历史的回忆，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或不忠诚，在所有这些共和国中，或来自俄罗斯人，或来自乌克兰人的入侵移民：凡此种种都引发了新的问题，时常造成殖民类型的紧张状态。就举一个例子吧。在开发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之后，俄罗斯人在该共和国的人数变得比哈萨克人还要多。

唯一一种苏联政策是可能的，并且事先被猜中：维持保卫联盟共同生活的凝聚力，即整体的“和谐”，给非俄罗斯民族的各加盟共和国合理的甚至非常宽宏大量的让步，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苏联的力量中都代表着极其微弱的一部分。这就是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1956年）出台的政策。其结果是让步，扩大自治，不折不扣地恢复列宁的民族政策。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它们使人想起传统的殖民化与非殖民化之间反反复复的问题。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苏联而论，“殖民

地”与“宗主国”在物质上和地理上直接相连。在苏共第21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上确实列入了“同化”（assimilation）这两个本身颇引人联想的字眼。然而同化是否可能，苏联在这一点是否将会成就西方人确实刚告失败的事业？

1959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书记断言：“随着经济飞跃发展和共同实践的增加，各民族能够融合在一起。列宁的这一论断从现在起被经验所证实。”这一点非常可能：我们看到在过去有成功的同化例证，而共同的政策，相互的让步，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是重要的论据，再加上由于40年间同时经受的共产主义的实践，双方新的共同的结构已经形成。尽管如此，文明是根深蒂固的。顽固而成功地捍卫民族语言这单独一个问题便证明了这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没有抛弃它们的本土文明。因此，至本书撰写之时，争论仍在进行。人们甚至可能感到疑惑：扫盲斗争和苏联普遍的教育发展，是否实际上加剧了中亚居民的民族意识。

·繁荣昌盛或“资产阶级”文明：把苏联引向共产主义社会极乐世界的二十年计划的宣布，并不是一纸空想。

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那些彼此间从未取得一致的专家们说，苏联应当有办法实现这向福利的跃进。在广泛舆论的范围内也是这样，既（热切地）渴望和平，又渴望物质的进步，并且相信今后这种进步是可能的，一代代青年满怀热情地汇集在国家活跃的生活范围内。一场巨变正在酝酿，即将产生，不管它将采取何种形式，或以后人们会给它贴上何种标签。

1962年，苏联生活被这种向工业革命最后阶段的快速前进主宰。自从1958年七年计划强调那些要求建立某种类型的“尖端”消费社会的新工业以来，赫鲁晓夫的革命向这不远的将来敞开了大门，这些新工业是：电子技术、机电技术、原子能、塑料、合成化学，所有这些新型工业，它们一边期待造成一个新的消费者阶层，一边需要和形成“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穿白大褂的技师、工艺学家、研究室的研究员、实验室的科学家……正是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压力，在更长或更短的期限内，使苏联的民主化不可逆转。我们向其借用这些细节的那位社会学家这样得出结论。

这种推动力，这种压力，还必须打开一条跨越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党的兼有生命力量与惰性的道路。而必然地，共产党试图把历经多少艰难困苦后达到的舒适与富足，记入它的功劳簿，试图把这一成就算作它

的成就。

如果苏联能够证明在过了40年社会主义生活后，它已彻底变成另一种模样：如果1917年的俄国一直生活在西方文明的范围内，那么1962年的苏联，按照“资产阶级的”西方所采取的标准，将不能想象达到富足，只有这样，事实上才告成功。总之，要是苏联证明繁荣昌盛本不为它自己，还为西方和美国，那才是“共同分享”革命的最佳方法。

基于这一点，无论什么都不可能预测。未来尚是未定之天。苏联仍然可能想出既非美国的又非欧洲的，而是它自己的解决办法。

·国际共产主义。在这一方面，事情同样也是悬而未决，也没有明确表现出多少昭示未来的迹象。

从1961年10月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中，西方评论家非常乐意看到国际共产党铁板一块局面的结束，好像苏联故意放弃独有的领导职务和它所包含的供奉，而致力于苏联一家的跃进，准备只身成为由于实现了物质的繁荣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完善的共产主义国家。总之，苏联从今以后似乎接受双中心论（中国、苏联），甚至多中心论，“祖国共产主义”。每个国家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自行处理自己特有的问题。

如此绝对，看来是鲁莽的；甚至在共产主义大家庭内部，政治也服从于普遍的规则：翻脸，争吵，甚至互相威胁，随后言归于好，顺从妥协；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是唯一提倡妥协的人。苏联对中国的不信任并非始于今日：在历史上的几个世纪，而且也在19世纪的冲突中，它就根深蒂固，俄国与其他列强为伍，一起瓜分中国的财富和战利品。但是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在程度上同样强烈，“冷战”的现实就摆在那里。不管苏联愿意与否，为了那些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原因，它无法躲在它的新繁荣里。苏联被迫根据国际现实来考虑它的国内政策。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上像行星围绕太阳旋转那样围绕着苏联的各国共产党看来出现了分化的迹象。这些围绕苏联转的共产党行星常常彼此迥然不同。

在轨道的外围，是各国的共产党，其中一些处在西方繁荣国家敌对的环境里（比如法国、意大利），甚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比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及联邦德国）。在那一时期，在政治上对他们持敌对态度但经济上软弱的西方国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此即西班牙、葡萄

牙、拉丁美洲的情况）；其他一些共产党还活动在不发达国家的舞台上，一切希望在这里都是合法的，苏联或中国的经验使它们着迷。

往里靠近一些，但也很遥远，是共产党国家卫星国。那些直接面对西方的“前沿地带”共产党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护着苏联的欧洲大陆主体：它们是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造。除了保加利亚（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它们全都是快速工业化国家。况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从过去继承了强大的工业，早在进入共产主义前就已具有规模了。最后，在前沿地带的边缘，则是阿尔巴尼亚这一离心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同样具有特性的南斯拉夫。

这些国家的立场错综复杂：一方面，它们没有脱离苏联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结构改革，它们未来的保证（波兰或匈牙利的土地改革，大地产的消失，以及工业化），没有共产主义的贸然侵入，无疑是没有可能的或不那么容易的。实际上，在每个国家，由于其经济状况的不同和文明根基的不同，它们与苏联和共产主义本身的关系，或多或少是可以信任的，或多或少是自由的，或多或少是有成果的。

最后，在极远处，是被重重困难压弯了腰、又因自豪感而直起腰杆的共产党中国。它是现今世界上面积最庞大的不发达国家。中国确实是有别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幅匆匆绘制的地图，反映的不仅是政治位置，也是经济位置。经济位置不支配大局，但事先改变大局方向。长期以来煞费苦心把自己置于为首地位的苏联，顷刻间有成为胜利者中孤家寡人的危险。

1966年附言

苏联与自己不可思议的命运斗争。在中苏冲突爆发之前，这回是政治成为主角，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17日）不过是个插曲。

1962—1964年，中苏冲突愈加严重。1962年之前，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是主义问题和阿尔巴尼亚问题；反过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则针对南斯拉夫和“修正主义”。1962年，古巴事件加深了中苏鸿沟。针对苏联的第一次明确抨击（策略上的冒险和战略上的投降主义）就发生在古巴危机之后。1963年，在各种大会上（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冲突日益明显。由苏联发起的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被认为是使共

产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的一个阴谋。

1963年深层分歧显露出来，实际上这种分歧自斯大林刚刚去世起就已存在。上半年是进行最后的修补。1963年3月9日，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苏联则要邀请一个中国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作为回报。5月9日，中国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但是6月14日，北京发表了代表中国态度的25点意见（二十五条）：中国认为苏联从国家之间的自由和解放的战争中看出包含着世界核冲突危险是荒谬的。如果苏联保持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力量关系的错误评估和担心美国使用核武器的错误战略概念，那么它就无法胜任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一职。总之，这是政治上和平共处政策的终结。

苏联驱逐了在莫斯科散发中国25点意见的一组中国人，指控中国挑唆苏联公民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认为不公开发表恰恰证明苏联拒绝考虑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将之变形为国家间的冲突。

如果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会谈（7月5—20日）以完全的失败告终，丝毫也不令人惊奇。

中国对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停止核试验的协议进行谴责，认为这表明苏联政府与帝国主义结成了同盟；苏联人则反过来指责中国违背了它与列宁确定的和平共处原则。中国人揭露苏联在1959年废除了1957年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协定（包括交付一部分核武器）。苏联方面则指责中国具有无限的野心，认为苏联最好把自己的力量用到经济发展上去，并宣布中国想做非洲和亚洲革命运动的领袖，但具有种族主义特征。

1964年，论战围绕着苏联反宣传的两大主题展开。

（1）中国对苏联（和印度）的“领土野心”。苏联人从毛泽东接受日本国会的采访中搜寻到中国意图修改中苏边界的证据。这个证据很不充分，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民族问题。

（2）中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在苏斯洛夫（Souslov）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64年2月14日）中明确提到，随后戈乌罗夫（Govourov）在阿尔及利亚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及。

苏联最后一次反对中国越来越可预见的原子弹爆炸，是Zorine的声

明：中国人有特殊目的，与共产党联盟不相容，在中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时，不能再自动获得苏联核武器的支持。这个声明方便了美国在东京湾事件之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

这一冲突对欧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它有利于苏联放松对其卫星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使西方共产党可以自由发展［可特别参看陶里亚蒂（Togliatti）在《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团结问题备忘录》（*Memoriale di Jalta* ）中的立场］。所有这些外部紧张状态不能掩盖苏联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演变。苏联领导人逐渐承认了自然经济法则的分量，并努力赋予其合理的地位。这也是改造企业管理的意义所在。这些企业应该适应消费市场，尤其是顾客的意愿，不再是满足于回应计划制订的生产标准。

至于苏美关系，如果说它一直处在和平共处的框架内，曾经被暂时“冻结住”，那么这既因为美国的对越政策——主要是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也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论战。苏联于是赋予与西欧国家关系以重要性，从而改善了双方关系。这些国家中，法国，出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占有特殊地位。1966年6月，戴高乐将军出访苏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新的国际局势有关。

[1] 泰加（taïga）：源自俄语тайяа，泰加森林，北方亚寒带针叶林的一种，位于苏联北部西伯利亚等地。——中译者

[2] 瓦朗吉亚人（Varegues）：是斯拉夫人对中世纪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称呼。——中译者

[3] 哈扎里亚（Khazarie）：即今克里米亚。——中译者

[4] 克里普特（Cryptes）：意为教堂里埋葬死尸的地下室，或地下小教堂。——中译者

[5] 斯拉冯语（Slavon）：中世纪东正教斯拉夫人使用的宗教语言。——中译者

[6] 奥斯曼土耳其人（Turcs Oamanlis）：土库曼诸部落之一，13世纪随着塞尔柱突厥王朝的入侵而定居小亚细亚。塞尔柱素丹为其在索古特划定地域，这个地区后来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核心。——中译者

[7] 帕雷奥洛格家族（les Paleologues）：11世纪中期拜占庭名门望族，1261年米歇尔八世登上王位，开始了该王朝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直至拜占庭帝国灭亡。——中译者

[8] 普加乔夫（Yemelian Pougatchev，1726—1775年）：俄国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顿河哥萨克人。1773年率众起义，要求废除农奴制，曾攻克乌拉尔地区重要工商业中心奥伦堡。1775年起义失败，普加乔夫在莫斯科被处死。——中译者

[9] 波特金（G.A.Potemkine，1739—1791年）：俄罗斯元帅和政治家。拥立叶卡捷琳娜二世称帝，参加1768—1774年俄土战争。积极开拓黑海北岸地区，创建黑海舰队和商船队。1787—1791年俄土战争时任俄军总司令。这里说的著名航行是沿第聂伯河进行的，由俄国女皇、奥地利皇帝、波兰国王参与。——中译者

[10] 黎世留公爵（Ducde Richelieu，1766—1822年）：法国政治家。黎世留元帅（1696—1788年）之孙，1790年逃亡，为俄军服务，参加俄土战争，任敖德萨省省长（1803—1814年），复辟时期回法国，任外交大臣和首相。签署第二巴黎条约（1815年）。——中译者

[11] 英译本作“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或接连相继的阶段”。——中译者

[12] 赫尔岑（Alexandre Herzen，1812—1870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作家。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后可通过人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曾在国外创办第一个俄罗斯刊物《钟声》。主要作品有《往事与深思》《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等。——中译者

[13] 乔治·居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1897—1965年）：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研究在法国的革新者，结构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识到社会事实的多样性，着重研究法律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中译者

[14] 源于希腊神话。厄利斯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有3000头牛，30年未打扫，粪秽堆积如山。赫拉克勒斯使河流改道，在一天中即将牛圈冲洗干净。——中译者

[15] 吕西安·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1913—1970年）：法国哲学家和评论家。他试图确定一种真正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个人创作与社会生活间相互的必然关系，1964年发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译者

[16] 普列汉诺夫（Georges Plekhanov，1856年11月29日—1918年5月30日），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早年曾参加民粹组织，后因该组织采用恐怖手段而与之决裂。流亡国外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883年成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劳动解放社。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和《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曾支持列宁，后转而支持孟什维克。——中译者

[17] 到本书成书的年份即1962年。——中译者

[18] 原文如此。似应为8.3%，英文版即这么处理。——中译者

[19] boom为英语，“繁荣”或“飞跃发展”之意。——中译者

[20] 儒勒·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政治家，以实行反教会的教育政策和在扩大法国殖民地方面取得成就闻名。律师出身，曾任巴黎市长和政府总理。最显著的政绩是在1882年通过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立法，并采取其他反教权措施。——中译者

[21] 直译为《特拉维亚塔》（La Traviata），是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四幕歌剧。——中译者

附录 英译者前言 [1]

任何一位第一次接触已故费尔南·布罗代尔著作的人，需要的可能都不是一个前言，而是四个：（一）对布罗代尔本人的介绍；（二）对他代表和参与领导过的法国年鉴学派的介绍；（三）对本书的介绍；以及（四）对翻译的介绍。

一

“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君王。”1967年，法兰西学院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这样评价时年65岁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与许多传奇英雄一样，他也出生在一个乡村——位于洛兰西北部默兹省的吕梅维耶村（Luméville）。

这里有同样的一排一排毗邻的大型房屋，里面既有居住区，也有谷仓和马厩；房屋背后是园子，但庞大的谷仓开在前面，正对宽阔的街道，les rues à usoirs，两侧胡乱堆放着大车、耙、犁、粪堆。房顶上铺的是称作“罗马”瓦的曲线形瓦，尽管现在人们不认为洛林的这一传统与罗马有什么关联……

我承认，在我意在创造幻觉的旅行中，在梦中，我曾认为欧洲发端于索姆河、默兹河或莱茵河河岸，向外扩展到了西伯利亚和遥远的亚洲。这类想法之所以涌上心头，是因为自莱茵河到波兰，沿途我看到的是与自己童年时在洛林乡下见到的相同的农村建筑，相同的成簇集中的村落，相同的开放式农作方法，相同的谷田，相同的三年轮作制，相同的塑像……

无疑，如果一个人能够用魔法回到过去，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看看那时法国的农舍，他会有充足的理由抱怨。耕种田地非常辛苦，而且没完没了，尽管有靠不住的自由。是的，人们可以另做选择，但只能是从一个艰苦繁重的工种换到另一个同样繁重的工种。虽然如此，人们并没有互相抱怨，无论是对缺少流动的水源（水必须从井里或村子水泵中引出），还是对夜里暗淡的灯光（没有电）、仅仅偶尔整新的褐色布，抑或缺少城镇里的便利和娱乐。幸亏有了菜园，有了田地（现在又有了

新的作物土豆），有了保存完好的水果和蔬菜、周日时的鲜肉与通常在家里宰杀和食用的家猪，每个人都够吃够喝。但我能够把我童年的记忆视为可靠的源泉吗？

与阿尔萨斯一样，洛林数百年来一直在罹受着外敌入侵和领土合并之苦。可能与它地处法国边疆有关，这里是法国爱国主义的故乡。圣女贞德（Joan of Arc）来自栋雷米拉皮塞勒（Domrémy-la-Pucelle），莫里斯·巴雷 [2] 来自摩泽尔河畔的沙尔姆；凡尔登是它的主要战场；洛林的双条纹十字是夏尔·戴高乐将军的徽记。费尔南·布罗代尔写道："我怀着与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同样苛刻、同样复杂的一片真情热爱着法国，不论是它的美德还是缺陷，也不论是我乐于接受的还是不易接受的东西。"但法国不是他的唯一所爱。他在别的地方写道："我极其热爱地中海，这无疑是因为我随许多其他人之后，同他们一样从北方来到这里。我十分高兴能把长年累月——比我整个青年时代还要漫长的岁月——的研究奉献给它。"

作为一位教员的儿子，他到了地处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附近的伏尔泰中学读书，而后进了索邦，1923年在那里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他得到的第一个教职使他南下到了地中海对岸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经历是非常有益的。

我非常幸运地发现自己终生都生活在宽容的气氛中。对此我感到欣慰。但我无法宣称我个人在那方面有什么功劳。比如说，1923年我已年逾20岁时，我才在阿尔及利亚真正发现了犹太人问题。在此后10年间，仍然在阿尔及利亚，我生活在一个穆斯林国度里，在那里学会了理解、尊重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是不是在那里他还开始查询当地的档案呢？后来他可以这么说，"我阅读了"阿尔及尔原总督府大楼——"那里非常奇怪地收藏着西班牙文献"——的"所有藏品"。

布罗代尔于1932年回到了巴黎，在孔多塞中学任教。这所中学位于阿弗尔大街，靠近欧斯芒林荫大道；后来他又到位于拉丁区万神殿后面的亨利四世中学任教。但三年后他又离开了故国——这一次是去了世界的另一侧。

1934年，一座新的大学在巴西成立，此即国家资助的圣保罗大学，内含历史悠久的法学系和其他现存机构。1935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应

聘到了那里，在艺术系任教三年。

这同样是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体验。布罗代尔写道：“生活在巴西，我与黑人相会，其气氛令人想起《飘》一书中描述的情景。”

昔日，1939年以前，拉丁美洲仍是半殖民地的美洲。占据政治生活和文化的狭小舞台的，看上去只是少数演员，同时他们还操纵着清闲的事务。他们可爱、有魅力、有教养，拥有几百几千公顷的土地，还是庋藏丰富的图书馆的所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奢华亲王，令来自欧洲的记者、旅行家或知识分子为之着迷。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已经给人留下落后于时代、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印象；这些人物常常身负重大责任——这个人负责英国在巴西的几乎所有资本，那个人担当某个迪尔伯恩化学公会的代理人，还有一个人是公共财政的主宰，或是国家总督，还渴望成为共和国总统，另外一个人是来源于民众的总长。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有的人都过于愿意从他们图书馆的高处，从他们思想的高处，进行统治，仿佛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宇宙之中。他们相信文化、文明、理性的美德。在专制或更确切地讲是开明家长制的氛围中，他们有些类似于欧洲19世纪闻名一时的自由主义的贵族类型。

在他们旁边，远离他们小心翼翼地封闭起来的圈子，是一些新人物，一些暴富的移民、工业家，他们已经开始闪电一样迅速地获得经济成功，而且只有他们的子弟最终才能学会某种程度的优雅风度。

在观察巴西社会的同时，费尔南·布罗代尔利用这几年的时间为其有关地中海的宏伟论文进行钻研。早在1932年他就访问过巴勒莫——结果只是发现“国家档案馆（the Archivio di Stato）和公共档案馆（the Archivio Comunale）大门紧闭，我只能在前者那里待上几天，只能看到后者庞大建筑的外景”。他的遗憾在“藏品丰富的公共图书馆（Biblioteca Comunale）”得到了补偿。但与所有研究人员一样，他不得不面对其他挫折，包括不得在价值无限的拉古萨档案馆（1935年他在那里工作）给文献拍照。他写道：“这一次使我的研究变得百倍地困难。”

还有比这大得多的困难等着他呢。1938年，布罗代尔回到了巴黎，成为享有盛名的开设研究生课程的高等实践研究院的一员。他又一次在拉丁区工作，所在位置能够更好地利用法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和外交部的文献收藏。研究深入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不再可以仅仅从远处注意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的档案。我的打算是通过阅读这些档

案馆所藏的一些文献而对许多已出版著作做出补充。”但如他指出的那样，“局势”使他无法那么做。1939年战争爆发了，1940年法国沦陷。费尔南在莱茵河前线任中尉，不久成了德军的战俘。

终究有没有一位法国人，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我们的命运在其自己自然发展时一而再地把我们压倒的特殊悲剧时刻，不因他的祖国而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呢？这些大灾难就像历史画布中的大帐篷，或者像我们从飞机上瞥见的云中裂洞，把光柱投向我们看到的下面的大地。裂开大口的灾难，地上的深坑，投下的幽暗的光柱——我们历史中不乏这类东西。不必追溯太远，到19世纪为止吧，就有1815年、1871年和1914年几个可怕的年份。随后是1940年，丧钟第二次为我们在色当敲响：此时敦刻尔克的戏剧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败的混乱无序结束演出。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这些重大的创伤也被治愈、逐渐消失和被人遗忘——根据所有集体生命的铁的法则：一个民族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人”。

我亲身经历了其中的一些灾难。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在1940年的那个夏天不得不直面这些问题——从命运的任何反讽来看都极为炽热，散射出光芒、鲜花和joie de vivre（生存的欢乐）。我们这些失败者，步履蹒跚地沿着不公道的道路走向不期而至的囹圄。我们代表着失败的法国，风儿掠过沙堆，带来阵阵尘土。真正的法国，la France profonde（深处的法国），依然处在我们的身后。它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它确实继续存在了下去。

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是这样——他的战斗精神就是这样。他在德国吕贝克战俘营里度过了五年时间，直至战争结束。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身陷囹圄的状态下，他撰写了其有关地中海的论文的大部分。他说，这部分地是“对我所经历的悲剧时刻做出的直接生存反应”。

我们敌人的电台和报纸传送给我们的一切情况，甚至我们的秘密电台接收到的来自伦敦的消息——我必须把它们都抛在一边，抵制和否定它们。不要管日常发生的事件，尤其是那些伤脑筋的事件。我不得不相信：历史、命运是在一个深得多的层面上被人书写的。

战争结束、费尔南·布罗代尔回到法国后，他把整个论文整理成型，并在1947年成功地举行了博士论文答辩。两年后，它以“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一名出版——该书使他一举成

名。到他在1985年去世时，他已被选入法兰西学院，而他在法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和一般读者中也赫赫有名，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

到了80岁高龄后，他仍在不断地写作和出书。1963年，《文明史》问世，它构成《当代世界史：历史与文明》的一部分，该书另两个部分分别由苏珊娜·贝耶和罗贝尔·菲利普撰写。1966年，他对《地中海史》做了彻底修订和增补。1967年，布罗代尔出版了《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英译本名为《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年》）。此后，在1969年，是一部题为“论历史”（*Ecrits sur l’histoire* ）的论文集。而后，在1979年，三卷本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ėle* ）问世（英译本把三卷分别译作《日常生活的结构》《商业轮回》与《世界的前景》）。费尔南·布罗代尔最后一部大型著作是《法兰西的特性》（*L ’ Identité de la France* ）。

我很晚才回到这个近在咫尺的圈子，而且显然感到高兴。事实上，历史学家只有研究本国历史才能真正得心应手，他几乎可以本能地了解它的迂回曲折、独特品格和薄弱环节。对于异国他乡，无论他怎样博学，也永远不会拥有这些王牌。因此，我没有先挑可口的白面包，而留着在晚年享用。

这些还不够。作为完美主义者的布罗代尔在去世前仍在撰写着本书。1986年，经由他的遗孀保罗·布罗代尔夫人之手，该书被交给出版社正式出版。最后，在1987年，《文明史》法文第二版问世。

二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故土的地位不可谓不尊崇。作为一位先知，在倡导一种新史学时，他却没有马上得到回应。1985年10月20日，在夏托瓦隆（Chateauvallon）进行的最后一次公共演讲中，他说道：“我喜爱的人对我说：‘不要像平常那样胡言乱语。’你们认为我听从他们的忠告了吗？”听众们体会到了他的嘲讽味道，因为使他在某些传统史学家看来不理智、胡言乱语的，正是他研究历史的广度。

虽然他关于地中海的学位论文被考官们认可了：

没有鼓乐之声，但耳畔回响着上千句好听的话语；尽管如此，1947年，我……却被排除出索邦。那年举行论文答辩时，一位主考官平和地对我说："你是一位地理学家，让我去做历史学家吧。"1949年我确实被提名进入法兰西学院，但该学院相对巴黎学来说是而且一直是微不足道的。同一年，我奉命主持全国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历史学部分的工作（président du jury d'agrégation d'histoire），但这仅仅出于当时任中等教育总监的古斯塔夫·莫诺（Gustave Monod）个人的意愿。莫诺试图改革这一神圣庄严的考试制度，急于使大厦倾覆。我未负职守，但1954年，我被解除了职务，索邦重新把这一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那些年里，如果说我和吕西安·费弗尔成为该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是由法国历史学家全体推选的），我们仍属于少数派：处于名单前列的是思想右翼之士。实际上，一年之后，我就被选举团成员摈诸门外。

布罗代尔可以像拉辛（Racine）作品中的菲德拉（Phedre）那样说，"Mon mal vient de plusloin"（我的苦难由来已久）。与索邦的冲突至少可以追溯到1929年，该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斯特拉斯堡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杂志。尽管杂志第一届编委会中包括两位索邦教授，但他们没有一位是正统的历史学家。其中一位，阿尔贝·德芒容（Albert Demangeon），是人文地理学教授，另一位，亨利·欧塞（Henri Hauser），是经济史教授。在其他成员中，一位是法国外交部的档案专家，一位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一位是那里的罗马史教授，一位是巴黎法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位是法兰西银行的副行长，最后一位是比利时经济史专家亨利·皮雷纳（Herri Pirenne）。

正如刊名所示，《年鉴》试图扩大历史编纂学的范围，把经济学和社会关怀，同时还有政治学和外交，包容起来。布洛赫和费弗尔在发刊词中写道："一个人专注于其正常的专业分工，辛勤地耕耘着自己的后院，不过仍要迫使自己关注一下邻人的工作，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但围墙太高了，很常见的情况的是，它们使人看不到其中的风景……正是为了填平这些深沟裂痕，打倒这些高墙，我们打算提出自己的准则。"

布罗代尔在回顾过去时写道：

可以肯定，他们有意识地努力创建一个全新的甚至革命性的史学。他们的方法相对说来很简单。对他们来讲历史学是各种人文科学中的一种。不必踮起脚尖，历史学家就可以瞥见相邻学科的田地和庭院。那

么，尽管壁垒把它们彼此分开，试着看一下那里发生了什么，恳请支持建立一个人文科学共同体，把它们视为历史学的必要的辅助手段，是如此复杂、如此不同寻常的事吗？试想一想，历史学家能不能够以服务换得服务？服务的交换：我相信，这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年鉴》最后和最深刻的箴言，是它唯一的战斗口号。

今日，当历史学家展现出历史学比过去多得多的方面，并使过去牢牢分化为宪政、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历史规范进行交流而相互得益时，这样一种口号可能看上去多余了。

但在1929年，这一口号是全新的，它提出的纲领在传统史学家看来是不合常理的和荒唐可笑的，即便对新思潮的信奉者来说可能也过于大胆了……

斯特拉斯堡两位教授面临的任务是显而易见的：深入到其他规范之中，带着战利品返回，再一次着手进行新的发现，利用每一个机会拆除妨碍交流的壁垒。另外，突袭对手看来是最好的防御。

在斯特拉斯堡，那些对手被起了“索邦分子”（les Sorbonnistes）的绰号。

那一绰号，如格特鲁德·希默尔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教授指出的那样，“在《年鉴》杂志由斯特拉斯堡迁到巴黎之后失去了某些刺伤力”。但尽管吕西安·费弗尔加入了法兰西学院，马克·布洛赫被指定为索邦教授，但他们二人都没有逃脱布罗代尔所说的“索邦谨防的敌意”。在被布罗代尔指斥为“可耻”的一场选举中，布洛赫未能被选入高等实践研究院第五部，而且被法兰西学院“排除在外”。像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布洛赫能够赢得索邦的教授席位，仅仅是因为“根本没有其他候选人有足够的资格接替亨利·欧塞的经济史教授职位，此为法国大学体系中唯一的经济史教授席位”。

同一年，即1937年，布罗代尔加入了《年鉴》杂志编委会。他留恋地把这形容为：

一个小的团体；尽管增加了“新人”，亨利·布隆什维希（Henri Brunschwig）、厄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雅克·苏泽勒（Jacques Soustelle）和我，仍可能舒适地聚集在吕西安·费弗尔位于瓦尔-德-格莱斯大街的客厅兼办公室，我们亲密地称之为“瓦尔”（le

Val）。

马克·布洛赫未能躲过布罗代尔所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令人发指的裂缝”而生存下来：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个成员，他于1944年被纳粹枪杀了。但《年鉴》杂志仍在继续办。它已经两易其名，一度被称为《社会史年鉴》与《社会史文集》；1946年，它用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名称：《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到那时，布罗代尔已经成为杂志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956—1968年他实际上是该杂志的主编。布罗代尔写道：

这无疑是一个新时期。但对第一代使之流传的众多思想，《年鉴》的第二代没有添加任何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我们这些新来者，夏尔·莫拉泽（Charles Moraze）、若尔热·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和我，没有为这一现存的理论库贡献任何真正独创的思想或概念……事实是，整个新一代历史学家都是从《年鉴》的思想框架中选择其“论文主题”，即其未来工作和事业的方向。因而，我把这一时期设想为理论转化为实际、年鉴模式与广袤的历史现实相冲突的时期……

那时与《年鉴》有关系的学者，包括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人——不仅有亨利·伊雷内·马鲁（Henri Irenee Marrou）、阿尔方索·迪普隆、约瑟夫·沙佩和吕西安·戈尔德曼这样的历史学家，而且有结构主义者罗杰·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这样评价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任主编期间，该杂志成为法国、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史学阵地。它还为事实证明具有非常大的独创性。它现在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范式，而从人类学、人口统计学、心理学，甚至符号论和语言学中汲取了主题和方法。”正如美国研究《年鉴》杂志的学者特拉扬·斯托扬诺维奇（T.Stoianovich）所述，“它既关注‘历史的非男性化’，也关注妇女史、青年史、儿童史、口述文化、志愿团体、非西方文明与非一致论文化的发展”。

实际上，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年鉴》杂志把网撒得还要大。为了寻求“总体史学”，他们把地理学、气候学、物理学、生物学、宗教学、神话、航海技术包括在内，此外更重要的，把电影和文学也没有遗漏在外。比如，在《地中海史》一书中，布罗代尔不仅提到了撒丁小说家格拉齐亚·德拉达（Grazia Deledda）的*La Via del Male*（1986年）和*Il Dio Dei Vivenit*（1922年），提到了加布利埃尔·奥迪西奥（Gabriel Audisio）、让·焦诺（Jean Giono）、卡罗·莱维（Carlo Leri）、安德烈·

尚松（Andre Chamson），甚至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的作品，而且提到了维托里奥·德塞达（Vittorio DeSeta）1961年拍摄的电影《奥尔高索洛的强盗》（*Banditi a Orgosoto*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增加了一个高等实践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第六部，《年鉴》学者的权威大大加强了。用特拉扬·斯托扬诺维奇的话来说，这“被视为一个不授学位的研究生中心，与《年鉴》杂志相关的学者以及其他杰出的或有前途的学者在这里培养高级研究人员，并就社会史、经济史、经济学以及行为或传播学的方法和问题进行研讨。该部几乎从一建立就下设了一个由布罗代尔领导的新的历史研究中心和一个由夏尔·莫拉泽领导的经济研究中心”。

它之所以获准成立，仅仅是因为高等研究院像法兰西学院那样无权授予大学学位。第六部作为一个边缘性的、仅仅为了研究目的而成立的机构在困难中缓慢发展起来。它知道如何把这种限制化为力量，化为自治的基础，这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它越是成功，来自传统的巴黎大学的反抗和敌对就越是强烈——确实，随之而来的也有罕见的友谊。

1963年，一个新的人文科学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成立了。它最初很分散，但1970年在一幢独立的钢结构玻璃大楼中集中起来，布罗代尔任行政主管。

这一机构是在巴黎大学阻止我们成立一个实验性的经济和社会科学系之后作为我们最后的避难所而成立的。是的，几乎直到1968年之前，我们一直是异端分子，虽然人数可能越来越多，力量可能越来越强大，但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被迫为每一次让步进行不间断的斗争。

1968年5月和6月的动乱改变了一切。……实在是命运的作弄，对我来说这一时期是当权时期。索邦城堡在1968年被一击而垮了，而分化为十几个不同的高等学术机构。伴随着此后进行的改革，一种新的生活开始扎下了根，值得称许的创新不止一个。这些改革造成的一个结果，是第六部在1975年失去了许多职衔和尊贵的名字，变成了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拥有了授予学位的权力。

这样，《年鉴》集团，像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权势集团。如此一来，他们反过来面临不仅仅来自那些他们昔日提出挑战的人的批评。阿瑟·马威克教授（Arthur Marwick）写道：“普通读者会发现《年鉴》成了一个非常令人可畏的杂志。与其他一切学术杂志

一样，它无意去担起与范围更广的读者、作为整体的社会交流所必不可少的历史任务……在《年鉴》杂志的论文中，统计表格充斥各处，其严格的意义并不总是被表达得非常清楚（除了据称它们展现出一种坚实的结构基础）；另外，流程图和示意图时常看上去意在让人佩服而不是说明问题；视觉资料时常被复制，似乎它们是不言自明的（当然，它们从来不能起这样的作用）。”

更严重的是马威克强调指出的三点：“仇视并忽视政治史；学术研究集中在中世纪史和近代早期历史，总体上回避工业社会和当代社会；以及试图把结构主义引入历史学，对这一点外行未必能够完全认识到。”

马威克温和的批评没有多少是适用于布罗代尔的。但在《地中海史》第二版末段（写于1965年6月26日）他承认：

论气质，我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很少受到事件甚或短期的局势的影响，它只不过是同一地区事件的聚集。

在更早些时候，他把这些事件称为“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在其未竟之作《法兰西的特性》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人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倒是历史造就着人，并且为人卸却责任。

正是由于布罗代尔明显超脱于较直接的人文关怀之外，才致使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教授在1967年写道，《地中海史》“提供了对有助于形成政策和行动的局势的非凡了解，唯一缺少的是政策和行动。书中有一种明显的和令人称羡的生命感，但这些生命如何穿过历史则很不清楚”。

对这样一种批评布罗代尔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已经使自己远离阿诺德·汤因比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和“无所不包的解释”。他同样对任何过于盲目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模式的历史学家不屑一顾，认为这种模式“僵化为简单化和被当成法则”。但他意识到他自己的“长时段”观点可以被称为“超凡脱俗”：

我经常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提问者有历史学家也有哲学家：如果

我们从这么远的距离看待历史，人变成了什么？他在历史上会起什么作用？他行动的自由会变成什么？

格特鲁德·希穆尔法伯抓住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在1940年布罗代尔仍是一名战俘、高呼“打倒日常发生的事件”并为其长时段历史学而努力时，“欧洲正因单单一个人的激情而动荡不已”。

不过，布罗代尔以他自己的方式已经承认我们或许可以称作“希特勒悖论”的东西。在《地中海史》中他写道：

这并不是说，这一灿烂辉煌的表面对历史学家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或者说历史的重建不能完全地以这一微观历史为出发点。……换言之，人类的历史是一张乐谱，这些单个的音符在它上面显现出来。……关于那一悖论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实干家是能够最为准确地量度自己能力的局限性，选择把自己保持在这个狭窄有限的范围之内，甚至利用不可避免的事物的重量、运用他自身的压力往同一方向推进的人。任何反对历史的主流——这种主流并不总是明显的——的努力预先注定都是要失败的。

确实，如特拉扬·斯托扬诺维奇指出的那样：“布罗代尔如他所宣称的那样从气质上可能是一位结构主义者，但他的结构主义是诗人、画家、戏剧导演或音乐指挥的结构主义。……在这样一位历史学家的作品中，甚至像大海这样的地理实体也可以被‘上升到历史人物的高度’（像吕西安·费弗尔评述的那样）。就这位历史学家而言，世界是一个剧场……然而，在最后的分解介绍中，导演们必须回到演员身上，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戏剧。”

布罗代尔很熟悉这造成的技术问题。1963年他问道：

人们能否采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同时抓住一种迅速变化着的、又因其变化本身及其场面而引人注目的历史和一种隐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悄悄的、当然是不引人注目的）、几乎不被见证人和主演者觉察的、终究抵抗住时间顽强的磨蚀并且始终保持原状的历史？

他找到了一个通过用三个量度或层面测量时间的答案：长时段，即结构和传统之在某种程度上静止不动的时间；中时段，即位于中间的“局势”层面，很少长过几代人；以及由事件构成的短促迅速的短时段。像他阐释的那样，每一时间段构成《地中海史》的一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不动的历史，即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人们或许乐意称之为“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如果这个词语没有脱离其完整的含义……

最后是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的部分—人们可以说，这种历史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保罗·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所说的事件史（l’histoire événémentielle）。……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对这种现在仍燃烧着激情，对这种当时的人在他们和我们同样短暂的生命中亲自感受过、描述过和经历过的历史，我们必须学会持不信任态度。

三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费尔南·布罗代尔绝非短见之辈，无论在瞩望未来还是在回顾过去时都不是这样。但他早就认识到需要把重点随意地由历史的一个范围或类型转到另一个上来。早在1936年9月，他就在圣保罗教育学院的一次讲演中阐述了他的某些基本思想。

讲演的主题是“历史教学”，它从询问如何把“教育小说”转变为一种“冒险小说”入手。布罗代尔说，秘诀在于简单——这不是“指歪曲真理、空洞无物、拾人牙慧的庸才的简朴，而是清晰、理解力出类拔萃者的简朴”。“到成为文明中心的地方去：希腊是爱琴海的一个文明，从色雷斯到克里特——而非巴尔干半岛文明。埃及则是由尼罗河养育的文明。”

他说，他的榜样是亨利·皮雷纳，“当今出类拔萃的用法文写作的历史学家”。要能叫人理解自己，要避免使用抽象术语。要想叫人听你的，“就要让所讲的历史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

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我坚持这一点。仅仅向学生讲授公司、支票和小麦的价格，是一种失职。历史编纂缓慢地经过了各个阶段，它曾一直是君王年代记、战争史或历史事件镜鉴；现在，得

益于勇敢的先驱者的诸般努力，它深深扎在昔日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这些阶段就像通往真理的阶梯的踏板。在学生面前，不要省掉任何一个阶段。

大约20年后，当布罗代尔发现自己处在法国中学改革最紧张的时刻时（这些改革间接地促成了本书的产生），这些原则再次浮现出来。历史教学是改革的目标之一。自1945年以来，在法国中学里，历史教学被按照学生学习的进度在年代上加以区别，开始时讲的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埃及史，但在前两个年级结束于所谓的“当代史”：一年级（première），讲到1789—1851年，最后一个年级（结业班，terminale），讲到1851—1939年。自1957年7月19日，教学大纲被推后了一年，这样1789—1851年在二年级（seconde）教授，1851—1945年在一年级教授，而最后一个年级（结业班）则用于学习“当代各主要的文明”。这些文明被分为“六个世界”：西方、苏联、伊斯兰世界、远东、东南亚以及黑非洲。

这一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任高等教育部长的加斯东·贝尔热（Caston Berger）的功劳，他还倡议成立后来的人文科学之家。但新主题的宽度——包括取自“相邻社会科学”，即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零星资料——明确显示出《年鉴》杂志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影响。不出所料，它遭到了强烈反对。两年后，即1959年，地理划分做出了修正：“当代世界文明”仅仅包括五个地区，因为远东和东南亚被合并为“印度洋和太平洋”，最后一部分则有所扩充，包括了“现今重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1914—1945年被推后到了结业班的第一学期。

这是一个倒退，但并不是失败。新教学大纲与布罗代尔的思想非常接近，激励他撰写了本书——部分地可能是为了预先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倒退。年鉴派成员莫里斯·埃马尔称它是一部“战书”，这是正确的。《文明史》最初是布罗代尔与苏珊娜·巴耶、罗贝尔·菲利普合著的《现代世界：历史与文明》的核心部分，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该书的首要目的是支持在中学结业班教授的新历史。正如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的“序”中所述：

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

很不幸，尽管在大学层次上获得了胜利，布罗代尔最终在中学之战中失败了。早在1964年，新近奉命到巴黎以北省里一家中学任职的莫里斯·埃马尔吃惊地发现，教师委员会做出决定，布罗代尔的著作“太难了，不适于学生使用”。此外，1965年，教育部进一步缩短“文明”教学大纲。正如莫里斯·埃马尔指出的：“在非殖民化的浪潮中，正值新独立的国家大胆地撰写自己国家的历史的时刻，1965年8月10日颁布的一个法令，全然要消除‘非洲世界’。”

1970年，布罗代尔的著作被悄悄地撤出销售架，此后不久，中学教学大纲再次做出改变，使高年级从一个针对过多旧习惯的革新中解脱出来，恢复了旧式的叙述性“当代史”：1914—1945年。教学大纲现在向低年级教授“新历史”，而向高年级教授传统历史。这是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改革的倒退。正如他于1985年在夏托瓦隆对听众讲的那样：

在业士学位考试上向孩子提问1945—1985年这个时期的问题，就像今天人们所做的那样，是可惜的、讨厌的，我确信，如果我是主考人，我将在业士学位考试中难倒不论哪一位历史学家！而如果人们向我发问，我自己也会被难题难倒！

不过本书不仅仅是布罗代尔在输掉的一次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它被撰写于《地中海史》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物质文明》第一卷问世之前，构成了他总的工作的一个坚实的部分。20世纪60年代，它被翻译成西班牙文，供大学学生使用，并被译成了意大利文，作为一种袖珍本定期重印。1987年，它在法国重版发行，删去了供教学使用的参考资料，而增加了1983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序言。英译本依据的就是该法文第二版。

四[3]

把布罗代尔的著作译成英文是一项不得不重视、需要才智的工作。普拉姆（J.H.Plumb）教授指责翻译布罗代尔著作的人毁掉了原书独特的火花。布罗代尔本人也承认：

把我那并非不复杂的风格改编得适于英语充满活力的韵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同意这一点。对于布罗代尔在前言中的引文，我转引了相关译者的译文，而没有尝试加以润饰。我本人承译的这部书在处理上在两个方

面较为自由。

保罗·布罗代尔夫人非常友善地对我说："与所有优秀的译作一样，你的翻译很自由。"并称它"快捷、生动，与这类作品非常相称"。对这些赞扬我深表感激，因为在翻译中我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布罗代尔夫人的热情帮助。除可能有的误排外，译文中的一切错误或瑕疵均由我负责；我非常乐于在将来再版时予以更正。

说这是一本"自由的"译作还有第二层意思。假如费尔南·布罗代尔生前看到这部书重印，他肯定想重新撰写它。在《地中海史》英译本前言中他宣称：

不经过彻底修订，我不想重印这部书。

在10年的时间里，他被要求"改编"《文明史》以适于更广的大众阅读；尽管他从未表示拒绝，但总是推迟进行这一工作。不过正如布罗代尔夫人所说，"在1993年翻译出版一部反映1962年的世界的书是非同寻常的"[4]。出于这一原因，我主要通过改变时态对原文做了小心谨慎的改变，意在帮助读者理解。我想，如果布罗代尔在世，他对笔者的这一处理也不会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本人就为意大利文译本添加了数页（主要是关于中苏关系）。

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一直令我感到震撼的是，真正需要根据时代发展做出修订的地方少之又少，以及布罗代尔是多么地富于远见。苏联反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密谋正在策划时，我恰巧马上就要译完关于苏联及其离心倾向的那章。似乎布罗代尔正在注视着这一切。不要说"我告诉你这么样"，因为这从来不是他的作风。但在那些非常危急的时刻，这至少提醒一位读者，在一位大师的手中，长时段如何能够帮助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最戏剧性的激变。

理查德·梅因（Richard Mayne）

[1] 英译本1993年由Penguin Group出版，英译者即本文作者。——中译者

[2] 莫里斯·巴雷（Maurice Barres，1862—1923年）：法国作家、政治家。其个人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曾给同时代人强烈影响。早期主要作品为《自我崇拜》三部曲，对其个人做了严格的剖析。从政后由爱国主义立场逐步转向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后创作了以"民族精力的小说"为总题的三部曲。190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中译者

[3] 此部分主要叙述作者把《文明史》译成英语时处理的方式。在翻译时，中译者仅保留了该部分的主要内容。——中译者

[4] 英文版于1993年正式出版。——中译者

译后记

一

1963年，如日中天的法国史学巨擘费尔南·布罗代尔雄心勃勃地进入历史教学领域，用年鉴学派的方法为法国16—18岁的中学生编写了一部教材，即《文明史》（*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 ）。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学术界的布罗代尔力图借这部作品，“说明和示范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可以教授和怎样教授。它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要使成为教育对象的男女学生对此产生兴趣，就必须使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埃马尔语）。要做到这一点，布罗代尔认为一项基本原则，是要让接受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在他看来，历史学通过发问和迂回到过去，是可以回应人们的好奇心、疑问，并回答今天提出的种种问题的。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我坚持这一点。仅仅向学生讲授工厂、支票和小麦的价格，是一种失职。历史编纂缓慢地经过了各个阶段。这一直是君王年代记、战斗史或历史事件的镜鉴；现在，得益于勇敢的先驱者的诸般努力，它深深扎在昔日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这些阶段就像通往真理的阶梯的踏板。在学生面前不要省掉任何一个阶段。”“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平铺直叙、形象、电视系列片、电影，即大体上传统的但又改进了的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因而，撰写历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人同时应该是“语言大师”，写作态度要极其认真，“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可以说，为了这部部头不算小的“小”书，布罗代尔倾注了全部的激情。

然而，就一本教科书而言，《文明史》无疑失败了。其表面的理由，如同时代法国一部最有名的教科书在前言中批评的那样：“即使这门课程的趣味不容置疑，即使对第二学位在学的学生来说，当今世界的这种学习研究具有诱惑力和好处，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使用这个教程有重重困难。许多技术字眼必然要涉及，必须使之简单易懂……”一句话，

这部教材难懂难教。表面上看，确实如此。《文明史》计分为上、中、下三编共25章。上编“文明释义”着重叙述了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它首先“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中编“欧洲以外的文明”分为三个小部分，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与穆斯林世界”“黑色大陆”（非洲）、“远东”的文明。下编“欧洲文明”同样分为三个小部分：“欧洲”“美洲”，以及“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叙述东欧和俄国的历史）。全书富于理论性，涉及面甚广，以集约的方式介绍了世界各大文明，并在不少地方提出了独立见解。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法国教育界内部的斗争。用埃马尔在《布罗代尔教授历史》中的话：“这部教程从问世之际就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课本：这是一部引起斗争的书，而且这是一场最棘手、进行起来最令人不快的斗争：反对行会习惯的斗争，因为不能强加于人，必须说服人，而为了说服人，就必须不断地从头开始，还必须反复地讲述。种种错误，甚至最丑恶的无知，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今天和过去一样，既不能归咎于学生，也不能归咎于课程，更不能归咎于课本。”在尖端史学领域，布罗代尔取得了巨大成功，蜚声国内外，但在中学历史教育领域，面对一个他无法控制的体制，他肯定无疑地失败了：历史教学恢复了从1914年、继而从1939年至今的当代的只叙述事件的旧史学，《文明史》在1970年就被悄悄地从销售目录中拿掉了，甚至未能入选教师用书。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文明史》却又取得了很大成功，某种意义上是一部无可替代的著作。对这部书的价值，出版方有充分的理解。在隔上几年就予以重印的同时，出版者一直恳求作者为另一批读者大众“改编”这部作品。布罗代尔一再推迟进行这一工作。因为“对每一部著作，他的写作逻辑都不容许做详细修改，而总是要求人们从零开始”。这部书也逐渐得到了世界的认可，1966年起，西班牙和意大利就率先做出了榜样。西班牙整本翻译了这部书，供大学学生使用；意大利出版了袖珍本，以后又不断重版。再后，英、德等西方文本问世。遥远的东方，也有了日文和中文译本。学界公认，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起，《文明史》为人们呈现了一部世界史，一部不同于《地中海史》的世界史，其目的是要考察过去与不远的将来，用莫里斯·埃马尔的话说，它“给了我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鸿篇巨制还要丰富。读读关于非洲、拉丁美洲的章节，你不能不击节叹服，在我们眼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竟可以写得那么好。而在不少方面，如关于东欧的章节，作者显示出远见

卓识。简言之，一部不成功的教科书蝶化为一部不朽名著，对世界各地产生着影响。

说到中学历史教科书改革，不由得联想到我国现代史上与布罗代尔相似的撰写历史教科书的两个人。一个是夏曾佑，他曾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今人评价它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这部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出版，民国时期广为人所关注，时至今天仍在重印，不过读者群已主要不是中学生。以新的史学方法撰写中学教科书的还有顾颉刚。顾氏认为，1922年，中国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是层累地造成的：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1922年，他以此在当时中国可谓全新的观点为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书成后印行160万册，却因所谓“非圣无法”遭到学术界以外各种势力的反对，后者认为这一历史教材竟然怀疑禹有无其人，太过荒唐，容易误导学生，不应作为中学教材，应当取缔，同时还要对出版商予以重罚。商务印书馆因此差点遭受灭顶之灾，历经周折方平息风波。就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史教科书而言，布罗代尔的这部《文明史》与顾氏那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一样遭受失败的厄运，尽管因国情不同没有后者那种磨难。布罗代尔有言：“有谁能够否认历史学的强烈作用呢？—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民族意识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没有这种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布罗代尔至死都在坚持自己对历史教学的观点。“谁敢说这种教学主张在今天新的改革时刻，丧失了其现实性呢？”（莫里斯·埃马尔语）

二

翻译《文明史》，是在跨入21世纪后不久，应斯时在北京贝贝特主事的呼延华兄之约着手进行。译事本拟由翻译过多部法国史名著的老友冯棠先生主要担当，但他因杂务缠身，再兼呼延兄在时间上要求较紧，他只愿承担其中一部分；不幸的是，刚刚完成所承译的那些部分的初稿，未及汇总通校通改，冯先生即沉疴复发，没有能够见到中译本问世即告别人寰，留下永久的遗憾和无法忘怀的痛。

为了告慰老友的在天之灵，为了向布罗代尔这位我最为尊敬的西方史学大师致敬，也为了布氏这部堪称经典的“小”书，我勉为其难，承担

起译著出版前的各种杂事：逐字逐句校改全书，统一译名和文字风格，补译部分内容，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添加一些译注，甚而包括部分编辑工作。法文水平不够，勤查勤问；知识有盲点，同样靠勤查勤问。7、8月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挥汗如雨，以满腔的热情与罕见的酷暑抗争。翻烂了两部字典，一部法文，一部英文；翻烂了两部西文原书，一部法文原版（Flammarion，1987年），一部英文译本（Penguin Group，1993）。英译本是托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常务院长刘东先生（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由亚马逊购买的。应当承认，校改译稿，大量参照了理查德·梅因（Richard Mayne）的英译本，部分章节，也主要依据英译本翻译。不过，所有译稿均据法文原版改定，英译本与法文原版不一之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亦以后者为准。

好在辛苦没有白费。2003年12月中译本正式出版后，得到读书界广泛好评。一些著名学者如李公明、蔡天新等郑重推介这部书；一些专业史学网站刊载相关评论文章；也有一些文章专门对这部书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如罗珍的《布罗代尔的历史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李宗奇的《略论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观与历史教学》等。搜索网站，可以看到大量相当有水平的评论，如朱正琳认为“关于文明或文化，布罗代尔有一个独到的概念，指向他所谓的‘长时段的历史’。他拒绝了‘历史哲学的概括’，而从人类学家那里‘借来’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最简单地说，‘这个定义里有三个起作用的因素：具有边界的文化区域、借鉴和抵制’。他认为只有这个定义是恰当的，而‘所谓恰当是指易于用来观察，而且足以排除任何价值判断’。这本《文明史纲》（上一版中译本用名），可看作这个概念的具体体现。我以为，读它会有助于澄清我们对时下被滥用的文明（或文化）一词的理解”。

网民“性情中老虎”称赞此书是“了解过去与现在的一把钥匙”。也有人感叹，这样一部写给法国16—18岁的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一部探讨文明问题的教材，实已成为学术上的经典著作。“能用这本书作教材的法国中学生是幸福的”。当然，幸福是相对的。没有相当扎实的史学尤其是世界史基础，想读通这部书不会那么容易。正因如此，许多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慨叹，法国的一部高中教材，让他们望而生畏。不过，历史系学生畏惧，并没有令其他学科的读者却步。或许与本书的主题即文明相关，不少文化学者大量引用它。更为奇特的是，不少大学的建筑系把它列为学生参考书。如一本《建筑学新生专业入门指南》这样写道：“读历史不能指望一些电视节目解决问题，历史这门学科包含太多东西，需要沉下来认真读些书——像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或者布罗代

尔的《文明史纲》这样的大砖头可能比较难读（不过也物有所值），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那几本相对轻松愉快。”还有一个让人完全想象不到的现象，即几乎全国省份的高考历史练习题或试题中，都有用布罗代尔《文明史》做题干的选择题或者简答题。与此相应，产生了许多与此书相关的课件或解读。这在无形中也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三

2003年年底，《文明史》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中译本当时取名《文明史纲》。这一译名是据法文本原著和英译本书名结合而成。而今选择“文明史”一名，主要是应出版方的要求，意在求新求异，其依据主要是梅因的英译本。实际上，法文原版*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 直译当为“文明语法”或“文明释义”，更为中国化且较为准确的译名或许当为“文明史教程”或“文明史基础”。

相较上一中文版《文明史纲》，《文明史》确实也有一些新的地方。首先，前者依据的是Flammarion 1987年版，现在依据的是Flammarion 1993年版。两版均系在作者身后问世，但新版除对上一中文版个别错误进行修订之外，还在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五章后补充了布罗代尔1966年撰写的附言（这些新增加的部分主要由张文英补译），反映了在本书1963年初版后作者对世界文明问题新的认识。如第十二章“中国的昨日与现在”后附言重点谈中苏冲突后的两个突出事件，一是中国原子弹爆炸，一是中法建交，后者因如今适值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读来别有意义。第十九章“欧洲的统一”后除1966年附言外，另附作者之子保罗·布罗代尔记录的布罗代尔1981年在意大利米兰博科尼大学就欧洲统一问题所做的演讲，涉及人文科学与历史学作用问题，弥足珍贵。其次，利用此次重版之机，我们对原译稿进行了再度加工，除润饰文字外，厘正了上版遗留的不少错误，包括把原译“上编文明史纲”改译作“上编文明释义”，使之更贴近作者原意。最后，根据世界形势新的变化（旧译《文明史纲》出版至今已十年有余），尤其是借助于越来越发达的网络，我们对上版注释做了订正补充，使之跟上时代的发展。校改工作主要由本人承担。因能力所限，译稿中仍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敬请方家不吝指教。

常绍民

2014年3月31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常绍民等译.-2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0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SBN 978-7-5086-7724-8
I. ①文… II. ①费… ②常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0905号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著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译者：常绍民 冯棠 张文英 王明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576千字
版次：2017年10月第2版
印次：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7724-8
定价：128.00元

Table of Contents

Table of Contents